



DAVID ABULAFIA

THE HISTORY

OF THE

PORT  
OF THE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下）

地中海人类史

〔美〕大卫·阿布拉菲亚 著

何帆译



DAVID ABULAFIA

#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 伟大的海

[下]

地中海人类史

[英] 大卫·阿布拉菲亚 著  
徐家玲 等 译 徐家玲 校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全二册 / (英)阿布拉菲亚 (Abulafia, D.) 著；徐家玲等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7

书名原文：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ISBN 978 - 7 - 5097 - 9112 - 7

I. ①伟… II. ①阿… ②徐… III. ①地中海区 - 历史 IV. ①K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6257 号

## 伟大的海 (全二册)

——地中海人类史

---

著 者 / [英] 大卫·阿布拉菲亚 (David Abulafia)

译 者 / 徐家玲 等 审 校 / 徐家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廖涵缤 陶 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33.375 插 页：2 字 数：74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112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5410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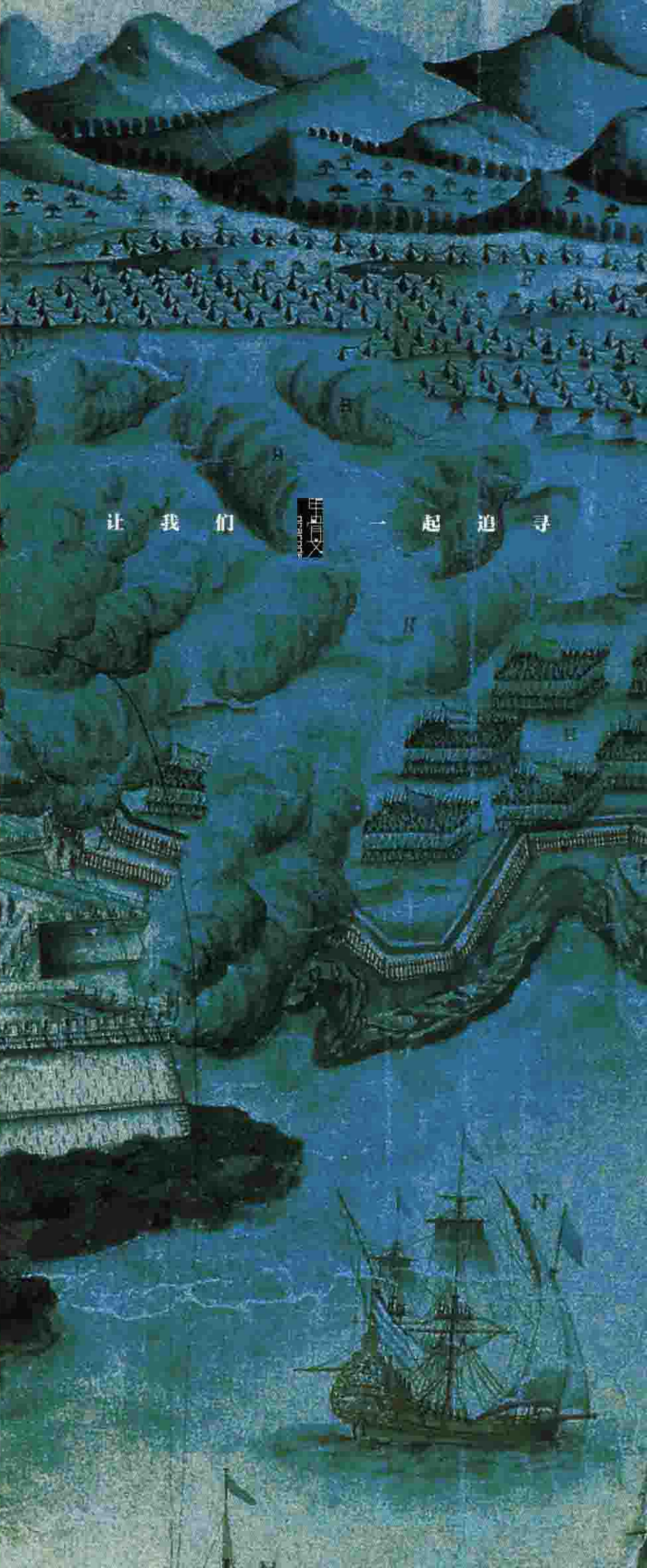
登 记 号

定 价 / 168.00 元 (全二册)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让我们  一起追寻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Text Copyright © David Abulafia, 2011, 2014

First Published 2011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2011,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鵝)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Allen  
Lane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鵝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本中文版根据 Penguin Books 2014 年版本译出。

## 目 录

图片列表 / 4

转写与纪年体系 / 1

序 / 3

导言：有多个名字的大海 / 10

第一部 第一地中海（前 22000 ~ 前 1000 年） / 1

一 孤立与隔绝时代（前 22000 ~ 前 3000 年） / 3

二 紫铜与青铜时代（前 3000 ~ 前 1500 年） / 19

三 商人与英雄时代（前 1500 ~ 前 1250 年） / 38

四 海洋人与陆地人（前 1250 ~ 前 1100 年） / 56

第二部 第二地中海（前 1000 ~ 600 年） / 81

一 紫色染料的贸易者（前 1000 ~ 前 700 年） / 83

二 奥德修斯的继承者（前 800 ~ 前 550 年） / 110

三 第勒尼安人的胜利（前 800 ~ 前 400 年） / 134

四 通往金苹果园（前 1000 ~ 前 400 年） / 161

五 制海权（前 550 ~ 前 400 年） / 180

六 地中海的灯塔（前 350 ~ 前 100 年） / 203

- 七 迦太基必须灭亡（前 400 ~ 前 146 年） / 227
- 八 “我们的海”（前 146 ~ 150 年） / 261
- 九 新信仰与旧信仰（1 ~ 450 年） / 291
- 十 地中海世界的瓦解（400 ~ 600 年） / 311

### 第三部 第三地中海（600 ~ 1350 年） / 331

- 一 地中海交通（600 ~ 900 年） / 333
- 二 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900 ~ 1050 年） / 356
- 三 地中海的变迁（1000 ~ 1100 年） / 374
- 四 “上帝惠赐的利润”（1100 ~ 1200 年） / 395
- 五 穿越地中海的方式（1160 ~ 1185 年） / 419
- 六 帝国的兴衰（1130 ~ 1260 年） / 438
- 七 商人、雇佣军和传教者（1220 ~ 1300 年） / 461
- 八 “关闭”大议会（1291 ~ 1350 年） / 490

### 第四部 第四地中海（1350 ~ 1830 年） / 513

- 一 想成为罗马皇帝的人（1350 ~ 1480 年） / 515
- 二 西方的变迁（1391 ~ 1500 年） / 544
- 三 神圣同盟与不神圣的同盟（1500 ~ 1550 年） / 574
- 四 白海之战（1550 ~ 1571 年） / 597
- 五 地中海的闯入者（1571 ~ 1650 年） / 632
- 六 绝望中的离散犹太人（1560 ~ 1700 年） / 657
- 七 对其他事件的推力（1650 ~ 1780 年） / 682
- 八 在俄罗斯人的视角下（1760 ~ 1805 年） / 705
- 九 总督、省长与帕夏（1800 ~ 1830 年） / 732

<b>第五部 第五地中海 (1830 ~ 2014 年)</b>	<b>/ 757</b>
一 昔日二者即将相见 (1830 ~ 1900 年)	/ 759
二 希腊人与非希腊人 (1830 ~ 1920 年)	/ 781
三 奥斯曼退出地中海 (1900 ~ 1918 年)	/ 795
四 四个半城市的传说 (1900 ~ 1950 年)	/ 808
五 我们的海——再现 (1918 ~ 1945 年)	/ 833
六 碎片化的地中海 (1945 ~ 1990 年)	/ 849
七 末代地中海 (1950 ~ 2014 年)	/ 868
<b>结语：穿越大海</b>	<b>/ 885</b>
<b>扩展阅读</b>	<b>/ 894</b>
<b>译后记</b>	<b>/ 898</b>
<b>索 引</b>	<b>/ 901</b>



**第三部**  
**第三地中海**  
**(600 ~ 1350 年)**

' . . . ,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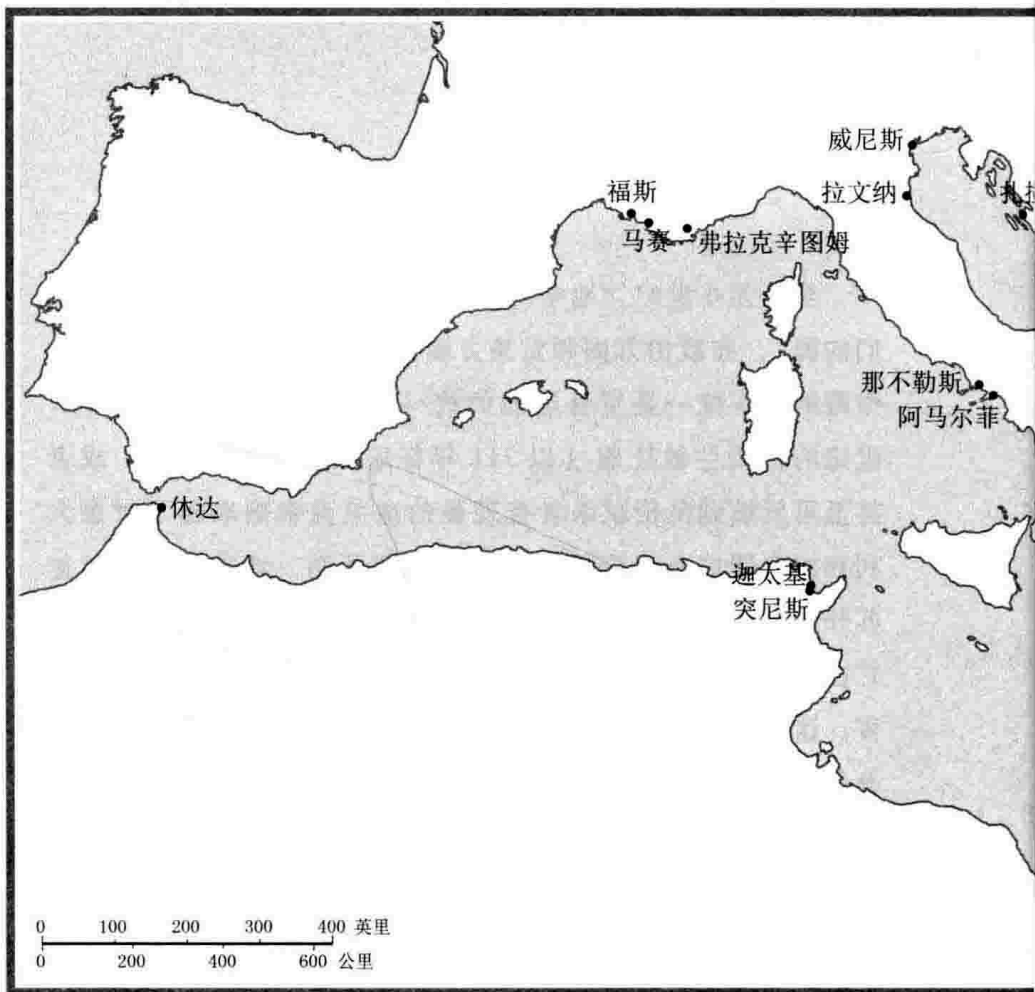
# 一 地中海交通

## (600 ~ 900 年)

### 1

至公元6世纪，地中海的统一被打破了；它不再是“我们的海”，在政治方面和贸易方面都不是。人们试图揭示，地中海的基本统一是贸易层面的统一，至少这种统一幸存到7世纪的伊斯兰教征服（以711年征服西班牙为顶点），或者甚至可延续到乱伦弑杀者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取得了对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控制。<sup>1</sup>人们也试图证明，地中海世界的复苏开始得比过去几代历史学家所推测的要更早一些，而且，它在10世纪甚至9世纪时就已经开始。<sup>2</sup>就拜占庭的东方而言，这是无可辩驳的，因为这一地区已经显现出了一些恢复迹象；伊斯兰地区更是如此，到这时它们已经从叙利亚和埃及扩展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然而，拜占庭的西方却更像一个谜。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此时的西方正在衰落，而另一些却认为它在扩张和发展。对于这点，人们可以机智地回答，这里存在巨大的地域性差异；但是，依然存在的问题是：地中海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统一？是否失去了统一？又是在什么时候恢复了统一？是否恢复了统一？正如在古代，地中海融合为单一的贸易区域，之后经历了数个世纪——从前10世纪的黑暗时代到罗马帝国的出现——才变成

241





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区域。因此，在第三地中海时期，整合的过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尽管侵入的阿拉伯人和更久远之后的土耳其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上的完全统一依然再也没有出现。

242 拜占庭失去了如此多的领土，被斯拉夫人和其他敌人占领，这使得这个帝国只保留了少量著名的遗产。西西里、南意大利的一部分、塞浦路斯和爱琴海诸岛仍处于拜占庭的统治之下，帝国从这些领土上的一些金银矿井中获取财富。<sup>3</sup>甚至撒丁岛和马略卡岛也是拜占庭的属国，但不太清楚的是，跨地中海的沟通网络是否还存在。君士坦丁堡维持着对埃及的控制，埃及是其重要的粮食供应地，然而这个城市已经极大地衰落了。“叙利亚”商人与犹太商人在西欧的编年史中经常被提及，证明了他们作为腓尼基人的后代继续在跨地中海的商业网络中发挥着作用。拜占庭认识到它不仅受到北方蛮族的严重威胁，而且受到东方敌人之威胁。243 尽管波斯人在公元7世纪早期暂时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并没有起到在叙利亚和埃及瓦解拜占庭势力的作用。

沿着叙利亚商人为寻找能在地中海出售的香水和香料所开辟的贸易路线，穿过沙漠居民纳巴泰人的属地，即距离红海东岸不远的内陆地区，一支宗教和政治势力正在兴起，它将永远改变地中海南岸及北岸之间的关系。在穆罕默德（Muhammad，亡于公元632年）时代，穆斯林的目标是使阿拉伯半岛上的异教居民改宗，征服阿拉伯半岛上的犹太人部族或迫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旗帜（象征着服从——即使不是服从安拉，也至少服从于那些崇拜安拉的人）下实现了各部族的统一之后，一轮在早期先知的“代理人”，即哈里发（*khalifas*，

*caliphs*) 领导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政治扩张开始了。哈里发 244 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 其军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几年之内即攻占了耶路撒冷和叙利亚, 后来则是在阿穆尔·伊本-阿斯 ('Amr ibn al-'As) 指挥下于 641 年攻入了埃及。事实上, 这时候的伊本-阿斯已经与他的首领哈里发产生分歧。神的绝对统一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 但其追随者的统一很快瓦解了。

伊斯兰教并非诞生于地中海, 但它从初创之日起就与地中海一神教派——犹太教和基督教——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伊斯兰教也与异教主义互相影响, 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 因为穆斯林拒绝容忍除犹太教、基督教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之外的任何宗教或教派)。伊斯兰教能在叙利亚的基督徒中间争取皈依者, 是因为这里的许多基督徒都是被希腊教会镇压的愤愤不平的一性派成员。许多东方基督教派的拥护者承认伊斯兰教教义中与基督教教义相近的方面, 这让他们缓慢地被新的宗教同化; 穆斯林接受基督, 或伊萨 (Isa), 认为他是穆罕默德之后的伟大先知, 他们也接受圣母感孕生耶稣的说法, 他们还坚持认为伊萨仅仅是个凡人。<sup>4</sup>伊斯兰教的其他特质则追随着犹太教的行为模式, 特别是禁止食用猪肉、日常祈祷 (伊斯兰教是每日五次, 犹太教每日三次), 以及在主持宗教仪式时不设专门祭司团体——因祭司自后圣殿时代以来就已经在犹太教中消失了。一方面, 穆斯林认为, 《希伯来圣经》和《新约》是被损毁的经文, 被损毁的部分载有最伟大的先知即将降临的预言; 另一方面, 穆斯林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圣书的人群”, 与穆斯林崇拜的是同一个上帝。由此产生了顺民 (*dhimmi*) 这一概念, 它指的是服从穆斯林统治的基督徒和犹太人, 他们缴纳人头税 [即吉兹耶 (*jizyah*)], 回报是他们有

权崇拜他们自己的神，只要他们不去试图劝诱穆斯林皈依他们的宗教。的确，顺民们所缴付的税款成为伊斯兰教国家的一个经济支柱。顺民们被免除了兵役义务——这一义务是由穆斯林专有的，但他们缴纳的税款维护了军事机器的运转。因此，埃及的所有科普特人或者北非的所有柏柏尔人如果都迅速皈依伊斯兰教，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问题。它将腐蚀哈里发国家征税系统的基础。对顺民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中东的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所述，顺民是“二等公民——但毕竟是公民”。换句话说，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异类的少数族群——的确，  
245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区，在整个叙利亚海岸，在埃及和遥远的西班牙，更无须说在像波斯这样的东方土地上，他们都是多数族群。

由于科普特人对信奉正统基督教的拜占庭持敌视态度，埃及被阿拉伯人军队攻陷就变得比较容易，可能仅用了1.2万名士兵。此事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影响是切断了从尼罗河运输谷物供应新罗马公民的路线。后来在公元674年和717年，君士坦丁堡将面临阿拉伯人的包围，但在当前，阿拉伯人却停留在非洲，他们在埃及看向的不是地中海，而是向南看到了努比亚（Nubia）：占领这块临近红海的土地，将巩固他们对阿拉伯半岛的占领。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人扩张的主要目标是伊拉克和伊朗，因为波斯是直接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最大国家。因此，阿拉伯人最初的目标不是创建一个沿着地中海南岸延展的帝国，他们对地中海的征服只是一次穿插表演。在进军努比亚受阻之后，他们才转而向西去攻击昔兰尼加，进入了柏柏尔人部族的领地。<sup>5</sup>



这一行动被证明为明智之举。当昔兰尼加和阿非利加行省还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时，阿拉伯人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它们将成为光复埃及之战的战场。为避免这种情况，阿拉伯人需要控制海岸线和北非沿岸的港口，这只有在也门派出大量士兵并有柏柏尔人的帮助时才有可能实现，柏柏尔人是北非的土著族群，他们由一些罗马化的城镇居民和一些信仰不同宗教的农村部族构成。阿拉伯人还需要一支船队，而且“阿拉伯”海军势力公元654年在罗得岛外对拜占庭的胜利，只意味着他们能够成功地雇用本地的基督徒船员；海战可能是以希腊人为一方，以希腊人、叙利亚人和科普特人为另一方的混战。搞定与柏柏尔人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容易的：异教的柏柏尔部族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又会在阿拉伯人从地平线上消失之后回到原初的信仰上；据说，当时有一个部族曾十二次皈依伊斯兰教。<sup>6</sup>也有大批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女王卡希珊（Kahina）就可能是一位信奉犹太教的柏柏尔人，她的骁勇善战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sup>7</sup>7世纪北非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是迅速的、肤浅的、暂时的，但它足以让柏柏尔人的军队去追求战利品，此时穆斯林军队开始在拜占庭城市迦太基周围直面他们真正的目标。自660年之后，他们控制了属于旧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即被他们称为伊夫里基亚（Ifriqiya）的一些较小的城镇。他们在离地中海有一段距离处建立了自己的设防城市凯鲁万（Qaywaran）；凯鲁万靠近内陆，对他们而言有更大吸引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喂骆驼吃草，而不是开采海洋资源。698年，迦太基从陆地上被包围，它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足够的支持，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4万人的阿拉伯军队包围了这座城市；约1.2万名柏柏尔人也加入其中。是阿拉伯人

对迦太基的征服，而不是 750 年之前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征服，标志了这座城市作为商业和帝国中心的历史的结束。阿拉伯人没有利用这座城市，而是在其近处的突尼斯建了一座新城。拜占庭失去了它另一片最富裕的领地，查士丁尼所征服的西班牙的一小块领地，已经于 7 世纪 30 年代被西哥特人吞并，因而拜占庭只保留了对于休达、马略卡岛和撒丁岛的松散的主权。拜占庭在西地中海的势力完全消失了。

## 2

伊斯兰教的征服代表着地中海历史的一个悖论。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的征服割裂了地中海的统一；然而，伊斯兰教也为创造一种跨地中海的新统一提供了基础，尽管并没有跨越整片海域，因为穆斯林的贸易和交通网络主要局限于其南方和东方的海岸。与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和拜占庭所属爱琴海之间的贸易联系紧密起来，一些处于拜占庭松散统治下的意大利港口也被纳入了贸易网络之中，特别是威尼斯和阿马尔菲。但是南部高卢和意大利的居民面对的主要是作为奴隶掠夺者的穆斯林船员。奴隶成为在西欧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流通的主要商品，这种流通一般都经过地中海 [他们也通过佛兰德 (Flanders) 修道院中的阉割院发展了从东欧到西班牙的陆路奴隶贸易]。海盗活动的持续存在可以被视为贸易持续发展的证据，因为如果没有值得抢劫的东西，海盗是无利可图的，然而，萨拉森人 (Saracens) 的多数牺牲者可能还是被猎奴者从南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抢来的新水手。另外三种商品——莎草纸、黄金和奢侈纺织品——在作为主要贸易商品几百年之后，此时不再出现了。关于商品贸易消失的原因，伟大的比利时

历史学家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认为，公元7~8世纪标志着地中海与古代的根本断裂；贸易缓慢地衰落，变成“涓涓细流”。<sup>8</sup> 由于多数莎草纸产于埃及，因此这种古代产品在西欧消失并被当地手工制作的羊皮纸代替的现象就可以表明，莎草纸已经不再是跨地中海贸易的商品了。罗马教会是在10~11世纪仍使用莎草纸的极少数机构之一；罗马有靠近那不勒斯湾和萨勒诺湾仍在运作的各港口的优势，这两个海湾保持着与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有关地中海贸易仍保有活力——哪怕不那么繁忙——的证据的确存在。公元716年，高卢的法兰克国王希尔佩里克二世（Chilperic II）答应给科尔比（Corbie）修道院的修士们可观的赋税减免，允许他们通过罗讷河（Rhône）三角洲的滨海福斯港（Fos-sur-Mer）进口莎草纸和其他东方商品，但他只是在重申一项古老的特权，因此，这并不能证明福斯港的贸易依旧活跃。<sup>9</sup> 在极盛时期，福斯港开辟了北方航线，不仅运输西班牙皮革和莎草纸（每年五十刀），而且还有一万磅油、三十桶鱼酱、三十磅胡椒、一百五十磅孜然，以及大量的无花果、杏仁和橄榄——假定这些东西的确被运到了北方。<sup>10</sup> 我们知道，福斯附近的马赛是地中海西北角极少数尚未衰落的港口之一。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这个城市事实上在6世纪以后扩大了，而且它与迦太基及其所属地域的联系在600年之后仍然比较密切。马赛甚至有自己的金币，这证明了它与地中海的联系，因为当时在西欧并没有可靠的黄金资源。<sup>11</sup> 但是，到了7世纪末，马赛人感受到了压力。迦太基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意味着马赛与非洲的联系被切断了。黄金资源枯竭了，本地的金币不能被铸造出来，东方的双耳陶瓶也无法被运抵此地了。

公元 9 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库尔达比 (ibn Khurdadbih) 描写过一群讲多种语言冒险的犹太商人, 人们称之为“香料商” (*Radhaniyyah* 或 *Radhanites*)。<sup>12</sup> 他列举了这些商人的四条线路, 一些人经陆路穿越高卢, 经过布拉格到达占据黑海北岸广阔空间的白保加尔人 (White Bulgars) 的王国, 其他人经海路, 由普罗旺斯到埃及, 顺红海而下至印度, 或者从黎凡特的安条克到伊拉克、印度、锡兰, 再走海路到远东。但有些商队是从西班牙出发, 沿北非海岸东行到黎凡特的, 从陆上走这一路线会比从海上走更容易一些, 因为在海上会遇到浅滩、逆风和洋流。<sup>13</sup> 从尼罗河三角洲返回的香料商可以乘船到君士坦丁堡, 或者他们有可能找到返回高卢的路线。对这些路线的描述将这些商人塑造成从事调料、香料和药材贸易的“香料商”的角色, 然而他们的北方熟人又让他们得以将铁制武器、皮毛和奴隶运到地中海; 穆斯林在缺少铁制武器时, 就愿意从北方购买武器。<sup>14</sup> 与香料商同行的还有不少贩奴者, 其中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 到 961 年为止, 有 13750 名“萨卡里巴” (*Saqaliba*), 即斯拉夫奴隶, 居住在穆斯林统治下的科尔多瓦。在温德人 (Wendish) 的土地上, 即现在的东德意志, 日耳曼人和斯拉夫民众之间的战争保证了大批战俘源源不断地流向奴隶市场, *sclavus* 和 *slave* 之类的名称, 使人们想到许多斯拉夫人血统的奴隶。来自斯拉夫土地上的奴隶也到达了叙利亚和埃及, 他们与切尔克斯人 (*Circassians* 或 *Cherkess*) 一同来自黑海地区。<sup>15</sup> 虽然这些斯拉夫人的遭遇很悲惨, 但他们的命运, 甚至那些幸免于阉割手术的人, 也不总是能与那几个世纪后跨越大西洋大量贩运至美洲的奴隶的命运相比。看起来很强壮的青年人没有被阉割, 而是进入了埃米尔 (emir) 设在

科尔多瓦的卫队，有时候他们会晋升为高级指挥官。另外，女性有可能进入封闭的后宫（harem）；较为英俊的男孩会落入那些喜好男色的王公手中。有一个可以被称为香料商的人物——萨拉格萨的亚伯拉罕（Abraham of Saragossa），他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受到了法兰克皇帝“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的个人保护。他在828年前后特别活跃，得到了通行税豁免权；他明确地被批准购买外族奴隶并在法兰克的土地上卖出，但是，在846年，犹太商人遭到里昂主教的控诉，主教说他们只关注在普罗旺斯诸城市中寻求奴隶供应来源，而且他们还将基督徒奴隶卖给科尔多瓦的买主们。<sup>16</sup>

249

如果说罗马人的海军力量是建立在海盗灭绝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穆斯林的海军力量则奠基于海盗行为。正因如此，在穆斯林船队中服役的有希腊人、科普特人、柏柏尔人和西班牙人等，他们无疑都是能操控船只的。西行的航海船只经常受到那些为穆斯林统治者效力的海盗的肆意攻击。公元9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描述了地中海上的向其他基督教土地航行的基督徒船只如何成了穆斯林海盗的正当攻击目标；当一艘船被捕获时，如果船长坚持强调他是在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如安达卢西亚的埃米尔保护之下，那么他就得出示书面证据。<sup>17</sup> 尽管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711年对西班牙的入侵引发了少数海上军事行动（一次极为重要的行动是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在8世纪的其他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穆斯林船队在地中海西部自由穿行。当迦太基于698年陷落时，突然猖獗起来的海盗被拜占庭海军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但是，当拜占庭失去了对西西里以西海域的实际控制权之后，穆斯林船队得以自由航行在那些仍承认拜占庭权威——尽管有时是有所保留的承认——的岛屿和

海岸线上，如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利古里亚海岸。<sup>18</sup>

这一区域的安全在公元 800 年前后受到了严重威胁。海上冲突在整个西地中海海域发生。这些事件一般被认为是阻止阿拉伯入侵者控制地中海岛屿的斗争。然而，穆斯林海军通常更热衷于掠夺战利品（包括战俘，他们可以将战俘卖掉），而不是扩大穆斯林的领地。基督徒也热衷于夺取奴隶、获得战利品，尽管他们的目的更明显是自卫。此外，确切地说，因为在当今，西方出现了一个乐于对抗穆斯林海军的大国，所以海上的对抗激化了，海盗们变得更为胆大妄为。798 年，阿拉伯海军攻击了巴利阿里群岛，此时这一群岛还没有成为入侵西班牙的最初目标。岛上居民得知君士坦丁堡不能提供任何援助，于是转投高卢和北意大利的统治者查理曼大帝，他们宣布查理曼大帝是他们的新领主。查理曼大帝派了一些军队，以在阿拉伯人再次袭击此岛时将他们击退。<sup>19</sup>他令他的儿子路易建立了一支船队以保护罗讷河三角洲，并建立了新的沿岸防御设施以保护法兰西南部以及意大利西北部的港口。法兰克热那亚伯爵哈达马尔（Hadumar）率领一支船队侵入科西嘉岛，并在战斗中被杀害。科西嘉人和撒丁人继续战斗，一位名叫布尔夏德（Burchard）的法兰克海军将领摧毁了十三艘敌船。与此同时，威尼斯船只巡视着西西里和北非的海域，是它们或另一些为拜占庭服役的船只，对来自伊斯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的船只取得了显著胜利。812 年，十三艘阿拉伯船只攻击很小但战略地位很重要、位于西西里和非洲之间的兰佩杜萨岛（Lampedusa），但被拜占庭人歼灭。不久之后，北非人觉得事态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与拜占庭的西西里总督格雷戈里奥签订了一份为期十年的

和约。<sup>20</sup>现在，由基督教徒构成的海军控制了西西里西部的海域，拜占庭已经得到了他们在地中海中部急需的缓冲，因为阿拉伯人对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攻击已经使地中海沿岸城乡受到严重破坏。

对于拜占庭人来说不幸的是，穆斯林决心从西西里岛获得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奴隶和掠夺物，因此于公元 827 年发动了对西西里的入侵，逐渐将整个岛置于北非阿格拉比特（Aghlabid）埃米尔的控制之下。穆斯林重新开始对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发动攻击，对此，法兰克人以一次对非洲海岸的大胆攻击予以回应。可问题是，法兰克海军没有长久的基地，即使在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之后，在苏塞（Sousse）的一次失败就足以迫使法兰克人逃离非洲。无论如何，814 年查理曼大帝去世，法兰克帝国的辉煌时代结束了，内部争斗使查理曼的继承人“虔诚者”路易把精力从西地中海移开。在 9 世纪 40 年代，阿拉伯人已经能够随意地侵袭马赛、阿尔勒（Arles）和罗马了。让想控制南意大利的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感到更为尴尬的是，一支穆斯林海军于 847 年占领了巴里海港，建立了一个埃米尔国家，它的统治持续到 871 年，这时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才学会齐心协力，最终驱逐了穆斯林。<sup>21</sup>在 9 世纪试探性的举动后，10 世纪阿拉伯海盗在普罗旺斯沿海和距普罗旺斯不远的内陆弗拉克辛图姆（拉加尔德弗雷），建立了他们的基地。阿拉伯海盗严重威胁了从普罗旺斯出海的基督徒的贸易活动，同时，海盗也为穆斯林供应奴隶和战利品。<sup>22</sup>

251

### 3

面对穆斯林的进攻，拜占庭也有过各种成功。在公元 718

年拜占庭人将阿拉伯人拒于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后，从8世纪早期开始，其船队开始在地中海上航行，但是地方起义，特别是西西里岛的起义，威胁到了他们对地中海航线的控制。自6世纪以降，拜占庭海军已经以一种快速大帆船（*dromôn*）为主力。它是战船的一种，船体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在12世纪之前，它一直是整个地中海上的标准战船；它的特征包括使用了一种三角帆而不是横帆，数排划桨置于主甲板之下而且（很可能）采用了支架式结构而不是壳式结构。最初，每艘船配备五十名桨手，分布在船舷两侧，每人控制一只船桨〔他们成为单列桨战船（*monoremes*）的划船手〕，后来演化为双列桨手（*biremes*），即每两名桨手控制一只船桨，共有一百五十名桨手。<sup>23</sup>穆斯林的舰船与之类似，但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浅滩、岩石和沙滩使得沿北非海岸自东向西的航行非常困难。船只航行时被迫选择继续向北，实行越岛作战。这一事实与海盗劫掠和贩卖奴隶一起，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海军要冒险进入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sup>24</sup>说这些海军“控制水域”，只是对它们行动方式的一种简单描述：如果海军要有效地在某一海域巡逻，那么让舰船驶入对它们友好的港口并获得补给就十分重要。对那些从拜占庭中心地带驶出的船队实施远程控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航海的前沿地区建立拜占庭的基地。<sup>25</sup>拜占庭人控制了塞浦路斯和克里特（这个岛屿曾经短暂地被阿拉伯人占有）以北的海域。这让他们能够维持爱琴海及更远一些地区的交通。但拜占庭帝国的边缘地带更危险，特别是在亚得里亚海。

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困难并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阿拉伯人占领巴里毕竟是稍后才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困难来自法兰克



人，即到公元 8 世纪末为止一直控制着意大利大片土地的统治者，这片领土（在 751 年）包括原来的拜占庭行省，也就是 252 首府设于拉文纳的总督区（Exarchate）。直到 8 世纪 90 年代，法兰克人的军队仍然活跃在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地区，查理曼摧毁了庞大而富裕的阿瓦尔人（Avar）的帝国，将今日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巴尔干北部的大片领土并入自己的帝国。791 年，法兰克人占领了伊斯的利亚（Istria），这是亚得里亚海北部海湾内的多岩石半岛，当时在名义上仍处于拜占庭管辖之下。<sup>26</sup> 这些征伐活动使得法兰克和拜占庭的利益发生冲突。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在查理曼大帝于 800 年的圣诞节在罗马被加冕为西罗马皇帝时激化，但这位新加冕的皇帝认为这次事件并不重要，故一笑了之。而拜占庭直到 1453 年灭亡之时还十分敏感地强调自己是罗马帝国真正的继承者。听到查理曼想占有西西里的报告时，拜占庭人感到更为不安。查理曼似乎曾密谋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r-Rashid）结盟，哈里发赠给查理曼一头大象，以示自己对他的尊敬，同时还赠给他一把圣城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钥匙，而拜占庭人一直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拥有保护权。

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看，亚得里亚海是对于试图进犯拜占庭领土的敌军的第一道防线。维护好自都拉基乌姆到萨洛尼卡（Salonika）间的艾格纳提亚大道具有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作为商路十分重要。<sup>27</sup> 于是，拜占庭加大力度保护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海岸，抵制法兰克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入侵者及劫掠者。除了在一些城镇，如伊斯的利亚的波雷奇（Poreč）城内有早期拜占庭镶嵌画遗存下来，这

一地区基本上由拉丁教会主导，而且当地人讲的是一种中古拉丁语（Low Latin），这种语言后来发展成为现在已经消失的达尔马提亚语。<sup>28</sup>拜占庭的影响也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意大利一侧，沿着新月形的海湾伸展，穿越格拉多（Grado）的潟湖和湿地，沿着意大利半岛一侧下行经过一系列沙滩（或称 *lidi*），到达拉文纳以北不远处的科马基奥（Comacchio）。失去了拉文纳总督区并未完全剥夺拜占庭作为意大利宗主的地位，因此，即便这片地区拥有的鱼比人多，且这里只生产盐而不生产麦子，它也毫无疑问是一块有价值的地方。

258 这里并不稳定，水和泥沙相互争夺控制权。皮亚韦河（Piave）、波河和阿迪杰河（Adige）以及诸多更小的河流的淤积物被排放到这里。根据公元6世纪的作家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的记载，这片湿地上早期居民的生活“如同水鸟，时而在水面上，时而陆地上”，他们的财富只是鱼和盐，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盐在某种意义上比金子更贵重：每个人都需要盐，但一定有人会认为他们不需要黄金。卡西奥多鲁斯把这些湿地上的居民理想化，说“所有人分享着同样的食物和相似的房屋，于是，他们不可能妒忌其他人的炉灶，而且他们没有整个世界都盛行的那些恶习”。<sup>29</sup>蛮族的入侵改变了这个地区，不是他们征服了潟湖湾，而是他们使这片潟湖变成了逃避日耳曼人军队，也就是伦巴第入侵者的避难地。这一次移民不是马上完成的，但许多村庄开始出现在科马基奥、埃拉克莱阿（Eraclea）、耶索洛（Jesolo）、托切罗（Torcello），以及里亚尔托（Rialto）附近的一些小岛上。在托切罗的小规模社区中，一些玻璃作坊的建立可上溯到7世纪。可能是在715年，科马基奥从伦巴第统治者手中获得了一些特权。其中

一个岛，即格拉多岛，成了一位名字响亮的主教的所在地，他的权威延伸至整个潟湖地区；但这里也出现了许多主教——每个大小不等的居民区都拥有一位主教，许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堂在8~9世纪纷纷建立，这一事实有力说明了此地贸易的繁荣。<sup>30</sup>如同在达尔马提亚地区一样，这些主教遵行着拉丁教会的礼仪，但在政治上，他们直接附属于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总督区衰落之前，居民们期盼着来自拉文纳的直接性政治指令和军事上的保护——早在697年，拉文纳总督就指定了一位军事指挥官，或者称都督（*dux*），来保护这片潟湖。<sup>31</sup>在拉文纳总督区于751年衰落之后，这片潟湖的价值奇怪地被忽视了。事实上，它们才是罗马帝国在北意大利持续存在的标志。

随着法兰克人于公元8世纪晚期到达意大利，潟湖上的居民已经有意臣服于新的罗马皇帝查理曼。他的军队就在附近，他承诺让他们获得伦巴第及更远地区的贸易特权，以吸引他们归附自己。此外，法兰克人已经因他们对于古典文化的兴趣而得到了尊重，他们逐渐地修正自己粗陋的蛮族特性。亲法兰克的和亲拜占庭的两个宗派在潟湖和达尔马提亚出现。在9世纪初，拜占庭人决心守住这块占领地，遂派出了一支船队开向亚得里亚海北部海湾，在这片水域与法兰克人交战。807年，拜占庭收复了潟湖区的多数地盘。两年之后，他们包围了仍然忠于法兰克人的科马基奥，不幸引来法兰克人的陆军和海军，由查理曼的儿子、意大利国王丕平（Pippin）指挥。丕平把拜占庭船队吓得逃离了潟湖海域，这片区域因此被危险地暴露于法兰克人的攻击下，丕平还包围了马拉莫柯（Malamocco）海滨防线，期望由此获得突破，从而进击里亚尔托及潟湖内的居民区。历史记录多有不同，但它们都显示丕平似乎失败了。威尼

斯总督安德里亚·丹多洛（Doge Andrea Dandolo）写于14世纪的编年史描述了当地居民如何用面包块攻击法兰克人，阻止其进军，这证明了法兰克人的围攻并没有伤害到他们，他们仍有大量食物，这是与许多不可信的围城故事同时传播的。<sup>32</sup> 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使人忽视了更重要的问题，因此都向往和平。查理曼认识到，如果他妥协，就可获得拜占庭人对其皇帝头衔的认可。812年，一个解决方案出台了，拜占庭宣称自己对这片潟湖拥有最高主权，同时希望此地的居民向法兰克人缴纳三十六磅白银作为年贡，并在拜占庭对付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时提供海上支持。这笔年贡并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和约使潟湖居民获得了进入意大利市场的特权，于是亚得里亚海的这一角落就能够成为西欧与拜占庭交往的桥梁，享有东方和西方两个帝国的保护。这一特权地位使商人们获得极大的好处。

在拜占庭与查理曼之间的亚得里亚海战役发生之后，潟湖上出现了作为政治和商业实体的城市威尼斯。与法兰克人的争斗鼓励了分散的潟湖民众组成一个以保卫海岛为目标的群体，这些岛在长长的海滨防线的保护下抵御外部入侵者，但这远不能阻止来自陆上的入侵者。威尼斯人逐渐分散到接近里亚尔托的那些小岛上，在潮湿的地面上打下木桩，用来自伊斯的利亚半岛的木料建筑了木屋。早期威尼斯并不是一座大理石建筑构成的城市，甚至没有自己的主教——最靠近威尼斯的主教驻于卡斯泰洛岛（Castello）上，该岛位于里亚尔托居民点以东。<sup>33</sup>

从操控驳船和平底船穿越波河三角洲，到航行于亚得里亚海上，威尼斯人都是行家里手，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家族一直控制着都督——或者称总督（Doge）——这一职务，主要的家族

都在陆地上拥有农庄，因为威尼斯还没有发展到完全以贸易为主导、精英们不再耕作土地的程度。<sup>34</sup>

然而，在威尼斯人聚合于一个城镇之前，与遥远地域的贸易联系已经开始发展。威尼斯人在盐、鱼和木材方面的贸易量十分可观，同时他们还开始从事有限的东西奢侈品贸易。其竞争者可谓极少：在公元8世纪，罗马只能从地中海获得极少量的商品。奢侈品进口的规模很小，但利润很高，这是因为这种贸易具有风险，也因为威尼斯人所经营的商品甚为稀缺，例如丝绸、珠宝、黄金工艺品、圣徒遗骨等。<sup>35</sup>他们将这些商品卖给居住在波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伦巴第王公、法兰克王公和爱好奢侈品的主教们。人们在亚得里亚海北部发现了拜占庭的金币，偶尔也有阿拉伯人的金币。在靠近波伦亚的雷诺河（Reno，此河是若干注入潟湖的河流之一）河岸，人们发现了一个藏金窖，里面的金币可上溯到法兰克与拜占庭海战期间。这是一个混杂着拜占庭、南意大利和伊斯兰金币的口袋；拜占庭金币来自君士坦丁堡，伊斯兰世界的金币则来自埃及、北非等地。这表明，这些钱是由一位穿行于地中海、从事贸易的商人用一艘船运来此地的。威尼斯船只偶尔受命运载使臣们进出君士坦丁堡。<sup>36</sup>现在，马赛处于衰落之中，威尼斯已经成为维持与东地中海的交往——包括商业、外交和宗教事务交往——的重要口岸。

在所有那些自东方来到威尼斯的旅行者中间，最为重要的是已经死去很久的犹太人马可（Mark），他被认为是一卷福音书的作者，并建立了亚历山大教会。公元828~829年，亚历山大的一些威尼斯商人将他们偷出的马可遗骨装在木桶中，覆以猪肉偷偷地装在船上，瞒过了穆斯林的海关官员（这些官

256 员不肯检查被猪肉覆盖的桶底之物)——如果一个偷盗圣骨的小偷成功了,这自然是他已经获得圣人认可的标志。<sup>37</sup>圣马可的遗骨于是被安置在威尼斯总督府附近的一个教堂内,直到11世纪,这个小教堂才大为扩建,建了新的大殿;到19世纪,这个教堂才由总督的小教堂升格为主教座堂(cathedral)。这一事件并不是简单地使威尼斯取代了亚历山大成为朝圣中心,它还意味着威尼斯获得了类似于古代亚历山大的身份地位,即成了基督教的教区之一。<sup>38</sup>借助于与君士坦丁堡的密切联系,威尼斯也试图在西罗马帝国的辉煌失落后维系拜占庭的文化。威尼斯人不仅开始创造一座建立于水中的特色城市,还创造了一种不同于西欧、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的特色文化和特色政治。

#### 4

威尼斯和稍晚时候兴起的阿马尔菲成为东西方有限联系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东西方联系之前中断的程度。它们是两座新城,晚期罗马帝国衰亡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地中海的古代贸易中心在商业交往地图上完全消失不见了。但东地中海不是这样,在这里,亚历山大城在公元6世纪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在伊斯兰教征服埃及之后仍然保持了它作为一个活跃的贸易中心的地位。到8世纪晚期,拜占庭出现了全面复兴的信号,但是西方复兴得慢一些,它所失去的是罗马统治整个地中海时期建立的强有力的海上联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地中海上的联系不仅仅是商业的,宗教思想也自东方传到帝国首都,艺术风格也在被复制,士兵和奴隶都背井离乡。在“黑暗时代”,奴隶们仍然在被来回运送,但是数量少了一些;然

而，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影响却带有异域色彩，来自君士坦丁堡宫廷的礼物跨越了不安全的海面到达蛮族的宫廷，海盗和船的漏水并不能阻止它们。

当历史学家们试图统计这一时期的跨地中海贸易量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在公元 8 世纪时，这种贸易活动的活跃程度远不及 9 世纪，这并不单纯因为 8 世纪的书面记载遗失了，也因为在这一时期海难极少发生。<sup>39</sup>在关于这两个世纪有记载的四百一十例活动中，只有四分之一发生在 8 世纪，而这些记录也提到了传教者、朝圣者、难民和外交使节的航行。只有二十四次商业航行是可鉴别的；穆斯林商人并不愿意踏入异教徒的领地，我们所知的商人只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这两个称谓在不久后成了另一种指代“商人”的通用词语。<sup>40</sup>外交使臣在西欧和拜占庭之间频繁往来，旨在开拓双方政治上、商业上、宗教上及文化上的联系渠道，而不是说这种联系已经很频繁。尽管 8~9 世纪的阿拉伯金币曾经出现在西欧，但在 8 世纪末，它们大量进入西欧，此时查理曼将他新兴的法兰克帝国扩展到了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而拜占庭金币在 9 世纪中期以后才大量出现于西欧。<sup>41</sup>事实上，这些阿拉伯金币中有许多就是在欧洲铸造的，它们产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

东西地中海联系的恢复，以及地中海北岸和南岸联系的恢复，依赖于诸多商人群体的活动，他们发现已经可以无障碍地穿越地中海。很多因素——他们的宗教认同、他们用来控制风险和赚取利润的合法商品、他们跨越广泛区域的沟通交往能力等——都可以证明他们有能力这样做。到了公元 10 世纪时，这种群体已经出现在伊斯兰世界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

## 注 释

1. H.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London, 1939) – cf. R. Hodges and 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 (London, 1983); R. Latouche, *The Birth of the Western Economy: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Dark Ages* (London, 1961).
2. M. McCormick,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 300–900* (Cambridge, 2001), pp. 778–98.
3. A. Laiou and C. Morriison, *The Byzantine Economy* (Cambridge, 2007), p. 63.
4. T. Khalidi, *The Muslim Jesus: Sayings and Stories in Islamic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2001).
5. Hodges and Whitehouse, *Mohammed, Charlemagne*, pp. 68–9; D. Pringle, *The Defence of Byzantine Africa from Justinian to the Arab Conquest*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vol. 99, Oxford, 1981); on Byzantine ships: J. Pryor and E. Jeffreys, *The Age of the Δρομῶν: 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Leiden, 2006).
6. X. de Planhol, *Minorités en Islam: géographie politique et sociale* (Paris, 1997), pp. 95–107.
7. S. S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London, 2009), pp. 202–7.
8. Pirenne, *Mohammed and Charlemagne*; A. Lewis, *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A.D. 500–1100* (Princeton, NJ, 1951); McCormick, *Origins*, p. 118; P. Horden and N.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2000), pp. 153–72 (p. 154 for ‘the merest trickle’); also C.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2005), pp. 821–3.
9. McCormick, *Origins*, p. 65; Horden and Purcell, *Corrupting Sea*, p. 164.
10. Horden and Purcell, *Corrupting Sea*, p. 163.
11. *Ibid.*, pp. 164–5; S. Loseby, ‘Marseille: a late Roman success story?’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82 (1992), pp. 165–85.
12. E. Ashtor, ‘Aperçus sur les Radhanites’, *Revue suisse d’histoire*, vol. 27 (1977), pp. 245–75; Y. Rotman, *Byzantine Slavery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Cambridge, MA, 2009), pp. 66–8, 74.
13. Cf. J.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p. 138.
14. M. Lombard, *The Golden Age of Islam* (Amsterdam, 1987), p. 212; Rotman, *Byzantine Slavery*, pp. 66–7.
15. D. Abulafia, ‘Asia, 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2,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 M. M. Postan, E. Miller and C. Postan (2nd edn, Cambridge, 1987), p. 417.



16. McCormick, *Origins*, pp. 668, 675; Rotman, *Byzantine Slavery*, p. 73.
17. P. Sénac, *Provence et piraterie sarrasine* (Paris, 1982), p. 52.
18.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pp. 102-3.
19. J. Haywood, *Dark Age Naval Power: a Reassessment of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eafaring Activity* (London, 1991), p. 113.
20. *Ibid.*, pp. 114-15.
21. G. Musca, *L'emirato di Bari, 847-871* (Bari, 1964); Haywood, *Dark Age Naval Power*, p. 116.
22. Sénac, *Provence et piraterie*, pp. 35-48; J. Lacam, *Les Sarrasins dans le haut moyen âge français* (Paris, 1965).
23. Pryor and Jeffreys, *Age of the Δρομων*, pp. 446-7.
24. J. Pryor, 'Byzantium and the sea: Byzantine fleet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empire in the age of the Macedonian emperors, c.900-1025 CE', in J. Hattendorf and R. Unger (eds.), *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Woodbridge, 2003), pp. 83-104; Pryor and Jeffreys, *Age of the Δρομων*, p. 354;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pp. 108-9.
25. Pryor and Jeffreys, *Age of the Δρομων*, pp. 333-78.
26. Haywood, *Dark Age Naval Power*, p. 110.
27. McCormick, *Origins*, pp. 69-73, 559-60.
28. M. G. Bartoli, *Il Dalmatico*, ed. A. Duro (Rome, 2000).
29. F.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D, 1973), pp. 3-4.
30.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690, 732-3; McCormick, *Origins*, pp. 529-30.
31. Lane, *Venice*, pp. 4-5.
32. Sources in Haywood, *Dark Age Naval Power*, pp. 195, nn. 88-94.
33.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 690.
34. Lane, *Venice*, p. 4.
35. Cf.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p. 73, 75.
36. McCormick, *Origins*, pp. 361-9, 523-31.
37. P. Geary, *Furta Sacra: Thefts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1978).
38. D. Howard, *Venice and the East: 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 CT, 2000), pp. 65-7.
39. McCormick, *Origins*, pp. 433-8.
40. Cf. Lewis, *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pp. 45-6.
41. McCormick, *Origins*, pp. 436, 440, 816-51.

## 二 跨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边界 (900 ~ 1050 年)

### 1

258

穆斯林的统治区域的扩张延伸到了摩洛哥、西班牙和西里，这就意味着地中海的南半部成为穆斯林统治下的湖，该事实为贸易提供了绝妙的新机遇。在各种记录中犹太商人都是最突出的。但这种现象是不是一种偶然性的遗存，或者他们是否比科普特人和叙利亚基督徒或者北非、西班牙和埃及的穆斯林城镇居民更为成功，都是不确定的。有理由认为非穆斯林商人有特别的优势。穆斯林被他们的法律法规束缚，这些法律规定他们不得在异教徒的土地上生活或者从事贸易活动。这就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地中海上伊斯兰城镇的统治者们向基督徒和犹太人中的贸易者敞开了大门，但穆斯林居民却对到意大利、加泰罗尼亚或普罗旺斯去冒险持谨慎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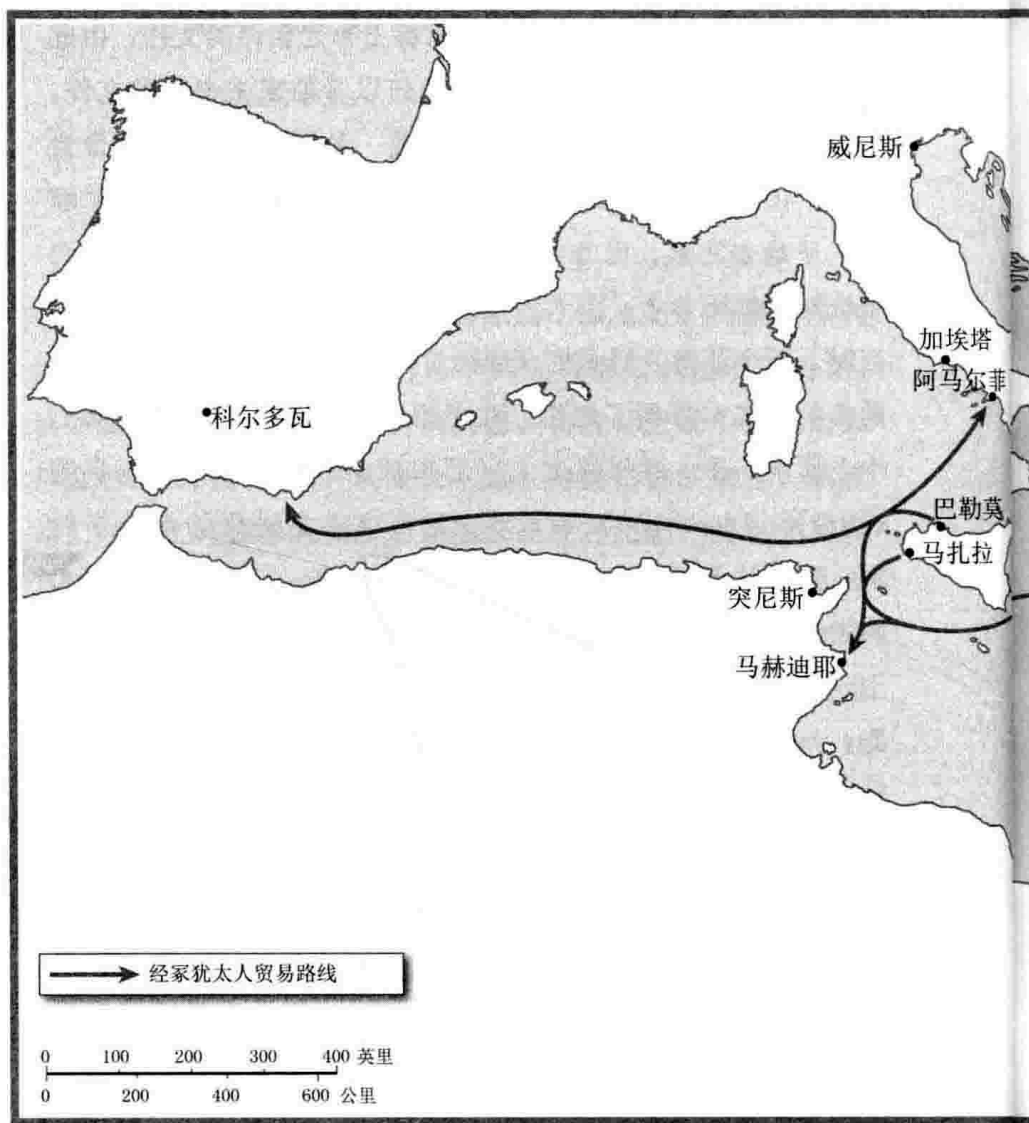
我们之所以了解犹太商人的情况，是因为成百上千份犹太人信件和贸易文件尚存于所谓的开罗经冢（Cairo Genizah）内。在公元7世纪中期，入侵埃及的阿拉伯人在现代开罗外缘的福斯塔特（Fustat，意为“渠沟”）建立了他们的基地，并在不久后将其首都迁移到新开罗大城堡周边地区。<sup>1</sup> 旧的开罗，或称福斯塔特，成为这个城市的犹太人和科普特人的定居地；在11世纪时，一群犹太人重建了本·以斯拉（Ben Ezra）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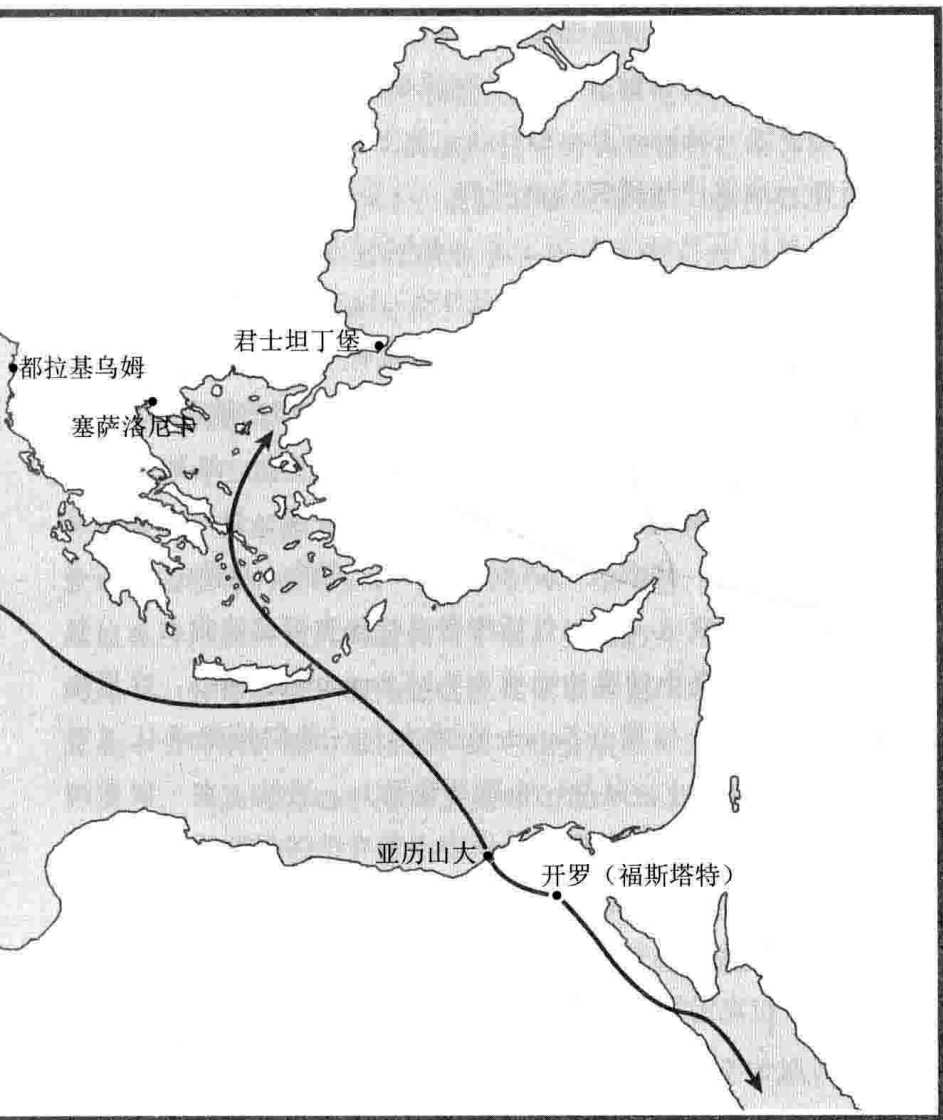
堂，其楼上有一间库房，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冢（Genizah）<sup>①</sup>，要进入经冢只能通过梯子，他们将无用的文件和手稿存放于该库房内。他们希望避免破坏任何写有上帝之名讳的文件；由此概念延伸出来，他们也不会破坏任何以希伯来文书写的文件。可以说，经冢中的手稿集“完全不是一种档案”，因为其设置是为了让文件不受破坏地被闲置一边，事实上是把它们“埋葬”于地表之上，而非制造一个可随意进入的房间，供人们系统性地翻阅参考。<sup>2</sup> 这些手稿于 1896 年获得了学者的注意，当时，两个苏格兰妇女将《便西拉智洲》（*Wisdom of Ben Sira*）的希伯来文本带到了剑桥。此书原来只以希腊文留存于《七十士译本》中，并被犹太人（后来被新教徒）收于非正统的《伪经》（*Apocrypha*）中。不论这一文本是丢失的希伯来原本，还是从希腊原文译为希伯来文的译本，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剑桥，讲授《塔木德》的讲师所罗门·谢克特博士（Dr Solomon Schechter）闻讯极其兴奋，于是特意前去开罗，与会堂商谈购买其库房所存之物，并带回了几乎全部手抄本的四分之三，它们一般都皱皱巴巴的，有的已经破碎不堪，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后人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将其分类（其他残片已经在市场上被一件件地卖掉了，最终散布在从圣彼得堡到纽约的世界各地）。<sup>3</sup> 经冢中有大量的商人信件（可叹的是，它们经常是不标记日期的），以及中世纪许多犹太人中的伟大人物手写的信件，尤其是西班牙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及西班牙诗人犹大·哈列维

259

---

① 因经冢一词，人们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地中海上的犹太商人为 Genizah，有些中译按照读音译为“杰尼扎”犹太人，但本书倾向于用意译，即经冢犹太人。——译者注





(Judah ha-Levi)。<sup>4</sup>

在经冢中的商人信件得到验证之前，我们关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经济生活的信息主要从编年史、司法案例和考古证据中获得。与这些资料的发现和保存同样重要的是，什洛莫·多夫·戈伊坦 (Shlomo Dov Goitein, 他生活在以色列, 当时在普林斯顿) 决定仔细研究这些资料, 以重建他所说的“地中海社会”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这一名词引出的问题是: 在大多数史料依据得以保存下来的公元 950 ~ 1150 年, 经冢犹太人究竟在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圈子里有多大的代表性? 我们甚至不能肯定, 本·以斯拉会堂内的犹太人是不是典型的埃及犹太人。他们的会堂仿效了古“巴勒斯坦”的礼仪程序, 这种古老的礼仪程序后来被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犹太人沿袭。另一座会堂是  
260 按照“巴比伦”犹太人的需要而组织仪式的, 这些犹太人不仅包括伊拉克犹太人, 也包括所有遵行这类仪式的犹太人, 包括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赛法迪犹太人 (Sephardic Jews)。这里也有许多埃及的卡拉派 (Karaites) 犹太人 (他们拒绝承认《塔木德》的权威性), 以及一些撒马利亚人。当然, 本·以斯拉派的犹太人慷慨赐予荣耀, 促使许多富有的突尼斯犹太人定居于福斯塔特, 加入他们的会堂。这大概可以解释, 为什么经冢文献里关于穿越地中海到突尼斯和西西里的资料, 要远比到西班牙或伊拉克的资料丰富。

## 2

261 经冢文献并非对那些居于福斯塔特城的人的生活的简单记载。这些犹太人也与生活在地中海各处——包括安达卢斯 (al-Andalus)、西西里和拜占庭——的家人、朋友和商务代理

人通信，但他们同西方的基督教城市的交往较为有限。<sup>5</sup> 关于穆斯林商人的情况有许多资料，他们经常被委托向远方发货（北非海岸的交通十分忙碌）；这是由于许多犹太人有安息日（Sabbath）的禁忌，不能在陆上旅行，如果他们随商队而行就难以避开安息日。在海上的旅行如果遇到安息日还稍为简单一些，因为人们只要选择不在安息日出发即可。<sup>6</sup> 或许是出于犹太人的宗教倾向使得他们更乐于选择海上航行这一简单的事实，经冢文献中的犹太人成了有志于穿越地中海的商人。他们形成了密切交错的、有他们自己的精英人士和习俗的社会圈子，与他人建立了跨越地中海交往的利益纽带——婚姻同盟在福斯塔特与巴勒莫的家族之间形成，一些商人还在数个港口置办了住宅，甚至娶了多位妻子。这些联系可见于一封 11 世纪发自福斯塔特的信件。一个名叫伊本·伊居（Ibn Yiju）的人给他在西西里的兄弟约瑟夫写了信，将他的女儿许配给约瑟夫的儿子，并称他唯一的儿子已经在他远在也门之时就死去了。<sup>7</sup>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中海社会，但它也会将目光投及地中海之外的世界，埃及成为地中海贸易圈和印度洋贸易圈之间的桥梁，与印度洋贸易圈相连接的是一条通向红海港口阿伊扎布（Aydhah）的短距离陆上路线。商人们的经营范围从西地中海延伸到也门和印度。大批东方的香料就是这样通过埃及进入地中海的。

262

经冢犹太人充分利用了属于穆斯林的地中海部分地区新出现的繁荣。埃及是这一地区的经济重心。亚历山大作为贸易和跨海交通的中心得以复兴；开罗则作为从亚历山大通过尼罗河和沙漠到达红海的中心环节而繁荣起来。法蒂玛王朝于公元 969 年将国家权力中心由突尼斯移至开罗，开罗也成了一个大都市，

法蒂玛家族的成员作为哈里发统治着这片地区，并挑战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与科尔多瓦倭马亚朝（Umayyad）哈里发的领袖地位。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信奉什叶派信条，但他们意识到，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还包括相当多的逊尼派穆斯林以及许多科普特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应对所有人予以充分考虑。如果他们升起什叶派的旗帜，就是在宣称他们要对抗地中海和东方的逊尼派对手。法蒂玛人从埃及进入红海进行贸易，取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这反映在他们的优质金币上，由此他们在中东占据了优势地位。他们取得的成就使得阿拔斯王朝败落了，阿拔斯王朝因掌控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行的商路而曾经生活得十分奢靡，同时，阿拔斯王朝的商业利润缩水，金币贬值。经冢犹太人在将东方奢侈品卖给地中海客户时可利用这些经过红海的贸易路线。<sup>8</sup>

这些犹太商人专营一些特别的商品，他们并没有过多涉足粮食贸易。当然，这时一定还存在着活跃的粮食贸易，因为伊斯兰世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黎凡特和北非城市的复兴——的确，其中一些城市成了新的基地，如防御性城市福斯塔特和凯鲁万，以及能将撒哈拉沙漠的黄金从内陆运出的港口城市马赫迪耶和突尼斯。大量城市居民依赖于外来的粮食和原材料，包括他们的产业需要的纺织纤维和金属等。城市中有许多掌握特殊技能的手工业者，他们制作的手工品可供出口，在远方用来交换食物。突尼斯人依赖于西西里的谷物，但他们（或者说经冢犹太人代表他们）出口棉麻织品，他们通常是从西西里购买原棉用于加工。这种被地中海隔离开来的两岸共生现象，在整片地中海海域都可以看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从摩洛哥取得粮食，同时卖给摩洛哥人成品——纺织品、陶器和金



属工具。如果条件许可，埃及人也如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那样，到拜占庭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寻找他们缺少的木材。<sup>9</sup>

经冢犹太人充分利用了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机会。他们对于犹太律法中规定的商业手段并不满意，一般遵行穆斯林的经商方法，这种方法将贸易中的风险分摊给本国的合伙人，而不是像拉比们所说，在参与旅行的代理人中分配。<sup>10</sup>这就意味着年轻的商人可用成功商人的代理人的身份参与贸易活动，而不必担心因经营不当而一蹶不振。<sup>11</sup>人们开始用较为复杂的方式在整个地中海完成支付：信用票据、汇票和支票是为人所熟知的，这对于行商处理债务、在必要时购置货物并完成消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大批量地从事麻织物和丝织品的买卖，丝锭经常被用作一种投资方式，他们把丝锭堆在一个容器内，到需要集资时再拿出来使用。埃及亚麻被运到西西里和突尼斯，丝绸有时来自西班牙或西西里；在西西里，波斯丝绸的仿制品被制造出来，仿制商标在伊斯兰世界也很常见，可以认为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伪造，而是对原产品商标的尊重。<sup>13</sup>经冢商人是经营不同品质丝绸的行家里手，他们知道最好的西班牙丝在进入埃及后价格可达每磅三十三第纳尔（dinars），而品质较差的西西里丝可能降至每磅两第纳尔。<sup>14</sup>亚麻的贸易规模更大，包括纺成麻线的和未纺成麻线的，有一款布料是部分由亚麻丝织成，它事实上因福斯塔特城而得名，被称为“福斯提安”（fustian，棉麻粗布），这个词后来被意大利商人用来指代任何地方生产的棉麻混纺产品，甚至产于德意志的也被如此称呼，这个词进入了当代欧洲的语言中。

264

经冢犹太人的世界一直延伸到当时已知世界的西部边缘。尽管安达卢斯以及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还没有被经冢商人们

当作商贸活动的重心，但多关于西班牙商人的资料很丰富。一些人带上了安达卢斯人（*al-Andalusi*）或者哈 - 塞法迪人（*ha-Sefardi*）的标签，就像雅各·安达卢斯（*Jacob al-Andalusi*）家族——该家族于公元 11 世纪中期生活于西西里、突尼斯和埃及——那样，在地中海各处经商。<sup>15</sup> 大商人哈尔丰·本·内塔尼尔（*Halfon ben Nethanel*）于 1128 ~ 1130 年在西班牙经商，后来在 1132 ~ 1134 年到了印度，1138 ~ 1139 年时又回到了安达卢斯。<sup>16</sup> 西西里是经冢犹太人贸易网络的一个中心。在它于 9 世纪被穆斯林征服之后，第一座沦陷的城市是该岛西端的马扎拉（*Mazara*）。该城成为埃及船只的目的地，一些小船也载着商品穿行于马赫迪耶和其他突尼斯港口之间；一旦它们进入马扎拉，商品就会被转移到更大的船只上，并由此东行。穿行于安达卢斯、西西里和埃及之间的一些船只很大；载重量为一千零五十吨的大船可从亚历山大载大约五百名乘客前往巴勒莫。在马扎拉著名的亚麻市场，埃及的商人们都在焦急等待着亚麻价格的变化，以确定自己应该向西方运送多少亚麻。向另一个方向运送的是丝绸，它被大量用作埃及新娘的嫁妆，此外，还有许多精细纺织品：枕头、床罩、地毯和一种被称为“披肩头纱”（*mandil*）的遮盖新娘头发的饰物。<sup>17</sup> 西西里岛上有一大片土地是留给牧场的，高品质的皮革（有的时候是镶金的）和绵羊乳酪也毫不奇怪地是该岛输出的著名产品。<sup>18</sup> 绵羊乳酪被运到遥远的埃及，其中一些还能保持着鲜度。

这并不是说，西西里的一切都很平静祥和；拜占庭攻击过西西里东部（皇帝决心为君士坦丁堡收回这颗明珠），岛上也有埃米尔之间的争斗。在公元 11 世纪早期有一封言辞悲切的

信件被送到了埃及，它描述了约瑟夫·本·塞缪尔（Joseph ben Samuel）在拜占庭对西西里发动新一轮攻击时的悲惨经历。他出生于突尼斯，但生活在埃及，并在埃及成婚；他在巴勒莫也有一处房产。一次船难将赤身裸体、身无分文的他丢在了北非海岸。幸运的是，他在黎波里（Tripoli）找到了一位欠他钱的犹太人，他用这笔钱买了新衣服，出发前往巴勒莫的住所，却发现这栋房子被他的邻居推倒了。他抱怨称自己没有钱将此人告上法庭。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发出十磅丝绸及一些金币到埃及。他愿意接受拜占庭海军的攻击；他愿意回到埃及找他的妻子和儿子，把他们带回巴勒莫，但是担心她不会答应此事，或者他得与她离婚。当时，行商有一个习惯，即拟定一份有条件的离婚协议，保证行商在无目击者的情况下去世后，他们的妻子可以避免被犹太律法阻止再嫁。这种离婚，如果她愿意的话，就可以成为事实上的离异，但约瑟夫申明，他爱他的妻子，写这份离婚书只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害怕在海的那边等待着他的命运。他哀伤地继续写道：

那么，噢，上帝，噢，上帝，我的主！按照你的宗教信仰去关注我的孩子吧！——当然，我对此非常了解。当他变得坚强一些时，就让他找一个老师去学习吧。

经冢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船只的信息。多数船主是穆斯林。早早地登船，并在船只起航前密切关注自己的货物，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习惯上，人们都在起航之前一天登船，在起航前夜不断地祈祷并写出遗嘱和相关说明。当然，起航的时间是不可预料的，由于突发暴雨、关于海盗的新闻或者统治当局的干

266 预，人们总是不得不在港口内等待出航，例如，一艘在航行季末在巴勒莫港等待驶往西班牙的商船被当局扣押，导致全船人在巴勒莫滞留了整个冬季。一个乘客抱怨道，他被困在巴勒莫，“手和脚都被砍掉了”——这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航行时间也是不可预料的：在公元 1062 年，一艘船自亚历山大驶往马扎拉只用了十七天；但另一信件揭示了一个叫作佩拉希亚·伊居（Perahya Yiju）的人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从巴勒莫航行至墨西拿（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城市，认为它很肮脏）。一艘小船耗时两个月才从亚历山大开到阿尔梅里亚（Almería）；另一艘船用了五十天才从亚历山大驶到巴勒莫，而有时候，这段距离只需要航行十三天。<sup>20</sup> 乘客们带着行李、餐具和陶器，有时候他们得睡在自己的货物上面，如果运载物是亚麻之类的物品，他们可能还不会太难受；船上没有舱室，在整个航程中人们都在甲板上苦挨。信件中很少提到他们的食物，食物一定非常简单。<sup>21</sup> 戈伊坦的感觉是，船难并不经常发生，而历史学家们关注船难只是因为关于船难的描述都非常形象。船只的确及时到达，且经冢犹太人也不因大海而惊恐。海上航行似乎不比陆地上的行程更危险。船长们在沿北非海岸航行时，试着在能看见陆地的海域行进，海岸上有灯塔观察着船只的移动，这显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而不仅仅是要控制关税。信息被送回亚历山大，通报船只的航行情况，商人们关注着这些信息，以确认他们的货物正在途中。<sup>22</sup>

有许多资料证实了犹太书籍和学者的流动，这说明贸易路线除传递亚麻外也传递着思想。公元 1007 年前后，一份咨询宗教见解的文件由东行的穆斯林商人驼队从摩洛哥带到巴格达。<sup>23</sup> 犹太人可能做到的事对于穆斯林也非常简单，希腊医药

和哲学方面的文本跨越了广阔的地中海，在西班牙南部流行。事实上，当希腊医生狄奥斯科理斯（Dioskorides）写的医药作品于10世纪传到科尔多瓦时，无人能读懂它，但是据说哈里发的御医犹太人哈斯代·伊本·沙普鲁特（Hasday ibn Shaprut）曾经与一位希腊修道士一起工作，他们一起把这些文本译成了阿拉伯文。沿着从西班牙到埃及和叙利亚的路线，267 一个经济、文化和宗教联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在伊斯兰世界内部，除了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派别分歧，以及倭马亚家族、法蒂玛家族和阿拔斯家族之间的政治分离之外，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往一直活跃。穿越地中海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像持各种信仰的商人一样频繁活动，加强了这种联系。被弃于这些联系之外的大多是基督教西欧的居民。在10世纪和11世纪，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拉丁商人在涉足这片海域时始终十分小心。只有少数基督教城市向穆斯林的海域派出商船，因为它们知道，成功的秘诀就是与穆斯林敌人合作。这些基督教城市中就有威尼斯，它的早期历史前文已经讲述过了。另一个知名度并不逊于威尼斯的港口是阿马尔菲，它紧靠索伦托半岛（Sorrentine peninsula）的山地边缘，难以抵达。

### 3

阿马尔菲是地中海历史上的一大谜题。如果有哪座罗马南部的城市会崛起为意大利贸易中心的话，那么它一定是拥挤的那不勒斯；除了亚麻业、与内陆便利的交通和陡峭的地形，那不勒斯还具有持续不断的贸易史——尽管它在公元6~7世纪经历了衰败，但并未因此崩溃。然而，在阿马尔菲的兴盛期，也就是与850~1100年大致相当的时期，阿马尔菲超越那不勒

斯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尽管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的城镇，在6~7世纪才围绕一个灯塔发展起来。<sup>24</sup>它有一条主街道盘旋而上，还有穿插在城市建筑之间的狭窄小巷，似乎根本无法与威尼斯竞争。<sup>25</sup>这里的早晨几乎不可能有风，对航海有相当大的影响。<sup>26</sup>这让一些历史学家讲起了“阿马尔菲之谜”，他们拒绝接受基督徒、犹太人尤其是穆斯林作家关于阿马尔菲是10世纪和11世纪西方最大的转运口岸的说法。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笔下的阿马尔菲是一个“没有商人”的城市，根据他的观点，阿马尔菲人在山崖上种植葡萄、经营果园，认为贸易只是增加一些收入的手段。<sup>27</sup>当然，制造一些可以到达其他大陆的船只是一项要付出昂贵代价的事业，该事业激发了进行商业扩张的动力。

狭小的阿马尔菲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然而，阿马尔菲变成了一个标签，指代一些来自南意大利的商人和水手，特别是索伦托半岛的山坡上的一些微型城镇的居民。阿马尔菲上方的城市拉韦洛（Ravello）和斯卡拉（Scala）没有自己的港口，于是派它们的商人搭乘阿马尔菲人的船前去海上；从阿特兰尼（Atrani）到阿马尔菲仅需步行五分钟，两地被一处突起的岩石隔开；马约里（Maiori）和米诺里（Minori）坐落于通向萨勒诺（Salerno）的海岸上；切塔拉（Cetara）则成为一处渔船队集结地。简言之，索伦托半岛的整个南海岸，从波西塔诺（Positano）到拉卡瓦（La Cava）的圣三一大修道院（Santissima Trinità，建于公元1025年），都属于阿马尔菲。阿马尔菲与潟湖湿地中的威尼斯的相似度比第一眼看上去高。威尼斯最初是一些小社区的集合，这些社区被水隔离开来，而不是像阿马尔菲中的社区一样被深山和陡峭的悬崖隔离——两种形态都给人

以固若金汤的感觉。阿马尔菲人和威尼斯人都认为自己是由于蛮族入侵而避难于此的。阿马尔菲在公爵——他们与威尼斯的总督一样，都与远方的拜占庭统治者保持着松散的联系——的统治下建立了零散的、碎片化的城市。在北非的萨拉森人入侵的时代，这种分散性使他们与潟湖周围分散的威尼斯人一样获得了抵御的力量。

阿马尔菲人能够发动一支船队作战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812年，当时，他们与另一个在地中海贸易中变得很活跃的城市加埃塔的水手一起，被拜占庭的西西里省督召集去抵抗穆斯林对西西里的入侵，当时穆斯林的船队已经抵达伊斯基亚岛和蓬扎岛（Ponza）的沿岸。当穆斯林的陆军侵入西西里岛，且穆斯林海军肆无忌惮地进军罗马并掠夺了圣彼得大教堂和城墙外的圣保罗大殿（St Paul's-without-the-Walls）时，情况变得更为危险。三年后，一支南意大利船队在奥斯蒂亚艰难地击败了敌人，这一事件在后来几个世纪中都被认为是拯救了罗马的战役——它被拉斐尔画在梵蒂冈宫殿的壁画上，此壁画的赞助人是利奥十世（Leo X），他与画中胜利时期的教宗利奥四世（Leo IV）同名。<sup>28</sup>教宗试图说服阿马尔菲人站在他的一边，允许他们自由使用罗马的港口。但是，阿马尔菲的商人一定会问自己：如果需要到西西里、突尼斯和更远的地方去搜罗罗马教廷渴望的奢侈品，与罗马建立这种关系又有什么用处呢？于是，尽管教宗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但阿马尔菲人和加埃塔人与穆斯林签订了协议，这为他们至少带来了物质上的救赎。到906年，加埃塔的执政官拥有了金币、银币和铜币，且获得了珠宝、丝绸和可用来装饰教堂的大理石，还有土地和牲畜，所有这些都

在他的遗嘱里写了出来。<sup>29</sup>阿马尔菲人也供养着坐落于南意大利

内陆的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本笃派主修道院，视自己为它在耶路撒冷的代理人。在希腊人与拉丁人教会还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的时期，他们也是坐落于阿索斯山的本笃派修道院的赞助人。

遥远的君士坦丁堡很乐意签署夸大其词的文件，授予阿马尔菲的公爵和杰出公民“*protospatarius*”的称号（从理论上讲，这是军事将领的头衔）。<sup>30</sup>然而，有一个家族，即潘塔莱奥尼（Pantaleoni）家族得到了皇帝的注意。公元11世纪，潘塔莱奥尼家族的人带了一批铜门来到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阿马尔菲大教堂和罗马城墙外的圣保罗大殿。<sup>31</sup>这只是潘塔莱奥尼家族成员从东方带来的众多奢侈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阿马尔菲人想要在拜占庭的领土上建立基地以便经商，10世纪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还拥有一些码头和货栈。<sup>32</sup>他们与威尼斯人一道穿越亚得里亚海，成为拜占庭强有力的设防城市都拉基乌姆的主要居民。<sup>33</sup>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的商人都渴望利用自都拉基乌姆经萨洛尼卡到君士坦丁堡的大路。

阿马尔菲在更远的东方，即法蒂玛王朝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阿马尔菲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处客栈，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商业优势，但珍奇圣骨的交易不断发展。作为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代理人，他们使得本笃派修道士们可以为那些来自欧洲的越来越多的朝圣者——他们经常从南意大利的港口出发——提供帮助。这个小客栈后来发展为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团中的善战的修士后来为保卫罗得岛和马耳他岛与突厥人作战。11世纪之后，这个骑士团发展为马耳他主权军事教团（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现在其总部位于罗马。<sup>34</sup>传说第一次东



征的十字军在 1099 年包围耶路撒冷时，阿马尔菲人就在城内。他们被迫服从穆斯林的指令，从城内向十字军扔石块；奇妙的是，石块在半空中变成了面包，供养了饥饿的十字军士兵。当然，事实上，阿马尔菲人之所以能繁荣，恰恰是因为他们避免了在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冲突中选边站。

公元 10 世纪时，福斯塔特有一处阿马尔菲殖民地；996 年，其成员被指控在法蒂玛哈里发的泊船港放火，大约有一百六十名意大利商人在随后发生的暴乱中被杀。<sup>35</sup>阿马尔菲人在福斯塔特生活时，与犹太商人也建立了联系，有一个叫作“马尔夫”（Malf）的地方在经冢文献中时不时地出现。经冢商人们航行至阿马尔菲出售胡椒。尽管发生了大屠杀事件，阿马尔菲人与法蒂玛王朝的联系仍然很密切。<sup>36</sup>他们在对非洲的贸易中创造了很高的利润并制造、发行了自己的金币。

西方正在复兴，同阿马尔菲人一样愿意与穆斯林做生意的西方人获得了利润。无论如何，另外两个意大利城市，即热那亚和比萨，开始证明更具野心的政策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

## 注 释

1. S. Reif, *A Jewish Archive from Old Cairo: the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s Genizah Collection* (Richmond, Surrey, 2000), p. 2 and fig. 1, p. 3.
2. S. D.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 1,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CA, 1967), p. 7; cf. the puzzling title of Reif's *Jewish Archive*.
3. S. Shaked, *A Tentative Bibliography of Geniza Documents* (Paris and The Hague, 1964).
4. Reif, *Jewish Archive*, pp. 72–95.
5. On Byzantium: J. Holo, *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 2009).
6. R. Patai, *The Children of Noah: 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NJ, 1998), pp. 93–6;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p. 280–81.
7. Shaked, *Tentative Bibliography*, no. 337.
8. D. Abulafia, 'Asia, 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2,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 M. M. Postan, E. Miller and C. Postan (2nd edn, Cambridge, 1987), pp. 421–3.
9. Mercantile contacts: Holo, *Byzantine Jewry*, pp. 201–2.
10.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 429.
11. Shaked, *Tentative Bibliography*, nos. 22, 243 (wheat), 248, 254, 279, 281, 339, etc., etc.
12.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p. 229–48, 257–8.
13. S. Goitein,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in the Cairo Geniza documents', *Archivio storico per la Sicilia orientale*, vol. 67 (1971), p. 14.
14. Abulafia, 'Asia, Africa', p. 431;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 102.
15. O. R. Constable, *Trade and Traders in Muslim Spain: the Commercial Realignment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900–1500* (Cambridge, 1994), pp. 91–2.
16. *Ibid.*, p. 92.
17. Goitein,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pp. 10, 14, 16.
18.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 111; Goitein,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p. 31.
19. Goitein,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pp. 20–23.
20.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p. 311–12, 314, 317, 325–6; Goitein,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pp. 28–30.
21.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p. 315–16.
22. *Ibid.*, pp. 319–22.

23. Reif, *Jewish Archive*, p. 167.
24. P. Arthur, *Naples: from Roman Town to City-state* (Archaeological Monograph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12, London, 2002), pp. 149–51.
25. D. Abulafia, 'Southern Italy, 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Aldershot, 1993), essay 1, pp. 8–9; B. Kreutz, 'The ecology of maritime success: the puzzling case of Amalfi',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 (1988), pp. 103–13.
26. Kreutz, 'Ecology', p. 107.
27. M. del Treppo and A. Leone, *Amalfi medioevale* (Naples, 1977), the views being those of del Treppo.
28. G. Imperato, *Amalfi e il suo commercio* (Salerno, 1980), pp. 38, 44.
29. C. Wickham, *Early Medieval Italy: Central Power and Local Society 400–1000* (London, 1981), p. 150; on Gaeta: P. Skinner, *Family Power in Southern Italy: the Duchy of Gaeta and its Neighbours, 850–1139* (Cambridge, 1995), especially pp. 27–42 and p. 288.
30. Imperato, *Amalfi*, p. 71.
31. H. Willard, *Abbot Desiderius of Montecassino and the Ties between Montecassino and Amalfi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Miscellanea Cassinese, vol. 37, Montecassino, 1973).
32. Abulafia, 'Southern Italy, Sicily and Sardinia', p. 12.
33. Anna Komnene, *Alexiad*, 6:1.1.
34. J. Riley-Smith, *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 1050–1310* (London, 1967), pp. 36–7.
35. C. Cahen, 'Un texte peu connu relative au commerce orientale d'Amalfi au Xe siècle',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e napoletane*, vol. 34 (1953–4), pp. 61–7.
36. A. Citarella, *Il commercio di Amalfi nell'alto medioevo* (Salerno, 1977).

### 三 地中海的变迁 (1000 ~ 1100 年)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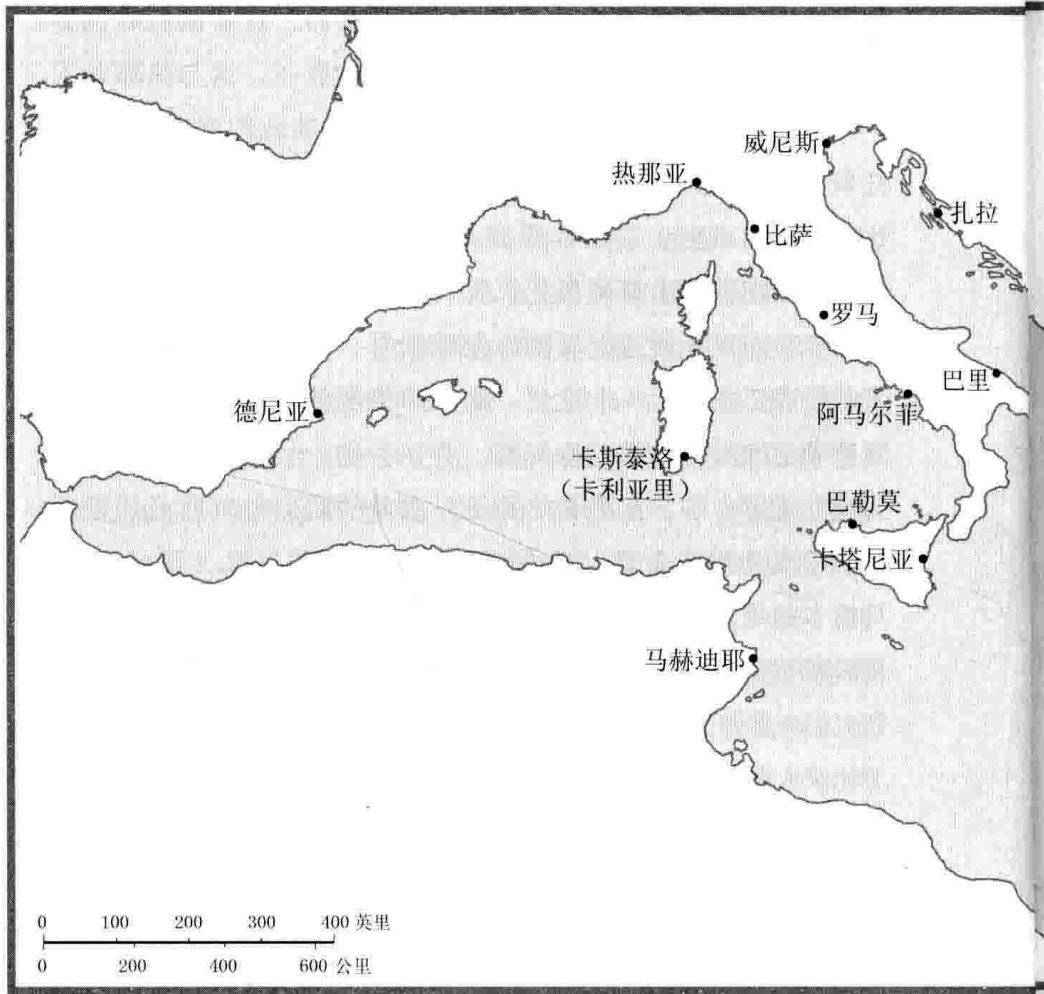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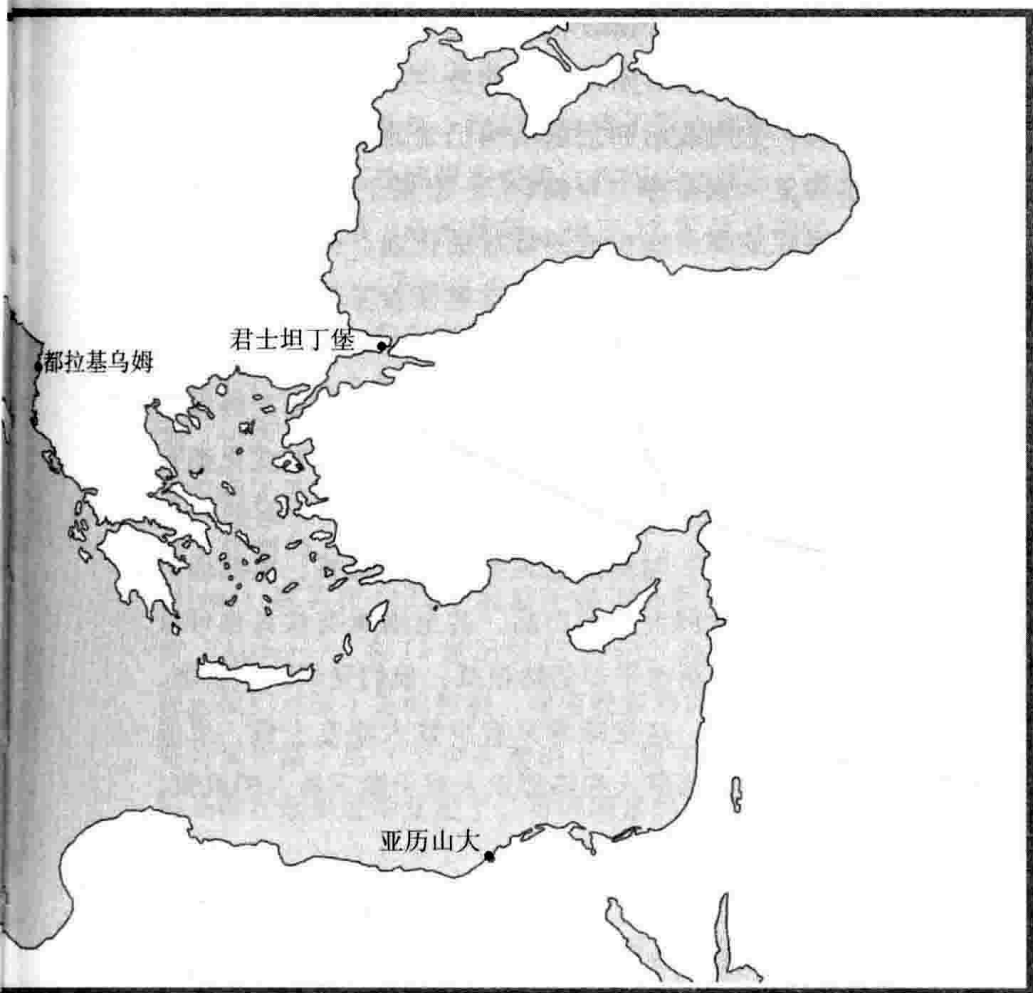
比萨和热那亚的兴起如同阿马尔菲一样，也是一个谜，这个谜题因这些城市在肃清西地中海海盗，开辟远及圣地、埃及和拜占庭的贸易路线——这些商路都是由商人和移民经营维持的——方面的惊人成功而更加复杂。比萨和热那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热那亚原来是公元7世纪的拜占庭总督的驻地，但经过两三百年的沉寂之后，该城于934~935年遭到来自北非的萨拉森人的洗劫，平静被突然打破。<sup>1</sup> 这个城市没有明显的可用资源；它位于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Ligurian Alps）的一侧，与产粮的平原隔离开来。其沿海地区的主要产品有葡萄酒、坚果、草药和橄榄油，热那亚人用当地的草药和油制了香蒜酱（*pesto*），这种产品只能说明这里的贫穷而不是富有。热那亚的港口在中世纪末期才发展起来，这经过了多个世纪的修缮才得以实现，但船只因集中停靠在热那亚东西方向的沙滩上而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没有被恶劣天气的破坏。<sup>2</sup> 除了造船业之外，热那亚没有其他产业。热那亚人需要生存，他们开始探寻航海之路，并以此为维系城市生存的核心。随着城市发展，他们更加依赖于外部供应的小麦、咸肉和奶酪。从这些规模不大的商业开始，热那亚脱颖而出，逐渐发展出了前工业社会中最有雄心的贸易网络。

比萨则完全不同。这个城市坐落于阿诺河边，距离海岸只有几英里；河道入海口的沼泽地使得比萨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港口。比萨人在由内陆伸向海岸的平坦农田中种植谷物，并喂养绵羊以为比萨提供羊毛、皮革、肉和乳制品，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比萨的市民很少担心他们无法填饱肚子，这与热那亚人不同。另外，对于以普罗旺斯和撒丁岛为基地的穆斯林来讲，托斯卡纳低洼的海岸比陡峭的利古里亚更易于从海上进攻；到比萨海军出现时，它的首要敌人就是穆斯林。公元 982 年，比萨船只随同德意志皇帝奥托二世的军队沿着意大利半岛向更南端的卡拉布里亚行进，希望压制穆斯林，以免他们从西西里岛发动侵袭。在之后一个世纪，比萨和热那亚集中力量，希望清除第勒尼安海上的萨拉森海盗。为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撒丁岛建立指挥中心，比萨和热那亚以激昂的活力对抗西班牙穆斯林中善战的穆贾希德（Mujahid）——他是德尼亚（Denia）和马略卡的统治者——的陆军和海军进入撒丁岛。<sup>3</sup> 不管穆贾希德是否希望征服岛屿，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势力只到达了撒丁岛上的一些沿海据点。1016 年，穆贾希德被逐出撒丁岛，这提升了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作为基督教反对穆斯林军队之圣战勇士的声誉。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势力平衡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穆斯林的中央政权变得支离破碎，比萨和热那亚的舰队抓住了机会。

## 2

这两个城市越是深入了解撒丁岛，就越是觉得它对于它们非常有价值。这个岛上有着广泛的牧羊人群体，到公元 12 世纪以前，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开始视撒丁岛为他们自己乡村地区（*contado*）的延伸。这里的粮食产量丰足，品质居中；在





南部有许多可以被改为盐田的潟湖。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毫无顾忌地奴役撒丁岛人，他们将这些人视为未开化的群体。撒丁岛人讲后期拉丁文，记录当地羊、牛、马数量的财产文件使用的就是该语言。撒丁岛自石塔时期以来几乎没发生突出变化，仍是远离大海的田园社会：它是一座岛屿，但并不完全属于地中海。它的政治和宗教结构仍是原始时代的。当地人微言轻的国王（或者称“审判官”）出现于10世纪，他们是几乎不复存在的拜占庭权威的最后的代表。但是拜占庭的势力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岛上的教堂遵循着希腊教仪，且在1100年之前，至少有一些教堂是以希腊的十字式风格修建的。教宗猛烈抨击这种习俗，并支持欧洲大陆的修士进入该岛，其中包括来自蒙特卡西诺的本笃派教士。<sup>4</sup> 所有变化都有助于改变撒丁岛上的生活。上层家族的成员，即所谓的“马约拉尔”（*maiores*），与热那亚人和比萨人通婚，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欧洲大陆的产品，甚至锅碗类炊具也可以进口了。而农民的生活水平却仍然很低，他们受到疫病折磨，食物贫瘠，死亡率高。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吃上饭，更多的谷物被用于出口。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对于撒丁岛人的政策，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剥削。

公元12世纪，热那亚人经常派船只前往撒丁岛，他们廉价但重要的产品保障了投资的稳定回报率。任何拥有一小笔闲置资金的人——例如继承了一点儿遗产的寡妇——都可以安全地用五磅或十磅重的热那亚银币投资对撒丁岛的出口贸易，以期在几个月后收回六磅或十二磅。<sup>5</sup> 撒丁岛使比萨和热那亚第一次领略了殖民形式。这两个城市都试图维持撒丁岛上的审判官们对自己的忠诚。在1100年前后，该目标经常通过这两个城



市的大教会的代理人而达成。撒丁岛南部的卡利亚里（Cagliari）<sup>275</sup>的审判官马利阿诺·托奇托里奥（Mariano Torchitorio）把撒丁岛南部的土地赠给了热那亚的圣罗伦佐大教堂。但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因为他也同样使比萨人获得了一些礼物。<sup>6</sup>即使如此，挑拨离间的手段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比萨和热那亚太过强大，撒丁岛无法抵抗。比萨人修建了带有很强比萨特色的大教堂和修道院，其外墙覆盖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这极为清楚地说明了比萨在撒丁岛的优势。建于12世纪早期的萨萨里圣三一修道院（Santa Trinità di Saccargia）是这类建筑在撒丁岛北部的典型代表，它有斑马纹状的外墙。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是在石塔时代后最先修筑设防城墙的：在审判官统治卡利亚里的时期，比萨人占据了被称为卡斯泰洛的陡峭山峰，至今它还俯瞰着卡利亚里城，山上的高墙围出了一个比萨人的侨居区，比萨的士兵和商人们可在此地安然度日。据说热那亚的多利亚（Doria）家族在1102年前后于撒丁岛的西北部建立了阿尔盖罗（Alghero）。在12世纪和13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能够保证他们对撒丁岛的控制。即使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坚持认为撒丁岛（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他们，但真正有意义的是谁在这里成功立足了。可问题是热那亚和比萨都希望自己成为撒丁岛的真正主人，这导致了两座城市的激烈角逐。由于撒丁岛的归属问题而不是意大利半岛内的意见不合，热那亚和比萨间冲突频发。到1200年，撒丁岛周围的海域基本上肃清了穆斯林海盗，但意大利海盗大量涌现——比萨人攻击热那亚人，反之亦然。

### 3

比萨人和热那亚人之所以能够调动自己的船队，中央政权

在北意大利的衰亡是原因之一。“意大利王国”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存在，它的统治者自公元 10 世纪以后就是德意志的国王，该国王同时也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冠持有者——962 年教宗为奥托一世加冕，使西罗马帝国获得再生。帝国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势力衰微，这些或那些城市的政权日益旁落地方贵族的手中。到 12 世纪初，贵族们开始组织自治的共同体，虽然历史学家们使用“公社”（*commune*）或“城市共和国”（*city-republic*）这样的词称呼这种共同体，但是它们都有不同的名称。在热那亚，这被称为“自治会议”（*compagna*），字面意思是“一起分食面包的人”。的确，热那亚的政权自 1100 年之后就非常像一种商业合作了。这种自治会议在一定期限内形成，用于解决某些特殊问题，如建造十字军的战船，或者解决在热那亚经常导致暗杀或街头暴乱的政治冲突。这种“伙伴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向整个社群敞开的公共机构；但从另外一些非常重要的角度看，它又有私人社团的性质，尽管“公共”和“私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 12 世纪的热那亚人的头脑中还不明确。这个城市中充斥着一些私人“飞地”，它们是修道院和贵族的财产，是享有豁免权的小区域，逐渐地被自治会议中的一些上层官员攫取和控制。这些官员都有着响当当的“执政官”头衔，表明他们对罗马共和模式的认识，在热那亚的第一个自治会议问世时就有了多达六位执政官了。<sup>7</sup> 如在古罗马时期那样，在这一时期，拥有实权的人小心地操纵选举制度，执政官总是来自贵族阶级。<sup>8</sup>

这些贵族创建了热那亚的贸易帝国，同样的进展也发生于比萨。此处的难题是他们究竟是谁：我指的并不是他们在历史记录中被反复提及的名字 [如热那亚的多利亚（*Doria*）

家族和斯皮诺拉（Spinola）家族，或者是比萨的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和阿利阿塔（Alliata）家族]，而是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到底源自贸易还是土地。意大利城市的公社将城镇周边那些习惯居住在此类地区的小贵族和相对晚近成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依赖于从经商、纺织业或者银行业获得的财富）凝聚起来。到公元12世纪早期，在比萨和热那亚，这些群体融合得很好，新贵的财富被带入需要更多金钱的古老家族。进入那些成员在陆战或者海战中赢得名声的家族的荣耀的可能性，吸引着商人团体中最为富裕的人。一个新的集团出现了。这个集团的成员显然并不愿意与那些构成市民之大部分的艺术家和手工业者分享权力。公社的兴起并不是城市变成民主共和国的标志；相反，它表明寡头们赢得了胜利，热那亚的街头因此爆发了严峻的派系斗争。然而，在这些暴力活动发生的间隙，人们还是有机会以空前的规模赚钱。精英们投资于遥远地域的跨海贸易；他们在城市购买土地，并继续经营自己在农村的产业，甚至将他们的手伸到远隔海洋的撒丁岛上去攫取土地。城市政权对于这类活动干预甚少，只在跨国同盟影响到贸易，或者这些同盟的建立取决于那些主宰贸易活动的人时，才予以干预。<sup>9</sup>

277

这些就是在公元1100年前后我们能在意大利北方观察到的趋势，但比萨和热那亚是最早形成贵族社团的城市。意大利内陆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大伦巴第平原上的城市的发展，对于地中海上的事件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们都成了舶来奢侈品的需求中心，且同时，它们自己的精英组织生产了日益精细的布料和金属制品，这些产品可以运抵地中海的另一端，以偿付现在需要的丝绸和香料的货款。在热那亚和比萨，

以及在意大利东部的威尼斯，人们发现自己能够到达那些他们的老前辈阿马尔菲商人所不能接近或不能经常接触的地方，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外，这些城市开始把眼光投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域。南德意志的宫廷和城市都欢迎由威尼斯人运来的产品，且在12世纪，德意志商人也抵达威尼斯，为德意志人的商栈（Fondaco dei Tedeschi）奠基，这种商栈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是以热那亚为基地的德意志商人的商务代理站。<sup>10</sup>热那亚商人开始溯罗讷河而上，前往香槟地区的新兴市集，他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最为精致的弗兰芒呢绒，然后顺罗讷河而下至地中海。一个广泛的商业网络形成了，其核心是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间的海上贸易，也有延伸至西欧的分枝。

278 支持这一商业革命的是经营和记账方式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热那亚这一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如此了解，是因为自公元1154年以来，城市里的文书做了大量合同、遗嘱、土地出售和其他转让的记录。<sup>11</sup>这些记录中保存下来的第一件，就是由公证官乔瓦尼 [Giovanni Scriba，或称约翰文士 (John the Scribe)] 所写的笨重大书，这些记录写在从亚历山大进口的厚实平滑的纸上，他的服务对象包括热那亚12世纪中期最有权势的家族。<sup>12</sup>经商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高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公教会公开地斥责任何形式的“高利贷”。高利贷这个名词的用法极其宽泛，从高额贷款利率到简单的商业利润都可用它指代。商人们的经营手段须设法逃避教会的责难，教会对经商赢利行为所实施的最重惩罚是开除教籍。人们可以贷出一种货币，再用另一种流通货币结算还款，经商利润就隐含在钱币交换率当中。商人们常常结成一种被称为 *societas* 的合伙

形式，其中一个坐商的投资额度占四分之三，而其合伙人的投资占四分之一的份额，同时后者须同意航行前往双方协商的某一目的地，并在该地经营，作为回报他将获得利润的一半。这对于一个年轻的商人来说是开始资本积累的好途径，但另一种利润的分配方式变得更加常见——佣金（*commenda*）。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出行的合伙人不必投资，只需付出他的技术和服务，他将获得四分之一的利润。这种分配方式有助于将财富分散到贵族精英以外的阶层；一个忙碌的、野心勃勃的、不怕海上和异国港口之险境的商人阶层形成了。<sup>13</sup>热那亚人和比萨人遥望地中海，在每一个角落寻找机会。

#### 4

要在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开展更有野心的事业，掌控家门前的水域是基本前提。在巴里处于穆斯林埃米尔的控制之下时（公元847~871年），威尼斯人需要肃清亚得里亚海的穆斯林船队；880年，威尼斯人的努力得到回报，他们从感激涕零的拜占庭皇帝那里获得了一项特权。992年，威尼斯人再一次前来帮助拜占庭，在这次行动中，它获得了一项贸易特权。<sup>14</sup>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并不拥有强如希腊皇帝的庇护者，只能依赖自己的努力。1063年，一支比萨船队侵入了被穆斯林控制的港口巴勒莫，破坏了一些敌船，并掌控了在港口外拦截（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入侵者（如他们自己那样）时所用的铁链。他们没能进入港口，但还是掠走了大量战利品。<sup>15</sup>他们的利润增加了上帝的荣光，因为他们捐出其中的一部分修建了比萨人的圣玛利亚（*Santa Maria*）大教堂。如果有任何标志能够显示这座城市的财富增长，那就是这座壮丽

的大理石教堂了。

这些劫掠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即他们在进行一场对抗穆斯林的圣战。上帝将以胜利、劫掠物品，以及当时界定尚不明确的“精神财富”来回报他们的付出。在精神回报和物质回报方面还没有明显的界线，公元 1087 年（当年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攻击了突尼斯海岸的马赫迪耶）的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sup>16</sup>马赫迪耶城屹立于一处海岬，是由当年实际控制了埃及的法蒂玛统治者所奠基的，它也曾经是来自通布图（Timbuktu）之外的尼日尔河岸的沙金集散地；这些沙金由骆驼商队驮运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地中海，然后被注入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对马赫迪耶的控制一定也是控制西西里海峡的关键环节，由此也是地中海东西两方自由交通的关键环节。因此，它一直是基督教征服者——12 世纪的诺曼诸王、14 世纪的法兰西十字军——所设定的目标。但是它最为繁盛的时期是 11 世纪晚期。经冢犹太商人经常光顾此地，在此出售来自东方的胡椒和埃及的亚麻。<sup>17</sup>1062 ~ 1108 年，马赫迪耶由精力充沛的埃米尔塔敏（Tamin）治理，他通过贸易和对卡拉布里亚的尼科泰拉（Nicotera）及西西里岛马扎拉的海盗式袭击致富。<sup>18</sup>对于近邻来说，他是一个讨厌的骚扰者。法蒂玛王朝愚蠢地发动了贝都因人（Bedouin）的军队 [即巴努希拉尔部（Banu Hillal）和巴努苏莱曼部（Banu Sulaym）]，他们以为这会使突尼斯重新与埃及结盟。最终，贝都因人仅仅加剧了局面的混乱，对村庄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导致北非的居民开始对西西里的谷物产生依赖，而突尼斯在数百年之前曾经是地中海世界的面包筐。<sup>19</sup>据 13 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阿尔-阿希尔（ibn al-Athir）记载，基督徒试图劝诱西西里的诺曼伯爵罗

杰 (Roger) 参与攻击马赫迪耶的军事行动 (罗杰曾经在西西里岛上耗费了二十五年时间以扩大基督徒的控制范围); 但是 280 “罗杰抬起他的大腿, 放了一个大大的屁”, 抱怨说这会引起诸多纠纷: “食物的贸易权将从西西里人的手中转到他们的手中, 而且我将失去每年在谷物贸易上所得到的利益而使他们获益”。<sup>20</sup>

即使没有罗杰伯爵的加入, 意大利的同盟者也乐于在公元 1087 年采取行动。教宗维克托三世在罗马欢迎那些前来参战的人, 他们在这里获得了朝圣者的香袋, 表明他们已经拜谒了圣彼得大教堂。这曾经使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当代历史学家大感兴奋, 他们坚持认为自 1095 年第一次东征后, 十字军便开始被视作朝圣者: “朝圣行为与圣战事实上是同一件事。”<sup>21</sup> 就像在巴勒莫一样, 意大利人对马赫迪耶的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但并没有占领这个城市, 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占领它。他们用掠夺得来的财富资助修建了位于比萨中心的科尔泰维基亚 (Cortevicchia) 的圣西斯托 (San Sisto) 教堂, 该教堂的立面装饰着十字军从马赫迪耶劫掠来的陶器。<sup>22</sup> 此外, 比萨人还为此举作了一首拉丁文的诗——《比萨人的胜利之歌》 (*Carmen in victoriam Pisanorum*), 诗中满是圣经式的想象, 使人回忆起以色列的子民与其异教邻人间的斗争。马赫迪耶人在诗中摇身一变成了古代的米底人 (Midianites), 而比萨人则自称马加比家族甚至摩西的继承者: “噢, 希伯来人再次掠夺了埃及, 并因击败法老而喜悦; 他们越过了伟大的海, 似乎它是最干燥的陆地; 摩西将水从最坚硬的岩石中吸出。”<sup>23</sup> 这首诗营造了一种狂热, 使与异教徒作战的神圣事业看起来超越了商业方面的考虑。

比萨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对立的，比萨人用伊斯兰世界的陶器装饰教堂就可证明这一点。<sup>24</sup> 这些陶器用了很厚的陶釉和丰富的色彩，在风格上十分不同于西欧生产的古朴器皿，而且被嵌入教堂的外墙使它们在阳光下像珠宝一样闪耀着光芒。<sup>25</sup> 大的陶盘（*bacini*）被嵌入比萨的钟楼和教堂正面的墙，它们述说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这个故事并非只与战争相关，还涉及贸易和人们对于东方产品的迷恋。公元 11 世纪修建的教堂的外墙展示了埃及式的精美陶器。这里有在马赫迪耶战争前后从西西里岛和突尼斯运来的陶罐；摩洛哥曾向比萨输送大量更简朴的绿色和棕色的陶器，它们的表面覆有蓝色的陶釉。比萨人开始习惯于这种装饰方法，即使他们在 13 世纪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涂釉陶器制造业，教堂的钟楼上还是安置了这种彩陶盆装饰。这是因为意大利人从伊斯兰世界不只获得了陶器，还学习了穆斯林的技术，这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奠定了锡釉陶器产业的基础。

在比萨附近，圣皮耶罗格拉多（San Piero a Grado）教堂的立面镶有一只大盘，上面画了一艘挂着三角帆的三桅船，有较大弧形的船头和倾斜的船尾。这艘船来自穆斯林统治下的马略卡，它的设计相当富有特色。<sup>26</sup> 即便如此，这一图像还是令人隐约想起那些装载各类货物的巨大帆船，它们在伊斯兰势力控制地中海南部水域期间在西班牙、非洲和西西里岛间航行。它印证了经冢文献关于宽大船只 *qunbar* 的描述，这种船可以装载大量货物并同时搭乘旅客。<sup>27</sup> 另一只陶盘描绘了一艘较小的、装备有桨和帆的船，它紧随一艘双桅船航行，这可能是一种体长、低矮、流线型的快速帆船。经冢文献中同样可找到相关的证据。在这些文献提到一种叫作 *ghurabs* 的轻型帆船，这个词传达了一



柄剑的利锋之意，突显了这种船破浪前进的能力。而长形低矮的小船可能是 *qarib*，这是一种远洋船只，能够一直从突尼斯驶向叙利亚。<sup>29</sup>

## 5

对穆斯林在地中海霸权的挑战在公元 11 世纪末激化了。在 11 世纪 60 年代，也就是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和他的兄弟罗杰·德奥特维尔（Roger de Hauteville）的军队侵入西西里后，基督徒在穆斯林控制下的地中海海域的扩张进展顺利。此两人是诺曼骑士，他们已经在伦巴第和南意大利的拜占庭领土建立了统治权。1061 年，即在他们占领了巴里——人们所知的拜占庭“伦巴迪亚”（Longobardia）行省的首府——的十年后，他们受诱渡过墨西拿海峡，干预占领了西西里岛且对诺曼人的威胁毫无所知的三个埃米尔间的激烈争端。伊本·哈瓦斯（ibn al-Hawas），也就是其中一位埃米尔，把自己的妹妹放在山顶的恩纳（Enna）保护起来，她是势力强大且可憎的卡塔尼亚埃米尔伊本·阿斯-希姆纳（ibn ath-Thimnah）备受虐待的妻子，后者试图以武力将妻子夺回却没有成功。绝望之中，伊本·阿斯-希姆纳请求诺曼人帮助他，罗伯特和罗杰·德奥特维尔答应了。他们到了西西里，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不是入侵者，而是卡纳尼亚的埃米尔军事上的支持者。他们将这一同盟关系作为逐渐地夺取整个岛屿的基础，他们首先占领了墨西拿，继而在 1072 年占领了巴勒莫（但对整个西西里的占领直到 1091 年诺托陷落后才完成）。他们将战斗人员和马匹运过墨西拿海峡的本领令人难忘。罗杰成为西西里伯爵，并娶了意大利西北部的萨沃纳（Savona）贵族的女儿；和她一起来

的有大批利古里亚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后来被称为伦巴第人。随着这批移民的到来，西西里岛缓慢的拉丁化进程开始了，直到12世纪，在西西里东部的一些城镇中，还有一些人讲着与利古里亚的意大利语相近的方言。<sup>30</sup>

然而，西西里岛的本质并没有发生迅速变化。在公元12世纪的多数时候，这里是一个多族混居之地：穆斯林人口最多，约有一千一百人；希腊人略少；犹太人则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而拉丁移民（不论他们是诺曼人还是“伦巴第人”）的占比不到百分之一。希腊人口主要集中在西西里岛的东北角，在埃特纳火山周边被称为瓦尔德莫尼（Val Demone）的区域，且尤其集中在墨西拿，墨西拿后来成为诺曼人治下的西西里的主要造船基地。这里的每个居民群体都被允许保持一定独立性：人们可自由地实践宗教信仰，这是在与被征服的城镇如恩纳签订“投降协议”时确立的原则；各群体有自己的法庭，处理相同宗教信仰者内部的讼案；伯爵保证为他们提供保护，缴纳的保护金或称“人头税”（*poll-tax*）由穆斯林和犹太人来支付，它只是穆斯林向“有经书的人民”所征收之人头税（*jizyah*）的扩展，只不过在这里，基督徒可以免税，而穆斯林需要征税而已。

288 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了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行省，周边的伦巴第公国也引起了拜占庭皇帝的极度愤怒。教宗与希腊正教会之间的关系在公元11世纪持续恶化，因为教宗开始强调其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而且诺曼人的胜利有可能使南意大利的教会脱离希腊派基督教。尽管1054年的“东方分裂”经常被视为西方的大公教会与正教东方分裂的决定性节点，但这一年的事件只是长期争执中的一小部分：教宗使节亨

拜 (Humbert of Silva Candida) 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高高的圣坛上抛出了一个文件, 将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他的主人拜占庭皇帝开除了教籍。拜占庭曾经在阿普利亚 (Apulia) 的沿海城市巧妙地平衡与拉丁人和希腊人的关系。在那里, 拉丁主教们通常更乐于接受君士坦丁堡的权威, 至少在政治事务上情况如此, 而无视西方的统治者, 包括教宗。诺曼人的到来挑动了拉丁人对抗拉丁人, 希腊人对抗希腊人; 诺曼人对于意大利靴头部位的卡拉布里亚的征服, 以及之后对西西里岛的征服, 使数万希腊人被置于罗伯特的兄弟罗杰的统治之下。在 1071 年巴里陷落之后, 诺曼人对于拜占庭人的敌意更强, 因为罗伯特计划入侵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对面的拜占庭领土。他将都拉基乌姆和爱奥尼亚诸岛视为可以在他金发碧眼的大块头儿子波希蒙德 (Bohemond) 协助下深入拜占庭领地的门户。罗伯特攻打拜占庭的理由是, 他在为被废黜且被流放的皇帝米哈伊尔·杜卡斯 (Michael Doukas) 打抱不平。他欢迎一位自称米哈伊尔的难民修士随军前行。他给这位修士穿上皇帝的服饰, 让他站在都拉基乌姆的城墙前, 但这个“米哈伊尔”(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娜的说法) 一出现, 在城垛上守卫的市民就立即大声喊叫说他是假冒的。人们可能会推测安娜如此说, 是因为她是在位皇帝阿列克修斯·科穆宁 (Alexios Komnenos) 的女儿, 这位皇帝是一个强大王朝的奠基者, 他的文治武功带来了拜占庭的伟大复兴。安娜怀疑罗伯特觊觎君士坦丁堡的皇位, 而且我们很难否定这一点。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只是他试图沿着艾格纳提亚大道一直攻向拜占庭心脏的一场战争的第一阶段。

公元 1081 ~ 1082 年, 罗伯特建立了一支足以装载用兽皮包裹的庞大攻城塔的船队, 以图从海上攻击都拉基乌姆, 而波

希蒙德会在前方海岸的法罗拉（Valona 或 Vlorë）登岸，然后从陆上行进。当时是夏季，海面比较平静，但是据安娜·科穆宁娜记载，上帝显示出了对拜占庭人的恩宠，刮起了大风将罗伯特的船只吹散并摧毁。当云层散开之后，建在船上的攻城塔被突然兴起的巨浪击倒，陷入甲板之下。船沉了，罗伯特和他的少数随从有幸存活，被抛在岸边。即使面临如此逆境，罗伯特·吉斯卡尔也不认为这是神的裁夺，而决心重新发动攻击。<sup>31</sup> 罗伯特集结他的残余兵力包围了都拉基乌姆，甚至带来了一些更庞大的攻城塔搭在城墙上。这些城墙建筑十分牢固，据拜占庭作家的说法，两台二轮战车可以在城墙上叠起来——这个画面更接近荷马的描写，而不是 11 世纪战争的现实情形，因为在这一时期，这种二轮战车早已消失。都拉基乌姆只能被叛变和欺骗征服。事实上，给入侵者打开城门的是一个阿马尔菲商人。<sup>32</sup>

阿列克修斯对于如何对处于帝国西端的潜在敌人发动战争的问题有了明智的解决方法。他的船队缺乏在离家如此远的地方进行战斗的能力。拜占庭的海军被局限于爱琴海，拜占庭人在陆地上还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处理：塞尔柱突厥人攻击着其小亚细亚的东方边境，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上，更不必提君士坦丁堡内部的派系之争了。拜占庭人更乐于利用外交手段避免冲突，但仅诉诸外交手段并不能搞定罗伯特·吉斯卡尔。外交手段是对作为其他势力的威尼斯人使用的，威尼斯商人生活在对冲突的恐惧之中，这种冲突可能导致他们难以自由出入亚得里亚海。诺曼人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次胜利会使南意大利军舰控制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威尼斯非常乐于见到控制南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势力无法同时控制东岸，所以威尼斯人答应为拜占庭人提供海上援助，以将吉斯卡尔赶离都拉基乌姆。他们派出

了配有镶着钢钉的重型撞角的帆船，它们撞向敌船并将其撞破。最后，拜占庭人收复了都拉基乌姆，罗伯特（他当时在意大利也遭遇了困难）被迫撤退，但波希蒙德仍在阿尔巴尼亚逗留了一段时间并为那里带去了浩劫。当罗伯特再度发动进攻时，他已经是老弱之躯，最后在公元 1085 年的攻击行动中死于凯法利尼亚岛（Kephallonia）的小港口费斯卡尔多（Fiskardo），此地的地名中至今仍保留着他“吉斯卡尔”的绰号（意为狡猾的）。尽管阿列克修斯和他的宫廷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甚为欣慰，但这绝不是南意大利的统治者通过阿尔巴尼亚入侵拜占庭的最后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向皇帝阿列克修斯派出使节，公元 1082 年皇帝颁布“黄金诏书”，赏给威尼斯人许多礼物，并同时强调威尼斯人是皇帝的“臣属”（*duli*）。他给予威尼斯人的最为贵重且最具争议性的礼物是允许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除黑海和塞浦路斯之外的所有地方享有贸易免税权。皇帝试图保住君士坦丁堡作为连接地中海（从地中海可获得香料和奢侈品）和黑海（从黑海下行，商人们可带来皮毛、琥珀和其他北方的产品）的要道的特殊地位。威尼斯人甚至在金角湾得到了一些土地，包括一个码头和他们自己的教堂（附有自己的面包房）。<sup>33</sup>1082 年的特权在地中海树立了一种标准；且无论何时，只要意大利城市需要与一个需要其提供海军力量支持的贸易伙伴谈判，它们都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仿效。

关于拜占庭经济受威尼斯人制约达到什么程度，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从长远来看，意大利人的出现可能促进了农产品和纺织品的输出。<sup>34</sup>很明显，在公元 1100 年前后，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的存在还是极其有限的。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世界的主要

目的地很令人惊奇地是接近自己家园的都拉基乌姆（刚刚从诺曼人手中夺回）以及科林斯（进入此地不需要经过爱琴海，只需使用科林斯湾内位于勒凯翁的古代港口即可）。威尼斯人从这两处运载葡萄酒、油、盐和谷物回到自己正在蓬勃发展的家乡，那里对这类普通食品原料的需求在不断增长。<sup>35</sup>对于多数的威尼斯商人来说，有着丝绸、珠宝和金属制品的君士坦丁堡是远在天边的地方，但是他们开始考虑充分利用他们已经获得的特权。这是一项权利，因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住在东罗马帝国边区的居民，对于他们作为帝国臣民的身份颇感自豪，这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可以通过圣马可大教堂的建筑和装饰证明，这座教堂重建于7世纪下半叶，完全属于拜占庭风格，模仿了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的形制。圣马可大教堂的修建意在全面彰显与东方的联系，因为它也骄傲地宣称它与亚历山大，即埋葬圣马可骸骨之地的联系。<sup>36</sup>

286 到公元11世纪末，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已经越来越热衷于用武力清除西地中海的穆斯林海盗，并瓜分了撒丁岛。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赢得了在日后将变得独一无二的地位。穆斯林在地中海上的统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在十字军的陆军和海军第一次开始行动之后。

## 注 释

1. S. A. Epstein, *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 (Chapel Hill, NC, 1996), p. 14.
2. *Ibid.*, pp. 10-11 (with a rather more positive view of its harbour).
3. *Ibid.*, pp. 22-3.

4. D. Abulafia, 'Southern Italy, 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Aldershot, 1993), essay i, p. 24.
5. *Ibid.*, pp. 25-6.
6. J. Day, *La Sardegna sotto la dominazione pisano-genovese* (Turin, 1986; = J. Day, 'La Sardegna e i suoi dominatori dal secolo XI al secolo XIV', in J. Day, B. Anatra and L. Scaraffia, *La Sardegna medioevale e moderna*, Storia d'Italia UTET, ed. G. Galasso, Turin, 1984), pp. 3-186; F. Artizzu, *L'Opera di S. Maria di Pisa e la Sardegna* (Padua, 1974).
7. Epstein, *Genoa*, pp. 33-6.
8. Cf. A. Greif,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Cambridge, 2006), p. 229; also L. R. Taylor,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 CA, 1949).
9. Epstein, *Genoa*, pp. 19-22, 41; Greif, *Institutions*, p. 230.
10. G. Rösch, *Venedig und das Reich: Handels- und Verkehrspolit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Tübingen, 1982).
11. S. A. Epstein, *Wills and Wealth in Medieval Genoa, 1150-1250* (Cambridge, MA, 1984).
12. D. Abulafia, *The Two Italies: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 1977), pp. 11-22.
13. Q. van Dosselaere, *Commercial Agreements and Social Dynamics in Medieval Genoa* (Cambridge, 2009).
14. D. Abulafia, 'Gli italiani fuori d'Italia', in *Storia dell'economia italiana*, ed. R. Romano (Turin, 1990), vol. 1, p. 268; repr. in 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Aldershot, 1993); D.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88), pp. 33, 41.
15. Abulafia, *Two Italies*, p. 52.
16. H. E. J. Cowdrey, 'The Mahdia campaign of 1087',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92 (1977), pp. 1-29, repr. in H. E. J. Cowdrey, *Popes, Monks and Crusaders* (London, 1984), essay xii.
17. S. D.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 1,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CA, 1967), pp. 196-200, 204-5.
18. Cowdrey, 'Mahdia campaign', p. 8.
19. D. Abulafia, 'Asia, 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2,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 M. M. Postan, E. Miller and C. Postan (2nd edn, Cambridge, 1987), pp. 464-5.
20. Abulafia, *Two Italies*, p. 40.
21. Cowdrey, 'Mahdia campaign', pp. 18, 22.
22. D. Abulafia, 'The Pisan *bacini* and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 a historian's viewpoint', *Papers in Italian Archaeology*, IV: *the Cambridge Conference*, part iv, *Classical and Medieval Archaeology*, ed. C. Malone and

- S. Stoddart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vol. 246, Oxford, 1985), pp. 290,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xiii.
23. Cowdrey, 'Mahdia campaign', p. 28, verse 68; also p. 21.
  24. G. Berti, P. Torre et al., *Arte islamica in Italia: i bacini delle chiese pisane*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Rome; Pisa, 1983).
  25. Abulafia, 'Pisan bacini', p. 289.
  26. *Ibid.*, pp. 290-91; J. Pryor and S. Bellabarba, 'The medieval Muslim ships of the Pisan bacini', *Mariner's Mirror*, vol. 76 (1990), pp. 99-113; G. Berti, J. Pastor Quijada and G. Rosselló Bordoy, *Naves andalusies en cerámicas mallorquinas* (Palma de Mallorca, 1993).
  27.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 306.
  28. Pastor Quijada in *Naves andalusies en cerámicas mallorquinas*, pp. 24-5.
  29. Goitein,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1, pp. 305-6.
  30. D. Abulafia, '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Roger II and his successor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7 (1981), p. 12; repr. in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31. Anna Komnene, *Alexiad*, 3:12.
  32. *Ibid.*, 4:1-5:1.
  33. R.-J. Lilie, *Handel und Politik zwischen dem byzantinischen Reich und den italienischen Kommunen Venedig, Pisa und Genua in der Epoche der Komnenen und der Angeloi (1081-1204)*, (Amsterdam, 1984), pp. 9-16;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54-5; Abulafia, 'Italiani fuori d'Italia', pp. 268-9.
  34. J. Holo, *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 2009), pp. 183-6.
  35. Abulafia, 'Italiani fuori d'Italia', p. 270.
  36. D. Howard, *Venice and the East: 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 CT, 2000), pp. 65-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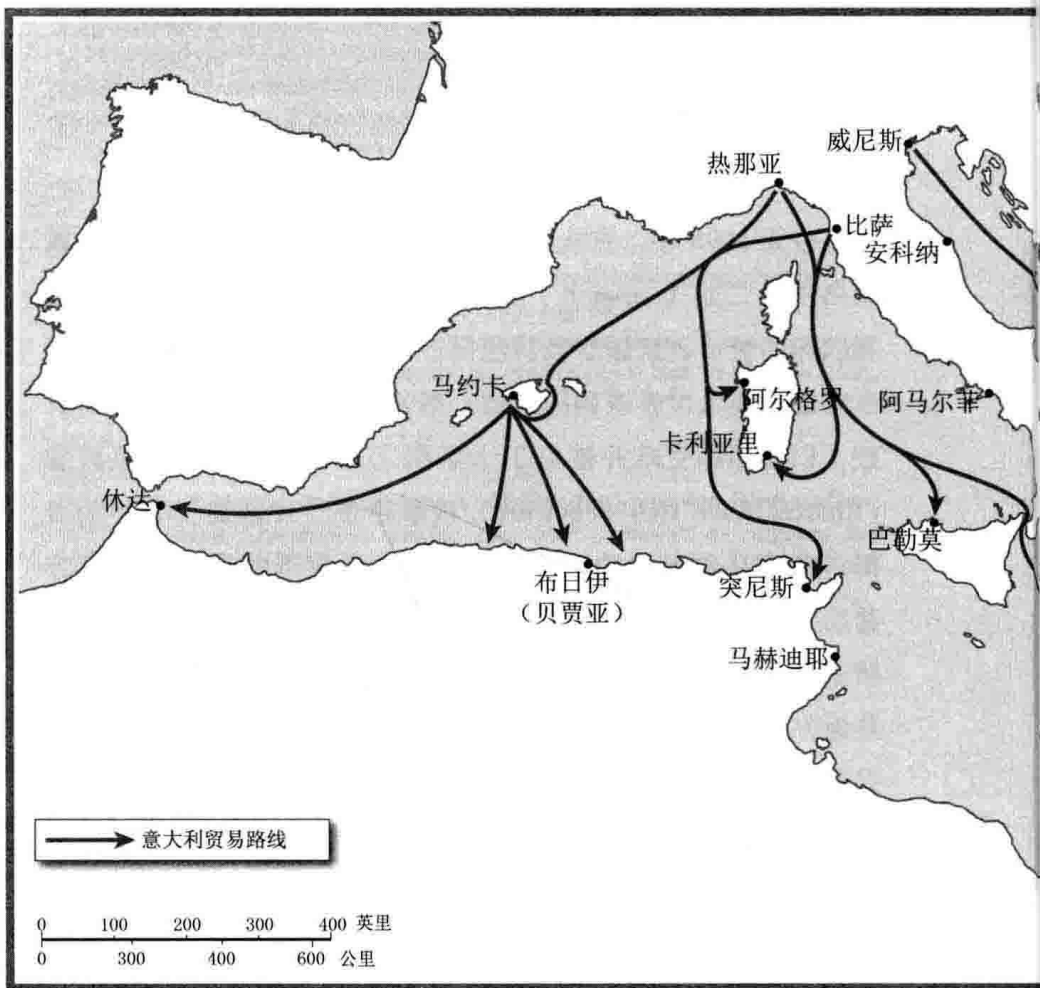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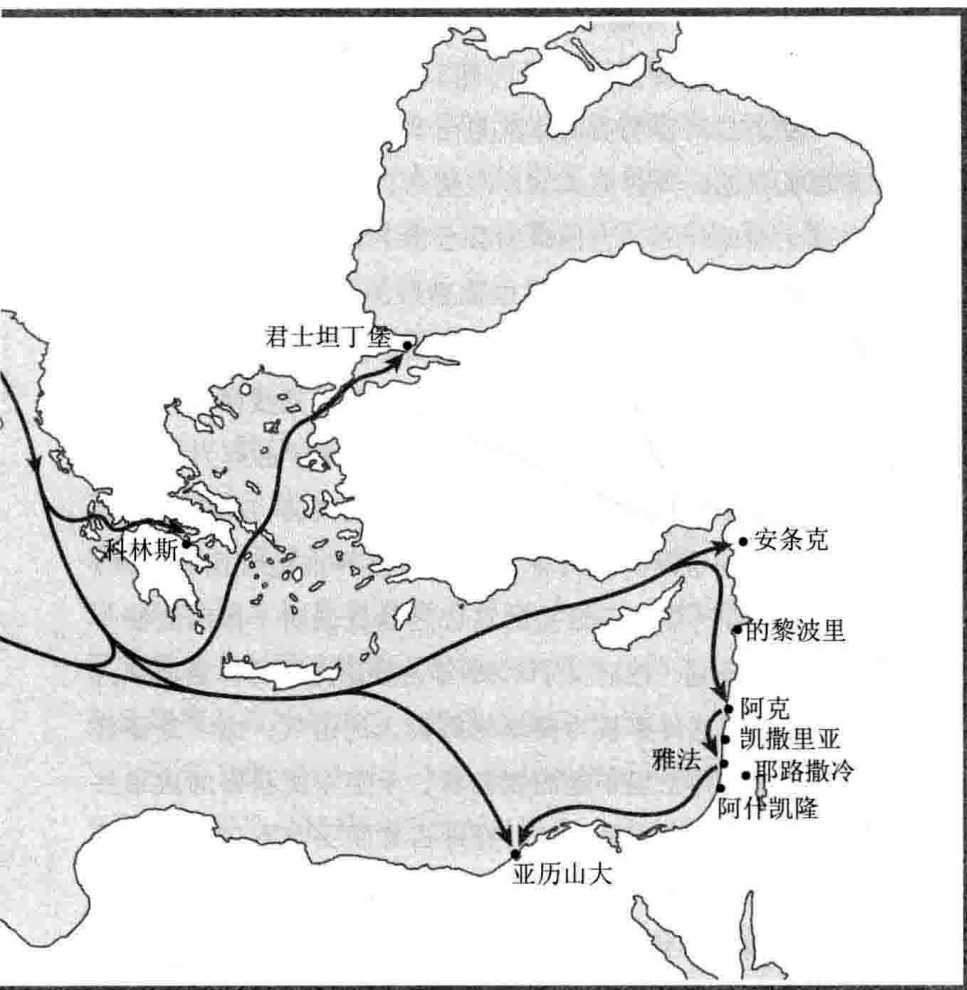
## 四 “上帝惠赐的利润” (1100 ~ 1200 年)

### 1

公元 1095 年，在法兰西中部的克莱蒙的一次布道中，教宗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发起了一个运动，它将改变地中海和欧洲的政治、宗教、经济版图。他的布道主题包括基督徒在东方的伊斯兰世界遭到的压迫、基督徒军队与突厥人战斗的失败，以及耶稣受难并被钉于十字架之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被掌控在“异教徒”手中的丑闻。<sup>1</sup> 教宗乌尔班意欲动员、召集法兰西南部的志愿者去东方帮助拜占庭对付突厥人，但其演说被理解为号召基督教世界的骑士们停止彼此之间的内部争斗（这件事使他们的灵魂面临危险），转而将他们的精力用来对付异教徒，组织一次神圣的武装朝圣运动，怀着那些死于此次伟大征程的人将获得永恒救赎的信念。这是一个取代其他教会要求的救赎行为的机会，这是最适合骑士阶级的机会，应投身战争，但这次的效力对象是上帝。参加十字军战争的人此前的所有罪愆将因而获得救赎这一概念是逐渐成为正式信条的。但是民众对于教宗所宣传的为基督而战这一理念的理解，领先于教法制定者们更为谨慎的定义。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行军路线绕开了地中海，而是从陆上经过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十字军由于战事、





疫病和疲劳过度而大大减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到达叙利亚之前从未见过除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外的其他海域。<sup>2</sup>甚至在东方，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一座滨海城市，而是耶路撒冷，因此公元 1099 年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创造了一片远离大海的飞地，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只有意大利的海军能够解决。另一支来自阿普利亚的军队是由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儿子波希蒙德征集的。拜占庭人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要接手他父亲征服拜占庭土地的计划，当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他被迫承认了拜占庭皇帝的权威，称自己是这位皇帝的臣属 (*lizios*)。这是西方封建制的用语，在这里被如此使用，是因为波希蒙德更乐于根据自己家乡的传统向皇帝宣誓效忠，而不是按照拜占庭的法律做出承诺。1098 年，他占领了近期才被拜占庭人丢失并  
289 落入突厥人之手的城市安条克，成为安条克大公，此后拜占庭宫廷便使出各种手段，坚持称他的公国是拜占庭帝国的属国。令人惊诧的是，一群装备极差的乌合之众竟证明了他们能够于 1098 年占领安条克，然后又于 1099 年占领耶路撒冷，然而拜占庭人更倾向于把这件事视为典型的野蛮人的运气，而不是基督策划的胜利。从君士坦丁堡的视角看，十字军所获得的成果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西方骑士已经在拜占庭领土与塞尔柱突厥人和法蒂玛哈里发发生争议的土地之间的敏感地带站住了脚。

波希蒙德加入十字军的宗教动机并不应该被低估，但是他是  
290 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十字军不进入地中海，如果没有一支能够在西方打开补给线的基督徒舰队的支持，他们将一无所获。因此，他需要与意大利海上势力建立联系。格勒诺布尔 (Grenoble) 和奥朗日 (Orange) 主教传达的教宗乌尔班讲演在热那亚和比萨激发了宗教热情，他可以以此为倚

仗。热那亚市民决定结束他们的内部争端和嫌隙，在一个由六位执政官领导的自治会议下团结起来；成立这个自治会议的最主要目标是为十字军建立一支武装船队。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主张，热那亚人把参加十字军东征看成一次商业机遇，他们希望在十字军征服的任何土地上获得贸易特权，这种权利应与威尼斯人最近在拜占庭获得的商业利益相匹敌。然而热那亚人并不能预见到十字军的结局。他们愿意搁置自己的贸易活动，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建设那些之后很有可能在战争和风暴中损失殆尽的船队。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是对圣战的热情。据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热那亚编年史学家卡法罗（Caffaro）记载，早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公元 1083 年，一艘被命名为波美拉（Pomella）的热那亚船就曾载着佛兰德伯爵罗伯特和耶路撒冷的第一位拉丁统治者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去往亚历山大，从亚历山大出发，他们历经艰难，拜谒了圣墓教堂，并梦想为基督教世界收复它。<sup>3</sup> 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它表达了热那亚精英人士的一种理念，即他们的城市注定要在征服耶路撒冷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公元 1097 年 7 月，十二艘大帆船和一艘稍小的船从热那亚出发。船员包括约一千二百名男丁，这在该城的男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为热那亚全城只有一万人。<sup>4</sup> 无论如何，这支船队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十字军的所在地，在叙利亚北岸和十字军取得了联系。安条克仍然处于包围之中，热那亚船队就停泊在圣西梅恩港（St Symeon）之外，该港口是安条克城的出海口，自青铜时代以来它就是通向地中海的通道。<sup>5</sup> 1098 年 6 月夺得安条克之后，波希蒙德回报了热那亚人，在安条克给他们修了一座教堂，附近有三十间房屋、一间货栈和一口井，它

们基本构成了一处商业殖民地。<sup>6</sup>这是热那亚人从即将由十字军人创建的国家中取得的第一宗特惠许可。在1099年夏天，颇有威望的热那亚埃姆布里亚科（Embriachi）家族派遣搭载族人的船只在雅法海域停泊，为十字军人围击耶路撒冷施援——他们用从自己船只拆下的木料为耶路撒冷制作攻城器械。然后在1100年8月，二十六艘大船和四艘补给船从热那亚出发，载运了大约三千名男丁。<sup>7</sup>他们与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北法兰西统治者鲍德温一世（Baldwin I）取得联系，开始缓慢地征服沿海地区，因为沿海地区是维系西欧和这个新建王国间补给线的战略要地。他们于1101年5月洗劫了古代海滨城市凯撒里亚。<sup>8</sup>热那亚人的首领在分配掠夺物时分给了每个船员两磅胡椒，这表明即使在一个如此之小的黎凡特港口，香料的存储也十分充足。他们还拿走了曾经悬挂在凯撒里亚大清真寺上的绿色大陶盘，人们相信这个大盘曾在最后的晚餐中被使用，它由珐琅制作（这是一个在几个世纪之后才纠正的错误，当时某人把它摔到地上，发现它是用玻璃制作的）。由于几乎可以肯定这个盘子是1世纪的罗马手艺人制作的精品，他们对于此陶盘来源的直觉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盘子在凯旋仪式中被迎进了热那亚大教堂，现在还在那里展示，以“圣杯”（Holy Grail）候选者之一的身份吸引着人们的关注。<sup>10</sup>

这只绿色的陶盘对于热那亚人来说是可以与他们的任何商业特权相媲美的回报，所有优惠权都被列入城市年鉴并作为神赐的信号被加以庆祝。热那亚人与每一个需要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获得海港控制权的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安条克）的统治者交好。公元1104年，由于夺取了具有良港和进入内陆地区的便捷通道的海港城市阿克，热那亚人的财富

进一步增加。在之后两个世纪的多数时间内，阿克成为意大利商人在圣地的主要贸易基地。热那亚人撰写了文件，以说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曾经允诺，在热那亚人帮助下征伐的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海岸的土地中，有三分之一归热那亚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即使这些文件并不真实，它们也仍然是可证明热那亚人勃勃野心的证据。<sup>11</sup>他们甚至被许诺将获得三分之一的“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当时的欧洲对开罗的称呼），因为他们也一直策划侵入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在以上所有地方，热那亚人还获得了法律上的豁免权，其范围自犯罪法扩展到财产法，使热那亚人摆脱了国王法庭的日常司法程序。<sup>12</sup>热那亚人坚持称他们被允许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内竖起一块刻有镀金文字的石碑以记录他们的特权。且不论这份铭文是否已经准备到位，对于这种公开记录的需求表明了热那亚人是如何执着于维系他们在从未建立过重要海军力量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域外特权。<sup>13</sup>

292

## 2

热那亚人也有竞争者。比萨人也热衷于加入十字军，于公元1099年派出了由其大主教戴姆伯特（Daimbert）率领的舰队。他们于1099年帮助十字军攻打雅法，得到的回报是在当地建立贸易基地的权利。<sup>14</sup>在三个曾支援十字军运动的意大利城市中，动作最慢的是威尼斯。威尼斯人意识到拜占庭皇帝并不喜欢看到大批饥饿且装备极差的西方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他们也不愿意使在法蒂玛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经商的威尼斯商人陷入麻烦。然而，他们看到了十字军给热那亚人带来的巨大利益，最终派出了两百艘船驶往东方。他们的第一站就是

小亚细亚南部的衰败小镇米拉，在这里，他们挖到了圣尼古拉（St Nicholas）的骸骨，他是为海员提供庇护的圣徒。令威尼斯人嫉妒的是，在 1087 年，一群自巴里出发的海员成功地从米拉偷走了圣尼古拉的骸骨，为了保护这些骸骨，他们用白色石块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大教堂。从此以后，作为圣地朝拜之旅起点的巴里本身也成了一处重要的朝圣地。威尼斯人发现在威尼斯统治下的海滨有足够的遗骸，他们可在其周围修筑圣尼可洛（San Niccolò）教堂。<sup>15</sup>在米拉发生的事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回到了十字军运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十字军攻击海法，它于 1100 年的陷落带来了对城内穆斯林和犹太人口的大屠杀。<sup>16</sup>十字军因此控制了自迦密山（Mount Carmel）到阿克之间的弧形海湾地带。到 1100 年，巴勒斯坦的大部分海岸皆被掌控在十字军手中，但阿什凯隆（Ascalon）直到 1153 年还在埃及人的占领下。埃及人驻阿什凯隆的治理者事实上是服从于意大利人的利益的，因为只要敌人的军事力量在圣地沿岸驻扎，他们就需要意大利人的海军船队，意大利人因此可以期望从耶路撒冷国王手中获得更好的特权。

293

意大利人可以向他们自己贺喜。贸易活动显然活跃在和平时期，但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有许多极好的贸易机会：获取战利品或者奴隶、提供武器（通常是向双方提供）、对敌方船只发动海盗式袭击等。但是，要在支持耶路撒冷的拉丁诸王和维系同其他客户的联系及承诺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埃及和拜占庭）。拜占庭人开始怀疑自己给了威尼斯人太多的东西。公元 1111 年，比萨人得到了有限的商业特权；然后在 1118 年，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儿子和继任者约翰二世拒绝重申拜占庭于 1082 年赐给威尼斯人特权的黄金诏书中



的条款。于是，当威尼斯人向其他方面寻求商业利益时，他可能不应该感到惊诧；威尼斯人对十字军产生了极强热情，他们响应了向十字军提供海上支援的请求，派出了一大支船队前往圣地。1123年，他们在阿什凯隆港外将法蒂玛王朝的多数船只击溃，使它们沉入海底。<sup>18</sup>威尼斯人因此得以封锁推罗，该城仍然掌控在穆斯林手中，但在第二年被攻克。在这里，威尼斯人确立了极高的特权地位，不仅占有了该城的三分之一，而且控制了城外的田庄，且在今后任何一处威尼斯人协助攻克的城镇，他们都将有权掌控一座教堂、一个广场、一个烤炉和一条街道。他们被免除了所有的贸易关税；承诺书上写着：“在每一处国王或男爵的土地上，每一个威尼斯人都将像在威尼斯一样完全自由。”<sup>19</sup>推罗成为他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的主要据点，但这并不能阻止法蒂玛王朝船队的偶尔入侵。然而埃及海军发现，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可为其提供给养的基地了。有一次，一些埃及海员试图登陆获取一些淡水，但被拉丁王国的弓箭手击退。<sup>20</sup>法蒂玛王朝失去了进入黎巴嫩森林的入口，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黎凡特的重要造船业基地。尽管阿什凯隆的海战并不标志法蒂玛海军的全军覆没，但它是一个转折点：穆斯林的船只已经无法动摇基督教船队的优势地位。东地中海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已经落入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手。参与早期的十字军活动带给这些城市的不仅是在圣地诸城内的立足点，还有在整个地中海上的航行主导权。

最后，甚至拜占庭皇帝也认识到，他不能阻止威尼斯人的行为。他极不情愿地在公元1126年颁布了给予威尼斯人的特权诏书。<sup>21</sup>威尼斯人的出现刺激了拜占庭的经济。<sup>22</sup>尽管威尼

斯人并不向拜占庭帝国的财库纳税，但与他们进行交易的拜占庭臣民要交税，而且从长远来看，由商业税收构成的收入在增长而不是下降。但是，皇帝们总是关注直接的收入而无法看得更远。无须纳税的特权集团的存在引起了人们的敌视。<sup>23</sup>1140年，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一世（Manuel I Komnenos）开始重新打击威尼斯人，但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注意到，那些意大利人蜂拥进入君士坦丁堡，有些人成为城市的外籍居民，融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生活（他们被称为 *bourgesioi*）；另一些人则惹是生非，他们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皇帝在金角湾内建立了一块封闭的区域，从德意志和法兰克商人手中夺取了土地，建立了威尼斯人的居住区，以便更轻松地控制威尼斯商人。

### 3

北意大利的兴起导致其他曾经在地中海世界成功经商的商人群体的势力——阿马尔菲人和经冢犹太人——在11世纪衰退。阿马尔菲人在拜占庭宫廷失宠，那些定居于君士坦丁堡的阿马尔菲市民甚至得向威尼斯人纳税。对于此，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阿马尔菲不能像威尼斯人那样，提供一支大规模的、能够打败罗伯特·吉斯卡尔海军的船队。尽管阿马尔菲能够在公元1131年之前一直在诺曼人统治下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但它的地位在拜占庭人眼中大打折扣，因为它的城址太接近诺曼征服者建立于南意大利的要塞——萨勒诺距离此地只有很短的航程。<sup>24</sup>但是，阿马尔菲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1127年，阿马尔菲和比萨达成了友好协议。但在1135年，比萨人参与了日耳曼人对新建立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诺曼王国的一次入侵。西西里的罗杰允许阿马尔菲人的船只离港，并攻击了他可以发现的

任何敌船——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新臣民幻想发现迷路的比萨人载满昂贵商品的船只。在阿马尔菲人离开后，比萨海军进入了阿马尔菲港，蹂躏了这座城市，带走了大量战利品；他们于 1137 年再一次劫掠了阿马尔菲。<sup>25</sup>阿马尔菲的海上贸易范围缩减至包括巴勒莫、墨西拿和撒丁岛在内的第勒尼安海水域，且它在南意大利的陆路贸易发展得相当不错，于是许多内陆城市如贝内文托（Benevento）逐渐成为阿马尔菲人的小贸易中心。<sup>26</sup>到 1400 年，阿马尔菲已经成为一些并不引人激动的基础性商品，如葡萄酒、油、猪油、羊毛和亚麻织品的重要来源地，同时它也因生产优质纸张而闻名。<sup>27</sup>在这些变化之下的是一种显著的延续性。阿马尔菲人一直知道，海洋并不是他们的唯一生计来源。他们一直在索伦托（Sorrento）半岛的陡峭山坡上种植葡萄，并不只把自己视为职业商人。<sup>28</sup>

295

公元 12 世纪地中海上的多方变化使阿马尔菲被边缘化；它距离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新兴商业中心太过遥远。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可以轻松进入法兰西和德意志，更不用说伦巴第平原了，也能与遥远的佛兰德的大规模纺织中心建立联系，于是向埃及收购者卖出优质的佛兰德呢绒成为热那亚人的常规利润来源。阿马尔菲代表着小商小贩贸易的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少量商人从伊斯兰和拜占庭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的中心带来数量有限的奢侈品，卖给西欧的少数富裕君主和教职人士。自此以后，阿马尔菲、拉韦洛及其邻近城镇的精英阶层利用先人们代代相传的记账及会计知识，在西西里王国的行政体系中效力，为其服务，有些人的生涯极其成功。这类精英并没有失去其对东方风格的向往。拉韦洛的鲁菲洛（Rufolo）家族在 13 世纪借鉴伊斯兰风格，建成了一座宫

殿，以及阿马尔菲主教堂，即著名的“天堂修道院”（Cloister of Paradise），它们同时拥有伊斯兰和拜占庭的元素。<sup>29</sup>借鉴东方风格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开放姿态。如同在威尼斯一样，异国情调表现的是富裕、尊贵和家族的自豪感，同时唤起对阿马尔菲（和威尼斯一起）作为东西方主要沟通桥梁的时代的记忆。

296 另一群商人和旅行者也在同一时期走向衰落，他们是经冢犹太商人。大约于公元1150年，寄向开罗经冢犹太人的商务邮件开始减少；<sup>30</sup>1200年之后，与埃及无关的事件大多从信件中消失了。这个自安达卢斯延伸到也门和印度的庞大伊斯兰世界，现在局限在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阿尔莫哈德派（Almohad）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兴起是一种政治上的灾祸，该派对于犹太人极不宽容；在来自阿尔莫哈德王朝西部的犹太难民中，有哲学家兼医生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sup>31</sup>但经冢犹太商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意大利人的兴起。威尼斯和热那亚不鼓励犹太人在其境内定居。据一位西班牙犹太旅人的记载，在1160年前后，整个热那亚城只有两名犹太人，他们是从摩洛哥的休达移居而来的。<sup>32</sup>随着意大利人对整个地中海交通的控制力增强，以及随着穆斯林商船比过去更多暴露于基督徒的攻击之下，传统的海上商路对于经冢犹太人越来越不具有吸引力。而且，随着意大利海军力量的增长，拜占庭与埃及之间的海路，即经冢犹太商人以往的经商之路，也落入了意大利船主之手，他们同时受益于拜占庭皇帝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赐予他们的特权。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使犹太商人失去影响力。公元12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个穆斯林商人集团，即卡利米斯（Karimis），它控

制了自红海到也门和印度的商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犹太人曾经在这条商路沿线十分活跃。这条商路向地中海供应商品：东方的调味品和香精被运至埃及红海海岸上的阿伊扎布（Aydhab），再经陆路转运开罗，然后由水路溯尼罗河而上至亚历山大城。由于一位标新立异的十字军领主雷纳德·德沙蒂永（Reynaud de Chatillon）在12世纪80年代派遣船队去红海水域的尝试（目的是入侵麦地那和麦加），红海开始对非穆斯林旅行者封闭。卡利米斯继续主宰这一水域的贸易，直到15世纪早期。<sup>33</sup>以埃及统治者作为媒介，意大利人与卡利米斯建立商业合作关系，保障了胡椒和其他香料流入地中海的正规渠道。从西班牙南部到印度的贸易网络现在分离成两部分：地中海方面是基督徒，印度洋方面是穆斯林。

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和其继承者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Ayyubids，该族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库尔德人（Kurdish）军事首领萨拉丁）对于他们自己能够从贸易资源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有兴趣。这并不是出于一种商业精神，而是因为他们发现香料贸易是他们支付战争费用的资金来源。在公元1191～1192年的十二个月中，他们通过所谓的“五一税”（*khums*）从沿尼罗河各港口经商的基督商人手中征集了28613金第纳尔（gold dinars）。这意味着即使在一个如此困难的时期——此时萨拉丁攻克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正在进行，意大利城市与南法兰西及加泰罗尼亚诸城镇正在向圣地派出舰队——通过这些港口运出的商品价值也超过了十万第纳尔。<sup>34</sup>尽管这种商业税的名目为“五一税”，但事实上对一些香料，如香菜、孜然和胡荽征收的税额高于这个比例，因为埃及当局非常清楚西欧是多么渴望获得这些产品。在12世纪晚期，阿拉伯

海关税收官员阿尔 - 马克组米 (al-Makhzumi) 编纂了一本征税手册, 其中列举了经过埃及港口的商品。他提到的商品范围比经豕犹太人信件中提到的更大。达米埃塔 (Damietta) 出口鸡肉、粮食和明矾, 明矾在埃及是由当局垄断的。埃及的纺织品生产者对明矾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他们使用这种暗灰色的粉末作为给织物染色时的稳定剂和清洁剂。<sup>35</sup> 埃及也是以下商品的产地: 亚麻, 当局对亚麻征收了重税; 翡翠, 当局对翡翠贸易的管控越来越多; 黄金, 这类商品是从法老的坟墓中盗取的; 还有价值极高药物, 西方人称之为木乃伊粉, 即由木乃伊压成的粉末; 尼罗河三角洲的港口进口木材, 木材在埃及是十分珍稀的商品; 亚历山大城进口铁、珊瑚、油和番红花, 它们都由意大利商人贩运到东方。<sup>36</sup> 其中一些商品可以被分类为战时物资, 而教廷则越来越担心北意大利商船在为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担任或者假意担任主要海上防护者的同时向穆斯林运送武器。阿拉伯人用 *janawiyah* 即“热那亚”来指代一种盾牌, 显示至少这种盾牌中的一些是从意大利非法地运出的。<sup>37</sup>

偶尔会出现紧张局面, 意大利商人会被逮捕, 但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不可能冒财政收入减少的风险。有一次, 比萨海员在一艘比萨人的船上攻击了穆斯林乘客, 他们杀死了男性, 使女人和孩子成为奴隶, 同时偷走了所有商品。为了报  
298 仇, 埃及当局囚禁了那些驻留埃及的比萨商人。此后不久, 于公元 1154 ~ 1155 年, 比萨人派出使者去法蒂玛埃及谈判。双方关系得以修复, 都做出了善待商旅的承诺。<sup>38</sup> 更看重埃及而非圣地的不只比萨人。令人毫不奇怪的是, 在保留至今的 1171 年以前威尼斯人签订的将近四百份贸易合同中, 过半数涉及对君士坦丁堡的贸易; 但有七十一份涉及埃及, 这比同拉

丁王国的贸易份额大得多。<sup>39</sup> 这些只是从大量文件中偶然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文件都遗失了，但它们说明了东方的诱惑是多么的强烈。

当意大利商人前往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阿克或巴勒莫的道路因与当地统治者间的争端而受到阻碍时，西北非在吸引着他们。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进入马格里布港（Maghrib）获取皮革、羊毛、精细陶器，并从摩洛哥进口大量粮食。黄金的供应尤其重要，它是以沙金的形式由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驼队运抵马格里布的城镇的。<sup>40</sup> 公元 12 世纪中期，这些土地落入了属于极端派的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治下。阿尔莫哈德派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柏柏尔哈里发，被逊尼派 [如大量被他们取而代之的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s）] 视为异端。该派的典型特征是试图回归最为纯粹的伊斯兰教，其基本原则是神的绝对唯一性——使用神的属性如仁慈为其命名，也是对神之真实存在的误解。西班牙和北非的阿尔莫哈德哈里发尽管对于他们治下属于少数群体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怀有敌意，却欢迎外来的商人，认为这些外来商人是财富的源泉。1161 年，热那亚人派出一个使团拜谒摩洛哥的阿尔莫哈德哈里发，获得了十五年的和平协议，热那亚人也确定了他们能带着货物不受任何阻拦与干扰地在阿尔莫哈德人的土地上旅行经商。据相关记载，1182 年，与休达的贸易占热那亚人贸易总量的 29%，略领先于诺曼人的西西里岛；如果把布日伊（Bougie）和突尼斯包括进来，热那亚人在北非的贸易份额可达 37%。<sup>41</sup>

热那亚人在突尼斯、布日伊、马赫迪耶及北非海岸的其他城市获得了他们的商栈（fonduk），即一个仓库和附带着生活区的商业总部。突尼斯的另一一些商栈建筑是公元 17 世纪的建

筑，属于意大利、德意志、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商人。<sup>42</sup>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商栈可扩大为一整块商业区域。热那亚公  
299 证员皮耶特罗·巴蒂弗吉利奥（Pietro Battifoglio）在1289年的记录中描述了突尼斯的一个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热那亚社群，其成员包括商人、士兵、教士和失足女性，他们对自己经营的旅店中满是葡萄酒桶感到自豪，甚至阿尔莫哈德统治者也很乐于向他们征税。

#### 4

基于对贸易合同的研究，一些成功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生活及职业生涯就可以被重新构建起来。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站着大的贵族家族，如热那亚的德拉·沃尔塔家族（della Volta）的成员经常占据执政官之位，执政官负责决定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与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拜占庭、西班牙的穆斯林以及其他外部势力是战是和皆由他决定。由于这些家族也是海外贸易活动的投资者，他们在经营上具有极大优势，能够通过政治和约的谈判获得他们热衷于攫取的商业利润。<sup>43</sup>热那亚的大家族结成了密切的血亲同盟，这种同盟的共同利益高于个人的直接利益。<sup>44</sup>当敌对的血亲同盟试图掌握执政官和其他官职时，热那亚人所付出的代价是尖锐的派系冲突。威尼斯贵族走的是另一个极端，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接受总督的权威，一般能够控制这种冲突；控制高层官员以及同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等地开展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的，同样是大的家族集团，如齐亚尼（Ziani）、蒂耶波洛（Tiepolo）、丹多罗（Dandolo）。他们的成功对一个由众多成功商人组成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的财富构成了连锁反应。区分贵族之家和平民商人的不只是血



统；贵族可以依靠的财富更具多样性，因此即使在战争时期贸易活动衰退了，他们仍然能够从城市和乡村的产业中或者通过田赋获得收入。他们的地位比一般商人更稳固，有更强的后继力量。因此，商业革命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精英阶层的富裕程度，强化而不是削弱了他们在 12 世纪意大利的主要滨海城市中的统治地位。

文献对两位“新富”有较好的记载。威尼斯的罗曼诺·麦拉诺 (Romano Mairano) 在公元 12 世纪 40 年代在希腊从事小规模贸易探险活动，主要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殖民地出发。<sup>45</sup> 后来他转向了更富野心的目的地，包括亚历山大和圣地。他的生涯说明了威尼斯人是如何控制自拜占庭到伊斯兰世界的海上商路的。威尼斯人也安心于从事拜占庭内部的贸易，维持着君士坦丁堡同较小的希腊城市之间的联系。<sup>46</sup> 到 1158 年，罗曼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向圣地的圣殿骑士团供应了五万磅铁。他不只是一个商人，还成了一位著名的船主。当拜占庭皇帝转而对付威尼斯人时，他似乎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怀疑威尼斯人对于自己的敌手西西里国王表示了同情，而且在各种情形下，威尼斯人在拜占庭经济中占据的（或者是在他们的想象中所占据的）强势地位都引起了希腊人对他们越来越强的敌意。认识到这种趋势的麦拉诺开始于 12 世纪 60 年代在威尼斯创立他的事业。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再次结婚，发现由于妻子的丰厚嫁妆他变得更为富有。他与之后将成为威尼斯总督的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 (Sebastiano Ziani) 共事时，修建了威尼斯商船船队中最大的“透图斯·蒙都斯号” (*Totus Mundus*)，它的另一个 (希腊语) 名称是“克斯莫斯号” (*Kosmos*)，他亲自将这艘船驶往君士

坦丁堡。威尼斯人与拜占庭皇帝的关系似乎得到了改善，曼努埃尔一世甚至颁布了诏书，宣称他将把任何一个敢于烦扰威尼斯人的家伙送上绞刑架。但是他的目标是营造一种错误的安全感。1171年3月，皇帝对威尼斯人发起了一次类似于“水晶之夜”的暴力行动，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上万的威尼斯人在自己的生活区内被逮捕，数千人被杀害，其财产被没收。那些能够逃到码头的人登上了在此随时可起航的“克斯莫斯号”，被浸了醋的兽皮掩盖着这艘船，保护它不受火箭和投石机的攻击。“克斯莫斯号”成功抵达了阿克，向当地通知了这次灾难的消息，但罗曼诺·麦拉诺已经失去了他的所有财产，并因建造这艘大船而负债累累。两年之后，他的这艘船再度出现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海域，该城已经向曼努埃尔·科穆宁宣誓效忠，正处于曼努埃尔的敌手、德意志皇帝腓烈特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又称巴巴罗萨）的围攻下。威尼斯人现在更倾向于帮助巴巴罗萨而不是曼努埃尔（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且意识到安科纳已经成为自己在亚得里亚海水域的一个商业竞争对手。尽管安科纳顶得住德意志人的进攻，但出于义务威尼斯人仍是帮助了处于危难之中的这座城市。<sup>47</sup>

301

当时麦拉诺已经差不多五十岁了，他必须从零开始重建事业。为此他只能再次求助于贵族阶层的齐亚尼家族；已故总督之子皮耶特罗对麦拉诺一次驶向亚历山大的航行投入了一千磅威尼斯钱币。麦拉诺带着一大船木材，并不在乎教宗有关禁止出售战时物资的警告。在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如此恶劣的时代，麦拉诺派船前往北非、埃及和耶路撒冷王国从事胡椒和明矾的买卖。当新登基的皇帝于公元1187~1189年重新赐予威尼斯人相当优惠的待遇时，麦拉诺已经做好了回到君士

坦丁堡的准备。即使已经上了年纪，他仍然投资对埃及和阿普利亚的贸易，但在1201年他再次陷于资金短缺的境地，遂向堂弟借钱；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sup>48</sup>这就是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经历了成功时期的辉煌和灾难时代的衰落，并曾在中年时期戏剧性地从灾祸中逃生。

另一个遭际坎坷的人是萨勒诺的所罗门（Solomon of Salerno）。尽管来自南意大利，但他以热那亚为基地开始经商，就像麦拉诺那样，他与热那亚的贵族走得很近。<sup>49</sup>他也与西西里国王有私人来往，据说他是西西里国王的忠实臣仆。当他在热那亚城外买下一些土地时，他表示自己愿意成为热那亚人，他试图用自己的女儿和热那亚的贵族家族之一联姻；他背弃了萨勒诺。他承认，萨勒诺、阿马尔菲和其邻近的城镇都被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等进取心更强的贸易城市超越了，且他是在热那亚获得财富的。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埃莉阿德（Eliadar）离开萨勒诺，她也是一个积极的商人，在热那亚女人可不受阻拦地进行商业投资。所罗门和埃莉阿德是一对令人畏惧的夫妇，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整个地中海。和罗曼诺·麦拉诺一样，所罗门愿意远行到地中海最遥远的角落去寻求财富。公元1156年，在埃及、西西里岛和西方，黄金般的机会在召唤他们。在当年的夏季，他决定利用更为开放的法蒂玛王朝提供的机会。他答应代表一批投资者前往亚历山大，然后沿尼罗河下行至开罗，他将在开罗购买东方香料，包括可用于印染业的胶质材料虫胶，以及红色染料的原料苏木。其他方位也有能够吸引所罗门的巨额利益。同年，他试图从一个携款潜逃至西西里岛的热那亚人那里换回二又三分之二磅的西西里金币，这在当时价值不菲，而当时热那亚外交使节正因此事与西西里国王谈判。<sup>50</sup>他

在东方经营了近两年，把他的妻子埃莉阿德留在家里处理热那亚、弗雷瑞斯（Fréjus）和巴勒莫三地间的贸易事务。

在从东方返回热那亚之后，所罗门又转向西方，与马略卡岛、西班牙西西里岛和他的老朋友埃及来往，他在埃及的投资数额巨大。一份文件揭示了由他委派的一次环地中海航行，这在当时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中十分典型：“先去西班牙，然后是西西里岛或普罗旺斯或热那亚，从普罗旺斯到热那亚或西西里岛；或者如果他愿意，可以从西西里岛到罗马尼亚（拜占庭帝国），然后再去热那亚，或从西西里直接到热那亚。”<sup>51</sup>热那亚的大贵族们热情地投资所罗门远航埃及的事业，忽视了文件中表明船有可能在埃及被卖的条款。意大利人不仅把木材运给亚历山大的船厂，还直接把船只送到法蒂玛王朝供其舰队使用。所罗门到达了成功的顶峰。尽管他是一位外来人，他的女儿阿尔达（Alda）还是与马龙家族中一个权贵的儿子订婚了。所罗门有他自己的笔记，上面记载了他的商业活动，文献后来逐渐提到“所罗门的宫廷”，说明他生活得很奢侈。但和罗曼诺·麦拉诺一样，他的事业受制于他无法控制的政局变化。热那亚在公元1156年与西西里国王交好，但于1162年被迫放弃这一使其获得大量小麦和棉制品的极为有利的同盟关系；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扼住了热那亚人的咽喉，他们不得不加入腓特烈一世的军队直接进攻西西里。安萨尔多·马龙（Ansaldo Mallone）废除了他的儿子和所罗门的女儿的有利婚姻关系。所罗门和埃莉阿德的商业帝国似乎突然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与西西里保持一些联系仍然是可能的。公元1162年9月，在热那亚人因德意志人而放弃了西西里岛的几个月

后，所罗门接待了由一位声名卓著的西西里穆斯林派出的使者，这位穆斯林是伊本·哈穆德（ibn Hammud），是西西里穆斯林社群中的领袖人物。他不顾当时的禁令向所罗门提供了资金，抵押物是一件貂皮披风、一些银器和其他精美物品。一位西西里的阿拉伯著书者赞美伊本·哈穆德说：“他绝不肯让自己的钱生锈”。他非常富有：西西里国王借口他有不忠的行为，罚了他二百五十磅重的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sup>52</sup>这类交往使所罗门得以继续从事商贸活动，但对他这种人来说情况并不太妙。热那亚和耶路撒冷国王之间的争吵妨碍了对圣地的贸易；且由于热那亚与西西里国王的不和，进入东地中海也越来越难，因为西西里国王的船队控制着东西地中海之间的通行要道。就像其他热那亚商人那样，所罗门和他的妻子现在从东地中海转向西地中海，与现在属于阿尔及利亚的重要港口布日伊通商。所罗门应该是在 1170 年前后去世的。他想以联姻方式跻身热那亚贵族集团的野心因政治事件的发生受挫。除非他和他的继承人能够进入贵族集团，否则他的地位将无法得到巩固。他在热那亚城外购置的土地仅值一百零八磅热那亚银币，他的财富主要是以现金、贷款、投资与投机为基点，城市贵族的财富却是植根于城市和乡村的地产。城市贵族的财富给了他们永久的权力，而这正是萨勒诺的所罗门和罗曼诺·麦拉诺缺乏的东西。而且，正是由于商人和贵族的合作才有了当时发生的商业革命。

## 注 释

1. 早期计划请参见 H. E. J. Cowdrey, 'Pope Gregory VII's crusading plans', in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oshua Prawer*, ed. R. C. Smail, H. E. Mayer and B. Z. Kedar (Jerusalem, 1982), pp. 27-40, repr. in H. E. J. Cowdrey, *Popes, Monks and Crusaders* (London, 1984), essay x.
2. J. Prawer, *Histoire du royaume latin de Jérusalem*, 2 vols. (Paris, 1969), vol. 1, pp. 177-238.
3. S. A. Epstein, *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 (Chapel Hill, NC, 1996), pp. 28-9.
4. *Ibid.*, p. 29.
5. L. Woolley, *A Forgotten Kingdom* (Harmondsworth, 1953), pp. 190-91, plate 23.
6. M.-L. Favreau-Lilie, *Die Italiener im Heiligen Land vom ersten Kreuzzug bis zum Tode Heinrichs von Champagne (1098-1197)*, (Amsterdam, 1989), pp. 43-8.
7. Epstein, *Genoa*, p. 30.
8. Prawer, *Histoire*, vol. 1, pp. 254, 257.
9. Favreau-Lilie, *Italiener im Heiligen Land*, pp. 94-5.
10. R. Barber, *The Holy Grail: Imagination and Belief* (London, 2004), p. 168.
11. Favreau-Lilie, *Italiener im Heiligen Land*, pp. 88-9, 106.
12. Epstein, *Genoa*, p. 32.
13. D. Abulafia, 'Trade and crusade 1050-1250', in *Cultural Convergences in the Crusader Period*, ed. M. Goodich, S. Menache and S. Schein (New York, 1995), pp. 10-11; repr. in 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ncounters: Economic, Religious, Political, 1100-1550* (Aldershot, 2000); J.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pp. 122, 124.
14. Favreau-Lilie, *Italiener im Heiligen Land*, pp. 51-61; Prawer, *Histoire*, vol. 1, p. 258.
15. Abulafia, 'Trade and crusade', pp. 10-11.
16. Prawer, *Histoire*, vol. 1, pp. 258-9.
17. R. C. Smail, *The Crusader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1973), p. 17; R. C. Smail, *Crusading Warfare (1097-1193)*, (Cambridge, 1956), pp. 94-6.
18.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 115.
19. J. Prawer, *Crusader Institutions* (Oxford, 1980), pp. 221-6; J. Richard, *Le royaume latin de Jérusalem* (Paris, 1953), p. 218.

20.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p. 115–16.
21. R.-J. Lilie, *Handel und Politik zwischen dem byzantinischen Reich und den italienischen Kommunen Venedig, Pisa und Genua in der Epoche der Kommunen und der Angeloi (1081–1204)*, (Amsterdam, 1984), pp. 17–22.
22. J. Holo, *Byzantine Jewry in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Cambridge, 2009), pp. 183–6.
23. Abulafia, ‘Italiani fuori d’Italia’, pp. 207–10.
24. A. Citarella, *Il commercio di Amalfi nell’alto medioevo* (Salerno, 1977).
25. D. Abulafia, *The Two Italies: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 1977), pp. 59–61.
26. G. Imperato, *Amalfi e il suo commercio* (Salerno, 1980), pp. 179–235.
27. D. Abulafia, ‘Southern Italy, 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Aldershot, 1993), essay 1, pp. 10–14.
28. M. del Treppo and A. Leone, *Amalfi medioevale* (Naples, 1977).
29. J. Caskey, *Art and Patronage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Merchant Culture in the Region of Amalfi* (Cambridge, 2004).
30. S. D. Goi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 1,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CA, 1967), pp. 18–19.
31. D. Corcos, ‘The nature of the Almohad rulers’ treatment of the Jews’, *Journal of Medieval Iberian Studies*, vol. 2 (2010), pp. 259–85.
32. Benjamin of Tudela,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ed. M. N. Adler (London, 1907), p. 5; Abulafia, *Two Italies*, p. 238.
33. D. Abulafia, ‘Asia, 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2, *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 ed. M. M. Postan, E. Miller and C. Postan (2nd edn, Cambridge, 1987) pp. 437–43; cf. the misconceptions in Holo, *Byzantine Jewry*, p. 203.
34. H. Rabie,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Egypt, AH 564–741/AD 1169–1341* (London and Oxford, 1972), pp. 91–2.
35. Abulafia, ‘Asia, Africa and the trade of medieval Europe’, p. 436.
36. C. Cahen, *Makhzūmiyyāt: études s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Égypte médiévale* (Leiden, 1977).
37. C. Cahen, *Orient et occident au temps des croisades* (Paris, 1983), pp. 132–3, 176.
38. K.-H. Allmending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Kommune Pisa und Ägypten im hohen Mittelalter: eine rechts- und wirtschaft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 (Wiesbaden, 1967), pp. 45–54; Cahen, *Orient et occident*, p. 125.
39. Cahen, *Orient et occident*, p. 131.
40. L. de Mas Latrie, *Traité de paix et de commerce et documents diver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des Chrétiens avec les arab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au Moyen Âge* (Paris,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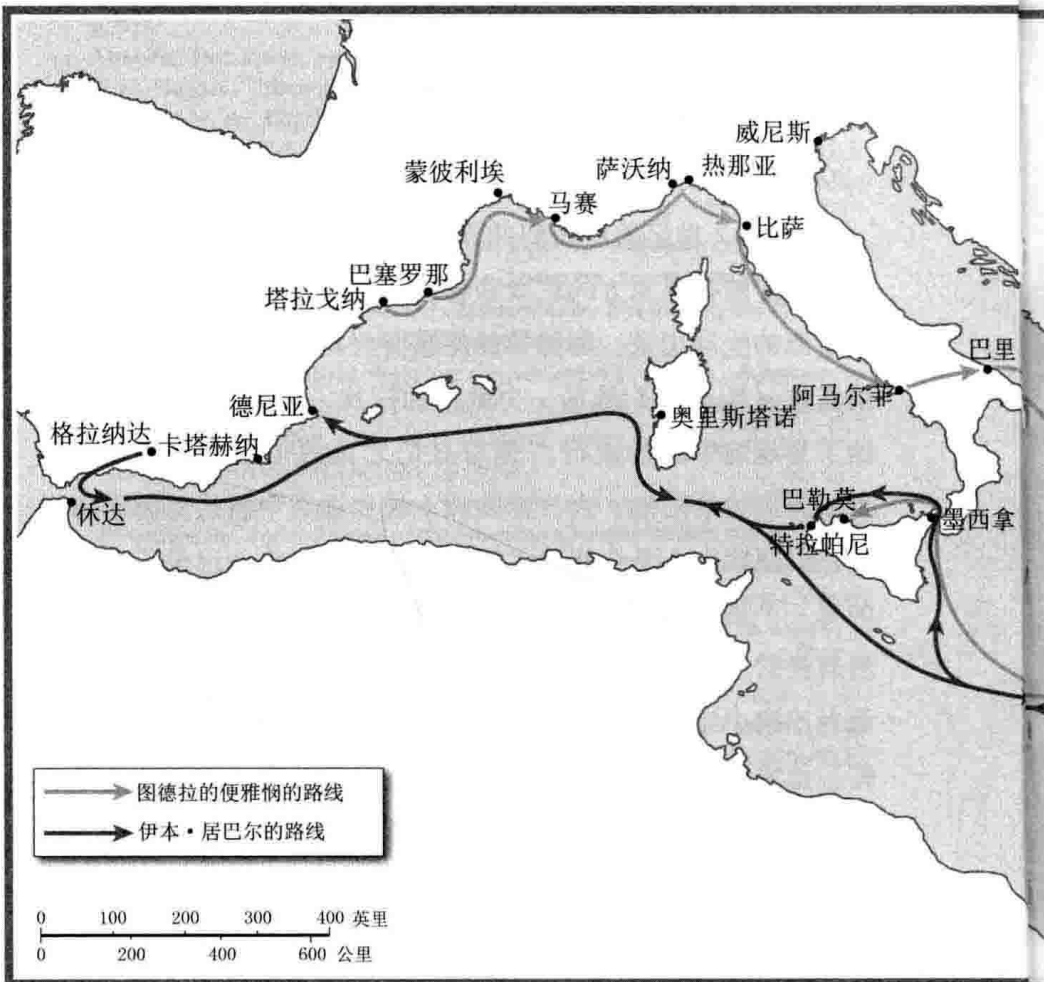
41. D. Abulafia, 'Christian merchants in the Almohad cities', *Journal of Medieval Iberian Studies*, vol. 2 (2010), pp. 251-7; Corcos, 'The nature of the Almohad rulers' treatment of the Jews', pp. 259-85.
42. O. R. Constable, *Housing the Stranger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odging, Trade, and Travel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2003), p. 278.
43.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50-51.
44. D. O. Hughes, 'Urban growth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medieval Genoa', *Past and Present*, no. 66 (1975), pp. 3-28.
45. R. Heynen, *Zur Entstehung des Kapitalismus in Venedig* (Stuttgart, 1905); J. and F. Gies, *Merchants and Moneymen: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1000-1500* (London, 1972), pp. 51-8.
46. D. Jacoby, 'Byzantine trade with Egypt from the mid-tenth century to the Fourth Crusade', *Thesaurismata*, vol. 30 (2000), pp. 25-77, repr. in D. Jacoby, *Commercial Exchange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Byzantium, the Crusader Levant, Egypt and Italy* (Aldershot, 2005), essay i.
47. D. Abulafia, 'Ancona, Byzantium and the Adriatic, 1155-1173',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52 (1984), p. 208,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ix.
48. Gies, *Merchants and Moneymen*, pp. 57-8.
49.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237-54, showing he was not a Jew; cf. E. H. Byrne, 'Easterners in Geno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8 (1918), pp. 176-87; and V. Slessarev, 'Die sogenannten Orientalen im mittelalterlichen Genua. Einwanderer aus Südfrankreich in der ligurischen Metropol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l. 51 (1964), pp. 22-65.
50.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102-3, 240.
51. *Ibid.*, p. 244.
52. Ibn Jubayr, *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 Broadhurst (London, 1952), pp. 358-9;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247-51 - in the Genoese documents he appears as 'Caitus Bulcassem'.



## 五 穿越地中海的方式 (1160 ~ 1185 年)

### 1

公元 12 世纪的船长们并没有留下日记或航海记录，但是自西班牙航行至东方的犹太和穆斯林朝圣者们留下了诸多穿越地中海的生动记录。图德拉的便雅悯（Benjamin of Tudela）是纳瓦拉（Navarre）地区一个城市的拉比，他在 1160 年前后开始了穿越地中海的航行。<sup>1</sup> 他写日记之目的是用希伯来文描述地中海周边的陆地、大片的欧洲土地和远至中国的亚洲大陆土地，以便犹太人受众阅读了解；而且他也仔细地记录了他造访的每一个城镇的犹太人口数量。他的日记记录了横跨地中海，然后经君士坦丁堡向下行至叙利亚海岸的几次真实旅程，但是他对于地中海之外的一些偏远之地的描述显然基于传闻和谣传，他想象中的冒险越远，这些谣传就越神奇。然而他显然去过耶路撒冷，并表达了他对传说中锡安山（Mount Zion）上的大卫王陵墓的惊叹。随着基督徒对于圣地的热情变强，犹太人在他们轻视的十字军的影响下将关注也投向了耶路撒冷。<sup>2</sup> 便雅悯的路线把他从纳瓦拉经阿拉贡王国和埃布罗河沿岸带到塔拉戈纳，在那里，“巨人和希腊人”修建的厚重的古典时期防御工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sup>3</sup> 他从这里又转移到巴塞罗那，那是“一个小而美丽的城市”，满是智慧的拉比，以及来自所有地方，包括希腊、比萨、热那亚、西西里岛、亚历山大、圣地



蒙彼利埃

萨沃纳

热那亚

威尼斯

马赛

比萨

巴塞罗那

塔拉戈纳

巴里

德尼亚

阿马尔菲

格拉纳达

卡塔赫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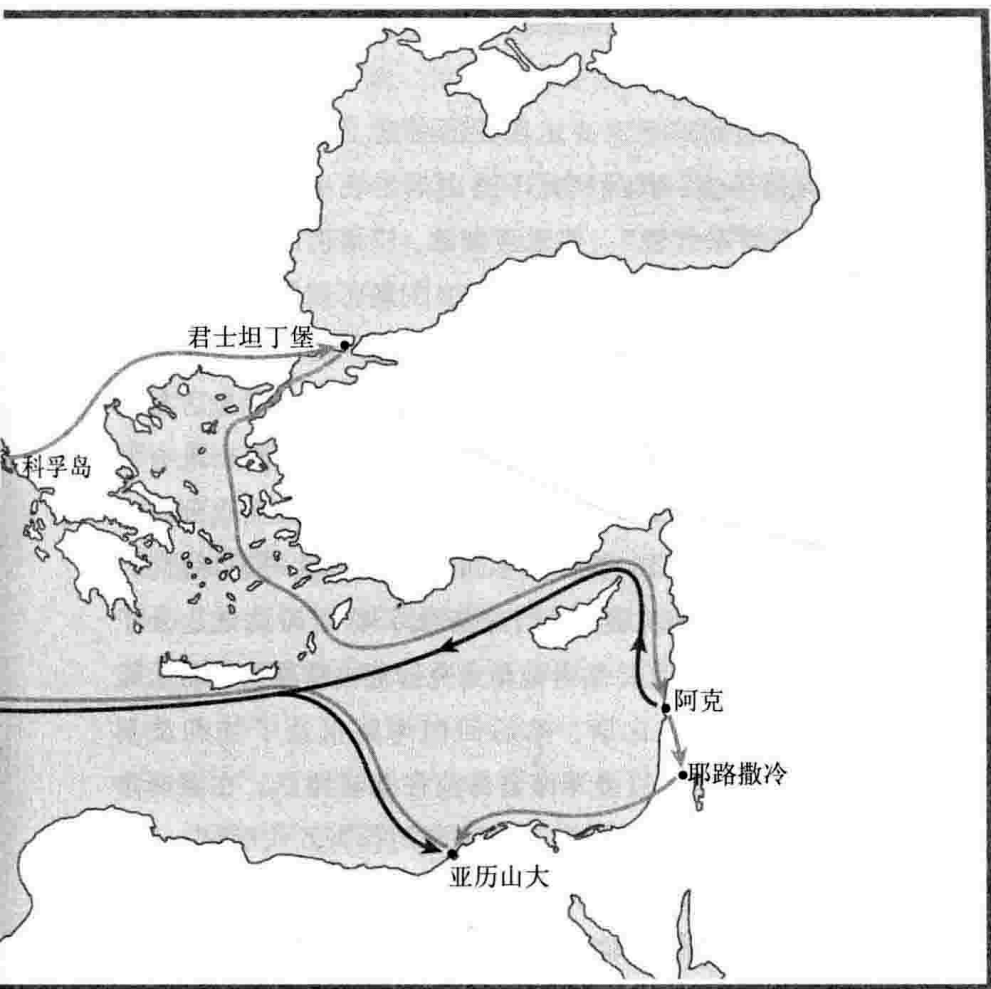
奥里斯塔诺

休达

巴勒莫

墨西拿

特拉帕尼



和非洲的商人。便雅悯的记录是说明巴塞罗那开始发展跨地中海关系的珍贵而可靠的证据。<sup>4</sup> 他也提道，另一处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英格兰的商人的地方，是蒙彼利埃（Montpellier），  
305 “各个地区的人都通过热那亚和比萨代理人在此从事贸易活动”。<sup>5</sup>

从蒙彼利埃到热那亚要走四天的海路。<sup>6</sup> 便雅悯写道，热那亚“被城墙环绕，其居民并不是由国王统治，而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法官来管理”。他也强调称，“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洋”。他对海盗问题的关注不亚于贸易问题，因为他提到了海盗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土地（包括拜占庭）发动的攻击，而且对于他们掠回的战利品印象深刻。两天航程之外的地方是比萨，但热那亚人一直在与比萨交战。便雅悯称热那亚人有着“上万”座塔楼，他们据守塔楼而相互攻击。<sup>7</sup> 便雅悯也到过巴里，但发现在公元1156年西西里国王威廉一世的破坏之后，此地便荒凉不堪。<sup>8</sup> 他又渡海到了科孚岛，称当时此地也处于西西里王国的统治之下，然后他精力充沛地由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中途经过了底比斯，然后回归海路抵达了加利波利（Gallipoli）。他希望穿过爱琴海诸岛前往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他被一些伊壁鸠鲁派的犹太异端者的行为方式震惊，“以色列人已经在所有的地方将他们逐出教门”，因为他们的安息日排除了星期五的晚上却包含了星期六的晚上。<sup>9</sup> 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在东地中海地区，无数的小教派仍然活跃。便雅悯沿黎巴嫩海岸下行时，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派别，即伊斯玛仪派中的阿萨辛（Ismaili Assassins），但他避开他们到达了吉伯利特（Gibellet），这是热那亚人设在黎凡特地区的一处基地，正如他所观察到的，该地由热那亚贵族埃姆布利亚科

(Embriaco) 家族中的一员统治。当地发现的一处古代神殿使他心醉神迷，神龛上有一座雕像，两侧是两尊女神像。这显然是古代的异教崇拜，古代以色列人曾与这种行为做斗争，但是他相信现在这里也有异端：再度出发的他不得不穿过德鲁兹派 (Druze) 武士的领地，他认为德鲁兹派也是无法无天的异端，行乱伦之事且相互易妻而居。<sup>10</sup>

便雅悯在他旅行的某个阶段来到了埃及，而且对亚历山大的港口设施印象深刻：这里有灯塔，约在一百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它。这里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他们“来自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包括威尼斯、托斯卡纳、阿马尔菲、西西里，也来自希腊、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以及西班牙和普罗旺斯，还有商人来自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如安达卢斯和马格里布的商人。<sup>11</sup> “印度的商人带来了各种香料，以东 (Edom，即基督教世界) 的商人从他们手中进货。”此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商栈”。便雅悯通过西西里岛回到家乡，他对于西西里王国奢华宫廷的描述将在下一章中提到。

306

## 2

如果生活在当代，便雅悯一定可以被称为研究古代遗址的专家。他热衷于探查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古建筑。与他描述自己遇到的每一个犹太人社群的热情相匹配的，是他对细节的洞察力和对与不同民族交往的沉迷。当写到圣地时，他毫不令人奇怪地把自己变成了引领人们参观位于耶路撒冷、希伯伦 (Hebron) 和太巴列的犹太圣殿和拉比圣墓的导游，但他没有记录基督徒的圣处。他亲历旅行的私人目的很有可能是以一个朝圣者的身份拜谒圣地，而其他方面的兴趣只是表面

307

上的。与便雅悯经历相似的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迈德·伊本·居巴尔（Muhammad ibn Ahmad ibn Jubayr），他的记录写于大约二十五年之后。<sup>13</sup>他于公元1145年出生在巴伦西亚，他却成为格拉纳达总督的书记员，总督是阿尔莫哈德哈里发阿卜杜勒·穆明（Abd al-Mu'min）的儿子。这位总督尽管有如此显赫的阿尔莫哈德家族的出身，但喜欢喝酒，并总是让伊本·居巴尔尝试饮酒。伊本·居巴尔极其害怕得罪他的主人，在人生中第一次饮用了酒精饮料。但当这位总督意识到他的书记员是多么心烦意乱后，他把七杯金币赐给了伊本·居巴尔。

伊本·居巴尔认为使用这笔钱的最好法子是为自己去麦加朝圣支付路费，他于公元1183年2月出发。他离开西班牙的时间长达两年多。<sup>14</sup>在休达，他发现了一艘热那亚的船正准备起航前往亚历山大。在第一程中这艘船沿安达卢斯海岸把他带到德尼亚，从此地出发后，这艘船将先后停靠伊维萨岛、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然后在离开摩洛哥之后两周将到达撒丁岛：“这是一次速度快得超乎寻常的跨海之旅”。<sup>15</sup>这也是一段穿越数个政治领地的航程：从阿尔莫哈德人统治下的摩洛哥，到阿尔莫哈德人的死敌、信奉逊尼派的阿尔摩拉维德人统治下的巴利阿里群岛，然后来到撒丁岛，这里处于比萨人海军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然而构成威胁的是自然之力而不是人。一股强劲的风暴在撒丁岛外围兴起，但伊本·居巴尔的船最终到达了撒丁岛西部的奥里斯塔诺（Oristano）。一些乘客在此下船去准备补给。其中一位穆斯林看到有八十名穆斯林男女在市场上作为奴隶被人出售，很是伤感。<sup>16</sup>伊本·居巴尔的船借着顺风之力起航出港，但这是一个错误。另一场大风暴来临了，它相当猛

烈，这艘船甚至都无法使用主帆，其中一片帆被强风卷走，同时被卷走的还有用来固定船帆的桅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船长站出来，加入这次航行并遇到风暴的穆斯林水手也站出来，他们都认为这场风暴生平罕见。任何关于这场风暴的描述其实都只能算作轻描淡写。”<sup>17</sup>然而即使气候如此恶劣，他们也到达了目的地西西里岛，因为这艘船是沿着一条常被称为“千岛航线”的路线行驶的，这是充分利用海风和洋流之力的西行路线。<sup>18</sup>如果他们继续航行，冬季的西北风将有助于他们的航程，但是早春的气候是难以预测的，风向改变了。<sup>19</sup>他们从西西里岛的外缘通过，看见了埃特纳山，然后向克里特进发，当他们在夜间抵达克里特时离开休达港已经有四个星期了。从克里特出发，他们越过利比亚海朝北非驶去，3月29日，亚历山大的灯塔就遥遥在望了。整个航程持续了三十天，与经冢犹太人的记录相比并没有太长。<sup>20</sup>

在陆地上和在海上一样也有诸多艰难险阻。当他们到达亚历山大的海关并上岸时，每一个乘客的详细个人信息都被记下，船载货物的清单也被收走。穆斯林须上交被称为“天课”（*zakat*）的慈善税款，即使他们拥有的只剩朝圣（*hajj*）必需的补给。另一个著名的乘客是艾哈迈德·伊本·哈桑（Ahmad ibn Hassan），他是来自格拉纳达的医师。他被卫兵带到当地官员的面前，被询问西方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船上都带了哪些商品。这类对重要乘客的问讯在地中海的港口上是例行程序。伊本·居巴尔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经过了巴勒莫，在那里他受到了更加严格的讯问。<sup>21</sup>船上的乘客还须承受海关官员们带有羞辱性质的彻底搜身：

海关署拥挤得令人窒息。他们带的商品，无论是大件还是小件的，都被搜查，然后被乱七八糟地扔作一堆，搜查者的手竟然伸到乘客们的腰包里，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货主们不得不发誓称，他们没有其他还没有被搜查到的东西了。在整个过程中，由于鱼龙混杂、手续繁复，加上对货物的粗暴抛掷，许多东西不翼而飞。<sup>22</sup>

伊本·居巴尔抱怨道，如果这种状况被告知正义而仁慈的苏丹萨拉丁知晓，他必然会制止这种行为。

即便如此，伊本·居巴尔还是非常欣赏亚历山大。今天，在这座城市中，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痕迹已经基本从地面上消失了。即使在伊本·居巴尔的时代，地底下的亚历山大还是比地面上的更引人入胜：房屋和小巷的下面有水井、水道，使“地下的建筑甚至比其上方的地表建筑更精致、更牢固”。在街道上，他观察到巨大的柱廊式建筑“直耸云天，无人能说明如此修建石柱的原因和目的”；他被告知，这些设施曾经被过去的哲学家使用，而且他相信，这些石柱是当年天文观测台的一部分。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记忆此时已经变成了传说。居巴尔对灯塔印象深刻；在它的顶端有一间清真寺，居巴尔去那里祈祷。他听说这里有多达 1.2 万间清真寺，换句话说数量极多，清真寺中的伊玛目们从当局领取薪酬。与其他伊斯兰世界的大城市一样，这里满是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s*）、济贫院和浴室；当局监管着一个民众就医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下，人们去病人家中探视，然后向医生汇报，医生将针对病人的护理回答一些问题。每天，城中都向外来旅行者发放两千份面包。当公共基金不足以承担这种开支时，萨拉丁就用自己的钱



垫付。<sup>23</sup> 这里的税收很低，但犹太人和基督徒得付人头税 (*dhimmi*)。伊本·居巴尔对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吹捧令人惊讶——他的逊尼派信仰与阿尔莫哈德派的信仰多少有些分歧，且他与阿尔莫哈德派的关系并不融洽。

从亚历山大启程，伊本·居巴尔又经由尼罗河上行到红海和麦加，然后在公元 1184 年 9 月才回到地中海：他沿大马士革海岸南下，穿过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抵达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阿克。他穿越了住着穆斯林却由法兰克人掌控的提卜宁 (Tibnin)，他说此地“属于被称为太后的母猪的管辖范围，她是阿克领主这头猪的母亲”，他指的是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太后。<sup>24</sup> 伊本·居巴尔和与他一同朝圣的随从们下定决心不受诱惑，于 9 月 18 日进入阿克城，他表达了强烈的心愿：愿安拉摧毁这座城市。这里的来访者同样被送到海关署，海关署的院子很大，足以容纳新到的骆驼商队；院里有石凳，基督徒的海关官吏们坐在那里，他们讲阿拉伯语，并用阿拉伯语做记录，在乌木或黄金制作的墨水盒内蘸笔。他们在为一位包税商工作，这位包税商每年付给国王一大笔税款，以得到开署征税的许可。这在中世纪的地中海是常见的操作模式，而且几乎可以完全确定的是，伊本·居巴尔造访的这间海关署是廊柱客栈 (Khan al-'Umdan)。它是一种巨大的拱形结构，其廊柱环绕着一个院子。该建筑在距离港口很近的地方，但是其大部分是在土耳其时期重建的。<sup>25</sup> 楼上有一处空地，可堆放已经检查完毕的货物，但是海关税吏们都很仔细，甚至会检查那些声称自己并没有携带任何商品的乘客的行李；但与亚历山大的情形不同，“所有检查都很有礼貌且带着敬意，没有粗暴无礼的行为”。<sup>26</sup>

阿克在公元 1184 年已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港口，但 1190

年之后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商人获得的大量新优惠待遇使它变得更大。在 1187 年萨拉丁攻克耶路撒冷和多数十字军王国后的危难时期，欧洲许多地方提供了急需的海军援助，这些优惠是对这些帮助的报答。比萨人可以把他们的业务从雅法转移至此。雅法距离南方太远，使比萨人很难从黎凡特贸易中充分受益；而从雅法以北的阿克同大马士革和内陆地区建立联系则更轻松。但这并不是说阿克有一个特别好的港口。船只在海港的入口外停泊，人们不得不用一条铁链把港口封锁起来（如地中海的多数港口那样），货物得通过小船运抵岸边。换句话说，阿克“不能停泊大型船只，大船必须在港口外停泊，只有小船才能进入”。遇到恶劣天气时，必须把船只拖上沙滩。中世纪的商人在选择他们的贸易商站时，良港并不是必备前提——在巴塞罗那、比萨和墨西拿我们可看到同样的情形。但是，伊本·居巴尔认为“阿克港之伟大堪比君士坦丁堡”，这并不是说阿克港的规模大，而是指穆斯林和基督徒能够汇聚此地，他们从海上或跟随陆上的骆驼商队来到此地，“街道挤满了人，人们很难踩在地上”。如同以往，伊本·居巴尔很快就得掩饰对所见的羡慕之情并代之以诅咒：“在这里，不信和伪善的情绪在猛烈燃烧，猪和十字架无处不在。”此处的猪既指道德败坏的基督徒，又指肮脏的牲畜。“这里脏乱不堪、臭气冲天，到处都是垃圾和粪便。”<sup>27</sup>他自然强烈反对十字军将清真寺改造为基督堂的行为，但他确实注意到，在原来的星期五清真寺里，有一个角落可供穆斯林使用。这是因为法兰克移民和当地居民关系的紧张程度低于阿尔莫哈德派的士伊本·居巴尔或新到达的十字军的预期。这些新十字军对他们看到的和谐状态感到十分困惑。北叙利亚的沙札尔（Shayzar）的年迈酋

长 (*sheikh*) 乌沙玛·伊本·蒙奇迪 (Usamah ibn Munqidh, 1095 ~ 1188 年) 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记录, 这份回忆录描述了基督徒与穆斯林分界线两侧的友好关系。这位酋长与一位法兰克骑士日渐熟悉, 他写道: “他是我亲密的伙伴, 始终与我维持着这种关系, 并开始同我称兄道弟。”<sup>28</sup> 与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发生的那种深刻广泛的文化交往相比, 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兰克人几乎没有从伊斯兰文化中进行借鉴, 但双方的确达到了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和谐共存 (*convivencia*)。伊本·居巴尔对于穆斯林在基督教王国中的这种表现感到十分不安。他写道: “在真主的眼中, 一个穆斯林没有任何理由生活在异教徒的土地上, 除非是路过, 且这条道路应明显通往穆斯林的陆地。”<sup>29</sup>

然而, 基督徒的船只仍然被认为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 伊本·居巴尔在要回到西方时选择了一艘由一个热那亚海员掌舵的船: “他对航海术有透彻的领悟, 作为一艘海船的船长技术娴熟。” 船的航行目标是利用将在 10 月持续两周的东风起航, 因为除了 10 月及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外, 地中海上主要刮西风。公元 1184 年 10 月 6 日, 伊本·居巴尔和其他穆斯林与两千名来自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朝圣者一起上了船, 尽管他对于船载乘客数量的估计对于一艘船来说过高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在甲板上共处, 但他们互不妨碍: “穆斯林与法兰克人保持着距离。” 伊本·居巴尔表达了他的愿望: 他希望上帝能使穆斯林很快就离开他们的基督徒旅伴。居巴尔和其他穆斯林把他们的货物装载上船, 在船等待顺风的期间, 他们每晚都在陆上过夜, 这样可以休息得更舒服一些。但这个决定差点令他们大祸临头。10 月 18 日, 天气看起来并不适合行船, 伊本·居巴尔仍然在陆地上睡觉, 但此时船已经扬帆起航了。他和他的朋友

租了一条四桨大船，拼命追赶前面的船，毕竟船上载着他们的全部财产，而且他们已经为这次航行支付了费用。穿越波涛汹涌的海面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们在当晚赶上了热那亚人的船。他们有了五天的顺风，航行很顺利，但之后遇到了西风；船长迂回行进，以避免陷入更坏的境地。西风于10月27日发展到极为猛烈的地步，一支带帆的桅杆被折断并坠入了大海，但船员们马上立起了一支新的桅杆。<sup>30</sup>风停后，海面平静如“玻璃铺设的宫殿”，伊本·居巴尔从《古兰经》中引用了这句话。<sup>31</sup>基督徒在11月1日夜幕降临后欢庆他们的万圣节；所有乘客，无论男女老幼，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听着祈祷和布道：“整条船从上到下都被灯烛照得通亮。”<sup>32</sup>伊本·居巴尔显然再次受到震动，但一如往常，他并不想表现出这一点。

伊本·居巴尔的日记非同寻常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船上生活。他描写了在海上去世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如何在历史悠久的海葬仪式中被抛入大海。根据热那亚人的海洋法，船长将拥有在海上去逝之人的物品：“死者真正的继承人无法继承他的财产，对此，我们感到震惊”。<sup>33</sup>这艘船没有因要获取补给而在中途停泊，许多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朝圣者在航行开始一段时间后就感觉物资紧缺。但是居巴尔坚持说在甲板上有许多新鲜食品可以买到：“在这艘船上，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个商品丰富的城市中一样”。有面包、水、水果（包括西瓜、无花果、木瓜和石榴）、坚果、鹰嘴豆、扁豆、奶酪、鱼和许多其他东西；经验丰富的热那亚水手显然知道，只要他们能够将任何额外的补给物装上船，他们就能拥有垄断市场。风将船吹到了一座拜占庭控制下的海岛，乘客们从当地居民手中买到了肉和面包。在经过克里特岛时，这艘船碰到了更多的风暴，乘客们开

始担心自己将在希腊的一座岛上或非洲沿海某处过冬，但前提是他们能挺过风暴；然而实际上他们只是被风刮回了克里特岛。伊本·居巴尔感动地从一个阿拉伯诗人的诗中引了一句话：“海是苦涩而难以控制的。”<sup>34</sup>他曾提道，秋季里会有一个人人们可由东方平安地航行至西方的时期，现在指出：

各种类型的旅行都有适当的季节，海上航行必须在一个吉祥且获得人们公认的时段进行。不应该像我们一样在冬季的月份从事冒险。总之，真主掌握了一切。

他的悲观情绪是没有道理的。不久后，来自亚历山大的五艘船出现在海平面上。这支小型船队进入了爱奥尼亚海上一个小岛的港口，补充了肉、油和一种用小麦和大麦做成的烘烤得很硬的黑面包。人们蜂拥而上，去抢购面包，尽管它很贵。其实这里出售的东西已经没有廉价的了——感谢真主赐予的一切。<sup>36</sup>

当这些船只离开港口时，时间已接近11月末；随着冬季的来临，旅途更加艰辛。在南意大利海域，“惊涛骇浪不断地袭向我们，其冲击力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但是他们在卡拉布里亚靠岸了，在这里许多基督徒都认定他们已经受够了，除了要忍受风浪的袭击外，他们现在还都饥渴难耐。伊本·居巴尔和他的朋友们仅靠船上每天发放的一磅被水浸湿的干粮充饥。那些上岸的人把他们还留存的一些食物卖给了那些仍然在船上的人，而穆斯林必须花费一个银第尔汗（*dirham*）才能买一块饼干。<sup>37</sup>他们在接近西西里岛时曾感到如释重负，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荡然无存。墨西拿海峡的水像是沸腾了一样翻滚着，这片水域被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挤在中间。强大的风推着船靠

近墨西哥附近的海岸，一片帆因被卡住而降不下来；海船在风的驱赶下漂向浅水，它的龙骨撞上海底的礁石，船因此停下来了。舵被撞坏，锚也无用了。所有船上的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只能听天由命。一些地位较高的乘客搭上了救生船，但救生船试图从海岸回到海上时被海浪拍得粉碎。一些小船于是出动，去帮助那些受困的乘客，尽管其救援并不是出于善意：小船主们想从获救的人那里获得高额的回报。船只搁浅的消息传到了西西里国王的耳中，为督造他的战船他刚到墨西哥。他前来围观这起事故，对那些船夫的表现甚为不满，于是向他们下令，他将发给他们一百塔里，他们因此应将一些付不起他们索要的报酬的穷困穆斯林运回岸上。伊本·居巴尔惊讶于真主使西西里国王出现在墨西哥的先见之明，“这证明了我们被赐予的救赎”。<sup>38</sup> 国王威廉确实拯救了那些仍然在船上的人，因为船在触礁的第二天就解体了。

虽然航行如此惊险，但伊本·居巴尔对于墨西哥港口的便捷感到震惊。船只可以直接到达海岸，完全没有必要安排驳船来转运乘客和商品，只需一块木板即可。船只“沿码头排列，像马匹成列地拴在桩上或者拴在马厩中”。<sup>39</sup> 然而，为了到达安达卢西亚，居巴尔不得不穿过西西里岛前往特拉帕尼（Trapani），他要在那里寻找一艘驶往西班牙的船。在正常情况下这并不困难，但国王已经对所有的船只下了禁行令：“他似乎在准备一支船队，在他的船队离港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驶出。愿真主使他的计划失败，愿他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居巴尔开始意识到，这支船队的目标是拜占庭帝国，因为在西西里每个人都在谈论一个被西西里国王留在宫廷中的青年，国王想把这个青年送上拜占庭帝国的皇位，以重现一个世纪之前的

罗伯特·吉斯卡尔的计划。<sup>40</sup>这则禁令委实讨厌，但总是可通过老办法说动国王的大臣们。伊本·居巴尔在三艘要一起向西行驶的船中的其中一艘上找到了一个位置，热那亚船主贿赂了王室的官员，使其对船的出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三艘船于公元1185年3月14日起航。它们穿过埃加迪群岛朝西西里岛西部航行；它们在小港口法维尼亚纳（Favignana）与热那亚人马可的船相遇，船上搭乘着来自亚历山大的朝圣者，正是居巴尔在几个月前于麦加遇到的那群人。于是旧友重聚，并举行了宴会。现在一起驶向西班牙的有四艘船了，但是季风似乎在和他们开玩笑，船被风吹往撒丁岛，然后被吹到南面，最后又回到撒丁岛，并朝伊维萨岛、德尼亚和卡塔赫纳驶去。在卡塔赫纳，伊本·居巴尔重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最后于1185年4月25日回到了他的家乡格拉纳达。他用一位阿拉伯诗人充满疲惫感的诗句结束了他的讲述：“她抛下了她的船员，停了下来，像一个到达旅途终点的旅行者。”<sup>41</sup>

315

伊本·居巴尔很不幸地遇到了坏天气，而墨西拿水域的船难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毫无疑问，他夸大了自己面对的危险、船上搭乘旅客的数量和行船的艰辛。然而，从许多方面看，他的航行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极为典型，尤其是穆斯林与基督徒朝圣者都使用热那亚船只这一点。他写道，热那亚的船长“统治着”他们的船，但这些大船通常并不是船长的财产。热那亚投资者买下股份，通常每人各占六十四分之一的较小数额，所以商船的所有权极为分散。一个活跃的投资将同时投资几艘船以分散自己的风险。被用来指代这种股份的词是 *loca*，即“位置”，它们可以像现代的“股票”（*equities*）那样被买卖、被继承。<sup>42</sup>这些股份没有固定的价格，因为每艘船都

是不同的，且每艘船被分割成的份额也不同；通常每一股份可以用大约 30 镑的热那亚货币买到，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热那亚人可能获得的遗产数额及决定投资的数额。股份持有者包括少数女性；许多股份持有者，包括城中德拉沃尔塔（della Volta）和埃姆布利亚科（Embriachi）等大家族的成员，都参与热那亚的行政管理。这些股份可以使他们从乘客旅费和商人租用货栈支付的费用中获得收入。股份的总价值可高达 2480 热那亚镑，如公元 1192 年的例子所示；或者低至 90 镑，这无疑意味着一艘船的使用寿命将尽，或需要进行大量维修。<sup>43</sup>

816 当时主要有两类船。轻型单桅帆船被用于战争或者搭载被派遣到别国宫廷的使节，但是如同在古代那样，这些船只无法承受惊涛骇浪，一般在人们视力可及的近陆海域航行，当风不大或者当准备靠岸时使用船桨作为辅助工具。轻型帆船有一根桅杆和一块大三角帆，船头不是撞角而是鸟喙状或者是尖头的。这种船上一般安置有二十到八十名桨手，他们都是自由市民。和公元 16 世纪后的普遍情形不同，他们并不共同操纵一个大桨，而是两名桨手坐在一张凳子上，各操纵一支长短不同的桨，这种机制在威尼斯被称为 *alla sensile*。<sup>44</sup> 这种船的优点是速度快，因此它们很容易就能超过弧形船。许多单桅帆船都属于私人，但在战时会被热那亚城市公社征用，当然一般会有足够的补偿。<sup>45</sup> 热那亚文献提到了一种桶状帆船，它的拉丁语简称是 *navis*，这种船被提到的次数远比单桅帆船多。这些文献也很少提那些被称为 *barca* 的小船，因为这类小船只能沿海岸做短距离航行，或者载少量货物在热那亚和科西嘉或者撒丁岛之间来回，且热那亚人很少投资这种船。<sup>46</sup> 大型舰船可达 24 米长、7.5 米宽。到 13 世纪早期，它们可能会配上两到三个桅



杆，并配有三角帆；伊本·居巴尔明确指出，这种船可在需要利用海风时再装上方形的帆。1200年之后，人们开始把这种船建得更高，它有了两层或三层船舱，但底舱非常窄小，因为建这种船的目的是增加装载货物的空间而不是改善乘客的生活条件。<sup>47</sup>地中海还没有开始使用尾舵，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喜欢的传统舵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船能使用多久令人担忧。坚固的罗马单桅帆船作为运输粮食的工具颇为耐用，但是中世纪却倾向于把船只建得轻便一些，对于其在水中的倾斜度和维修还不够关注。

多数船都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因此如果投资足够分散的话，这种投资就不算不良投资。这意味着，只派出少量船只出海的城镇，如阿马尔菲和萨沃纳（离热那亚不远），就处于不利位置：他们的商人不能把投资分散给更多船。因此他们之中一些人，如萨勒诺的所罗门在前往热那亚、比萨或威尼斯后，感到自己在这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这构成了乘数效应。比萨、威尼斯、热那亚这三个城市的贸易比较繁荣，其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与之匹敌。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地中海上的成功在公元12世纪晚期达到了巅峰，因为他们坚持一项原则：从普罗旺斯的港口起航前往黎凡特的船只只许搭载朝圣者和其他乘客，而不允许装载货物。<sup>48</sup>

317

船上的所有人和货物都被紧凑地安排在一起，乘客们就睡在星空之下，把他们自己的行李当作枕头和床垫。到公元13世纪，货物可以放在甲板之下，船舱也在船的两端建立起来，于是，在中世纪出现了公务舱，它们针对的是那些愿意为更舒服的航行付账的乘客。<sup>49</sup>在海上旅行的恶劣条件下，促使众多海上旅客穿行地中海的是信仰：对于心怀信仰的朝圣者来说，

海上的逆境是对他们虔诚之心的考验，这种虔诚可助他们获得他们的崇拜对象的认可。另一个因素是商人的信念，他们深信自己有能力从有时很危险的地中海南部和中部的航行中获得收益，他们对于可能遇到的风险已做了估计。商人们同样清楚，他们所取得的任何利润都应归功于上帝的恩赐——“这是上帝惠赐的利润”（*proficuum quod Deus dederit*）。

## 注 释

1. Benjamin of Tudela,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ed. M. N. Adler (London, 1907); also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ed. M. Signer (Malibu, CA, 1983); references here are to the original Adler edition.
2. J. Prav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Oxford, 1988), especially pp. 191–206.
3. Benjamin of Tudela, *Itinerary*, p. 2
4. *Ibid.*, p. 2.
5. *Ibid.*, p. 3; cf. H. E. Mayer, *Marseilles Levantehandel und ein akkonensisches Fälscheratelier des XIII. Jahrhunderts* (Tübingen, 1972), pp. 62–5.
6. Cf. M. Soifer, “You say that the Messiah has come . . .”: the Ceuta Disputation (1179) and its place in the Christian anti-Jewish polemics of the high Middle Ages’,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31 (2005), pp. 287–307.
7. Benjamin of Tudela, *Itinerary*, p. 3.
8. *Ibid.*, p. 9.
9. *Ibid.*, pp. 14–15.
10. *Ibid.*, pp. 17–18.
11. *Ibid.*, p. 76, n. 1: twenty-eight groups in one MS, forty in another.
12. *Ibid.*, pp. 75–6.
13. Ibn Jubayr, *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 Broadhurst (London, 1952).
14. Broadhurst, *ibid.*, p. 15.
15. Ibn Jubayr, *Travels*, p. 26.
16. *Ibid.*, p. 27.
17. *Ibid.*, p. 28.
18. Roger of Howden, cited in J.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p. 37.
19.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p. 16–19, and p. 17, figs. 3a–b.

20. Ibn Jubayr, *Travels*, p. 29.
21. Ibid., pp. 346–7; also J. Riley-Smith, ‘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 in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 D. Baker (Edinburgh, 1973), p. 112.
22. Ibn Jubayr, *Travels*, pp. 31–2.
23. Ibid., pp. 32–5.
24. Ibid., p. 316.
25. R. C. Smail, *The Crusader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1973), p. 75.
26. Ibn Jubayr, *Travels*, pp. 317–18.
27. Ibid., pp. 318, 320.
28. Usamah ibn Munqidh, *Memoirs of an Arab-Syrian Gentleman or an Arab Knight in the Crusades*, ed. and trans. P. Hitti (2nd edn, Beirut, 1964), p. 161.
29. Ibn Jubayr, *Travels*, pp. 320–22.
30. Ibid., pp. 325–8.
31. Koran, 27:44.
32. Ibn Jubayr, *Travels*, p. 328.
33. Ibid., p. 329.
34. Ibid., pp. 330–31.
35. Ibid., p. 332.
36. Ibid., p. 333.
37. Ibid., p. 334;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 36.
38. Ibn Jubayr, *Travels*, pp. 336–8.
39. Ibid., p. 339.
40. Ibid., pp. 353, 356.
41. Ibid., pp. 360–65.
42. H. Krueger, *Navi e proprietà navale a Genova: seconda metà del secolo XII* (=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vol. 25, fasc. 1, Genoa, 1985).
43. Ibid., pp. 148–9, 160–61.
44. J. Pryor and E. Jeffreys, *The Age of the Δροῦον: 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Leiden, 2006), pp. 423–44.
45.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 64; Krueger, *Navi*, p. 26.
46. Krueger, *Navi*, pp. 24–7.
47.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pp. 29–32; R. Unger, *The Ship in the Medieval Economy, 600–1600* (London, 1980), pp. 123–7.
48. D. Abulafia, ‘Marseilles, Acre and the Mediterranean, 1200–1291’, in *Coinage in the Latin East: the Fourth Oxford Symposium on Coinage and Monetary History*, ed. P. Edbury and D. M. Metcalf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Oxford, 1980), pp. 20–21,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x.
49. Unger, *Ship in the Medieval Economy*, p. 126.

## 六 帝国的兴衰 (1130 ~ 1260 年)

### 1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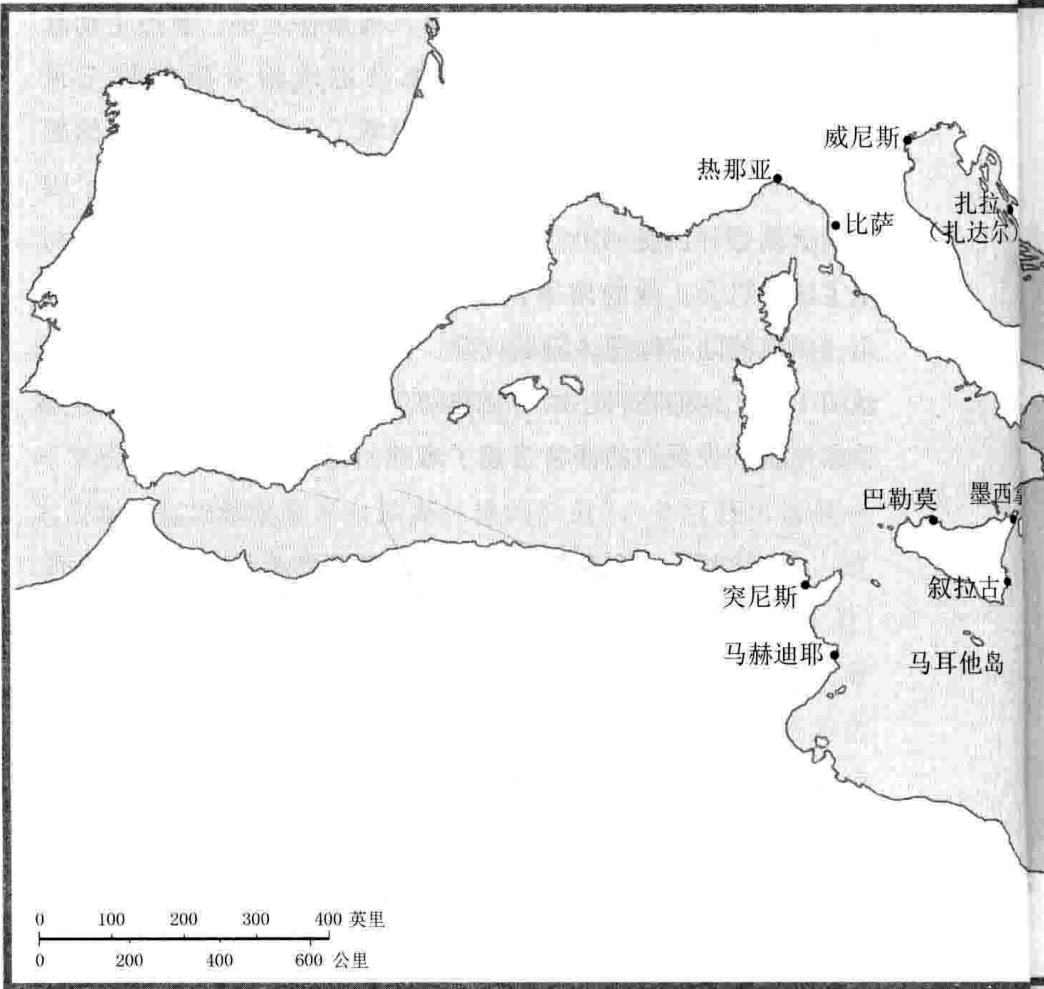
意大利水域上并不只有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船队。“大伯爵”罗杰一世对西西里岛的征服到公元 1091 年就告一段落了。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兴盛起来：墨西拿吸引着来自拉丁世界的商人，成为热那亚、比萨同阿克、亚历山大间贸易航线上的补给站。伊本·居巴尔称它为“异教商人的大市场，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并且指出这是一个巨大的军械库，西西里王国的船队就是在这里打造的。<sup>1</sup> 这里的统治者把他土地上生产的沥青、钢铁大多留给自己使用，因为控制造船的原材料是至关重要的。<sup>2</sup> 罗杰一世无情却天分很高的儿子罗杰二世取得了由他的堂兄弟统治的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与之同样重要的是，1130 年，他从教宗手中取得了新造的西西里王国的王冠。他是有心称霸地中海的人，自视希腊僭主的继承人，并强调称他不是篡位者，而是一个古代王国的复兴者。<sup>3</sup> 他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拜占庭皇家礼服，或是阿拉伯埃米尔的袍服。他用最精致的希腊式镶嵌画和最华贵的木制天花板——它们是阿拉伯手艺人的杰作——装饰自己宫殿内的礼拜堂。他委托在休达避难的王公伊德里西 (Idrisi) 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形图，因此可以极其仔细地考察地中海和地中海以外的世界。

宣传与行动是同步进行的。公元 1147 ~ 1148 年，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罗杰二世将注意力转移到拜占庭帝国。这次十字军是在 1147 年由教宗动员的，不久前十字军建立于北叙利亚的埃德萨（Edessa）公国落入穆斯林之手。罗杰主动献出他的船队，但由于他的敌人德意志统治者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的施压，他的援助被拒绝了。罗杰准备把他的船队用于其他方面。1148 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因受制于取道拜占庭的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而无力他顾，罗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海军占领了科孚岛，攻击了科林斯和雅典，而他的陆军则深入希腊内陆，从底比斯掠走了数十名犹太丝织工，让他们在自己的宫廷作坊里工作。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学家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描述了班师回朝的西西里大帆船：

319

任何人看到西西里的三列桨船装载着如此多的精美商品，看到船桨浸没在水中，都会说这些船不是海盗船，而是装载各种货物的商船。<sup>4</sup>

毫无疑问，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罗杰现在控制了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威尼斯人对此十分警惕，遂向曼努埃尔·科穆宁派出救援船队。皇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重新给予威尼斯人那些在他眼中已是过分的贸易特权。在听说威尼斯人在科孚围攻战中如何消磨时间后，他对威尼斯人的不信任加深了：为嘲讽曼努埃尔长得黑，威尼斯人给一位非洲人穿上华丽的袍服，将他安置在一艘悬挂了拜占庭帝国旗帜的船上，命他表演拜占庭的宫廷礼节。<sup>5</sup> 罗杰不经意地迫使拜占庭人和威尼斯人明白了他们之间互相厌恶的程度极深。罗杰对希腊发动了突袭，但





他企图在北非创造一个长久的海上帝国。<sup>6</sup> 他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在这个饥荒严重的时期，罗杰用西西里岛产的谷物赢得了又一个又一个非洲埃米尔对自己权威的认可，并且他于公元 1146 年派出船队攻击并轻松占领了的黎波里。<sup>7</sup> 两年之后，马赫迪耶的埃米尔哈桑（al-Hasan）表示不愿服从，于是他派出了一支船队，它的统帅是机动灵活、颇有才干的希腊基督徒安条克的乔治（Admiral George of Antioch），他早年曾为马赫迪耶的统治者效力。在潘泰莱里亚岛附近的海域，西西里船队碰上了一艘马赫迪耶的船，并发现该船带着信鸽。乔治强迫该船船长给马赫迪耶送信，告诉埃米尔，尽管有一支正在行进的西西里船队，但它的目标是拜占庭帝国。哈桑以为这个信息准确无误，但他看到西西里船队于 1148 年 6 月 22 日黎明在海平面上出现时大吃一惊。哈桑逃跑了，他的城市被轻松占领，乔治允许他的军队在城中劫掠两小时。

之后，他把马赫迪耶人纳入王室的保护范围，甚至向当地商人发放贷款，从而使这里的商业活动尽可能快地恢复。他从当地市民团体中指定了法官，以保证穆斯林能继续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法律制度下。外国商人到来了，当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罗杰将这一系列的征服视为他建立部分地区再次基督教化的“非洲王国”的第一步。他试图使基督徒移居马赫迪耶，因为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当地的基督徒几乎完全消失了。<sup>8</sup> 但他也有一个更大的战略计划，意在控制西西里王国的周边海域：他已经于公元 1127 年重新占领马耳他（他的父亲于 1090 年第一次占领此地），而且他热切地希望在希腊西面的爱奥尼亚诸岛确立自己的影响力。<sup>9</sup> 只要占有这些地方，他就能够在王国周边创建一道海上封锁线，从而保证敌人的船队——不管



是效力于拜占庭的威尼斯船队，还是效力于德意志皇帝的比萨船队——都不能向他的领地发动进攻。他有兴趣在西班牙海域打一次海战。到 1154 年去世时，他已经快要成功创建一个强大的海权国家。<sup>10</sup> 罗杰并没有带领他的船队亲征，而是将其置于他的主要行政管理者安条克的乔治的指挥之下，此人现在拥有了“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的称号。后来，莫迪卡的威廉（William of Modica）于 1177 年被指定为“幸运的王室船队”的埃米尔，或者可以写作 *amiratus* 或 *admiral*，这个特指海军将领的概念于 13 世纪被逐渐引入法兰西、西班牙和其他地区。这是一个西西里岛阿拉伯语词，它反映了 12 世纪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船队所拥有的绝对主导权。<sup>11</sup>

822

公元 1154 年之后，罗杰的儿子“恶棍”威廉（William ‘the Bad’）在整合整个王国的权力网方面做得远逊于他的父亲。面对获得威尼斯人支持的一次拜占庭对阿普利亚的入侵，威廉可能表现出了他的良好判断力，因为他接受了非洲领地已经无法维持的事实。北非城市认识到威廉在其家乡面临的困境，于是把他们的命运与在摩洛哥迅速发展的阿尔莫哈德运动结合在一起。阿尔莫哈德哈里发于 1159 年亲自指挥了对马赫迪耶的进攻。1160 年 1 月，阿尔莫哈德人攻破了马赫迪耶的城墙，让城内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死亡与皈依伊斯兰教间做出选择。<sup>12</sup> 这起使形势发生逆转的大事件使威廉受到很多责备，但事实上，他（或者他的谋臣们）表现出了一些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威廉击退了拜占庭人的入侵，与曼努埃尔·科穆宁达成和约，拜占庭皇帝第一次勉强承认了西西里王国的合法性。

当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控制了东西方间远程载

运商品和朝圣者的海上航线时，西西里人也控制了第勒尼安海与东方、亚得里亚海与东方的交通要道。西西里船队称霸这些水域的事实使北意大利人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如果不希望把他们的船只交给西西里海军，就必须与巴勒莫的宫廷交好。但是，他们被迫走上其他道路，因为他们希望安抚拜占庭和德意志皇帝。公元1156年，热那亚人与国王威廉一世签订了一项条约，城市编年史学家就此事写道：“长期以来，整个世界的智者都在说，热那亚人收获的远比其付出的更多、更好。”<sup>13</sup>国王威廉需要一种保证，即热那亚人的船队不会被他的敌人用于攻击他的王国。<sup>14</sup>热那亚人经墨西拿海峡从亚历山大和圣地运出的货物可享受减税待遇。该条约对通往东方的航线的安全与购买西西里岛的部分商品的权利同等重视。热那亚人同样需要西西里岛的产品。不断发展的热那亚得供养它自己，而无论如何，相较于热那亚与比萨一直争夺的撒丁岛，西西里岛有产量更丰富、品质更好的小麦。这项协议描述了热那亚人将如何接收小麦、腌肉（产自西西里王国北部一个以基督徒居民为主的地区）、羊毛、羔羊皮和棉花 [主要来自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周边地区]。<sup>15</sup>在此后数个世纪中，热那亚人对西西里岛的谷物形成依赖，他们购买这些谷物的价格比较便宜，且把谷物运到他们的繁荣家园的运费也比较低；另外，通过从西西里岛购买大量原棉到北意大利，热那亚人奠定了其棉纺织业的基础，这一产业将在整个中世纪持续繁荣。<sup>16</sup>一些最好的棉花来自马耳他，该岛接受西西里国王的统治，而且马耳他的棉花早在1164年就已经被热那亚人记录在案。<sup>17</sup>西西里岛的贸易逐渐全面发展起来，于是它与北非的密切联系被与北意大利的联系替代。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进入了欧洲的

经济网络。在当时，它还只是一块充满异国情调的地区，这里的商人们可以找到的产品不仅有谷物还有糖和靛蓝，但随着生产这些地中海伊斯兰社群传统产品的穆斯林人口减少，自1200年之后它们就被更多的小麦取代。随着热那亚人将越来越多的意大利甚至弗兰芒的毛织品运到西西里岛南部，以帮助他们支付购买小麦、棉花和其他商品的费用，北方和南方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北意大利和南意大利之间，一种互补的关系发展起来。在这种关系中，西西里岛成为原料和食品的供应地，而北意大利成为成品的供应地。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是岛上谷物生产基地的主人，因此能够从他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资产中获得巨大的财富。<sup>18</sup>

“好人”威廉二世（King William II “the Good”，1166~1189年在位）背靠强大的船队，对更广泛的地中海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将他的权威扩展到整个亚得里亚海，将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即拉古萨（Ragusa）〕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该城正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sup>19</sup>但是，他的视野远远超出了亚得里亚海。1174年，他发动了对埃及亚历山大的强力攻击；1182年，他派出自己的船队向马略卡进军，但是他的船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三年之后，拜占庭成了他的目标，且当他去世时他已经有了向被包围的十字军国家提供帮助的计划。他认为自己是为了基督而与穆斯林及希腊人斗争的战士。他最具野心的征伐计划使西西里船队在1185年进入了拜占庭帝国深处。他可以寄望于得到意大利商人的支持，因为1182年，在一次获得拜占庭新皇帝安德罗尼卡·科穆宁（Andronikos Komnenos）公开鼓励的可怕突发暴力事件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遭到屠杀。一艘威尼斯船进入爱琴海，在玛

勒亚海角（Cape Malea）遇上了另一些威尼斯船，这些船上的船员呼喊：“你们为什么停在这里？如果不逃跑，你们全都会死，因为我们与所有拉丁人都已经被君士坦丁堡流放了。”<sup>20</sup>但是牺牲者多是比萨人和热那亚人，威尼斯人仍然纠结于他们与君士坦丁堡的长久争执，他们中没有太多人在君士坦丁堡事件中受害。

到公元1185年，威廉获得了他需要的理由：一个四处游荡的骗子来到了他的宫廷，宣称自己是被废黜的拜占庭皇帝，威廉遂将帮助这个不可信人物复位作为自己的高尚职责。<sup>21</sup>当采取行动的时机来临时，他的船队依照当年罗伯特·吉斯卡尔确定的方案开始行动：都拉基乌姆被攻克，一支军队在此登陆；这支军队一直深入到萨罗尼卡，在王室船队的协助下攻克并洗劫了这座城市，船队一直在伯罗奔尼撒周边待命。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的陷落激起了希腊人的士气。<sup>22</sup>西西里人被证实无法控制萨罗尼卡，但他们的攻击加深了拜占庭人对西方人的憎恨。<sup>23</sup>当威廉的野心扩张到整个地中海时，他的成功无法持续下去。在这一点上，北意大利人表现得更为出色。

## 2

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是永远改变地中海政治版图的一系列政治灾难发生的时期，即使在这个时候，意大利靠海的几个共和国已利用这些变化越来越牢固地控制住了地中海的海路。1169年，耶路撒冷王阿莫里（Amaury）在估计形势时犯了严重错误，决定与曼努埃尔·科穆宁结盟，以攻击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曼努埃尔承诺提供一支强大的拜占庭船队，也就是说，当拜占庭人拥有足够意志力时，他们还能够派出一

支庞大的船队。阿莫里将召集法兰克人的军队，他们将一起进攻尼罗河三角洲和开罗。最后，一支法兰克军队确实抵达了开罗，但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企图遭到了民众的反对。法蒂玛王朝被推翻，但埃及并没有成为顺从的盟友，而是成了反对拉丁王国的中心。<sup>24</sup>不久之后，阿尤布王朝新即位的苏丹萨拉丁——他是一个库尔德人出身的逊尼派穆斯林——在争夺伊斯兰教第三神圣的城市的斗争中，看到一个可以使中东全体穆斯林联合起来反抗法兰克人的事业。萨拉丁把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合二为一，自此以后法兰克人的耶路撒冷王国便愈发岌岌可危，因为法兰克人无法继续使用其传统策略，即在叙利亚统治者和法蒂玛王朝间挑拨离间，以此取得平衡。萨拉丁于1187年在太巴列湖附近的哈丁角（Horns of Hattin）大败组织混乱的法兰克军队，此后便占领了耶路撒冷城和巴勒斯坦海岸沿线，包括港口大城阿克，唯有推罗得以幸免。

西方的反应是果断的，却没有达成既定目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于公元1189年发动，这次行军对海上力量依赖度很高：在马赛船只的运送下，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理查一世的军队取道西西里到达黎凡特。在西西里岛，他对当地事务的干预（主要因为他卑鄙地想拿回他妻子的嫁妆，而她曾嫁给已故国王威廉二世）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在墨西拿发生冲突并引发动乱。理查成功夺取了塞浦路斯，该岛当时处于科穆宁王朝一个谋反者的统治下；后来阿克也被收复了，他还同时收复了今天属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狭长海岸地带，但没能收复耶路撒冷。阿克街道上的意大利水手和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对海上支持的迫切需要迫使法兰克统治者不断向外国商人

赐下在阿克和推罗的商务特权：马赛、蒙彼利埃和巴塞罗那的商人都被赐予“绿色宫殿”作为他们基地，它是位于推罗的一处建筑；他们同时还被免除了关税。<sup>26</sup>

阿克拥有了多个主人，他们对自己拥有的权利寸步不让：在近港口处有威尼斯人和比萨人的自治社区，一大片热那亚社区夹在这两块飞地的后面。到公元13世纪中期，被围墙隔离出来的威尼斯人社区拥有了两座分别为圣马可和圣德米特里修建的教堂，还有一座为总督（*bailli*）修建的宫殿、一个蓄水池、一座底楼有十六间店铺的商栈、有三层楼的仓库，以及圣326 马可教堂的教士们的生活区。意大利人的社区极其拥挤，热那亚人可能拥有大约六十间房屋。<sup>27</sup>在不同的社区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圣萨巴斯战争（War of St Sabas, 1256 ~ 1261年）发端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间因居住区边界而发生的争吵，后来场面失控，热那亚人最终放弃了阿克。热那亚人将其大本营转移至推罗，而原来占据推罗的威尼斯人则进一步巩固了对阿克的占有。互为竞争对手的两个共和国把精力都放在了对头身上，似乎忽视了来自伊斯兰王国的长期性威胁，但在这一点上拉丁世界那些好斗的东方法兰克贵族表现得不比他们好。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也在阿克拥有很大的社区，他们对自己政治上的自治权十分坚持。<sup>28</sup>在刨除那些属于耶路撒冷牧首和其他领主的地盘后，阿克已经没有多少剩余土地可作为法兰克国王的财产，但是他拥有来自贸易税收的丰厚收入——即使有些商人有免税权，他们也须与那些须全额纳税的内陆商人做买卖，税率是很古怪的数字269/2400。中世纪的地中海统治者非常清楚，低额税收能刺激贸易，从而使他们能获得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收益。<sup>29</sup>

萨拉丁同他的法兰克竞争者一样，对意大利的来访者很热情。他们之所以如此宝贵，是因为他们可以创造财政收入，且在没人盯梢时还可提供军备。<sup>30</sup>埃及购入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产品，特别是来自伦巴第和佛兰德的精品布料。对于精品布料的需求并不仅仅产生自一种穿着奢侈服饰和（对于一个埃及人来说）带有异国情调的服饰的愿望。它们经常以最精细、最柔软的英格兰羊毛制作，以昂贵的东方靛蓝或西班牙格拉纳<sup>①</sup>染色。中东的产业正在走向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清楚；在伊斯兰化的地中海，城市化程度仍然很高，一些城市，如开罗、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大规模很大。但无论如何，意大利人明显抢占了先机。

比萨扮演是其他托斯卡纳贸易者的港口，这些人可以住在比萨的海外殖民区。只要他们向比萨的裁判官表示服从，并像比萨常住民那样缴纳税赋，他们便可被视为比萨人，可以享受地方统治者给予比萨人的各种豁免权。托斯卡纳内陆有一座专门向东方出售其产品的城市，即拥有许多塔楼的圣吉米尼亚诺（San Gimignano），它是番红花粉在西方的最大产地。番红花粉由番红花脆弱易碎的花蕊制成，是少有的在西方比东方生长得更好的香料。它被用来做染料、调味品和草药，其生产过程十分复杂，因此其价格极其昂贵。<sup>31</sup>来自圣吉米尼亚诺的人将该商品运至阿克，然后经穆斯林的领土将其带到阿勒颇（Aleppo）。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发动的商业革命开始把那些远离地中海的城镇的居民包括进来。佛罗伦萨也取得了成功；它的商人在兜售由其作坊完成最后工序的精美的法兰

327

① 格拉纳（grana）是一种类似于胭脂虫的红色染料。——译者注

西和佛兰德的纺织品，后来他们开始自己生产这些商品的高仿品。佛罗伦萨商人开始从他们与突尼斯、阿克和其他地方的贸易中获得大量黄金，这些贸易活动不仅有纺织物的出售，还包括以金换银的业务。到公元 1252 年，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都已经有了足够发行他们自己的金币的黄金贮备，这是查理大帝之后西欧（除了西西里岛、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最早的金币。<sup>32</sup>到 1300 年，佛罗伦萨的弗罗林（florin）散布在了地中海的每个角落，标志着意大利人的领先地位，以及“伟大的海”作为一个贸易圈不断加强的整合力。

### 3

比法蒂玛王朝的衰落更具戏剧性的是西西里王国的衰亡。当萨拉丁还能够维系旧的统治模式（包括实践获利甚巨的垄断）之时，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于公元 12 世纪 90 年代落入了贪婪的封建巨头之手，在地中海地区中部造成了极不稳定的局面。面对多数西西里封建巨头的强烈反对，德意志皇帝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亨利六世在比萨和热那亚船队的支持下入侵了西西里王国，他宣称自己因妻子（罗杰二世的遗腹女）而获得了西西里的继承权。<sup>33</sup>但他对西西里的占领只持续了三年，即从 1194 年到 1197 年，此间他一直在策划一次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战争。他死后，他的遗孀康斯坦丝（Constance）试图在其有生之年恢复西西里王国旧时的平衡，但是这个王国开始瓦解：穆斯林在西西里西部发动了起义，此地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都处于暴乱之中。在康斯坦丝去世之后，她年幼的儿子腓特烈成为巴勒莫各竞争派系手中的傀儡，居于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封建巨头和主教们利用这一机会，在没有受到任何激烈



反抗的情形下占领了王室领地。

对西西里水域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北意大利海盗的手中。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决定让皇帝亨利当年为和他们结盟而做出的慷慨承诺得到部分落实。热那亚人获得的承诺是可占领叙拉古，于是公元1204年，一个名为阿拉曼诺·达科斯塔（Alamanno da Costa）的热那亚海盗以叙拉古伯爵的身份占领了叙拉古。比萨的船只在西西里海域经常受到热那亚海盗的攻击，而热那亚海盗的举动得到了热那亚城市公社的许可。<sup>34</sup>与此同时，阿拉曼诺的朋友热那亚人恩里克·佩斯卡托勒（Enrico Pescatore，绰号“渔夫”）自立为马耳他伯爵。马耳他伯爵亨利<sup>①</sup>是公海水域上最危险的私掠者之一，他有自己的小型船队和狂妄的野心。1205年，他派了两艘单桅大帆船及三百名热那亚和马耳他水手袭击了希腊水域，在那里，他们扣押了两艘向君士坦丁堡航行的威尼斯商船，船上满载着钱币、武器和两百大捆欧洲布料。他们在制造了一起国际性事故之后，一直深入至黎巴嫩的黎波里，包围了这座城市，迫使基督教的伯爵与之议和，承诺给予热那亚人贸易特权，以回报他们在反击叙利亚穆斯林时提供的帮助。<sup>35</sup>亨利的成功被他的随从、伟大的吟游诗人皮埃尔·维达尔（Peire Vidal）写成了韵体诗：

他是那么慷慨、勇敢，且有骑士风度，他是热那亚人之星，他使海上和陆上所有的敌人闻风丧胆……我亲爱的孩子亨利伯爵摧毁了他的所有敌人，他是他朋友们的保护

---

① 即恩里克。——译者注

者，不管何人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他都会毅然前往，毫无畏惧。<sup>36</sup>

于是，即使这些热那亚海盗追求实现其私人野心，但他们同时也在尝试为母邦谋取利益，而只要他们被认为是在为共和国的利益而劳作，其母邦城市似乎就不会放弃他们。

329 随着另一个地中海强大海上势力的衰落，亨利的下一次冒险以征服克里特为目标。在曼努埃尔·科穆宁一世于公元1180年逝世之后，因继承人问题而发生的争斗消耗了拜占庭贵族的政治能量；一支突厥人于四年前在小亚细亚的密列奥塞法隆（Myriokephalon）取得的伟大军事胜利——曼努埃尔在这次战役中侥幸逃命——使政治能量进一步流失。<sup>37</sup>意大利海盗在爱琴海得以建立他们的基地；科孚岛落入一个热那亚海盗之手，现在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袭击那些驶出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船只了。<sup>38</sup>因比萨和热那亚市民于1182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历了大屠杀（关于这次屠杀，前文已经提到），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渴望向希腊人寻仇。<sup>39</sup>最恶劣的一次复仇行动是由热那亚海盗古列尔莫·格拉索（Guglielmo Grasso）实施的，他和一个名叫福蒂斯（Fortis）的比萨海盗联起手来。他们在1187年毫无顾忌地袭击了罗得岛，然后袭击了一艘萨拉丁派往拜访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杰洛斯（Isaac Angelos）的威尼斯船只，船上除了有萨拉丁的外交使节外，还装载着野兽、优质木材、贵金属，以及作为苏丹之特别礼物的“真十字架”。海盗们杀死了船上的很多人，只留下了一些比萨的和热那亚的商人，福蒂斯还占有了这片“真十字架”圣物，他带着这片圣物穿越地中海到达科西嘉南部被岩石包围的博尼法乔（Bonifacio），这

个城市后来被他的比萨随从占领。热那亚人坚信，他们更有权保存这片“真十字架”，所以攻击了博尼法乔城，占有这片圣物和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后来成为比萨人在撒丁岛北部从事商业活动的据点。<sup>40</sup>西方对这次对萨拉丁使节船的袭击并无反对的声音，因为这艘船的行程可视为拜占庭人和阿尤布王朝结盟对付耶路撒冷王国的证据。

拜占庭在各方面都被重重危机困扰。在欧洲东南部，拜占庭势力受到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军事领主们的挑战。已失去皇权的科穆宁家族的成员在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Trebizond）和塞浦路斯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拜占庭早在其被征服之前就已经分裂了。当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在公元1202年开始策划时，其原定目标是萨拉丁的经济活动基地亚历山大。如果能够攻克亚历山大，就可用它来交换耶路撒冷王国那些陷落的城市，或者把它作为以后摧毁阿尤布王朝势力的基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被讲述了许多次：十字军从威尼斯人那里租用船只；他们不能付清威尼斯人向他们索要的费用，威尼斯人于是督促他们帮助自己攻击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扎拉城 [Zara, 即扎达尔 (Zadar)] 以偿付部分费用；十字军人因此答应开向君士坦丁堡，希望能将自己的保护对象阿列克修斯·安杰洛斯 (Alexios Angelos) 重新推上拜占庭的皇位；十字军内部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与威尼斯人以及希腊人的关系，在1203年因希腊人对阿列克修斯敌意的增长而更为恶化；阿列克修斯四世被推翻，十字军的回应是立即开始攻击君士坦丁堡；然后在1204年4月，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被翻越，曾被认为无法攻克的君士坦丁堡被攻克，洗劫在城内持续了好几天。<sup>41</sup>威尼斯人以镶满珠宝的圣器、水晶制作的圣

水壶、镀金及镶嵌珉琅的圣书封面、圣者的遗骨和其他从拜占庭皇宫和教堂中掠夺的价值不菲的宝物丰富了圣马可大教堂的宝库。多数物件仍然被保存在圣马可大教堂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从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运走的活灵活现的铜铸马匹。圣马可所在的威尼斯现在是新的君士坦丁堡，也是新的亚历山大。<sup>42</sup>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最为明显的受惠者是威尼斯人，他们控制了拜占庭的贸易路线，并能够随意排挤他们的竞争对手。帝国被分割了：萨洛尼卡和克里特岛的治理权被赐予一位十字军首领，即意大利西北部的贵族蒙菲拉的卜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冠则被交予佛兰德伯爵鲍德温（Baldwin）。希腊的王公们仍然驻留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和巴尔干半岛西部的伊庇鲁斯。皇帝鲍德温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以极有限的资源与保加利亚人对抗。希腊人的流亡政府顽强地收复了拜占庭的腹地，而君士坦丁堡贫弱不堪的拉丁帝国最后被尼西亚的统治者米哈伊尔·巴列奥略（Michael Palaiologos）灭亡，他于公元1261年光复了君士坦丁堡。<sup>43</sup>威尼斯宣称它自己是“罗曼尼亚（即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领土的领主”。当与皇帝鲍德温一样承担着沉重压力的卜尼法斯决定将克里特岛以一千银马克的价格卖给威尼斯人时，威尼斯人的份额至少在理论上增长了。卜尼法斯并没有在事实上控制这个岛屿，于是威尼斯人就得发兵占领它。威尼斯人希望如此行动的绝妙理由是，此岛是通往东地中海的航线上的交通枢纽，而且威尼斯商人们早就知晓，它是谷物、油和酒的重要来源地。

在威尼斯人开始行动之前，马耳他伯爵亨利向克里特发起了一次雄心勃勃的海上攻击，试图使自己成为该岛的国王；而

热那亚人在瓜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的活动中被排除在外，他们于是在亨利背后助推。公元 1206 年，亨利占领了干地亚（伊拉克利翁）和克里特的十四处堡垒。他大胆地派出一位使节去见当时的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要求教宗封自己为克里特王，但遭到反对。热那亚人曾经假装他们并没有卷入亨利的计划，但于 1208 年开始直接表示对此事的兴趣，以船只、人员和食品援助亨利，不久以后，他们就获得了可在该岛的城镇中建立商栈、面包房、浴池和教堂的许诺。在其行动缓慢开始之后，威尼斯人组织了武装人员反击热那亚人；一位蒂耶波洛（Tiepolo）家族的成员被指定为克里特公爵，这个位子上的人将经常充当威尼斯总督的副手。热那亚人无意同威尼斯人进行长期战争，于 1212 年同威尼斯人签署了一项和约，但在六年后热那亚的马耳他伯爵和叙拉古伯爵才镇压了海盗。<sup>44</sup>此后，亨利乐此不疲地在西西里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 1220 年起）腓特烈麾下效力，成了他的海军司令，偷猎者居然成了狩猎场的看护者。

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短暂冲突的重要性。它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抗；他们已经成为前往阿克城的海路上的竞争对手，且如前所述，在公元 1256 ~ 1261 年，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热那亚人深恨威尼斯人控制了前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于是当米哈伊尔·巴列奥略在 1261 年收复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毫不出人意料地为其提供了海上支持，且获得了相当优惠的条件作为回报。但是 1212 年以后，克里特岛落在了威尼斯人手中，威尼斯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一群不太喜欢共和国的希腊人的主子（在 1363 年克里特岛发生了一次针对共和国的暴乱）。此外，威尼斯人巩固了他们在东地

中海的补给线；希腊人和威尼斯人逐渐学会了合作，一种混合的文化在岛上发展起来，威尼斯人与克里特人通婚，甚至天主教和正教基督徒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了。<sup>45</sup>

#### 4

382 尽管在克里特岛上发生着地域内的交融，但意大利城市公社在东拉丁或者跨地中海的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难以估计。一些绘图抄本曾经被鉴定出自公元 13 世纪的耶路撒冷王国，这证明那些生活在东方的艺术家与那些在托斯卡纳和西西里工作的人一样借鉴了拜占庭的图画风格。君士坦丁堡于 1204 年的陷落使更多的拜占庭元素注入西方，强化了拜占庭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并为热衷于古典文献研究的威尼斯人创建了一种学习途径。<sup>46</sup>伊斯兰元素也具有装饰性的意义，被用在威尼斯和南意大利的建筑上，但当地人对产生这种艺术的文化不太有兴趣。对于东方文化的兴趣主要是实用性的。在 12 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有一两个比萨的译员，他们除了完成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将往来于西欧与君士坦丁堡的官方信件翻译成拉丁文或者从拉丁文译成希腊文——外还试图翻译希腊的哲学著作。比萨人雅各布在 1194 年曾经为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杰洛斯担任译员。<sup>47</sup>比萨人威廉的儿子麦蒙——他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混血身份——曾经在与北非的阿尔莫哈德王朝谈判中提供帮助。比萨人的文书用阿拉伯文字与阿尔莫哈德人通信。他们甚至还向北非学习一些有用的会计知识。比萨商人列奥纳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一度在布日伊居住，他在 13 世纪初写的一篇著名的论文谈到了阿拉伯数字。<sup>48</sup>但是文书们本能的保守性使他们仍用拉丁数字进行统计，统计工作因此仍然是令

人厌倦的任务。

经由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很可能已经传播了许多不同派别的思想，它们将在公元 1209 年之后的数十年内在南法兰西引发重要变化。11 世纪，拜占庭皇帝们对鲍格米勒派（Bogomil）的异端积极地进行了镇压，这派异端传播了一种二元论的宇宙观，在此观念下善神的精神王国正在同掌控肉体世界的撒旦进行战斗。历史学家们提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期间经过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或者来自比萨和其他地方的意大利商人与鲍格米勒派建立了联系，并将他们的信仰带往欧洲，然后它们再发展成为 12 世纪朗格多克的清洁派（Cathars）异端邪说。<sup>49</sup>人们一般认为意大利的观点更为温和，可能受到了巴尔干的异端派别的影响，这些异端派别的信徒带着他们的思想经由杜布罗夫尼克及它的邻近城市越过了亚得里亚海。然而很难论证这种异端思想是沿海路传到西欧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在海港城市生根：蒙彼利埃是一个重要的地中海贸易中心，但一般观点认为那里没有异端派别，在热那亚人中也很难找到清洁派的信徒。在热那亚和威尼斯，清洁派信徒很少出现。热那亚人忙于挣钱，沉溺于属于肉体的凡俗世界，正如他们所自称的“吾等热那亚人乃商人矣”。

333

## 注 释

1. Ibn Jubayr, *The Travels of ibn Jubayr*, trans. R. Broadhurst (London, 1952), p. 338; D. Abulafia, *The Two Italies: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d the Northern Communes* (Cambridge, 1977), pp. 116-19.

2. D. Abulafia, '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Roger II and his successors', *Dumbarton Oaks Papers*, vol. 37 (1981), p. 12;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i.
3. H. Wieruszowski, 'Roger of Sicily, *Rex-Tyrannus*, in twelf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Speculum*, vol. 38 (1963), pp. 46-78, repr. in H. Wieruszowski,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Spain and Italy* (Rome, 1971).
4. Niketas Choniates, cited in Abulafia, *Two Italies*, p. 81.
5. D. Nicol, *Byzantium and Venice: a Study in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88), p. 87.
6. D. Abulafia, 'The Norman Kingdom of Africa and the Norman expeditions to Majorca and the Muslim Mediterranean', *Anglo-Norman Studies*, vol. 7 (1985), pp. 26-41,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xii.
7. Ibn al-Athir, in *ibid.*, p. 34.
8. Abulafia, 'Norman Kingdom of Africa', pp. 36-8.
9. C. Dalli, *Malta: the Medieval Millennium* (Malta, 2006), pp. 66-79.
10. C. Stanton, 'Norman naval power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Ph.D. the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8).
11. L.-R. Ménager, *Amiratus-'Aunpāc: l'Émirat et les origines de l'Amirauté* (Paris, 1960); L. Mott, *Sea Power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the Catalan-Aragonese Fleet in the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Gainesville, FL, 2003), pp. 59-60.
12. Abulafia, 'Norman Kingdom of Africa', pp. 41-3.
13. Caffaro, in Abulafia, *Two Italies*, p. 97.
14. Cf. G. Day, *Genoa's Response to Byzantium, 1155-1204: 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Medieval City* (Urbana, IL, 1988).
15.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90-98.
16. M. Mazzaoui, *The Italian Cotton Indus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100-1600* (Cambridge, 1981).
17. Abulafia, *Two Italies*, p. 218; Dalli, *Malta*, p. 84.
18. See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255-6, 283-4; D. Abulafia, 'Southern Italy, Sicily and Sardinia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economy', in 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Aldershot, 1993), essay i, pp. 1-32; colonial economy: H. Bresc, *Un monde méditerranéen: économie et société en Sicile, 1300-1450*, 2 vols. (Rome and Palermo, 1986); another view in S. R. Epstein, *An Island for Itsel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Sicily* (Cambridge, 1992).
19. D. Abulafia, 'Dalmatian Ragusa and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54 (1976), pp. 412-28,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x.
20. C. M. 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1180-1204* (Cambridge, MA, 1968), pp. 41-2, 195-6.
21. *Ibid.*, p.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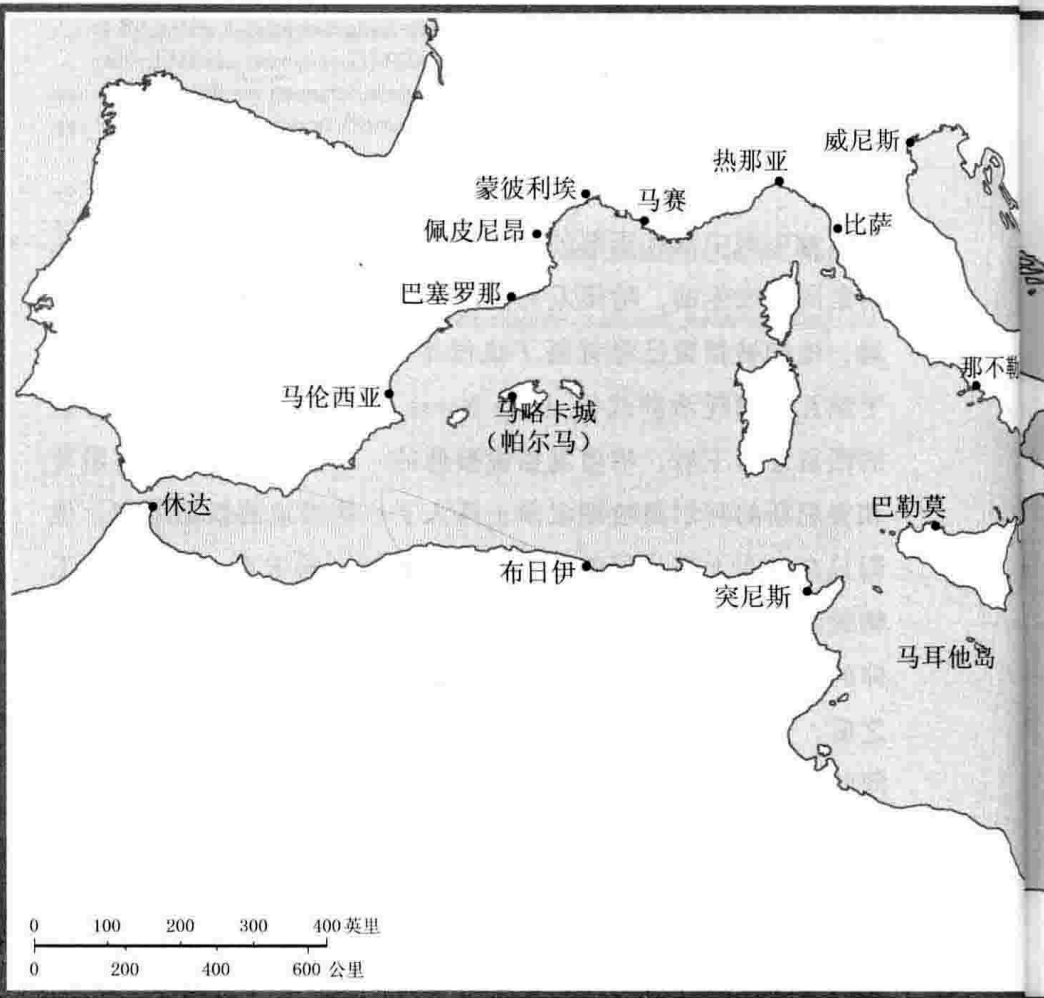
22. 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 *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ki*, ed. and trans. J. R. Melville-Jones (Canberra, 1988).
23. 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 175.
24. G. Schlumberger, *Les campagnes du roi Amaury I<sup>er</sup> de Jérusalem en Égypte au XII<sup>e</sup> siècle* (Paris, 1906).
25. E. Sivan, *L'Islam et la Croisade: idéologie et propagande dans les réactions musulmanes aux Croisades* (Paris, 1968).
26. D. Abulafia, 'Marseilles, Acre and the Mediterranean 1200-1291', in *Coinage in the Latin East: the Fourth Oxford Symposium on Coinage and Monetary History*, ed. P. Edbury and D. M. Metcalf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Oxford, 1980), p. 20,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xv.
27. J. Prawer, *Crusader Institutions* (Oxford, 1980), pp. 230-37, 241.
28. R. C. Smail, *The Crusader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Ancient Peoples and Places, London, 1973), pp. 74-5 (with map); M. Benvenisti, *The Crusader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1970), pp. 97-102; Prawer, *Crusader Institutions*, pp. 229-41; P. Pierotti, *Pisa e Accon: l'insediamento pisano nella città crociata. Il porto. Il fondaco* (Pisa, 1987).
29. J. Riley-Smith, 'Government in Latin Syria and the commercial privileges of foreign merchants', in *Relat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iddle Ages*, ed. D. Baker (Edinburgh, 1973), pp. 109-32.
30. C. Cahen, *Orient et occident au temps des croisades* (Paris, 1983), p. 139.
31. D. Abulafia, 'Crocuses and crusaders: San Gimignano, Pisa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in *Outrem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ing Kingdom of Jerusalem Presented to Joshua Prawer*, ed. R. C. Smail, H. E. Mayer and B. Z. Kedar (Jerusalem, 1982), pp. 227-43, repr. in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xiv.
32. D. Abulafia, 'Maometto e Carlo Magno: le due aree monetarie dell'oro e dell'argento', *Economia Naturale, Economia Monetaria*, ed. R. Romano and U. Tucci, *Storia d'Italia, Annali*, vol. 6 (Turin, 1983), pp. 223-70.
33. Abulafia, *Two Italies*, pp. 172-3, 190-92.
34. D. Abulafia, 'Henry count of Malta and his Mediterranean activities: 1203-1230', in *Medieval Malta: Studies on Malta before the Knights*, ed. A. Luttrell (London, 1975), p. 111, repr. in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iii.
35. *Ibid.*, pp. 112-13.
36. Cited in *ibid.*, pp. 113-14, nn. 43, 46.
37. 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 16.
38. Abulafia, 'Henry count of Malta', p. 106.
39. 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 209.
40. *Ibid.*, pp. 210-11; Abulafia, 'Henry count of Malta', p. 108.
41. J. Phillips, *The Fourth Crusade and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2004); J. Godfrey, *1204: the Unholy Crusade* (Oxford, 1980); D. Queller and T. Madden, *The Fourth Crusade: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2<sup>nd</sup> edn,

- Philadelphia, PA, 1997).
42. D. Howard, *Venice and the East: the Impact of the Islamic World on Venetian Architecture 1100-1500* (New Haven, CT, 2000), pp. 103, 108.
  43. J. Longnon, *L'Empire latin de Constantinople et la principauté de Morée* (Paris, 1949); D. Nicol, *The Despotate of Epiros* (Oxford, 1957); M. Angold, *A Byzantine Government in Exil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under the Laskarids of Nicaea (1204-1261)* (Oxford, 1975).
  44. Abulafia, 'Henry count of Malta', pp. 115-19.
  45. S. McKee, *Uncommon Dominion: 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 (Philadelphia, PA, 2000).
  46. Howard, *Venice and the East*, p. 93.
  47. Brand, *Byzantium Confronts the West*, p. 213.
  48. *Leonardo Fibonacci: il tempo, le opere, l'eredità scientifica*, ed. M. Morelli and M. Tangheroni (Pisa, 1994).
  49. C. Thouzellier, *Hérésie et hérétiques: vaudois, cathares, patarins, albigeois* (Paris, 1969).

## 七 商人、雇佣军和传教者 (1220 ~ 1300 年)

### 1

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的帝国衰落与西端阿尔莫哈德势力的瓦解是同步发生的。哈里发对极端的阿尔莫哈德派教义失去了热情，他们被指责已经背叛了该派本来的宗旨。在公元 1212 年于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 (Las Navas de Tolosa) 中败给基督教的西班牙诸王后，哈里发据说被他的一个奴隶勒死了。西班牙和突尼斯的阿尔莫哈德派领土落入了一些当地的新王手中，他们只在口头上遵从阿尔莫哈德派的宗旨。哈夫斯 (Hafsid) 王朝的统治者获得了突尼斯的控制权，自称阿尔莫哈德派信仰的继承者。柏柏尔人的马林王朝 (Marinids) 经过长期斗争之后，于 13 世纪中期在摩洛哥摧毁了阿尔莫哈德国家。与此同时，那斯里德 (Nasrid) 王朝于格拉纳达奠基，该王朝在此地的统治一直维系到了 1492 年。它严格遵循逊尼派伊斯兰教教义，而不是阿尔莫哈德派伊斯兰教教义。13 世纪也见证了西地中海基督教世界的重大转变：比萨与热那亚对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周围海域控制权的争夺于 1284 年告终，结果是比萨人在梅洛里亚海战 (Battle of Meloria) 中失去了有丰富铁矿资源的厄尔巴岛。<sup>1</sup> 尽管比萨人并没有失去对他们统治下的撒丁岛的控制，甚至收回了厄尔巴岛，但这时比萨和热那亚都有了一个新对手，该对手不是航海共和国，而是获得阿拉贡国王和加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0 200 400 600 公里



泰罗尼亚伯爵征服者詹姆斯一世（James I “the Conqueror”）支持的以巴塞罗那为首的城市群体。

385 公元 13 世纪之前，阿拉贡诸王对于地中海责任的诉求并不明显。这些领主在 1118 年才击溃萨拉戈萨的埃米尔王国，统治着面积不大的山地王国，将主要精力浪费在了对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和纳瓦拉（Navarre）王国事务的干预中。但是，在 1134 年，阿拉贡的“斗士”阿方索一世去世，未能留下继承人；他的兄弟是一位修士，为了生育后代被迫还俗，之后生了一个女儿，把她嫁给巴塞罗那伯爵。巴塞罗那伯爵的领地和阿拉贡王国因此在 12 世纪中期合为一体，但这种联合是出于个人原因的联合，受制于统治者。巴塞罗那伯爵在加泰罗尼亚依然是伯爵（名义上处于法兰西国王的宗主权之下）；在高原上的阿拉贡，他才是一位国王。此外，巴塞罗那伯爵还被加泰罗尼亚的地方纷争分去了精力，在该地区他充其量是地位平等的众贵族中的第一人。伯爵的视野没有超出加泰罗尼亚，但他在比利牛斯山外的朗格多克和鲁西永（Roussillon）有许多同盟者和附庸。1209 年，阿拉贡 - 加泰罗尼亚的伯爵 - 国王（他时常被如此称呼）被卷入了法国南部的事件，被迫加入了教宗召集的反清洁派异端的十字军，即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尽管他南法的封臣们都被指控为在保护异端人群，或者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异端，伯爵 - 国王彼得二世（Peter II）将自己的领主义务置于首位，出头帮助这些诸侯对抗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统帅的北法兰西的军队。彼得在 1213 年图卢兹（Toulouse）附近的米雷（Muret）战役中被杀，于蒙彼利埃留下了年轻的继承人詹姆斯。这些事件进一步动摇了加泰罗尼亚的地位。<sup>2</sup>

在图德拉的便雅悯生活的时期，巴塞罗那仍然是“一个美丽的小城”，但便雅悯坚持认为在公元1160年前后，来自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地的商人都到访过此地。<sup>3</sup> 这是该城市的低谷期，然而，如果说11世纪时地中海沿岸还有一个似乎将变得繁荣的城市，那就是巴塞罗那了。<sup>4</sup> 在精力充沛且好战的伯爵的统治下，这些领主乐于威胁那些分散于西班牙南部的伊斯兰国家，并对它们发动攻击。巴塞罗那因此得到丰厚的贡赋，大量黄金被注入其经济发展中，激励如里卡特·吉列姆（Ricart Guillem）的成功商人投资巴塞罗那西部 [靠近当代的兰布拉（Ramblas）] 的葡萄园、果园和其他产业。里卡特是一个城堡主的儿子，是巴塞罗那的新兴之星。1090年，他反击了制造混乱的雇佣兵埃尔·熙德（El Cid）并旅行至穆斯林统治下的萨拉戈萨做以银换金的交易。但是巴塞罗那的第一次繁荣是短暂的，紧随而来的是漫长的寒冬期；自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在西班牙南部建立后，巴塞罗那的贡赋来源于11世纪末就枯竭了。<sup>5</sup> 然后随着热那亚和比萨崛起，巴塞罗那被边缘化，因为它略为偏离那些往来于理想避风港（如休达和布日伊）的意大利船只的航线：这些船想行至马略卡岛和伊维萨岛，并与伊比利亚海岸的德尼亚建立联系，德尼亚位于巴伦西亚的南面。巴塞罗那并没有良港，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优良港口是现代建成的。加泰罗尼亚军队于1148年攻击托尔托萨（Tortosa）时，仍然需要依靠热那亚海军的帮助。但加泰罗尼亚人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小型船队，在巴塞罗那的雷戈米尔门（Regomir Gate）附近修建了一处造船厂；此地是巴塞罗那南方的门户，一条道路从大教堂一直延伸到海边（该地现在位于哥特区的南端）。<sup>6</sup> 巴塞罗那也是一座首府城市，伯爵-国王的宫殿位于

336

337

该城的东北部。巴塞罗那尽管发展了一个设计合理的政权体系，但从来都不是自由的共和国，城市的长老们并不享有比萨人和热那亚人拥有的那种决策自由。<sup>7</sup>但是这也是巴塞罗那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在13世纪，城内的贵族们和伯爵-国王的利益出现交叉。他们都开始关注海外贸易和穿越地中海从事海上征伐可带来的利益。

## 2

388

在詹姆斯一世没待在其母亲的城市蒙彼利埃的多数时间中，加泰罗尼亚的大领主们内部争斗不断；即使如此，王室的权力也并没有被完全削弱，因为詹姆斯的支持者中有如鲁西永伯爵那样的显贵人物，鲁西永伯爵认为保护王室的权威有助于强化他自己的地位。到公元12世纪20年代，这位年轻的国王建功立业，渴望成为十字军英雄。他重启了征服穆斯林统治下的马略卡的长期计划，他的先祖拉蒙·贝伦格尔三世（Ramon Berenguer III）曾经于1114年在比萨船队的支持下短暂占有过这座岛屿。但这一次，他试图用一支由自己的臣属们的船只构成的船队去攻击马略卡。的确，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马略卡岛稳稳地站住了脚，在那里他们经营了贸易商站，因此并不赞同詹姆斯野心勃勃的计划。<sup>8</sup>詹姆斯于是在塔拉戈纳设宴，以向他的臣属们请教，显赫的船主佩雷·马特利（Pere Martell）赞助了这次宴会，他认为此项事业是正义且有利可图的：

因此，您看，我们认为阁下征服那个岛的理由有两个：首先，你和我将因此扩张我们的权力；其次，那些听到这一征服消息的人会认为，阁下能攻取上帝乐于置于此



的土地和海上王国一事是一个神迹。<sup>9</sup>

从此以后，国王和商人在利益上很明显达成了一致。

除了加泰罗尼亚的船只，詹姆斯还可以依赖马赛的资源，因为普罗旺斯的伯爵们都是巴塞罗那王室的姻亲。公元1229年5月，詹姆斯集合了一百五十艘大船，以及许多较小的船只。他宣称：“这支船队如此庞大，海上似乎布满了白色的船帆。”<sup>10</sup>在一段颇为艰难的航行之后，加泰罗尼亚人和他们的同盟登陆并在年末攻下了马略卡岛的首府城市梅地纳-马约卡 [Madina Mayurqa，加泰罗尼亚人称之为 Ciutat de Mallorca，即马略卡城 (Ciutat de Mallorca)，它是现代的帕尔马]。加泰罗尼亚诸城，以及马赛和蒙彼利埃获得了马略卡城中的一些产业和城外的一些土地，这是对它们援助的回报。国王詹姆斯感觉到了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不满，于是赐予意大利商人在马略卡岛的贸易特权，尽管他们曾经反对国王的伟大事业。这些行动为马略卡城的商业扩张奠定了基础。但是，国王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征服其他岛屿。1231年，在詹姆斯虚张声势的恐吓下，梅诺卡岛投降了：他在马略卡岛东部可以看到梅诺卡岛的地方集结了他的军队，到了晚上，他命每位战士举起两个火把，于是当梅诺卡岛上的穆斯林远远看到火把时，他们以为有一大支军队在准备攻击他们，于是送上了表示臣服的文书。为了保证他们的自治和对伊斯兰教教仪的践行，他们每年都向詹姆斯纳贡。<sup>11</sup>1235年，一支得到国王许可的、由塔拉戈纳大主教组织的私人征伐队攻克了伊维萨岛。

339

正如攻克伊维萨岛这件事所体现的，詹姆斯很少从这些岛屿的事务中直接获利。他高兴地将马略卡的行政管辖权授予伊

比利亚亲王葡萄牙的佩德罗（Pedro of Portugal），以换取佩德罗拥有所有权的比利牛斯的战略要地。詹姆斯还是更关注陆地安全而非海上安全。但是他征伐马略卡的一个后果是，巴利阿里群岛突然成为基督教海军的前沿阵地。詹姆斯在自传中写下了自己的功绩，以庆祝自己的胜利，这是这类由中世纪国王写下并留存至今的著作中的第一部。该书以加泰罗尼亚语写成，商人和征服者们越过地中海，沿着西班牙海岸南下，把这种语言带到了马略卡，后来当詹姆斯于公元 1238 年征服巴伦西亚时，它又被带入了另一片基督徒的属地。詹姆斯在晚年时身边还有两个儿子，他认为应将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授予长子彼得，但同时创建了一个扩大的马略卡王国，传给了小儿子詹姆斯。这个新的王国的存在时间从 1276 年一直持续到 1343 年，其领土包括詹姆斯所占有的比利牛斯山外法兰西一侧的富庶土地——鲁西永、塞尔达涅（Cerdagne）和蒙彼利埃，其中蒙彼利埃是联系地中海和北法兰西的重要贸易中心。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创建了一个依赖海洋生活的王国。

他在征服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该如何对待穆斯林民众。詹姆斯将穆斯林视为一种经济资产。在马略卡岛，许多穆斯林以土地为生，臣服于基督教的领主。穆斯林团体慢慢瓦解，有些人移民了，另一些人改信基督教。这块土地并没有因此被空置：基督徒从加泰罗尼亚或者普罗旺斯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定居，岛上的人口成分很快发生了变化，于是到公元 1300 年，穆斯林已经是被基督徒包围的少数群体。<sup>12</sup>而在巴伦西亚，国王试图使自己成为统治伊斯兰王国的基督徒国王；尽管巴伦西亚城市的核心部分很少有穆斯林，但穆斯林在郊区繁荣发展，在巴伦西亚旧伊斯兰王国的穆斯林社区内，人们被允许践行他

们自己的法律和宗教，他们甚至可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移居他们的小城镇和农村（如在梅诺卡发生的那样）。这些小村镇是重要的生产中心，通常专门生产那些在早期穆斯林征服活动中被阿拉伯人运到西方的农作物和手工艺品，陶器、谷物（包括稻米）、干果和精细布料都是可能的产品；而且，通过向内陆贸易或跨地中海的贸易收税，国王和贵族领主获得了大量收入。<sup>13</sup>从穆斯林签订的投降协议中有时很难看出穆斯林是被打败的一方；这些条款读起来更像是双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和约。<sup>14</sup>但是看来是维持稳定的好方式，至少在巴伦西亚的穆斯林起义、13世纪60年代的粗暴迫害条款制定之前是这样的。王室的宽容是真实的，但也是有条件的、易变的。

詹姆斯在犹太人那里看到了特殊的潜质，即使巴塞罗那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团体对海上贸易并没有特殊兴趣（与传统看法不同，他们也不热衷于放贷）。<sup>15</sup>他从加泰罗尼亚、普罗旺斯和北非请来了犹太人，使之于马略卡定居。他特别关注来自西吉尔马萨（Sijilmasa）的一个犹太人，西吉尔马萨是撒哈拉沙漠北部边缘的小镇，在这里许多骆驼商队从尼日尔河河湾处运来黄金。这个犹太人就是所罗门·本·阿马尔（Solomon ben Ammar），他在公元1240年前后的商业和金融领域甚为活跃，在马略卡城有自己的产业。这样一个人物很容易进入北非的市场，将马略卡变成连接加泰罗尼亚和属于伊斯兰世界的地中海部分地区的桥梁。所罗门和其他很多西班牙犹太人一样，能够熟练地使用阿拉伯语。因此，以下情形的出现并非巧合：在下一个世纪，来自马略卡的犹太人和由犹太教改宗而来的基督徒开始了地图的制作，利用穆斯林和基督徒编写的资料中的准确的地理学知识，制作了著名的波托兰海图（portolan charts），这幅地图描绘

地中海沿岸和远海情况的细致程度至今仍然令世人震惊。<sup>16</sup>

841 在西班牙，三种始于亚伯拉罕的宗教信仰间的碰撞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托莱多（Toledo），即卡斯蒂利亚的腹地，国王阿方索十世赞助了翻译阿拉伯语文献（包括被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文著作）的活动，其中很多翻译都是犹太人。而在地中海沿岸，这类活动受到了更多限制。在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的脑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现实问题，即如何在巴伦西亚和他统治的其他地区保持对桀骜不驯的穆斯林民众的控制。另一个是宗教问题，即是否应向且该如何向他的犹太和穆斯林臣民提供皈依基督教的机会。由于他从这些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中征收的赋税使他获利甚丰，他同南地中海沿岸的早期穆斯林征服者一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太多改宗者会影响他的税收基础。因此，尽管他坚持要求他的犹太臣民去会堂听托钵修士的布道，但也因犹太人更愿意向他交一笔特别税款以免于按照他的要求行事而窃喜。然而他还是公开表明了对托钵修士的支持。多明我会的总会长拉蒙·德佩尼亚福特（Ramon de Penyafort）总是把在加泰罗尼亚的犹太人社群和北非的穆斯林社群中传播基督教的福音置于首位。他的一个成就就是创建了语言学校，在那里传教士可以通过学习熟练使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他们还可研习《塔木德》（*Talmud*）和《圣训》（*hadith*），这使他们能够站在相反立场与拉比和伊玛目们就其教义进行辩论。<sup>17</sup>公元1263年，国王詹姆斯在巴塞罗那主持了一次公开的辩论会。会上，来自希罗纳（Girona）的著名拉比纳玛尼德（Nahmanides）和从犹太教改宗的基督徒保罗激烈地讨论了弥赛亚会不会到来的问题。双方都声称他们赢得了辩论，但是纳玛尼德知道自己现在树大招风，必须离开加泰罗

尼亚。于是，他逃到了阿克。在逃亡途中，他在海滩上丢失了自己的印章指环。这枚指环在当代出土，目前正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展出。<sup>18</sup>

不同信仰人群之间日常接触的内容可从一份客观的二手报告中看到，报告的内容是一个犹太人和著名的热那亚商人英盖托·康达尔多（Ingheto Contardo）之间的争论，它于公元 1286 年发生于马略卡的热那亚商栈。当地一位拉比常去热那亚人生活区的长廊同他的热那亚人朋友辩论。康达尔多并不把这位拉比视为敌人，而是视他为需要启蒙、救赎的朋友。他说如果他发现一个犹太人在寒冷的天气挨冻，他会乐意放倒一个木制十字架，将其劈成碎片，以供犹太人烧火取暖。<sup>19</sup>犹太人嘲笑康达尔多，问他：如果弥赛亚已经来了，为什么世界还有战争？为什么你们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打得那么激烈？这些年的激烈冲突也提供了一个背景，让我们尝试了解一位极富领袖魅力的人的职业生涯。此人是往返于地中海两端、知晓基督教和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的卡巴拉派人物（kabbalist）亚伯拉罕·本·萨缪尔·阿布拉菲亚（Abraham ben Samuel Abulafia），他于希伯来纪年 5000 年（公元 1239 ~ 1240 年）生于萨拉戈萨。<sup>20</sup>阿布拉菲亚坚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弥赛亚是否将在教宗面前显露身份的主题，我们在前文描述 1263 年的巴塞罗那辩论时已经提到过。阿布拉菲亚从地中海的一端旅行至另一端。他从南意大利出发，试图于 1260 年深入阿克。但是他准备经圣地耶路撒冷去传说中以色列人丢失的十二支派<sup>①</sup>居住的神秘的撒姆巴提

342

① 原文如此。在以色列王国灭亡后，以色列民族消失的支派为十个。——译者注

翁（Sambatyon）流域时，被法兰克人、穆斯林和蒙古人之间的战争阻隔了。阿布拉菲亚回到了巴塞罗那，但又不肯就此安分，于1270年再度出发，在希腊的佩特雷（Patras）和底比斯传播自己信奉的教义，激起了南意大利的特拉尼（Trani）犹太人的愤怒，然后他前往教廷，计划在那里进行自己有关弥赛亚即将到来的布道宣传，在做以上工作的同时他还在撰写一本充满呓语和幻想的书。他的作品阐述了一种使人狂喜入神的独特的卡巴拉派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他坚信希伯来文字经精心组合后可向人提供一条通往上帝的精神之路。他认为自己可以展示，一个专注思考上帝的灵魂将如何脱离肉身，目睹上帝的无上荣光。幸运的是，在阿布拉菲亚即将演示自己观点的几天前，教宗离世。他（在他身陷囹圄一个月后，此时他只成功地把捕获他的方济各派修士弄得无所适从），又回到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被他的忠实追随者们簇拥。他最后于1291年出现于马耳他和戈佐岛之间的科米诺岛（Comino）上，生活在这片水域在当时十分危险。

阿布拉菲亚的经历说明了激进的宗教思想是如何通过旅行被改革者本人或其追随者传播到整个地中海的。他的生涯也表明，接近上帝的方法是如何在天启宗教的神秘主义信徒中交流和分享的。一个多产的加泰罗尼亚作家和传道者拉蒙·鲁尔（Ramon Llull，公元1232~1316年）试图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他自己的神秘主义理论以及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体系或者“艺术”，并带着它穿越整个地中海，他的旅行同亚伯拉罕·阿布拉菲亚的一样雄心勃勃。鲁尔出生于一个相当受人敬重的巴塞罗那家族在马略卡岛的支系。在马略卡岛上的新社会中，他以朝臣身份过着优

越的生活，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有罪、放荡的。1274 848 年于马略卡朗达山（Mount Randa）上获得的一次神秘体验使他相信，他必须将他的才能用于使人皈依的事业中。<sup>22</sup>他试图学习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并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以培养向马略卡山区的米拉马尔（Miramar）传教的教士。他编写了好几百册书，多次旅行至北非（但因自称先知而被驱离），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曾经帮助了任何人皈依。也许他的“艺术”对除一小群追随者以外的其他人来说都太复杂了。一个可以解释他的“艺术”的方式是，它是欲将现存所有事物加以分类并理解这些类别之间的关系的企图。他定义了九种“绝对的”东西（尽管在他的著作中，这个数目并不完全一致），包括善、大、力、智，以及九种“相对的”东西，如“开始”、“中间”和“结束”。他的书中充斥着数据、编码和符号，一眼看去令人费解，但是他也写了一些面向大众的以皈依为主题的短篇。<sup>23</sup>

在基督教传教者中，鲁尔很特别，因为他坚持称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尊崇的有同一位上帝，且他反对基督徒竞争对手是撒旦的信徒这一越来越流行的看法。在《异教徒和三个智者》（*Gentile and the Three Wise Men*）一书中，他基本公允地详细描述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仰，并且允许一位犹太辩论者给出可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他在著作中强调：“恰如我们有同一位上帝、同一位创世者、同一位主，我们也应该拥有同一个信仰、同一种宗教、同一个教派和同一种热爱与尊崇上帝的方式。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热爱”。<sup>24</sup>他试图将自己宣传的东西付诸实践。他为到访亚历山大和其他伊斯兰地区的商人写了一本简明的手册，向他们说明应该如何与当地

居民讨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优点。他们却更乐意讨论胡椒的价格；他们也知道，对于伊斯兰教的任何批评都可能导致被捕、被驱逐出境或者被处死。鲁尔于公元 1293 年从热那亚渡海到非洲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即便是他也缺少勇气。他已经将书籍和其他随身物品装上了船，但立即又害怕得浑身无力，不敢起航，这使那些曾经被他的励志言辞感动的人震惊不已。然而他很快又出发前去突尼斯，在那里他对穆斯林宣称，如果他们能够以其真理说服自己的话，自己就将随时皈依伊斯兰教（这是试图引起他们相互争论的诡计）。他的诡辩引起了苏丹的关注，于是他被放逐到一艘热那亚船上。苏丹严禁他再次到来，否则将对他处以极刑。这种对于传教者的威胁经常使他们梦想成为殉教者。<sup>25</sup>在对那不勒斯和塞浦路斯宣传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他于 1307 年回到北非。这次，他来到了布日伊，站在市场中指责伊斯兰教。在被捕之后，他告诉当权者：“实践天主教真理的基督之仆并不惧怕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可以为那些不信者的灵魂获取精神生活的恩典。”但是，拉蒙·鲁尔曾经打动了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他们在宫廷中有一些影响力，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没有被处以极刑。他于 1314 年回到突尼斯，这时，苏丹正在玩弄老一套的伎俩：为了在对付竞争对手时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寻求加泰罗尼亚人的支持，并大肆散布谣言称他有心皈依基督教。鲁尔因此受到欢迎，但此时他年事已高，之后很可能于 1316 年时春天死于一艘开回马略卡岛的船上。<sup>26</sup>

苏丹对雇佣军的关心远甚于对传教者的关注。加泰罗尼亚的民兵维护着马格里布统治者的权力，但是阿拉贡的国王们也很重视加泰罗尼亚民兵的存在：他们保证了北非各地的苏丹不



会陷入艰难的对抗之中，如我们随后会见到的那样，这些对抗在公元 13 世纪晚期和 14 世纪早期动摇了基督教的君主政体。一些雇佣军如卡斯蒂利亚亲王亨利是一些在欧洲不能保住自己领地的冒险者。<sup>27</sup>这并不是新鲜事。在 11 世纪晚期，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曾经给北非的埃米尔写了具有妥协意味的书信，希望以此对那些在穆斯林军中服役的基督徒提供宗教关怀。在西班牙，基督徒参加穆斯林的军队，穆斯林也参加基督徒的军队。但到 1300 年，雇佣军成为保证北非土地被纳入由阿拉贡王朝统治的加泰罗尼亚的实质性保护之下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 3

加泰罗尼亚人的另一专长领域是航海。到了 13 世纪末，加泰罗尼亚的船只因安全可靠而获得了好名声。如果一个商人要在巴勒莫寻找船只装载他的货物，他知道他最好选择一艘加泰罗尼亚船，如马特·奥利弗达尔（Mateu Oliverdar）所拥有的坚固的“圣弗朗西斯科斯号”（*Sanctus Franciscus*），该船在 1268 年泊在巴勒莫港口。<sup>28</sup>虽然热那亚人乐于几个人共享船只的所有权，但在加泰罗尼亚，常见情况是个人完全拥有一艘船。加泰罗尼亚人向托斯卡纳的小麦商人或者奴隶贩子出租场地，并寻找愿意出租整艘船或部分的富商。<sup>29</sup>巴塞罗那和马略卡的船主和商人在利益诱惑下来到了意大利人曾经长期盘踞的地域。13 世纪 70 年代，来自巴塞罗那的中产阶级寡妇玛利亚·德马拉（*Maria de Malla*）在与君士坦丁堡和爱琴海地区的人们做生意时，派出她的儿子去购买乳香（像口香糖一样昂贵的商品）；她向东方运去精细织品，包括来自北法兰西的沙隆（*Chalons*）麻布。德马拉家族的专项特长是做毛皮生意，

包括狼皮和狐狸皮。<sup>30</sup>加泰罗尼亚人还获得了在突尼斯、布日伊和其他一些北非城镇建立由他们自己的商务代理管辖的商栈的权利。这些海外商务领地可以创造巨额利润。当詹姆斯一世于1259年发现突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商务代理付给他的租金是如此之少时，感到暴怒不已。他立即把租金数额增至三倍。<sup>31</sup>加泰罗尼亚人大量聚集的另一个中心是亚历山大。13世纪90年代，德马拉家族在此地搜集亚麻子和胡椒。14世纪，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二世试图说服埃及苏丹允许他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圣处实行保护特权；苏丹承诺，他如果发出“满载商品的大船”到埃及，就会得到基督受难时留下的圣物。<sup>32</sup>教廷在阿拉贡国王表面上的支持下，试图禁止加泰罗尼亚人和意大利人在埃及的贸易活动，那些与穆斯林敌人做买卖的人将被开除教籍。但是国王保证有两个修道院院长去处理商人与埃及人交易的免罪问题，他们只需交一笔罚款即可。这些罚款后来成为贸易税，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收入：1302年，对同亚历山大城做生意的人的罚款总数几乎达到国王从加泰罗尼亚所获的有记录收入的一半。阿拉贡诸王不但没有镇压贸易活动，而且成了这种贸易的共谋。<sup>33</sup>

加泰罗尼亚人当然也试图挑战意大利人对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权。但是他们真正的实力在于他们在西地中海建立的网络。宽敞的突尼斯外国人居民区街道上满是加泰罗尼亚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这些移民区内有很多商栈、小酒店和教堂。进入北非的港口意味着接近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黄金之路。加泰罗尼亚人为这些地区运来了产自佛兰德和北法兰西的毛麻织品；他们自己的纺织业在公元1300年实现扩张，此后商人也运来了产自巴塞罗那和莱呈达（Lleida）的精细纺织品。他们

也从事食盐贸易，食盐资源在加泰罗尼亚的伊维萨岛、撒丁岛南部和西西里岛西部都非常丰富，但在沙漠的南部极其短缺，有时还被用作货币。随着 13 世纪巴塞罗那开始繁荣发展，商人们保障了这座城市的食品供应。西西里岛很早就成了小麦贸易的中心，运载小麦的是大型圆船。该岛早在 13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向地中海的其他地区供应小麦，它们包括：突尼斯，这里在阿拉伯部族在 11 世纪蹂躏北非的农村后再也没能恢复元气；热那亚和比萨，它们可能还被指望照看自己的供应线；还有普罗旺斯的城镇。<sup>34</sup> 13 世纪 80 年代的一份合同简单地要求“好运号”（*Bonaventura*），也就是近期在巴勒莫港停泊的船，起航去阿格里真托，那里堆满了“大量的小麦等着这艘船去装运”。

加泰罗尼亚人也擅长做另一种重要货物的生意：奴隶。他们被描写为“黑人”、“黄种人”或“白种人”，一般都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俘虏。他们在马略卡、巴勒莫和巴伦西亚被售出，然后被送到加泰罗尼亚主人和意大利主人的家中做家务。公元 1287 年，阿拉贡国王认定梅诺卡人犯了通敌之罪，宣布 1231 年的投降协议无效，遂率军进入此岛，将岛上所有人籍没为奴，他们被分散至整个地中海，一度在奴隶市场中大量出现。<sup>35</sup> 一些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幸运奴隶会被他们的教友赎回，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设立了赎回兄弟的基金。加泰罗尼亚与普罗旺斯的圣三一赎奴会（Order of Trinitarians）和普罗玛利亚赎奴会（Order of Mercedarians）这两个宗教团体是专注于从穆斯林手中赎回基督徒的代表性团体。<sup>36</sup> 一个年轻妇人被萨拉森入侵者从法兰西南部的海岸拖走的故事是中世纪骑士故事中的一个常见主题，但加泰罗尼亚人以积极的心态做好了回应的准备。他们以海盗行为或者诚信商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

人到了地中海贸易网中。

与此同时，马略卡一直有船只驶往北非和西班牙。公元1284年签发给欲驶离马略卡的航海者的许可证书揭示了几乎每天都有船只出港，甚至在1月也是如此；这里没有禁航的季节，尽管在较暖的季节商贸活动更为活跃。在这些船只中，较小的海船被称作 *barques*<sup>①</sup>，不到十二名海员就能驾驶这种船迅速往返于西班牙陆地和马略卡岛间。更常见的是大一些的船，叫 *leny*，字面意思是木头，这种船适合进行穿过公海驶往北非的距离稍长一些的航行。<sup>37</sup> 和其船只一样，马略卡人也是先驱者。1281年，两艘热那亚船和一艘马略卡船到达伦敦，在此地马略卡船装载了二百六十七包英格兰细羊毛。此后，马略卡人定期前往英格兰进行这种贸易的实践一直持续到了14世纪。腓尼基人在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往塔特索斯的途中从来没有遇到大的困难，但是中世纪的船只需同直布罗陀与休达之间的洋流、雾气和逆风斗争。它们也与沿岸的统治者，包括摩洛哥马林王朝（Marinid）的柏柏尔统治者及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的那斯里德王朝统治者抗争。这一片水域不太友好，而且驶离地中海的海路之开通不仅标志着外交策略的成功，也标志着技术上的成功。原毛和佛兰德的纺织品现在可以相对便宜的价格从北方直接进入地中海，然后被运往佛罗伦萨、巴塞罗那和其他从事羊毛加工和纺织的城镇的作坊中。明矾是最好的染色固化剂，可从小亚细亚的弗凯亚获取，然后运往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伊普雷（Ypres）的织染坊，以避免经由法兰西东部和德意志的成本高昂、路途艰难的陆路和内

---

① 一种三桅帆船。——译者注

河交通。尽管常常发生危机，但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航行开始慢慢连在一起，而且加泰罗尼亚战舰经常在直布罗陀海峡巡航。到 14 世纪早期，地中海地区的造船者们开始模仿经常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的宽大的圆形船的样式，甚至借用了它的名字 *cog*，称模仿品为 *cocka*。沿着摩洛哥海岸南下，加泰罗尼亚和热那亚船只也发现了可以买到他们所渴求的粮食的市场，当地的居民们很乐意得到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纺织物。到 14 世纪 40 年代，这些船只甚至深入加那利群岛（Canaries），马略卡人曾经尝试征服这些岛屿（但失败了）。<sup>38</sup>

848

不出所料的是，自公元 1276 年起，臣服于马略卡国王的马略卡商人决定拥有他们自己的商务代理人和商栈。这是造成阿拉贡的彼得和马略卡的詹姆斯兄弟两人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因素，他们瓜分了詹姆斯一世的王国。航海者和商人在利用这些紧张关系时毫不迟疑。1299 年，一个名叫佩雷·德戈劳（Pere de Grau）的无赖（他拥有一艘船）被指控在西西里西部的港口特拉帕尼偷窃了一个热那亚木匠的工具箱。佩雷针锋相对地坚持说，事实上这位木匠偷盗了他的大船。这起案件被提交到加泰罗尼亚的商务代理那里，但是佩雷尖刻地说：“这位商务代理对马略卡的市民没有任何司法管辖权，只对那些处于阿拉贡国王领地的人有司法权。”<sup>39</sup>随着加泰罗尼亚人迅速地将其贸易网络扩张到整个地中海，该网络有了破裂的危险。

#### 4

这种破裂的趋势在整个地中海蔓延。在公元 13 世纪中期，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再次打破了该地区的势力平衡。十字军的远征没有能够保护以阿克为统治基地、自称耶路撒冷王国的狭长

而脆弱的东地中海沿岸。耶路撒冷王国的领地变得越小，领主之间的派系争斗就越发激烈，因为王权十分衰弱，而另一些好斗的势力，包括意大利城市公社、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力量很强大。西方的统治者很清楚埃及对这个王国的威胁，而且有一系列依靠海运船只的十字军的目标是埃及：第五次东征的十字军在1219年到1221年的短暂期间获得了对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达米埃塔的控制权；法兰西的路易九世也在1248年损失惨重的东征中向达米埃塔投入了兵力。在上述这两次十字军行动中，十字军都希望用他们在埃及的征服地去换取耶路撒冷，或者同时控制埃及和圣地，但这是一个无法达成的梦。但信奉基督教的国王逐渐因其家乡附近的争端，如我们在随后要讨论的争夺西西里岛的战役，被分散了注意力。虽然有许多歌颂十字军的言论和较小规模的海上征伐，但是1248年之后，对圣地的大规模征伐就终止了。<sup>40</sup> 奴隶出身的军事指挥官们在阿尤布王朝统治时期夺取了政权，于1250年到1517年控制着埃及和叙利亚。这些马木留克人保留了对意大利商人和埃及统治当局之间的商贸事务安排，但他们也决定在地图上移除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阿克于1291年沦入马木留克人之手，城内居民遭到了可怕的屠杀，但是有许多避难者挤上了最后离港的船只，在塞浦路斯得到了安置。阿克不再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拉丁人在东方的统治开始局限于塞浦路斯王国。

我们已经看到，第四次十字军的一个遗留影响就是君士坦丁堡衰弱的法兰克政权——尼西亚的希腊人于公元1261年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对热那亚人的回报是相当慷慨的贸易特权，包括获得谷物、奴隶以及黑海的蜂蜡和皮毛的权利。西西里岛也发生了剧变，在那里腓特烈二世恢

复并振兴了诺曼人的统治体制。他的一项成功之举是重建西西里船队，1235年他派出这支船队去进攻北非的杰尔巴。<sup>41</sup>当教宗反对腓特烈对德意志、西西里岛及北意大利部分地区进行联合统治时，后者于1241年恰到好处地用船队逮捕了代表团中的所有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当时这些人正乘坐热那亚人的船去罗马参加教宗的一次会议。<sup>42</sup>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腓特烈的海军将领安萨尔多·德马利（Ansaldo de Mari）也是热那亚人，热那亚人在是否支持腓特烈的问题上一向分裂为两派。严格来说，腓特烈二世与教宗之间的激烈斗争并不属于地中海历史，但在腓特烈二世1250年去世后的那些年发生的事对整个地中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266~1268年，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腓特烈继承人被教宗的盟友、法兰西的十字军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安茹和普罗旺斯伯爵查理完全打败了。

查理试图为他自己和安茹家族的继承者们创建一个地中海帝国。在他的设想中，帝国的核心是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在它们周围是海上封锁线，以保证对西西里岛和非洲之间的海域，以及南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和撒丁岛间的海域的控制权。在年轻时查理已经通过与阿拉贡的一个女继承人联姻，将普罗旺斯从阿拉贡人手中夺走。在他的统治下，马赛的对立派贵族被迫接受了他的权威，马赛的港口成了他的大型军械库。<sup>43</sup>公元1269年，查理不顾他的对手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反对，策划使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当选撒丁国王。<sup>44</sup>他于1277年从安条克的玛利亚那里购买了衰败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头衔，但当时塞浦路斯国王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声明获得的认可更为广泛。查理认为自己是反穆斯林（不管是突尼斯还是东方的穆斯林）的十字军人，但他在东方首要关注的是从前的拜占庭

帝国。他宣称霍亨斯陶芬王朝诸王控制的阿尔巴尼亚是他的领地，并夺取了都拉基乌姆；然后，在众多阿尔巴尼亚领主的拥戴下，他僭领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的称号。<sup>45</sup>在希腊人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后，他梦想帮法兰克人夺回他们在第四次十字军行动中夺得的帝权，并让他的女儿与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皇帝共结连理。他坚信，希腊的皇帝米哈伊尔·巴列奥略八世并不是真的想实现在教宗统领下的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的复合。对于他来说，将从教会中分离出去的希腊人带回罗马权威之下的唯一途径是使用武力。

查理计划着与威尼斯人结盟，派出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进攻君士坦丁堡；都拉基乌姆将是他沿艾格纳提亚大道深入拜占庭腹地的基地。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好人”威廉曾经的作战计划被掸去灰尘再度面世。查理用他相当可观的收入之一半来建造他的船队，其中有五十艘或六十艘单层甲板大帆船，而且很可能还有三十艘辅助型船。这些帆船看上去都气势磅礴，其船体庞大、坚固，应该能在外海上漂浮停泊。<sup>46</sup>维持这支船队至少要花费3.2万盎司黄金，甚至可能要5万盎司。<sup>47</sup>查理严重低估了其臣民对承担重税的忍耐度。在高压之下，反抗爆发了。在巴勒莫，自公元11世纪起便移居此地的拉丁移民的后代在1282年3月的“西西里晚祷”<sup>48</sup>大起义中攻击了查理的安茹士兵。起义的口号是“去死吧！法兰西人”，但是他们同样仇视来自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湾的官僚群体。这些人被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排挤出了地中海贸易，于是将他们的经商手段用于服侍腓特烈二世及后来的查理一世。<sup>49</sup>他们对征税这类琐事的热衷引起了岛上精英阶层的抵制。起义者迅速攻克了整座岛屿，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同盟。起义者向查理最伟大



的同盟者教宗请求支持，却遭到断然拒绝，无奈中他们转而向腓特烈孙女的丈夫、霍亨斯陶芬朝的最后传人、征服者詹姆斯的儿子阿拉贡国王彼得求助。

公元 1282 年 8 月，彼得和他的船队恰巧在西西里岛附近，彼得坚持称他当时在北非小镇阿尔克尔（Alcol）进行一场圣战。此言是否纯系借口，他是否确实计划占有西西里岛，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在一个法兰西士兵性侵了一位年轻的西西里主妇后，巴勒莫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造成了局势的失衡，城内似乎已经混乱不堪。当彼得于 9 月份到达该岛时，他或者准确地说他的妻子康斯坦丝得到了多数西西里精英的支持。他来此的最终目的是落实他妻子对于西西里主权的诉求；而且如果南意大利的居民参与了起义，且他拥有能够打败查理装备精良的安茹军队的资源（查理从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手中得到了贷款，银行家希望确保阿普利亚的谷物能够被运到不断扩张的佛罗伦萨），他也会夺取南意大利。<sup>50</sup>安茹家族劝说法兰西国王于 1283 年入侵阿拉贡（这对法兰西是一次灾难）。阿拉贡王朝支持了意大利的反教宗者，后者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诸城中亲安茹家族的圭尔夫派（Guelfs）和亲阿拉贡王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es）两败俱伤的争斗中确立了尽忠的目标，结果使斗争陷入僵局：到彼得三世和查理一世都已故去的 1285 年，阿拉贡国王占领了西西里，而安茹国王控制了南意大利，但两人都自称“西西里国王”（而位于意大利本土的王国通常被称为“那不勒斯王国”）。教宗试图在 1302 年及之后出面调停，但安茹家族和阿拉贡家族的斗争贯穿了整个 14 世纪，消耗了宝贵的财富资源，偶尔还会升级为冲突。

斗争同时在海上和陆上发生。安茹家族的查理可能认为加

泰罗尼亚的船队不值一提。这是一个错误，在阿拉贡国王彼得指定来自卡拉布里亚的劳里亚的罗杰（Roger de Lauria）为船队的指挥官后，这一点尤为明显。此人是地中海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指挥官之一，是新时代的莱山德。<sup>52</sup>与管理良好、小巧紧凑的加泰罗尼亚船队相比，查理的船队装备精良但缺乏凝聚力，它是由南意大利人、比萨人和普罗旺斯人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sup>53</sup>公元1282年10月，罗杰在卡拉布里亚海岸的尼科泰拉打败了查理的船队，扣押了二十名安茹家族的成员和两艘比萨的大船，迫使查理退守南意大利。无论如何，如果查理重新攻下西西里岛，他就需要取得对分隔西西里岛与非洲海岸的西西里海峡的控制。他再次被罗杰阻止，在马耳他周围的海域，一支安茹家族的守军与阿拉贡入侵者发生了冲突。1283年6月，一支由十八艘船组成的普罗旺斯船队到达了后来成为马耳他大海港（Grand Harbour）的水域，但它被劳里亚二十一艘船组成的船队追赶。两支海军对战了一整个白天，到入夜时分，安茹家族的船队被迫放弃了多艘船，还有一些船被摧毁。安茹军队损失惨重：大约有三千五百名战士被屠杀，且阿拉贡人抓获了几百名战俘，包括一些贵族。牺牲者可能多数来自马赛，马赛人在这场战斗中损失的人数占其人口总数的将近五分之一。<sup>54</sup>在法兰西人于1283年入侵加泰罗尼亚后，加泰罗尼亚船队也得心应手地在罗赛斯海岸俘获了法兰西船队中的一半船只。罗杰宣称：“我坚信，海上不会有任何船队、船只，甚至任何一条鱼，除非它拿着阿拉贡国王的武器。”<sup>55</sup>

安茹家族现在已经不能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持续攻击下保护南意大利海岸了，公元1284年他们彻底失去了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为查理一世的儿子萨勒诺亲王查理愚蠢至极地率领

一支安茹家族的船队在那不勒斯海面攻击了罗杰的船只。许多那不勒斯水手都不善于对付加泰罗尼亚人，他们被迫在甲板上与敌手进行白刃战。这次的灾难形式有所不同。那不勒斯人的船队没有被摧毁，但一些普罗旺斯的舰船被捕获，萨勒诺的查理就在一艘被捕获的船的甲板上。<sup>56</sup>直到1289年，他一直是阿拉贡人的战俘，尽管在他的父亲于1285年去世后，（至少是安茹人的眼中）他已经成了西西里国王和普罗旺斯伯爵。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加泰罗尼亚船队肆无忌惮地扩大了他们在地中海上的行动范围，攻击了凯法利尼亚（从属于那不勒斯）、基克拉泽斯和希俄斯；突尼斯海岸附近的杰尔巴岛和克肯纳群岛（Kerkennah）也重新回到西西里人的控制之下。没有人能抵抗劳里亚的罗杰的进攻。他持续不断地取得海上战役的胜利，保证了西西里岛始终由阿拉贡人控制。

马略卡岛则是另一个问题。彼得三世早在其统治之初就憎恶他父亲把领地分割为阿拉贡王国和马略卡王国的做法。彼得在弟弟马略卡的詹姆斯二世背信弃义地投靠安茹家族后，侵入鲁西永，攻入佩皮尼昂（Perpignan）的王宫，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弟弟的卧室外。他甚感受挫地敲打大门，而詹姆斯此时却从下水道逃离了这个国家，直到公元1298年才在教宗干预下夺回王位。<sup>57</sup>然而彼得做出的决定与他父亲的做法相似，即把新征服的西西里领地与其他领地分而治之，并把它作为独立的实体授予他的第二个儿子。这承认了一个可怖的事实：西西里人并不是在为巴塞罗那王室战斗，而是在为霍亨斯陶芬家族战斗。此外，西西里岛离巴塞罗那太远，从巴塞罗那控制它是很困难或不可能的。然而，这个岛屿是如此具有魅力。早在“西西里晚祷”事件之前，加泰罗尼亚商人就大批前往巴勒莫、特拉帕尼

和其他港口，以寻找谷物和棉花。然而，彼得的目标是实现他的妻子对于王权的诉求，而不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在彼得逝世之后，商人们的机会就因三个阿拉贡国王——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国王，马略卡国王和西西里国王——间的争执减少了。

尽管面对着政治上的分裂以及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世界内部实行的封港令，加泰罗尼亚人还是使自己占据了一个可与意大利人比肩的地位。他们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竞争活动：当巴塞罗那人开始为了进入非洲、西西里岛和东方而加入竞争之时，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还没有完全获得对地中海商路的控制权。加泰罗尼亚人在航海方面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专长，包括地图制作的技术。他们还有其敌手完全不具备的优势：在阿拉贡国王的保护之下，他们很容易就可接近突尼斯、特莱姆森（Tlemcen）和亚力山大的统治者的宫廷。后代之人在回顾征服者詹姆斯和彼得的时代时，会视之为加泰罗尼亚的英雄时代。

## 注 释

1. D. Herlihy, *Pisa in the Early Renaissance* (New Haven, CT, 1958), pp. 131-3.
2. D. Abulafia,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Kingdoms 1200-1500: the Struggle for Dominion* (London, 1997), pp. 35-7.
3. Benjamin of Tudela, *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ed. M. N. Adler (London, 1907), p. 2.
4. S. Bensch, *Barcelona and its Rulers, 1096-1291* (Cambridge, 1995).
5. J.-E. Ruiz-Domènec, *Ricard Guillem: un sogno per Barcellona*, with an appendix of documents edited by R. Conde y Delgado de Molina (Naples, 1999); but cf. Bensch, *Barcelona*, pp. 85-121, 154-5.
6. S. Orvietani Busch, *Medieval Mediterranean Ports: the Catalan and Tuscan Coasts, 1100-1235* (Leiden, 2001).

7. Abulafia, *Western Mediterranean Kingdoms*, p. 52.
8. Bernat Desclot, *Llibre del rey En Pere*, in *Les quatre grans cròniques*, ed. F. Soldevila (Barcelona, 1971), chap. 14; D. Abulafia, *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the Catalan Kingdom of Majorca* (Cambridge, 1994), pp. 7–8.
9. James I, *Llibre dels Feyts*, in *Les quatre grans cròniques*, ed. F. Soldevila (Barcelona, 1971), chap. 47, cited here with modifications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J. Forster, *Chronicle of James I of Aragon*, 2 vols. (London, 1883);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p. 7.
10. James I, *Llibre dels Feyts*, chaps. 54, 56.
11.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pp. 78–9, 65–8.
12. *Ibid.*, pp. 56–64.
13. See A. Watso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1100* (Cambridge, 1983).
14. R. Burns and P. Chevedden, *Negotiating Cultures: Bilingual Surrender Treaties on the Crusader-Muslim Frontier under James the Conqueror* (Leiden, 1999).
15. L. Berner, 'On the western shores: the Jews of Barcelona during the reign of Jaume I, "el Conqueridor", 1213–1276'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6).
16.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pp. 78–9, 204–8; A. Hernando et al., *Cartografia mallorquina* (Barcelona, 1995).
17. R. Vose, *Dominicans, Muslims and Jews in the Medieval Crown of Aragon* (Cambridge, 2009).
18. R. Chazan, *Barcelona and Beyond: the Disputation of 1263 and its Aftermath* (Berkeley, CA, 1992).
19. Best edition: O. Limor, *Die Disputationen zu Ceuta (1179) und Mallorca (1286): zwei antijüdische Schriften aus dem mittelalterlichen Genua*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Munich, 1994), pp. 169–300.
20. H. Hames, *Like Angels on Jacob's Ladder: Abraham Abulafia, the Franciscans, and Joachimism* (Albany, NY, 2007).
21. *Ibid.*, pp. 33–4.
22. H. Hames, *The Art of Conversion: Christianity and Kabbalah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2000); D. Urvoy, *Penser l'Islam: les présupposés islamiques de l'"art" de Lull* (Paris, 1980).
23. D. Abulafia, 'The apostolic imperative: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Lull's *Blaquerna*', in *Religion, Text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pain and Northern Europe: Essays in Honour of J. N. Hillgarth*, ed. L. Shopkow et al. (Toronto, 2002), pp. 105–21.
24. Ramon Llull, 'Book of the Gentile and the three wise men', in A. Bonner, *Doctor Illuminatus: a Ramon Llull Reader* (Princeton, NJ, 1993), p. 168.
25. 'Vita coetanea', in Bonner, *Doctor Illuminatus*, pp. 24–5, 28–30.
26. Bonner, *Doctor Illuminatus*, p. 43.
27. C.-E. Dufourcq, *L'Espagne catalane et le Maghrib au XIIIe et XIVe siècles* (Paris, 1966), pp. 514–20.

28. D. Abulafia, 'Catalan merchants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1236-1300: studies in the notarial acts of Barcelona and Sicily', *Viat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vol. 16 (1985), pp. 232-5,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viii.
29. *Ibid.*, pp. 235, 237.
30. *Ibid.*, pp. 220-21.
31. A. Hibbert, 'Catalan consulate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9 (1949), pp. 352-8; Dufourcq, *L'Espagne catalane et le Maghrib*, pp. 133-56.
32. J. Hillgarth, *The Problem of a Catalan Mediterranean Empire 1229-1327*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supplement no. 8, London, 1975), p. 41; A. Atiya, *Egypt and Aragon* (Leipzig, 1938), pp. 57-60.
33. Hillgarth, *Problem*, p. 41; J. Trenchs Odena, 'De alexandrinis (el comercio prohibido con los musulmanes y el papado de Aviñón durante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IV)', *Anuario de estudios medievales*, vol. 10 (1980), pp. 237-320.
34. Abulafia, 'Catalan merchants', p. 222.
35. *Ibid.*, pp. 230-31.
36. J. Brodman, *Ransoming Captives in Crusader Spain: the Order of Merced on the Christian-Islamic Frontier* (Philadelphia, PA, 1986); J. Rodriguez, *Captives and Their Saviors in the Medieval Crown of Aragon* (Washington, DC, 2007).
37.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pp. 130-39.
38. *Ibid.*, pp. 188-215; A. Ortega Villoslada, *El reino de Mallorca y el mundo atlántico: evolución político-mercantil (1230-1349)* (Madrid, 2008); also Dufourcq, *L'Espagne catalane et le Maghrib*, pp. 208-37.
39. Abulafia, 'Catalan merchants', pp. 237-8.
40. N. Housley, *The Later Crusades: from Lyons to Alcázar 1274-1580* (Oxford, 1992), pp. 7-17.
41. D. Abulafia, *Frederick II: a Medieval Emperor* (London, 1988), pp. 164-201.
42. *Ibid.*, pp. 346-7.
43. G. Lesage, *Marseille angevine* (Paris, 1950).
44.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pp. 240-45.
45. P. Xhufi, *Dilemat e Arbërit: studime mbi Shqipërinë mesjetare* (Tirana, 2006), pp. 89-172.
46. J. Pryor, 'The galleys of Charles I of Anjou, king of Sicily, ca. 1269-1284',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vol. 14 (1993), pp. 35-103.
47. L. Mott, *Sea Power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the Catalan-Aragonese Fleet in the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Gainesville, FL, 2003), p. 15.
48. Abulafia, *Western Mediterranean Kingdoms*, pp. 66-76; S. Runciman, *The Sicilian Vespers: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58).

49. H. Bresc, '1282: classes sociales et révolution nationale', *XI Congresso di storia della Corona d'Aragona* (Palermo, 1983-4), vol. 2, pp. 241-58, repr. in H. Bresc, *Politique et société en Sicile, XIIe-XVe siècles* (Aldershot, 1990).
50. D. Abulafia, 'Southern Italy and the Florentine economy, 1265-137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 2, 33 (1981), pp. 377-88, repr. in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vi.
51. Abulafia, *Western Mediterranean Kingdoms*, pp. 107-71.
52. J. Pryor, 'The naval battles of Roger de Lauria',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9 (1983), pp. 179-216.
53. Mott, *Sea Power*, pp. 29-30.
54. *Ibid.*, pp. 31-2.
55. From the chronicle of Bernat Desclot: see *ibid.*, pp. 39-40.
56. Mott, *Sea Power*, pp. 33-4.
57.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pp. 10-12.

## 八 “关闭”大议会 (1291 ~ 1350 年)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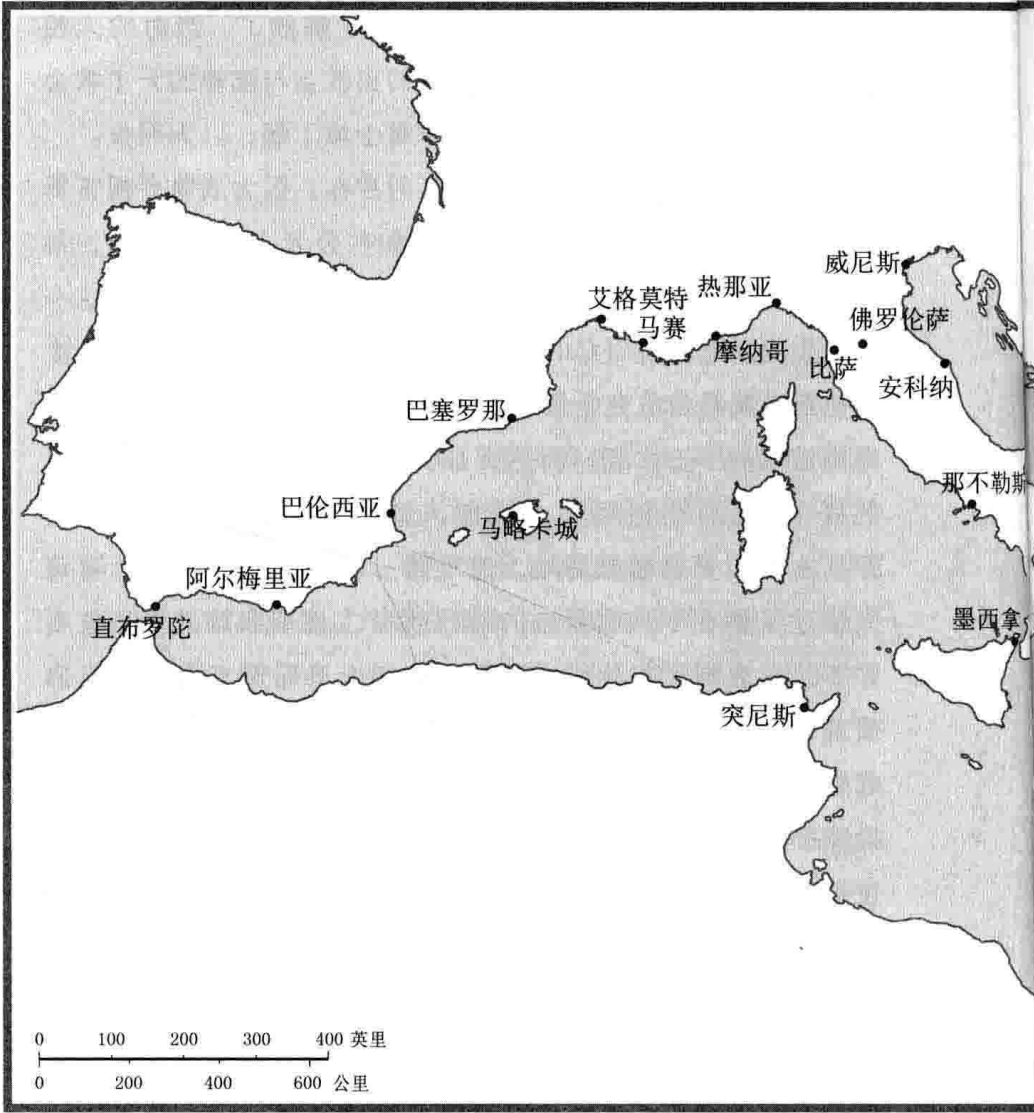
354

公元 1291 年，阿克的陷落震惊了西欧，西欧的确没有在这座城市陷落前的最后几十年内为保护它而做些什么。人们发动了许多新的远征计划，对这些计划最为狂热的是从加泰罗尼亚监狱获释的那不勒斯的查理二世。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他更热衷于打败阿拉贡人的尝试，而不是获得发动一次十字军行动的能力，况且他也没有资源来做这件事。<sup>1</sup>意大利商人为适应其不再能通过阿克获得东方丝绸和香料的现实，已经采用了多种经营方式。威尼斯人逐渐开始在对埃及的贸易中发挥带头作用；而热那亚人则在 1261 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块殖民地之后，集中精力于与爱琴海和黑海地区的大宗商品贸易。但是，拜占庭的皇帝们对于热那亚人很警惕。拜占庭也向威尼斯人提供了支持，尽管与对热那亚人的支持相比略逊一筹，因此热那亚人不认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米哈伊尔八世和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卡二世（Andronikos II）将热那亚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金角湾以北的高地上，该地被称为佩拉（Pera）或者加拉泰（Galata），那里的大片热那亚人的碉楼仍然是伊斯坦布尔北部的主要景观。但是两位皇帝也赋予了热那亚人自治权，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发展得十分迅速，以至于它很快就需要扩张范围。到 14 世纪中期，热那亚人在佩拉的贸易收入使得



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相形见绌，前者大约是后者的七倍。拜占庭的皇帝们将爱琴海和黑海的控制权交给了热那亚人，而米哈伊尔大约有八十艘船的海军被他的儿子解散了。当时的人相信，由于君士坦丁堡拒绝了使神圣的正教会与渎神的天主教会统一的所有企图，因而上帝会保护君士坦丁堡，以为回报。<sup>2</sup>

热那亚人逐渐容忍了威尼斯人的存在，因为战争会损害贸易，吞噬价值不菲的资源。偶尔，如在公元 1298 年那样，某一方的海盗的攻击导致了危机，所有城市都陷入战争。在这一年发生的科尔丘拉（Curzola 或 Korčula）之役中，大约有八十艘热那亚舰船对抗九十多艘威尼斯舰船。威尼斯人是在深入亚得里亚海的本土作战。而热那亚人坚持不懈地赢得了这一天的战斗，数百名威尼斯人被俘，包括（据说是）马可·波罗，在被囚于热那亚期间，他对同一囚室的一个波斯行吟诗人讲述了他在中国和东方的非凡故事。<sup>3</sup> 波罗家族的真正故事并不仅仅表现了鲁莽或者愚蠢，这些威尼斯珠宝商由阿克出发前往远东，年轻的马可加入了队伍。13 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恢复了穿越亚洲的贸易通道，打通了将东方丝绸运至黑海沿岸的路线，尽管穿越印度洋和红海的海上通路仍在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运往亚历山大港和地中海。当他们于 13 世纪 60 年代进入黑海之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立即试图涉足这条带有异国情调的穿越亚洲的贸易之路。事实上，当热那亚人专注于从事奴隶、粮食和干果这些黑海沿岸的地方特产的贸易之时，威尼斯人更乐意从事昂贵的奢侈品贸易。对优质的蜂蜡也有很大的需求量，它被用来点亮西方的教堂和宫殿。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卡法（Caffa）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贸易基地，而威尼斯人的基地在亚速海（Sea of Azov）上的塔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0 200 400 600 公里



纳（Tana）。在卡法，热那亚人召集了成千上万名奴隶，其中大多数是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鞑靼人（Tartars）；他们在意大利城市把奴隶卖掉，使其成为家仆，或者卖给埃及的马木留克人，将他们补充进苏丹的卫队。热那亚人向他们的穆斯林敌人提供强大的军队这一奇观毫无疑问导致了教廷的不悦和警觉。

热那亚人把黑海地区的谷物发运到比君士坦丁堡还远的地方，恢复了曾经使古代雅典人有粮吃的黑海粮食贸易。而随着意大利城市规模的不断增长，他们就从更遥远的地区收购谷物，如摩洛哥、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的海岸、克里米亚、乌克兰等。这里的产品价格远比北意大利便宜，所以即使考虑到运输的费用，从上述地区运来的粮食在意大利的市场上也能以不高于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进口的谷物的价格出售。对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粮食的需求仍然较大。热那亚人将从以上所有地方  
356 运来的粮食分散到地中海各处：他们和加泰罗尼亚人供应着突尼斯的粮食市场；他们将谷物从西西里岛运至北意大利。<sup>4</sup>有一个城市对粮食的需求保持不变，那就是佛罗伦萨，只是在这一时期，它发展成一个经济体，一个加工和生产纺织品的中心。尽管佛罗伦萨处于内陆，当地人极其依赖地中海来取得他们需要的羊毛和食品；他们控制的土地十分狭小，在一年十二个月内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这座城市五个月的需求。托斯卡纳的土地十分贫瘠，当地生产的粮食无法与来自外域的“重小麦”<sup>①</sup>相比。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定期地向他们的同盟者安茹家族的那不勒斯国王提供贷款，这样他们就能进入似乎拥有无限

357

---

① 即蛋白质和淀粉成分较高的小麦。——译者注

粮食资源的阿普利亚。<sup>5</sup>

这些发展反映了环地中海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到公元1280年或1300年，人口增长，粮食价格也相对增长。地区性的饥荒变得更常见，城镇中的人必须到更远处去寻找他们需要的粮食。欧洲的商业革命导致了城市的骤然发展，城镇内的就业机会吸引着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城市史无前例地开始主导西欧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经济，自加泰罗尼亚到托斯卡纳的弧状区域的主要商业中心城市有巴伦西亚、马略卡城、巴塞罗那、佩皮尼昂、纳博讷（Narbonne）、蒙彼利埃、艾格莫特（Aigues-Mortes）、萨沃纳、热那亚、比萨和佛罗伦萨，在这些城市中佛罗林金币被广泛使用和模仿。艾格莫特盛产食盐，自14世纪早期以来它的景观就没有改变多少。它是法兰西王国面向地中海的门户城市，于13世纪40年代建立，直到此时才直接控制了朗格多克。国王路易九世关注繁荣的蒙彼利埃城，这座城市是贸易、银行业和手工业中心，但由于复杂的封建契约规则，它被置于阿拉贡国王的宗主权下。路易九世希望将商业重心转移到他位于潟湖上的新港口艾格莫特，他也同样使此地成为他于1248年集结的那支损失惨重的十字军的出发地。最终，艾格莫特迅速成为蒙彼利埃的一个出海口，避开了法兰西王室在下一个世纪对它的控制。<sup>6</sup> 威尼斯人对于如何满足其城市内十万居民的粮食需求这个问题有与众不同的答复。他们试图将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所有粮食运至自己的城市，这样威尼斯人就会有首选权，然后才在其饥饿的邻市，如拉文纳、费拉拉（Ferrara）和里米尼（Rimini）间分配剩余粮食。他们试图将亚得里亚海变为“威尼斯人的海湾”。威尼斯人与安茹家族的查理和他的继承者就保证阿普利亚小麦供应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

判，甚至准备支持查理一世去攻击君士坦丁堡，这次进攻行动原定在1282年，即“西西里晚祷”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实施。

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大圆船除了装运食物外，也从小亚细亚装运明矾至西方。热那亚人在明矾产地的边缘地带建立了他们的飞地：首先，在小亚细亚沿岸，热那亚冒险家贝内德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于公元1297年创建了一个短暂的“亚细亚王国”；然后是附近的希俄斯岛，它于1346年被热那亚商人公会的家族重新占领（他们对此地的控制一直持续到了1566年）。希俄斯不仅是获得弗凯亚明矾之地，也盛产干果和乳香。比希俄斯更为重要的是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它填补了自阿克陷落之后留下的空白。塞浦路斯处于来自法兰西的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控制之下，但其居民多是拜占庭希腊人。它的统治者们经常被卷入派系斗争，但是吕西尼昂王朝从与邻国的贸易活动获得财富，并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在塞浦路斯延续了两个多世纪。<sup>7</sup>许多外国商人的公会前来造访或驻扎：法马古斯塔是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巴塞罗那、安科纳、纳博讷、墨西拿、蒙彼利埃、马赛和其他地方的商人的基地，当地已经损毁的哥特式教堂可说明商人们曾经积累起来的财富。<sup>8</sup>

以塞浦路斯为起点的贸易路线延伸到了另一个基督教王国，即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它位于当代土耳其的东南部海岸。西方的商人通过塞浦路斯向亚美尼亚供应谷物，他们使亚美尼亚成为离开地中海的门户，从此地商人们可走上通往波斯大不里士（Tabriz）以及更远处的丝绸市场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艰难贸易路线。塞浦路斯与贝鲁特（Beirut）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叙利亚基督徒商人在这里充当安科纳和威尼斯商人的代理

者，为他们供应大批量的棉花以运至意大利甚至德意志加工成布匹，这是地中海上出现了一个跨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单一经济体系的明显征兆。一些布匹成品被运回东方，在埃及和叙利亚出售。贸易和政治在吕西尼昂国王的脑中交织纠结。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在公元 1365 年发动一场针对亚历山大的野心勃勃的十字军远征时，他的庞大计划之一是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和叙利亚诸港口确立基督教的支配地位（他已经攻取了安纳托利亚的两处港口），但是他的资源无法使他在埃及的征伐活动长期维持下去。于是他转而对亚历山大进行病态的掠夺，这证实了他所谓的“圣战”是由物质利益驱动的。在他回到塞浦路斯之后不久，这位惯会制造敌手的国王就被刺杀了。<sup>9</sup>

## 2

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商人的商业优势是以他们海上力量的优势为基础的。大型圆帆船之所以能够自由地穿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主要是因为长形多桨大帆船监视各海域。这种单层甲板的多桨帆船的长宽比为 8:1，其动力结合了桨手和风帆的力量。在桨的下面，四到六名桨手肩并肩坐着，每两人或三人操纵一支桨。但作为商船，这种船最适合用于运载小批量的高端商品，如香料，因为船上的空间十分有限。这些船速度快、机动性强，但容易在深海中沉没。随着佛兰德商路的发展，驶向大西洋的船只建造得更长、更宽且更高（这是最重要的），因此这种新的“大帆船”能够应对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海风和洋流。<sup>10</sup>圆船中有极少数属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巨型船只，如公元 13 世纪 60 年代建造的“罗卡福特

号”（*Roccaforte*），它是一种吃水量达五百吨的大船，相当于多数“圆船”吃水量的两倍多。<sup>11</sup>

一些船，特别是那些自威尼斯出发驶向黎凡特或者佛兰德的船只，在出发后伴有护航船，并有武器保护 [此即威尼斯人所说的穆达（*muda*）系统]。即使如此，穆斯林和基督徒海盗的疯狂攻击也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断运输。公元1297年，由格里马迪（*Grimaldi*）家族的一位成员——他因为经常披着修士的风帽，为他自己赢得了“修士”的绰号——领导的热那亚暴乱群体，占领了热那亚领地最西端的摩纳哥岩 [事实上，摩诺伊科（*Monoikos*）这个名称源于古代时期的弗凯亚移民，与修士毫无关联]。作为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国王智者罗伯特（*Robert the Wise*）——他已经在1318年成为热那亚的最高领主——的支持者，摩纳哥的水手们在之后几十年内都是令人厌恶的对象。1336年，摩纳哥海盗扣下了两艘从佛兰德返程的装有货物的单桅大帆船。佛兰德元老院不得不叫停所有驶向佛兰德航行的船只，航运在二十年后才恢复。格里马迪家族的成员留在原处，但仍是事端制造者，仍然统治着摩纳哥，不过他们找到了比做海盗稍微体面一些的赚钱方式。<sup>12</sup>

贸易在创造一个成功商人的阶级的同时，也强化了贵族的势力。在威尼斯，贵族掌控了收益最好的贸易通道，留给中产阶级的选择只剩用圆船做谷物、食盐和酒的生意。要确定哪些人可称为贵族并不简单，尽管有一些古代的家庭，如丹多罗（*Dandolo*）家族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都占据着社会阶梯的顶端。问题是，在社会繁荣发展的时代——当时许多人都已经获得了巨额财富并要求获得决定护航帆船应该向哪里进发，或者自己应与哪些外国君主签订条约的权利，但做决策的仍是由贵族构



成的元老院（公元 14 世纪早期便是如此情况）——究竟哪些人能够获许向上攀登社会阶梯。结果是 1297 年出现了一个限制大议会成员的决议，规定元老院和高层委员会只能由现有成员以及他们的后裔构成，他们来自约两百个家族，其中有许多是像蒂耶波洛那样的商业精英家族。这种“关闭”（Serrata）或多或少应是永久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家族仍然通过“后门”获许加入了贵族行列。大议会的“关闭”于是成为贵族们重新确认其在政治、贸易和社会领域的至高权力的一个机会。

### 3

加泰罗尼亚人在公元 14 世纪初取得了成功。1302 年，“西西里晚祷”战争正式结束，重新打开了连接西西里、马略卡和巴塞罗那的贸易航道。最重要的是，阿拉贡国王决定宣示他对撒丁岛的领主权。该岛曾经于 1297 年被教宗赐给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教宗希望以此交换西西里岛，<sup>14</sup> 詹姆斯的兄弟腓特烈的攻击性回应是占领西西里岛，使之成为他的独立王国。直到 1323 年，阿拉贡国王阿方索四世才发动了对撒丁岛的攻击；虽然他是为了自己的王朝才这样做，但加泰罗尼亚的商人认为这一征服行动将使他們获得该岛所产的大量粮食、食盐、奶酪、皮革，以及最为重要的白银。<sup>15</sup> 这些即将成为征服者的人忽视了一向存在于撒丁岛人中的对外来统治的抵触情绪。加泰罗尼亚人基本上都住在城市内，主要是沿海一带（仍有说加泰罗尼亚语的后裔生活于阿尔盖罗），而撒丁人则住在城墙之外。与此同时，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认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入侵侵犯了他们作为领主的权益。比萨人最后被允许在撒

丁岛南部保有产业，但比萨已是强弩之末——不久之前，这个城市甚至考虑要主动归附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但热那亚人更为麻烦。当加泰罗尼亚人对他们实行野蛮攻击时，他们的回应是以牙还牙。撒丁岛周围的海域成为危险之地。该岛一直处于抗争之中，抗争的双方是岛上的古老原住民与即将成为新主人的民族，或者都是希望成为新主人的人。在14世纪晚期，一个统治根基在该岛中西部的阿博雷阿（Arborea）的王国建立，结束了地方性的对抗，其女王埃莱奥诺拉（Eleonora）以立法者的形象而受到称颂。<sup>16</sup>

在野心勃勃、身材矮小的彼得四世于1337年继承阿拉贡王国的王位后，阿拉贡的宫廷开始制定其可被描述为“帝国主义式的”战略目标。彼得四世在统治之初下定决心要处理他的堂兄在马略卡岛的行为。马略卡国王詹姆斯三世给人的印象是心智不够健全。他痛恨彼得四世的说法，即马略卡国王是阿拉贡国王之附庸，前往巴塞罗那商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船停在滨海宫殿的墙外，由于他的坚持，对方修建了一座吊桥搭在船舷上。然后他试图引诱彼得上他的船，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有一个疯狂的计划，即绑架阿拉贡国王。马略卡的商业公会对此感到厌烦。他们愿意且需要与他们在巴塞罗那的贸易对手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阿拉贡国王宣布詹姆斯抗拒王命并于1343年攻下马略卡之时，他们十分欣慰。加泰罗尼亚的船队由一百一十六艘船构成，包括二十二艘单桅多桨大帆船。<sup>17</sup>此后不久，詹姆斯在试图收复自己的领地时逝去。在彼得漫长生命（其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最后时期，他试图用联姻方式收回阿拉贡人的西西里岛。他的帝国之梦开始变为现实：最后，一个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帝国”出现了。

加泰罗尼亚商人希望利用此事获取更大的利益。1380年，彼得解释了“跨地中海”联系的重要性，也考虑了控制饱经战争创伤的撒丁岛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失去了撒丁岛，随后将失去的就是马略卡岛，因为马略卡岛已经习惯于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获得的食物将不再运达，于是这里将不再有人居住，我们也将失去这块土地。<sup>18</sup>

一个连接西西里岛、撒丁岛、马略卡岛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网络即将出现，在这个网络中，意大利诸岛将持续不断地为马略卡和巴塞罗那供应生命之粮。

养船队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公元13世纪，一个大的造船厂于巴塞罗那建立，现在那里成了航海博物馆。造船厂的工人在棚架之下劳作，大的钢环悬挂在拱门上，因此他们可用滑轮起吊船体。但是，根据一个王室顾问的估计，建立这样一间能容纳二十五艘单桅帆船的船厂要花费两千盎司黄金，这超出了阿拉贡国王的承受能力。该数字还没有包括保养船只、供养船员以及购买武器和其他装备的费用。加泰罗尼亚大帆船上的船员们的饮食很单调，由硬干粮、咸肉、奶酪、菜豆、油和酒构成，也有鹰嘴豆和蚕豆，与热那亚、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水手的饮食的区别在于不同成分的构成比例不同：威尼斯水手分得的干粮和奶酪少一些，但咸肉更多；而那不勒斯船队享有的是免费的酒（难道这就可以解释那不勒斯人在战争中的拙劣表现吗？）。<sup>19</sup>把大蒜、洋葱和香料混合在一起，就可制成一种口味相当不错、可抹在干粮上的酱汁。人们当时就知道，大蒜和

洋葱可预防一些疾病，如败血症。干粮的准确说法是 *biscoctus*，意为两次烤制，因此它比较坚硬，但体轻、容易保存且富有营养。<sup>20</sup> 船员的饮食中没有咸鱼是很奇怪的事。咸鱼在巴塞罗那那饮食中是很重要的。当地盛产凤尾鱼，也可从大西洋捕鱼，在基督徒们禁食肉类的大斋期，咸鱼尤其重要。虽然船下的海水中有丰富的渔产资源，但国王没有理由为鱼买单。腌制的食物会增加人们对淡水的需求，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每个船员每天需要消耗至少八公升淡水，在炎热的季节则消耗量更大。每艘船可以装载五千公升淡水，水容易被污染，需要加以净化并以醋去味。但是，船上的给养是需要不断补充的，因此同古代的情形类似，船需要经常靠岸。<sup>21</sup> 保障船的给养是船长需要行使的重要职责之一，他的角色不只是船上的指挥官。

西地中海的一些区域是禁区。公元 1340 年前后，热那亚、加泰罗尼亚和摩洛哥的马林王朝就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展开了争夺。<sup>22</sup> 由于人们担心摩洛哥人入侵西班牙南部——来自摩洛哥的经常性入侵成为 11 世纪和 12 世纪伊比利亚的基督教王国面临的一大威胁——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基督教国家而言，幸运的是，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王们总体而言和自己一样担心被马林王朝控制，但是在 14 世纪 30 年代后期，他们与摩洛哥人结盟，极大地威胁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路。卡斯蒂利亚国王不止一次地试图通过包围直布罗陀的行动来赢得对海峡的控制，但最终他自己却被穆斯林包围并被迫撤退了。<sup>23</sup> 1340 年，卡斯蒂利亚船队在直布罗陀城外被一支新建的摩洛哥船队打败，失去了三十二艘战船。基督徒的这次失败震撼了阿拉贡人，于是他们与长期以来同自己争斗不休的卡斯蒂利亚人议和。阿拉贡国王希望装备至少六十艘快船，但他得乞

求他的议会提供资金；巴伦西亚议会提供了二十艘快船，甚至好斗的马略卡国王也提供了十五艘快船。与此同时，摩洛哥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西班牙，但是卡斯蒂利亚人在葡萄牙的帮助下，于1340年10月在西班牙南部的萨拉多（Salado）击败了一支摩洛哥军队。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夺取的马林王朝之军旗，现在还保存在托莱多大教堂的珍宝馆中。但是，这次胜利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卡斯蒂利亚仍然经常派出由十艘或二十艘船组成的船队进入海峡。这与摩洛哥人的船队相比规模很小，1340年摩洛哥人大约有二百五十艘战船，其中包括六十艘快船。战争于1344年结束，当时卡斯蒂利亚的国王阿方索十一世进攻了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港。最后，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控制了海峡的北岸，但没有攻克直布罗陀的另一出口。<sup>25</sup>

穆斯林的海上势力也在东地中海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对基督徒在突厥人海域内取得的成功回应。公元1310年，在二十多年前被赶出阿克的医院骑士们从他们当时位于塞浦路斯的基地出发，夺取了罗得岛。此地在此之前许多年里都是突厥人的攻击目标，拜占庭对其有名义上的宗主权。<sup>26</sup>医院骑士们此时将罗得岛建成了他们的基地，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开始积极地从事海盗活动。他们也不断与西方的统治者，包括法兰西国王、那不勒斯国王和其他君主谈判，希望能得到大规模十字军船队的帮助。但是，这支船队的目标不再只是圣地，或者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留克王国，而是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突厥人。他们在抵达小亚细亚海岸后改变了游戏规则：突厥人已经冲破了拜占庭建立已久的使他们局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警戒线，而且，正如医院骑士适应了海洋一样，突厥人也在来自拜占庭海军的希腊人的帮助下适应了海洋。米哈伊尔八

365 世为节省财政开支，于1284年解散了拜占庭的舰队，他以为意大利的海军会保护他；由于安茹的查理忙于应付“西西里晚祷”事件，他也摆脱了查理的干扰。数个小规模的突厥公国出现在小亚细亚海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爱琴海为边界线的埃米尔国艾登（Aydin）。于基督徒来说，幸运的是这些突厥人的埃米尔国在侵扰基督徒属地边境的同时耗费了同样多的时间在内部斗争上。即便如此，到1318年，艾登成了令其基督教邻国头疼的对象，当时埃米尔乌姆尔帕夏（Umur Pasha）与数年前已经控制雅典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军结成联盟，这支雇佣军在名义上服从于西西里岛的阿拉贡国王的权威。<sup>27</sup>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艾登的突厥人之间结成的这一古怪同盟惹恼了威尼斯人：一位威尼斯贵族的封地圣托里尼岛（Santorini）两次受到袭击，威尼斯人害怕这个同盟随后会对克里特岛构成威胁。<sup>28</sup>

解决突厥人的威胁似乎要依靠一支装备良好、资金充足的海上十字军，在此军队中，医院骑士、意大利海军、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和法兰西人应协同确立对爱琴海的完全控制权。这一动议因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野心而受挫，因为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保护他们的贸易通道和他们在这一海域获得的领主权。一个由西方海军组成的“神圣同盟”——威尼斯人事实上是其追随者——暂时性地于1334年清除了爱琴海海域的猖獗海盗。<sup>29</sup>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教宗热心地促成了另一次十字军行动，这支十字军于1344年从乌姆尔帕夏手中夺取了士麦那。十字军在士麦那取得的胜利只是表面上的。基督徒们只成功征集了一支拥有三十艘快船的船队：西方人的热情只是表面文章而非出自真心。<sup>30</sup>他们夺取了要塞〔他们对这座要塞

的控制一直维持到帖木儿（Timur）于 1402 年攻陷它之时]，但没能进入内陆，一个原本宝贵的贸易中心于是转变为受到围攻的边塞城镇。事实上，十字军补给不足。像安茹家族的那不勒斯国王智者罗伯特这样的统治者已经长期征收十字军税，甚至装备了十字军船队，但这支船队神奇地转移了目标，被投入到对抗热那亚吉伯林派或者是西西里岛的阿拉贡人的战争中。

这一区域的不安定因热那亚人的出现——热那亚人的一个合股公司于公元 1346 年占领了希俄斯岛——而加剧了；该岛由热那亚人的投资商共享所有权，由一个公司管理，该公司被称为马奥那（*Mahona*）。其主要靠明矾、乳香和干果获取利润，并不热衷于与西方船队一起进一步涉险；甚至医院骑士也逐渐地失去了对十字军的热情，开始利用罗得岛在商路上的有利位置赚钱。在其东方，艾登被打败，在安纳托利亚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地带，但它迅速被一个来自西北的新崛起的突厥群体填补。这些突厥人即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热衷于从事对抗拜占庭的圣战（并于 1331 年占领了尼西亚），但是就像这一时期的所有突厥人一样，他们也愿意在基督教统治者需要雇佣军时为其效力。于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坎塔库津六世（John VI Kantakouzenos）允许他们定居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这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一个桥头堡。

366

一直到公元 14 世纪中期，基督教船队都没有占据无人匹敌的优势。加泰罗尼亚人极力使船队保持一定的规模，以期在他们的穆斯林对手要攻占直布罗陀海峡时予以阻止。即便如此，阿拉贡国王与加泰罗尼亚商人的同盟还是创建了一个能够供应西地中海各国以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尽管

联系时有中断，且多次出现不祥征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从 1299 年到 1350 年的数十年间还是保持了和平。热那亚的海军军官们在寻求好的战争机遇时发现了其他客户。他们已经在 13 世纪为腓特烈二世服役；到 1300 年，他们教授了加泰罗尼亚人如何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调动船队。他们为葡萄牙船队做了奠基性工作。但他们不能抵抗另一个凶残的入侵者，该入侵者在七八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地中海。

#### 4

367 黑死病有时候被视为大自然对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各国过快发展的经济的压制：人口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对欧洲的土地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谷物价格被迫上涨，鸡蛋和鸡肉等高端产品也因此匮乏。产出极差的边边角角的土地也被开垦出来，每一粒粮食都得到珍惜。饥荒发生得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如托斯卡纳。尽管北欧发生了特别严重的饥荒，自公元 1315 年的大饥荒以来尤其如此，但它对阿尔卑斯山以南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sup>31</sup>然而，我们可以绘出更乐观的图景。到 1340 年，人口的增长达到顶峰，特别是在西欧和拜占庭。在 1329 年到 1343 年，马略卡的城市人口下降了 23%，差不多的数字也出现在了普罗旺斯和其他地区的城镇中。<sup>32</sup>大规模专门化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用商品交换生活必需品的城市贸易网络的发展。早在 1280 年，比萨人就放弃了阿尔诺河河口的贫乏耕地，用其牧养绵羊；他们运出毛皮、肉食、奶酪和羊毛以从海外换回谷物，因为羊身上很少有用不上的东西。托斯卡纳的小城市圣吉米尼亚诺特别以盛产藏红花等经济作物和酒著称，在这些产品的供养下，该城的人口密度纪录直



到 20 世纪才被打破。它的商业网络被扩展到了地中海，在那里，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圣吉米尼亚诺的商人向阿勒颇等远东城市出口藏红花。这一“商业化”的趋势在北欧也很明显，预示了在黑死病之后会出现的诸多发展。

且不论在公元 1340 年前后的危机之后是否出现了新兴经济，黑死病的确打破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间的平衡。达地中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量一半以上的死亡人数必然会在社会、经济、宗教、政治多个方面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种震动既是精神的，又是经济的。<sup>33</sup>然而，瘟疫导致的“黑暗时代”的持续时长并不能与以青铜时代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崩溃为标志的灰暗时期相比。在当时，瘟疫的到来加深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困境，推迟了复兴的到来，但它并不是发生巨大倒退的唯一原因。但是 14 世纪的瘟疫是引发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转型的重要介质，这种转型进一步带来了新秩序的建立。

热那亚人对于地中海黑死病的到来有不察之责。腺鼠疫是由蒙古军队而非商人带到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基地卡法的——蒙古人于公元 1347 年包围了卡法。<sup>34</sup>一些意大利人乘船从克里米亚发生的战争中逃出，沿水路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即便他们没有被感染，船上的偷渡者黑鼠也被感染了。这些老鼠喜欢黑海商船上装载的大量谷物，身上有传播瘟疫病毒的跳蚤，船载的大捆布匹商品为跳蚤提供了藏身之处。1347 年 9 月，腺鼠疫在拜占庭首都肆虐，其市民开始逃离，但他们也是病毒携带者。一艘运载奴隶的船从黑海起航驶向亚历山大，船上有三百人；据阿拉伯历史学者阿里·马克里齐（al-Maqrizi）记载，当这艘船到达亚历山大港时，船上只余四十五人，而且

他们也很很快就死去了。<sup>35</sup>毫不出人意料，亚历山大成为腺鼠疫在东地中海的一个传播中心，1348年春，加沙受到影响。西地中海第一个感染此种疫病的地方是墨西拿。一个西西里编年史学家将此归罪于十二艘来自东方的热那亚长船，这批船于1348年到达。墨西拿的居民带着病菌逃到岛屿的各个角落，疫病越过海峡传至雷焦，于1348年5月到达那不勒斯。<sup>36</sup>到1348年春天，黑死病已经感染了整个马略卡岛，由此它沿穿越加泰罗尼亚的经典商路，进入佩皮尼昂、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又南下至穆斯林统治下的格拉纳达王国，于1348年5月到达了阿尔梅里亚。<sup>37</sup>同一个月，巴塞罗那的市民们带着他们的圣骨和圣像游行，恳求上帝消灭这次瘟疫，此类行为自然进一步帮助了疫病的传播而非结束。<sup>38</sup>突尼斯于1348年春天被感染，瘟疫很有可能是由西西里传播至此的，另一个感染源是从马略卡下行到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港口的加泰罗尼亚船只。<sup>39</sup>12世纪到14世纪城市的急速发展意味着，西地中海岸与中东风的繁荣城市一样易受瘟疫感染。各地死于瘟疫的人数都多得令人震惊：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于瘟疫；在西地中海的一些地方，如加泰罗尼亚，死去的人可能占人口总数的六成或七成。<sup>40</sup>瘟疫在传播过程中也变得更烈性了，新出现的肺鼠疫可在几小时之内夺走那些呼吸道感染者的性命。

欧洲和地中海近一半人口的损失对于经济关系影响巨大。  
369 对食物的需求大大减少，但由于西西里岛和其他地方的土地因疫病导致的劳动人口减少而无人耕种，瘟疫过后许多人都陷入饥荒。由于疫病在热那亚、威尼斯和其他商贸城市的大街小巷及水道上传播得很快，所以这些大的商贸城市人口锐减。<sup>41</sup>黑死病并不是唯一的灾难，公元14世纪晚期，瘟疫的反复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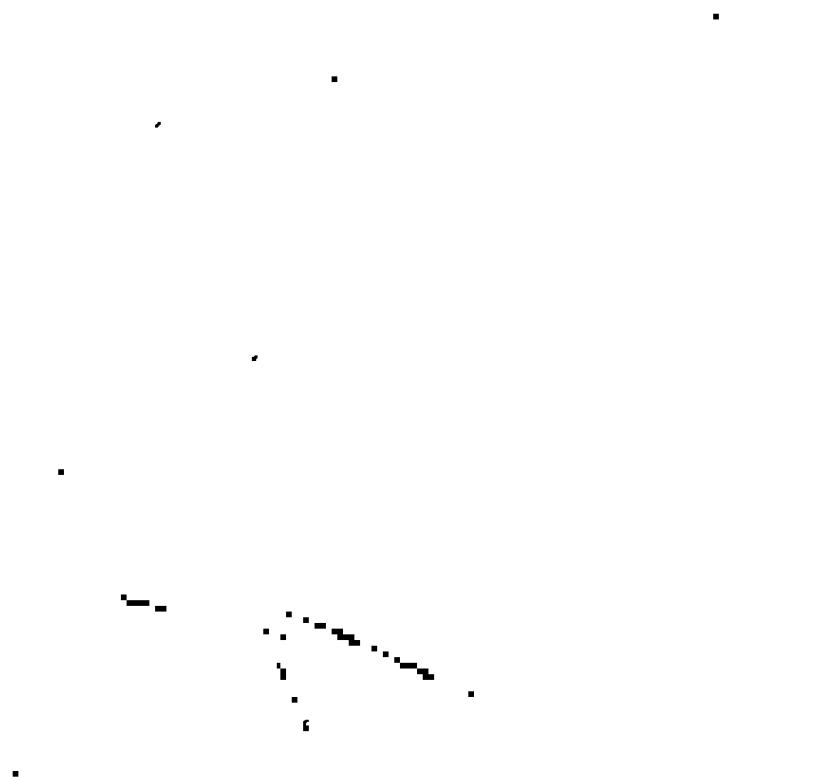
导致人口总数在要缓慢恢复之时再度下滑；新的瘟疫对年轻人危害尤其大，因为老一代已经在经历多年瘟疫后有了一些抵抗力。在“西西里晚祷”起义之后的那个世纪，西西里岛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从八十五万人降至三十五万人，导致人口锐减的两起最重要的事件是1347年的瘟疫与1366年在西西里岛上暴发的又一次瘟疫。<sup>42</sup>在经历了黑死病的摧残与恐怖后，一切都改变了。尽管这次瘟疫改变了整个地中海，却没有造成长久的衰落。旧的经营体制如商栈仍然存在；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继续明争暗斗；基督徒策划了更大胆的十字军计划，意图攻击势力一度稳固的马木留克人。在这一切的背后，旧的贸易网络发生了一些微小却重要的变化，其第一个信号是一个活跃的贸易区在直布罗陀海峡外出现。在这一复苏之后，第四地中海于14世纪末到来了。

## 注 释

1. S. Schein, *Fideles Cruces: the Papacy, the West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1274-1314* (Oxford, 1991).
2. A. Laiou, *Constantinople and the Lati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dronicus II 1282-1328* (Cambridge, MA, 1972), pp. 68-76, 147-57.
3. F.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D, 1973), p. 84.
4. D. Abulafia, 'Sul commercio del grano siciliano nel tardo Duecento', *XI° Congresso della Corona d'Aragona*, 4 vols. (Palermo, 1983-4), vol. 2, pp. 5-22,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vii.
5. D. Abulafia, 'Southern Italy and the Florentine economy, 1265-137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 2, 33 (1981), pp. 377-88, repr. in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essay vi.
6. G. Jehel, *Aigues-mortes, un port pour un roi: les Capétiens et la Méditerranée* (Roanne, 1985); K. Reyerson, *Business, Banking and Finance in Medieval Montpellier* (Toronto, 1985).

7. P. Edbury, *The Kingdom of Cyprus and the Crusades 1191-1374* (Cambridge, 1991); very helpful studies in B. Arbel, *Cyprus, the Franks and Venice, 13th-16th Centuries* (Aldershot, 2000).
8. D. Abulafia, 'The Levant trade of the minor citie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he Medieval Levant. Studies in Memory of Eliyahu Ashtor (1914-1984)*, ed. B. Z. Kedar and A. Udovitch,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2 (1988), pp. 183-202.
9. P. Edbury, 'The crusading policy of King Peter I of Cyprus, 1359-1369', in P. Holt (e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Lands in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Warminster, 1977), pp. 90-105; Edbury, *Kingdom of Cyprus*, pp. 147-79.
10. R. Unger, *The Ship in the Medieval Economy, 600-1600* (London, 1980), pp. 176-9; J. Robson, 'The Catalan fleet and Moorish sea-power (1337-134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1959), p. 391.
11. Lane, *Venice*, p. 46.
12. D. Abulafia, 'Venice and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the last years of Robert the Wise, 1332-1343',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48 (1980), pp. 196-9.
13. S. Chojnacki, 'In search of the Venetian patriciate: families and factio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Renaissance Venice*, ed. J. R. Hale (London, 1973), pp. 47-90.
14. 另一个计划涉及阿尔巴尼亚。参见：D. Abulafia, 'The Aragonese Kingdom of Albania: an Angevin project of 1311-16',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 (1995), pp. 1-13.
15. M. Tangheroni, *Aspetti del commercio dei cereali nei paesi della Corona d'Aragona*, 1: *La Sardegna* (Pisa and Cagliari, 1981); C. Manca, *Aspetti dell'espansione economica catalano-aragonese nel Mediterraneo occidentale: il commercio internazionale del sale* (Milan, 1966); M. Tangheroni, *Città dell'argento: Iglesias dalle origini alla fine del Medioevo* (Naples, 1985).
16. F. C. Casula, *La Sardegna aragonese*, 2 vols. (Sassari, 1990-91); B. Pitzorno, *Vita di Eleanora d'Arborea, principessa medioevale di Sardegna* (Milan, 2010).
17. D. Abulafia, *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the Catalan Kingdom of Majorca* (Cambridge, 1994), pp. 15-17, 54.
18. *Ibid.*, pp. 14, 248.
19. L. Mott, *Sea Power in 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the Catalan-Aragonese Fleet in the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Gainesville, FL, 2003), p. 216, table 2, and p. 217; J. Pryor, 'The galleys of Charles I of Anjou, king of Sicily, ca. 1269-1284',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vol. 14 (1993), p. 86.
20. Mott, *Sea Power*, pp. 211-24.
21. Tangheroni, *Aspetti del commercio*, pp. 72-8.
22. Robson, 'Catalan fleet', p. 386.

23. G.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 1974), pp. 60–72; M. Harvey, *Gibraltar: a History* (2nd edn, Staplehurst, Kent, 2000), pp. 37–40.
24. Robson, ‘Catalan fleet’, pp. 389–91, 394, 398.
25. Harvey, *Gibraltar*, pp. 44–5.
26. J. Riley-Smith, *The Knights of St John in Jerusalem and Cyprus, 1050–1310* (London, 1967), p. 225; Edbury, *Kingdom of Cyprus*, p. 123.
27. K. Setton, *The 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 1311–1388* (2nd edn, London, 1975).
28. E. Zachariadou, *Trade and Crusade: Venetian Crete and the Emirates of Menteshe and Aydin (1300–1415)* (Venice, 1983), pp. 13–14.
29. *Ibid.*, pp. 27–37.
30. N. Housley, *The Later Crusades: from Lyons to Alcázar 1274–1580* (Oxford, 1992), pp. 59–60; Zachariadou, *Trade and Crusade*, pp. 49–51.
31. W. C. Jordan, *The Great Famine: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1966); cf. D. Abulafia, ‘Un’economia in crisi? L’Europa alla vigilia della Peste Nera’, *Archivio storico del Sannio*, vol. 3 (1998), pp. 5–24.
32. O.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 2004), p. 281.
33. B. Kedar,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CT, 1976).
34. M.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NJ, 1977); Benedictow, *Black Death*, pp. 60–64, 69; 认为黑死病不是腺鼠疫与肺鼠疫的观点。见 B. Gummer, *The Scourging Angel: the Black Death in the British Isles* (London, 2009).
35. S. Borsch, *The Black Death in Egypt and Eng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Cairo, 2005), pp. 1–2.
36. Benedictow, *Black Death*, pp. 70–71, 93–4.
37. *Ibid.*, pp. 77–82, 89–90, 278–81.
38. *Ibid.*, pp. 82–3.
39. *Ibid.*, pp. 65–6.
40. *Ibid.*, pp. 380–84.
41. D. Abulafia, ‘Carestia, peste, economia’, *Le epidemie nei secoli XIV–XVII* (Nuova Scuola Medica Salernitana, Salerno, 2006).
42. S. R. Epstein, *An Island for Itsel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Sicily* (Cambridge, 1992).



**第四部**  
**第四地中海**  
**(1350 ~ 1830 年)**

1

2

3

4

5

6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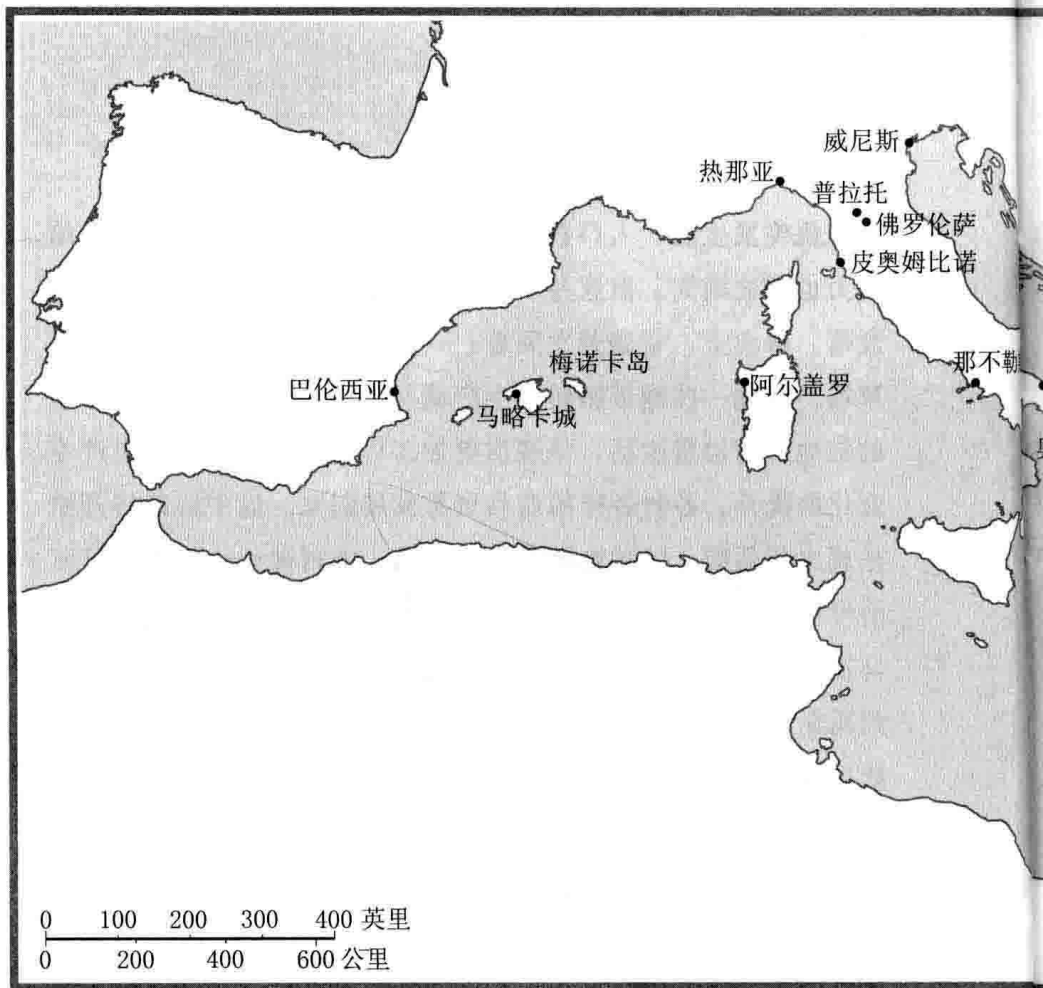
# 一 想成为罗马皇帝的人 (1350 ~ 148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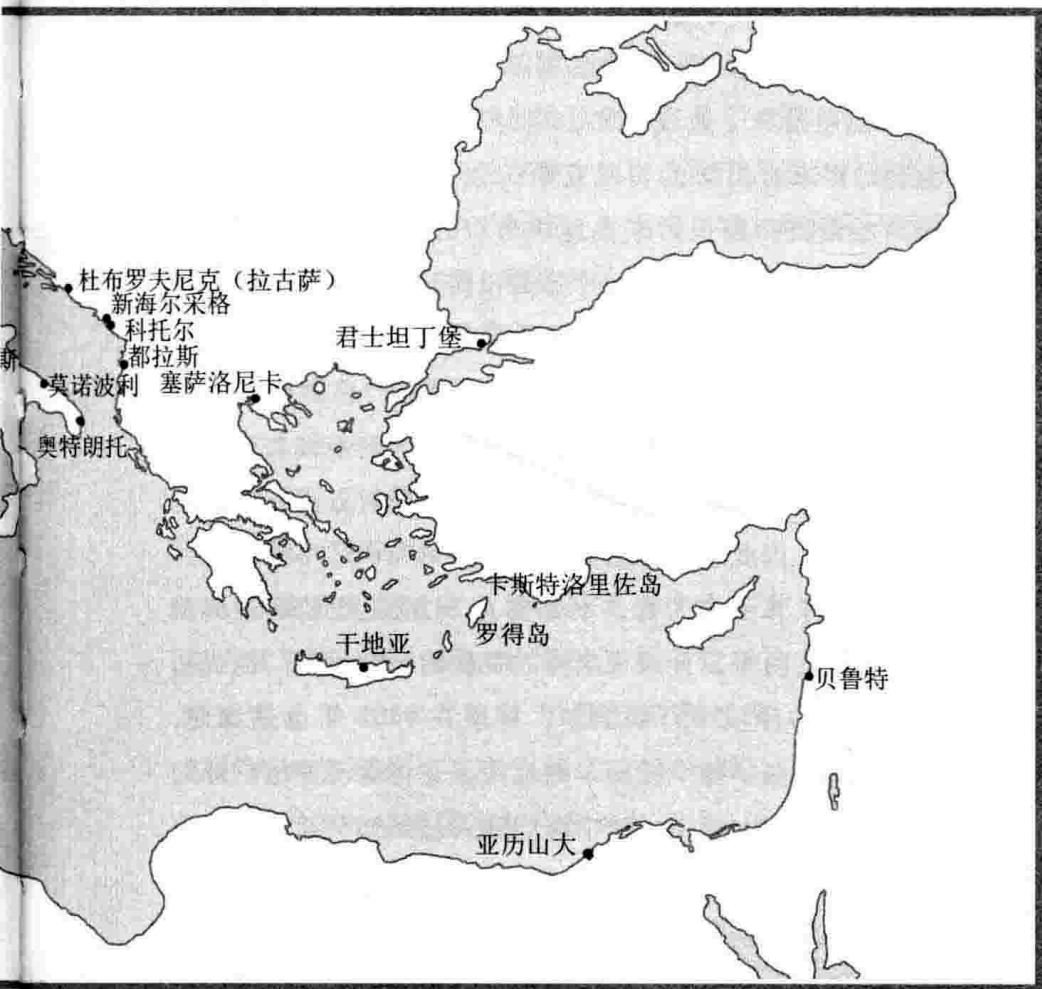
## 1

瘟疫发生后，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地中海内部的粮食供给压力也随之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老的地中海谷物贸易就此衰落。事实上，它繁荣发展着：一些劣等田地被弃耕，变成了草场，其他一些地区则转而生产糖与染料，与这伟大的海相接的陆地上的经济生活，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征。随着生产专业化的提升，各种各样的商品贸易发展起来。地中海经济开始呈现出新面貌。区域性贸易崭露头角：木材被运往加泰罗尼亚沿岸地区；羊毛有的从阿普利亚出发穿过亚得里亚海到达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新城镇，有的从梅诺卡岛（当地盛产绵羊）运到托斯卡纳，特别要说明的是，托斯卡纳地区在公元1400年前后有一位著名的“普拉托商人”（Merchant of Prato）名叫弗朗切斯科·迪·马可·达蒂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他曾致力于记录每一捆羊毛，保留每一封信件（现存十五万封），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sup>1</sup>他派驻扎伊维萨岛的一名代理人抱怨道：“这个岛对健康不利，面包糟糕，葡萄酒劣质——上帝宽恕我吧，这儿就没一样好！我觉得我恐怕要在这儿被刮掉一层皮了。”<sup>2</sup>但商业需求当然比个人享受重要。

873

这位普拉托商人在坐落于西班牙海滨的圣马蒂奥（San





Mateu) 设置了托斯卡纳办事处, 在那里代理人可以收购最优质的阿拉贡羊毛, 此时绵羊养殖业已经深入西班牙内陆地区, 逐渐征服了梅塞塔高原, 到了夏季, 数百万只牲畜在高地吃草, 冬季则转场到高原地带。达蒂尼的商业网络还延伸到马格里布 (Maghrib)、巴尔干半岛以东以及黑海地区。在 14 世纪 90 年代, 他还投身于奴隶贸易, 当时马略卡和西西里的奴隶市场上会出售来自黑海的切尔克斯人以及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sup>3</sup> 他所经营的商品包括来自地中海以外远东地区的靛蓝染料、巴西苏木、胡椒、芦荟、片姜黄和良姜, 以及来自地中海周边的棉花、乳香、精制糖。除了大量的羊毛原毛外, 他还从西班牙和摩洛哥进口鸵鸟羽毛、象牙、大米、扁桃仁以及大枣。他会从巴伦西亚订购餐具, 按照惯例, 上面装饰着他自己的徽章; 不过若干年后, 他再次订购时却发现对方没有保留自己的徽章设计, 因此感到勃然大怒。<sup>4</sup>

达蒂尼是个寡头式人物, 不是公元 14 世纪晚期那种典型的商人, 但他的生平充分展现出商品贸易的勃勃生机。他成功地 375 地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开展贸易, 即便在 1402 年也是如此, 当时米兰大公扫荡了整个托斯卡纳地区, 并将除佛罗伦萨外的所有主要城市都收入囊中。地中海的商人总是知晓如何从战争与和平当中获利。然而, 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发生了。14 世纪早期, 佛罗伦萨的三大银行家族巴尔迪 (Bardi)、佩鲁齐 (Peruzzi) 和阿恰约利 (Acciaiuoli), 与极为依赖银行贷款的那不勒斯国王、罗得岛的骑士团以及欧洲内陆的统治者建立起紧密联系; 但就在黑死病暴发前夕, 这些银行破产了, 显然是由于之前累积了过多的毒债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向英王提供的贷款)。后来取代这些破产银行的跨国银行都谨慎地控制

自己的规模，经营时也更加稳健；美第奇银行就是如此，尽管它同时也拥有着政治权力，是著名的统治家族。<sup>5</sup> 谨慎经营保障了稳定的收益。扩张的野心同样也更加温和：加泰罗尼亚人遣往佛兰德、英格兰以及马赛船只变少，这座曾经的重要商站已辉煌不再。如此一来，新的商业结构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精神面貌。<sup>6</sup> 推动城市生活发展的不仅是手工业专业化的不断增强，这反映在手工行会的发展方面，还在于大量乡村居民移居到城镇，由于人力的减少，村庄已经无法存续。在埃及，土地废弃导致对灌溉设施的忽视，而这些设施维持着尼罗河三角洲的生态平衡。三角洲地区变得贫穷，工资减少，然而地中海的欧洲一侧在应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时，却走向了崛起。<sup>7</sup> 于是，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到 1400 年时，这一地区在许多方面已经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水平，这又促使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继续前往地中海和黑海的粮食产地。

在瘟疫的刺激下，基督徒普遍产生一种心理，即人们需要为其罪孽忏悔。但这种罪孽显然不包括内斗：威尼斯与热那亚在公元 1350 ~ 1355 年爆发激烈冲突，随后在 1378 ~ 1381 年冲突再起（基奥贾战争，Chioggia）。这两次冲突的起因都在于争夺从爱琴海前往黑海的通道。第一次冲突发生时，威尼斯人与阿拉贡国王达成协议，而后者当时正与热那亚人争夺撒丁岛的控制权。威尼斯人派遣舰队前往西地中海，并于 1353 年在撒丁岛北部阿尔盖罗附近海域击败热那亚人，而加泰罗尼亚人则派遣舰队奔赴遥远的波斯普鲁斯海峡，在战斗中还牺牲了一名舰队司令。然而，没有任何一方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在占领达尔马提亚长达三百五十年后，威尼斯被迫接受将其划归匈牙利；热那亚则陷入内斗，该城落入米兰

的维斯孔蒂（Visconti）家族的领主们手中，在后者看来，热那亚的资源已经耗尽，于是在1355年就与同样被耗尽的威尼斯签署了和约。<sup>8</sup>

当战争于公元1378年再次爆发时，双方关注的焦点起初是小岛特涅多斯（Tenedos），认为控制该岛就可以掌控经由达达尼尔海峡的商路。两年之前，拜占庭的一位篡位皇帝曾将该岛赠送给热那亚人作为得到其援助的回报，但威尼斯人从这位皇帝的对手那里得到承诺，他们可以控制该岛。<sup>9</sup>热那亚和威尼斯要打仗的念头实在令人惊诧，因为黑死病已经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威尼斯人不得不从达尔马提亚招募大批新桨手。此外，他们还有其他严重分歧。在这两次战争间隙，1363年，威尼斯人遭遇克里特起义，起义者不仅包括当地的希腊人，还有一些威尼斯贵族，如古老且伟大的格拉德尼戈家族（Gradenigo）。<sup>10</sup>起义使得威尼斯人的供给网出现问题，因为意大利东北部缺乏广袤腹地，他们只能对克里特进行开发——事实证明是过度开发——以便获取谷物、葡萄酒、橄榄油和蔬菜。在两次战争期间，热那亚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海域爆发冲突，热那亚海军不敢进入该海域，威尼斯则以另外一种更危险的方式陷入严重危机。在1378~1380年，由于亚得里亚海的东侧被匈牙利国王控制，威尼斯就完全暴露在其敌手的攻击之下。威尼斯还需处理另一个顽疾：若要实现其东地中海的扩张野心，就必须将威尼斯附近的海域完全掌控在共和国之手。

热那亚人向匈牙利国王以及威尼斯的近邻帕多瓦的卡拉拉（Carrara）领主求助，从而使威尼斯陷入包围。公元1379年，热那亚人焚毁了威尼斯海滨的一些村庄，其盟友则洗劫了威尼斯潟湖南端的基奥贾。盟军还曾放出狂言：不把圣马可大教堂

门廊上方的四座青铜马掠走，他们绝不停歇。这是威尼斯自9世纪初被加洛林人围城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威尼斯成功地在围城战中坚持下来；最后反而是热那亚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的补给已然耗尽。到1380年6月，热那亚人意识到，他们已经难以维系，只能选择和谈。这次冲突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威尼斯人在舰船的前甲板上安装了发射石弹的火炮，使用了大量火药。热那亚人的指挥官皮耶特罗·多利安（Pietro Dorian）就是在一座塔遭炮弹击中后被砸死的。<sup>11</sup>

威尼斯的历史学家喜欢将基奥贾战争说成是威尼斯人取得了胜利，但热那亚人进逼潟湖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威尼斯的巨大羞辱。威尼斯失去了特涅多斯岛，无法收复达尔马提亚，不得不承认热那亚在塞浦路斯的权利（热那亚人由此参与到白糖贸易中），甚至还不得不将其本土的附属国特雷维索（Treviso）让渡给奥地利公爵，也因此丧失了意大利东北部的谷物产地——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爪由此伸入意大利东北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sup>12</sup>在公元1350年和1378年的两场战争中，威尼斯在领土和声望方面所失去的远远多于所获得的。尽管这些冲突很严重，但它们仅仅是极其和谐的关系的戏剧性中断，两地的商船仍一起穿行于爱琴海，经由君士坦丁堡，前往盛产谷物的克里米亚（Cremea）。1381年后，双方细分了各自的贸易范围以及商业利益，以避免产生纠纷：威尼斯保有黎凡特商贸的主要中心，其商船前往亚历山大和贝鲁特购买香料；而热那亚人则更愿意采用圆形商船<sup>①</sup>装载大宗货物——明

378

---

① 这是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的一种船只，长宽比例为3:1，所以从侧面看像圆形。——译者注

矾、谷物和干果——并在小亚细亚、希腊和黑海搜罗这些商品；“无籽葡萄干”（currants）的名称就来源于科林斯，而位于黑海南岸的独立的希腊国家特拉布宗（Trebizond）则是榛子的主产地。1300年前后，雄心勃勃的商业冒险冲动曾驱使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深入波斯，甚至远到中国，而此时这种冲动已经消失；商人们致力于恢复横跨地中海的重要联络网。<sup>13</sup>

促成稳定的一个因素在于威尼斯造船厂的高效，而且它是整个地中海最大的、组织最为严密的造船厂。威尼斯的造船厂位于名为塔纳（Tana）的大型缆绳作坊的旁边，它早在公元14世纪初就已建成，当时但丁听到了从地狱最深处传来的回声。

正如在威尼斯人的船厂里，  
     冬天熬着黏糊糊的沥青，  
     来涂抹已经损坏的船只，  
 既然已经不能再航海；那就只能，  
 有的正给自己造新船，有的正用麻屑  
     填塞船只两侧因多次航行形成的隙缝；  
 有的在船头敲啊敲，有的在船尾敲啊敲，  
     这个人在制桨，那个人在缠绕缆索，  
     还有一个人缝补着前桅的帆，缝补着后桅的帆……<sup>①</sup><sup>14</sup>

---

① 此处的译文参见〔意〕但丁著《神曲》，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157页。



原来的老造船厂的船坞可容纳 12 艘商船，而新造船厂的规模是前者的三倍。到 14 世纪晚期，在一位海军将领的领导下，它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造船厂一年可制造 3 艘大型商船，这看起来并不多，只是从 14 世纪 40 年代开始，随着通往黎凡特和佛兰德的航行渐趋稳定，商船的规模大幅提高。这些大商船是装有大三角帆的三列桨船，可搭载 150 吨货物以及多达 200 名水手。只有威尼斯公民可以将货物放在船上，这些船出航时还配有护卫，一些小型的配备着武器的护卫船伴其左右，沿着威尼斯元老院仔细选择的路线航行；只有过了二十五岁才能成为公民，且如我们所见，利润最丰厚的航线运送的是丝绸和香料，威尼斯贵族纷纷投资以获得控制权。对于那些更为普通的物品，威尼斯人用圆形的挂方帆的商业柯克船（cogs）来装运，这些船均由私人造船厂建造，在设计方面较少受限。已知最大的 15 世纪柯克船长约 30 米，排水量为 720 吨左右。<sup>15</sup>威尼斯人的造船技术与其航海技巧不相上下，而且威尼斯和热那亚及马略卡一样，均是地图绘制的主要中心。如此一来，威尼斯水手人人熟知地中海沿海地区的确切信息。此外，随着指南针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在海洋中航行更有信心，航海季也扩展到一年中的大多数时段。<sup>16</sup>

## 2

有一项业务让水手忙碌不停，那就是将朝圣者送往圣地。巴勒斯坦最后一处基督徒据点的丢失，并未终结朝圣活动；阿拉贡诸王与其他地区争夺一些模糊的权利，要为圣地的基督徒避难所提供保护，而马木留克苏丹们清楚，当与西方的统治者进行政治以及商业谈判时，可以打圣地牌。朝圣是一

种自然的或被认为是自然的需求。菲力克斯·法贝尔（Felix Fabri）是多明我会修士，他在公元1480年从德意志前往圣地，并生动地描述了乘船时船上的臭气、不适以及污秽：爬满蛆虫的肉，不能饮用的水，无处不在的寄生虫。他回程时从亚历山大出发，在不适合航海的季节里，也像早年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一样，经受了狂风与海浪。不过，他得知有个隐秘的地方最适宜睡觉，就在捆得结结实实的香料包上方。<sup>17</sup>但至少对少数学者来说，朝圣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1358年，彼特拉克（Petrarch）受朋友乔瓦尼·曼德利（Giovanni Mandelli）的邀请，一起前往圣墓教堂。但彼特拉克认为待在后方更加安全，于是将一本小册子送给曼德利，在书中他描绘了穿越地中海的路线。他特别注明奥德修斯到访过的所有地方，还指出了意大利最南端的克罗托内（Crotone）的朱诺神殿（*Juno Lacinia*）；他注意到奇里乞亚就是庞贝击败大批海盗的地方；他曾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沉思片刻（“您本不应为其他人承担如此艰巨的职责，不妨用您的眼睛看看……周遭这些，您已用心感受到的这些事”）；但他最后却与曼德利分手，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亚历山大，不是在一堆香料之中，而是在亚历山大的坟墓和庞贝的骨灰旁。<sup>18</sup>以古典时代的遗址为中心的文化旅游即将开始。彼特拉克的《圣地导游手册》（*Itinerary*）现存四十份手稿，可见其受欢迎程度，尤其在15世纪的那不勒斯——因为曼德利就是在南意大利的海岸接受了大量关于古典时代的遗址的信息洗礼，这些内容（而非对圣地的兴趣）也吸引着广大读者。

彼特拉克的古典之旅在公元15世纪20年代由安科纳的一

名商人变为现实，该商人每次看到古典时代的遗址时都会惊呆，第一次是在他的家乡，然后是在地中海沿岸。但这位安科纳的希里亚克（Cyriac）还有政治动机：他向奥斯曼苏丹做自我介绍，而后者并没有意识到希里亚克还有个目的，即搜集资料用于针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不过，他的确很欣赏古典时代的遗迹，曾在 1436 年前往德尔斐，那里已是杂草丛生，令当地居民十分诧异的是，他竟在那里逗留了六天，在他误认为是主殿的地方，在剧场和体育场，热情地徘徊，抄录铭文，绘制示意图。<sup>19</sup>虽然绝大多数对古典时代感兴趣的人，仍像彼特拉克那样舒适地坐在自家的沙发里，但希里亚克的经历意味着跨越地中海进行游览的动力不再仅限于宗教或商业活动。

少数人在旅游时愿意“入乡随俗”，接受在海对岸生活的人们的宗教和习俗。有一位传奇的马略卡修士叫安塞尔默·突尔梅达（Anselmo Turmeda），他在波伦亚了解到伊斯兰教的知识后前往北非，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公元 15 世纪早期的知名穆斯林学者，他的教名为阿卜杜拉·塔尔朱曼（Abdallah at-Tarjuman）；他的墓如今依然立于突尼斯。一个世纪后，生于格拉纳达的学者兼外交官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赞（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即非洲的利奥（Leo Africanus），被是基督徒的海盗俘虏后带到罗马，在那里成为教宗利奥十世（Leo X）的门徒，并撰写了一篇非洲地理志：我们在此提到的这位著者，也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地中海以外伊斯兰世界的真实情况，他还在两大宗教间变来变去，先是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后来又重新皈依伊斯兰教。<sup>20</sup>

## 3

阿拉贡国王们的财富，以及他们治下许多王国的财富，为我们了解公元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富庶提供了极佳的指南。加泰罗尼亚的影响越过地中海，延伸到亚历山大和罗得岛等地的市场；到 15 世纪末，阿拉贡国王已经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整个欧洲政坛举足轻重。阿拉贡国王马丁（Martin）的继承人是小马丁，后者娶了西西里的女继承人，实际上这位女继承人在与小马丁结婚之前是被诱拐并送到西班牙的，但这门婚姻为阿拉贡国王提供了很好的口实，使他在 1392 年入侵该岛；15 世纪时，西西里岛由岛民议会委任的总督管理，阿拉贡国王的影响此时已然式微，他们在西西里的支脉也已消失。显然，和平有利于西西里人，同样也有利于那些想要购买西西里谷物的人。加泰罗尼亚的贵族们开始在西西里岛购入地产，并定居于此。<sup>21</sup>小马丁在撒丁岛因感染疟疾去世，他所取得的最后成就是加泰罗尼亚 - 阿拉贡人重新收复西西里岛的大片土地，从那之后，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影响占据了主要地位，例如艺术上的影响。<sup>22</sup>

阿拉贡统治者的新魄力在阿方索五世身上更具说服力，他于公元 1416 年即位，成为 15 世纪最伟大的君主之一。<sup>23</sup>巴塞罗纳王族的男性继承人绝嗣，而阿方索来自卡斯蒂利亚；  
382 尽管如此，他却将眼光转向地中海，其计划涵盖整个海洋。与所有阿拉贡国王一样，他也赢得了一个绰号：“宽宏大量的”（Magnanimous，或叫“慷慨者”）阿方索。这个绰号完美地表达出了他的愿望，即成为慷慨的庇护者。凭借与生俱来的高贵品质，他徜徉于同是西班牙人、为古罗马皇帝提供服务的

哲学家塞涅卡的著作当中；他热情地学习古典文献，对于史诗般描绘出来的古代战争很感兴趣。他了解到有两位极为成功的罗马皇帝就是西班牙人，即图拉真与哈德良。<sup>24</sup>阿方索立志在地中海重建罗马帝国，以应对逐渐发展起来的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其统治初年，他进攻科西嘉，因为教廷曾将科西嘉岛与撒丁岛一起交给阿拉贡的国王，不过那是在 1297 年。他仅占据了卡尔维（Calvi）这座堡垒，在其余地区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他的这次征战揭示出其野心绝不仅限于所继承的西班牙领地。为了实现建立罗马帝国的梦想，他将视线投向意大利，向糊里糊涂的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二世（Joanna II）大献殷勤，甚至还得到承诺，她会推荐阿方索作为其继承人（尽管这位女王私生活十分精彩，却没有任何子嗣）。不幸的是，她还承诺把日趋动荡的王国留给安茹公爵兼普罗旺斯伯爵——安茹的勒内（René of Anjou）。“好国王勒内”（*Le bon roi René*）同阿方索一样，也对骑士文化极为热衷，还赞助艺术；他也想拥有很多王国，不过当 1480 年他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他一无所有；与之相比，阿方索在 1458 年去世时已经拥有六七个王国以及一个公国。<sup>25</sup>为了争夺南意大利，阿方索与勒内断断续续地打了二十多年，耗费大量王室资源，因为维持一支强大的舰队花费巨大。这位君主的资金储备相当有限，因此他不得不毕恭毕敬地求助于议会，给了他们一个为获得他们最看重的特权而讨价还价的机会。<sup>26</sup>幸运的是，安茹的勒内比他还穷，但勒内成功调动了热那亚的舰队：自从一个多世纪前加泰罗尼亚人入侵撒丁岛后，热那亚人对加泰罗尼亚人的敌视就从未减退。

阿方索陷入严重危机。公元 1435 年，他率领舰队在蓬扎

岛附近海域迎击热那亚人；结果他被击败并被俘，之后被带到热那亚。但热那亚人却不得不将这名俘虏交给他们的领主——米兰大公菲利普·马利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  
388 大公竟然被阿方索吸引，决定与其结盟，使得局势彻底反转。米兰大公甚至还思忖将其公国转赠阿方索，而这时的阿方索计划控制整个意大利，无暇顾及伊比利亚事务。阿方索与勒内的战争漫长且耗资巨大，在 1442 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他用在城墙之下挖地道的办法占领了那不勒斯。即使勒内被驱逐出境，他也始终认为那不勒斯王国应该属于自己，因此仍不断地向四处征伐的阿拉贡人施压，而在 15 世纪 60 年代之前，热那亚始终是反抗西班牙人远征南意大利的基地。<sup>27</sup> 那不勒斯陷落后，意大利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1448 年，阿方索对一个战略意义极为重大的小国皮奥姆比诺（Piombino）发动攻击，这个国家与控制着富产铁矿、拥有舰队的厄尔巴岛结盟，皮奥姆比诺的商队和舰队还曾远航经商或者出征突尼斯。<sup>28</sup> 掌握了皮奥姆比诺，他就可以控制穿行于热那亚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商船，为他进一步入侵托斯卡纳提供跳板。虽然皮奥姆比诺的领主明智地选择臣服，并愿意每年贡献一只金制高脚杯，以换取阿方索对他的好感，但皮奥姆比诺仍是块难啃的骨头，多年以后，阿拉贡人才控制了厄尔巴岛两岸的基地，直到 16 世纪转归于西班牙人控制之下。<sup>29</sup> 15 世纪中期，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五大强权，即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教廷以及阿拉贡国王分割。虽然阿拉贡国王控制的领土面积最大（如果算上两座意大利岛屿的话，其面积会更大），他却不得不放弃主宰整个半岛的梦想。1454 年，其他四方签署了《洛迪和约》（Peace of Lodi），阿方索也最终于次年初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份协议保证了接下

来半个世纪的和平（间或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冲突），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签约国的力量转移到另一项紧急任务，即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上。

就在该条约签署的前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攻陷。所有关于抵抗土耳其人的讨论都无济于事：事实上，他们正怀着比以往更大的信心前往巴尔干半岛。早在公元1447年，阿方索就承诺为积极备战的匈牙利国王约翰·匈雅提（John Hunyadi）<sup>①</sup>提供援助。阿方索遵守承诺召集了军队，却将军队派去托斯卡纳参战。然而，他不只是在讨伐土耳其人上显得玩世不恭。<sup>30</sup>阿方索很喜欢将自己刻画成一位救赎大众的国王、为基督而战的勇士——就像是加拉哈德（Galahad）再世，位于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凯旋门上的巨大雕像即采用了加拉哈德的主题。他还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阿尔巴尼亚人——伟大的斯坎德贝格（Scanderbeg）——提供了颇为热心的支持，因为若奥斯曼人占据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的舰队和陆军就将直接威胁到南意大利。<sup>31</sup>阿方索的野心还扩展到卡斯特洛里佐（Kastellórizo），它是位于罗得岛以东的一座微型岛屿，成为阿拉贡舰队深入东地中海的海军基地（如今这里是希腊最偏远的领土）。<sup>32</sup>就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阿方索还曾与希腊亲王德莫特里奥斯·巴列奥略（Demetrios Palaiologos）谋划，打算从最后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那里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皇权，这样他就可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任命总督。阿方索去世后，为了纪念他，若阿诺·马特雷尔（Joannot Martorell）将

384

---

① 匈牙利原名为 János Hunyadi，故也译作雅诺什·匈雅提，此处依英文音译。——译者注

这些击败土耳其人、收复东地中海的宏大愿景写进了一部生动的小说中，这就是《骑士蒂朗》（*Tirant lo Blanc*）<sup>①</sup>。<sup>33</sup>从很多方面看，那好摆空架子的英雄蒂朗就是阿方索，或者就是这位国王所期待成为的那种人，该书（在经常出现的直白的爱情场景中）充斥着各种关于如何能最有效地击溃土耳其军队和热那亚人的建议，因为阿方索就将热那亚人视为奥斯曼人的秘密盟友。<sup>34</sup>在《骑士蒂朗》中，热那亚人试图挫败在罗得岛抗击土耳其人的医院骑士团：

大人啊，您要知道，我们骑士团有两名热那亚修士背叛了我们，因为在他们的建议下，可恶的热那亚人派遣所有舰船载着许多士兵到来，却没有带来任何给养。我们城堡里的叛徒还做了极其邪恶的勾当，他们磨去了我们所用十字弩上的刻痕，在上面涂抹肥皂和奶酪。<sup>35</sup>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围城之战中，热那亚人的行为也曾引起类似的怀疑。<sup>36</sup>

#### 4

到公元1453年，奥斯曼人凭借强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以及为圣战（*jihād*）事业的献身精神，已经肃清小亚细亚沿岸的一系列敌对的突厥小国，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扼守前海盗据点的艾登（Aydin）。尽管奥斯曼人在1402年曾大败于中亚霸主帖

---

① “*Tirant lo Blanc*”的本意为“白色的蒂朗”，2006年以该书内容改编的同名电影译为“骑士蒂朗”，所以此处也采用“骑士蒂朗”的译名。——译者注



木儿，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到 15 世纪 20 年代时，他们重返巴尔干半岛。1423 年，拜占庭皇帝将塞萨洛尼卡卖给威尼斯人；虽然威尼斯人对此已渴求多年，但他们掌控此城的时间只有七年，之后它很快就被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II）的军队攻陷。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的成功，平息了政府中的纷争，比较谨慎的官员们反对快速扩张，担心扩张过度会难以控制，而更富冒险精神的官员则将穆罕默德视为复兴罗马帝国的领袖，在他们的想象中，罗马帝国在穆斯林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将融合罗马 - 拜占庭、土耳其以及伊斯兰的统治概念。穆罕默德二世的目标是收复与建立，而不是毁灭罗马帝国。他的希腊书记员在发布文件时称穆罕默德为罗马人的“皇帝”（*basileus*）和统治者——这也是过去拜占庭皇帝的名号。<sup>37</sup>但他的帝国梦想并不限于新罗马，他还想要成为旧罗马的主人。现实的政治局势也将其注意力引向西部事务。斯坎德贝格在阿尔巴尼亚发动的反叛使苏丹意识到传统的政策存在漏洞，即不应该允许独立的基督徒领主统治巴尔干。即使那些像斯坎德贝格一样在奥斯曼宫廷中被培养成穆斯林的人也会变节。因此，奥斯曼的权威需要直接行使，奥斯曼人的权利需要推进到亚得里亚海岸。1468 年，斯坎德贝格去世，阿尔巴尼亚反叛力量也逐渐衰竭；到 1478 年时，穆罕默德已经控制了阿尔巴尼亚海岸的法罗拉，数月后他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天险罗查费山（Rozafa）护佑的城市斯库台（Scutari, Shkodër）。<sup>38</sup>威尼斯人一直控制着古老的都拉基乌姆，即如今的都拉斯；同时，位于黑山（Montenegro）峡湾腹地的港口科托尔（Kotor, Cattaro）也始终处于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要到下个世纪初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威尼斯人对亚得里亚海这个区域中其他领

地的控制都被削弱了。<sup>39</sup>

威尼斯人对斯坎德贝格不太热心，担心如果他们支持起义者，就会危及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商站。然而，失去阿尔巴尼亚的海岸要付出沉重代价，不仅仅因为那里作为盐场拥有重要价值，还因为威尼斯人驶出亚得里亚海时必须经由阿尔巴尼亚海岸。从海岸前往内陆的商道也同样重要，因为通过这些商道可获取产自巴尔干内陆山区的白银、奴隶和其他产品。土耳其人对威尼斯人在爱琴海的海军基地的袭击 [利姆诺斯岛和内格罗蓬特 (Negroponte) 均被土耳其人占据] 进一步增加了威尼斯人的困难。“高门”<sup>①</sup> (*Sumblime Porte*, 即人们所知的奥斯曼宫廷) 十分清楚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依然赋予威尼斯人以贸易特权。这一讯息非常明确: 与过去数个世纪地中海周围的穆斯林统治者一样, 奥斯曼人依然允许来自海外的基督徒商人自由活动; 但他们不能接受威尼斯人或热那亚人在“白海”拥有领地。<sup>40</sup>

征服者穆罕默德在统治末年, 下定决心要直面地中海的基督教政权。土耳其人的明确目标是位于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总部, 该骑士团于公元 1310 年占据该岛。从那之后, 医院骑士团不断对穆斯林商船发动海盗袭击, 还控制了小亚细亚一些沿岸站点, 最具代表的当属博德鲁姆 (Bodrum), 医院骑士团在此用哈利卡那索斯伟大陵墓 (Mausoleum of Halikarnassos) 的石头建造了城堡。罗得岛吸引穆罕默德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在古代就是非常著名的城市。<sup>41</sup> 萨克森的火炮专家米斯特·约格 (Meister Georg) 曾长期住在伊斯坦布尔, 为土耳其人提供

---

① 亦译为“宏伟门”, 是土耳其帝国宫廷议政之处。——译者注

了关于医院骑士团城堡的布局的宝贵信息，但在 1480 年时，罗得岛的防御极为坚固，即使土耳其最好的专家投射大量石弹也无法将其攻下。双方都不遗余力：医院骑士团在夜晚派出突击队，将被杀掉的土耳其人的首级带回来，他们还带着这些首级在市内游行以鼓舞守卫士兵的士气。土耳其人在这样坚决的抵抗面前颇感挫败，因此与医院骑士团签署条约，后者承诺不再干扰土耳其人的商船。<sup>42</sup>苏丹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失败，但罗得岛在之后的四十二年中始终是医院骑士团的财产。西欧人也没有忘记在罗得岛发生的事，因为在土耳其人面临严峻威胁的同时，西欧人感到了一丝振奋。此后不久，一部有关这次围城的木刻历史书在威尼斯、乌尔姆（Ulm）、萨拉曼卡（Salamanca）、巴黎、布鲁日和伦敦成为最早的畅销书之一。

与此同时，土耳其舰队也威胁到了西方。南意大利正是其直接的目标，因为它距离阿尔巴尼亚最近，也因为奥斯曼人若能控制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两侧，就能迫使威尼斯人服从苏丹的意志。威尼斯人并不想公开对抗土耳其人。当土耳其人在公元 1480 年对奥特朗托（Otranto）海峡发起攻击时，威尼斯人竟然帮助土耳其人，将其军队从阿尔巴尼亚转运到意大利，不过这种做法遭遇了威尼斯官方的反对。140 艘奥斯曼舰船（包括 40 艘桨帆船）将 1.8 万人带到海峡对岸。由于奥特朗托的居民拒绝投降，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葛迪克·艾赫迈德帕夏（Gedik Ahmet Pasha）对幸存者明示可能会发生的后果，然后下令发起攻击；这座城镇防御极为简陋，也没有安装火炮，结果自然没有悬念。在占领这座城市后，艾赫迈德帕夏下令杀死所有成年男性，约 2.2 万人中只留下 1 万人；有 8000 人沦

为奴隶，穿过海峡被遣送至阿尔巴尼亚。年迈的大主教在奥特朗托大教堂的最高祭坛上被杀。之后，土耳其人在阿普利亚南部散开，对周边的城镇进行劫掠。此时的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儿子费兰特（Ferrante），早先已经将军队派往托斯卡纳，而一旦他的军队与战舰成功集结，他就能发动一场漂亮的反击战。不过，即便是在撤退中，土耳其人依然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们还会再来，要来征服阿普利亚的港口。随后四起的谣言把这句话改为：有一支大军，已经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向意大利和西西里发动攻击。<sup>43</sup>

奥特朗托围城战在西欧产生巨大震动。地中海的所有基督教政权都提供援助以对抗土耳其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他是那不勒斯的费兰特的表兄弟。一个惹人注意的例外就是威尼斯人，他们声称经过数十年与苏丹的陆军和海军的冲突，已感精疲力竭。土耳其人的劫掠分队已进入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在威尼斯人控制下的领土弗留利（Friuli）——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从陆地与海洋逼近，威尼斯人选择了绥靖。<sup>44</sup> 威尼斯派驻阿普利亚的领事得到的指示是：他应该向那不勒斯国王表达对基督徒所取得胜利的欣慰，但仅限于口头，不能书面致意；书面信息经常会被间谍偷走，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 Repubblica）担心苏丹若看到被窃取信件的恭贺内容，会谴责威尼斯的两面派做法。

随着穆罕默德在公元 1481 年 5 月去世，南意大利再次遭到攻击的威胁得以解除。当时，穆罕默德年仅四十九岁。随后的数年当中，西方的统治者，如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和阿拉贡的斐迪南，都把他们的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作为政策的核心。这两位统治者都认为：他们如果控制了

意大利南部，就能凭借当地的资源大展身手，发动一场大规模十字军运动，因为距离很近，阿普利亚就是对奥斯曼领土发动攻击的最佳起点；他们都对那不勒斯的王位提出要求，而无视当地已经存在有着阿拉贡血统的王朝。1494 ~ 1495年，查理八世侵入南意大利，成为那不勒斯的统治者，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很快他就被迫撤退。如今，威尼斯感受到全方位的威胁。抗击奥斯曼人的十字军只会让奥斯曼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附近的水域交通更加危险。因此，在15世纪末，威尼斯控制了阿普利亚的一些港口，以确保可自由通行于该海峡。<sup>45</sup>1495年，在血淋淋的大屠杀以及野蛮劫掠的背景下，威尼斯人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莫诺波利（Monopoli）；然后，他们说服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二世将特拉尼、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交予他们，整个过程兵不血刃，并且对那些地区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509年。国王需要盟友，而他们需要阿普利亚的产品，这些出口产品包括：谷物、葡萄酒、盐、油、蔬菜，以及加农炮所需要的硝石。<sup>46</sup>然而，1502年，土耳其人占据了都拉斯，使威尼斯人失去了位于海峡阿尔巴尼亚一侧的最重要监听站。他们只能另建新的堡垒，这些堡垒今天依然矗立着。地中海逐渐分成两部分：奥斯曼治下的东部和基督徒居住的西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谁可能会赢得这场竞争；但也还有一个问题，即哪个基督徒政权能够主宰西地中海的水域。

## 5

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了一些桥梁。奥斯曼的宫廷对西方文化很是着迷，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要征服古老罗马帝国的宣言中

看出；与此同时，西欧人也努力理解土耳其人，并继续获取颇具异域风情的远东货物。<sup>47</sup> 画家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曾从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儿为穆罕默德二世绘制了一幅著名的画像，该像现藏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sup>48</sup> 奥斯曼对西方的军事压力几乎没有放松（只有在苏丹们的注意力转向波斯时才会出现），但奥斯曼人也意识到有必要在他们的疆土与西欧之间建立一个中立区，中立区的商人可获准进入差异极大的土耳其人的世界以及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这就是规模虽小但极富活力的商业共和国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西欧人称之为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的起源与威尼斯和阿马尔菲（Amalfi）一样，由蛮族入侵时逃到这里的一波难民建立，他们占据了达尔马提亚南部的一处多岩石的海角，附近的一道山峦挡住了斯拉夫人的入侵。拉丁人居住的拉古萨很快迎来了一支斯拉夫人，到公元 12 世纪末，这座城市使用两种语言，有的人讲南部的斯拉夫方言，有的人讲达尔马提亚语，后者是一种与意大利语紧密相关的罗曼语；在斯拉夫语当中，当地的居民被称为“丛林中的人”（*dubrovcani*）。虽然拉古萨人已经与独断专行的塞尔维亚以及内陆波斯尼亚的王公们签署协议，但他们仍然需要保护者，于是他们先接受西西里的诺曼诸王的庇护，然后依靠威尼斯，威尼斯人在 1202 ~ 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巩固了对达尔马提亚南部的控制。<sup>49</sup>

匈牙利国王在公元 1350 年介入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并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达尔马提亚，从那之后，拉古萨接受了匈牙利的宗主权（始于 1358 年）。<sup>50</sup> 这使得拉古萨人得以在没有严重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管理机构和商业网

络。一个商业贵族阶层出现了，他们凭借通往盛产白银和奴隶的波斯尼亚内陆地区的商路而获得利益；杜布罗夫尼克成为整个地区的主要食盐市场。<sup>51</sup> 由于本土缺乏白银，这里对东地中海出产的白银需求极为巨大，于是拉古萨商人前往东方的拜占庭和土耳其人统治地区寻找货源。<sup>52</sup> 黑死病过后，杜布罗夫尼克抓住新的机遇获得丰厚利润。本地的商业繁荣起来——事实上，倘若没有定期从阿普利亚运往达尔马提亚的小麦、油、腌肉、葡萄酒、水果和蔬菜，无论是杜布罗夫尼克还是其邻近地区都无法生存；甚至鱼都要从南意大利进口，一点儿也不像一座海洋城市。<sup>53</sup> 当地几乎没有适合耕种的土地。15 世纪的作家菲利普斯·德·狄维西斯（Philippus de Diversis）曾这样解释他家乡的本质：

拉古萨这个地区，由于贫瘠，也由于人口众多，仅依靠微薄的收入生活，因此没有任何人及其家庭仅仅依靠其地产就能生存，他们需要有其他收入，所以必须投身商业。<sup>54</sup>

对城里的贵族也投身商业的行为，他颇为尴尬，因为他知道经商在古罗马是禁忌，贵族们都要远远避开。另外，本地资源的匮乏也刺激了一些重要产业的出现：来自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羊毛被加工成粗纺毛织物，到 16 世纪中期，杜布罗夫尼克已

免除拉古萨人的港口税。<sup>55</sup>拉古萨人的船只得以在阿普利亚海域占据优势地位。这只是开始，此后拉古萨开始扩张，其舰队将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商业舰队之一；英语中“*argosy*”一词表示“商船队”，该词并非来自伊阿宋的阿尔戈英雄，而是被误传的“Ragusa”。一位名叫本内德托·柯特鲁格利（Benedetto Cotrugli）的拉古萨贵族，也被称为柯特鲁耶维奇（Kotruljevic），是那不勒斯的制币师傅，但令其名声大噪的却是一本以经商艺术为主题的小册子，它讲述了可保证成功的商业技巧。他给商人的睿智建议是：要避免赌博或纸牌类的赌博，也不能太耽于吃喝。<sup>56</sup>

这样一个距离各位斯拉夫大公的辖区不过几步远的海洋共和国，自然难以逃脱他们的干涉，也正因如此，拉古萨人更愿意接受远距离的保护者——即便他们是土耳其人。到公元15世纪中期，充满敌意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从不同的方向逼近，这座城市遭受的困扰因此不断增多。杜布罗夫尼克被其周边建造起来的坚固城墙——这些城墙今天仍然存在——护卫。杜布罗夫尼克的一个敌人是斯捷潘·武科西奇（Stjepan Vukcic），此人是杜布罗夫尼克后方地域的“黑塞哥”（*herceg*，或称公爵），后来这块土地被称为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武科西奇的头衔源自奥斯曼当局，不过他认为自己可以独立自主，当初向“高门”的臣服只是为了确保其权力，并非在权力方面做出让步。他决定在科托尔海湾入口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建立贸易据点以增加收入，希望以此打败杜布罗夫尼克。其利润来源不是来自远东的异域珍品，而是食盐，也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所经营的传统商品。<sup>57</sup>不过，拉古萨人对领土扩张并不是毫无野心。他们当然也想要获得新海



尔采格，甚至还想夺取距离黑塞哥维那不远处的塞尔维亚城市特雷比涅（Trebinje）。1451年，拉古萨的传令官宣称：若有人能成功暗杀黑塞哥（此人也被人们怀疑是异端分子），就可以获得1.5万杜卡特的报酬，还可被擢升为拉古萨的贵族。

这一威胁震慑住了武科西奇，他不得不从拉古萨人的领土上撤退，可杜布罗夫尼克却不得不应对新的威胁，因为征服者穆罕默德已经成功地将其权力扩张到巴尔干诸公国。于是，在公元1458年，拉古萨的使臣不辞辛劳地前往位于斯科普里（Skopje）的苏丹朝廷，向其表示臣服。他们还希望：作为回报，苏丹能赋予他们商业特权。这中间必然有一些讨价还价，但到1472年时，他们已经需要每年缴纳一万杜卡特的贡赋——此后，年贡金额不断增加。<sup>58</sup>定期缴纳的年贡要比雄伟的城墙更有保障。后来的局势发展却很奇怪。拉古萨人在奥斯曼治下的各地经商，但他们却给土耳其人的敌人提供支持，如斯坎德贝格。当时，斯坎德贝格从阿尔巴尼亚前往南意大利，准备为陷入围困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效劳，途经拉古萨；当武科西奇被土耳其人驱逐时，拉古萨人还为其提供帮助，显然已经忘记了当年准备暗杀他时的想法。然而，土耳其人却很少打压杜布罗夫尼克，看重的是它带来的利益，作为中间商，它能为“高门”提供货物和年贡。约1500年，威尼斯人努力阻止奥斯曼人在阿尔巴尼亚海岸的扩张，当他们的努力受挫时，拉古萨人反而从中获益。威尼斯无法再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但拉古萨人的商船只要高挂着他们的旗子，就可以在土耳其人辖下的水域自由通行，在东西方之间买卖货物。拉古萨人逐渐把他们应向奥斯曼苏丹缴纳的年贡置于脑后，炫耀

着城市自由的神话，将其缩减成简单的座右铭——“自由”（LIBERTAS）。

## 注 释

1. D. Abulafia, *A Mediterranean Emporium: the Catalan Kingdom of Majorca* (Cambridge, 1994), pp. 217–21; F. Melis, *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medievale (studi nell'Archivio Datini di Prato)* (Siena and Florence, 1962); I. Origo, *The Merchant of Prato*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63).
2. Origo, *Merchant of Prato*, p. 128.
3. I. Houssaye Michienzi, 'Réseaux et stratégies marchandes: le commerce de la compagnie Datini avec le Maghrib (fin XIVe–début XVe siècle)', (doctoral dissertation,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Florence, 2010).
4. Origo, *Merchant of Prato*, pp. 97–8.
5. R. de Roov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 1397–1494* (Cambridge, MA, 1963).
6. B. Kedar, *Merchants in Crisis: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century Depression* (New Haven, CT, 1976), 书中强调所谓的经济衰退伴随着商人们心理上的沮丧。
7. O.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 2004), pp. 118–33.
8. F.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D, 1973), pp. 176–9; S. A. Epstein, *Genoa and the Genoese, 958–1528* (Chapel Hill, NC, 1996), pp. 220–21.
9. Lane, *Venice*, p. 186; Epstein, *Genoa*, pp. 219–20.
10. S. McKee, *Uncommon Dominion: 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 (Philadelphia, PA, 2000), pp. 145–61.
11. Lane, *Venice*, pp. 189–201; Epstein, *Genoa*, pp. 237–42.
12. Lane, *Venice*, p. 196.
13. Cf. Kedar, *Merchants in Crisis*.
14. Dante Alighieri, *Divina Commedia*, 'Inferno', 21:7–15; Lane, *Venice*, p. 163.
15. Lane, *Venice*, pp. 122–3, 163–4; F. C. Lane, *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 (Baltimore, MD, 1934).
16. Lane, *Venice*, p. 120.

17. H. Prescott, *Jerusalem Journey: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4); H. Prescott, *Once to Sinai: the Further Pilgrimage of Friar Felix Fabri* (London, 1957).
18. *Petrarch's Guide to the Holy Land: Itinerary to the Sepulc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ed. T. Cachey (Notre Dame, IN, 2002).
19. Cyriac of Ancona, *Later Travels*, ed. E. Bodnar (Cambridge, MA, 2003); M. Belozerskaya, *To Wake the Dead: a Renaissance Merchant and the Birth of Archaeology* (New York, 2009); B. Ashmole, 'Cyriac of Ancona', in *Art and Politics in Renaissance Italy*, ed. G. Holmes (Oxford, 1993), pp. 41–57.
20. N. Z.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2006).
21. P. Corrao, *Governare un regno: potere, società e istituzioni in Sicilia fra Trecento e Quattrocento* (Naples, 1991).
22. J. Carbonell and F. Manconi (eds.), *I Catalani in Sardegna* (Milan, 1994); G. Goddard King, *Pittura sarda del Quattro-Cinquecento* (2nd edn, Nuoro, 2000).
23. A. Ryder, *Alfonso the Magnanimous, King of Aragon, Naples, and Sicily, 1396–1458* (Oxford, 1990).
24. P. Stacey, *Roman Monarchy and the Renaissance Prince* (Cambridge, 2007).
25. J. Favier, *Le roi René* (Paris, 2009); M. Kekewich, *The Good King: René of Anjou and Fifteenth-century Europe* (Basingstoke, 2008).
26. W. Küchler, *Die Finanzen der Krone Aragon während des 15. Jahrhunderts (Alfons V. und Johann II.)* (Münster, 1983); L. Sánchez Aragonés, *Cortes, monarquía y ciudades en Aragón, durante el reinado de Alfonso el Magnánimo* (Saragossa, 1994).
27. A. Gallo, *Commentarius de Genuensium maritima classe in Barchinonenses expedita, anno MCCCCLXVI*, ed. C. Fossati (Fonti per la storia dell'Italia medievale,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ser. 3, vol. 8, Rome, 2010); and C. Fossati, *Genovesi e Catalani: guerra sul mare. Relazione di Antonio Gallo (1466)* (Genoa, 2008).
28. D. Abulafia, 'From Tunis to Piombino: piracy and trade in the Tyrrhenian Sea, 1397–1472', in *The Experience of Crusading*, vol. 2: *Defining the Crusader Kingdom*, ed. P. Edbury and J. Phillips (Cambridge, 2003), pp. 275–97.
29. D. Abulafia, 'The mouse and the elephant: relations between the kings of Naples and the lordship of Piombino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J. Law and B. Paton (eds.), *Communes and Despots: Essays in Memory of Philip Jones* (Aldershot, 2010), pp. 145–60; G. Forte, *Di Castiglione di Pescaia presidio aragonese dal 1447 al 1460* (Grosseto, 1935; also published in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storica maremmana*, 1934–5).
30. M. Navarro Sorní, *Calixto II Borja y Alfonso el Magnánimo frente a la cruzada* (Valencia, 2003); cf. A. Ryder, 'The eastern policy of Alfonso the Magnanimous', *Atti dell'Accademia Pontaniana*, vol. 27 (1979), pp. 7–27.

31. D. Abulafia, 'Scanderbeg: a hero and his reputation', introduction to H. Hodgkinson, *Scanderbeg* (London, 1999), pp. ix–xv; O. J. Schmitt, *Skënderbeu* (Tirana, 2008; German edn: *Skanderbeg: der neue Alexander auf dem Balkan*, Regensburg, 2009); F.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ed. W. Hickman (Princeton, NJ, 1979), pp. 390–96.
32. D. Duran i Duelt, *Kastellórizo, una isla griega bajo dominio de Alfonso el Magnánimo (1450–1458)*, colección documental (Barcelona, 2003); C. Marinescu,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Alfonse V d'Aragon, roi de Naples (1416–1458)* (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 Memòries de la Secció Històrico-Arqueològica, vol. 46, Barcelona, 1994), pp. 203–34.
33. D. Abulafia, 'Genoese, Turks and Catalans in the age of Mehmet II and Tirant lo Blanc', in *Quel mar che la terra inghirlanda. Studi sul Mediterraneo medievale in ricordo di Marco Tangheroni*, 2 vols. (Pisa, 2007), vol. 1, pp. 49–58; English translations: C. R. La Fontaine, *Tirant lo Blanc: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New York, 1993), a full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D. Rosenthal, trans. *Tirant lo Blanc* (London, 1984), an abridged version.
34. E. Aylward, *Martorell's Tirant lo Blanch: a Program for Military and Social Reform in Fifteenth-century Christendom* (Chapel Hill, NC, 1985).
35. *Tirant lo Blanc*, chapter 99.
36. Douka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by Douka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istoria Turco-Byzantina*, ed. H. Magoulias (Detroit, 1976), chap. 38:5, p. 212.
37. H. İnalcık,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1973).
38.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p. 359–66.
39. P. Butorac, *Kotor za samovlade (1355–1420)* (Perast, 1999), pp. 75–115.
40. L. Malltezi, *Qytetet e bregdetit shqiptar gjatë sundemit Venedikas (aspekte te jetës së tyre)* (Tirana, 1988), pp. 229–41 (French summary); O. J. Schmitt, *Das venezianische Albanien (1392–1479)* (Munich, 2001).
41. L. Butler, *The Siege of Rhodes 1480* (Order of St John Historical Pamphlets, no. 10, London, 1970), pp. 1–24; E. Brockman,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1969);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p. 396–9.
42. Butler, *Siege of Rhodes*, pp. 11, 22.
43. H. Houben (ed.), *La conquista turca di Otranto (1480) tra storia e mito*, 2 vols. (Galatina, 2008);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p. 390–91, 395.
44. Babinger, *Mehmed the Conqueror*, pp. 390–96.
45. C. Kidwell, 'Venice, the French invasion and the Apulian ports', in *The French Des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 1494–1495: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ed. D. Abulafia (Aldershot, 1995), pp. 295–308.
46. *Ibid.*, p. 300.
47. N. Bisaha, *Creating East and West: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the Ottoman Turks* (Philadelphia, PA, 2004); R. Mack, *Bazaar to Piazza: Islamic Trade and Italian Art, 1300–1600* (Berkeley, CA, 2002).

48. C. Campbell, A. Chong, D. Howard and M. Rogers, *Bellini and the East*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2006).
49. D. Abulafia, 'Dalmatian Ragusa and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54 (1976), pp. 412-28, repr. in D. Abulafia, *Italy, Sici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1100-1400* (London, 1987), essay x.
50. R. Harris, *Dubrovnik: a History* (London, 2003), pp. 58-63.
51. F. Carter, 'Balkan exports through Dubrovnik 1358-1500: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roatian Studies*, vols. 9-10 (1968-9), pp. 133-59, repr. in F. Carter's strange *Dubrovnik (Ragusa): a Classic City-state* (London, 1972), pp. 214-92, much of the rest of which is an unattributed reprint of L. Villari, *The Republic of Ragusa* (London, 1904).
52. B. Krekić, *Dubrovnik (Raguse) et le Levant au Moyen Âge* (Paris, 1961).
53. B. Krekić, 'Four Florentine commercial companies in Dubrovnik (Ragus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The Medieval City*, ed. D. Herlihy, H. Miskimin and A. Udovitch (New Haven, CT, 1977), pp. 25-41; D. Abulafia, 'Grain traffic out of the Apulian ports on behalf of Lorenzo de' Medici, 1486-7', *Karissime Gotifride: Historical Essay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Godfrey Wettinge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P. Xuereb (Malta, 1999), pp. 25-36, repr. in 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ncounters: Economic, Religious, Political, 1100-1550* (Aldershot, 2000), essay ix; M. Spremić, *Dubrovnik i Aragonci (1442-1495)* (Belgrade, 1971), p. 210.
54. Filip de Diversis, *Opis slavnoga grada Dubrovnika*, ed. Z. Janeković-Römer (Zagreb, 2004), p. 156; B. Krekić, *Dubrovnik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a C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orman, OK, 1972), p. 35.
55. Spremić, *Dubrovnik i Aragonci*, pp. 207-11 (Italian summary).
56. B. Cotrugli, *Il libro dell'arte di mercatura*, ed. U. Tucci (Venice, 1990); B. Kotruljević, *Knjiga o umijeću trgovanja* (Zagreb, 2005); also, on winds, waves and navigation: B. Kotruljević, *De Navigatione - O plovidbi*, ed. D. Salopek (Zagreb, 2005).
57. Harris, *Dubrovnik*, pp. 88-90.
58. *Ibid.*, pp. 93, 95; N. Biezman, *The Turco-Ragusan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firmāns of Murād III (1575-1595) extant in the State Archives of Dubrovnik* (The Hague and Paris, 1967).

## 二 西方的变迁 (1391 ~ 1500 年)

### 1

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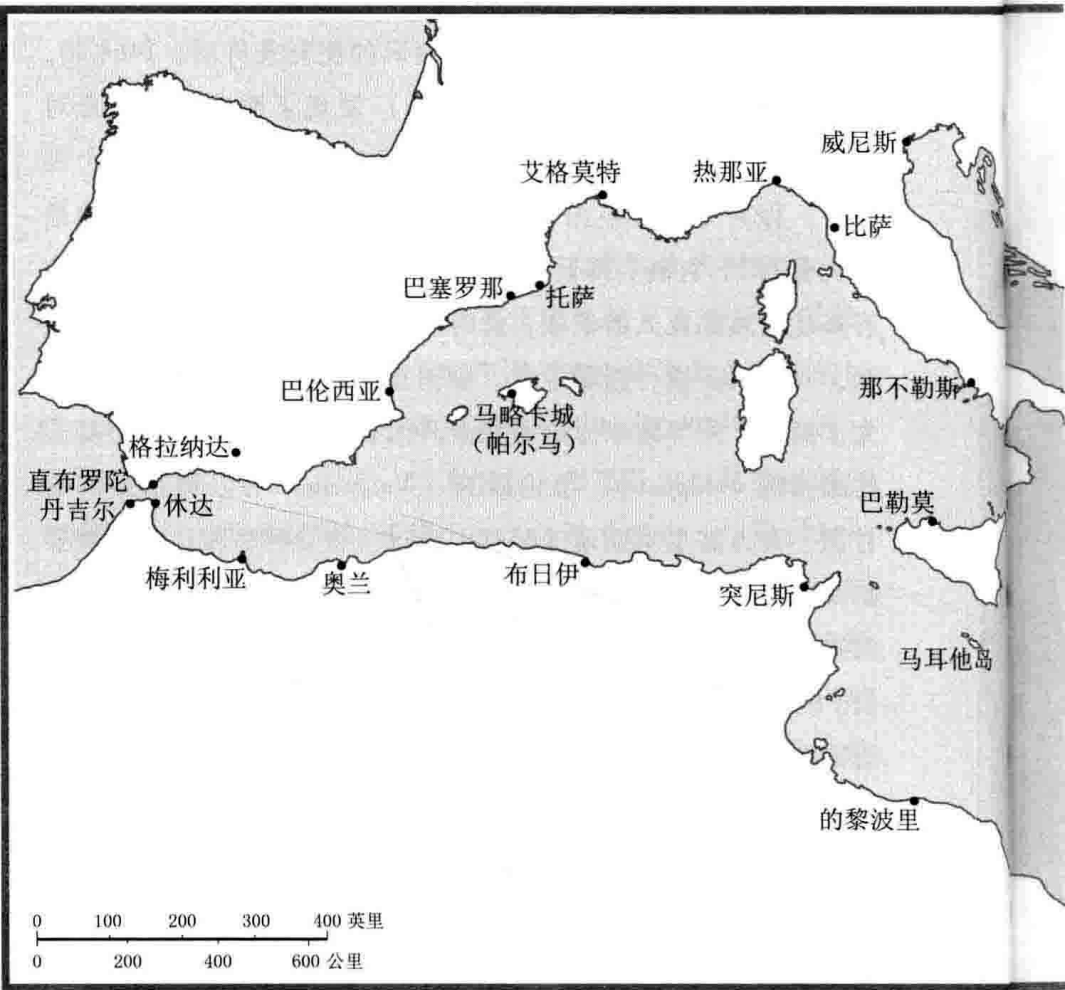
当拉古萨人凭借与土耳其人的特殊关系而收获利益时，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却在与奥斯曼宫廷建立联系方面更为谨慎。苏丹并不想与他们断交，但他们却视东地中海为日益危险的区域。威尼斯人与埃及的马木留克苏丹间不时发生的纠纷，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沟通难度，因为埃及人想要征收更高的税额以支撑其政权。马木留克对于整个地区也是个威胁。公元 1424 ~ 1426 年，他们侵入塞浦路斯，抓走了当地的国王杰纳斯（Janus）以及六千名俘虏；杰纳斯不得不支付二十万杜卡特赎金才重新取得王位，据说，从那以后杰纳斯再未笑过。1444 年，马木留克包围罗德岛。1460 年，他们支持吕西尼昂的詹姆斯（James of Lusignan）继承塞浦路斯王位，并派遣八十艘战舰直抵该岛，令整个基督教世界感到惊恐，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詹姆斯——这样一个私生子——竟想借助埃及人的帮助来谋取他没有资格得到的王位。<sup>1</sup>

当奥斯曼人和马木留克对这片区域造成的压力令人无法忍受时，热那亚人与其对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西方，从西西里和西班牙购买白糖，从西西里和摩洛哥购买谷物。尽管初看起来，公元 15 世纪中期时的热那亚困难重重，但这时才是其真正的经济复兴期：该城虽仍然深陷内斗，但大部分居民仍能从

贸易和投资中获利，城市再次繁荣起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市民入股新成立的公共银庄——圣乔治银庄（Banco di San Giorgio），它最终获得了对科西嘉岛的控制。<sup>2</sup>热那亚人失去了从小亚细亚弗凯亚的明矾矿获取明矾的便利条件后，1464年，在罗马的入口处——托尔法（Tolfa）发现了明矾矿，这是对热那亚人的最佳补偿；教宗庇护二世（Pius II）说起这个发现时，称其为“在抗击土耳其人的过程中，我们所取得的最伟大胜利”。它确实降低了对“土耳其人”的依赖，但仍然没有降低对热那亚人的依赖，此时热那亚人将注意力转向中意大利，对明矾矿进行垄断经营。制糖技术也传到西方，其速度要先于商人，并导致东方的制糖业开始衰落。<sup>3</sup>西西里制造出复杂的磨糖机（*trappeti*）。巴伦西亚（Valencia）可以种植最好的甘蔗，商人甚至从遥远的德意志到这里建立种植园；由于需要贮存原糖，当地也发展出瓷器制造业，“西班牙-摩尔风格”的瓷器使得巴伦西亚名扬四海，今天在许多博物馆均可见到它们。<sup>4</sup>商业转向西方的趋势如此之强，并在15世纪20年代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影响到马德拉群岛（Madeira），然后传播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Cape Verde）和圣多美（São Tomé）——这些地区大部分隶属葡萄牙，但其中的资本与技术均来自热那亚人，据说马德拉群岛的第一批糖业股份就来自西西里。<sup>5</sup>

393

通往大西洋的商站重新受到重视。虽然格拉纳达在公元1492年之前一直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它也是热那亚商人、佛罗伦萨商人和加泰罗尼亚商人的聚集中心，他们定期前往阿尔梅里亚和马拉加（Málaga）购买丝绸、干果和瓷器。倘若没有从基督徒商人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很难说格拉纳达那斯里德







(Nasrid) 王朝的苏丹们如何做才能维系自己的政权 [或者建造如阿罕布拉 (Alhambra) 宫殿这样的恢宏建筑]。但他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狂热的伊斯兰信仰庇佑了格拉纳达, 外来的资金并无多大用处。<sup>6</sup> 当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成功地迫使格拉纳达苏丹缴纳年贡时, 这里变得更加中立。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之间的边境战争从未停歇, 但它更像是一次赛期很长的锦标赛, 其更成功之处在于: 它催生出了关于美丽的摩尔公主的西班牙民谣, 而非赢得领土。

394 这种脆弱的稳定状态在公元 1415 年被打破, 当时葡萄牙人派遣一百艘战舰前去攻打休达 (Ceuta), 并在短暂的围城后占领该城; 也是在这场战争中, 国王的儿子, 即后来被称为“航海家”的亨利, 得到了启发。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葡萄牙人对海峡地区的复杂洋流一无所知, 因此他们的舰队遭遇夏季风暴, 有一部分被吹回西班牙。这使得休达总督有时间召集摩洛哥人来巩固其防御, 但随后他又愚蠢地放弃了请求。葡萄牙人在犹豫是执行原计划, 还是转而攻击直布罗陀海峡地区的格拉纳达领土; 无论从哪方面说, 直布罗陀都是最有利的选择, 因为自 1410 年巨岩发生起义以来, 它一直被非斯 (Fez) 与格拉纳达争来夺去。但休达更大、更富有, 位置也不是那么险峻, 它横跨一道将哈乔山 (Monte Hacho) 的隆起地带与非洲大陆相连的狭长半岛。征服休达在当时引起了欧洲人的震惊。没有人能理解葡萄牙宫廷究竟在想什么。当他们听说了葡萄牙宫廷的一桩秘闻后, 这种震惊进一步加剧: 人人都知道他们正在打造一支舰队, 雇用外国船只, 但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打算对格拉纳达发起攻击, 尽管卡斯蒂利亚人始终坚持攻击格拉纳达是卡斯蒂利亚的事。<sup>7</sup>

如此一来，葡萄牙人就成为直布罗陀海峡区域不受欢迎的第四支力量，其他三支力量是马里尼德家族（Marinid）治下的摩洛哥、那斯里德治下的格拉纳达以及卡斯蒂利亚。虽然葡萄牙人很渴望获得休达的财富，却没能保有：在穆斯林商人的集体抵制下，休达沦为了一座空荡荡的鬼城，居民主要是葡萄牙的守军以及受到惩罚被流放到那里的人。葡萄牙人原本希望夺取休达能够打通连接摩洛哥大西洋一侧的粮食产地，但这场战役的后果却恰恰相反。休达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如鲠在喉。然而，他们太过骄傲又不愿意放弃，甚至还希望在摩洛哥进一步扩大领地：公元1437年，葡萄牙人打算夺取丹吉尔，但遭遇了耻辱性的大败（直到很久之后的1471年才占领该镇）。亨利王子的弟弟费尔南多（Fernando）作为人质被送到非斯，只有葡萄牙人将休达归还才能被释放；亨利表示同意，后来却又食言，这让他永世蒙羞，而他的弟弟也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sup>8</sup>这一协议的长期影响在于，休达一直被葡萄牙人控制，直到1668年才落入西班牙人之手。<sup>9</sup>16世纪时，路易斯·德卡蒙斯（Luis de Camões，又译作路易·德贾梅士）撰写了关于葡萄牙扩张的伟大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Lusiads*），从那之后，征服休达就被看作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扩张的第一步：

396

千条战船如鸟儿般展翅翱翔，  
乘着海风鼓起风帆，  
劈开银色的汹涌海浪，  
向着那赫拉克勒斯竖立的  
石柱之所在驶去。<sup>10</sup>

显然，尽管此时的葡萄牙人还不能预言将要开辟从非洲前往印度的商路，然而，从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正努力地否定着托勒密的《地理志》（*Geography*）。

葡萄牙水手们的目标并不是遥远的海域，而是地中海。<sup>11</sup>黑死病过去后兴起的大规模重建浪潮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新商业中心以及新商人群体的涌现；到访地中海的大西洋客人越来越多，如葡萄牙人。这些商业活动集中于短途、定期的商路，并将其充分开发。葡萄牙人、巴斯克人、坎塔布里亚人（Cantabrians）和加利西亚人（Galicians）纷纷前往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从事咸鱼贸易。<sup>12</sup>也有一些更加雄心勃勃的长途贸易：据载在公元1412年，伊维萨岛出现了一艘英格兰船；1468年，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多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IV）签署商业协议。<sup>13</sup>一些雄心勃勃的英格兰远程航行是由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商人实现的。1457年，罗伯特·斯托米（Robert Sturmy）领着三艘船驶往黎凡特，但返程途经马耳他附近海域时遭遇热那亚人的攻击，两艘船沉没。消息传回英格兰时，民众强烈抗议，反对热那亚人对北欧人试图竞争地中海商路的封锁行为。南安普顿（Southampton）市长立刻将他能找到的所有热那亚人抓捕起来。<sup>14</sup>这是英格兰与地中海武力冲突的开端，而这种关系也将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彻底改变这片海域。

毫不奇怪的是，从地中海港口驶出的法国商船也想在与亚历山大的香料贸易中为自己谋取一方市场。<sup>15</sup>公元1432年，一位富有的毛皮商之子布尔日的雅克·科尔（Jacques Coeur of Bourges）从纳博讷前往亚历山大与大马士革，黎凡特地区的重重商机让他很是着迷。后来他为王室效力，很快他的聪明才

智就获得了认可；他担任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的军需官（*argentier*），负责物资供应，包括王室需要的奢侈品；在15世纪40~50年代，他在法国与埃及以及北非之间建立起联系，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当时的一位作者称：他至少掌管着四艘大型帆桨船，是“当时法国人当中第一位将商船武装起来的人，船上装满了法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羊毛服装和其他产品，时常停靠在非洲和东方的海岸”。<sup>16</sup>他开始认识到，蒙彼利埃附近那片污浊泥潭边的艾格莫特，是实现其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的基地；巴塞罗那的城市议会担心雅克·科尔会将香料贸易转移到那边，企图建立法国王室的垄断权。事实上，人们的确不完全清楚这些法兰西帆桨船是属于法国国王的，还是那位雄心勃勃的军需官的；也可能这种差别无关紧要，因为国王与他的军需官可分享这些利润。雅克·科尔努力获取埃及马木留克苏丹们的好感，后者允许他在贸易时享受一些特惠权，于是他的代理商网络得到增强和巩固。他曾经被视为典型的重商主义者，很好地反映出在地中海范围内实施积极的贸易政策所能带来的政治优势。<sup>17</sup>他的成功招致嫉妒，而他与外国政权，从马木留克苏丹到普罗旺斯的统治者安茹的勒内所建立的联系，似乎表明他是在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1451年，他的政敌们联合反对他；他以挪用公款与叛国的罪名被捕，在饱受折磨后被流放。尽管这张商业网并没有使其免于逮捕，但雅克·科尔的生涯充分展示出，在15世纪中期的地中海，富于野心的商人们所能紧紧抓住的新商机。

## 2

所有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都需要绕过那块巨岩。卡斯 398

蒂利亚的冒险家们决定收复这个公元 14 世纪时他们的同胞短暂控制过的城镇。1436 年，涅夫拉（Niebla）伯爵曾对直布罗陀发起攻击，失败后在撤退途中与四十名同伴一同被淹死；他的残骨被放在一个藤筐（*barcina*）中示众，直到今天，直布罗陀有一道门仍以“巴尔齐纳”（*Barcina*）命名。最后，在 1462 年，当城中的首领们去格拉纳达朝觐苏丹时，梅地纳 - 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趁机夺取巨岩。梅地纳 - 西多尼亚的公爵们具有强大的力量，指挥着自己的海军战舰，并且认为他们可以对巨岩为所欲为，包括使当地居民完全被外部人口替代。1474 年，四千三百五十名“皈依者”——刚刚皈依基督教的原犹太人——定居直布罗陀；他们希望借此逃脱在家乡科尔多瓦遭受到的苦难，并主动承担城市的防御职责。然而，公爵很快就被说服，认为这些皈依者会把直布罗陀献给对他们抱有同情心的国王与王后。他原本的计划是远征葡萄牙人控制的休达（这就是他对同为基督徒的邻人所表现出的爱），却指挥着舰队对直布罗陀发起了攻击并很轻易地再次将之收复。这一次，被迫离开的是皈依者。巨岩此后一直被梅地纳 - 西多尼亚诸公爵掌控，直到 1501 年时，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坚持认为：必须把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地区置于王室的掌控之下。<sup>18</sup>

卡斯蒂利亚王国控制下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非常有限，主要包括公元 13 世纪时征服的古老的穆尔西亚（*Murcia*）王国。15 世纪，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都经历了严重的内斗，内斗最终发展成为 15 世纪 70 年代伊莎贝拉与葡萄牙国王争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内战。也是在那时，伊莎贝拉嫁给了阿拉贡与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与卡斯蒂利亚一样，阿拉

贡的国王也刚刚从内战中产生。1458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于那不勒斯去世，此前，他认为自己的南意大利王国是可以任意支配的财产，并将其作为遗产赠给私生子费兰特（Ferrante）；而其他所有领地——包括位于西班牙本土的一些地区、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与西西里岛——都被传给阿方索的兄弟约翰（John），此时约翰已经通过联姻成为纳瓦拉国王。约翰拒绝将纳瓦拉交给其继承人，也就是颇受民众拥戴的比亚纳（Viana）王子查理（Charles），查理在纳瓦拉以及后来在加泰罗尼亚的支持者们将他奉为英雄，当他不明不白地、很可能是被下毒毒死之后，这种情绪更加强烈。纳瓦拉内战拉开了加泰罗尼亚内战的序幕。这场冲突的原因在于黑死病之后，城镇和乡村的巨大经济变革引发了整个社会的紧张态势。<sup>19</sup>

399

在巴塞罗那，一些颇有群众基础的党派——被称为布斯卡党（*Busca*）——要求减税、参与城市管理、严格限制律师与医师的收费、限制外国纺织品的进口以及对外国船只的使用。<sup>20</sup>概括起来，他们（向资金匮乏的君主提出）的要求就是一个词——“恢复”（*redreç*），比较贴切的翻译是“经济复苏”。布斯卡党获得了城市议会的控制权，却无力解决巴塞罗那的问题。到阿方索五世时期，布斯卡党与毕加党（*Biga*）——一个由古老的贵族家族组成的松散党派——一起操纵政权；在公元1462年加泰罗尼亚内战爆发之际，巴塞罗那依然处于分裂之中。马略卡岛也是一个处于分裂之中的社会。15世纪时，这里不断爆发政治冲突，主要是首府居民与那些生活在首府以外的岛民——“城外入”（*forenses*）——之间的竞争。当阿方索五世不在西班牙本土时，这一冲突进一步加剧；马略卡城遭到“城外入”的围困。此外，15世纪后半

期（1467年、1481年和1493年）时，瘟疫继续在岛上肆虐。<sup>21</sup>

然而，真实的情形并没有那么令人绝望。在马略卡，富人们赞助艺术家，创作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马略卡、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和佩皮尼昂的市民们建造了精美的凉廊（*llojjas*），被称为“海事代理”（*Consulate of the Sea*）的商业法庭就设在这些凉廊内；在这里，法庭审理各种商业行为——涉及远洋保险合同的签订、债券转卖、现金兑换等。<sup>22</sup>马略卡的凉廊建于公元14世纪30年代，由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吉列姆·萨格雷拉（*Guillem Sagrera*）设计，他还为阿方索设计了那不勒斯新堡（*Castelnuovo*）中的大厅，将  
400 西班牙晚期哥特式建筑风格带到了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在他设计的凉廊中，高耸的圆柱看上去十分惊艳，当后来皮雷·康普特（*Pere Compte*）在1483~1498年为巴伦西亚建造同样雄伟的凉廊时，也部分吸收了萨格雷拉的高耸圆柱因素。巴伦西亚凉廊内壁的顶部有一行醒目的拉丁铭文，声称：

我是一幢花费十五年建成的辉煌建筑。市民们为之欢呼，并亲眼见证，经商是如此美好，当它对邻人诚实守信时，当它不把金钱用于高利贷时。如此行事的商人将会飞黄腾达，并终将得享永生。

乍一看，这并不是阿拉贡国王治下的土地能够“飞黄腾达”的时代。<sup>23</sup>公元14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失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早些年遭到抑制的意大利资本开始主宰西班牙海滨地区的商业。<sup>24</sup>巴塞罗那的商业精英们因贸易存在风险而厌倦



贸易，越来越多地选择投资债券，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1401年，在巴塞罗那滨海地区，他们建起了一所被称为“兑换桌”（Taula de Canvi）新的公共银行，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为了维系阿方索在地中海的战争支出，国王的财政需求耗尽了西班牙辖区的资金。不过，还是存在好消息的。阿拉贡国王构建的商业网络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焕发了新的生机。从1404年到1464年，几乎每年都有船只从巴塞罗那出发前往东地中海，其中绝大多数船只属于加泰罗尼亚人，而非外籍人。1411年，有十一艘加泰罗尼亚商船驶往黎凡特，1432年有七艘，1453年有八艘。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高，但这些大型商船是去收购诸如香料这样的高价商品的，通常它们的交易量都比较小。加泰罗尼亚人经过数十年谨慎小心的经营，发展起自己的黎凡特贸易，终于成为继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之后的第三支重要力量；他们在贝鲁特经商，在大马士革设置办事处。<sup>25</sup>这里也有定期前往佛兰德和英格兰的船只（主要是外国商船）。<sup>26</sup>

这些是大型帆桨船的重要航行路线，但还有一条极为活跃的商路，那就是满载谷物、干果、油、盐和奴隶的坚固的圆形柯克船所行驶的路线。如今我们掌握了巴塞罗那在1428年到1493年之间将近两千次的出航记录，其中有25%是前往西西里，约15%的目的地是撒丁岛，超过10%是前往南意大利——换句话说，是前往阿拉贡国王控制下的意大利地区。也有大量加泰罗尼亚船只前往罗得岛（这份记录中有129次），因为它不仅仅是骑士团的堡垒，还是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的集散地。<sup>27</sup>加泰罗尼亚人对南意大利呢绒贸易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方索国王的庇护。当他于1442年夺取那不

勒斯后，他就将原先在安茹诸王治下主宰该城商业活动的佛罗伦萨商人全部驱逐。加泰罗尼亚人抓住这次机会取代其竞争对手。到1457年时，阿拉贡人治下的那不勒斯活动着大量加泰罗尼亚商人，数量上远多于其他所有地方的商人。<sup>28</sup>他们贩卖的便宜羊毛织品大量进入南意大利，以至于到1465年，即便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是当朝阿拉贡国王的侄子，也要试图禁止进口这些商品。<sup>29</sup>

公元15世纪加泰罗尼亚人的商业网络还有其他一些微小但极为重要的变化。完善的本地商业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通常，船舶并不会前往太远的地方，而是在附近的便利地区寻找货源。小镇托萨（Tossa，可能只有三百名居民）与巴塞罗那之间来往不断，将产自加泰罗尼亚森林的大量木材运往巴塞罗那。<sup>30</sup>另一处木材产地马塔洛（Matarò）则更为重要，当地教堂中有一条精美的圆形商船“纳乌”（nau）的模型，现存于鹿特丹（Rotterdam）；它堪称15世纪加泰罗尼亚人造船技术的极佳证明。<sup>31</sup>另外一条相当活跃且很重要的小规模商路，是用于鱼类贸易的商路。1434年的税收记录表明：在四旬斋期间，大宗腌制沙丁鱼从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运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人特别喜欢食用鳕鱼、金枪鱼和鳗鱼。源源不断的油、蜂蜜、木材、金属、毛料、皮革、染料汇集到西班牙海岸——大量当地产品的贸易为遭受黑死病袭击后的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础。<sup>32</sup>

公元1462年之后的十年中，巴塞罗那的商业因加泰罗尼亚内战而衰落，但1472年之后却以惊人的速度恢复。<sup>33</sup>15世纪70年代，许多领事被派到了地中海沿岸大大小小的港口，负责料理当地的加泰罗尼亚商务。这些港口包括亚得里亚海的杜

布罗夫尼克与威尼斯，西西里王国辖下的特拉帕尼、撒丁岛与马耳他。来自德意志和萨伏伊的商人也汇集到巴塞罗那。<sup>34</sup>这里再次充满了商机。同样，马略卡岛虽然经历了内乱，但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船只从马略卡岛出发，驶向北非、巴塞402 罗那、巴伦西亚、那不勒斯、撒丁岛，甚至偶尔还会前往遥远的罗得岛和亚历山大。留存至今的15世纪前半期马略卡与北非之间的航行记录有近四百份，其中80%的商船是从马略卡出发的。与数百年前一样，马略卡是加泰罗尼亚与北非之间商贸的中枢，而北非因出产大量优质货源，是商人们大批前往的市场。在马略卡，充当保险经纪人的犹太人阿斯特赫·柯西比利（Astruch Xibili）生意兴隆，他主要为往返西班牙本土、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商船提供保险。<sup>35</sup>与巴塞罗那一样，马略卡对海洋保险也越发重视，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穆斯林海盗不时攻击基督徒商船，基督教国家之间不时发生冲突，各城镇也经常爆发起义。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时期从事跨海贸易的商人们强大的适应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是乐观精神。

在阿拉贡王国治下，有一座城市经历了切切实实的繁荣，它就是巴伦西亚。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艾略特（John Elliott）曾写道：“对于巴伦西亚来说，公元15世纪就是黄金时代。”特别是想到在15世纪“像陀螺仪一样稳定的”巴伦西亚金币时，就会发现这种表述相当贴切。<sup>36</sup>在阿拉贡五世离开西班牙前往意大利之前，巴伦西亚是他最钟爱的居所，这反映在城中的众多艺术作品以及雄心勃勃的建筑规划中。巴伦西亚对商业机构的发展影响极大。“海事代理”法庭在恢宏的凉廊中设置，其法官的地位相当于王室法官，他们聚到一起处理

涉及海洋法以及商业法的案件。他们是从商会中选出的“最能干、最明智、最有经验”的成员，他们需要尽快做出判决，不搞任何浮夸的仪式，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做出公平的判决。不过，他们更倾向于庭外和解，因为其目的是促进社区的和谐，而非鼓励纷争。<sup>37</sup>巴伦西亚的海事法庭因1494年由市政府刊印的极为详细的法律条款而声名远扬，这部被称为《海事代理法》<sup>①</sup>的法律也被广泛地学习与研究。

该法强调了海事法中的古老问题：

如果有货物或财产在装船后遭受鼠害，而且船主没有在船上养猫以避免鼠害，那么船主就需要赔偿这些损失。但这并不适用于以下情形：当货物装载上船时船上有猫，但在航行期间，猫死了，且在船能够靠岸、船主能够再买到猫之前，货物遭到鼠害。如果他在第一次装货出发之前即在可以买到猫的港口购买了猫并把猫放到船上，他就不必为货物遭到鼠害而负责，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船主的疏忽造成的。<sup>38</sup>

408

遭遇风暴时，船长需将船上所有商人召集到甲板，并告知他们，他确信如果不把一些货物扔到海里，船只就会沉没。他需要明确宣布：

先生们，商人们，如果我们不减轻此船的重量，我们将会陷入危险，并将失去甲板上的一切，包括货物、商品

---

① 法学界通常又将其译为《康索拉多海法》。——译者注

和所有财产。如果您，慷慨的商人们啊，如果您允许我们减轻船的重量，那么我们就能在上帝的庇佑下挽救在场所有人的生命以及船上的大多数货物……显然，扔掉一些货物要比人员死亡、整艘船沉没乃至损失所有货物的结果合理得多。<sup>39</sup>

在《海事代理法》那一丝不苟的法律条文中闪现的基本原则是，责任必须认定，协议中各方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因此，若一名船主告知旅客的出发时间晚于实际出发时间，那么他必须返还全部费用，并为相关的损害支付赔偿。客商们则需在他们没有遵守相关惯例与规则时，承担相应责任。<sup>40</sup>由于巴伦西亚还对外出口高品质的瓷器（包括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以及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定制的成套餐具），因此他们需要很谨慎地雇用熟练的搬运工，后者知道如何将瓷器搬运装船。如果搬运工的工作本身很出色，但仍然出现了一些破损，那么就需由商人们来承担损失，而非船主。<sup>41</sup>水手们在周日、周二和周四可以吃到肉食，其他日子主要是喝汤；在每天的晚餐中他们食用为乘船而特制的干粮，用奶酪、洋葱、沙丁鱼或其他鱼作辅食。此外，船上还会定量供应葡萄酒，但这种酒是在船上用葡萄干甚至无花果制成的（浸泡在水里，然后产生出一种甜甜的、泥土色的酒浆）。<sup>42</sup>

巴伦西亚受益于巴塞罗那的困境——银行业危机、毕加党与布斯卡党之间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巴塞罗那贵族经常将外来的钱商驱逐出城。<sup>43</sup>巴伦西亚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其处于意大利北部与大西洋之间的商路上。<sup>44</sup>热那亚与佛罗伦萨的帆桨船会经过伊维萨岛，绕过巴塞罗那，来到这里。汇集到巴伦西亚

后，船上会装运一些市场上的农产品，这些是仍然生活在巴伦西亚郊区的众多穆斯林所特有的产品，包括干果、糖、大米，这些商品在英格兰的宫廷中极受欢迎，英格兰人会将大米、鸡肉丁和糖与一种被称为牛奶冻的白色调合剂混合在一起。<sup>45</sup>外国资本主宰着巴伦西亚，推动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扩大了巴伦西亚相对于更加排外的巴塞罗那的优势。这里有热那亚人、米兰人、威尼斯人和托斯卡纳人、弗兰芒人和德意志人的活跃的社区，他们将巴伦西亚作为自己在地中海上的基地。<sup>46</sup>米兰人主要进口武器和其他金属器物。来自朗格多克（Languedoc）的商人从大宗羊毛贸易中获利，这些羊毛来自卡斯蒂利亚高原，有一部分是由托莱多（Toledo）的犹太人经营。<sup>47</sup>来自巴伦西亚的穆斯林商人与格拉纳达的那斯里德王国做生意。<sup>48</sup>公元15世纪末，贪婪的斐迪南国王向城市征收高额税收减缓了其发展的速度。<sup>49</sup>不过，阿拉贡国王的收入相当可观，如果再加上其在意大利的领土，收入还会更多：西西里盛产小麦和糖，撒丁岛盛产小麦与盐。<sup>50</sup>加泰罗尼亚 - 阿拉贡王国的繁荣恰恰得益于黑死病之后经济的快速调整。

### 3

巴伦西亚的成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里缺少虔诚的犹太人的身影。在公元15世纪，与西欧的其他国家相比，伊比利亚诸王国有一个独有的特征，那就是每个王国中都存在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在西班牙，有时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日常往来非常和谐，基督徒会去参加穆斯林、犹太人的婚礼，穆斯林与基督徒也会在巴伦西亚建立联合作坊。但到14世纪晚期时，和谐共处被彼此间的不信任取代。黑死病的传播

被归咎于犹太人，并导致巴塞罗那以及其他地区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袭击。<sup>51</sup>瘟疫的影响之一在于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其成员有时会将犹太人视为商业竞争对手。在 14 世纪晚期，西班牙南部埃西哈（Ecija）的副主教费兰·马丁内斯（Ferran Martínez）情绪激昂地布道，反对犹太人，要消灭犹太会堂并要求摧毁其圣卷与经书。卡斯蒂利亚国王也无力遏止这位副主教释放出来的暴力信号。1391 年，在这位副主教的支持下，塞维利亚最先发生了民众暴乱，然后向北、向东席卷到阿拉贡国王的辖区，与之相伴的是犹太人被屠杀以及许多人皈依基督教。

这一事件影响了整个西地中海，导致公元 1392 年一整年阿拉贡控制下的西西里对犹太人进行迫害。<sup>52</sup>巴伦西亚的犹太人聚居区不复存在，因为原有 2500 人的犹太社区经历了屠杀或被迫改宗之后，只余 200 多人还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同样在巴塞罗那，从 8 世纪时就已存在的犹太社区也遭受严重打击。位于巴塞罗那老城西北角的犹太人社区“卡尔”（Call）遭到严重侵袭。在马略卡岛，一次农民抗议副总督的行动失去控制：当他们无法攻下马略卡城外的贝尔维尔（Bellver）城堡时，他们就转向犹太人的“卡尔”，侵入城区，杀害了他们所遇到的许多人。进一步的压力来自上层，1413 ~ 1414 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一世与教宗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XIII）在托尔托萨举办了一次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公开辩论。这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辩论，而是一次迫使许多犹太人领袖皈依基督教的机会。<sup>53</sup>在阿拉贡国王的统治下，公开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数量锐减，不过在皈依者当中有许多人仍在家中秘密坚持他们祖先的宗教信仰。到 15 世纪 80 年代，随着西班牙王国之内宗

教裁判所的重新建立，将这一实践保密变得越发重要。阿拉贡国王治下的犹太人生活处境已经跌至谷底，并不是因为大规模的驱逐，而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重重压力。

公元 1391 年和 1413 ~ 1414 年犹太人的大批皈依似乎表明：迫于压力，大多数犹太人会选择皈依基督。当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于 1479 年登上阿拉贡王位后，他逐渐开始执行如其同名祖父一样的严苛政策。为了解决犹太人声明皈依基督教后却依然坚持其原传统宗教习俗 [他们通常被称为马拉诺（Marranos）] 的问题，他重启阿拉贡的宗教裁判所，并将其扩展到整个西班牙，这种行为甚至在古老的基督徒家庭看来都是国王干涉宗教的手段。<sup>54</sup> 负责宗教裁判所的多明我会修士们使斐迪南相信：如果不把所有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人从西班牙驱逐，将犹太人与皈依者隔离开，那么这项工作就无法完成。<sup>55</sup> 斐迪南最希望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犹太人选择皈依，而非离开西班牙（他并不厌恶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反而偏爱真诚的“皈依者”）。然而，法令颁布后却导致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相当多的犹太人——可能有 7.5 万人——放弃了西班牙，不过这个时期离去的大多数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犹太人，因为在 1391 年动乱之后，加泰罗尼亚与阿拉贡的许多犹太人社区已经消失。然而，许多西班牙的犹太人，无论是阿拉贡的还是卡斯蒂利亚的，都需要经由阿拉贡国王治下的港口前往流亡地。

难民们得到的待遇有时相当好，有时则相当恶劣：关于犹太人被船长和水手们扔到海里的故事没有任何可被质疑的。<sup>56</sup> 摩洛哥的苏丹并不想接受他们，所以去往距离最近的伊斯兰国家并不是好的选择。尽管搭载他们的船只大多数属于热那亚



人，但热那亚也不欢迎他们，因为它从来不鼓励犹太人到此定居：居住在热那亚的犹太人被严格限定在一小片地区，那里到处都是废弃的石头和瓦砾；在经历了严酷的冬季后，许多人就会甘愿选择皈依基督教。<sup>57</sup>更理想的选择是在意大利南部寻找新家园，在那儿，斐迪南的侄子费尔南多敞开怀抱欢迎他们，并保证他的官员们会为每位移民进行登记，以确定那个人作为工匠或商人的特殊技能。费尔南多还不断声称犹太人将获得“人道”（*humanamente*）待遇。数月后，费尔南多接收了第二批犹太难民，这一次是来自阿拉贡治下的西西里，尽管巴勒莫的市议会表示反对，担心驱逐犹太人会影响经济，但犹太人还是遭到了驱逐。<sup>58</sup>当斐迪南征服新的领地时，他依然积极地推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公元 1509 年他把犹太人逐出奥兰（Oran），1510 年将犹太人逐出那不勒斯。<sup>59</sup>

这些流亡的犹太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引发的冲击。他们穿过意大利南部，当他们再次遭到驱逐时，就从那里继续分散出去：有的向北前往比较友善的亲王治下的费拉拉（Ferrara）与曼图亚（Mantua）；其他人则拥向奥斯曼人的辖区，苏丹几乎无法相信，他竟然有如此好运，获得了拥有高级技术的纺织工人、商人和医师。公元 16 世纪

407

他们之中有各种拥有精湛技艺的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放并驱赶出来的马拉诺，他们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危害与灾难，因为他们把各种用于战争的发明、技术以及机械教给土耳其人，如制作火炮、火绳枪、火药、炮弹以及其他军火；他们还带去了其他地区从未见

过的印刷术，通过它，他们可以精美的字母随意印制各种语言的各种书籍，如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以及很自然的他们所需要的希伯来语。<sup>60</sup>

在奥斯曼人统治的广大区域，穆斯林是少数族裔，因此接纳犹太人在他们的辖区生活没有任何困难，但需要接受顺民（*dhimmi*）身份的各种限制。萨洛尼卡 [即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a）] 成为安置这些犹太人的特别地区。

许多流亡者将被驱逐出西班牙视为一种标志：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头，很快就会终结，犹太人将在弥赛亚（Messiah）的带领下得到拯救。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一些人前往他们远祖生活过的土地，定居在加利利（Galilee）山区中的萨法德（Safed），他们也热切地想在那里建立纺织工场和其他企业。与此同时，他们专心投入卡巴拉教派（*kabbalistic*）的经文编撰中，还创作礼拜用的诗歌，这些诗歌后来传播到地中海全境以及之外的地区。他们中的一位拉比雅各·贝拉卜（Jacob Berab）从托莱多附近的马克达（Maqueda）游历至非斯，然后抵达埃及，最后来到萨法德，在这里，他梦想着重建古代犹太圣贤的会议——犹太公会（Sanhedrin），作为弥赛亚时代的序幕。<sup>61</sup>当流亡犹太人向东迁徙时，他们带着对西班牙——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塞法迪（Sepharad）——的记忆。这些塞法迪犹太人中的许多人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继续讲着15世纪的西班牙语，并将这种语言传播至奥斯曼帝国境内以及北非的犹太人社区——这种语言经常被称为拉迪诺语（Ladino），不过它也从其他语言，如土耳其语中吸收了一些词。生活在地中海的犹太人广泛使用拉迪诺语是文化帝国主义

的一部分，它还表现在这些塞法迪犹太人的礼拜仪式与行为方式被希腊、北非以及意大利大部的犹太人采用。因为塞法迪人坚持认为他们是相当于绅士 (*hidalgos*) 级别的犹太贵族后裔，是生活在西班牙繁荣时期的犹太贵族。先知俄巴底亚 (Obadiah) 不是提到过“被驱逐到塞法迪的耶路撒冷人”吗？ 408

公元 1492 年还见证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统治的终结。1 月 2 日，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战争后，格拉纳达国王布阿卜迪勒 (Boabdil) 率其城市部众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投降，这也有助于实现伊莎贝拉对卡斯蒂利亚王位的诉求。投降协议保证穆斯林有权留在他们原来的王国内；如果他们确实想离开，那么国王与王后将为他们乘船离去付账。只是到 1502 年，格拉纳达以及所有卡斯蒂利亚王国领土上的穆斯林才遭到驱逐，因为此前 3 年格拉纳达山区爆发了穆斯林起义。不过，阿拉贡国王治下的地区却没有发生类似事件，那里的穆斯林居民聚居于巴伦西亚王国以及阿拉贡南部。15 世纪时，巴伦西亚王国中可能有三分之一人口是穆斯林，随着基督徒人口的增多以及诸多穆斯林家庭改信基督教，穆斯林人口不断减少。如今，在巴伦西亚大教堂外，每周四仍然会召开著名的水务法庭，目的是调解城外农田的用水纷争，其中就保存着一些中古时代晚期穆斯林农民遵循的原则与方法。<sup>62</sup>但与伊斯兰世界的隔绝以及精英群体的缺失意味着：阿拉贡与巴伦西亚的穆斯林得努力维持他们的伊斯兰知识，或在某些领域还要努力维持阿拉伯语的使用。<sup>63</sup>斐迪南是位精明的统治者，他意识到驱逐穆斯林会在王国内引起人口流失以及经济混乱，毕竟这个帝国的繁荣在经历他父亲治下的内战后已经出现了危机。他去世 9 年后，也就是 1525 年，新任国王才再次试图促使西班牙的每个穆斯林都皈

依基督教，而且直到 1609 年，这些被称为摩里斯科人（Moriscos）的西班牙穆斯林才开始被粗暴地全部赶出西班牙。<sup>64</sup>

#### 4

409 在卡斯蒂利亚与格拉纳达，斐迪南与妻子伊莎贝拉的地位几乎相等，而在阿拉贡，她却只是王后。但当公元 1504 年伊莎贝拉去世时，斐迪南摄政卡斯蒂利亚的要求连续数年遭西班牙议会拒绝，这激励他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到地中海，试图恢复他叔叔阿方索曾创立的地中海帝国。他关注的是阿拉贡王国的未来，并且认为在他死后，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会再次分裂。在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伟大船长”科尔多瓦的费尔南多·冈萨雷斯（Fernando González de Córdoba）的帮助下，他于 1503 年重建阿拉贡对那不勒斯的直接统治，还与法国人发生了短暂的冲突，法国人在国王路易十二（Louis XII）的统治下重返意大利，其打击土耳其人的意图并不是很强烈，更看重的是落实路易对米兰公爵权位的继承要求。<sup>65</sup>对于斐迪南来说，他与阿方索一样，那不勒斯并不是其目标：斐迪南的政策带有强烈的救世情结，为了发起一场十字军运动并击败土耳其人以收复耶路撒冷，他还组织了一些前往东方的远征军，如由“伟大船长”统辖的小舰队曾对凯法利尼亚岛发动攻击——当然，这里距离亚平宁半岛的靴跟处并不远。<sup>66</sup>斐迪南的这些白日梦又进一步被一位古怪热那亚水手的执着所刺激，此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哥伦布坚持他能够在印度为国王找到足够的黄金以支撑他想做的任何事。<sup>67</sup>

斐迪南更愿意其加泰罗尼亚臣民航行于地中海而非大西

洋，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受到叔叔阿方索的影响，要构建一个包括西西里、撒丁岛、那不勒斯、马略卡岛以及新占领的北非领土的“加泰罗尼亚共同市场”（Catalan Common Market）。在公元1497年，梅地纳-多尼亚公爵已经表明征服摩洛哥海岸的梅利利亚（Melilla）是多么容易；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西班牙人。在意志坚定的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的帮助下，1509年，斐迪南夺取了奥兰。这位上了年纪的枢机主教骑在一头骡子上，高举着一柄银十字架，冲在西班牙军队的最前面，鼓舞着人们为基督而战。征服了格拉纳达之后，他的激情并未退却，出于对伊斯兰教的蔑视，他将许多阿拉伯语书付之一炬，并为自己能将人类的大量知识销毁而深感幸福。征服奥兰之后，1510年，斐迪南又夺取了布日伊和的黎波里。<sup>68</sup>西班牙人在北非沿线一直向东到利比亚建构起的防线巩固了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西部与中部的控制，但也燃起了各地穆斯林敌手的怒火，他们决心收复被西班牙人占据的城市。在斐迪南很高兴能在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中不断取得胜利时，他在非洲的扩张野心又有了一个实践难度。他若控制了马格里布（Maghrib）沿海地区，就能够为加泰罗尼亚人以及其他前往东方的商船提供保护，这不是因为欧洲的商船要沿非洲海岸前行，而是因为西班牙人控制这里后可以遏制穆斯林海盗。

410

斐迪南的行为表明：在他的意识当中，地中海是多么重要，在伊莎贝拉去世后，他在那不勒斯花费了数月时间，让受到战争破坏的南意大利王国恢复元气。他迎娶了一位新妻子，极富才干、颇有教养的比利牛斯（Pyrenean）公主富瓦的杰曼（Germaine of Foix），希望她能为他诞下一位男性继承人以继承

阿拉贡王国的领地。<sup>69</sup>然而，他的所有恢宏计划都因男性世系的中断而打了折扣。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儿子——胡安王子（Infante Juan）早早过世，而富瓦的杰曼也未能为他留下继承人。如此一来，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就传给了斐迪南那精神错乱的女儿胡安娜（Juana）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孙，哈布斯堡（Habsburg）王子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sup>70</sup>在查理治下，西班牙内部的权力从阿拉贡最终回到卡斯蒂利亚。随着新世界贸易航路的开辟，卡斯蒂利亚，特别是塞维利亚将走向兴盛，而加泰罗尼亚在地中海的商业网络则渐趋停滞。阿拉贡人仍在追诉其在意大利的传统利益，但卡斯蒂利亚人逐渐从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那里取得了对地中海帝国的掌控权。<sup>71</sup>

## 注 释

1. N. Housley, *The Later Crusades: from Lyons to Alcázar 1274-1580* (Oxford, 1992), pp. 196-7.
2. J. Heers, *Gênes au XVe siècle: civilisation méditerranéenne, grand capitalisme, et capitalisme populaire* (Paris, 1971).
3. E. Ashtor, 'Levantine sugar industr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a case of technological decline', *The Islamic Middle East, 700-1900*, ed. A. L. Udovitch (Princeton, NJ, 1981), pp. 91-132.
4. 这些博物馆包括伦敦的华莱士珍藏馆、纽约的美国西班牙协会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
5. D. Abulafia, 'Sugar in Spain', *European Review*, vol. 16 (2008), pp. 191-210; M. Ouerfelli, *Le sucre: production, commercialisation et usag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médiévale* (Leiden, 2007).
6. A. Fábregas Garcia, *Producción y comercio de azúcar en el Mediterráneo medieval: el ejemplo del reino de Granada* (Granada, 2000); J. Heers, 'Le royaume de Grenade et la politique marchande de Gênes en Occident (XVe siècle)', *Le Moyen Âge*, vol. 63 (1957), p. 109, repr. in J. Heers, *Société et économie à Gênes (XIVe-XVe siècles)* (London, 1979), essay vii; F. Melis, 'Málaga nel sistema economico del XIV e XV secolo', *Economia e Storia*,

- vol. 3 (1956), pp. 19–59, 139–63, repr. in F. Melis, *Mercaderes italianos en España (investigaciones sobre su correspondencia y su contabilidad)* (Seville, 1976), pp. 3–65; R. Salicrú i Lluçh, 'The Catalano-Aragonese commercial presence in the sultanate of Granada during the reign of Alfonso the Magnanimous',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27 (2001), pp. 289–312.
7. P. Russell,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a Life* (New Haven, CT, 2000), pp. 29–58.
  8. *Ibid.*, pp. 182–93.
  9. B. Rogerson, *The Last Crusaders: the Hundred-year Battle for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ondon, 2009), especially pp. 399–422.
  10. Luis Vaz de Camões, *The Lusiads*, trans. L. White (Oxford, 1997), canto 4:49, p. 86.
  11. F. Themudo Barata, *Navegação, comércio e relações políticas: os portugueses no Mediterrâneo Ocidental (1385–1466)* (Lisbon, 1998); J. Heers, 'L'expansion maritime portugaise à la fin du Moyen-Âge: la Méditerranée', *Actas do III Colóquio internacional de estudos luso-brasileiros*, vol. 2 (Lisbon, 1960), pp. 138–47, repr. in Heers, *Société et économie*, essay iii.
  12. R. Salicrú i Lluçh, *El tràfic de mercaderies a Barcelona segons els comptes de la Lleuda de Mediona (febrer de 1434)* (Anuario de estudios medievales, annex no. 30, Barcelona, 1995).
  13. D. Abulafia, '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Ferrante I of Naples (1458–94)', in T. Dean and C. Wickham (eds.), *City and Countryside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Italy: Essays Presented to Philip Jones* (London, 1990), pp. 135, 140, repr. in D. Abulafia,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editerranean, 1100–1500* (Aldershot, 1993).
  14. A. Ruddock, *Italian Merchants and Shipping in Southampton 1270–1600* (Southampton, 1951), pp. 173–7.
  15. K. Reyerson, *Jacques Coeur: Entrepreneur and King's Bursar* (New York, 2005), pp. 3, 90–91; J. Heers, *Jacques Cœur 1400–1456* (Paris, 1997), taking a different view from M. Mollat, *Jacques Cœur ou l'esprit de l'entreprise au XVe siècle* (Paris, 1988) and C. Poulain, *Jacques Cœur ou les rêves concrétisés* (Paris, 1982).
  16. Cited by Reyerson, *Jacques Coeur*, p. 87.
  17. *Ibid.*, pp. 90, 92, 162; Mollat, *Jacques Cœur*, pp. 168–80.
  18. D. Lamelas, *The Sale of Gibraltar in 1474 to the New Christians of Cordova*, ed. S. Benady (Gibraltar and Grendon, Northants, 1992); M. Harvey, *Gibraltar: a History* (2nd edn, Staplehurst, Kent, 2000), pp. 48–53.
  19. P. Wolff, 'The 1391 pogrom in Spain: social crisis or not?', *Past & Present*, no. 50 (1971), pp. 4–18.
  20. C. Carrère, *Barcelone: centre économique à l'époque des difficultés, 1380–1462*, 2 vols. (Paris and The Hague, 1967); C. Batlle, *Barcelona a mediados del siglo XV: historia de una crisis urbana* (Barcelona, 1976).
  21. J. M. Quadrado, *Forenses y Ciudadanos* (Biblioteca Balear, vol. 1, Palma de Mallorca, 1986, repr. of 2nd edn, Palma, 1895); plague: M. Barceló Crespi,

- Ciutat de Mallorca en el Trànsit a la Modernitat* (Palma de Mallorca, 1988).
22. R. Piña Homs, *El Consolat de Mar: Mallorca 1326-1800* (Palma de Mallorca, 1985); R. Smith, *The Spanish Guild Merchant: a History of the Consulado, 1250-1700* (Durham, NC, 1972), pp. 3-33.
  23. Classic negative views in: J. 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4* (London, 1963), pp. 24, 30-31; P. Vilar, 'Le déclin catalan au bas Moyen Âge', *Estudios de Historia Moderna*, vol. 6 (1956-9), pp. 1-68; J. Vicens Viv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pain* (Princeton, NJ, 1969), with relevant sections republished in R. Highfield (ed.), *Spai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69-1516* (London, 1972), pp. 31-57, 248-75.
  24. A. P. Usher, *The Early History of Deposit Banking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Cambridge, MA, 1943).
  25. D. Coulon, *Barcelone et le grand commerce d'Orient au Moyen Âge: un siècle de relations avec l'Égypte et la Syrie-Palestine, ca. 1330-ca. 1430* (Madrid and Barcelona, 2004).
  26. M. del Treppo, *I Mercanti Catalani e l'Espansione della Corona d'Aragona nel Secolo XV* (Naples, 1972), figure facing p. 16; D. Pifarré Torres, *El comerç internacional de Barcelona i el mar del Nord (Bruges) al final del segle XIV* (Barcelona and Montserrat, 2002).
  27. There were 154 voyages from Barcelona to Rhodes between 1390 and 1493: del Treppo, *Mercanti Catalani*, p. 59.
  28. Del Treppo, *Mercanti Catalani*, pp. 211, 213, 231-44.
  29. Abulafia, 'The Crown and the economy under Ferrante', pp. 142-3.
  30. D. Abulafia, 'L'economia mercantile nel Mediterraneo occidentale (1390ca.-1460ca.): commercio locale e a lunga distanza nell'età di Alfonso il Magnanimo', *Schola Salernitana. Dipartimento di Latinità e Medioevo,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Salerno, Annali*, vol. 2 (1997), pp. 28-30, repr. in 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Encounters: Economic, Religious, Political, 1100-1550* (Aldershot, 2000), essay viii; M. Zucchitello, *El comerç marítim de Tossa a través del port barceloní (1357-1553)* (Quaderns d'estudis tossencs, Tossa de Mar, 1982).
  31. H. Winter, *Die katalanische Nao von 1450 nach dem Modell im Maritiem Museum Prins Hendrik in Rotterdam* (Burg bez. Magdeburg, 1956); *Het Matarò-Model: een bijzondere Aanwist* (Maritiem Museum Prins Hendrik, Rotterdam, 1982).
  32. Salicrú, *Tràfic de mercaderies*.
  33. M. Peláez, *Catalunya després de la Guerra Civil del segle XV* (Barcelona, 1981), p. 140; cf. del Treppo, *Mercanti catalani*, pp. 586-7.
  34. Peláez, *Catalunya*, pp. 145, 153-9.
  35. P. Macaire, *Majorque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1400-1450 environ)* (Lille, 1986), pp. 81-91, 411; O. Vaquer Bennisar, *El comerç marítim de Mallorca, 1448-1531* (Palma de Mallorca, 2001).
  36.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 24; 'gyroscope' cited from E. Hamilton, *Money, Prices and Wages in Valencia, Aragon and Navarre 1351-1500* (Cambridge, MA, 1936), pp. 55-9.



37. S. Jados (ed. and trans.), *Consulate of the Sea and Related Documents* (Tuscaloosa, AL, 1975), pp. 3–18; Smith, *Spanish Guild Merchant*, pp. 20–25.
38. Jados, *Consulate of the Sea*, p. 38; also pp. 35–8, 54–7, 204–8.
39. Ibid., pp. 56–7; O. R. Constable, 'The problem of jettison in medieval Mediterranean maritime law',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20 (1994), pp. 207–20.
40. Jados, *Consulate of the Sea*, pp. 65, 68–9.
41. Ibid., pp. 135–7; on ceramics: *Valenza-Nàpoli: rotte mediterranee della ceramica/València-Nàpols; les rutes mediterrànies de la ceramica* (Valencia, 1997).
42. Jados, *Consulate of the Sea*, p. 79.
43. M. Teresa Ferrer i Mallol, 'Els italians a terres catalanes (segles XII–XV)', *Anuario de Estudios Medievales*, vol. 19 (1980), pp. 393–467.
44. J. Guiral-Hadziiossif, *Valence, port méditerranéen au XVe siècle (1410–1525)*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86), pp. 281–6; D. Igual Luis, *Valencia y Italia en el siglo XV: rutas, mercados y hombres de negocios en el espacio económico del Mediterráneo occidental* (Bancaixa Fundació Caixa Castelló, Castellón, 1998).
45. P. Iradiel, 'Valencia y la expansión económica de la Corona de Aragón', in D. Abulafia and B. Garí (eds.), *En las costas del Mediterráneo occidental: las ciudades de la Península Ibérica y del reino de Mallorca y el comercio mediterráneo en la Edad Media* (Barcelona, 1997), pp. 155–69; E. Cruselles, *Los mercaderes de Valencia en la Edad Media, 1380–1450* (Lleidà, 2001); E. Cruselles, *Los comerciantes valencianos del siglo XV y sus libros de cuentas* (Castelló de la Plana, 2007).
46. See the studies by P. Mainoni, V. Mora, C. Verlinden collected in A. Furió (ed.), *València, mercat medieval* (Valencia, 1985), pp. 83–156, 159–73, 267–75.
47. E.g. Gentino Abulafia: G. Romestan, 'Els mercaders llenguadocians en el regne de València durant la primera meitat del segle XIV', in Furió, *València*, p. 217.
48. Salicrú, 'Catalano-Aragonese commercial presence', pp. 289–312.
49. E. Belenguer Cebrià, *València en la crisi del segle XV* (Barcelona, 1976).
50. S. R. Epstein, *An Island for Itsel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Sicily* (Cambridge, 1992); C. Zedda, *Cagliari: un porto commerciale nel Mediterraneo del Quattrocento* (Naples, 2001).
51. O.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 2004), p. 281.
52. Wolff, '1391 pogrom', pp. 4–18.
53. H. Maccoby, *Judaism on Trial: Jewish-Christian Disputa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Rutherford, NJ, 1982), pp. 168–215.
54. A. Y. d'Abrera, *The Tribunal of Zaragoza and Crypto-Judaism, 1484–1515* (Turnhout, 2008).
55. R. Conde y Delgado de Molina, *La Expulsión de los Judíos de la Corona de Aragón: documentos para su estudio* (Saragossa, 1991), doc. §1, pp. 41–4.

56. Samuel Usque, *Consolation for the Tribulations of Israel (Consolaçam as Tribulaçoens de Israel)*, ed. M. Cohen (Philadelphia, PA, 1964); Joseph Hachohen and the Anonymous Corrector, *The Vale of Tears (Emek Habacha)*, ed. H. May (The Hague, 1971).
57. G. N. Zazzu, *Sepharad addio – 1492: I profughi ebrei della Spagna al 'ghetto' di Genova* (Genoa, 1991).
58. N. Zeldes, 'Sefardi and Sicilian exiles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settlement,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crisis', *Hispania Judaica Bulletin*, vol. 6 (5769/2008), pp. 237–66; D. Abulafia, 'Aragonese kings of Naples and the Jews', in B. Garvin and B. Cooperman (eds.), *The Jews of Italy: Memory and Identity* (Bethesda, MD, 2000), pp. 82–106.
59. D. Abulafia, 'Insediamenti, diaspora e tradizione ebraica: gli Ebrei del Regno di Napoli da Ferdinando il Cattolico a Carlo V',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Carlo V, Napoli e il Mediterraneo =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e napoletane*, vol. 119 (2001), pp. 171–200.
60. Cited in M.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 2004), p. 48; *Maranes* signifies 'Marranos', a term more often used for *conversos*.
61. A. David, *To Come to the Land: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Eretz-Israel* (Tuscaloosa, AL, 1999).
62. T. Glick, *Irrigation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Valencia* (Cambridge, MA, 1970).
63. L. P. Harvey, *Islamic Spain 1250 to 1500* (Chicago, 1990).
64. M. Meyerson, *The Muslims of Valencia in the Age of Fernando and Isabel: between Coexistence and Crusade* (Berkeley, CA, 1991); L. P.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1500 to 1614* (Chicago, IL, 2005).
65. J.-E. Ruiz-Domènec, *El Gran Capitán: retrato de una época* (Barcelona, 2002); C. J. Hernando Sánchez, *El Reino de Nápoles en el imperio de Carlos V: la consolidación de la conquista* (Madrid, 2001); D. Abulafia, 'Ferdinand the Catholic and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Italy and the European Powers: the Impact of War, 1503–1530*, ed. Christine Shaw (Leiden, 2006), pp. 129–58; F. Baumgartner, *Louis XII* (Stroud, 1994).
66. J. M. Doussinague,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Fernando el Católico* (Madrid, 1944), pp. 91–106.
67. D. Abulafia, *The Discovery of Mankind: Atlantic Encounters in the Age of Columbus* (New Haven, CT, 2008); M. A. Ladero Quesada, *El primer oro de América: los comienzos de la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de las Yndias, 1503–1511* (Madrid, 2002).
68. A. Hess, *The Forgotten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IL, 1978), pp. 37–42; Doussinagu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pp. 194–209, 212–28, 346–52; R. Gutiérrez Cruz, *Los presidios españoles del Norte de África en tiemp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Melilla, 1998).
69. R. Ríos Lloret, *Germana de Foix, una mujer, una reina, una corte* (Valencia, 2003).

70. B. Aram, *Juana the Mad: Sovereignty and Dynas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MD, 2005).
71. T. Dandeleter and J. Marino (eds.), *Spain in Italy: Politics, Society, and Religion, 1500-1700* (Leiden, 2007); T. Dandeleter, *Spanish Rome, 1500-1700* (New Haven, CT, 2001).

### 三 神圣同盟与不神圣的同盟 (1500 ~ 1550 年)

#### 1

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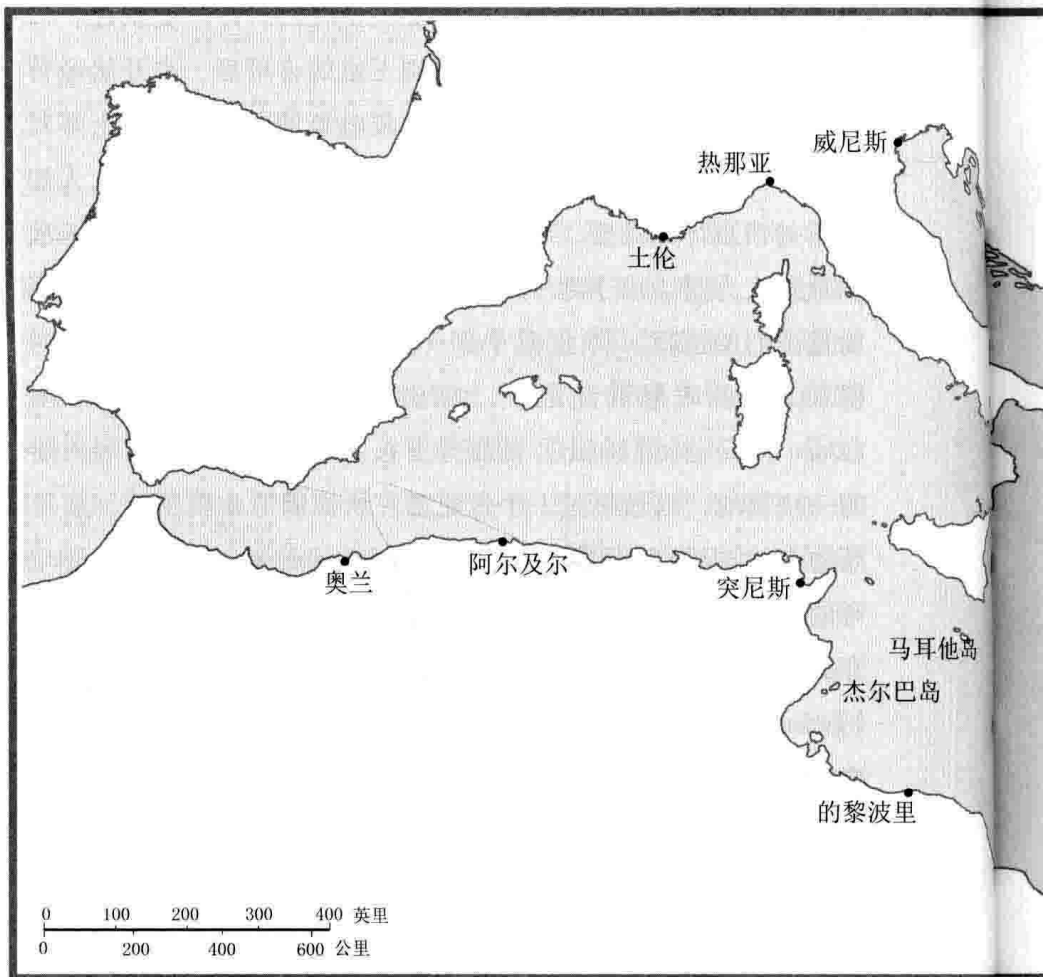
黑死病过后地中海的重组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除了地中海政治局势的变化，如奥斯曼政权的扩张，从长远来看，发生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事件，将给地中海沿岸以及岛屿上的居民生活带来深刻变化。在黑死病暴发之前的十年里，沿非洲海岸可以南下至加那利群岛，通往大西洋的航路就此开通，公元15世纪早期，由于葡萄牙人发现并殖民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航线又被继续延长。<sup>1</sup> 随着马德拉群岛糖料作物种植业的发展，佛兰德和北欧其他地区就可以直接从大西洋获得这种原本需要从地中海获得的且价值高昂的商品。到1482年时，随着葡萄牙人在赤道以北不远处的西非的埃尔米纳 [São Jorge da Mina (the Mine)]<sup>①</sup> 建立起一座堡垒，黄金不需经由撒哈拉沙漠和穆斯林控制的马格里布港口就能抵达欧洲；几内亚 (Guinea) 商贸的开辟弥补了维持休达港口所需的费用。大西洋还为地中海主人们提供了奴隶：来自加那利群岛的岛民、对岸非洲的柏柏尔人，以及从北部的米纳带来的、数量不断增加的黑奴。大量奴隶经由里斯本最终抵达巴伦西亚、马略卡以及其他地中海港口。<sup>2</sup>

---

① 葡文原文即“米纳的圣乔治堡”。——译者注

公元 1492 年 10 月，随着哥伦布驶入加勒比群岛（Caribbean islands），卡斯蒂利亚人又得到了一种贵金属资源，他们对那里实施野蛮开发，要求印第安人用黄金缴纳高额税收，尽管他们可能算是王国辖下的自由臣民。热那亚人虽在西班牙不受欢迎，却成功地在塞维利亚站稳脚跟，得到王室的许可后，也开始经营跨大西洋贸易。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触角伸向金融业。土耳其人逐渐加大对热那亚的东地中海领地的压力，因此热那亚人加强了与西班牙的结盟，看起来，西班牙人是能与土耳其人匹敌的最强大力量。由于地中海航行越发危险，威尼斯人也在重新衡量他们的选择。15 世纪中期，威尼斯已经陷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局混乱当中，在总督弗朗西斯科·福斯卡里（Doge Francesco Foscari）的领导下，威尼斯获得了意大利内陆的一块领地，远远超过一个世纪前它所控制的小块土地。威尼斯的令状书可以向西远抵贝加莫（Bergamo），在那里，圣马可的狮子将米兰的蛇击得粉碎。但这并不意味着威尼斯已放弃其在地中海的利益，只是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在内陆（Terraferma），即意大利本土获取资产。于是，当威尼斯的东地中海领地于 16 ~ 17 世纪逐渐被奥斯曼人占据后，它就能够向意大利本土转移。<sup>3</sup> 威尼斯感觉自己越来越易于遭到攻击，它的领导层也意识到：不愿意用自己的海军对抗奥斯曼人，使他们在西欧被谴责为虚伪小人和机会主义者。

关于海洋越来越不安全的感觉并非幻觉。从公元 15 世纪末开始，海盗出没于整个地中海，他们袭击商船、沿岸地区以及岛屿，每年都会捕捉成千上万名奴隶。<sup>4</sup> 在基督徒的领地中，遭穆斯林海盗劫掠最为严重的地区是卡拉布里亚、西西里与马略卡；这些地区自从 9 ~ 10 世纪遭受萨拉森人的侵袭以后，就





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穆斯林海盗。海盗已经在整个地区蔓延；过去意大利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对这些海域的长期主宰已经褪色成为记忆。而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在从事海盗劫掠；在基督徒海盗中，最为活跃的是罗得岛的圣约翰骑士团（或称医院骑士团）。他们依然保有对抗伊斯兰教的圣战理想，能够从位于西欧的领地上获取收益以维护六艘的装备精良的战舰。另一边，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柏柏尔海盗始终威胁着基督教世界。他们得到奥斯曼宫廷的支持；在北非建立了安全基地；拥有精力十足、颇具天分的指挥官；而且，他们将基督徒与穆斯林海军间的战争带入西地中海。<sup>5</sup>

在公元16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中，东地中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对奥斯曼人扩张的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传播信仰，苏丹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是抗击拜占庭人，为伊斯兰教而战的勇士（ghazis）；然而，他们却愿意让巴尔干半岛的臣民绝大多数是基督徒或犹太人，这是因为在中古早期，阿拉伯的哈里发们就指出，圣书民族是穆斯林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他们致力于保护贸易，部分是为了维持其宫廷的庞大开支，为富饶的首都供应丝绸、珠宝、黄金以及谷物之类的日用品，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们明白，商路运营是获得大量税收的另一种渠道——因此，他们愿意保护拉古萨人，也愿意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签署商业协议。<sup>6</sup>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却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516年，奥斯曼军队荡平叙利亚的马木留克人，为更快、更便利地攻占埃及开辟通道。这使得基督徒控制区域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岛屿：在爱琴海诸岛，所有意大利领主（他们通常也是海盗）被土耳其人在数十年中逐个打败；塞浦路斯仍被威尼斯人控制，热那亚人也依然掌控着希俄斯岛，但



在 1522 年经过漫长、痛苦的围城之后，罗得岛已经屈服于土耳其人。在罗得岛，新任奥斯曼苏丹苏莱曼（Süleyman）得到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他亲临阵前以报 1480 年土耳其军队在罗得岛战败之仇。由于预见到土耳其人可能会围城，这座城堡已经被大大加固，但积极作战的守卫者却很少——只有 415 300 名骑士，也有许多其他级别较低的人员。当天气逐渐恶劣时，苏莱曼依然拒绝撤围，一直坚持到罗得岛投降。1522 年 12 月，骑士团表示投降，被土耳其人赐予许多慷慨的条件，因为有时候，奥斯曼人会尊重那些英勇抗击他们的人。<sup>7</sup>

如今，医院骑士团无家可归，于是决定重新投入与穆斯林的战斗。幸运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阿拉贡王国（包括西西里）的统治者查理五世愿意提供帮助。公元 1530 年 3 月，他为骑士团颁发一份慷慨的特许状，声明：他们“已四处游荡数年”，努力寻找“安身之处”；他将西西里王国的一些属地——包括非洲海岸的黎波里以及马耳他岛和戈佐岛——恩赐给骑士团，供他们安置。作为回报，为表示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对西西里的宗主权，他们需要在每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向西西里总督献上一只猎鹰。天主教徒斐迪南曾于 1510 年在黎波里建造防御要塞，不过由于柏柏尔人可从陆地各个方向发起攻击，因此守住这里太过困难。<sup>8</sup>对于查理来说，占据的黎波里还是比较重要的；1551 年，黎波里沦陷，此后，最为重要的自然就是守住马耳他。

初看起来柏柏尔海盗与组织严密的医院骑士团完全不可等同看待。然而，这些海盗也是不惧危险到远方为自己赢得声望的勇士。其中有许多人是希腊人后裔，是背弃了基督教信仰的叛徒；其他的包括卡拉布里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热

那亚人，甚至还有匈牙利人。<sup>9</sup>他们并不是或者说不全是只关心自己利益或乐趣的四处流浪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中也有一些技术精湛的航海家，最著名的当属皮里·雷斯（Piri Reis），他绘制的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以外世界的地图被奥斯曼宫廷收藏，其中包含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许多宝贵信息。<sup>10</sup>但最著名的海盗是巴巴罗萨（Barbarossa），西方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的红胡子。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乌鲁兹（Uruj 或 Uruc）和他的弟弟席兹尔（Hizr 或 Khizr）。围绕着他们衍生出一整套故事，但很难分辨哪些是虚构的。比较公认的是，这两兄弟生于征服者穆罕默德统治时期的莱斯沃斯岛，当时穆罕默德从意大利公爵尼科洛·朱斯蒂尼亚尼（Niccolò Giustiniani）手中夺取了这座岛屿。他们的父亲可能原本是基督徒，曾作为穆斯林新军（janissary）<sup>①</sup>在奥斯曼军中服役，退役后娶了一位基督徒妻子；他在爱琴海各地贩卖瓷器，最远向北运至君士坦丁堡，在经商时，他经常把儿子们带在身边。就是在这些旅程中，巴巴罗萨兄弟学到了海员技能。有一次，乌鲁兹在安纳托利亚海岸地区收购木材，不料却遭到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圣母号”（*Our Lady of the Conception*）帆桨船的追捕。乌鲁兹被捕后沦为舰上的奴隶，做着苦工，但两年之后，他被赎回，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然而，此后却开始流传出关于他脱逃的史诗般的故事。他幸福地重归大海，与席兹尔一起畅游于西班牙与马格里布之间的海域；据称，他们还曾于公元 1492 年帮助犹太难民和穆斯林难民离开西班牙。<sup>11</sup>

他们的起家装备只是一艘较轻的帆桨船，搭载了一百名左

---

① 或译耶尼切里兵团。——译者注

右的志愿者，都想获得战利品和荣耀。约公元 1502 年，他们的基地迁到杰尔巴岛，这里长期以来都是海盗的巢穴，也是基督徒入侵者与穆斯林守卫者战斗的舞台。他们与突尼斯宫廷建立联系，凭借哈夫斯（Hafsid）苏丹颁发的令状从事海盗业务；1504 年，他们出发前往厄尔巴岛，那里有深得海盗欢心的深海湾，他们突袭了两艘帆桨船与一艘西班牙客轮，前者被证实是为教宗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效力，后者搭载着三百名士兵以及六十名阿拉贡贵族，正准备前往那不勒斯。他们如此轻易地拿下这些帆桨船，使自己在突尼斯的英雄名声进一步提高，而在罗马看来他们却是恐怖的敌人。到 1506 年时，他们已经拥有八艘船，而且他们的成功赢得了盛誉，奥斯曼苏丹授予他们“信仰守卫者”（*khayr-ad-din*）的尊号，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为“海雷丁”（Hayrettin）。<sup>①</sup> 穆斯林海盗与其基督徒对手间发生了一场消耗战；这些基督徒不只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水手（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海盗），还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沿着地中海和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的堡垒一路挺进。虽然西班牙人在梅利利亚和奥兰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在阿尔及尔能取得的成就最多就是占领保护港口的一些孤立的岩石。这些岩石在 1510 年被装上了火炮，但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这座城市。<sup>12</sup>

当冲突发生时，穆斯林有一重大优势：他们能够召集摩洛哥腹地得土安（Tetuan）周围的武装酋长为自己提供支援。夏季，他们活跃于海上，对西班牙发动袭击，抓获成千上万名奴隶，并驱使这些奴隶修建得土安的防御工事。席兹尔曾宣称他

417

---

① 意为“信任的美德”。——译者注

在仅仅一个月内就捕获了二十一艘商船和三千八百名基督徒奴隶（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对兄弟无休止地对马略卡岛、梅诺卡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发动侵扰，其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大量城镇和村庄从西地中海各岛屿危险的海岸地区迁徙到数英里以外的内陆。<sup>13</sup> 乌鲁兹以极度嗜血闻名，他会像疯狗一样咬断受害者的喉咙，但实际上他是位精明的政客，利用这种名声达到政治目的。他从阿尔及利亚海岸的吉杰勒城（Jijelli）开始创建自己的王国。当他抢夺了一艘满载麦子的西西里帆桨船之后，当地居民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当时他们自己的粮食供应非常少。他们邀请他来管理这座城市，不久之后，他就在阿尔及尔发动了政变。距离海岸不远处有一座重要的城市特莱姆森（Tlemcen），公元 1517 年，城里发生了继承危机，他利用这个机会成了那里的主人。以上所有事都引发了那些驻守奥兰的西班牙人的深切关注，他们一直努力与当地酋长建立友好关系。<sup>14</sup> 西班牙的新任统治者哈布斯堡的查理也认识到他需要向北非的领地调派军队。幸运的是，特莱姆森的危机最终被当地人解决，他们把乌鲁兹看作土耳其统治的代理人；随后，乌鲁兹被赶出来，他陷入西班牙军队设置的陷阱，后在战斗中被杀。

第二位巴巴罗萨，即席兹尔，更常被称为海雷丁，此时他赢得了比乌鲁兹更令人恐惧的名声。为了强调自己是哥哥红胡子巴巴罗萨的继承人，他特意将自己的胡子染成红色。他巩固了对马格里布沿岸城镇的控制，于公元 1529 年成功地从西班牙人治下夺取阿尔及尔入口处的群岛。<sup>15</sup> 由于他更加靠近巴利阿里群岛，因此就在同一年，他在群岛的福门特拉岛（Formentera）附近海域击败一支西班牙舰队，捕获七艘帆桨船及其船长；当他被那些船长激怒后，就用锋利的刀把他们切

成片。<sup>16</sup>阿尔及尔成为巴巴罗萨的大本营，不过他仍谨慎地寻求奥斯曼苏丹的保护。他距离君士坦丁堡十分遥远，因此能够获得自治权；对于奥斯曼苏丹来说，他也很有价值，因此“高门”给他提供物质支援。奥斯曼苏丹们的关注点总是在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和波斯之间转换，与东方萨法维王朝（Safavid）国王们之争斗常使其无暇关注地中海事务。更好的选择就是通过代理人海雷丁·巴巴罗萨来处理，而非将所有资源投入某一处战场。巴巴罗萨得到官方承认，成为阿尔及尔的埃米尔，他更愿意称自己为“船长帕夏”（kapudan pasha）。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送给他一面土耳其旗帜、一些火炮及其他军需品，还有两千名土耳其新军。

418

到公元16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赢得塞利姆的继承人苏莱曼的信任，甚至奉召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就西地中海的战略提供建议，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土耳其人究竟能够向其西班牙对手施加多大的压力。据说，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曾鼓励巴巴罗萨冒险对罗马以南的意大利海岸上的丰迪（Fondi）发动攻击，希望能掳走美貌的寡妇吉丽亚·贡萨格（Guilia Gonzaga），她的丈夫曾是当地的领主。在传奇故事中，当土耳其人对丰迪城门发动攻击时，她半裸着逃亡，不过事实上，那天晚上她根本不在丰迪。<sup>17</sup>那不勒斯总督相当沮丧，在他看来，南意大利就是又一个罗得岛，是地处土耳其世界边缘的最后一个前哨。<sup>18</sup>果不其然，1534年，当此前对土耳其人始终心存疑虑的突尼斯国王去世、该国陷入继承纷争时，海雷丁指挥着奥斯曼苏丹派去的舰队对突尼斯发动攻击。海雷丁·巴巴罗萨发动突袭，不过随后查理五世无视巴巴罗萨要杀掉突尼斯城内两万名基督徒奴隶的威胁性声明，依然

发起反击。1535年，查理夺回突尼斯，却务实地将它交还给突尼斯前国王的幼子来管理，不过他要求获得一笔高额年贡：1.2万枚金币、12只猎鹰和6匹骏马。<sup>19</sup>但如果查理就此以为他在突尼斯的成功得到了臣民们的祝福，那么很快他就会发现自己太过乐观了。数月之后，一支小舰队偷偷溜出阿尔及尔，驶往梅诺卡。在梅诺卡，巴巴罗萨手下肆无忌惮地将西班牙的旗帜挂在自己的桅杆上，堂而皇之地进入雄伟的天然海港马翁。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市，抓获1800名奴隶。<sup>20</sup>

## 2

针对土耳其人势力范围向西地中海的扩张，基督徒的应对措施有两种：直面迎战或妥协和解。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也叫弗朗索瓦一世）打算与土耳其人合作，招致许多对手的毁谤；不过，在西班牙，与奥斯曼人的斗争被看作基督徒过去抗击摩尔人的伟大十字军运动的延续与强化。查理五世寻求“我们造物主的帮助与指导”，希望在神的祐助下，能够成功地“对巴巴罗萨发起最有效的攻击”。<sup>21</sup>在热那亚舰队司令安德里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的指挥下，基督徒发起了反击战。<sup>22</sup>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多利亚所在家族涌现出多位热那亚的著名海军将领，安德里亚就是他自己的主人：他没有亲自参加法兰西斯一世在公元1528年发起的对那不勒斯的攻击战，表现出他的自主意识，然后又从法兰西斯的阵营投向查理五世。不过他为查理五世效劳，很可能主要是出于金钱的诱惑而非原则问题。他经营着自己的舰队，但他仍可使用家乡的造船厂；他还雇用志愿者作为水手，并招纳了形形色色的罪犯；他的成功使得更多的人自愿投奔而来，即便他实行了严格

纪律，其中褻渎神明的行为被严格制止。<sup>23</sup>在许多方面，他就是海雷丁·巴巴罗萨的翻版，既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又愿为圣战事业奋斗。1532年，他受命去攻打希腊，向新主人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夺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科伦（Coron）的海军基地。让敌人意料不到的是，多利亞突破土耳其人的封锁，并派自己的军队驻守那里。在繁盛期，科伦与莫顿（Modon）曾是“威尼斯帝国的双眼”，保护着自爱奥尼亚海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科伦是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苏莱曼派遣60艘帆桨船组成远征军，意图收复这里，但多利亞成功地将其击退。<sup>24</sup>

公元1537年，苏莱曼派遣2.5万名士兵，交由海雷丁指挥，对科孚岛发动攻击，自此，苏丹对西方的关注开始加强。土耳其人对科孚的围攻自然对西方构成了威胁：奥斯曼人拥有该岛意味着获得了对意大利发起攻击的平台，还能够控制通往亚得里亚海的交通。在教宗的支援下，神圣同盟（Holy League）在尼斯成立，将多利亞、西班牙人和威尼斯聚集到一起，其中威尼斯在传统上对“高门”总是采取比较审慎的政策。1538年初，海雷丁对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几处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其中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纳夫普利翁（Nafplion）和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这不单纯是一对一的抗争，威尼斯人所控制的岛屿和沿海据点为西方船只提供了补给线和保护。奥斯曼人宣称他们从威尼斯人手中夺走了二十五个岛屿，有时实行洗劫，有时则是征收贡赋。<sup>25</sup>多利亞在神圣同盟大军行动中的糟糕表现充分说明了他是自己的主人这一性格特征。这支神圣同盟军队包括：36艘教宗的帆桨舰，10艘医院骑士团的战舰，50艘葡萄牙的战舰，以及61艘热那亚

战舰。1538年9月28日，这支联合舰队在科孚海域的普雷韦扎（Preveza）战斗中与海雷丁指挥的奥斯曼舰队相遇。<sup>26</sup>当多莉亚发现西方的舰队处于下风时，他竟然选择撤退而非继续战斗。作为热那亚人，他对保护威尼斯人的利益毫无兴趣，而且——尽管充分意识到苏莱曼与海雷丁造成的威胁——他仍然优先选择保护西地中海。当时的一位法国观察家曾将多莉亚和巴巴罗萨比作从不彼此撕咬的狼，或者是“从不互相啄食对方眼睛的”乌鸦。<sup>27</sup>

### 3

关于如何应对土耳其人，法国国王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方案。法兰西斯一世深陷于同查理五世的纷争，他们都对意大利的米兰公国以及那不勒斯王国提出继承权的诉求，此前，法兰西斯的前任路易十二也曾对米兰公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都曾入侵那不勒斯王国。当查理五世已经把公元1495年对那不勒斯的征服视为他所领导的十字军朝着最终夺取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胜利迈出的第一步时，从1498年到1515年统治法国的路易十二的眼界却相当狭隘。他的确对莱斯沃斯岛发起过一次远征，却成了一场灾难，打消了他对东地中海的所有野心。1507年，他投身于业已混乱不堪的热那亚事务，镇压城中发生的一次起义，但其目的依然是巩固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统治，而非发起一场法国人抗击土耳其人的伟大运动。他低估了阿拉贡的斐迪南在意大利北部调动反对派的能力。1511年在拉文纳的失利迫使路易撤出意大利；然而，其继任者法兰西斯却决心为法国向哈布斯堡的对手报仇，他先是收复了米兰，然后推行更加庞大的计划，最后导致1525年



在帕维亚（Pavia）大战中的惨败，自己也被俘虏。<sup>28</sup>当他从马德里监狱被释放后，法兰西斯迅速放弃了与邻居哈布斯堡人和平相处的承诺，因为法国周边的所有土地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查理五世表示效忠。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并不特别忠诚于查理，法兰西斯也没必要担心他会被这些邻居包围，但他知道若想实现自己在意大利建立帝国的梦想，就只有向哈布斯堡施压。<sup>29</sup>

法兰西斯想通过干涉西班牙人与土耳其人在西地中海的战争来解决自己的困境。<sup>30</sup>从根本上来讲，他与土耳其人缔结盟约的目的不是带来和平，而是施加灾祸。公元1520年，他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突尼斯，策动海盗们“给身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皇帝制造更多的麻烦”，这一计划表明法兰西斯毫不关心他想要成为其宗主的南意大利人民的利益。<sup>31</sup>那时，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结盟还属于秘密交易，大多数交涉都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法国的代表还鼓动当地基督徒领主与土耳其人一起攻击哈布斯堡辖下的领土。1529年，法兰西斯派使者前去求见苏莱曼，目的是想对安德里亚·多利亚的背叛实行报复；就在同一年，法国提供的火炮被用来攻打了阿尔及尔海港入口处的西班牙堡垒。七年后，查理五世收到报告，得知法国人与奥斯曼宫廷达成共识要同时进攻哈布斯堡治下的领地。查理想通过建立针对土耳其人的神圣同盟的方式，使法兰西斯陷于被动，因为如果神圣同盟建立起来，那么法国国王就必须在基督徒统一体与土耳其同盟之间公开做出选择；对于法兰西斯来说，权力的平衡才是最要紧的，他想象着，奥斯曼人可以被用作压制哈布斯堡家族的筹码。<sup>32</sup>人们不禁要问：如果1529年苏莱曼攻打维也纳取得成功的话，法兰西斯将如何反应？1532年，向苏丹派去的使团十分清晰地阐述了法兰西斯的意图：苏莱曼应该集

中力量攻打意大利，而非匈牙利和奥地利。法兰西斯想象着：苏莱曼的军队能够将哈布斯堡人赶出意大利半岛，之后他就可以打着基督的旗号，作为神指定的救世主进驻意大利。然而，苏莱曼再次由于同波斯国王的冲突而转移了注意力，将地中海的战争事务交由北非的海雷丁·巴巴罗萨负责。法国国王的表现给人们的印象是十足的玩世不恭。到 1533 年时，法国人与土耳其人的盟约已完全不是秘密：法国准备招待海雷丁派来的使者，数月之后，11 艘精美的土耳其帆桨船抵达法国，带来了苏丹本人派遣的使团。双方的协商最后落实为“治外法权条款”（the “Capitulations”），这份商贸和约掩饰了其政治联盟的实质。<sup>33</sup>

法国人对土耳其人的支持可谓厚颜无耻。公元 1537 年，12 艘法国帆桨船出航，为 100 艘土耳其战舰提供二次补给，他们在地中海中部四处寻找海雷丁舰队的位置，闪避着马耳他骑士团的舰队。1543 年，当海雷丁的舰队劫掠南意大利的海岸、掳走雷焦总督的女儿时，同行的还有一名法国大使。苏丹甚至还提出可以将巴巴罗萨的舰船借给法国国王。巴巴罗萨的舰队在响亮的号角和民众的欢呼声中抵达马赛。法兰西斯欣然盛情款待土耳其人，不仅举办盛宴欢迎土耳其海军的到来，还为海雷丁的舰队提供补给，这样一来，“他将成为海洋的主人”。于是，土耳其人对法国东部的沿岸地区发动侵袭以作消遣，这些地方并不属于法国，而属于皇帝的一位封臣，即萨伏伊（Savoy）公爵：尼斯遭到围困，昂蒂布（Antibes）的修女们被俘获成为奴隶。

就在这时，法国与土耳其人联盟的怪异历史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法兰西斯向土耳其舰船开放了土伦港（Toulon），邀请海雷丁的手下在那里过冬。法兰西斯还送给巴巴罗萨一座

钟和一面银盘。三万名土耳其人散居于城镇及郊区，土伦大教堂也被改成了清真寺，还建立起奴隶市场，因为土耳其人继续从周围地区抓捕男人和女人，强迫其中一些男人到船上工作。土耳其钱币取代了法国钱币在当地流通。市议会抱怨土耳其军队消耗的橄榄太多，在这个自然资源不是很丰富的地方，食物和燃料供应都出现了短缺。巴巴罗萨也充分意识到他待在法国这件事引发了纷争，也担心食物供给的问题；他劝服国王送给他八十万枚金埃居（*écus*），并在公元1544年5月离开。新的掠夺又开始了，而且更加野蛮，当巴巴罗萨离开土伦时，他说服法国舰队与他一起行动：托斯卡纳沿海的塔拉莫内（Talamone）被洗劫；伊斯基亚岛拒绝向入侵者提供金钱、男孩与女孩，后被摧毁；法兰西斯的使节勒波林（le Paulin）窘迫地见证着所有这一切。<sup>34</sup>1544年底，法兰西斯羞愧地与查理

423

五世签署和约，承诺与西班牙联合对抗土耳其人，但事实上，法兰西斯与其继任者亨利三世（Henry III）并没有因他们与土耳其舰队和柏柏尔海盗联合攻击他们的共同敌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土而感到内疚。例如，16世纪50年代末，法国海军与阿尔及尔人联合攻击了易受攻击的梅诺卡岛以及距离那不勒斯不远的索伦托。

查理五世其实也没有那么固执地不肯与穆斯林统治者，尤其是与突尼斯统治者，在地中海上进行任何合作。传统上，威尼斯也会与奥斯曼人妥协以谋取商业利益。杜布罗夫尼克通过向“高门”缴纳贡金来维持着自己的中立。但相比其他基督教统治者，法兰西斯谋取自己利益的方式更加残酷无情，他这么做只是希望为自己赢得意大利的领土和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的荣耀。查理五世更为冷静、谨慎地制定自己的政策，他在很

大程度上是被动的：他关注着伊斯兰教在地中海的扩张，以及新教在欧洲的扩张，而法国却在挑战他所掌管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西班牙诸王国的霸权。查理的政治热情取决于他与苏莱曼大帝以及马丁·路德及其后继者间的冲突。在他去世前不久，即公元 1556 年他宣布退位时，地中海内部的势力平衡仍很微妙。在此后十六年间发生的三件大事将最终决定伟大的海在相对较小的基督教西方与较大的伊斯兰东方之间的分裂，这三件事是：马耳他围城、奥斯曼人征服塞浦路斯和勒班陀战役（the battle of Lepanto）。

#### 4

424 纵观公元 16 世纪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可以发现：奥斯曼人的到来产生出一套新秩序，或者说是伊斯兰教早期的怀旧情绪。现在，一个伊斯兰帝国再次从陆地与海洋的各个方向寻求势力扩张，穆斯林指挥的海军控制了东地中海的水域，并在西地中海通过代理人，即柏柏尔海岸（指北非海岸）的统治者向基督徒海军发起挑战。这是极为重要的转变。数百年来，穆斯林的海军逐渐控制了紧邻伊斯兰国家——埃及与叙利亚附近的马木留克舰队，最西端的摩洛哥舰队、爱琴海内部的土耳其埃米尔——的海域，伊斯兰的海上力量扩张到极大的规模。<sup>35</sup>此时的君士坦丁堡成了一个巨大舰队的指挥中心，与拜占庭时代帝国海军逐渐沦于热那亚与威尼斯人掌控之下的状况形成对比。技术精湛的海军将领成为海战艺术的专家。土耳其人不只是一支战斗力量；苏丹们还热衷于向首都提供生活物资，他们用谷物填饱不断增加的人口，用奢侈品装点帝国宫廷。<sup>36</sup>与此同时，在西部，西班牙的海军力量逐渐依赖于意大

利的资源。下一章中将会出现的，在马耳他、勒班陀与土耳其人作战的“西班牙”船只中，绝大多数都来自西班牙治下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sup>37</sup>数个世纪以来，墨西拿的兵工厂兴盛繁荣；但自13世纪安茹的查理打算打造一个海洋帝国以来，西西里与南意大利还从未在地中海发生的各种海上冲突中产生过这样大的影响。

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还有保守主义。地中海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帆桨船的长期使用。就船只本身而言，奥斯曼人用未干的或者说“绿色”木料建造的船只不像古典时期罗马的大型谷物船那样可长久使用。但帆桨船的基本设计几乎没有发生太多改变，除了威尼斯人建造的大量三桅帆桨船外——这种船行驶缓慢、比较笨重，进港口还需外力拖引，是从用以承担中世纪晚期前往佛兰德与黎凡特的航行的大型商用帆桨船发展而来。<sup>38</sup>西班牙帆桨船的长度约有40米，宽度仅有5~6米，长宽比例接近8:1。与古代一样，沿着船的纵向一侧有升起的甲板，在其下部安装着划桨的长凳。这种规模的舰船每一侧放置的划桨长凳约有25条，每条长凳上坐5名桨手。<sup>39</sup>当条件允许时，也会使用风帆的牵引力，与威尼斯以及奥斯曼帝国相比，西地中海的人们更愿意使用较大的船帆。这可能更适于在水面更为开阔的西地中海航行，而在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与爱琴海，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只需要从一座岛屿驶往另一座岛屿，要在曲折的海岸线之间缓慢航行——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爱琴海，帆桨船编织着密集的交流网络。<sup>40</sup>有了船帆的力量，航速相当可观，可能达到每小时10~11海里，而依靠桨动力的普通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3海里，当需要加速追击或逃跑时，速度可翻倍。当然，人力无法

维持长期快速划桨；每分钟划 26 次的频率只能维持 20 分钟。此外，还有一个老问题：较低的干舷在深海航行时容易被水浸，因而无法在不频繁停下的前提下，为桨手们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sup>41</sup>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天气恶劣时航行不能离陆地太远，因此帆桨船总是与海岸相伴。然而，由于它们并不是完全依靠地中海变幻莫测的风向的牵引，因此它们也有可精确操控的优势，一位训练有素的船员可以驾驶着船在狭窄的水域中行驶。

通常，船员中既有奴隶，也有自由人。当然，管理船员时要将团队合作的概念灌输下去。一般会安排一名自由人桨手与一名非自由人桨手比肩而坐；自由人桨手拥有较多权利，可以监视身旁的非自由人伙伴，后者通常会戴有脚镣。不过，奥斯曼人的舰队由不同类型的船只构成，有的由奴隶操作，有的由志愿者操作。一份公元 16 世纪的报告提到一支由 130 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有 40 艘由奴隶来划桨，60 艘由被征召的、会得到固定薪金的自由穆斯林操作，其余 40 艘由自愿加入的基督徒操作，当然也需要向后者支付薪金<sup>①</sup>；该报告还指出，一旦战争爆发，还要额外征召穆斯林，因为只有穆斯林才受到完全信任。各个村庄都需要提供应征士兵以及他们的生活费用——每 20 ~ 30 户家庭需供养 1 名桨手。<sup>42</sup> 威尼斯设有“海军民兵”（*Milizia da Mar*），这是 1545 年设立的行政部门，其职能是从威尼斯及其属地征兵；威尼斯的各种行会与协会共有近 4000 名桨手，而且无论何时士兵籍册上都会有 1 万多名士兵

---

① 此处的舰只数目相加是 140，与前面提到的 130 艘不一致，原文如此。——译者注

随时等候征召，再通过抽签从中选出要在帆桨船上服役的船员。<sup>43</sup>无论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的船员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无论他们在基督徒船上服役，还是在穆斯林船上工作，都需如此。显然，所有桨手都得遵守时间，并负担船桨的重量（有些帆桨船的桨是独立的，但大部分是五人桨，也就是五个人操纵一支巨大的桨）。在航行中，甲板上的状况相当糟糕：桨手们不得不在划桨岗位上就地解决排泄问题，尽管聪明的指挥官可以确保每两天清理一下粪便和其他杂物。与此同时，船上的空气污浊不堪。在船的坐板下方和舷门里有很小的空间，可供货物存放以及晚上蜷缩着休息。当船只遇到困境或沉没时，被缚的奴隶没有丝毫机会逃走；1571年，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在勒班陀附近爆发大规模海战时，双方都有大量奴隶遭遇这一命运。在航行中，许多桨手几乎全身赤裸；在夏季地中海的高温中，脱水是个问题，有些人在当值时死去，一名船长但凡有点儿理智，就会知道他无法承担失去桨手的损失。桨手轮换制意味着桨手有时间恢复体力。那些最具合作精神的人会被提拔进入船上的指挥层，从甲板下面沉闷、肮脏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帮助计算时间或负责其他重要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船上的恶劣状况确实需要改变，但同样不能要求积极和周到地对待奴隶或志愿者。铁的纪律决定着一切。

426

奥斯曼舰队上的奴隶会被剃发以标记其身份，而穆斯林奴隶则会挂着一把摇晃的锁；他们的一只脚上还会戴上铁环以象征被俘。因此，在陆地上，人们可以轻易地把他们辨识出来，而且他们待在陆地上的时间更长。虽然在冬季航行并不罕见（运送使团、发动闪击战等），但冬季到来时这些奴隶中的绝大部分不会上船，而是从事一些与海洋完全无关的任务，如在

菜园和作坊中做替补小工；有些人还可自己做些生意，严格地说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至少在威尼斯是这样），但如果他们想要赚钱为自己赎身的话，这就非常重要。即便在航运季节，他们也需要在岸上等待出海命令，他们的奴隶营（*bagni*）经常是一些在城市腹地建造的洞穴和牢房，有自己的商店和市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各奴隶营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尚可忍受，有的悲惨不堪；同性的性强暴行为比较普遍。另外，奴隶营中还设有祈祷场所：里窝那（Livorno）的奴隶营有一间清真寺；阿尔及尔的奴隶营有进行礼拜的房间。除了对  
427 不同宗教信仰的容忍，某些地区还有另一种倾向，如在北非，可以改变宗教信仰以获得自由，基督徒改宗者在柏柏尔人舰队中作用极大，经常能获得指挥权。<sup>44</sup>

桨手们的食物供应充足，以使其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这也需要频繁靠岸进行补给。与早些年一样，不同舰队供应的饮食也不相同：公元1538年，在西班牙海军的西西里帆桨船上，一名桨手或中下级船员（*ciurma*）的配给是每天26盎司船上特备干粮，一个星期中有三天配给4盎司肉食，其余四天则供应炖菜（主要是蔬菜）。在西班牙之外的地区，船上的人们更喜欢食用鹰嘴豆，而到16世纪时，肉食的供应量普遍减少。这个时期，帆桨船的体积越来越大，整个西欧的食品价格却大幅上涨。这意味着16世纪末舰船补给的成本变得让人难以承担：“地中海战舰的胃口像霸王龙一样已经超出环境的供养能力。”<sup>45</sup>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和波斯巨大战争开支，以及西班牙人在尼德兰的巨额军事开支——这导致在查理五世的儿子及继承人、顽固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爆发了起义——使他们用于地中海船队的资金所剩无几，进而使土耳其和西班牙陷入僵局。



##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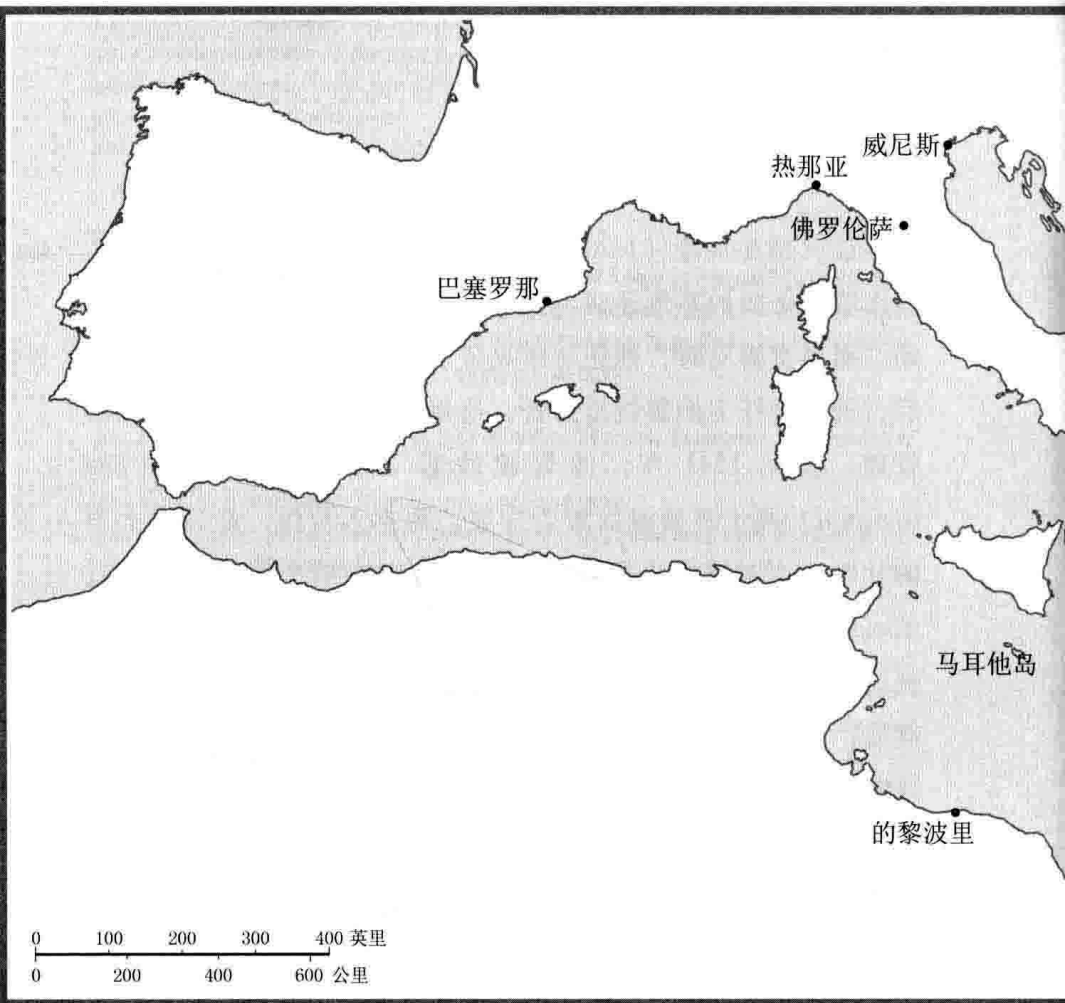
1. D. Abulafia, *The Discovery of Mankind: Atlantic Encounters in the Age of Columbus* (New Haven, CT, 2008), pp. 33-44, 82-6.
2. D. Blumenthal, *Enemies and Familiars: Slavery and Mastery in Fifteenth-century Valencia* (Ithaca, NY, 2009).
3. B. Pullan (ed.), *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Venetian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68).
4. F.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 Reynolds, 2 vols. (London, 1972-3), vol. 2, p. 880 dates the phenomenon too late.
5. J. Heers, *The Barbary Corsairs: Warfare in the Mediterranean, 1480-1580* (London, 2003); G. Fisher, *Barbary Legend: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1830* (Oxford, 1957); also J. Wolf, *The Barbary Coast: Algiers under the Turks, 1500 to 1830* (New York, 1979).
6. P. Brummett, *Ottoman Seapower and Levantine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Albany, NY, 1994), pp. 123-41.
7. Lively accounts in R.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the Final Battle for the Mediterranean 1521-1580* (London, 2008), pp. 11-27; and B. Rogerson, *The Last Crusaders: the Hundred-year Battle for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ondon, 2009), pp. 261-5.
8. A. Hess, *The Forgotten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Sixteenth-century Ibero-African Frontier* (Chicago, IL, 1978), pp. 21, 42, 75-6.
9. Ö. Kumrular, *El Duelo entre Carlos V y Solimán el Magnífico (1520-1535)* (Istanbul, 2005), p. 126.
10. M. Özen, *Pirî Reis and his Charts* (2nd edn, Istanbul, 2006), pp. 4, 8-9.
11. Fisher, *Barbary Legend*, p. 42;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 61; Özen, *Pirî Reis*, p. 4; Rogerson, *Last Crusaders*, p. 156.
12.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 63; Rogerson, *Last Crusaders*, pp. 160-63; Hess, *Forgotten Frontier*, pp. 63-4.
13. R. Davis,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Basingstoke, 2003);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 34.
14.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p. 64-5.
15. Kumrular, *El Duelo*, p. 119; also Ö. Kumrular, *Las Relaciones entre el Imperio Otomano y la Monarquía Católica entre los Años 1520-1535 y el Papel de los Estados Satélites* (Istanbul, 2003).
16.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 68.
17. *Ibid.*, pp. 70-71.
18. Kumrular, *El Duelo*, p.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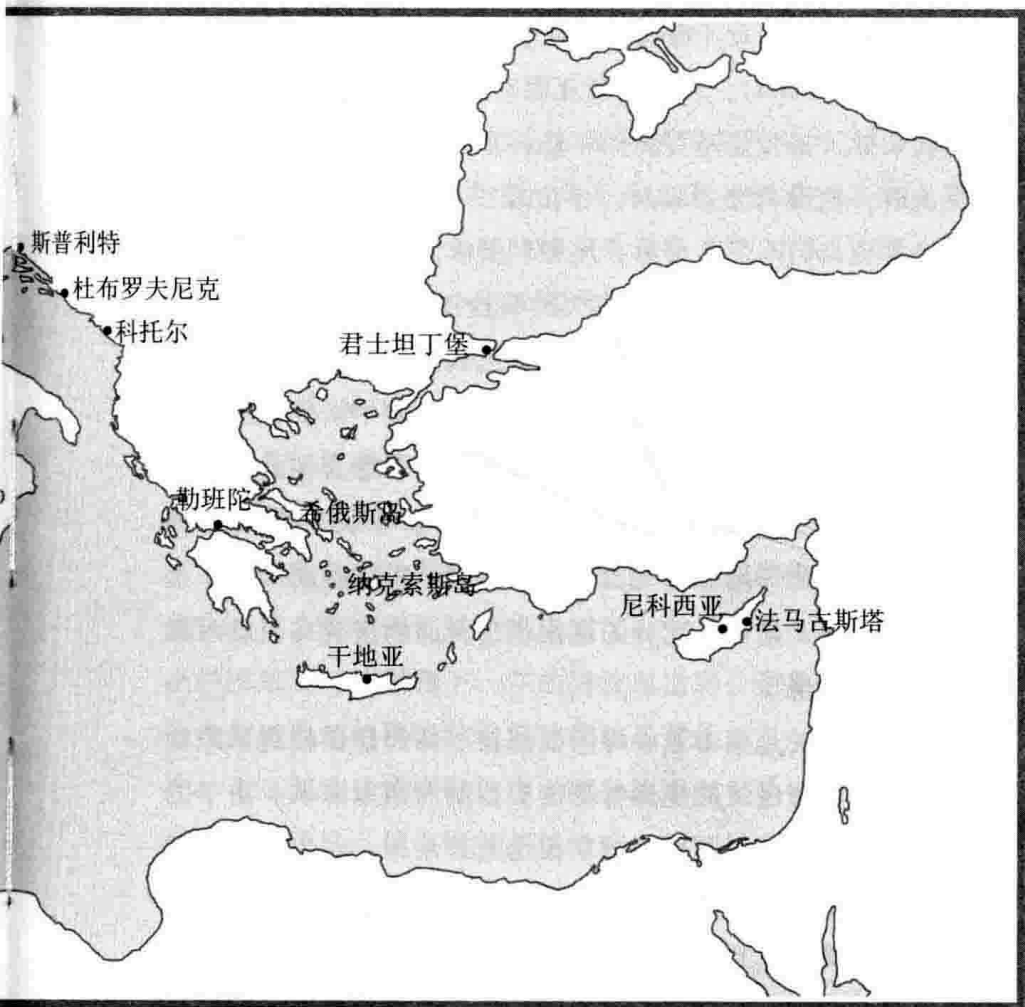
19.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 71.
20.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 63.
21. Wolf, *Barbary Coast*, p. 20 (1535).
22. P. Lingua, *Andrea Doria: Principe e Pirata nell'Italia del '500* (Genoa, 2006).
23.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 49;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 69.
24.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 55; Rogerson, *Last Crusaders*, p. 288.
25.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 69.
26. Lingua, *Andrea Doria*, pp. 94–101.
27. Wolf, *Barbary Coast*, p. 20.
28. D. Abulafia, 'La politica italiana della monarchia francese da Carlo VIII a Francesco I', in *El reino de Nápoles y la monarquía de España: entre agregación y conquista*, ed. G. Galasso and C. Hernando Sánchez (Madrid, 2004).
29.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p. 73–4.
30. R. Knecht, *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 the Reign of Francis I* (Cambridge, 1994), p. 296; J. Luis Castellano, 'Estudio preliminar', in J. Sánchez Montes, *Franceses, Protestantes, Turcos: los Españoles ante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de Carlos V* (2nd edn, Granada, 1995), pp. ix–xlvi.
31.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 73.
32. Hess, *Forgotten Frontier*, p. 73; Sánchez Montes, *Franceses, Protestantes, Turcos*, p. 52.
33. Knecht, *Renaissance Warrior*, pp. 296, 299, 329.
34. *Ibid.*, p. 489; Heers, *Barbary Corsairs*, pp. 83–90; Hess, *Forgotten Frontier*, p. 75.
35. Brummett, *Ottoman Seapower*, pp. 89–121.
36. *Ibid.*, pp. 131–41.
37. G. Hanlon, *The Twilight of a Military Tradition: Italian Aristocrats and European Conflicts, 1560–1800* (London, 1998), pp. 29–30; D. Goodman, *Spanish Naval Power, 1589–1665: Reconstruction and Defeat* (Cambridge, 1997), pp. 13, 132.
38. J.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2nd edn, London, 2003), pp. 245–7.
39. N.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p. 179–81;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209–34; H. Bicheno,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3), p. 73 (plan of galley).
40.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183–4.
41.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78–9, 211–20; J. Pryor,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1988), p. 85.
42.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125–6.
43.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198–9.
44. Davis,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pp. 42–3 (renegades), 115–29 (*bagni*).
45.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237–9.

## 四 白海之战 (1550 ~ 1571 年)

### 1

让 - 德瓦莱特 (Jean de Valette) 是圣约翰骑士团的成员，428  
当医院骑士团的基地还在罗得岛时，他主要领导劫掠奴隶的行动。撤离罗得岛时，他还亲眼见证了投降条约的签署。在那之后，他被委任为黎波里总督，这里与马耳他一起交由骑士团管理。公元 1541 年，他驾驶的船“圣乔瓦尼号” (*San Giovanni*) 与土耳其海盗发生冲突，他本人被俘，在四十七岁的壮年 (当时这样分类) 沦为一名苦囚在船上劳作。他熬过了一整年的屈辱生活，直到驻扎于马耳他的骑士团与土耳其人进行俘虏交换才重获自由。回到马耳他后，他晋升至骑士团的高层；人们都知道他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但他的勇气和风度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当土耳其的扩张范围接近马耳他以及西西里时，他已经成为骑士团潜在的领导人。1546 年，土耳其军队当中最有能力的海军司令图尔古特 (Turgut)，或德拉古特 (Dragut)，夺取了突尼斯海岸的马赫迪耶，不过 1550 年时西班牙人又将其收复。图尔古特在杰尔巴岛附近的海域与安德里亚·多利亚的舰队发生对峙，当多利亚设置的陷阱就要抓住他时，他却成功逃脱；他驶往马耳他岛与戈佐岛，给骑士团的岛屿留下一地狼藉；随后，他成功地袭击了黎波里，这座城市经过四十年的基督徒统治后再次被穆斯林夺取。<sup>1</sup> 西班牙





人打算重新使天平倾向自己一方，1560年时派遣一支约有一百艘战舰的舰队（半数为帆桨船），希望最终能够夺取杰尔巴岛。这个时候安德里亚·多利亚已经上了年纪，他任人唯亲，将指挥权交给他的继承人，也就是大外甥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Gian Andrea Doria），当小多利亚面对皮雅利（Piyale）——一位极具天赋、祖先是基督徒的年轻将军——领导的土耳其海军的反击时，他没有能力服众，各位船长不再遵守严格的纪律，无法保持该有的阵形。据称，皮雅利要求升帆并撞击西班牙舰船时的命令“堪称海军史上伟大的快速决定”。<sup>2</sup>在杰尔巴战役中，几乎没有一艘西班牙帆桨船能够逃脱被撞毁的命运。<sup>3</sup>西西里与教廷的舰队也花费数年时间才从这场失败中恢复。除了大量船只被毁，这场战役的灾难还在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军官、技术高超的海员和技工（箍桶工、水手长、水兵）阵亡——西班牙损失的优秀人员有六百多名。<sup>4</sup>这场胜利增强了土耳其人的信心。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进攻马上就可以取得惊人的进展。

最为紧要的是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任何想要控制从东地中海到西地中海通道的统治者都需要控制西西里海峡。由于的黎波里已经丢失，对突尼斯的掌控也危若累卵，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保住马耳他岛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土耳其的作家表现出他们对于这块“被诅咒的石头”没有什么耐心了，力劝苏丹快点把它拿下，那样一来，马格里布与爱琴海之间的交通就可以更加顺畅。<sup>5</sup>随着医院骑士团不断发起海盗式袭击，夺取马耳他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在马耳他骑士团的指挥官当中，最负盛名的是罗姆加斯（Romegas）。公元1564年6月初，在希腊西部海域，他对土耳其的一艘前往威尼斯的大型帆桨船

“苏丹娜号”（*Sultana*）发动袭击；仅被罗姆加斯据为己有的商品价值就达到八万杜卡特。接着，他俘获了开罗与亚历山大的总督，还抓住一位来自苏丹后宫、颇受爱戴的女侍，据说她当时已经一百零七岁。苏莱曼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目的：

我要征服马耳他岛，我命令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为战斗指挥官。马耳他岛是异教徒的总部。马耳他人控制了白海东部的穆斯林朝圣者以及商人们前往埃及的路线。我已命令皮雅利帕夏与皇家海军一起参加战斗。<sup>6</sup>

1565年3月30日，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抱着必胜的信念，通往西地中海的大门马上就要被打开；170艘战舰以及200多艘运输船带着3万名士兵，于5月18日进入马耳他岛的视野范围之内。<sup>7</sup>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支无敌的舰队；整个海平面都被船帆染成了白色。<sup>8</sup>还有更多的船只只在年老的图尔古特的指挥下，从黎波里出发，正在途中。奥斯曼 430 的各位王公都确信能够拿下并碾碎马耳他。

土耳其人最终未能如愿，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做出的错误决定，还因为马耳他人对其新任的骑士团领导十分信服。马耳他的贵族躲在岛中央，即古代的首都姆迪纳（Mdina）的石筑宫殿中。底层的马耳他居民反而狂热地献身于基督教的事业，充当侦察员，在危险的海域游来游去以向被围的防御堡垒传递情报。战斗集中于马耳他的大海港及一些小海湾。现代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Valletta）是在围城结束后建造的，如今那里耸立着一块突出的岩石海岬，叫作希伯拉斯山（Mount Sciberras），在这座海岬的末端矗立着圣艾尔莫堡（Fort St Elmo），一道较 431

低的围墙为其提供防御。在圣艾尔莫堡的对面，是马耳他的老港维托里奥萨（Vittoriosa），骑士团的基地就位于这里，它如今被称为比尔古（Birgu）。圣约翰骑士团将其在罗得岛的生活方式复制到这里，每一个分队，或称“语团”（*langues*），都有各自的总部（此时在被一名信仰新教的女王统治的英格兰所设置的语团只召集了一名骑士）。在维托里奥萨港的一角，耸立着雄伟的城堡圣安杰洛（St Angelo）以守卫港口。圣安杰洛堡的对面是被一道窄窄的海湾隔开的郊区森格莱阿（Senglea）。这里是防御最为坚固的地区，而且不出所料，土耳其人也会被引到这里。一位帮助守卫马耳他的意大利士兵弗朗西斯科·巴尔比·迪柯雷乔（Francisco Balbi di Correggio）撰写了一部关于围城的回忆录，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土耳其的两位指挥官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位是掌管陆军的穆斯塔法帕夏，另一位是掌管海军的、更为年轻的皮雅利。巴尔比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土耳其人采纳穆斯塔法攻打姆迪纳的建议，“我们肯定就守不住了，因为我们的援兵正是经由姆迪纳前来。但万能的上帝没有允许那样的情况发生，正是因他的意志，两位帕夏才会因嫉妒而产生严重分歧——我们从改信基督教的人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sup>9</sup>实际征战中，土耳其人决定夺取圣艾尔莫堡，若以那里为基地，他们就能够打乱骑士团对大海港的控制，还能够获得进入北部的马萨姆塞托（Marsamuscetto）水道 [现代瓦莱塔与现代斯利马（Sliema）之间的河道]，他们希望把舰队停泊在该水道。土耳其人非常自信，认为不超过十二天，圣艾尔莫堡就会落入他们手中。

土耳其人低估了对手的决心，也被所在地的荒凉击退，他们发现：那是一个岩石小岛，没有任何植被，庞大的军队驻扎



在这里之后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守卫圣艾尔莫堡的是一支 800 人的军队，拥有充足的食物：肉类（包括饲养的活牛）、干粮、葡萄酒和奶酪。<sup>10</sup> 这座堡垒遭受了无休止的攻击；为了报复土耳其人的进攻，骑士团将烧红的致命铁环扔到土耳其人的营帐当中。土耳其人这才注意到：马耳他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难打。圣艾尔莫堡一直坚持到 6 月 23 日才被攻陷。骑士团坚持这么久，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所献身的基督教事业。与其在恐怖的大屠杀当中被杀掉，他们更愿意选择战斗至死；巴尔比还确认，大海港的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在这次围城战中，89 名骑士阵亡，但他们只是阵亡者中的精英，实际战死的人数更多，除他们外，还有 1500 名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士兵。奥斯曼人的损失更加惨重：是西欧阵亡人数的四倍。<sup>11</sup> 此时担任总团长的让 - 德瓦莱特前往各阵地鼓舞士气，几乎不睡觉。来自西西里的基督徒增援船只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不过 7 月初时，有 700 名援军成功地进入维托里奥萨。如果要将土耳其人驱逐出马耳他岛，则需要更多的援军，不过欧洲的各个王廷逐渐才看到了奥斯曼人获胜的潜在影响。德瓦莱特不断向西西里发信求援，但西班牙国王害怕像之前在杰尔巴岛一样失去他的舰队。有时，菲利普想到这场冲突时，也会像账房先生一样眨着眼睛算计得失，即便他完全清楚将奥斯曼人击退回东地中海就是他的责任所在。最后，国王同意西西里总督托莱多的唐·加西亚（Don García de Toledo）的建议，立刻派遣一支大型舰队前往马耳他；但马德里与巴勒莫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导致行动迟缓，而且西西里可用帆桨船的数量也有限（唐·加西亚在 6 月底时只能提供 25 艘战舰，再晚两个月就能提供 100 艘了）。<sup>12</sup>

圣艾尔莫堡的陷落使得土耳其人终于可以对骑士团的森格莱阿城堡和维托里奥萨城堡发起迟来甚久的进攻，穆斯塔法帕夏将大炮拖拽到比它们略高的地方，准备使用火炮攻击。在随后的数个星期里，土耳其人实施了大面积的轰炸，进行了恐怖的屠杀。然而，守军这边就只能靠运气了，或者按照他们的说法，上帝在庇佑他们以及这座岛屿。就在8月初守军快要绝望的时刻，一支马耳他分队袭击了位于森格莱阿附近的土耳其大营。他们杀掉的土耳其人大多病重无法作战，但他们造成的破坏被看作盼望已久的西西里援兵造成，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事实上，西西里援兵刚从姆迪纳出来后就又返回去了；土耳其人派出的先遣队在抵达姆迪纳后，无一不为这座古老首都的严密防线感到震惊。巴尔比还记载：这件事与其他事件导致皮雅利与穆斯塔法帕夏再次发生冲突。皮雅利坚持称：他听说一支庞大的基督徒援军已经抵达。“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他有责任护住整支舰队。他说：‘苏丹更看重舰队，而不是这样的陆军。’说完这些话后，他就离开了。”<sup>13</sup>无情的屠杀又持续了一个月，土耳其人想在维托里奥萨布雷，将整座城市变成一堆瓦砾；穆斯塔法收到苏莱曼的信，询问围城战的情况，为此他颇感尴尬，因为苏丹明确要求：现在，这场战役必须结束，必须获胜。

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幸运眷顾着土耳其人：夏末的风暴打乱了西西里援军的路线，使得他们沿着巨大的弧形从叙拉古绕道潘泰莱里亚到特拉帕尼，然后从那儿才能再向戈佐岛进发，最终于公元1565年9月6日抵达马耳他。西西里援军登陆的消息再次引起穆斯塔法与皮雅利的争执：

经过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争论，穆斯塔法的想法是，既然确定一支庞大的援军已经登陆，最好立刻撤退。但皮雅利却说：“噢，穆斯塔法，那你准备怎样向苏丹禀报呢？如果你还没见到敌人就撤退，他不会砍掉你的脑袋吗？如果你连敌人都没见过，你又怎么向苏丹说明是什么样的军队迫使你逃亡呢。”<sup>14</sup>

所以穆斯塔法也同意留下来战斗，但他的军队却没有采取相应的部署：1万人的援军在姆迪纳附近一举击溃了穆斯塔法的军队，土耳其军队逃到皮雅利的战舰上。到9月12日，活着的土耳其人已全部跑掉。数千人被抛弃于希伯拉斯山上的临时坟墓内。据巴尔比的记录，有3.5万名土耳其士兵在这场战役中阵亡，这要比最初发起进攻时的部队总人数多很多。<sup>15</sup>

马耳他保卫战在西欧激起了高昂的斗志，其影响难以估量。大约一个星期后，土耳其人失败的消息传到教廷。教宗在集会上宣称，胜利属于上帝与骑士团，并没有提及菲利普。<sup>16</sup>马耳他的胜利打破了基督徒在对抗苏莱曼以及柏柏尔海盗时不断失利的怪圈：罗得岛沦陷、普雷韦扎战败、杰尔巴岛惨败。西班牙人恢复了活力，开始在加泰罗尼亚、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打造一支新的舰队，因为他们确信奥斯曼人还会发起攻击；但此时他们精力充沛、信心满满，要将土耳其人的进攻打退而不是避开。奥斯曼人似乎把这场失利看成了逆境中的一件烦心事，而不是土耳其人在地中海霸权的终结。苏丹仍然能够征召大量的后备军。事实上，他的舰队仍然存在。无论是皮雅利还是穆斯塔法帕夏都没有被砍头，不过穆斯塔法被剥夺了指挥权。然而，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医院骑士团成功地阻止了奥

斯曼人，使其无法决定性地冲破西地中海的防线。当然，土耳其人已经在这个地区得到了盟友，柏柏尔地区的埃米尔们承认奥斯曼人的宗主权。奥斯曼人还希望在西班牙本土寻找到这样的盟友，他们的关注对象是西班牙的穆斯林，或称摩里斯科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信仰，憎恨官方在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对“摩尔方式”的打压。公元1568年底，摩里斯科人发动起义，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后被镇压下去。在起义期间，起义者得到柏柏尔人的支援——提供支援没有难度，因为“这个时期的西班牙本土根本没有舰船，国王的军队全部在千里之外忙碌着”。<sup>17</sup>只要奥斯曼人取得一次进展，就可能迫使西班牙国王关注本国海域的防御，尽管这片海域有柏柏尔海盗，但西班牙人仍将其视为自己的海域。不过，考虑到有三座最为重要的岛屿——希俄斯、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仍然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高门”经过深思熟虑，将注意力转回到了东地中海。

## 2

骑士团与他们所统治的居民有很大不同。骑士团是来自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贵族；按照官方规定，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生育子女；人们还注意到，骑士团中位阶最低的骑士也被认为比马耳他最高贵的贵族重要。<sup>18</sup>公元1565年以后，骑士团被大加赞颂，被誉为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他们在绝境中的勇气与决心为其赢得无数赞誉，这种赞誉来自基督教新教欧洲，甚至也来自奥斯曼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然而，马耳他处于地中海心脏的重要战略位置却不是以作为奥斯曼海陆两军的攻击焦点表现出来，而是以其他方式。骑士团来到马耳他后，选择维

托里奥萨而非姆迪纳作为其管理中心，极大地改善了那个昔日小渔港内人们的生活。骑士团自驻扎罗得岛起就以海盗式劫掠为主要收入来源，不过他们也鼓励马耳他的船长们申请私掠许可证；马耳他人只要将劫掠所得的十分之一上缴给骑士团总团长，就可获准悬挂骑士团的旗帜（红底白十字）。此外，要装备一艘船需要足够数量的火炮，这也是一笔巨额开支；通常，一支小型海盗船队会包括总团长辖下的船只以及当地海盗们拥有的船只。<sup>19</sup>像罗姆加斯这样的海盗经常把俘获的船只带回马耳他，然后进行拍卖。<sup>20</sup>在劫掠到的战利品当中，最珍贵的是奴隶，如果是成年男子的话，就可能被送到骑士团的舰船上工作。16世纪晚期的马耳他有着庞大的奴隶市场。随着维托里奥萨港发展成跨地中海航行中的重要站点，信仰基督教的船长们越来越多地于此地停留，购买奴隶以补充此前航行中奴隶死去或逃亡造成的缺口。与早些年一样，若有些奴隶的家人仍然关心他们，愿意花钱将其赎回，那么对于卖者来说，这也是一笔收益。<sup>21</sup>

436

在相对和平的时期，马耳他人在周边海域经商，主要前往西西里，从马耳他围攻战的前一年（公元1564年）到1600年，从马耳他岛出海的航船中有80%驶往西西里岛。往返西西里的航行有将近4700次，其繁忙程度可见一斑。此外，通往其他地区的有记载的行程包括前往马赛近300次，前往那不勒斯近250次，以及偶尔还会前往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君士坦丁堡、阿尔及尔、达尔马提亚，甚至走出地中海，到更远的北海，进入英格兰与佛兰德地区。与此同时，骑士团的到来，使得马耳他成为吸引地中海各地居民的中心地带。罗得岛的希腊商人跟随骑士团一起到来。其次是本地的马耳他商人，

过去他们在国际贸易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只是其庞大机器中的齿轮，向地中海各地运送谷物。一些位于纳沙尔（Naxxar）、泽布格（Zebbug）以及其他内陆地区的村庄，也拿出一小笔黄金，用于投资将西西里谷物运送到马耳他的海上贸易。马耳他岛上的另一种稀缺物资是木材，骑士团的到来使得对木材的需求激增，因为他们首先是一支海上力量。<sup>22</sup>他们让木材源源不断地运抵马耳他的能力令人震惊，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德瓦莱塔的雄伟建筑计划，结果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大海港。作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继承者，马耳他的骑士团并没有忘记他们救助病患的义务：其医院的大病房是早期现代欧洲医院厅堂中规模最大的。照料病患就需要保证某些十分昂贵的外来香料的持续稳定供应，甚至还有奢侈的金属：用银盘盛放食物反映出的不是毫无节制的奢侈，而是当时人们认为银制餐具比陶器更卫生。

在公元16世纪时，马耳他并不是地中海中部唯一经济繁荣的地区。当时也是意大利半岛两侧之“自由港”诞生的时期。两种类型的自由港发展起来：一种港口欢迎信仰各种宗教、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不受宗教裁判所的干涉；另一种港口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那里会降低甚或免除税收以鼓励贸易。前者的最佳代表是亚得里亚海西部、处于教宗领地内的港口安科纳。<sup>23</sup>虽然安科纳从事的是泛亚得里亚海贸易，主要与杜布罗夫尼克通商，但它仍在中世纪晚期成功地开展了有限的泛地中海营运，这受到拥有垄断地位的威尼斯人的嫉恨，但处于安科纳领主教宗的保护下。1500年前后，安科纳每年会向东地中海派遣两三艘商船，带回生丝、棉花以及香料，然后再从安科纳或杜布罗夫尼克向其他地区转售。从安科纳销售到东方的

商品包括肥皂、油和葡萄酒，但经由陆地运来的佛罗伦萨以及锡耶纳（Siena）的布料也会装在商船上，此外还有制衣业的著名副产品之一纤维纸，这是意大利人用从东方学到的用碎布边角料造纸的技术制造的东西——这也提供了证据，表明从1500年开始西欧的技术逐渐代替东方技术。<sup>24</sup>到这个时候，佛罗伦萨人全神贯注于他们的衣料经由安科纳向东方的销路；这不仅包括佛罗伦萨制造的丝绸和天鹅绒，还有从西欧获得的其他商品，如经由河流与陆路被运送到里昂的兰斯（Rheims）亚麻，这个时期的里昂是连接北欧与南欧的繁荣商站。而佛罗伦萨的衣料则要满足君士坦丁堡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庞大市场。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佛罗伦萨人已经能够在距离家乡很近的地方会见来自巴尔干的客户，因为土耳其商人、拉古萨商人、希腊商人和犹太商人都汇集于安科纳，这里迅速发展成为欢迎所有民族、所有宗教的自由港。犹太商人分为两大类：一是博宁提尼人（*Ponentini*），即西地中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其中大部分是过去被迫改信基督教的马拉诺犹太人（有时仍然是在模棱两可的“葡萄牙人”标签下的天主教徒）；另一类是黎凡特人（*Levantini*），即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治下，来自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以及士麦那的塞法迪犹太人。前一种人更多地表现出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适应，而后一种则遵循着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

大量毛皮从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随着安科纳的发展与繁荣，这座城市也不得不在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之外的地方寻找进口谷物，对此，拉古萨人很愿意满足它的需要，他们掌握着西西里、南意大利、爱琴海以及阿尔巴尼亚（出产粟子）的粮食资源。<sup>25</sup>到公元16世纪晚期时，谷物供应开始出

438 现压力：意大利以及伊比利亚本地人口衰减，土地开始更多地转向种植葡萄与橄榄，结果就是庄园生产只为满足本地的需求，不再关注对国际市场的供应。它产生的问题是：这些城市只能从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寻找重要的粮食市场。该问题还构成了一系列更复杂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泛地中海的商贸活动中，还发生在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农业耕作中。<sup>26</sup> 16 世纪末，当意大利中部发生政治动荡后，佛罗伦萨的布料贸易也开始衰落，安科纳人只能前往更加偏远的地方，从遥远的伦敦进口毛织布料，然后经由杜布罗夫尼克、新海尔采格和科托尔销售到巴尔干地区。<sup>27</sup> 因此，安科纳的崛起并不仅仅是意大利某一小角落的个别现象。安科纳人“连通各地”的商业网络已经成形；该网络在亚得里亚海最为密集，而且延伸到更远的地区。安科纳是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真正前线”，在这里，来自许多民族的商人们面对面地进行交易。<sup>28</sup>

安科纳的商业伙伴杜布罗夫尼克，恰恰在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发展到最为鼎盛的阶段，这是凭借城市的元老会在两大敌对的海军势力之间游刃有余而实现的。每年的贡赋持续不断地流向“高门”，拉古萨的船只也主动加入西班牙无敌舰队，参加了公元 1588 年入侵英格兰的灾难性战斗；一般认为，苏格兰发现的“托伯莫里 (Tobermory) 沉船”就是一艘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船。<sup>29</sup> 对于这样一个疆域仅限于城墙之内的城市共和国来说，能够在 1530 年维持一支由 180 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确实是非凡的成就。到 16 世纪 80 年代，其舰队的总排水量据说可达 4 万吨。<sup>30</sup> 杜布罗夫尼克作为一座天主教城市又同时是奥斯曼人的附庸，从双方获得自己的利



益。但它也开始向非基督徒的商人敞开大门。城市的元老们起初想禁止犹太人到城里居住，因为在1500年前后，西班牙和南意大利的犹太人被驱逐，城中的犹太人数目激增。到1532年，他们改变了想法，现在他们把犹太商人看作安科纳商路上的重要中介，非常鼓励犹太人到此定居。如今，城市的元老们降低了向犹太商人征收的关税，希望刺激商业的发展。在大量拥入西地中海的塞法迪犹太人中有许多医生。1546年出现了一个小型的犹太人居住区，但这里并不像威尼斯的居住区那样环境恶劣、位置偏僻：它紧邻海关所在地斯庞扎宫（Sponza Palace），就在斯特拉顿 [Stradun，或称普拉卡（Placa）] 大道不远处，这条大道正是杜布罗夫尼克最繁华的主街道。虽然1667年的一场大地震导致这一区域的大部分被重建，但犹太人区及其古老的会堂仍可辨认出来。<sup>31</sup>

439

杜布罗夫尼克成为国际性大都会。这也是文化繁荣的时期，拉丁文本研究和克罗地亚文学都发展起来——受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影响的剧作家马林·德尔日奇（Marin Držić），得到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铁托派的南斯拉夫人（Titoist Yugoslavs）的诸多关注，后者视其为社会主义的先驱。与此同时，天主教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s）与多明我会也在此建造了规模甚大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至今仍在运营；这里的艺术风格属于意大利马尔凯地区以及威尼斯的艺术类型，进一步证明了意大利文化在克罗地亚地区的深远影响。<sup>32</sup>事实上，意大利语仍然是当地的官方语言。东西方文化在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城市（包括威尼斯）创造出了如万花筒一样的融合现象。

杜布罗夫尼克同时面向陆地和海洋。这里有来自内陆波

斯尼亚地区的毛皮，从附近的特雷比涅以及更远的莫斯塔尔（Mostar）和新帕扎尔（Novi Pazar）进口的兽皮，此外，拉古萨人还经由马尔马拉海（Marmara）、爱琴海以及爱奥尼亚海深入保加利亚沿海地区购买毛皮。<sup>33</sup>公元16世纪早期，拉古萨人是欧洲粗纺毛织物（包括他们自己用巴尔干羊毛织成的毛料）贸易活动的专家，不过，到16世纪后半期时，他们就不得不将毛织物贸易更多地转向穿越巴尔干半岛的陆地商道。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威尼斯人的竞争，威尼斯人将原先与杜布罗夫尼克的贸易转到他们建于斯普利特（Split）的新的商站，此处距离威尼斯的路途更短。拉古萨人与威尼斯人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来自北海的竞争者：荷兰人与英格兰人，关于他们，更多的信息将在后面描述。<sup>34</sup>拉古萨人在伦敦的社区曾繁荣一时，到16世纪后半期时已经衰落，原因在于经由西地中海的海洋商路越来越危险；即使中立身份也无法使拉古萨人免于支付高昂的海洋保险金。<sup>35</sup>此外，随后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克罗地亚同胞中的海盗——乌斯科克人（Uskoks），以杜布罗夫尼克以北不远处的狭窄水道和岛屿为基地从事海盗劫掠——成为他们长期的烦恼。

然而，在公元16世纪，海洋交通衰落，陆路商道反而越来越重要。<sup>36</sup>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其视为16世纪末的主要发展，但这种趋势开始得更早，是随着安科纳、杜布罗夫尼克以及其他商业中心成为奥斯曼世界与西欧之间的连接点而出现的，因为对于任何一方来说，即便在战争期间，也渴求获得对方的商品。布罗代尔认为造成商路变化的一个因素在于塞浦路斯、安达卢西亚、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地区大批量地饲养骡子；但这种观念可能有些本末倒置。为什么人们宁愿选择骡子而非

船只作为交通手段呢？答案在于：海洋的安全度已经跌落至谷底，以至于陆地交通尽管缓慢且费用高昂，但仍然比海上交通更有利。例如，16世纪末，生丝从那不勒斯经由陆路运往里窝那，然后再运往德意志与佛兰德。杜布罗夫尼克也更多地投入于经波斯尼亚 - 黑塞哥维那的巴尔干贸易，而对前往英格兰、黑海以及黎凡特的远途海上贸易的兴趣有所减退。<sup>37</sup>甚至地中海沿岸新的贸易中心的出现，在布罗代尔看来，也证明了陆路贸易，而非海洋商路的繁荣：17世纪初，士麦那的崛起，让经由安纳托利亚到波斯的富庶地区成为可能；威尼斯人也试图开发经由科托尔然后翻越黑山的“黑色山脉”的路线。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拉诺犹太人丹尼尔·罗德里格斯（Daniel Rodriguez）建议将斯普利特建设成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主要商站，于是人们对这座古城开始了重建，到1600年，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中心，主要经营来自东方的丝绸、毛毯和蜡。<sup>38</sup>奥斯曼人极为热情地配合这些计划，派士兵护卫经由巴尔干半岛的商路。如今，威尼斯人的大帆桨船走的是航程相当于原来三分之一的路线，即从亚得里亚海下行至斯普利特，而不再需要先出亚得里亚海，之后再前往亚历山大和南安普顿（Southampton）；但即便是如此简短的航程也会遭到克罗地亚海盗的侵袭。<sup>39</sup>海洋贸易向更短、更限于本土发展的趋势，早在黑死病过去后就已开始（前文已经提到西班牙水域的例子）。远程贸易的衰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地中海作为交流手段的重要性也开始减弱。<sup>40</sup>

除去战争与海盗的影响，大西洋的开放也促使北欧经济进入新阶段；波罗的海的黑麦成为北方贸易的主要商品。西班牙

的白银的大量流入。<sup>41</sup> 第四地中海不仅仅因哈布斯堡人与奥斯曼人的冲突而破裂，而且，作为大西洋经济蓬勃扩张的结果，它也被边缘化了。然而，这个时期也不是全然黯淡无光。例如巴塞罗那，在其中世纪的黄金时代结束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历史似乎不再具有价值，但这并没有让它从商业地图上消失。它仍然承接了大量造船合同，以满足抗击土耳其人以及柏柏尔海盗舰队的需要。加泰罗尼亚的织物在新世界找到了新市场。公元 16 世纪时巴塞罗那的贸易也在扩张，不过是转向了西班牙内陆，并且对海洋的关注减退，符合商业路线从海洋转向陆地的大趋势。在海上，巴塞罗那附近地区的商贸日益被来自热那亚以及法国南部的商人主宰，此前三个多世纪当中加泰罗尼亚人控制的西地中海各岛屿间的商业活动，如今也由热那亚人掌控。1591 年，有提议要求把热那亚人逐出巴塞罗那，尽管西班牙一直有敌视意大利商人的传统。另外，大量法国人移居巴塞罗那，到 1637 年时，按照统计数据，总人口中的 10% 都有法国血统。<sup>42</sup> 在南意大利，热那亚人控制着长途贸易和西班牙治下那不勒斯的财政。<sup>43</sup> 事实上，热那亚已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银行，西班牙王室的财政主要依靠热那亚人的贷款，而非以往推测的来自美洲的白银收入。<sup>44</sup>

### 3

在地中海找到新生计的人还包括来自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流亡犹太人。其中有两人蜚声国际，还直接参与到一系列事件之中，最终导致塞浦路斯被奥斯曼人占领以及勒班陀大海战的爆发。比阿特丽斯·门德斯·德卢娜（Beatrice Mendes de Luna）约在公元 1510 年生于葡萄牙，就是 1497 年大多数葡萄

牙犹太人被迫改宗几年之后。她的家族生活在佛兰德，与西班牙同属查理五世治下，即便这个家族有一些成员与皇室联姻，但仍被怀疑为异端；积累大量财富的问题在于它会招致虚假的安全感——无论是出于神圣的还是罪恶的理由，富有的马拉诺总是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sup>45</sup>查理五世深信：这些从犹太教皈依的信徒都十分可疑，他们一定与德意志王国中新教的传播有着极大的联系。1545年，比阿特丽斯·德卢娜与其至亲匆匆离开佛兰德前往威尼斯，不过在那里他们再次被怀疑是遵循犹太律法<sup>①</sup>者，于是只好又在费拉拉寻找更为安全的避风港，因为那里的埃斯特（Este）王公们愿意接纳这些新的基督徒移民，移民们为这座日益发展的城市带来了财富、医疗技术以及美妙的音乐。比阿特丽斯·德卢娜恢复了她的富有，并重新以格拉西亚·纳西（Gracia Nasi）的身份开始公开作为一名犹太人生活，并支持从宗教裁判所逃离的马拉诺难民；在她的资助下，希伯来圣经的第一部西班牙语译本刊印发行，被称为“费拉拉的拉迪诺语（Ladino）圣经”，其目的是使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可以阅读。<sup>46</sup>到1552年，她再次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关注，导致她无法再舒适地生活在意大利；她堂而皇之地在四十名骑手组成的扈从队的护送下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君士坦丁堡。拉古萨当局表现出一定的远见，对她表示欢迎，因为她此前在君士坦丁堡时，其设在杜布罗夫尼克的商业代理人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大量商机。<sup>47</sup>苏

---

① 原文可译为“犹太化”，但语意不明，故作此译。特指在早期基督教时期，特别是3世纪时，基督教犹太人群中与保罗派相对立的派别，他们坚持维护摩西律法的原则，坚持要求外邦人中皈依基督教的男性实施犹太人传统的割礼。——译者注

丹允许她与其扈从依然穿着威尼斯式的服装，而没有要求他们按照犹太人的方式着装。然而，格拉西亚夫人（Doña Gracia）并没有背弃西方；她依然对意大利与地中海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可从她决心为与其拥有相同信仰的兄弟姐妹提供庇护得到证明。

443 她的决心如此坚定，尤其见于公元 1555 年教宗将宗教裁判所落户安科纳，在该城经商者及过去被鼓励定居在这里的百余名“葡萄牙人”中寻找异端之时。对马拉诺的迫害标志着教宗保罗四世（Pope Paul IV）更具挑衅性的宗教政策的开端，他还将罗马的犹太人拘禁到狭窄的居民区中；在他看来，在教廷治下的商业城市中，这些不信之人的发展速度令其震惊。带着这样的情绪，他的代理人抓捕“葡萄牙人”，将其财物（据说价值三十万杜卡特）充公，并将二十六人处以火刑。格拉西亚夫人设法向苏丹传讯，于是 1556 年 3 月苏莱曼大帝通过他的盟友法国国王的使节，向教宗保罗发出一封颇具轰动效应的信。在信中，他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犹太囚犯，因为那些都是他的臣民；苏丹还主张，他的财产遭受的损失已经达到四十万杜卡特，但他的表述极重礼节，他称自己为“超越诸帝王之伟大皇帝”，并承认教宗为“弥赛亚耶稣的信徒之最高贵、最强大的主人”。<sup>48</sup>教宗回信称：他愿意保护土耳其臣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对于其他新基督徒的火刑还将继续；他还辩称，将要在安科纳为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创建一个居住区（没有丝毫讽刺之意）。当这一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后，格拉西亚夫人的圈子开始联合抵制与安科纳的贸易。许多马拉诺向北逃亡到佩萨罗（Pesaro）港，这里是乌尔比诺（Urbino）公爵的领地；

于是，安科纳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曾经如此成功从事的商业活动，如今转移到了之前毫不起眼的竞争对手那里，这令安科纳人极度恼怒。<sup>49</sup>

然而，佩萨罗海港的设施比较差，那些不属于马拉诺的安科纳犹太人极为担心他们会与其基督徒邻居一样遭遇土耳其人的联合抵制。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争议，塞法迪犹太人的拉比拒绝接受一位富有的、作威作福的女人的指手画脚，何况这个女人还是以葡萄牙的基督徒身份长大的。他们不认为她就是新的以斯帖（Esther），不认为她能够保护并拯救犹太商人，尽管她慷慨地在帝国各地出资兴建犹太会堂与学校。抵制活动最终失败。安科纳得以幸存。一个女人无法扼杀安科纳；但安科纳的管理者们明白，由塞法迪犹太商人领导的抵制土耳其人行动将会终结他们的繁荣。管理者们意识到：这个精明世故的群体，虽然可能在当地的迫害浪潮中陷于困境，但其能力跨越了政治、文化和宗教的边界，能够造成巨大的影响。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流亡者向东迁徙（有的人向北进入荷兰等低地国家），但他们的流散不仅仅是到远离伊比利亚的地方生活。一个完整的海洋商业网络出现了，在其顶峰时期，曾经向西到达巴西和西印度群岛，向东到达果阿邦（Goa）和卡利库特（Calicut）。<sup>50</sup>他们所生活的商业世界，比五百年前他们的先辈经冢犹太人的世界要大得多。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对于那些亲历者来说是悲剧和灾难，而他们的后代却将灾难变为重生。

与格拉西亚夫人一起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还有她的侄子，也是其女婿若昂·米格斯（João Miguez）；行割礼后，他更名为约瑟·纳西（Joseph Nasi）——纳西是自称“亲王”的较为谦

逊的说法<sup>①</sup>。他的生平比其姑妈还要传奇。公元1577年，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发生权力斗争，他拥有大量财富来支持获胜的候选人，并且成为苏丹塞利姆二世 [Selim II, 或醉鬼塞利姆 (Selim the Sot)] 颇为信任的资政，据说，相较于战争，这位苏丹更喜欢喝酒。<sup>51</sup>葡萄酒为约瑟·纳西带来财富，却也加速了其靠山的倒台。虽然苏莱曼曾要求遵照伊斯兰律法，禁止在君士坦丁堡售卖葡萄酒，但约瑟·纳西还是获得了垄断权，可以从威尼斯人治下的克里特经由君士坦丁堡向摩尔达维亚 (Moldavia) 运送葡萄酒。这为奥斯曼政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税收，每年有两千杜卡特，当首都的葡萄酒禁令有所放松，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从事相关生意时，约瑟·纳西的收入进一步增长，而这种变化也意味着葡萄酒已经渗入整体经济 [它早已流入托普卡普宫 (Topkapı Palace)]。<sup>52</sup>古典时期曾以葡萄酒闻名的地方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的纳克索斯岛，这也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岛屿，因此，塞利姆即位后，就把约瑟封为纳克索斯公爵。1536年以前，这座岛屿一直处于威尼斯人的松散管理之下，但从这一年开始，土耳其人控制了这里，不过只要其拉丁公爵愿意缴纳贡赋，就可以继续留在纳克索斯；而纳克索斯的正教居民却向“高门”抱怨公爵的治理无方，于是塞利姆想到，任命一位犹太人做总督比天主教徒做总督也差不到哪里。事实上，纳克索斯人厌恶任何一个外来的政权，不过，纳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君士坦丁堡，他的生活奢靡浮华，对于自己获得的封号十分自豪。

---

① 纳西一词在中世纪犹太人群体中是身份的象征，指知识和权威受到认可的、从事经学研究的家族中的成员，或可理解为中世纪的先知。——译者注



约瑟还将目光投向爱琴海以外。他制订计划，鼓励犹太人到加利利的太巴列定居。<sup>53</sup>生活在萨法德附近的塞法迪犹太人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不过，他们仍然在努力发展纺织业，甚至印刷业；纳克索斯公爵觉得他们可以从丝绸上寻找商机，于是建议他们种植桑树。他还安排将西班牙的羊毛跨越地中海运到太巴列，希望模仿威尼斯纺织业的扩张，促进当地羊毛纺织业的发展。<sup>54</sup>教宗国推行新一轮的迫害政策，导致成百上千名犹太人前往东方更为宽容的奥斯曼辖区谋生，于是他设法吸引更多移民前来太巴列。在地中海的犹太人中间流传着一封信，信中圆润的笔迹写着：

445

我们从大地的一隅听闻那荣耀之歌，它献于正义的纳西（亲王），正是此前听闻过的那位大人，他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钱来，在包括威尼斯、安科纳在内的许多地方安排了船只，为我们提供帮助，结束我们这些被禁者的苦难。<sup>55</sup>

可是前往太巴列并不容易。一艘搭载移民的船被圣约翰骑士团捕获，船上的乘客沦为奴隶。犹太人希望通过向巴勒斯坦的古代圣城移民，加速弥赛亚的到来；无论是他们还是约瑟·纳西都没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或犹太人属地的明确概念。结果，太巴列的移民计划最终落空，因为这个地区仍然不安全；直到公元18世纪中期时，犹太定居者才陆续返回，并且长期居住于此。<sup>56</sup>

## 4

纳克索斯公爵能够对奥斯曼宫廷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公元1568年，他试图收回在法国的大笔财产和资金，因无果而被激怒，于是劝说塞利姆发布一道法令，没收法国商船上三分之一的货物，直到公爵的损失得到弥补。法令的目标是经由亚历山大从事黎凡特贸易的法国人，但它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破坏，埃及的税务官误认为它还适用于来自威尼斯与杜布罗夫尼克的商船。与此同时，法国宫廷非常震惊，将该法令看作对法国与土耳其之间长期盟约关系的侵害，这一切却源于一个人（而且还是个犹太人）宣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尽管法国国王与奥斯曼苏丹的关系逐渐得到修补，但约瑟·纳西的财产索赔始终没有被完全满足。<sup>57</sup>不过，1569年，当奥斯曼人计划入侵塞浦路斯时，苏丹打算再次听听他的建议。这一年的9月，一次大爆炸摧毁了存放在威尼斯军火库中的火药以及四艘帆

446 桨船，于是形形色色的谣言将这起确定无疑的偶发事故归咎于纳克索斯的犹太人的邪恶阴谋。当然，约瑟·纳西对威尼斯确实怀恨在心，它曾恶劣地对待他著名的姑妈，还想要控制他在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岛屿。据说，沉溺于杯中之物的醉鬼塞利姆二世曾向纳西承诺给他最大的奖赏——塞浦路斯王冠，因为奥斯曼人决定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这座岛屿，这个故事在添油加醋后成为传奇。据说他为大获全胜之日预定了一顶王冠，定制的旗子上印着“约瑟·纳西，塞浦路斯国王”的字样。威尼斯观察家们的说法更为准确，他们认为约瑟·纳西向当权者施压，要求夺取塞浦路斯，即使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索科鲁（Mehmet Sokollu）表示反对。<sup>58</sup>一般情况

下，土耳其人政策的制定需要时间，其间必然会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口水战。即便如此，攻打塞浦路斯的谣言在1566年1月就已传播开来，当时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负责处理本国公民事务的外交官员（*bailo*）在报告中称：（奥斯曼人）正在起草攻打塞浦路斯的计划；1568年9月，一支由六十四艘战舰组成的、以友好访问为名义的土耳其舰队对塞浦路斯的访问，使威尼斯人更加紧张。土耳其人无意识地考察了他们需要攻克的两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内陆的尼科西亚（Nicosia）与东海岸的法马古斯塔。到访的客人当中就有纳克斯公爵。<sup>59</sup>

塞浦路斯这样一个孤零零地坐落于东地中海遥远角落的基督徒领地，是理所当然的目标。不久前（即公元1566年），土耳其人才将热那亚人从其在爱琴海的最后据点——希俄斯岛——清除出去。基督徒拥有的这些飞地使得奥斯曼人无法专心处理其他问题，例如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冲突、肃清印度洋水域、将新来的对手葡萄牙的印度舰队驱逐出去等。塞浦路斯为掠夺谷物船的基督徒海盗提供了避难地，如今随着谷物产量的下降，对运送谷物前往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重镇的商路必须予以保护。另外，在经由这片水域前往阿拉伯半岛上各伊斯兰教圣城的朝圣之路上，不断有信徒在途中遭到基督徒侵扰，引得怨声载道。伊斯兰教中主战派的护教者辩称：早些时候，这座岛屿曾经被穆斯林占领并统治，或至少需要向他们交纳贡赋；伊斯兰教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一旦有可能就必须收回曾经属于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的土地。事实上，当威尼斯人对塞浦路斯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表示抗议时，索科鲁回应道：这个问题如今已交由大穆夫提（Grand Mufti）领

447 导的精通伊斯兰律法的专家们处理。而且，当有人提醒说过去数十年中土耳其人与威尼斯人关系一直友善之时，当局并不为之所动。<sup>60</sup>然而，如今“高门”释放出的是最后通牒，威尼斯如果想要避免战争，就需要交出塞浦路斯。

菲利普二世同奥斯曼人一样，态度十分坚定，不过与往常一样，他依然担忧该从哪里获得供养舰队的经费；他的军队正困于佛兰德，与当地的新教徒以及其他反抗西班牙国王的起义者作战。菲利普希望教宗可以筹集资金来资助这场战争。他自己能承担一半军费，威尼斯出四分之一。<sup>61</sup>随后是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争论的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还有指挥系统。在阿尔瓦（Alva）公爵终于成功地在低地国家确立了严酷的和平后，菲利普二世也就不再因此地而被牵扯精力了。<sup>62</sup>在西班牙，摩里斯科人中的许多人仍坚持其祖辈的信仰，而他们发动的起义耗尽了西班牙的资源，推迟了菲利普对呼吁建立神圣同盟的回应；他们也使得构建神圣同盟一事变得更为迫切，因为土耳其人在柏柏尔统治者以及摩里斯科人的支持下将对西班牙发动进攻的威胁，激起了人们对于伊斯兰军队将会重返西班牙的恐慌情绪。

所有这些摇摆不定的态度使得土耳其人能够自由地对塞浦路斯发动突袭。公元1570年7月初，土耳其人率大军来犯，这支军队约有10万人，由400艘战舰组成，其中包括160艘大帆桨船。<sup>63</sup>土耳其人决定：其首要目标是岛屿深处的尼科西亚，但威尼斯人已经开始修复、扩建防御工事，加固石墙。尼科西亚坚持了一段时间，但以石墙为掩护的毫无希望的战斗最终失败，土耳其士兵获得了令人唾弃的奖赏：他们可对城中居民随意烧杀抢掠。此间，西方各国仍然在争吵不休，而无视塞

浦路斯的局势。最后，在9月中旬，一支最多不超过200艘战舰的舰队出发前往塞浦路斯，在其向东航行途中，听到了尼科西亚陷落的消息；由于不确定接下来的行动，菲利普的将军吉安·安德里亚·多利亚与教廷派来的指挥官马尔坎托尼奥·科隆纳（Marcantonio Colonna）产生了新的分歧。他们没有对尼科西亚的土耳其人发动任何攻势，这非常明智，因为多利亚的看法很正确：在没有大量陆军和庞大海军的前提下，夺取一座内陆城市没有丝毫希望。马耳他的围攻战发生在一座小岛的外围，而塞浦路斯则完全不同。<sup>64</sup>唯一的希望在于尚未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法马古斯塔，因为这里拥有坚固的城防体系，而且理论上能够从海上获得补给。1571年冬季似乎出现了一个机会，当时土耳其舰队从法马古斯塔海域大规模撤离；一支威尼斯人的先遣队冲破土耳其人的薄弱防线，但只留下1316名士兵，因而法马古斯塔的防守人员总共有8100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索科鲁认为这是与威尼斯人和谈的最佳时机，当然条件是他们必须放弃法马古斯塔。<sup>65</sup>他怀疑威尼斯人是否有意愿或者有办法继续战斗。然而，威尼斯人却斗志高昂——此前，威尼斯人成功地夺回了在16世纪初失去的都拉斯，这个地方对于威尼斯人的战略重要性恰恰相当于塞浦路斯之于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提出的条件是：威尼斯人放弃塞浦路斯，但可把法马古斯塔作为商站，不过，威尼斯人拒绝了这项提议。无论如何，有一项谈判正在达成。神圣同盟建立起来，这是一支野心勃勃的十字军，由教宗、威尼斯与西班牙组成，它还为菲利普赢得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协议，即北非战争将作为神圣同盟的永恒目标。<sup>66</sup>神圣同盟的指挥官将由查理五世那年轻且精力旺盛的私生子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 担任。

当法马古斯塔在坚守之时，神圣同盟需要的大型舰队还在建造之中。土耳其人经由刚刚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的克里特岛派遣舰队进入爱奥尼亚海与亚得里亚海南部，迫使威尼斯海军的关注点从遥远的塞浦路斯转到眼前。如今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沿海堡垒包括乌尔齐尼 (Ulcinj)，位于今天黑山与阿尔巴尼亚边界线的北部。土耳其人的战舰还向北骚扰科尔丘拉岛 (Korčula) 与杜布罗夫尼克 (不过拉古萨人成功地保持了中立，赢得了双方对它的敬意)。<sup>67</sup>后来，土耳其人驻扎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扎达尔，对威尼斯本土造成巨大威胁，因为两地距离非常近，让人想起了一百八十年前的基奥贾战役。不过，土耳其人的目的是威慑而非摧毁威尼斯——他们要使威尼斯人相信：自己的帝国非常脆弱，抵挡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是徒劳的。此外，经过数个月的炮击，满目疮痍的法马古斯塔打算投降。8月初，威尼斯指挥官布拉加丁 (Bragadin) 亲自来到土耳其指挥官拉拉·穆斯塔法 (Lala Mustafa) 的营帐。当穆斯塔法听说威尼斯人囚禁的五十名穆斯林朝圣者已被处死后，他感到非常失望。拉拉·穆斯塔法的不悦很快变为愤怒。布拉加丁的  
449 随从被当场处死，布拉加丁本人也饱受折磨；十天后，他被活活剥皮，土耳其人在其皮囊中填充别的东西，在塞浦路斯各地示众，然后送回君士坦丁堡。<sup>68</sup>这是在警告威尼斯，同时也向奥斯曼宫廷，特别是向穆罕默德·索科鲁传递信息：拉拉·穆斯塔法用这恶劣的行为瓦解了任何仍有可能与威尼斯和解的想法。<sup>69</sup>其实并不需要这种粗暴的手段：神圣同盟的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在科孚附近的海域，基督徒海军得知法马古斯塔已经陷落。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一消息坚定了他们的

决心。<sup>70</sup>

随后，在科林斯湾入口处发生的勒班陀大海战，一直被看作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之一。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研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时，认为这场战役是“整个公元16世纪地中海最壮观的军事行动”。布罗代尔还简洁却又有些神秘地宣称：“毫无疑问，在这里，唐·胡安就是命运的工具。”与西西里海峡发生的那场包围战相比，这场亚得里亚海入口处的战斗意义不同。在战斗爆发之前的数月，土耳其人认为他们即将赢得亚得里亚海，海上攻击与来自土耳其治下波斯尼亚的陆地攻击一起，对准了亚得里亚海尽头的威尼斯人的领地。这些攻击不仅仅是为打造帝国，或扩张伊斯兰教的统治。以后，人们会逐渐清楚，刺激土耳其人的因素还在于达尔马提亚北部的斯拉夫基督徒海盗和山匪，也就是打着十字军旗号的乌斯科克人。

两大对抗势力之间的平衡相当微妙。双方舰船上的士兵人数大体相当：大约有3万之众，不过土耳其海军的经验可能更为丰富。<sup>71</sup>土耳其人的战舰比基督徒的战舰多一些：基督徒一方只有200艘战船，土耳其人大约有300艘，奥斯曼的海军将领穆阿津札德·阿里（Müezzinzade Ali）将战舰排成新月形，以形成对基督徒舰队的包围，而他坐镇的中路则试图将基督徒舰队分割，一块一块地予以歼灭。<sup>72</sup>不过，西方的战舰在建造时更注意其耐用性，而奥斯曼人的战舰则是用“绿色”木材建成，属于一次性产品——使用两个季度就要更换。奥斯曼舰队主要包括轻型帆浆船，吃水较浅，这样虽然使其更易受损，却使其能够在近海浅水区航行，因而他们可借此优势对基督徒的重型船只进行迂回包抄；威尼斯人也喜欢采用

轻型的帆桨船。<sup>73</sup>基督徒海军拥有的火炮数量是土耳其军队的两倍，但土耳其人的弓箭手更多；枪支的杀伤力较大，但装弹耗时太久，而弓箭手却可眨眼间更换箭支。<sup>74</sup>双方都使用了火绳枪，这是一种手持的枪支，精准度不是很高，但加装弹药相对较快，在中世纪末期已经取代了致命的十字弩。<sup>75</sup>西班牙人的旗舰“皇家号”（*Real*）上配备着400名来自撒丁岛的火绳枪手；而奥斯曼人的旗舰“苏丹娜号”上配备的枪手数量只有对手的一半。<sup>76</sup>除此之外，由于库佐拉里斯群岛（*Kurzolaris*）距离伊萨卡岛东岸非常近，狭窄的海峡限制了基督徒帆桨船的快速行动。<sup>77</sup>

基于以上种种条件，就不奇怪这次海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恐怖的伤亡。神圣同盟海军确信：与土耳其人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在土耳其人的炮火下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英勇行为导致了大量伤亡。威尼斯人的指挥官阿戈斯提诺·柏柏尔里格（*Agostino Barbarigo*）完全无视自己舰只的安全，驾驶着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旗舰冲向奥斯曼人的帆桨船，以拦截对方船只前行。威尼斯的船长们一个接一个地战死——他们都来自威尼斯的显贵家族，如奎里尼家族（*Querini*）和康达利尼家族（*Contarini*）。柏柏尔里格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却愚蠢地摘下了头盔，一阵箭雨射向了他的战舰，他的眼睛被击中，很快倒下死去。但教宗与那不勒斯的帆桨船紧随威尼斯分遣舰队之后，一点一点地逼退土耳其人。<sup>78</sup>威尼斯加莱塞战舰<sup>①</sup>的船首发射出的猛烈炮火把土耳其人的战舰炸得粉碎，被束缚在桨位

---

① *Galleasses*，是一种比单桅帆桨船（*galley*）更大、更高、更重的帆桨船。——译者注



上的奴隶也随着船只的碎片沉入海底。持续不断的炮火浓烟压制住了土耳其人的弓箭手。这场屠杀是无情的、丑陋而狂热的。<sup>79</sup>最后，基督徒的水兵登上穆阿津札德·阿里的旗舰，阿里英勇战死；他的首级被挑于矛尖高高地举起，极大地鼓舞了基督徒的斗志。<sup>80</sup>战斗没有就此终结，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舰也加入战斗。但随着夜幕的降临，神圣同盟的舰队撤离了被血染红的水域，寻找掩蔽处以躲避即将到来的风暴。次日凌晨，阵亡人数以及被毁战船的数量完全说明了战争的结果，神圣同盟赢得了一场大胜，而且土耳其人的阵亡人数难以计数。土耳其人约有 2.5 万，甚至 3.5 万人阵亡，不仅包括船上的奴隶，还有船长、指挥官，而基督徒一方的损失相对较小，不过也相当惨重：8000 人阵亡，大量人员受伤（伤员中有 4000 多人很快身亡）；伤亡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威尼斯人，这些技术人才的损失对于威尼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然而，至少有 1.2 万名被迫在土耳其帆桨船上劳作的基督徒奴隶重获自由。<sup>81</sup>

451

胜利的消息传回威尼斯，尽管伤亡惨重，但丢失塞浦路斯后的绝望情绪还是得到了缓和。当一艘船带着败军的旗帜从勒班陀回来后，胜利也回到威尼斯人中间；威尼斯、罗马以及整个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在欢庆胜利，庆祝的方式不仅仅是篝火与祭典，更加持久的方式是威尼斯总督宫殿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中的大型壁画和油画。<sup>82</sup>然而，这场胜利从战略意义上讲只是使双方陷入僵持，因为在此后的数年间，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人力、木料以及补给来筹建同等规模的舰队，或至少不敢冒险投入如此大规模的海战。<sup>83</sup>奥地利的唐·胡安在胜利的刺激下，想要直接攻打君士坦丁堡，但菲利普二世秉持着

其特有的谨慎，认为最好让幸存下来的帆桨船在意大利过冬。<sup>84</sup>的确如此，正如布罗代尔认为的那样，勒班陀的胜利使得意大利与西西里免于遭受进一步的袭击，而马耳他包围战已经确保了基督徒对西西里水域的控制。在公元1571年10月7日之前的数年以及数个星期中，地中海的政治版图就已划定。法马古斯塔已经陷落，威尼斯人再没有希望去收复塞浦路斯；马耳他仍巍然挺立，土耳其人要想攻打这座骑士团的堡垒，仍需深思熟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1574年回到了这片海域，以巩固其对突尼斯的控制。布罗代尔认为，重要的是“土耳其霸权的魔咒被打碎了”。<sup>85</sup>勒班陀战役将业已形成的双方位置固定下来：如今的地中海被两支海上力量分割，土耳其人占据东部——除了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外——掌控着所有主要的海岸与岛屿；西班牙人在马耳他以及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下控制着西部。

## 注 释

1. F.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 Reynolds, 2 vols. (London, 1972-3), vol. 2, pp. 919-20.
2. J.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 (2nd edn, London, 2003), p. 143.
3.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2, pp. 973-87.
4.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137-47.
5. E. Bradford, *The Great Siege: Malta 1565*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64), p. 14.
6. A. Cassola, 'The Great Siege of Malta (1565) and the Istanbul State Archives', in A. Cassola, I. Bostan and T. Scheben, *The 1565 Ottoman /Malta Campaign Register* (Malta, 1998), p. 19.
7.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2, pp. 1014-17.

8. R.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the Final Battle for the Mediterranean 1521–1580* (London, 2008), p. 114.
9. F. Balbi di Correggio, *The Siege of Malta 1565*, trans. E. Bradford (London, 1965), pp. 51–3.
10. *Ibid.*, pp. 55, 61–4.
11. *Ibid.*, p. 91.
12.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2, p. 1018;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p. 155–6, 165–6.
13. Balbi, *Siege of Malta*, pp. 145–7, 149–50;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p. 176–7.
14. Balbi, *Siege of Malta*, p. 182.
15. *Ibid.*, p. 187.
16.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2, p. 1020.
17. D. Hurtado de Mendoza, *The War in Granada*, trans. M. Shuttleworth (London, 1982), p. 58.
18. R. Cavaliero, *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 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 London, 2009), p. 23.
19. J. Abela, 'Port Activities in Sixteenth-century Malta'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ta), pp. 151–2, 155.
20. *Ibid.*, pp. 161, 163.
21. G. Wettinger, *Slavery in the Islands of Malta and Gozo* (Malta, 2002).
22. Abela, 'Port Activities', pp. 104, 114, 122, 139–42.
23. P. Earle,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Ancona, 1479–1551',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ol. 22 (1969), pp. 28–44.
24. E. Ashtor, 'Il commercio levantino di Ancona nel basso medioev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88 (1976), pp. 213–53.
25. R. Harris, *Dubrovnik: a History* (London, 2003), p. 162.
26. F.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 MD, 2008), p. 127.
27. Earl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Ancona', pp. 35–7; M. Aymard, *Venise, Raguse et le commerce du blé pendant la second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1966).
28. Earl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Ancona', p. 40.
29. V. Kostić, *Dubrovnik i Engleska 1300–1650* (Belgrade, 1975).
30. Harris, *Dubrovnik*, pp. 163–4; F. Carter, 'The commerce of the Dubrovnik Republic, 1500–17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vol. 24 (1971), p. 390.
31. V. Miović, *The Jewish Ghetto in the Dubrovnik Republic (1546–1808)* (Zagreb and Dubrovnik, 2005).
32. Harris, *Dubrovnik*, pp. 252–60, 271–84.
33. Carter, 'Commerce of the Dubrovnik Republic', pp. 369–94; repr. in his unsatisfactory *Dubrovnik (Ragusa): a Classic City-state* (London, 1972), pp. 349–404; Harris, *Dubrovnik*, p. 160.
34. Carter, 'Commerce of the Dubrovnik Republic', pp. 386–7.

35. Harris, *Dubrovnik*, p. 270.
36.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1, pp. 284–90.
37. *Ibid.*, p. 285.
38. Harris, *Dubrovnik*, p. 172.
39.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1, pp. 286–7; A.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1580–1615* (London, 1967), pp. 3–15.
40. Tabak,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pp. 173–85.
41. E.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 1934).
42. J. Amelang, *Honored Citizens of Barcelona: Patrician Culture and Class Relations, 1490–1714* (Princeton, NJ, 1986), pp. 13–14; A. García Espuche, *Un siglo decisivo: Barcelona y Cataluña 1550–1640* (Madrid, 1998), generally, and pp. 62–8 for French settlers.
43. A. Musi, *I mercanti genovesi nel Regno di Napoli* (Naples, 1996); G. Brancaccio, 'Nazione genovese': *consoli e colonia nella Napoli moderna* (Naples, 2001), pp. 43–74.
44. R. Carande, *Carlos V y sus banqueros*, 3 vols. (4th edn, Barcelona, 1990); R. Canosa, *Banchieri genovesi e sovrani spagnoli tra Cinquecento e Seicento* (Rome, 1998);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1, pp. 500–504.
45. C. Roth, *Doña Gracia of the House of Nasi* (Philadelphia, PA, 1948), pp. 21–49.
46. M. Lazar (ed.), *The Ladino Bible of Ferrara* (Culver City, CA, 1992); Roth, *Doña Gracia*, pp. 73–4.
47. Miović, *Jewish Ghetto*, p. 27.
48. Roth, *Doña Gracia*, pp. 138–46, 150–51.
49. *Ibid.*, pp. 154–8.
50. D. Studnicki-Gizbert, *A Nation upon the Ocean Sea: Portugal's Atlantic Diaspora and the Crisis of the Spanish Empire 1492–1640* (Oxford and New York, 2007).
51. C. Roth, *The House of Nasi: 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 PA, 1948), pp. 39–40.
52. *Ibid.*, pp. 46–7.
53. *Ibid.*, pp. 75–137.
54. J. ha-Cohen, *The Vale of Tears*, cited *ibid.*, p. 137.
55. Roth, *Duke of Naxos*, p. 128.
56.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aim Abulafia: J. Barnai, *The Jews of Palest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Committee of Officials for Palestine* (Tuscaloosa, AL, 1992), pp. 152–3.
57. Roth, *Duke of Naxos*, pp. 62–74.
58. *Ibid.*, pp. 138–42; N.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Lepanto* (London, 2006), p. 127.
59.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119–23.
60. *Ibid.*, pp. 121, 124–5.

61. Ibid., pp. 128–30.
62.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2, p. 1105.
63.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 137; A. Gazioglu, *The Turks in Cyprus: 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 (London and Nicosia, 1990), pp. 28–35.
64.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150–54; Gazioglu, *Turks in Cyprus*, pp. 36–48.
65.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160–61.
66. Ibid., p. 170.
67. Ibid., pp. 229–31.
68. H. Bicheno, *Crescent and Cross: the Battle of Lepanto 1571* (London, 2003), p. 208; Gazioglu, *Turks in Cyprus*, pp. 61–6.
69.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233–6.
70.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 252.
71.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263–4; Bicheno, *Crescent and Cross*, pp. 300–308.
72.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259–60; Bicheno, *Crescent and Cross*, pp. 252, 260 (部署计划和开始阶段).
73.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253, 255, 257.
74.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 272.
75.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158–60.
76.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 279.
77.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 256.
78. Ibid., pp. 268–71; Bicheno, *Crescent and Cross*, p. 263.
79. Crowley, *Empires of the Sea*, pp. 284–5.
80.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 279.
81. Bicheno, *Crescent and Cross*, pp. 319–21; Capponi, *Victory of the West*, pp. 289–91.
82. Bicheno, *Crescent and Cross*, plates 6a, 6b, 7.
83. Guilmartin, *Gunpowder and Galleys*, pp. 247–8.
84. Braudel, *Mediterranean*, vol. 2, p. 1103.
85. Ibid., pp. 1088–9.

## 五 地中海的闯入者 (1571 ~ 165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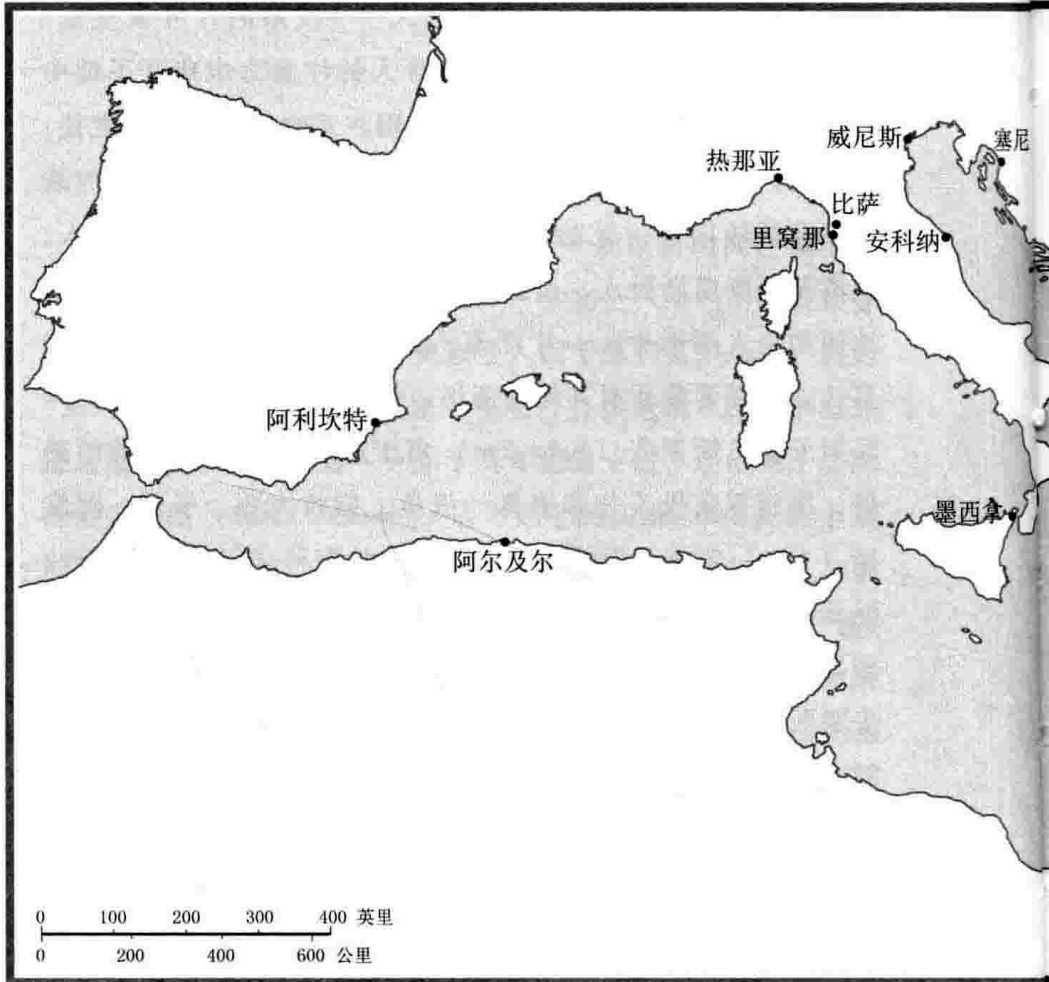
### 1

452

在从勒班陀战役结束到 17 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地中海相对统一。柏柏尔海盗并未离去——事实上，他们的海盗劫掠更加严重，在某种意义上，奥斯曼人赋予他们更多自由，因为“高门”已经不再期望对西地中海实行直接统治。<sup>1</sup>西地中海还遭遇基督徒海盗的劫掠——除了马耳他骑士团，还出现了圣斯德望骑士团（Santo Stefano），后者是公元 1562 年由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公爵创建，由托斯卡纳的海盗以及圣战士组成。与威尼斯人一样，他们也从勒班陀胜利地带回了奥斯曼人的军旗；他们还极不协调地将它挂在比萨的教堂顶部，每日在天主教祭祀的烟熏当中昭显伊斯兰教的信仰。此处没有必要重复描述基督徒的马耳他骑士团以及圣斯德望骑士团为赚取功名而对柏柏尔海盗进行的没完没了的攻击与报复；最不幸的牺牲者是那些因在被捕获的商船上，或因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海岸上（相对而言，法国人不是穆斯林袭击者的对象，因为他们与奥斯曼宫廷关系较好）被捕，而沦为奴隶的人们。从西西里开出的帆桨船继续海上巡航，以保证西班牙国王的意大利领地不受海上袭击者的侵扰，但发生大规模帆桨船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式的舰船更注重效率，还因为建造和维持帆桨船的费用过高。即便如此，奥斯曼人在勒班陀战役后

仍立即重整了舰队。西方也警钟长鸣：他们确信奥斯曼人会以基督教为目标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袭击。 453

然而，“高门”已经对海战失去了兴趣，他们不再理会西班牙人，而是去关注其传统敌人——波斯的什叶派皇帝。这是极合时宜的，因为如今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也离开了地中海；菲利普二世的野心是要击败盘踞在北欧的新兴的异教徒：新教徒。菲利普陷于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战争以及低地国家臣民的起义当中。他不仅告别了奥斯曼人，还离开了摩里斯科人，过去生活着摩里斯科人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如今人烟稀少、一片荒芜。<sup>2</sup>此外，他还获得一个意外之喜，这就是葡萄牙及其海外帝国。公元1578年，葡萄牙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Sabastian）出于基督教十字军运动的热情，率领军队投入与摩洛哥的战争，招致大败。于是，阿维斯（Aviz）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枢机主教亨利（Cardinal Henry）继承了王位，但1580年他无嗣去世后，葡萄牙王位被传给西班牙的菲利普，菲利普并没有积极延续葡萄牙人的古老梦想去驯服摩洛哥。<sup>3</sup>在菲利普统治的包括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庞大领土中，地中海看上去相当小。1589年，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论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该书后来在西班牙极受欢迎。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其领地分散于许多地方，那么它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但西班牙人凭借灵活地使用其舰队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弊病。在西班牙帝国，“没有任何领地在舰队的援助范围之外”，这使得加泰罗尼亚、巴斯克以及葡萄牙的水手们能够将伊比利亚半岛、国王菲利普的意大利领地，甚至低地国家都纳入一个统一实体当中：“这个本来看上去分散的、



热那亚

威尼斯

塞尼

比萨

安科纳

里窝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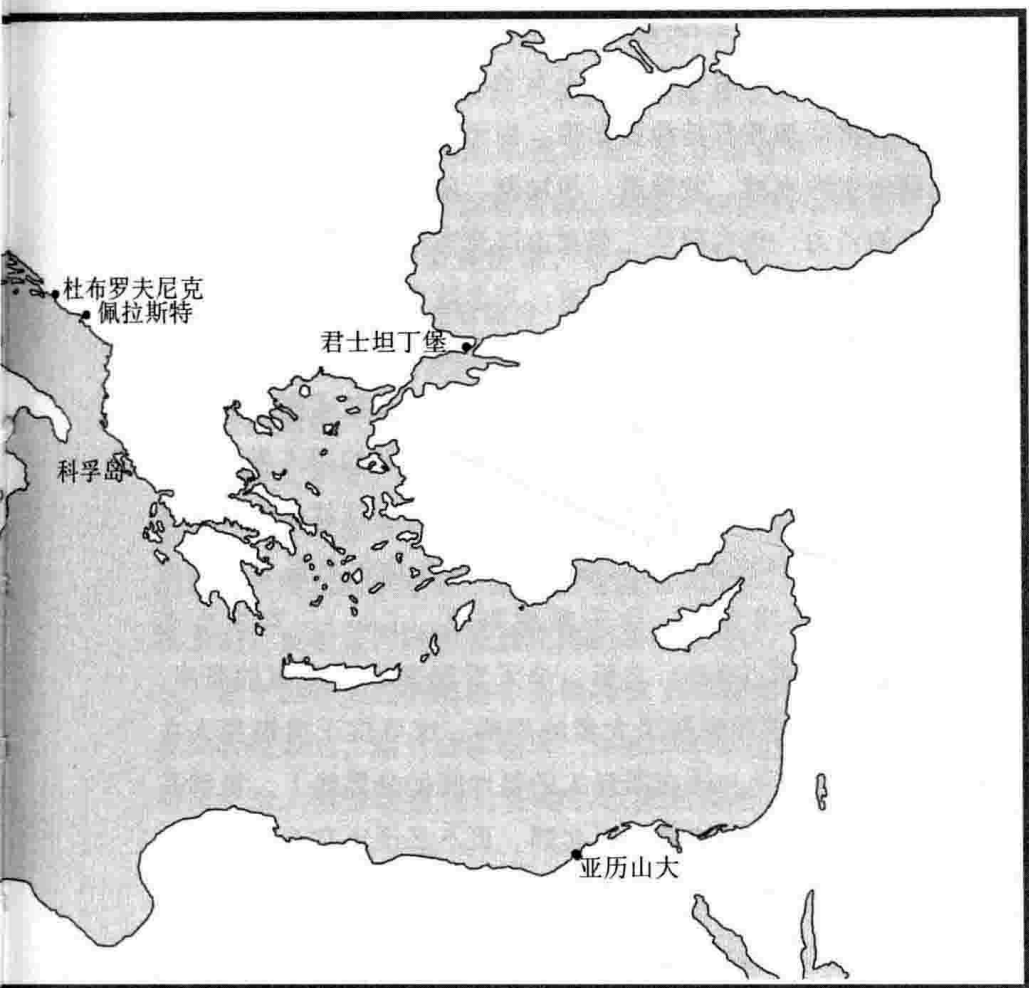
阿利坎特

阿尔及尔

墨西拿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0 200 400 600 公里





缺乏灵活性的帝国，因有了为这些人掌控的海军力量，反而是统一而紧凑的。”<sup>4</sup>

地中海的平静源于奥斯曼人与西班牙人的心照不宣。但由于西班牙人的巡航仅限于保护南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海岸，跨越地中海的航行变得极不安全。犹太商人和穆斯林商人的货物经常会被基督徒海盗劫掠。由于新的极具破坏力的水手也来到地中海水域，危险进一步加剧。随着大西洋经济开始进  
454 发出新的活力，来自荷兰、德意志以及英格兰的水手深入地中海，从事商贸活动，也进行劫掠；当北欧商人在地中海以及大西洋的谷物和香料贸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后，两大海洋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开始逐渐发展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后文还会谈及这些外来者；还有一些来自地中海内部的闯入者，对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是来自塞尼（Senj）的乌斯科克人，他们的基地隐藏在达尔马提亚北部的小岛屿和小海湾之间，位于茨雷斯岛（Cres）、克尔克岛（Krk）和拉布岛（Rab）之后。今天看起来那么美丽的海岸，在公元16世纪末却制造了大量的恐怖。这里位于奥斯曼人在  
455 巴尔干半岛的领地与哈布斯堡人的领地间的分界线上，也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北部，更不必说还有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领地。这样的地方为任性妄为、特立独行的山匪与海盗的泛滥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他们把自己打造成对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旗手，为捍卫基督教世界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的利益而战。<sup>5</sup>

在克罗地亚的民族史诗中，乌斯科克人成为罗宾汉（Robin Hood）式的人物，他们虽然人数很少，所乘坐的也是小型舰船，但仍然成功地将威尼斯挤到亚得里亚海的小角落里。这使其成

为现代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学家们尊奉的英雄。<sup>6</sup>但不能把乌斯科克人想象得过于浪漫。他们有自己的贵族领袖，与地中海海滨地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海盗以及强盗没有明显不同。“乌斯科克”的本意为“难民”，他们与柏柏尔海盗一样，成员的族属多种多样，来自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殖民地、杜布罗夫尼克和阿尔巴尼亚，此外还有意大利的水手，偶尔还会有改变信仰的前穆斯林。有些人出生时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有些是奥斯曼臣民，有些是威尼斯臣民；他们的背景随着时间变换也发生着改变，因此在公元16世纪90年代，有相当比例的成员来自扎达尔与斯普利特后方的达尔马提亚腹地，那里在奥斯曼人与哈布斯堡人漫长的陆地冲突中承受着重压。<sup>7</sup>在威尼斯人看来，乌斯科克人“此前是土耳其人的臣民，因无法忍受土耳其老爷们的暴政，而逃到塞尼”。<sup>8</sup>塞尼似乎也为他们准备了成功的机会：“原本扛着锄头和犁，衣着褴褛的赤脚汉子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肥胖而富有。”<sup>9</sup>

456

塞尼没有天然的海港。当被称为“布拉风”（*bora*）的强季风吹过来时，船只必须靠岸，并被牢牢地拴在堤岸上，以免被风吹走。但城市被背后陡峭的山脉和茂密的森林保护着。<sup>10</sup>其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是勒班陀战役结束到公元1610年之间，此时，乌斯科克人的警戒范围比较大，以塞尼为中心，向南直达内莱特瓦河（*Neretva*）的入海口，那里距离杜布罗夫尼克已经不远。<sup>11</sup>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匪徒。即使奥地利当局与其对手处于和平期，只要有机会，这群匪徒仍会对威尼斯或土耳其的船只发起攻击。<sup>12</sup>在16世纪90年代，威尼斯人不再把乌斯科克人视为逃离奥斯曼人的基督徒难民，而是视为危险的罪犯，他们对塞尼进行封锁，并把许多人处死（不过1596年时，

塞尼武装人员的总数也只有 1000 人，平常约有 600 人）。<sup>13</sup> 威尼斯人容忍他们的唯一条件是：他们同意放弃罪恶的掠夺行为，并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帆桨船上尽职尽责地服务。<sup>14</sup>

早在公元 16 世纪 20 年代，来自塞尼的海盗就开始威胁亚得里亚海的土耳其商船。威尼斯商船也是现成的劫掠对象，因为他们总想着与土耳其人缔结协约，也因为威尼斯人与哈布斯堡人在斯洛文尼亚边境地区偶尔会爆发冲突。早些年，乌斯科克人只满足于向当地小货船掠夺鱼、酒、橄榄油和奶酪，但很快他们就升级为对前往杜布罗夫尼克和安科纳的大型圆形商船发动袭击，威胁到从托斯卡纳到君士坦丁堡的海路与陆路交通。<sup>15</sup> 1599 年，威尼斯人被乌斯科克人激怒，派出一艘装载着有毒葡萄酒的船前往乌斯科克人大批出没的水域，主动让乌斯科克人捕获，希望乌斯科克人喝了这种酒后全部暴亡。然而，乌斯科克人后来全都活着，因此这条计策显然失败了。乌斯科克人与杜布罗夫尼克的关系也令人担忧。拉古萨人被视为暗中勾结土耳其人的叛徒，拉古萨的长老们也知道土耳其人不会允许杜布罗夫尼克与乌斯科克人合作。有一次，拉古萨人将被处决的乌斯科克人的首级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向乌斯科克人以及奥斯曼人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结果也不出所料：一份拉古萨的报告称，“他们对我们的袭击与对土耳其人一样”。<sup>16</sup>

尽管如此，一般说来，他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货船，而不是基督徒，他们更愿意登上那些船没收“异教徒的”货物；结果，犹太商人签署保险合同索赔的比例是基督徒商人的七倍。穆斯林的处境也很糟糕：有一位来自科托尔海湾的繁荣港口佩拉斯特（Perast）的船长，当公元 1581 年乌斯科克人登上他的船时，他对船上的穆斯林乘客承诺说，他

会照看他们，但他将船驶往塞尼，设宴款待乌斯科克人，而乘客们则作为奴隶被带走。<sup>17</sup>在意大利附近海域经商的犹太商人和穆斯林商人尝试了各种计谋。比较明显的是在货物上标注十字架的标记；另一种计谋是同时携带一份秘密账册以及一份伪造的账册。与此同时，塞尼主教还积极地确认那些与土耳其人合作的基督徒商人，特别是从事武器买卖的商人，然后将他们逐出教会——或者换一种方式，如果塞尼的圣战士劫掠他们的货物，他们不能做任何抵抗。

## 2

这些发展证实了威尼斯政治经济生活从公元 15 世纪中叶起就已显现出的大趋势：退出重要的黎凡特贸易，融入北意大利的政治经济生活。除了海盗影响之外，威尼斯人还需要处理葡萄牙人于 1497 年开辟的前往东方的新路线所带来的影响。即便与中世纪贸易最盛期相比，威尼斯人到君士坦丁堡的数量已经大幅衰减，但那里依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威尼斯社区，到 1560 年已经建立起 12 间商人会所。<sup>18</sup>除了传统上控制威尼斯黎凡特贸易的商业贵族，其他商人也非常活跃，比较突出的是 16 世纪时生活在威尼斯的犹太人。这个社区的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来自德国、意大利的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他们从市政厅获得经营执照，并被要求居住在隐藏于城市北部的“新隔都”（Ghetto Nuovo）。紧邻他们的是更多涉足地中海商业活动，特别是经由巴尔干半岛前往萨洛尼卡与君士坦丁堡从事陆路贸易的塞法迪犹太人，与安科纳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黎凡特人”；另一类是“博宁提尼人”（Pontines），即西方犹太人，主要是葡萄牙裔的马拉诺，

他们往往过着基督徒的生活，至少表面上如此。博宁提尼人面临着被威尼斯宗教裁判所调查的威胁，但总的说来，威尼斯更需要从事黎凡特贸易的商人，而非推行基督教正统信仰的顾虑。<sup>19</sup>威尼斯人的务实主义还体现在其政权机构正打算批准兴建一座希腊正教教堂——希腊圣乔治堂（San Giorgio dei Greci）一事上，因为这个时期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希腊教堂都属于东仪天主教会（Uniate），也就是说，他们承认教宗的权威。<sup>20</sup>

“威尼斯的衰落”极易被简单地视同威尼斯海上霸权的衰落。<sup>21</sup>事实上，在公元16世纪中期，威尼斯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这时，恰逢西欧大陆经济扩张时期，威尼斯人义无反顾地参与了这个进程。传统工业，比如玻璃制造业正在扩张，纺织品的生产规模也大幅膨胀。1516年，威尼斯每年生产的布匹不足两千匹，而到1565年，产量已经增长了十倍多。<sup>22</sup>威尼斯城的发展受益于佛罗伦萨的同类纺织品生产的衰落，也受益于西班牙原毛的正常稳定供应。这使得威尼斯更加重视通往西部的商路，货物可经伦巴第由陆路抵达，也可经由海路到达，不过威尼斯城仍然需要进口谷物、橄榄油和葡萄酒，这些均来自他们辖下的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克里特。塞浦路斯失陷之后，  
459 威尼斯人航行的范围有所收缩，但他们与奥斯曼人重新缔结的和约，确保了当时克里特仍安全地处于威尼斯人的统治之下——此地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土耳其人，而是来自难以驾驭的当地民众。

威尼斯的转型（这种表述比“衰落”更为贴切）使得其他人能够更加自由地涉足黎凡特贸易。威尼斯人撤离后，填补空白的是希腊人商业活动的复苏，他们在爱琴海、小亚细亚与埃及为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动提供服务。<sup>23</sup>另外，英格兰人的

到来是西班牙国王与英格兰女王、天主教君主与新教反对派之间激烈竞争的副产品。伊丽莎白有意与“高门”建立联系，部分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土耳其人”是菲利普二世的手——但也有商业上的考虑。公元1578年，女王的大臣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撰写了一篇短论，主题是“关于与土耳其的贸易”，他认为应该派一名“精明的人”去秘密会见奥斯曼苏丹，呈上女王伊丽莎白的亲笔信。1580年，英格兰成立了一家土耳其公司，以推动与奥斯曼人治下地区的贸易。<sup>24</sup>然而，这也反映出英格兰商人的新的进取精神，他们要进入传统上由意大利商人主导的区域，意大利商人过去一直为英格兰供应异国商品。女王提高了对意大利商船及其货物征收的关税，以此鼓励本土商人参与地中海贸易。不过，她依然在1582年续订了与威尼斯的协议，直到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威尼斯的大帆船（galleons）仍然在继续抵达英格兰。<sup>25</sup>英格兰人的目标之一是摩洛哥，早在1558年伊丽莎白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英格兰柏柏尔人公司（Barbary Company）的商人们就已经出现在这里。出口这一地区的商品还包括武器，英格兰商人很乐意想象这些武器可以用来对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sup>26</sup>

这并没有阻止英格兰人试图完全绕开地中海开发其他商路，经过西北或东北的商路，将香料运到北欧，这些路线可能比较寒冷，但比葡萄牙人绕经非洲的商路近得多；结果，英格兰人开始与俄国进行交易。但由于这里的贸易无法为其提供想要的香料，他们再次回到地中海，将商业活动与海盗劫掠结合起来，也因为此，伊丽莎白的私掠船才闻名于世；许多加入土耳其公司（很快就被称为黎凡特公司）的人也投资俄国公司

(Muscovy Company)。<sup>27</sup>对于这些发展，威尼斯人的心情很低落。英格兰的商船进入土耳其水域后，使得威尼斯人无法再获取原本经威尼斯销往奥斯曼帝国各地的英格兰纺织品的收入。更糟糕的消息是，英格兰女王与奥斯曼苏丹签署了协议。另外，威尼斯人也不赞成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威尼斯当然不能算是最衷心的教宗权力支持者，在公元1603年伊丽莎白去世之前，一直不愿意正式向英格兰派驻使节。<sup>28</sup>不过，一些新的变化也使威尼斯共和国能够从中获利。英格兰的商船开始出现在威尼斯，于是威尼斯也开始进口一些北方的基本产品，并对其越来越依赖，它们（尤其是谷物）甚至关系到该城的生死存亡：由于地中海谷物产区变得荒芜，且1587年初发生的饥荒进一步扩大了谷物的需求缺口，北方谷物的贸易总量不断增长。来自大西洋的干鱼和咸鱼也很受欢迎——从那之后，鳕鱼干（*stoccafisso*）就成为威尼斯菜系中的基本食材，现在依然如此。

英格兰人与荷兰人也前来做买卖。<sup>29</sup>起初，英格兰人关注的焦点不是以胡椒、姜为主的香料贸易，而是威尼斯人治下诸岛屿——爱奥尼亚群岛的赞特岛（Zante）与凯法利尼亚岛——的产品。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英格兰人开始痴迷于无籽葡萄干、紫葡萄干、无核小葡萄干，因此与威尼斯人展开竞争，争夺被后者称为“干葡萄”（*uva passa*）的市场，致使许多恶性事件发生。英格兰商人极为成功地闯入爱奥尼亚群岛，很快夺取了大半的葡萄干贸易。威尼斯政府试图禁止岛民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易，对这些禁令，岛上居民的抱怨连连，但大多数时候置之不理。<sup>30</sup>

与此同时，英格兰人对于攻击威尼斯商船却毫无愧疚，尤



其是当威尼斯人打算与西班牙做生意时——他们的织布机需要西班牙产的羊毛。公元1589年10月，一位英格兰船长在科孚港与一位威尼斯船长发生争吵；意大利人向英格兰人发起挑战，还称其为傲慢的狗。当威尼斯商船驶离港口时，英格兰船长却狂妄地追了出去。短暂的交火过后，意大利人觉得他已经受够了并弃船离开，但即便如此，那位英格兰船长还是追着重意大利人乘坐的大艇一直回到科孚港。这些海盗完全目中无人。1591年，阿尔及尔港曾经欢迎的英格兰海盗，在巴利阿里群岛与巴塞罗那之间的海峡劫掠了一艘从里窝那向西行驶的拉古萨商船。北非的统治者往往乐于让海盗们使用他们的港口，只要他们与柏柏尔统治者分享战利品。他们船上的水手可能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英格兰人。<sup>31</sup>一位叫作约翰·沃德（John Ward）的被流放的英格兰人手下有三百人；1607年，他迫使一艘威尼斯香料大帆船的船长投降，在突尼斯将船上的货物卖掉后得到七万克朗，仅以这种方式，他所攫取的货物总价就高达四十万克朗。<sup>32</sup>新教徒落入宗教裁判所之手后所遭受的虐待，彻底激怒了英格兰海盗，所以他们还褻渎了各个岛屿上威尼斯人的天主教堂。<sup>33</sup>

461

海盗们的成功归功于新的技术。他们带入地中海的是一种高舷帆船，威尼斯人称之为“贝尔托尼”（bertoni）。它们与西班牙以及威尼斯海军通常使用的大帆船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它的龙骨深且牢固，三面横帆也使得船只更易于操纵。这种新型船只并不是特别大，荷载的水手约有六十人，约每三人可分享一门火炮。当英格兰人在地中海的对手们成功地俘获这些船只时，就对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甚至还从英格兰船长以及荷兰船长手中购买这种船只用于研究。然而，威尼斯太过保守。在

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大三角帆船一直保护着这座城市的商贸与帝国，也使威尼斯政府对于那种认为这种新型的舰船对保卫共和国十分重要的观点完全置若罔闻。威尼斯的精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公元13世纪曾经捍卫共和国的舰船在17世纪却无法奏效。直到17世纪初，贝尔托尼船在威尼斯才变得司空见惯，因为这时威尼斯人请求英格兰与荷兰帮助他们对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人。到1619年，威尼斯海军已经拥有50艘贝尔托尼船以及五十艘帆桨船。然而，即使威尼斯的船长们已经开始操作贝尔托尼船，他们也无法挑战北方水手们的高超技术。1603年，威尼斯的贝尔托尼船“圣玛丽亚·德拉·格拉齐亚号”（*Santa Maria della Grazia*）在出发前往亚历山大途中，于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岛附近被敌军俘获。后来，大船被释放，却在夜间沿着亚得里亚海上行时又被捕获，船上的枪炮全被夺走。意大利人在海洋上近乎无敌的神话已成历史。

462 北方人之间也彼此攻击；公元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英格兰人与荷兰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1603年，托马斯·雪利（Thomas Sherley）指挥着一艘混杂着英格兰水手、意大利水手和希腊水手的船，袭击了两艘搭载爱琴海的谷物从基克拉泽斯群岛前往热那亚的荷兰商船。雪利还自鸣得意，伪装成托斯卡纳美第奇公爵的代表，妄称自己的行为是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行动，不过能把对荷兰人的袭击说成圣战还真是神奇。雪利不得不给公爵写信解释自己的行为，因为雪利的劫掠显然越了界。美第奇人很乐意购买英格兰的贝尔托尼船，也乐于雇用英格兰的水手。公爵甚至还从英格兰购买火药。他还在考虑是否可以劝说约翰·沃德为他效劳，因为看起来沃德是位更有活力的海盗。领地已扩展到尼斯周边地区的萨伏伊公爵，愿意

各类半真半假的水手使用他的旗号，使用他的自由港维勒夫朗什（Villefranche）。<sup>34</sup>正如阿尔贝托·泰尼迪（Alberto Tenenti）所指出的，“16世纪末的地中海，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海军及商业领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犬儒主义代替了过去的圣战意识，虽然有时仍然会使用圣战的术语，但海盗们愿意与土耳其人和摩尔人进行合作的意图证明了这种旗号的虚假性。<sup>35</sup>圣斯德望骑士团的行为就是这一倾向的最好证明：到17世纪时，他们已经成为彻彻底底的海盗，从托斯卡纳的美第奇公爵们那里获得慷慨的特许权。

公元17世纪，北方人发现原本艰难的海上生活——恶臭的饮水、长满谷象的干粮、刻板的规则，到航行于地中海水域时已经有所改善。约翰·巴萨普（John Baltharpe）是名英格兰水手，用打油诗记录了他在1670年的地中海航程。驶进墨西哥拿港后，“船上日日在交易”，他可以购买：

长丝袜、地毯、白兰地酒，  
 还有很棒的丝质围巾；  
 卷心菜、红萝卜、甘蓝与坚果，  
 最后，一个男人可在荡妇那里吃到：  
 柠檬、橙子与优质的无花果，  
 还有叙拉古的葡萄酒，以及鸡蛋。

在里窝那，巴萨普特别兴奋地发现了一种美味的鱼，那是“意大利人的一道名菜”，在“卡莱斯”（Cales，或称卡利亚里 Cagliari），也是“什么都不缺”。甚至在肉食很少的阿利坎特，  
 “没有英格兰的奶酪，也没有黄油，我们得到一小块奥伊

尔 (Oyl), 天晓得, 真是太糟糕了”, 令人欣慰的是有大量红葡萄酒——“这种公牛血……甜甜的, 非常可口, 极为诱人, 瓶子一下子就见底了”。<sup>36</sup>我们可对比一下此后的时代, 在 1800 年前后, 纳尔逊勋爵 (Lord Nelson) 一年要准备三万加仑的西里柠檬, 以供应整个英格兰海军, 这可防止其在地中海以及其他地方的水兵们感染坏血病。<sup>37</sup>

随着公元 16 世纪时生活水平的提高, 北方人对地中海的兴趣也日益浓厚, 即便生活水平的提高在 17 世纪已经停止, 北方人在勒班陀战役之后还是经常出现在这里。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汉萨同盟的德意志人是先锋 (1587 年地中海地区歉收之后就已出现), 但影响力不大; 同时, “佛兰德人”主要指的是西班牙辖下的尼德兰 (Netherlands) 北部起义省的新教荷兰人, 而不是佛兰德的天主教徒。<sup>38</sup> 荷兰海军的崛起始于安特卫普 (Antwerp) 成为葡萄牙与东方香料贸易中心之时, 但荷兰的繁荣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在地中海的贸易以及海盗劫掠活动的扩张, 二是对其大西洋以及印度洋商路的推进。<sup>39</sup> 当荷兰联省共和国事实上摆脱西班牙统治实现独立后, 生意迅速转向荷兰的造船厂。起初, 荷兰人在地中海与法国商人有一定的合作, 因为后者正打算开辟通往北非的商路, 时不时地允许荷兰商船悬挂法国的旗帜 (以保证他们在奥斯曼水域的安全)。<sup>40</sup> “方便旗” (flag of convenience) 这一术语特别贴切: 船长们不断变换船上悬挂的旗帜, 以获取地中海某处海岸或海岛的统治者所声明的保护。

### 3

在所有行驶于这片海域的人当中, “葡萄牙人”, 其中多

数是“马拉诺”，引起了特别的关注。自公元 1497 年葡萄牙迫害犹太人以来，其宗教裁判所（在国王的命令下）停止了对新基督徒的迫害；但 1547 年，迫害再次降临到这些新基督徒身上，许多人被迫开始向外迁徙，前往更适宜生活的地方。464 “博宁提尼”犹太人模棱两可的身份，被托斯卡纳公爵之类的统治者所利用，他们愿意庇护所有能够使其收入最大化的商人。公爵们将这种庇护扩展到“葡萄牙人”身上，却不包括其辖下的犹太人；事实上，1570 年，佛罗伦萨的犹太人就被封闭在一处隔都当中。<sup>41</sup> 不过逐渐地，公爵们开始看到建设一个自由港的益处，这种港口不仅向那些宗教信仰不坚定的马拉诺，也向黎凡特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北欧人开放，这些人可利用其定居权和特别的税收条款获利。于 1574 年去世的公爵科西莫一世（Cosimo I）生前将里窝那由一个毫无生气的小渔村发展成地中海商业的重要中心。在他临终之前，这座海港已经得到极大完善，一条新挖的运河将里窝那城与阿诺河连接起来，加速了货物在比萨与佛罗伦萨之间的转运；在其继承人弗朗切斯科一世（Francesco I）统治时期，里窝那周围环绕着雄伟的五边形城墙。城墙内是一条长方形的罗马式街道，符合文艺复兴时期城镇规划最崇尚的原则。<sup>42</sup> 这里的人口也缓慢增长：1601 年，城市居民约有 5000 人，包括 762 名士兵、114 名犹太人以及 76 名年轻的妓女，妓女群体的存在令我们注意到地中海每座港口对性服务不光彩的强烈需求。此后，随着港口基础设施的发展，这座城市也步入繁荣。<sup>43</sup>

生活在里窝那的外国人享有《里窝那法》（*Livornine*）所规定的权利，该法规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当中，规范着美第奇政权与其非天主教臣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特权当中，最负盛

名的是 1593 年公爵将里窝那的欢迎令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商人、黎凡特人和博宁提尼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希腊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犹太人、土耳其人和摩尔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及其他”。<sup>44</sup>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意大利城市的名单中意大利人的排位很低。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是，这个文件反复强调欢迎马拉诺，同样欢迎博宁提尼人、伊比利亚商人和犹太人。博宁提尼商人虽然有基督徒的面具，但只有宣称自己为犹太人，才能免于宗教裁判所的干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改变身份，特别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贸易时，而他们最擅长做这样的事。<sup>45</sup>对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几乎没有限制；在意大利生活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可以拥有地产。他们通常生活在犹太会堂附近，虽然到 18 世纪时，会堂已经成为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始终没有法定的犹太人聚居区。里窝那城中还有一座教堂属于来自东地中海的亚美尼亚商人。在舰船奴隶们生活的奴隶营内，还有三座清真寺，不过前往里窝那的自由穆斯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获得了建造一块穆斯林墓地的许可。<sup>46</sup>

这些反映出里窝那与伊斯兰地区间商路的开通：公元 1590 年前后，来自亚历山大的船只抵达里窝那，但真正的成功在于在 1573 年到 1593 年间开辟的前往北非的商路，布罗代尔与罗曼诺（Romano）在这二十年间发现了四十四次自摩洛哥的拉腊什（Larache）与突尼斯之间的广阔海域前往里窝那的航行。倘若没有塞法迪犹太人的投资，或者没有柏柏尔统治者与美第奇家族的合作，这些联系就无法实现；荷兰人也加入这一商路当中，提供保险以及额外的航船。这条商路对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物资补给至关重要，它从北非带回小麦、蜂蜡、皮

革、羊毛以及糖。<sup>47</sup>其他日用必需品，如锡、松果、金枪鱼和凤尾鱼则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经常被从法国南部港口出发的船只运至托斯卡纳。然而，西班牙商路的地理分布已经发生了变化。巴塞罗那与里窝那几乎没有联系，巴伦西亚也只有一般性的影响，西班牙在地中海区域最受欢迎的港口成了阿利坎特，这里有着优良的港口，还有通往西班牙内陆市场的优质道路。阿利坎特本身除了葡萄酒以及用本地橄榄油制作的香皂外少有其他产品；“它在近代也一直保持着一种类似于殖民工厂的特性，通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在亚洲或非洲的毫无生气的内陆地区。”<sup>48</sup>在阿利坎特与里窝那之间的商路（以及阿利坎特与热那亚之间的商路）上，拉古萨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间商，他们带来的商品有胭脂虫红和胭脂虫粉，这是用小虫子制成的红色染料，此外还有大米、丝绸、蜂蜜、糖，以及最重要的羊毛。除拉古萨人外，犹太商人也在这条商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在西班牙王国时会被禁止信仰自己的宗教。<sup>49</sup>

里窝那还与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区域——加的斯、里斯本以及北海各地建立了商业联系，其中加的斯逐渐成为西班牙在大西洋商贸的中心。荷兰人像蜜蜂追逐花朵一样被吸引而来。尽管《里窝那法》并没有特别鼓励新教徒定居于里窝那，但荷兰商人发现他们只要保持一定的谨慎就能够和平地生活。里窝那是荷兰人的地中海商业网络的中心，也是许多来自大西洋的荷兰商船航行的目的地。虽然托斯卡纳与北非的商业联系得到加强，当地时不时地也有几次丰收，但仍需要从波罗的海进口谷物，因为波罗的海的谷物优于地中海的谷物，而且即便算上运输成本，波罗的海的谷物也是更便宜的。正如我们所见，这反映出地中海沿岸种植业在这个时期

的衰退。意大利人也养成了食用北方黑麦的习惯：公元 1620 年，每五艘向里窝那运送谷物的荷兰商船中，就有一艘装着整船黑麦。美第奇公爵们还与荷兰人商定好优惠的价格，以保证其臣民能够买得起这种食物；当地中海地区有了充足的谷物后，商人还会把谷物替换成其他商品，如熏鲱鱼、干鲱鱼、沙丁鱼、鳕鱼甚至鱼子酱等。<sup>50</sup>贩卖谷物的荷兰商人并不仅仅是在地中海与北欧之间运载货物。他们自己也想要加入地中海内部的转运贸易，希望在运输南意大利的谷物与食盐去北意大利的贸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北欧发生 1630 年那样的饥荒，那么荷兰船长们就努力从爱琴海上为里窝那寻找供货市场，公然对抗奥斯曼人的禁令——奥斯曼帝国的规定是：将非法出口谷物者缚于木桩，使其活活饿死。当地中海的谷物供给充足时，他们就四处游走，从阿利坎特购买羊毛和食盐，从爱奥尼亚群岛购买葡萄酒和干果，从爱琴海购入丝绸等，他们还努力与黎凡特的主要商业中心建立联系——阿勒颇（Aleppo）已经发展为叙利亚重要的商业中心，那里驻扎着一位荷兰代表，此人还关注着荷兰人在巴勒斯坦与塞浦路斯的商业活动。由于阿勒颇位于内陆，商船只能在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靠岸，货物则需要经由陆路运送；货物包括一些异域商品，如靛青和大黄等，这些商品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sup>51</sup>

467 公元 1608 年，托斯卡纳的斐迪南公爵允许“佛兰德-日耳曼民族”建造一座献给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礼拜堂，其中有一块墓地，以供埋葬去世的佛兰德和荷兰商人。一方面，难免会有许多新教徒宁愿葬在天主教堂的辖区之外，但他们也被允许葬在私人花园里。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当中有一些杰出人



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如伯纳德·范登布鲁克（Bernard van den Broecke），他是圣母玛利亚礼拜堂的司库，在里窝那的主街斐迪南德大道（Via Ferdinanda）上的一栋大房子中经营他的事业。他的房子里有十间卧室以及一间宴会厅，宴会厅中装饰着一些油画，有一只装在笼子中的鸚鵡、一张双陆棋桌子以及精美的家具；在花园中，有一处喷泉以及大片的橘园。以里窝那为中心，范登布鲁克操纵着一个完整的商业网络，它覆盖了托斯卡纳公爵的宫廷、那不勒斯、西西里与威尼斯，当然还包括北欧。1624年，他还计划开辟一条新航路，从纽芬兰（Newfoundland）向那不勒斯供应鳕鱼，但因英格兰人的干扰而放弃——由于英格兰国王再次向统治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开战，致使他的鳕鱼被没收。即便如此，英格兰人与荷兰人（包括范登布鲁克）依然不时地与西班牙进行商贸合作，还常常悬挂托斯卡纳的旗帜作为“方便旗”。范登布鲁克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地中海的奴隶贸易，不过他的目的是从家境良好的俘虏身上敲诈赎金。他保证俘虏在自己家里会受到很好的款待，被赎回时能够保持最佳状态；他们一定“足衣足食，不受丝毫伤害”。<sup>52</sup>范登布鲁克的生意一直繁荣到17世纪30年代，这时，由于西班牙的政治困境、英格兰商人的竞争以及瘟疫，人们的生计越来越困难。但里窝那这座城市一直占据着地中海商业中的卓越地位，特别由于此处的塞法迪犹太人继续利用这一基地，与其他塞法迪犹太人聚居地，如阿勒颇、萨洛尼卡以及越来越重要的士麦那等地的塞法迪人同胞保持着联系。

#### 4

里窝那的巨大成功并非特例。公元17世纪时，热那亚人

也试图建立自己的自由港。起初是在 1590 年，这种自由仅限于食品类贸易，到 1609 年关税减免的特权已扩展到所有商品。这里与里窝那不同：热那亚强调的是商品的自由流通，而里窝那更着重于吸引商人，使其在居住以及行动上不受任何限制。468 自热那亚开始与比萨、威尼斯和巴塞罗那争夺地中海的主导权以来，这座城市的特质和商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热衷贸易转向为西班牙王室提供资金支持，这种变化影响了整个热那亚社会，甚至那些负责处理西班牙王室债务事宜的人都是热那亚精英家族的成员。到 16 世纪 60 年代时，他们对船务已经毫无兴趣。<sup>53</sup>在停泊于热那亚的商船当中，热那亚人所拥有的船占少数：1596 年以后，经过这里的商船中有 70% 来自外地。不出所料，在这些外地人当中，拉古萨人最为活跃，同时还有来自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商船以及低地国家的商船，荷兰人则在 17 世纪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sup>54</sup>到 16 世纪末，热那亚商人经常购买拉古萨商船的股份，这恰恰证明了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两个世纪前，倘若有人认为一个小小的亚得里亚共和国会胜过骄傲的热那亚共和国，就会遭到无情的嘲笑。

热那亚人仍自视为西班牙国王的盟友；而西班牙国王却将其视为自己的子民，这种坚持无疑会减弱热那亚人与西班牙人结盟的热情。为了宣示热那亚在西班牙事务中的实际位置，公元 1606 年与 1611 年，西班牙人保证：西班牙的附庸马耳他骑士团在战斗指挥中优先于热那亚人，这使得热那亚人完全明白西班牙将自己视为附庸。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时而会激化，以至于热那亚的战船与马耳他的战船发生对峙，扬言要朝对方开火，西班牙的海军将领不得不迫使双方后退。但西班牙的财政

主要依靠热那亚人，热那亚人的帆桨船从西班牙将金银锭运抵热那亚——1600 ~ 1640 年，数目就接近七千万枚西班牙银币（pieces of eight，或称比索）。热那亚人向西班牙国王提供贷款的条件是：从新大陆获取的金银收益中偿还热那亚人的预支款项。<sup>55</sup>其他商船主要从事更赚钱的从墨西哥购买生丝的贸易；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丝绸就已成为热那亚恢复繁荣的基础，它象征着与西班牙之间密切却麻烦的联系，因为丝绸来自西班牙控制之下的西西里。与西西里出产的谷物一样，西班牙政府也对它课以重税，他们渴望把商人身上的每一枚便士都压榨出来。<sup>56</sup>

469

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一样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因为那个时代的热那亚可以把商船派往地中海的各个地区，甚至进入地中海以外地区，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公元 1642 年，热那亚贵族安东尼奥·朱利奥·布里尼奥莱·萨莱（Antonio Giulio Brignole Sale）写了一篇文章，考察了关于打造一支新舰队的正反两方面观点，城市元老们希望通过打造新舰队重现热那亚的富庶。他坚信：地中海是理想的舞台，因为这里的“行省众多，各具特色，而且许多都拥有港口，人人可以轻易地找到工作”。若建造新的船队，那么就有可能重现“古老的黎凡特商路”，那曾经是“热那亚人获得资产与荣耀的特殊舞台”，他虽然坚持这一观点，但同时也认可反对者的意见，地中海已然与中世纪的地中海不同，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建造舰船无法挽回失落的世界。<sup>57</sup>

公元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地中海陷入迷茫。尽管热那亚人努力重建黎凡特贸易，但在西欧的商贸网络中，地中海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大西洋的商人如今成为主宰。

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地中海只是他们关注的一个方面，而且未必是他们最感兴趣或最重要的对象，因为他们的眼界已经从荷兰延展到巴西和东印度群岛，或者从英格兰延伸到纽芬兰与俄国。<sup>58</sup> 15 世纪以及 16 世纪初做出的承诺最终未能实现。

## 注 释

1. G. Hanlon, *The Twilight of a Military Tradition: Italian Aristocrats and European Conflicts, 1560–1800* (London, 1998), pp. 26–7.
2. D. Hurtado de Mendoza, *The War in Granada*, trans. M. Shuttleworth (London, 1982), p. 259.
3. B. Rogerson, *The Last Crusaders: the Hundred-year Battle for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London, 2009), pp. 399–422.
4. G.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trans. D. and P. Waley (London, 1956), p. 12; D. Goodman, *Spanish Naval Power, 1589–1665: Reconstruction and Defeat* (Cambridge, 1997), pp. 9–10.
5. C. W.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 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Adriatic* (Ithaca, NY, 1992), p. 8; A.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1580–1615* (London, 1967), pp. 3–15.
6. E.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Manchester, 1959), and *Bandits* (London, 1969); cf. T. Judt, *Reappraisals: Reflections on the Forgotten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2008);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p. 10–11.
7.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p. 51–2, 56–62, 67–8, 72–4.
8. *Ibid.*, p. 70, n. 43 (1558).
9. Venetian report cited in *ibid.*, p. 83.
10.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 p. 2;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3.
11.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6.
12.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 8;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8.
13.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10.
14.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p. 63–4;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10.
15.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p. 103–4;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8.

16. Bracewell, *Uskoks of Senj*, pp. 202–3.
17. *Ibid.*, pp. 210, n. 109, 211–12.
18. E. Dursteler, *Venetians in Constantinople: Nation, Identity and Coexist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Baltimore, MD, 2006), p. 24.
19. B. Pullan, *The Jews of Europe and the Inquisition of Venice, 1550–1670* (Oxford, 1983), especially pp. 201–312; R. Calimani, *The Ghetto of Venice* (New York, 1987).
20. D. Geanakoplos, *Byzantine East and Latin West: Two Worlds of Christendom in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in Ecclesias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xford, 1966).
21. E.g.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56; cf. R. Rapp, ‘The unmak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hegemony: international trade rivalry and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1975), pp. 499–525.
22. F. C. Lane,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D, 1973), pp. 309–10.
23. M. Greene, ‘Beyond northern invasions: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174 (2002), pp. 40–72.
24. J. Mather, *Pashas: Traders and Travellers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 CT, 2009), pp. 28–32; M. Fusaro, *Uva passa: una guerra commerciale tra Venezia e l’Inghilterra (1540–1640)* (Venice, 1996), pp. 23–4.
25.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p. 59–60.
26. T. S. Willan, *Studies in Elizabethan Foreign Trade* (Manchester, 1959), pp. 92–312.
27. Fusaro, *Uva passa*, p. 24.
28.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p. 60, 72.
29. Rapp, ‘Unmak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hegemony’, pp. 509–12.
30. Fusaro, *Uva passa*, pp. 25–6, 48–55;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 61.
31.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p. 74–5.
32. *Ibid.*, pp. 77–8; C. Lloyd, *English Corsairs on the Barbary Coast* (London, 1981), pp. 48–53; A. Tinniswood, *Pirates of Barbary: Corsairs, Conquests and Captiv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Mediterranean* (London, 2010), pp. 19–25, 30–42.
33. Tenenti,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pp. 63–4.
34. *Ibid.*, pp. 64–5, 70–71, 74, 85, 138–43.
35. *Ibid.*, p. 82.
36. J. Baltharpe, *The Straights Voyage or St David’s Poem*, ed. J. S. Bromley (Luttrell Society, Oxford, 1959), pp. 35, 45, 58–9, 68–9; N. A. M. Rodger, *The Command of the Ocean: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London, 2004), pp. 132–3.
37. Rodger, *Command of the Ocean*, p. 486.
38. M.-C.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Seamen and Corsairs: the ‘Flemish’ Community in Livorno and Genoa (1615–1635)* (Hilversum, 1997), pp. 47–50.

39. Rapp, 'Unmak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hegemony', pp. 500–502.
40.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pp. 50–51.
41. S. Siegmund, *The Medici State and the Ghetto of Flor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arly Modern Jewish Community* (Stanford, CA, 2006).
42. F. Trivellato, *The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 the Sephardic Diaspora, Livorno, and Cross Cultural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New Haven, CT, 2009), p. 74; L. Frattarelli Fischer, 'La città medicea', in O. Vaccari et al., *Storia illustrata di Livorno* (Pisa, 2006), pp. 57–109; more generally: D. Calabi, *La città del primo Rinascimento* (Bari and Rome, 2001).
43. F. Braudel and R.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Ports, Routes, Trafics, vol. 1, Paris, 1951), p. 21;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p. 41.
44. Trivellato,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 p. 76;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p. 40.
45. Y. Yovel, *The Other Within: the Marranos, Split Identity and Emerging Modernity* (Princeton, NJ, 2009).
46. Trivellato,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 pp. 78, 82.
47. Braudel and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p. 45;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p. 180.
48. Braudel and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p. 46; J. Casey, *The Kingdom of Valenc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79), pp. 80–82.
49. Braudel and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p. 47.
50.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pp. 67, 91–9, 206–13; K. Persson, *Grain Markets in Europe 1500–1900: Integration and Deregulation* (Cambridge, 1999).
51.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pp. 65, 67–73, 96; on Aleppo: Mather, *Pashas*, pp. 17–102.
52. Engels, *Merchants, Interlopers*, pp. 179, 191, 195, 201.
53. T. Kirk, *Genoa and the Sea: Policy and Power in an Early Modern Maritime Republic, 1559–1684* (Baltimore, MD, 2005), pp. 45, 193–4; E. Grendi, *La repubblica aristocratica dei genovesi* (Bologna, 1987), p. 332.
54. Grendi, *Repubblica aristocratica*, pp. 339–43, 356–7.
55. Kirk, *Genoa and the Sea*, pp. 34–5, 84–7, 91–6.
56. Grendi, *Repubblica aristocratica*, p. 207.
57. Kirk, *Genoa and the Sea*, pp. 119–23.
58. F.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 MD, 2008), pp.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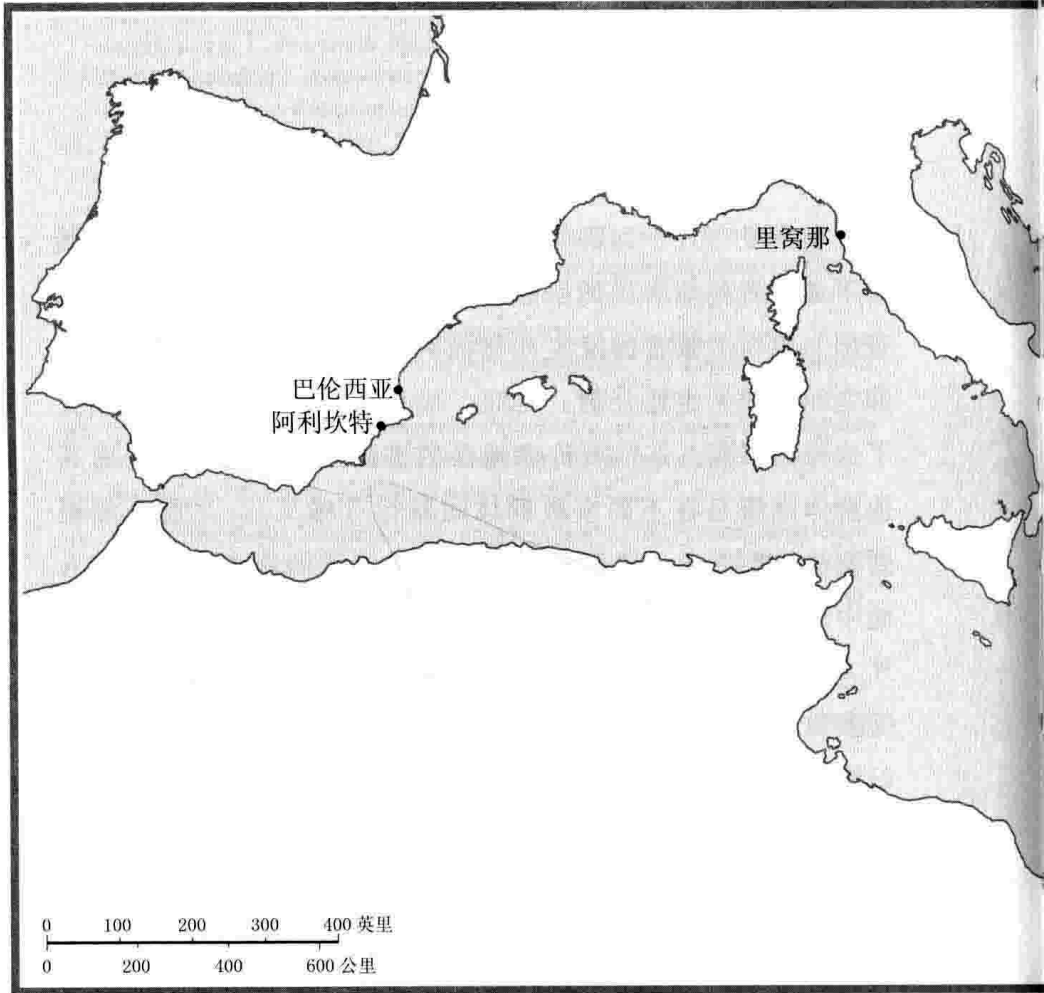
## 六 绝望中的离散犹太人 (1560 ~ 1700 年)

### 1

奥斯曼苏丹、西班牙国王以及他们的各级税吏，对于其治下地中海各地居民的宗教身份极感兴趣。有时，在基督教帝国与伊斯兰教帝国发生冲突的时期，地中海似乎在两大信仰之间被硬生生地分割。然而，很早以来，奥斯曼人就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其治下许多地区的多数人口是基督徒，而其他群体则像是在不同宗教群体间航行（喻义）。之前已经提到塞法迪犹太人，他们具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能力，每当进入地中海西班牙辖下的港口时，都能突然变成基督徒的“葡萄牙人”。公元17世纪，许多塞法迪犹太人宣称士麦那的一名受蒙骗的犹太人是救世主，从此刻起，他们的存在就变得难以维持。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同样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状态。摩里斯科人的悲惨历史在1525年（这一年，最后公开承认是穆斯林的人选择了改宗）到1609年（这些穆斯林最终被驱逐）之间逐渐淡出地中海；他们正是由于脱离了伊斯兰世界而孤立存在才成为独特的群体，此时再一次在宗教的对抗之间无处存身。

470

这些摩里斯科人生活的世界，在许多重要方面，与犹太人出身的皈依者的世界，有着明显差异。尽管一些摩里斯科人也被拖到宗教裁判所，但西班牙统治者起初对伊斯兰教的存在睁







一眼闭一眼；有时，只要向国王支付一笔“服务金”，就可以免于被宗教裁判所侵扰，但宗教裁判所苦恼地发现，它们不能靠没收被怀疑者财产的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sup>1</sup>许多摩里斯科人社区缺少牧师，因此，也就不必因其还在继续信仰伊斯兰教而感到奇怪了；即使在基督教化的地区，有时也会出现伊斯兰化的基督教，这一点在格拉纳达城外圣山修道院（Sacromonte）的著名铅版上有所展示，上面镌刻着他们的预言——“阿拉伯人是在世界末日救助宗教的人”，并且他们神秘地认为这句话来自一位基督的哈里发，即（耶稣的，而非穆罕默德的）继承人。<sup>2</sup>许多时候，国王关心的主要是政治而非宗教：一位西班牙的基督徒作家曾记载，格拉纳达摩里斯科人的首领们曾经与柏柏尔人诸国的统治者以及土耳其人达成秘密协议，希望在其保护下建立一个小国，但这项事业毫无希望，因为他们没有船只，也没有补给；此外，西班牙人在北非海岸的各个据点在柏柏尔人诸国与摩里斯科人之间构成了一道屏障，同时“阿尔及尔的海盗更擅长在海岸地区劫掠与经商，而非登上陆地发动艰难的远征”。<sup>3</sup>即使如此，西班牙人没有机会自鸣得意。当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陆军与海军在远方——不仅仅指勒班陀或马耳他，也包括尼德兰——征战时，摩里斯科人可能会在西班牙国内制造事端，转移西班牙人的注意力，从而为奥斯曼苏丹提供支援。菲利普二世与其父查理五世一样，在看待不信者的问题时，总是非黑即白。因此，对于菲利普来说，生活在西班牙的不守规矩的摩里斯科人，与其北方领地上难以驾驭的加尔文派，从根本上看是同一个问题。“对于上帝与整个世界，我需要承担如此特殊的义务，”菲利普写道，“因为如果异端占据上风（我希望上帝不会允许这种

事情发生)，那就是为更糟糕的灾难与危险敞开了大门，为内战敞开了大门。”<sup>4</sup>

这些担心似乎在公元 1568 年底变成了现实，当时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由于政府与宗教裁判所想把他们变成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发动了暴力冲突。摩里斯科人曾被要求讲卡斯蒂利亚语，不能讲阿拉伯语；他们不得身着“引以为傲的摩尔式长袍”；妇女不得佩戴面纱，应露出面容；他们不能聚集在公共浴场，在婚礼以及其他庆典上禁止跳摩尔舞蹈。<sup>5</sup>这场可怕的血腥战争持续了两年，对立的双方都不愿留一丝情面；如西班牙所担心的那样，土耳其人与柏柏尔人从北非向起义者提供支援，他们与“高门”以及北非统治者的外交联系也逐渐发展起来。<sup>6</sup>然而，这点援助自然不足以击溃由奥地利的唐·胡安指挥的西班牙军队的决心，唐·胡安的残酷无情也很快为其赢得了勒班陀基督教军队总指挥的权力。摩里斯科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不断地自我欺骗（无视各种迹象和证据），相信柏柏尔人会派大军来帮助他们，或者即使做不到，也会有庞大的舰队到来，神迹般地让他们、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财产从我们的掌控之中飘移出去”。<sup>7</sup>事实上，土耳其人认为西班牙太过遥远且无法企及，于是将注意力转向更易于抵达、更有利可图的塞浦路斯。<sup>8</sup>由于起义的中心位于阿尔普哈拉斯（Alpujarras）山区与格拉纳达，远离海岸，因此摩里斯科人的困境就变得更加严峻。起义失败后，五万名摩里斯科人被遣散到卡斯蒂利亚各地，巴伦西亚王国成为唯一拥有大的穆斯林聚集中心的地方。<sup>9</sup>然而，这只是临时方案；当 1580 年菲利普二世得到葡萄牙王位后，时机降临了，他开始在整個伊比利亚半岛强制推行宗教的完全统一。有一种方案主张用船将

472

473

摩里斯科人送到海洋上，然后让船沉没，因为把他们送到与西班牙敌对的北非从而使对方人口增多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塞戈尔韦（Segorbe）主教的提议更令人不寒而栗，他主张把摩里斯科人送到纽芬兰，还要将所有男性阉割，女性绝育，从而使“他们在那里完全灭绝”。<sup>10</sup>于是，到16世纪80年代，大规模驱逐摩里斯科人的行动被提上日程，此后又过了将近三十年才最终解决。问题不在于摩里斯科人是否应该被驱逐，而是以何种方式。很显然，认为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是潜在的叛徒，是基督教世界政治与宗教上的敌人的想法，完全无视了大量皈依者已经融入基督徒社会（事实上，有些人已经成为牧师）；也没有考虑这样做对经济困难日益加剧的西班牙社会，特别是巴伦西亚王国的摩里斯科人聚集地，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到这个时候，巴伦西亚城市的衰落已然显现；有的人已经担心丝织业与制糖业的经营，也注意到水利设施被荒废，过去巴伦西亚还可以从城郊获得并不充足的粮食供应，但现在供应可能会完全消失。<sup>11</sup>巴伦西亚议会非常肯定，驱逐摩里斯科人将摧毁巴伦西亚的大地产，包括教会与修道院，因此巴伦西亚派出使者前去面见国王，指出这样做将会损失赋税，将没有足够的资金守卫西班牙的海岸。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当使者见到国王菲利普二世时，驱逐法令已经于1609年8月签署完毕。<sup>12</sup>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比较简单的、将这些人送往北非的办法占据上风，于是，驱逐法案以摩里斯科人与柏柏尔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者有着反叛性质的信件往来为由开始执行。<sup>13</sup>虽然法令要求立即执行，可以使用国王提供的船只遣散穆斯林，但不可避免地，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以至于驱逐行动一直持续到公元1614年。政府也考虑到部分反对者的声音，特别是基

于经济角度的考量，因此决定每 100 名摩里斯科人中有 6 人可以留下，条件是他们是农民且表现出对基督教的信服；他们还需要“告诉那些占据摩里斯科人财产的人如何经营，以及如何制糖，如何使用水利工程”。这项法令的内容十分详尽 [让现代的读者能够联想起纳粹德国召开的声名狼藉的万湖 ( Wannsee ) 会议]，对要驱逐的人进行细致的分类，因为被驱逐人员中有混合家庭，例如如何处理父母中有一方自始至终都是基督徒的孩子问题。<sup>14</sup> 他们离开时的港口也被明确指定，包括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和托尔托萨。紧接着还展开了一波宣传攻势，声称摩里斯科人会带着奥斯曼舰队重返西班牙，他们甚至派出 15 万人的大军支援土耳其人。摩里斯科人曾试图反抗，但看到引领自己离开家乡的西班牙军队是如此庞大时，只能无望地放弃了抵抗。事实上，摩里斯科人决定：任何人不得自愿加入被允许留下的特殊群体，不许留下来向基督徒传授如何使用这片土地。摩里斯科人相当团结。结果，在巴伦西亚王国，甘迪亚 ( Gandia ) 公爵十分绝望，因为没有任何人留下来耕种他的糖业庄园。他的感觉与摩里斯科人一样，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一场灾难。1609 年 10 月 2 日，将近 4000 名摩里斯科人在德尼亚 ( Denia ) 上船，许多人搭乘特别运送他们的那不勒斯的帆桨船前往柏柏尔海岸；上船的人极多，拥挤不堪，短时间内有 2.8 万人拥入北非。对于西班牙船队来说，把这些人留在那里没有丝毫困难：第一拨摩里斯科人被送到奥兰，该地此时仍处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摩里斯科人抵达后，与特莱姆森 ( Tlemcen ) 的统治者就他们在穆斯林的土地上的居住权问题进行协商。其他难民则拒绝西班牙人提供的免费运输，而是自行安排行程：1.45 万人从巴伦西亚登船，进入基督徒的

视线，而基督徒来这儿是为了购买特价抛售的丝绸与缎带，于是这里就自然成为“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sup>15</sup>一些摩里斯科人态度平静，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解放而非迫害：柏柏尔王公们“将允许他们作为摩尔人而生活，而非此前这里的主人眼中的奴隶”。

有证据表明有超过 15 万人离开了西班牙，不过据当时的数据统计人数要少一些：巴伦西亚的宗教裁判所给出的数据是 100656 人，其中在巴伦西亚港上船的有 17766 人，而这些人当中不足十二岁的有 3269 人，还有 1339 名尚未断奶的婴儿。<sup>16</sup>这时候我们需要转到古老的阿拉贡王国，有 7.4 万摩里斯科人从这里离开西班牙，从加泰罗尼亚离开的人数少一些；许多人从托尔托萨经海路离开，不过其他人则选择了陆路，忍受着巨大的磨难，翻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要求：他们必须全部乘船前往北非。<sup>17</sup>法国与奥斯曼的联盟并不涉及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提供保护的义务，而亨利刚刚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残酷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不愿意将新的宗教纷争引入王国，毕竟这个王国是他放弃了新教后才赢得的。<sup>18</sup>不过，法国人对其所见感到震惊。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后来称这一事件为“人类历史上最奇怪、最野蛮的行为”，不过他可能更愿意谴责西班牙的基督徒，而不是为西班牙的穆斯林提供保护。<sup>19</sup>与此同时，西班牙国王的注意力转向卡斯蒂利亚，公元 1614 年初，国会告知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这项工作已经结束。<sup>20</sup>大约有 30 万生活在西班牙各个王国的摩里斯科人遭到驱逐。<sup>21</sup>

从西班牙基督徒的角度看，这场驱逐是针对不信者的行动，不过一些基督教化程度很高的穆斯林后代也被驱离，尽管

曾经承诺要保证那些愿意接受圣餐礼的人可以留下。国王的残暴行为导致了一个奇怪的后果：憎恨西班牙政策的那些混杂人群现在定居于柏柏尔海岸，摩里斯科人将他们的精力用于对西班牙海岸进行海盗袭击。除了报复心外，也有对过去浪漫生活的怀旧心理。安达卢西亚的音乐也被保留下来，部分存在于摩里斯科人中间，部分存在于早年被流放的难民中间——这些难民是在格拉纳达及其他地方陷入混乱时逃亡到北非各地的。北非的当地居民并不太欢迎这些人，远不如流放者所希望的那样。经过数十年来基督徒们对“摩尔方式”的讨伐，许多摩里斯科人似乎已经在语言、服装和习俗上实现了难以置信的西班牙化；他们与马格里布的居民保持着距离。这些生活在突尼斯的摩里斯科人大多讲西班牙语，许多人起的是西班牙名字；他们甚至还将刺梨等美洲水果引入北非，这种水果是他们于公元 1492 ~ 1609 年在西班牙时知道的。<sup>22</sup>如果他们想要寻找能够理解他们的同道者，他们会倾向于选择塞法迪犹太人，后者会与他们共同回忆过去在西班牙三种宗教和谐共处的美好时代，塞法迪人也与北非当地的犹太社区保持着距离，继续讲着一种卡斯蒂利亚语。如此一来，在北非，塞法迪犹太人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之间，因着流亡而有了情感上的联系。

## 2

就在这个世纪末，塞法迪犹太人也遭遇了严峻的危机。这场危机始于士麦那（或称伊兹密尔）。士麦那与里窝那构成了将意大利与奥斯曼世界联系起来的二元体系的一部分。<sup>23</sup>公元 16 世纪初，这两个地方都不重要。但 1621 年德·库曼宁（de Courmenin）男爵曾到访士麦那，并记录道：

这时，伊兹密尔有着巨大的市场，市场上有羊毛、蜂蜡、棉布与丝绸，这些商品由亚美尼亚人带到这里。他们没有选择去阿勒颇，因为到这里更有利可图，可以少缴纳一些费用。这里有各种不同的商人，其中法国人比较多，其次是威尼斯人、英格兰人或荷兰人，他们都有着充分的自由。<sup>24</sup>

如同爱奥尼亚群岛的干果，士麦那凭借当地出产的商品吸引了外来商人的注意力；其他同时代的商人还注意到波斯丝绸越来越多，这是由亚美尼亚人穿越安纳托利亚半岛运抵这里的。土耳其人对来自欧洲的丝绸商人不像对前来购买谷物和水果的欧洲商人那样设置重重障碍，毕竟君士坦丁堡也需要大量谷物和水果的供应。

公元1566年以后，由于热那亚人在爱琴海的最后据点希俄斯岛丢失了，欧洲与爱琴海之间的贸易平衡被打破。热那亚人的离岸商站消失后，士麦那开始发展，当地种植了棉花与其他新产品，如烟草。对于烟草，“高门”还存有疑虑——不是因为不喜欢其味道，而是种植烟草越多，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就会越少，而奥斯曼的首都一直需要稳定的食物供给。<sup>25</sup>几乎就在希俄斯岛陷落后，法国的查理九世为法国商人争取到在士麦那的贸易特权（1569年），伊丽莎白一世则在1580年为英格兰人谋求到特许状，后来为英格兰黎凡特公司所独有；荷兰人在1612年取得了特权。外国人很欣赏士麦那的地理位置，它隐藏于一处海湾之中，使得海盗无法轻易袭击，外国商人的到来也为这座城市吸引了无数的犹太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sup>27</sup>1675年，一位旅行者的记录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他提道这里的犹太人有 1.5 万之多，实际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字可按照人口比例缩减到约有 2000 人。这些犹太人来自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以外各地区：有塞法迪犹太人，既包括黎凡特人也包括葡萄牙人，还有罗马尼奥人（Romaniotes，即希腊犹太人）以及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m）犹太人<sup>①</sup>。葡萄牙犹太人的法律身份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总是从那些拥有免税权的商人中寻找保护者：在 17 世纪末的某个时候，他们（与丹麦人和威尼斯人一起）接受英格兰人的保护，后来又转而寻求拉古萨人的保护，最后苏丹亲自为其提供保护，但拒绝为他们提供税收减免的优惠，他们的对手因此感到十分满意——黎凡特公司在 1695 年曾断言：“在士麦那，我们的最大对手是犹太人。”<sup>28</sup>

478

公元 17 世纪士麦那的特殊性通过沿港湾区建造的法兰克人大道（Street of the Franks）显露无遗。在那里可看见欧洲人建造的、配备着优雅家具的房屋。屋后的花园可通往码头，被用来装卸货物；还建有楼梯通往欧洲人仓库的屋顶。<sup>29</sup>1700 年，一位法国来客观察到：

法兰克人大道贯穿整座城市，但在街上却很难看到土耳其人。当我们行走在大道上时，仿佛身处基督教世界；他们讲的是意大利语、法语、英语或荷兰语。每个人在向别人致意时都会脱帽行礼。

但在法兰克人大道听到的各种语言当中，最常出现的却是马赛

---

<sup>①</sup> 即德系犹太人。——译者注

商人讲的普罗旺斯语（Provencal），“因为在这里来自普罗旺斯的人远多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基督徒可自由地经营客栈，但其经营方式却不太明智，整日整夜地开门营业。更特别的是他们的自由信仰——“他们在教堂中公开唱诵；他们唱诵赞美诗、布道、举行圣礼，完全不会引起任何纷争。”<sup>30</sup>一座功能性港口城市由此形成，出于贸易的需要，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基督徒等各教派信徒比邻而居：这里有三座西欧人的教堂、两座希腊人教堂以及一座亚美尼亚教堂。这里也有一些犹太会堂，但17世纪60年代葡萄牙会堂里的事件引发了犹太世界的大火；连基督徒与穆斯林也和犹太人一样感受着这场大火的炙烤。

479 生活在士麦那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一起经商。英格兰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们经常雇用犹太人做代理商，其中有一名老迈不堪、患有痛风的掮客，名叫莫迪凯·泽维（Mordecai Zevi, Zevi 一词经常拼作 Sevi、Tzvi 或 Sebi），是个希腊犹太人，早年从事比较卑下的贩卖鸡蛋的生意。<sup>31</sup>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也做了掮客，但第三个儿子沙贝塔伊（Shabbetai）却眼界非凡，全身心地投入犹太学问中某些极为深奥难解的领域。对于犹太教卡巴拉教派的研究很早之前就已兴盛起来，最初出现在西班牙的犹太人中，自公元1492年起出现在巴勒斯坦萨法德的塞法迪犹太人中。在拉比看来，四十岁之前学习卡巴拉教义很危险，只有四十岁以后才能拥有理解它们所必需的知识背景与成熟度；但这些说法无法阻止沙贝塔伊·泽维，他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学：“他一切知识都靠自学，因为他是依靠自己习得造物主传下的真理的四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族长亚伯拉罕（Abraham）、犹大国王希西家（Hezekiah）和约

伯 (Job)。”<sup>32</sup>关于沙贝塔伊的情绪波动及行为的描述可以使人确信：他有着两极化的人格。一方面自我怀疑与反省，另一方面又陷入沉迷与自大。当他朗读以赛亚 (Isaiah) 的预言“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时，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做着那样的事，并邀请朋友来证明他能够在空中悬浮。结果，他们否认看到他能悬浮。于是，他就责备他们：“你们不值得看到这样荣耀的景象，因为你们不像我这样纯洁。”<sup>33</sup>

以色列人获救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在公元 17 世纪 40 年代，东欧哥萨克人 (Cossacks) 为报复而展开的恐怖大屠杀在远及整个地中海的犹太人中引发一种强烈的危机感，难民们在奥斯曼帝国寻找安全的避风港，也将所发生的事情传播到这里。这种危机感几乎与 1492 年时一样严重，那时，西班牙对犹太人的驱逐引起了对弥赛亚的信仰热情。如今，二十多岁的沙贝塔伊认为自己是弥赛亚般的人物，不过他究竟是弥赛亚还是其他人仍然比较模糊。他驳斥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开始在犹太会堂中宣称上帝的四字母之名 [犹太人一直以“阿多奈” (Adonai)，也就是“我主”或“上帝”，来代称其四字母之名]<sup>①</sup>，并且还反驳托拉中的规定，例如禁食动物肾脏周围脂肪，因为这些要留作圣殿献祭之用。他甚至在食用禁忌食物时还祈祷称：“祝福你，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他允你行所禁忌之事。”他的私生活也很复杂：坦白说，他的妻子萨拉 (Sarah) 是名妓女，靠着算命挣一点点钱，但这恰恰重现了先

---

① 所谓四字母之名，即 JHVH，中文译为“雅赫维”或“亚卫”，其原意是《圣经》中摩西得神启示时所听到的“我是自有永有之神”。由于摩西十诫规定不可妄称神名，因此，通常在祈祷时用 Adonai 取而代之。——译者注

480 知何西阿 (Hosea) 的经历, 后者就娶了一名妓女。<sup>34</sup> 他在萨洛尼卡生活了一段时间, 并开始招募一些追随者, 这些人被他的预言能力与自信感召。他在东地中海各地游历, 显然是希望得到巴勒斯坦拉比的支持, 后者的意见会得到整个犹太世界的尊重; 他的追随者中最突出的是一名来自加沙的聒噪的犹太人, 名叫拿单 (Nathan), 也是沙贝塔伊最坚定的支持者。不幸的是, 沙贝塔伊拒绝表演任何神迹, 即便在希伯伦他的支持者面前也不愿意表演, 结果当地塞法迪犹太人的领袖哈伊姆·阿布拉菲亚 (Haim Abulafia) 声称: “我不相信弥赛亚会以这种方式到来。”<sup>35</sup> 毕竟, 沙贝塔伊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是大卫王族的后裔。

回到士麦那后, 公元 1665 年 12 月 12 日, 他与追随者洗劫了士麦那的葡萄牙犹太人会堂, 将原来的领袖驱逐。当他们拥有了一个基地来推行其主张后, 就制定了新的节期并把旧的节期取消 (尤其把纪念圣殿陷落的夏季斋戒期取消, 因为如果犹太人所祈祷的拯救已经到来的话, 这种庆祝确实没有必要)。他让女人阅读托拉, 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做法, 并在集会时讲艳情故事以娱乐大家, 这个故事的名字在犹太-西班牙语中被称为《梅里塞达》(Meliselda), 讲的是一位皇帝的漂亮女儿与一位年轻人见面并做爱: “她的脸庞仿佛一道剑光, 她的唇如珊瑚一样红艳明亮, 她的肌肤像牛奶一样美丽白皙。”<sup>36</sup> 并非此前从未有人注意到这个故事, 而是这首诗歌显然是在说明弥赛亚与托拉之间的联系, 它代表着神性降临。弥赛亚是位真正的国王, 而非宗教领袖, 因此沙贝塔伊自称拥有王权, 并将其追随者封为葡萄牙、土耳其和罗马等地的国王或皇帝 (最后两个王者的位置要留给他的两

个哥哥)；不言而喻，他把自己堂而皇之地列于“犹太人之王”的行列之中，并因此而欢喜；关于他的成就（如果被称为成就的话）的消息，经由塞法迪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商人的信件往来，传到阿姆斯特丹。<sup>37</sup> 这些行为不但没有激起愤怒，反而更坚定了追随者的信念，认定他就是上帝所承诺的弥赛亚。

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不懈地记录这些事情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上帝知晓他是不是使得那些顽固之徒改信皈依的途径。”<sup>38</sup> 基督徒对东地中海（也迅速传到意大利）犹太人中不断发酵的动乱的兴趣，在回溯沙贝塔伊运动的根源后，就变得很好理解了。他声称自己是弥赛亚，拥有权力与权威将旧的律法中的某些部分加以摒弃，这种做法让人想到福音书中所描绘的拿撒勒人耶稣。由于其父亲的生意，年幼的沙贝塔伊与士麦那的英格兰商人以及其他基督徒商人有了联系。同样是在他们中间，天启的概念传播开来，因为在公元17世纪40年代，英格兰的宗教热情高涨，狂热的新教派别抢夺着自己的位置，有些人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弥赛亚概念 [奥利弗·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也受其影响]；这些派别仔细地阅读《旧约》，认真琢磨预示基督再次降临的段落。在这些人当中就有第五王国派 (Fifth Monarchy Men)，也就是贵格会 (Quakers) 的前身，其起源充满了对末日的期待。<sup>39</sup> 另一场影响基督徒商人又间接影响沙贝塔伊·泽维的运动是“玫瑰十字会启蒙”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sup>①</sup>，这是一整套、包括炼金术在内的深奥难懂的知识，在17世纪初以印刷文字的形式传播开

481

---

① 又可译为玄术启蒙。——译者注

来。<sup>40</sup>这场运动发源于被三十年战争蹂躏后的德意志，但其信条吸引了北欧各地的科学界人士。商路将土麦那的棉花带去英格兰，并从那里带回这些深奥的概念。

然而，沙贝塔伊·泽维的活动中心是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辖区，不出所料，他的名字也引起了苏丹的注意。竟然有一个犹太臣子，把他自己的哥哥任命为“土耳其国王”；在其追随者的犹太会堂里，传统上对于统治者的祈祷被改了，不再祈祷上帝赐福苏丹，信徒们聚会祈祷的是“我们的弥赛亚，约瑟的神所庇佑的受膏者，天界之狮与天界之牡鹿，正义的弥赛亚，诸王之王，苏丹沙贝塔伊·泽维”。<sup>41</sup>大维齐尔法佐·艾赫迈德帕夏（Fazıl Ahmet Pasha）受到伊斯兰教中教律严苛的教派影响，鄙视其他宗教；此前，他忙于在克里特与威尼斯人作战，现在这位大维齐尔的注意力转向这个麻烦的先知。<sup>42</sup>沙贝塔伊还制订了计划，使自己距离法佐·艾赫迈德更近。公元1665年12月30日，沙贝塔伊及其追随者乘船从土麦那前往君士坦丁堡，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王国。违背季节规律的旅程灾难不断，即便只是爱琴海当中的一小段航行也是如此，但

482 《诗篇》第107节的话语足以平息他们所遇到的风暴：“他使得风暴平息，海浪也平静下来。”他在海上游弋了将近四十天。奥斯曼帝国辖下的大量犹太人聚集起来迎接他；但土耳其政府也在等他。他被直接带到监狱，可是即便是这个身陷囹圄的过程，也被其追随者弄成了一场巨大的公众游行；即使身在监狱，他还是能够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此时，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ehmet IV）身在阿德里亚堡 [Adrianople，即埃迪尔内（Edirne）]，正准备前往巴尔干半岛，于是又花费一段时间才将这位先知带到苏丹面前。苏丹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施行神

迹证明自己是弥赛亚，要么改信伊斯兰教。苏丹所指定的神迹是：让他赤身裸体地接受土耳其弓箭手们的瞄准与射击，箭不能伤害到他，并要奇迹般地绕过他。沙贝塔伊表示反对，称他宁愿“变成土耳其人”<sup>①</sup>，并且顺顺利利地完成了转变。<sup>43</sup>

沙贝塔伊·塞维的背教极具戏剧性，因为阿德里亚堡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满怀期待地来见证他进入苏丹宫廷的时刻。结果，他竟揭发了自己的追随者。之后，他接受了御前侍卫的名誉职位，并改名为穆罕默德·埃芬迪（Mehmet Effendi）。对于生活在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社区来说，这件事引起了巨大震动。在整个犹太世界，有的人认为这仅仅证明他是个骗子；有的人被整件事弄得泄气又沮丧；有的人则从其行为中看出他对世界的启示发展到新阶段：可能弥赛亚在最终露面之前要先改信伊斯兰教——一些追随者也跟随他的脚步接受了伊斯兰教，只是秘密地继续着犹太教的信仰与实践，形成东马派（Dönme），它至今仍然存在于土耳其的某些地区。虽然一位耶稣会作家坚持认为，沙贝塔伊在漫长的斋戒期将自己封闭在堡垒中时，其实存有一堆小点心，但不能就此认定他是假称弥赛亚的骗子。虽然他自欺欺人、狂妄自大，也并不明智，但即便其反对者也承认他与其追随者加沙的拿单都是有学问的人。<sup>44</sup>不过，“一知半解反而危险”，在卡巴拉的神秘宇宙中更是如此。他的游历及其发起的运动还揭示出连接地中海各个港口的商业网络的一些重要方面：他的理论从士麦那这种商业中心渗透到萨洛尼卡、里窝那，然后进入巴尔干半岛与意大利

---

① “变成土耳其人”（turn Turk）是英文俗语，指改信伊斯兰教。——译者注

488 利内部。他的理论不仅仅源于犹太土壤，还受到新教商人对天启的热情的影响，那些商人将这些概念从英格兰、荷兰以及中欧带到士麦那。北方人不仅重新划分了地中海的商业地图，也影响到宗教格局的变化。

### 3

在公元 17 世纪的地中海，有变节的海盗，有被驱逐的摩里斯科人，有改宗的沙贝塔伊信徒，有“葡萄牙籍”的犹太商人：在这里，宗教身份不断地扭曲与重塑。基督徒社区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例如克里特。在这里，威尼斯人一直在努力维系他们对最后一块海外领地的控制权。克里特也成为威尼斯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包袱，威尼斯人一直在担心：他们什么时候会需要，而不是要不要，派遣庞大舰队前往克里特抵抗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人在 1571 年夺取塞浦路斯之后，必然会对克里特发动袭击。这还不仅仅是与土耳其人的斗争。克里特人自己——既有希腊人的后裔，也有与当地希腊人联姻的威尼斯人的后裔，在 16 世纪末抓住了葡萄酒以及橄榄油贸易的机遇，在全岛范围内种植葡萄与橄榄树；到 17 世纪中期，橄榄油已经成为克里特的主要出口商品，克里特的葡萄酒也满足了奥斯曼治下爱琴海区域以及尼罗河三角洲消费者的渴求。谷物的种植量严重衰减，以至于克里特都难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变化实在太奇怪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克里特一直是威尼斯的主要谷物来源。克里特人开始从奥斯曼治下的地区进口谷物，这些交易大体上比较顺利，前提是威尼斯人继续向土耳其苏丹缴纳贡金，苏丹亦不觉得自己帝国内的粮食供应紧张。如此一来，早在 17 世纪中期土耳其人夺取克里特之前，克里特与奥



斯曼世界的联系就已经变得更加紧密了。<sup>45</sup>土耳其人容忍威尼斯人控制克里特的唯一理由是想要维持威尼斯与奥斯曼辖区间的商业流通；但随着威尼斯人逐渐放弃了黎凡特贸易，“高门”对维系与威尼斯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也就失去了兴趣。土耳其人也注意到，欧洲列强彼此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后来还演变为三十年战争，因此若对克里特发动袭击，基督教力量不可能统一起来进行抵抗。此外，曾在1624年到1639年牵扯奥斯曼人精力的波斯战争，如今也已结束。<sup>46</sup>

484

漫长的克里特战争的导火索是公元1644年底一艘土耳其船只被劫持，该船原打算从君士坦丁堡前往罗得岛，然后再去埃及，船上搭载着苏丹后宫的宦官总领以及麦加的新任法官。海盗是马耳他人；他们杀死宦官总领后把法官囚禁，还截获了大量战利品。即便威尼斯人根本没有参与袭击，奥斯曼宫廷还是认为马耳他人利用了威尼斯人在克里特与凯法利尼亚的港口。1645年6月底，一支庞大的奥斯曼舰队逼近克里特。<sup>47</sup>西地中海的基督徒海军也确实被动员起来，一些战舰从那不勒斯、马耳他及教宗国出发。威尼斯自然也集结了自己的舰队，共和国任命八十岁的总督为指挥官，但所有这些努力均无济于事：在随后的数月间，土耳其人攻占了克里特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城市——干尼亚（Chania）和雷西姆农（Rethymnon），以及岛上的许多地区。<sup>48</sup>对于威尼斯来说，幸运的是，克里特首府干地亚（Candia）受到护城河、城墙、城堡及半月堡等防御设施的保护，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些当时最先进的军事设施能将土耳其人抛射的所有攻击物阻挡于城外。基督教联军的总体战略是将奥斯曼海军的注意力从克里特转移到距离帝国中心更近的地区：达达尼尔海峡在战争爆发之初就成为一个聚焦点，从

1654 年开始，这里发生了数次激烈的战斗，威尼斯人试图阻止土耳其舰队从这里进入爱琴海支援克里特战役。<sup>49</sup> 不过，干地亚所受压力不断增大，到 1669 年，战局已经发展至关键时刻。西班牙国王承诺提供援助，但始终没有兑现，因为他更担心法国人的进攻而非土耳其人。法国国王也派了援军，但他们的舰队不敌奥斯曼舰队，土耳其人通过一场迅速又简单的海战胜利将其盟友送上逃亡之路，留下了毫无倚仗的干地亚。1669 年 9 月 6 日，威尼斯人放弃了干地亚，承认奥斯曼对克里特的统治权；威尼斯人毕竟是威尼斯人，他们仍然抓住机会与奥斯曼人签署了和约。<sup>50</sup>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显然标志着其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因为自 13 世纪初以来，他们就统治着克里特。当他们投降时，威尼斯特使说：“我们献上的是举世无双的堡垒。它是一颗无价的珍珠，任何苏丹的财产都无法与之相比。” 数个小时后，苏丹真正地拥有了这颗珍珠。

奥斯曼人的到来并没有在克里特引爆一场革命。<sup>51</sup> 干地亚成为地区商贸网络的中心，而其西部的干尼亚却成为颇受欢迎的国际贸易港。在那些威尼斯人曾经经商的地方，法国人想要凭借与“高门”的友好联系成功地取代威尼斯人。当伊斯兰教在克里特扩张时，这里的葡萄酒制造并未停止。法国商人和克里特商人都从岛上收购马姆齐（Malmsey）甜酒、橄榄油、干果、奶酪、蜂蜜和蜂蜡；偶尔也会对外出口谷物，主要是当对面的北非沿岸出现饥荒时才会如此。据一位法国游客在公元 1699 年的记载，阿卡迪（Arkadi）修道院的修士们酿出一种“风味浓郁、味道甘醇、口感厚重、颜色略深”，并带有一种特别香味的葡萄酒。与此同时，克里特人还喜欢上了一种咖啡，这种咖啡来自也门，经奥斯曼治下的埃及传入克里特，埃及后来成为克

里特产品的主要市场。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本地商人的涌现，在威尼斯治下时，他们被排挤，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崛起。这意味着：当土耳其人夺取该岛后，岛上已经拥有了由本地商贸交易构建起的坚实基础，也包括一些热衷于将岛上货物贩卖到奥斯曼治下各地的商人。<sup>52</sup>

希腊的水手和商人越来越常见，但在被征服的干地亚城里，商人的主体是穆斯林。这座城市会重新迁入人口也很好理解，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干地亚的穆斯林商人不过是当地改变了宗教信仰却没有改变其住所的克里特人。到1751年时，穆斯林约有四十八艘舰船，其中就包括干地亚的商业舰队。<sup>53</sup>在克里特的各个城镇中，随时准备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已经很明显。当地居民得到保证：过去的历史会受到保护，岛上的穆斯林以及希腊正教徒的通用语言是希腊语，而非土耳其语。克里特人与拉丁教会的定期联系被切断，在威尼斯人统治时期，拉丁教会控制着岛上的统治集团。威尼斯人还曾经禁止正教主教们踏足克里特岛，不过正教的教会与修道院在政府的保护下还在正常运行——克里特教士在岛外受到推崇，有的教士还成为西奈山（Sinai）圣卡特琳娜（St Catherine）修道院院长。奥斯曼征服者利用这一机会在正教徒中寻找支持者，在尚未控制干地亚之前就委任了克里特总主教。<sup>54</sup>与伊斯兰教进入克里特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没有接受新信仰的居民中正教信仰再次占据首位。由于克里特距离西奈山很近，它也成为东地中海希腊正教复苏的中心。

486

#### 4

这时，地中海各港口、沿海地区以及岛屿上的居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单一群体，他们的日常语言，即所谓的“法兰

克语” (*lingua franca*)<sup>①</sup> 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sup>55</sup> 生活在地中海不同海岸的居民使用可相互交流的通行语言，可追溯到非常古老的时期，那时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先后使用着布匿语、希腊语以及后来出现的中古拉丁语。<sup>56</sup> 许多人用粗糙的混合语言交流，且多借助手势。在塞法迪犹太人中，广泛使用的是犹太-西班牙语，这使得从黎凡特直到摩洛哥的商人、朝圣者以及其他旅行者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甚至讲希腊语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也开始讲犹太-西班牙语。一方面，讲罗曼语的人在交流时大体上没有什么障碍（比如任何一位出现在西班牙召开的会议上的讲意大利语的人都可证明），但另一方面，属于拉丁语系的人与伊斯兰地区讲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的人的交流却存在着严重障碍。在现代早期，土耳其人从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中吸取了大量关于海洋的词，这也大体反映出土耳其人的舰船与装备的来源。<sup>57</sup> 水手与商人们需要交流，奴隶主想要对俘虏发号施令，就连奴隶营中的土耳其人或欧洲人也需要用一种奇怪的混合语下达指令，然而，这种混合语言的核心却通常是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结合体。突尼斯人的“法兰克语”接近意大利语，而阿尔及尔的“法兰克语”则倾向于西班牙语；地理位置以及政治联系决定了这种差异。<sup>58</sup> 据说，公元18世纪时，阿尔及尔的一位帕夏“能听懂并会讲‘法兰克语’，但他认为用‘法兰克语’与自由的基督徒对话有失身份”。通常，变节的海盗会使用这种语言，他们中有些人觉得掌握流利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难

487

---

① 所谓 *lingua franca*，事实上指不同族群的居民共用的交际语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兰克语”，故加引号。——译者注

度太大。所谓“法兰克语”的一些词在语义上发生了改变，因此土耳其人讲的“forti”虽然源于意大利语，但并不表示“坚强地”，而是表示“温柔地”，“todo mangiado”也不仅仅表示“都吃光”，而更常用作“消失”。<sup>59</sup>千万不要把“法兰克语”想象成一种正式的语言，它既没有正式的规则，也没有约定俗成的词，事实上，其流动性与易变性也明确反映出现代早期的地中海居民身份的不断变换。

## 注 释

1. L. P.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1500 to 1614* (Chicago, IL, 2005), pp. 206–7; M. Carr, *Blood and Faith: the Purging of Muslim Spain, 1492–1614* (London, 2009), pp. 109–17.
2. Texts in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p. 382–98.
3. D. Hurtado de Mendoza, *The War in Granada*, trans. M. Shuttleworth (London, 1982), p. 42.
4. Cited in G. Parker, *Empire, War and Faith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2002), p. 33.
5. Hurtado de Mendoza, *War in Granada*, p. 41; Carr, *Blood and Faith*, pp. 153–8.
6. Hurtado de Mendoza, *War in Granada*, pp. 150–51, 217–18, etc.;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p. 337–40; Carr, *Blood and Faith*, pp. 159–79.
7. Hurtado de Mendoza, *War in Granada*, p. 218 (with emendations).
8.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 339.
9. Carr, *Blood and Faith*, p. 182.
10.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p. 295–6, revising H. C. Lea, *The Moriscos of Spain: their Conversion and Expulsion* (Philadelphia, PA, 1901), p. 296.
11. J. Casey, *The Kingdom of Valenc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79), pp. 79–100.
12. Lea, *Moriscos*, pp. 318–19; Casey, *Kingdom of Valencia*, pp. 228–9, 234; Carr, *Blood and Faith*, p. 256.
13. Lea, *Moriscos*, p. 320; partial text in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p. 310–11.
14. Lea, *Moriscos*, pp. 322–5, n. 1.
15. Carr, *Blood and Faith*, p. 263.
16. Lea, *Moriscos*, pp. 326–33 (figures: p. 332, n. 1);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p. 314–16.

17.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 317; Carr, *Blood and Faith*, p. 286.
18. Lea, *Moriscos*, pp. 340–41.
19. Cited in J. Casey, 'Moriscos and the depopulation of Valencia', *Past and Present*, no. 50 (1971), p. 19.
20. Harvey, *Muslims in Spain*, pp. 320–31.
21. M. García Arenal, *La diáspora des Andalouisiens* (Aix-en-Provence, 2003), p. 103.
22. *Ibid.*, pp. 123, 137, 139.
23. M. Greene, 'Beyond northern invasions: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no. 174 (2002), pp. 40–72.
24. Cited in D. Goffman, *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 1550–1650* (Seattle, WA, 1990), p. 52.
25. *Ibid.*, pp. 61–4, 74–5.
26. E. Frangakis-Syrett, *The Commerce of Smyr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00–1820* (Athens, 1992), pp. 74–9.
27. Goffman, *Izmir*, pp. 67, 77.
28. *Ibid.*, pp. 81–4; Frangakis-Syrett, *Commerce of Smyrna*, pp. 80–81, 106.
29. Frangakis-Syrett, *Commerce of Smyrna*, p. 35.
30. Passages cited in Goffman, *Izmir*, p. 137; also J. Mather, *Pashas: Traders and Travellers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 CT, 2009), pp. 94, 213.
31. G. Scholem, *Sabbatai Sevi, the Mystical Messiah 1626–1676* (London, 1973), pp. 106–7, 109, n. 17; and the often inaccurate J. Freely, *The Lost Messiah: in Search of Sabbatai Sevi* (London, 2001), pp. 14–15.
32. Moses Pinheiro of Smyrna, cited by Scholem, *Sabbatai Sevi*, p. 115.
33. Scholem, *Sabbatai Sevi*, pp. 126–7.
34. Freely, *Lost Messiah*, pp. 50, 61.
35. Scholem, *Sabbatai Sevi*, pp. 358–9; Freely, *Lost Messiah*, p. 76.
36. Scholem, *Sabbatai Sevi*, pp. 396–401; Freely, *Lost Messiah*, p. 85.
37. Scholem, *Sabbatai Sevi*, pp. 374–5; Freely, *Lost Messiah*, p. 84.
38. Letter to England, cited by Scholem, *Sabbatai Sevi*, p. 383.
39. Scholem, *Sabbatai Sevi*, p. 101.
40. F. Yates, *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London, 1972).
41. Freely, *Lost Messiah*, p. 93.
42. *Ibid.*, pp. 133–4.
43. Scholem, *Sabbatai Sevi*, pp. 673–86.
44. Haim Abulafia, *ibid.*, p. 359.
45. M. Greene, *A Shared World: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 NJ, 2000), pp. 62–7, 110–19.
46. *Ibid.*, p. 17.
47. *Ibid.*, p. 14; R. C.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 1951), pp. 121–2.
48.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122–5.
49. *Ibid.*, pp. 148–67.
50. *Ibid.*, pp. 181–4; Greene, *Shared World*, pp. 18, 56.

51. Greene, *Shared World*, p. 121.
52. *Ibid.*, pp. 122-40, 141-54; Greene, 'Beyond northern invasions'.
53. Greene, *Shared World*, p. 155.
54. *Ibid.*, pp. 175-81.
55. J. Dakhli, *Lingua franca: histoire d'une langue métisse en Méditerranée* (Arles, 2008).
56. J. Wansborough, *Lingua Franca in the Mediterranean* (Richmond, Surrey, 1996).
57. H. and R. Kahane and A. Tietze, *The Lingua Franca in the Levant: Turkish Nautical Terms of Italian and Greek Origin* (Urbana, IL, 1958).
58. G. Cifoletti, *La lingua franca mediterranea* (Quaderni patavini di linguistica, monografie, no. 5, Padua, 1989), p. 74;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que ou petit mauresque* (Marseilles, 1830), p. 6, repr. in Cifoletti, *Lingua franca*, pp. 72-84.
59. R. Davis, *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 White Slav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Barbary Coast and Italy, 1500-1800* (Basingstoke, 2003), pp. 25, 57, 114-15; A. Tinniswood, *Pirates of Barbary: Corsairs, Conquests and Captiv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Mediterranean* (London, 2010), pp. 58-61; Cifoletti, *Lingua franca*, p. 108.

## 七 对其他事件的推力 (1650 ~ 1780 年)

### 1

488

在整个公元 17 世纪，欧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并在地中海产生强烈反响。在 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天主教与新教发生冲突，对于在欧洲争权夺利的列强来说，教派身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648 年之后，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政治现实主义或者世俗的关怀。因此数年之后，英格兰的新教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还能够与西班牙国王进行合作，而英格兰人对荷兰人的戒心与疑虑导致双方在北海爆发了冲突。参与地中海事务的英格兰人身份也发生了变化：皇家舰队开始介入，英格兰人（1707 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之后，他们可被称为英国人或不列颠人了）想要在西地中海寻找永久基地——一开始是丹吉尔，然后是直布罗陀、梅诺卡，到 1800 年，已经扩张到马耳他。因此，从 1648 年到拿破仑战争的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标志是各国立场的频繁转变，如英国人先是联合西班牙人后又转向法国人，又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权引发的纷争分裂了欧洲，导致在地中海上对衰落的西班牙帝国之遗产的争夺。就在西班牙的困境越发明显时，奥斯曼人也悄悄地从其鼎盛期下滑：1683 年奥斯曼人对维也纳的包围没有获得成功，而在地中海，土耳其人的帆桨船队仍然是巨大的威胁，他们的柏柏尔盟友在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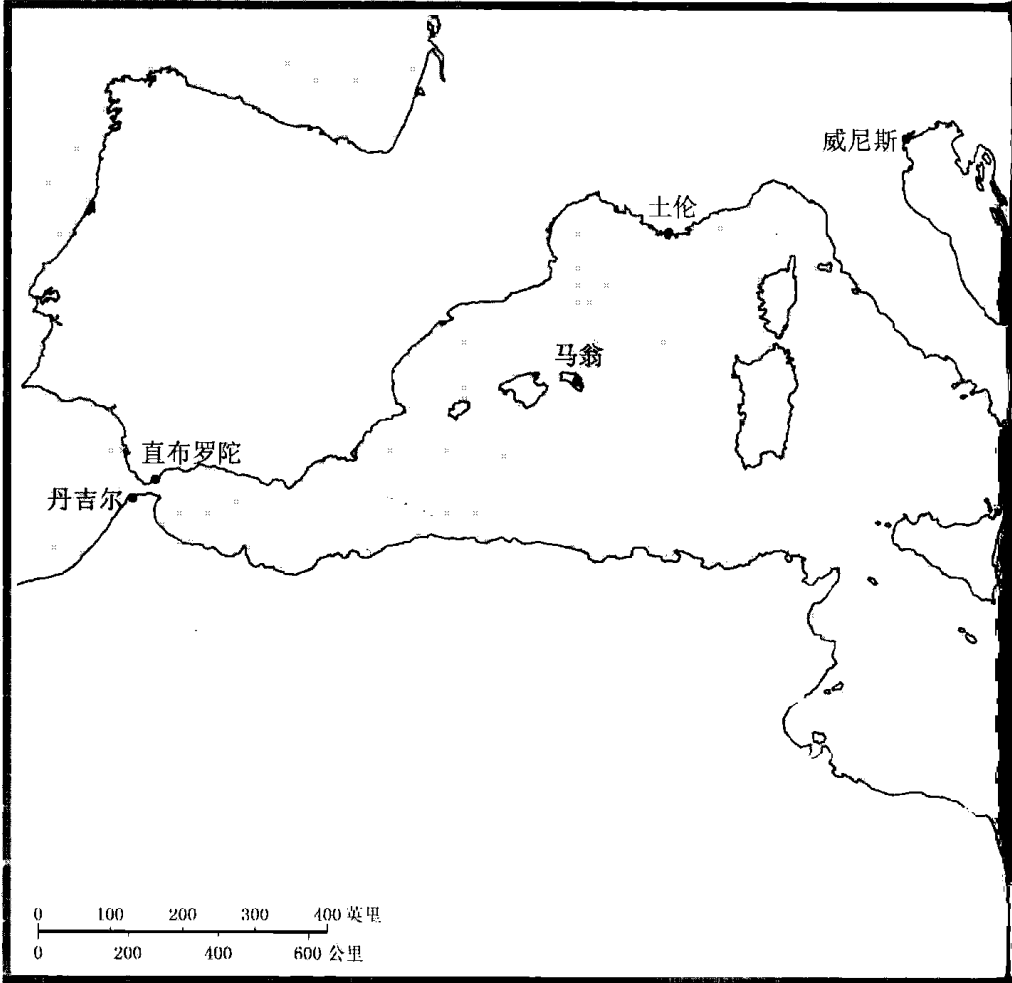


战爆发时能够提供支援的可靠力量。

即便如此，威尼斯人仍然能成功地在数十年内控制着莫里亚（即伯罗奔尼撒）半岛，而且有趣的是，他们才是侵略者。与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的表现相比，威尼斯人突然变得很489  
大胆，他们野心勃勃地想要将距离其航线最近的土耳其政权击溃。公元1685~1686年，威尼斯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两侧攻占并摧毁了土耳其人的许多要塞，并在1686年8月30日夺取纳夫普利翁。这只是威尼斯人自1687年9月攻占土耳其人在新海尔采格的基地，开始肃清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的前奏。1698年奥斯曼人同意让步，承认威尼斯人对达尔马提亚以及莫里亚的控制。但该协议并没有保证长期的和平，因为在1718年7月，威尼斯人的舰队在希腊西部的马塔潘角（Cape Matapan）遭遇一支庞大的土耳其舰队，丧失了对莫里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土耳其人意识到他们无论如何都占据不了上风，因而选择了撤退。之后威尼斯人与奥斯曼人签署的一份新协议保证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和平，这也是威尼斯人所需要的，毕竟这个时期该国的权势与影响力都在衰退。威尼斯人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保护黎凡特贸易，因为如今任何一个非地中海上的对手都不值得威尼斯人这么做；他们关心的是保护共和国在达尔马提亚的领地。但威尼斯共和国证明了自己并非强弩之末，土耳其人不得不寸土必争。<sup>1</sup>

## 2

在公元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更遥远的西部发生的事情也在地中海产生影响，导致了英格兰人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以





纳夫普利翁

及更早些时候的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冲突。1655年，英格兰人占领牙买加（Jamaica），这里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就一直由西班牙占据，由于英格兰联邦护国公（克伦威尔）对占领表示支持，但它威胁到了西班牙舰队的安全，因此原本对护国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人转而暴怒。战云笼罩，英格兰舰队向南驶向加的斯，以侦察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的海军的动向。他们有两点担心：一是西班牙国王会派遣海军解救牙买加，二是西班牙人的进攻会切断英格兰商船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如果可以的话，在地中海入口处建造一个英格兰基地将对战局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克伦威尔的探子蒙塔古（Montague）报告称：最佳选择是直布罗陀，但其防御十分坚固。于是，看似更合理的选择是在北非海岸地区寻找基地。然而，他认为倘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只要有一座堡垒以及“十二艘或十五艘灵活的护卫舰”的支援，就可以为英格兰人的贸易打开大门。可能选择占领的候选城市是此时由西班牙人控制的休达，以及葡萄牙人的指挥中心丹吉尔。但克伦威尔依然热衷于夺取直布罗陀，而后来的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力主派一艘装着独轮手推车和驻锄的船前往直布罗陀海峡，以切断直布罗陀巨岩与大陆间的联系；但这艘船被西班牙人截获。<sup>2</sup>

即使英格兰在查理二世（Charles II）统治下重新恢复了君主制，英格兰人也没放弃将他们的旗帜插到地中海入口处的念头。几乎立刻出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公元1661年，葡萄牙再次摆脱西班牙而独立，英格兰与葡萄牙之间的古老盟约得到延续，这不仅仅为英格兰带来了那位长期忍受痛苦的查理的王后——布拉冈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也带来了

她丰厚的嫁妆，使英格兰获得了孟买（Bombay）和丹吉尔。如此一来，英格兰人不费一枪一弹地获得了通往地中海的基地，虽然丹吉尔的葡萄牙总督对于移交丹吉尔的命令极为气恼，认为这么做是对其从1471年以来就控制着这里的先辈们的不敬。<sup>3</sup> 关注此事的外国人也相当吃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致函驻伦敦的法国大使，抱怨道：英格兰人正打算控制直布罗陀海峡——他觉得，英格兰人可能会像丹麦人在波罗的海入口处征税一样，也向途经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征税。<sup>4</sup>

492

对英格兰人来说，他们在看到丹吉尔破败的外观时颇为失望，还为每日的正常供水发愁，塞缪尔·佩皮斯报告称：“这个时候除了泉堡（Fountain Fort）之外没有其他水源，如果摩尔人知道这个情况，就可能掐断我们的水源。”<sup>5</sup> 他们原本以为这里将会是查理二世王冠上一颗新的宝石。结果，这座城市却几乎是一座空城，需要重新移入人口。第一种解决方法是仿效数个世纪以前葡萄牙人夺取附近的休达时的做法，将犯人流放到这里；第二种方法更为奇怪，将三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口转移到这里。英格兰人本来的设想是，得到丹吉尔后，既能与大西洋的摩洛哥进行贸易，也可与地中海的柏柏尔人诸国经商。<sup>6</sup> 这些目标如果能达到，将对发展与丹吉尔附近地区的统治者的友好关系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位统治者就是阿卜杜拉·盖兰（Abdallah Ghaylan），英格兰人称之为盖兰德（Gayland）；他统治着平原地区的四个阿拉伯部落以及山区的十八个柏柏尔部落。据说，他身形肥胖、生性狡诈、好色贪婪，“谨慎又放纵：性格矛盾”。<sup>7</sup> 他对英格兰人的态度在友好或者至少给予友好承诺与敌对之间不断摇摆；例如，他拒绝了英格兰人从丹吉尔郊区收集柴薪的要求。他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

度使他从英格兰总督那里赢得了大量特权，因为后者不想在这座新殖民城市还没有好好稳固时就遭遇安全问题。最后，盖兰的要求愈发离谱（他要求得到五十桶火药以及英格兰船只的使用权），不久之后，摩洛哥军队因偷牛而与英格兰士兵发生小规模冲突：冲突当中有 600 多名英格兰士兵被杀，其中还包括总督蒂维厄特勋爵（Lord Teviot），随后风向突变，盖兰又再次与英格兰人和好。<sup>8</sup>

498 英格兰人治下的丹吉尔发展成一座欣欣向荣的港口城市。第一任总督所见到的空旷城市很快被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填满：除了 1200 ~ 2000 名守卫士兵外，还有大约 600 名平民，包括不同时期来到这里的荷兰商人、葡萄牙修士、穆斯林奴隶以及来自欧洲和北非的犹太人。由于犹太人积极地与穆斯林进行贸易，因此英国人对他们心存疑虑。塞缪尔·佩皮斯的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与他的妻子为躲避宗教裁判所，从西班牙逃了过来”；英格兰守军的首领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咒骂道，‘这个该死的家伙，就应该被烧死！’结果他们又被送到宗教裁判所，并被火刑处死”。<sup>9</sup>其他来访者则受到了更热情的欢迎。佩皮斯提道，土耳其商人或亚美尼亚商人从遥远的士麦那来到这里，他们把货物放在沙滩上“再运到非斯销售”。<sup>10</sup>对于寻找安全场所的商人们来说，丹吉尔周围新建的雄伟的防御工事能够给他们巨大的鼓舞；这里的防波堤也很壮观，尽管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拒绝了设计此防波堤的邀请。<sup>11</sup>

在英格兰，对于丹吉尔的价值，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当公元 1665 年接任蒂维厄特勋爵的总督贝拉西塞勋爵（Lord Belaysse）抵达后，他特别强调了这座城市的价值：

国王陛下从这座城市获得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领地所带来的价值，如果他能亲临此地，就会欣赏到以下景象：通向西班牙的海峡，往来的船只，非洲富饶的山脉，散发出芳香的鲜花，罕见的水果与蔬菜，美妙的音乐、肉食与葡萄酒，等等，这些似乎在这里是应有尽有，或者即将会有。<sup>12</sup>

这是很乐观的期待。此时与荷兰人的战争已初现端倪；荷兰人打算组建一支地中海舰队，英格兰人的还击则是加强其与突尼斯及的黎波里的政治与商业联系。于是，荷兰人摧毁了向丹吉尔运送必需物资的小舰队，数月后，也就是1666年初，路易十四决定支持加尔文派的荷兰人对抗英格兰人。他的大臣柯尔贝尔（Colbert）一直致力于推动法国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此时直接负责派遣舰船在地中海抗击英格兰人。但英格兰的“丹吉人”（Tangerine）海盗在与法国人和荷兰人的对抗中相当成功，他们把所缴获的船只与货物带回丹吉尔出售。<sup>13</sup>这座殖民城市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在许多方面，最严重问题在于伦敦，而非直布罗陀海峡。经营丹吉尔的代价对于一个同时在数个战场上陷入冲突的英格兰政府来说，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只要丹吉尔主动投入与荷兰人的战争，英格兰在此地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此外，同样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丹吉尔是英格兰人与柏柏尔统治者，特别是阿尔及尔的柏柏尔统治者合作，或者合力对抗那些不遵守与英格兰所签协议的柏柏尔海盗的一处有效的基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英格兰需要在地中海的门户地带建立一处基地，特别是在与盖兰这个立场模糊的人为邻的时期，这迫使英格兰人从别处运来武器和人员，以守卫丹吉尔的生活物资。

上述原因使得查理二世在公元 1683 年重新考虑他的政策。到目前为止，他在财政上还需依赖其老对手路易十四，而路易十四对于英格兰的殖民地一直抱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查理二世无力再对摩洛哥人开战。于是，查理二世决定从自己的私人收入中拿钱来支付丹吉尔的防御费用，这笔费用每年为 7 万英镑，总共 160 万英镑，但他知道不能无限期地这么撑下去。<sup>14</sup>有人提出把这座城市还给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以及许多英格兰商人认为丹吉尔的价值在于对抗海盗），或者将它转交查理二世的新盟友——法国人（法国人的舰队已经发展为极为庞大，1683 年时已拥有 276 艘战舰）。但到最后，1683 年，被派往丹吉尔的最后一位总督达特茅斯勋爵（Lord Dartmouth）得到的明确指令是：夷平这座城市，摧毁防波堤。因此，1684 年，英格兰人最终撤离丹吉尔，留下了一堆废墟。<sup>15</sup>但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念头一直都在。查理二世带着浓浓的遗憾放弃了丹吉尔，此时距离英格兰得到这座地中海城市仅仅过去了二十年，如今英国的旗帜还在其上飘扬。

### 3

英格兰人一直想在地中海入口处获得基地的念头最终成为现实，然而，得到直布罗陀却不是英格兰人周密计划的结果。按照约翰·希利爵士的著名说法，英格兰人是“一不留神地”得到了直布罗陀。显然，公元 17 世纪 90 年代的西班牙王位继承危机将整个西班牙撕裂了。西班牙的最后一位哈布斯堡国王是查理二世（1700 年去世），他没有子嗣，据说还是个白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近亲婚姻对他们的健康带来了损害。在遗嘱中，查理二世指定路易十四的孙子，安



茹（Anjou）公爵菲利普·德·波旁（Philip de Bourbon）为其继承人；毫不奇怪的是，法国的邻国均认为，倘若一位法国王子继承了西班牙在欧洲、地中海以及美洲的庞大帝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会使法国成为比西班牙最鼎盛时期还要强大的世界强国。另一个选择是延续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世系，从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中选择一人继承西班牙王位。由于英格兰国王现在是荷兰人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因此荷兰人与英格兰人的利益逐渐趋同，尽管英格兰人认为自己“对商业利益与航海利益以外的事情毫无兴趣”，且荷兰人的看法也差不了太多；但如果一位法国王子成为西班牙国王，那么“只要这位来自法国的国王感觉时候到了，英格兰人与荷兰人的地中海贸易就会完全丧失，因为这位国王将在法国的帮助或支持下，成为整个海峡、地中海上所有地区和港口的主人”。<sup>16</sup>威廉国王想得更多，他说：

495

至于地中海贸易，必须在北非海岸获得港口；例如休达或奥兰，以及西班牙海岸的某些港口，例如梅诺卡岛的马翁，据说这是一处非常优良的港口；也许我们应该获得整座岛屿以确保得到这个港口。

但路易十四固执地认为，诸如休达、奥兰以及梅诺卡这样的西班牙领地绝对不能被英格兰人占据，他们对西班牙的遗产无权提出任何要求。可以确定的是，梅诺卡岛不属于伊比利亚半岛，但“它会使他们成为地中海所有商业活动的主人”，除荷兰人之外的“所有其他民族都会被排除在外”。英格兰人或荷兰人占据马翁会削弱土伦作为法国海军指挥中心的战略价值，

而且，由于柯尔贝尔的去世，当法国海军建设不似以往那样积极有效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尤其重要。<sup>17</sup>

496 英格兰人认为波旁家族的安茹公爵菲利普以及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三世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公元 1701 ~ 1714 年），是其获得利益的机遇：可以借机去征服加勒比群岛，战胜西班牙舰队的时机已成熟。英格兰人还在犹豫是进攻加的斯还是直布罗陀，但其终极目的是介入西班牙的大西洋交通，这条交通线的重要性不亚于不断被提及的对地中海上英格兰贸易的保护。加的斯是一座更大、更富庶的城市；直布罗陀比较小，但其战略位置更为诱人。<sup>18</sup> 1704 年 7 月，在英格兰舰队司令鲁克（Rooke）的旗舰上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决定：由达姆斯塔特 - 黑森（Darmstadt-Hesse）的乔治王子指挥军队进攻直布罗陀。其目的不是为英格兰夺取直布罗陀，“而是迫使其服从西班牙的国王”。<sup>19</sup> 当然，他们指的只是其中一位西班牙国王，也就是奥地利推出的候选人。在一封浮夸的国王来信中，直布罗陀的居民被要求接受查理三世作为他们的国王，但他们却有礼貌但又固执地认为：他们是法国的君主候选人“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忠实与虔诚的子民”，最后还祝黑森的乔治长命百岁。直布罗陀凭借它的城墙以及优质的火枪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他们防守人员短缺，入侵者人多势众。后来，入侵者成功地俘虏了在巨岩南端的欧罗巴圣母礼拜堂（shrine of Our Lady of Europa）内避难的妇女和儿童，于是直布罗陀的市议会与军事总督一致同意：“对于尊贵的陛下而言，我们接受条件投降要比毫无目的的坚守更令他欣慰，而这也是这座城市及其附庸的巨大损失。”<sup>20</sup> 这里的“陛下”仍然指菲利普，而非查理。因此，直布罗陀投降，并得到保证：

征服者不会强制推行新教——毕竟，他们是以一位天主教国王的名义夺取了这座城市。当地居民撤退到距此不远的内陆的圣罗克（San Roque），那里至今仍被认为是直布罗陀原住民的故乡。<sup>21</sup>

关于由谁来管理巨岩的讨论，一直以来的明确观点是，英格兰军队以正义的西班牙国王之名完成了此次征服：“英格兰不会声称她是为自己征服了这里。”<sup>22</sup>黑森希望把直布罗陀作为进入西班牙的大门：从直布罗陀沿海路对加泰罗尼亚发动攻击的计划得以通过，国王查理三世也亲临直布罗陀具体落实该计划。然而，事实却略有讽刺，现在他的确拥有第一块西班牙的领地，但不久之后，直布罗陀却永远地被英格兰女王所占据。现在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直布罗陀“无法保护一支舰队免受另一支更强劲舰队的攻击，而只能为单艘舰艇或四五艘战舰提供安全庇护，因此在这方面它对我们的贸易有着巨大的好处”。<sup>23</sup>英格兰人开始注意到，拥有直布罗陀就开启了控制西地中海的更大可能。驻里斯本的英格兰大使梅休因（Methuen）警告称，倘若查理三世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斗争中失利，“英格兰也绝对不能放弃直布罗陀，因为这里永远是我们西班牙的商业与特权的保证”。英格兰人在宣传时称颂直布罗陀的价值，“它位于海峡入口处，正处于我们商业活动的最中心，控制着各地的商业贸易，我们的巡航船从这里出去震慑法国东部与加的斯之间的所有交易”。<sup>24</sup>夸张才是王道：事实上，直布罗陀只是一座小小的、废弃的城市，它的船坞还没有建好。

497

公元1711年，神圣罗马皇帝也就是查理三世的哥哥约瑟夫一世（Joseph I）去世，权力平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查

理有可能被选为皇帝，甚至能够从哈布斯堡家族的东部领地调集更多资源投入西班牙战争。但是，没有人乐见查理五世皇帝的双重帝国再次出现。要让英国政府接受菲利普成为西班牙国王并不困难，只要仍旧把西班牙最南端这个不太重要的海峡（从巴黎的角度看）交由英国人控制。双方的争吵没完没了且非常复杂。偶尔，法国人会站在菲利普五世的立场上，反对任何将西班牙“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出让的想法；后来就开始争论出让直布罗陀究竟意味着什么——最为简单的观点是：它仅仅是个城堡、市镇和港口，周围没有土地，甚至没有岩石。<sup>25</sup>问题是：直布罗陀究竟是什么？

公元1713年4月11日签署的《乌得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意欲解决上述问题。该条约的第十条规定：英国人承认菲利普五世为西班牙国王，条件是：

割让直布罗陀的市镇、城堡，以及港口、防御工事、堡垒以及附属堡垒的全部、完整的所有权，他（西班牙国王）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永远放弃以上所列举之物的所有权利。

天主教徒在直布罗陀可自由信教；但基于菲利普国王的请求，英国女王表示同意，犹太人和摩尔人不得生活在直布罗陀，不过来自摩洛哥的商船可在此停泊。<sup>26</sup>对于这座城市的新统治者来说，该禁令不过是个易被打破的承诺，在1704年英国人夺取直布罗陀到1713年条约签订的短短数年中，摩洛哥的犹太掮客已经来到此处。他们通过向海军提供食物和装备获得了丰厚利润。即便如此，仍需经过数十年的经营，

直布罗陀的潜力才能真正实现并释放出来：巨岩地区没有足够的补给品，也缺乏修补舰船的设备，人们对此怨声载道。在18世纪时，除了犹太人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热那亚人来到这里。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出现了，里面充斥着掮客、小贩、船上的杂货商；但直布罗陀由将近五千名海员构成的流动人口统治，许多平民所生活的区域只能用肮脏来形容。<sup>27</sup>

#### 4

《乌得勒支和约》还将西班牙的另一块领地梅诺卡转让给大不列颠。在公元17世纪70年代，与柏柏尔海盗进行小规模战斗的英国舰船得到西班牙人的允许，把梅诺卡作为储粮站，但这里的设施很差——没有大型仓库，有特别多的老鼠，不过“这里的面包、葡萄酒、母鸡、鸡蛋等所有东西都很便宜，八里亚尔就可以买一只羊”。<sup>28</sup>1708年，英国人就占据了该岛，但其盟友查理三世不愿意让出宗主权；当英国人决定转而与菲利普五世谈条件时，虽然这对法国不利，这位波旁家族的男人还是同意出让该岛，不过答应之后他就立即后悔了。<sup>29</sup>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认识到梅诺卡的重要性，直布罗陀可以充当该岛的中间站——在地中海建立英国人的永久基地的伟大战略开始形成。<sup>30</sup>但眼前的问题是该岛资源匮乏。军队驻扎于此时，梅诺卡无法供养所有人，因为当地出产的谷物仅能满足当地居民自己的需要，当地牲畜的肉也比较粗糙。梅诺卡岛上有些地方寸草不生，所以木材供给也无处可寻。甚至为军队安排住处都很困难。<sup>31</sup>在炎热、干旱的梅诺卡服役被看作一种磨炼。然而，岛上的马翁港却是地中海最好的天然港口：它有三英里长，有些地方有半英里宽；

其人口约两百米宽，敌船很难驶入港口进行侵扰。此外，入口处还有坚固的圣菲利普堡提供保护。这座海港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的战略价值，它使英国拥有了一个距离法国南部很近的基地：由此向东北二百二十海里处就是土伦的法国舰队。身在西班牙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斯坦厄普（Stanhope）写道：  
499 “英国永远不能放弃这座岛屿，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时期，它都能够控制地中海。”他还强调此处对将法国人牵制在海湾内有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人控制敦刻尔克（Dunkirk）是为了控制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人一样，为了制服地中海上的法国人，他们就需要控制梅诺卡岛。<sup>32</sup>

英国人开始琢磨，梅诺卡是否还有其他未发现的潜能。凭借这样的天然良港，梅诺卡岛将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如果商业发展起来，梅诺卡人会变得“富庶、繁荣”。<sup>33</sup>理查德·凯恩（Richard Kane）是岛上副总督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他主持进行了一系列大型工程，创造了新的繁荣景象。沼泽排干了，变成了果园 [直到今天，岛上仍然种植着一种名叫“奎恩”（*quen*）的梅子，即“凯恩”之意]，他从北非引入了种牛，希望改善岛上牲畜的体形与品质。凯恩具有公元18世纪英国改革者的品质，这些改革者在凯恩的家乡引领了农业革命。到1719年时，连接马翁与休达德亚的道路竣工——这项工程历时两年，今天仍然被称为“凯恩先生大道”（*Camí d'En Kane*）。<sup>34</sup>马翁被定为新首府，取代了西海岸的休达德亚（古代的亚摩纳）。这加剧了梅诺卡当地居民，特别是岛上的贵族们与英国当局间的分裂。在英国当局看来，岛民们忘恩负义且丝毫不配合：1777年，岛上的副总督穆雷（Murray）致信岛上的治安官们（*jurats*），询问他们是否盼着宗教裁判所或柏柏尔

海盗重新出现，如今英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上述两者的侵扰，而且英国人还将他们从过去的贫穷中拯救出来。<sup>35</sup> 马翁成为英国努力改善岛上状况的焦点：新的船坞被建造起来，平直的道路被修造起来，这种道路至今依旧是该市的特点。英国建筑的印迹仍可从房屋的框格窗看出，它让人联想到英格兰南部的沿海城镇，而非西班牙的城镇。

所有这些英明的计划本身无法推动梅诺卡成为地中海一流商港之一；这里仍然主要是海军基地。英法（以及英荷）之间的竞争通过贸易以及战争来解决，而且，虽然英国的地中海贸易成功地维持下来，但在公元 18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人才是市场的领袖。法国的织物生产商更好地满足了黎凡特市场的需求，他们所提供的色彩鲜亮明快的布料更符合土耳其人的品位以及当地气候。英国与土耳其的贸易活动在前一个世纪获得了成功，但此时大幅收缩，在 1700 年到 1774 年，其出口额从 23.3 万英镑降至 7.9 万英镑。在 18 世纪，法国人通过马赛而在与士麦那交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士麦那也成为奥斯曼人与西方贸易的主要中心，不过士麦那还与叙利亚、塞浦路斯、亚历山大、萨洛尼卡、柏柏尔人诸国以及君士坦丁堡有着繁忙的商业往来（也要考虑到偶尔的中断，例如 1720 年马赛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这段时间里，英国与地中海的贸易在总体上有所增长，但它与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贸易增速更快。此外，与地中海国家的纷争，无论是与法国还是与西班牙，都会阻碍英国商业的发展。他们所推行的各种绝妙政策——使梅诺卡成为西地中海的粮仓，或发展本地的棉纺业，或建造盐田——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sup>36</sup>

500

鼓励商业的政策还对梅诺卡的社会产生了其他重要影响。

在英国人占领之初，特意划出一片地区供新教徒、犹太人和希腊人生活。英国人承诺保护天主教会的权利，不过始终有挥之不去的疑虑，认为天主教一定不会忠于英国国王（这种说法被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大量天主教士兵证明是错的）。然而，天主教当局却怨恨英国人，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诸如宗教裁判所这样的古老制度在英国人治下的土地上没有立足之地。公元1715年以及1721年，总督凯恩颁布法令，将外来的天主教牧师驱逐，还对教会法庭的权限加以限制。最后，凯恩决定：是时候在梅诺卡岛上建造英格兰国教的教堂了，这将是（有人明确指出）在地中海建造的第一座圣公会教堂。英国人从未像在直布罗陀所做的那样，承诺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梅诺卡，到1781年时，梅诺卡岛上已经形成了500人的犹太社区，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犹太会堂。随着数百名希腊人的到来，梅诺卡岛上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进一步强化，尽管这些希腊人来自附近地区——科西嘉岛上一个由希腊难民组成的社区。希腊人获得了建造一座教堂的权利，但对其抱有敌意的天主教徒却拒绝向他们出售建造教堂所用的土地，即便这些希腊人的宗教领袖属于东仪天主教会——他们承认教宗权威，只不过遵循的是希腊人的教仪。经历了数个世纪严厉的宗教裁判后，梅诺卡本地人已经难以忍受不同的宗教信仰，而英国人则致力于宗教信仰自由，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新的矛盾。<sup>37</sup>

501

梅诺卡的精英们分属不同的社区（*universitats*），他们仍然认为英国人是道德败坏的入侵者。梅诺卡的贵族规定女儿们不能与英国军官有任何联系，一些军官极其恶劣地习惯于去女修道院勾引漂亮的修女。公元1749年，三名追求浪漫的修女从位于休达德亚的女修道院逃离，藏身于一位英国军官的住处。



她们改宗英国圣公会，并嫁给了英国军官，这件事在本地官员看来是巨大的丑闻，而总督只是发布一道指令，要求他的士兵不能结交岛上的修女。<sup>38</sup>在其他方面，殖民当局与海岛原住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受到限制。然而，英国人的占领时间相当长，足以留下他们的印迹（从伦敦引入的一种外来品便是印刷厂）。梅诺卡的加泰罗尼亚人在船坞中学到些新词：表示“红木”的 *móguini*，表示“螺丝钉”的 *escrú*，表示“统治者”的 *rul* 等。甚至梅诺卡人的饮食也迎合了英国人的口味，如肉汁 (*grevi*) 和用伦敦的杜松子酒酿成的杜松子味的烈酒。梅诺卡儿童们喊的口号“*faitim!*”源于英语的“和他斗！”<sup>39</sup>

英国人并没有在梅诺卡的防卫上无所作为。圣菲利普堡是大英帝国中最坚固的堡垒之一，它有可供人们藏身的深入地下的隧道网络，隧道里还能使存储的物品保持干燥，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伦敦政府才能解决：兵力短缺。<sup>40</sup>公元 1756 年，英国海军将领宾 (Byng) 意识到梅诺卡难以抵挡法国人的入侵，因为兵力短缺且没有足够的海军支援，英国人的统治地位（以及他本人）危在旦夕。后来对英国人海军将领宾的审判与处决，使得法国人占领梅诺卡这一事件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七年战争不仅仅发生在地中海，也发生在俄亥俄河畔 (Ohio)，在那里，法国人想要建造一道防线，从南部的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 延伸到北部的五大湖；这样做就可以将北美的十三块英国殖民地限制在北美的东海岸。法国人还力求将地中海的英国人限制住，使其注意力转向土伦附近海域，也就是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所在地。伦敦收到了一些报告称：法国人那里配备了十六艘或十七艘战舰。卡塔赫纳的英国领事似乎知道对方究竟在做什么：

我收到的情报称：有 100 个营正全力开赴鲁西永，这些军队的目标是梅诺卡，他们将要乘坐如今停泊在马赛商船抵达梅诺卡，土伦的所有战船负责护航。<sup>41</sup>

起初，地中海只是七年战争的次要舞台，但局势很快变得明朗起来，英国人希望把梅诺卡作为基地，以干扰法国人的黎凡特贸易。

英国政府部分是由于缺乏资金，无力回击法国人的威胁。海军上校宾是一位极有能力的指挥官，但当他受命指挥一支只有 10 艘战舰且总人数不足 722 人的小舰队时，他就已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其他军舰被派往大西洋执行任务，以致他的舰队延误了时日。宾的任务是：若梅诺卡被法国人占领，他就夺回来；若尚未受到攻击，他就需要封锁土伦港。<sup>42</sup>当他在公元 1756 年 4 月刚刚离开朴次茅斯（Portsmouth）前往地中海时，法国舰队就已经登陆梅诺卡，其指挥官包括海军指挥官德·加利索尼埃尔（Galissonnière）侯爵和陆军指挥官德·黎塞留（de Richelieu）公爵。这位黎塞留是曾为路易十三效力的那位才华横溢但寡廉鲜耻的黎塞留的侄子；加利索尼埃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海军人才，不过其晋升速度较慢（可能因为他个子矮且驼背）。加利索尼埃尔保证法国舰队拥有了可完成这项任务的规模：他有 163 艘运输船，可运送 1.5 万名士兵。战列舰中包括“闪电号”（*Foudroyant*），该船装备着 84 门大炮，英国人的小舰队（总共 14 艘船）中没有可与之匹敌者，即使其旗舰“拉米伊号”（*Ramillies*）也做不到。<sup>43</sup>法国人毫不费力地在休达德亚登陆并赢得了梅诺卡人的支持，后者一直渴望着摆脱信奉新教的英

国人的统治。岛上有副总督凯恩修建的优质道路，法国士兵沿着这条路向东来到马翁，不过英国人派出一队由犹太人和希腊人构成的工兵将道路表面破坏，给带着重炮行军的法国人造成很大困难。即便如此，数日之后，英国军队手中就只剩下圣菲利普堡了。<sup>44</sup>

因此，当公元 1756 年 5 月中旬宾率军抵达巴利阿里群岛附近海域时，他的任务就是驰援圣菲利普堡。在与高级军官们召开的战前会议上，宾大致列出决定其小舰队战略部署的关键问题：有没有可能攻击法国舰队从而解救梅诺卡？显然不行。即便这片海域没有法国舰队，他们能从法国人手中夺取梅诺卡岛吗？结果依然是不行。但如果他们失败了，直布罗陀会不会危险？会的。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一致认为，舰队应该立即前往直布罗陀。”<sup>45</sup>只剩副总督单枪匹马地守卫圣菲利普堡，他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刻。而宾上校，则成了英国政府拖沓、吝啬的替罪羊，因为英国政府必须向愤怒的民众解释为什么英国在地中海的属地会落入其宿敌之手。宾被送上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有力地回击了关于他应为战场失利负责的指控，然而，1757 年 3 月 14 日，他还是被判有罪并被处决。梅诺卡的陷落当然不是他的错。<sup>46</sup>那些想帮他说话的人中包括其英勇的对手德·黎塞留公爵以及与公爵通信的伏尔泰，在其名著《老实人》（*Candide*）中，他写道，老实人来到朴次茅斯港，看到一位英国海军上校被处决：“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不时地杀死一位海军上校是件好事儿，这样可以激励其他人。”

503

法国人对梅诺卡岛的控制只持续了数年；英法和约使此岛于 1763 ~ 1782 年回到英国人手中，后来经过西班牙的短期统治后，在 1798 ~ 1802 年，它又回到英国人手中，在与拿破仑

的战斗中，这座岛屿又有了新的战略意义。然而，虽然英国人意识到这座基地在西地中海拥有的战略优势，但他们在梅诺卡始终没能高枕无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发现这座岛屿干燥且荒凉，虽然它邻近法国、西班牙和非洲，但这里却是偏僻荒凉之地（许多世纪之前，塞维鲁主教亦曾如此抱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梅诺卡岛当作诱饵，把它让渡给可能成为盟友的国家，从而与另一个地中海强国建立牢固的友谊。<sup>47</sup>这些讨论发生在1780年，在英俄之间展开。为了解释俄国如何突然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有必要后退数年时间重新梳理一下历史。

## 注 释

1. R. C.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 1951), pp. 194-211, 236, 264-70.
2. G.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 1974), pp. 142-6.
3. E. Routh, *Tangier: England's Lost Atlantic Outpost 1661-1684* (London, 1912), p. 10; A. Tinniswood, *Pirates of Barbary: Corsairs, Conquests and Captiv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Mediterranean* (London, 2010), p. 204.
4. Routh, *Tangier*, p. 27.
5. S. Pepys, *The Tangier Papers of Samuel Pepys*, ed. E. Chappell (Navy Records Society, vol. 73, London, 1935), p. 88; A. Smithers, *The Tangier Campaign: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Army* (Stroud, 2003), pp. 31-2.
6. Routh, *Tangier*, pp. 21, 28.
7. Cited in *ibid.*, pp. 23-4; Bromley in J. Baltharpe, *The Straights Voyage or St David's Poem*, ed. J. S. Bromley (Luttrell Society, Oxford, 1959), pp. xxvii-viii.
8. Routh, *Tangier*, pp. 66-9; Smithers, *Tangier Campaign*, pp. 49-53.
9. Pepys, *Tangier Papers*, p. 97; Routh, *Tangier*, pp. 272-6.
10. Pepys, *Tangier Papers*, p. 41.
11. Tinniswood, *Pirates of Barbary*, pp. 211-15.
12. Routh, *Tangier*, p. 81; also Sir Henry Sheres's opinion in Tinniswood, *Pirates of Barbary*, p. 205.
13. Routh, *Tangier*, pp. 82-6.

14. Pepys, *Tangier Papers*, p. 77;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p. 150; Routh, *Tangier*, pp. 242–4.
15. Pepys, *Tangier Papers*, p. 65; Routh, *Tangier*, pp. 247–66; also plate facing p. 266; Smithers, *Tangier Campaign*, pp. 142–9; Tinniswood, *Pirates of Barbary*, pp. 242–53.
16. Earl of Portland, cited by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pp. 157–8; M. Alexander, *Gibraltar: Conquered by No Enemy* (Stroud, 2008), p. 45.
17.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pp. 158–9.
18. S. Conn, *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CT, 1942), p. 5.
19.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pp. 167–9, and appendix A, pp. 475–7; M. Harvey, *Gibraltar: a History* (2nd edn, Staplehurst, Kent, 2000), p. 65; S. Constantin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the Making of Modern Gibraltar since 1704* (Manchester, 2009), p. 12.
20. Cited in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p. 174 from council minutes.
21. *Ibid.*, pp. 176–7.
22. *Ibid.*, pp. 183, 195.
23. Cited in Conn, *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p. 6.
24. Passages cited in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pp. 204–5.
25. *Ibid.*, p. 219.
26. Utrecht clauses, *ibid.*, pp. 222–3; Conn, *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pp. 18–22, 25–6.
27. Constantin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pp. 14–34.
28. Baltharpe, *Straights Voyage*, pp. xxv, 61.
29. D. Gregory, *Minorca, the Illusory Priz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s of Minorca between 1708 and 1802* (Rutherford, NJ, 1990), pp. 206–7; Conn, *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pp. 28–111; M. Mata, *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of Menorca* (Barcelona, 1984), pp. 129–60.
30. Gregory, *Minorca*, p. 26.
31. J. Sloss, *A Small Affair: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Menorca during the Seven Years War* (Tetbury, 2000), pp. 40–43; Gregory, *Minorca*, pp. 35–6, 144–6.
32. Cited by Gregory, *Minorca*, p. 26.
33. Mata, *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 160.
34. *Ibid.*, p. 163; J. Sloss, *Richard Kane Governor of Minorca* (Tetbury, 1995), p. 224; Gregory, *Minorca*, pp. 59–60, 151.
35. Gregory, *Minorca*, pp. 90, 156; Mata, *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 164.
36. E. Frangakis-Syrett, *The Commerce of Smyr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00–1820* (Athens, 1992), pp. 119–21, 131; Gregory, *Minorca*, pp. 144, 149–55, and p. 247, n. 1, summarizing figures from R. Davis,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Shipping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wton Abbot, 1962), p. 256; R.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in W. Minchinton (ed.), *The Growth of English Overseas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69), p. 108 and table opposite p. 118; Gregory, *Minorca*, pp. 144, 149-55.
37. Sloss, *Richard Kane*, p. 210; Gregory, *Minorca*, pp. 71, 119, 122, 132-4.
38. Gregory, *Minorca*, pp. 126-7; Mata, *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 164.
39. Mata, *Conquests and Reconquests*, pp. 237-8.
40. Sloss, *Small Affair*, pp. 2-4.
41. Mr Consul Banks, in H. W. Richmond (ed.), *Papers Relating to the Loss of Minorca in 1756* (Navy Records Society, London, 1913), vol. 42, p. 34, and see also pp. 38, 50; B. Tunstall, *Admiral Byng and the Loss of Minorca* (London, 1928), pp. 22, 32, 39; D. Pope, *At 12 Mr Byng Was Shot* (London, 1962), pp. 36, 38 and p. 315, n. 6.
42. Pope, *At 12 Mr Byng Was Shot*, pp. 59-60, 65.
43. Tunstall, *Admiral Byng*, p. 103.
44. Sloss, *Small Affair*, pp. 7-16.
45. Text in Pope, *At 12 Mr Byng Was Shot*, appendix v, p. 311; Tunstall, *Admiral Byng*, pp. 137-9.
46. Pope, *At 12 Mr Byng Was Shot*, pp. 294-302.
47. I. de Madariaga, *Britain, 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 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62), pp. 239-63, 295-300.

# 八 在俄罗斯人的视角下 (1760 ~ 1805 年)

## 1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引起了俄国沙皇对地中海的兴趣。从公元 17 世纪末开始，俄国的势力向南扩张到亚速海（Azov）与高加索山脉（Caucasus）。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从波斯帝国割走部分领土，结果，统治克里米亚的奥斯曼人感受到了威胁。<sup>1</sup>此时，俄罗斯人因与瑞典人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而无暇南顾，但彼得仍然想办法寻找通往黑海的自由路径。这些计划带有彼得所立志改变的老俄国的特征，同时也具有他所立志建立的、以新技术立国的俄国的特征。当彼得在波罗的海建立新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时，传统的观念并没有消逝：沙皇是拜占庭皇帝在宗教上，甚至政治上的继承人，而俄国是“第三罗马”。此外，这个时候的俄罗斯人已经拥有了成百上千艘战舰，足以挑战黑海上自负的土耳其人，不过，其舰队还无法发动一场全面海战。虽然彼得大帝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历，曾化名彼得·米哈伊洛维奇（Pyotr Mikhailovich）访问了西欧的造船厂，但俄罗斯人建造的舰船仍很糟糕。总的说来，这支舰队“纪律松弛、训练无序、士气涣散，没有操作经验，管理和装备都很混乱”；时人评论称“俄国海军管理的糟糕程度堪称第一”，因为帝国海军仓库中的大麻、焦油和钉子已经被耗尽。俄罗斯人开始雇用苏格兰海军将领来帮他们建







505 立现代指挥体系，他们还从英国购买海军所需物资；此外，英国与俄国间的商贸联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当18世纪英国的黎凡特贸易渐趋衰退时，英俄之间的商贸关系在整个18世纪始终处于繁荣状态：在1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每年驶往黎凡特的英国商船最多不超过72艘，而驶向俄国的有700多艘。<sup>2</sup>由于北海、波罗的海与大西洋经济联系的持续增强，因此相对而言，地中海已经逐渐落后。

由此一来，毫不奇怪的是，将俄国海军带入地中海水域的不是地中海的局势，更不是黑海的事件。在遥远的东北欧，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帮助她推举的候选人夺取波兰王位；在追捕反对新王一派势力的过程中闯进奥斯曼的疆域，于是公元1768年，他们发动了俄土战争。<sup>3</sup>1766年，英国人已经与叶卡捷琳娜缔结商业协议，并坚信在谨慎的操作下，女沙皇叶卡捷琳娜能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英国政府认为：俄国海上力量的扩张会增强它对英国的依赖，因为其扩张只有通过英国人的帮助才能实现。英国政府还相信，如果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胜利没有阻止法国人的话，那么法国商人最终也会进入黑海。英国人的政治意识当中首次出现了代理人战争的概念，即俄国的舰队将肃清地中海上那些威胁英国利益的势力。路易十五（Louis XV）的大臣德·布罗伊（de Broglie）在这个问题上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俄国海军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将威胁到法国人在黎凡特的贸易。<sup>4</sup>

不过，俄国在地中海有所收获的机会微乎其微。黑海舰队没有实力挑战经过奥斯曼首都的博斯普鲁斯通道，因此俄罗斯人决定派出五支分遣舰队从波罗的海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

中海。所以，无论在北海还是地中海，俄罗斯人都有必要利用一个友好国家的海军设施——坦白地说，他们的一些舰船无法适应数月的海洋航行 [它们刚抵达英国的赫尔港 (Hull)，2艘大型舰船就需要进行大修，其中之一还在英国南部海岸搁浅]。英国人想要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海军部却签发命令：俄 506 国人的船可以在直布罗陀以及梅诺卡购买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公元 1770 年 1 月，4 艘俄国战舰在马翁建造完工，俄罗斯人任命了一名希腊商人作为他们驻马翁的代理人。<sup>5</sup>

当土耳其人还在抱怨英国人怎么可以向俄国舰队提供帮助时，俄罗斯人已经向东挺进，公元 1770 年 7 月 6 日，与土耳其海军在希俄斯岛后方的切什梅 (Çesme) 交火。战争伊始， 507 俄罗斯人困难重重：当一艘土耳其战舰燃烧的桅杆落到他们一艘船的甲板上时，后者发生了爆炸。不过最后，俄罗斯人非常幸运：一阵猛烈的西风使得他们能够在希俄斯岛与土耳其本土之间的海峡中使用火船攻击，水面上的许多土耳其船只被烧毁。奥地利皇帝对此印象深刻，还颇为担心：“整个欧洲都需要包容这个民族，因为土耳其人完全无法与之匹敌。”<sup>6</sup> 尽管他们获得了一场胜利，但要想赢得整个海洋的控制权，俄罗斯人对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仍毫无头绪；然而，他们建立了一些补给站，数年之后，他们攻入爱琴海，且与土耳其人发生小规模 508 冲突，甚至殃及最南处的达米埃塔，他们在这里抓捕了大马士革的总督。但正如过去英国人借助梅诺卡所领悟到的那样，真正重要的在于拥有一处极为重要、具有战略性位置的港口，而这恰恰是俄罗斯人所缺少的。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感觉到地中海力量的平衡正在向一个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奥斯曼人实力的衰退以及威尼斯的日渐

衰弱，留下一个真空地带；此后人们会看到，不仅仅是俄罗斯人，甚至丹麦人、瑞典人，以及美国人都都介入地中海，即便他们的主要利益在别处，并不在地中海。事实上，这就是问题的一个侧面：除了老资格的威尼斯人与拉古萨人，每个民族都把地中海视为他们所必须经营的许多政治和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甚至肆无忌惮地侵入大西洋海域的柏柏尔海盗也是如此。在英国人的反制面前，法国人的沉默使得俄罗斯人可以放手介入东地中海。<sup>7</sup>事实上，在公元 1774 年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因为俄罗斯人已经排除万难，有效地控制了黎凡特海域。不过，他们未能占领爱琴海的主要岛屿，如利姆诺斯岛和印布罗斯岛<sup>①</sup>。这两座岛屿控制着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如果他们只能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出地中海的话，很难说他们是否能在地中海长期坚持下来。<sup>8</sup>俄罗斯人还需要算一下他们能从地中海获得什么好处：控制东地中海本身不是目的，这一点在 1774 年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签署的和约中明确体现出来。按照《库楚克 - 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 的规定，土耳其人首次承认俄罗斯人对黑海部分海岸的控制；俄罗斯人也得到权利，可派商船穿越波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这使得连接黑海北岸与地中海的古老商路的复苏成为可能。如今，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考虑俄国正教对东欧基督徒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对希腊人的责任。1770 年，俄罗斯人挑唆希腊人发动了一场重大的但毫无结果的起义。为受到压迫的奥斯曼治下的希腊正教提供帮助的理想，是其更伟大理想中的一

---

① 该岛原名 Imbros，即印布罗斯，是希腊语名称；1970 年 7 月 29 日之后正式改为 Gökçeada，即格克切岛。——译者注

部分：为正教基督教世界收复君士坦丁堡，这才是俄国沙皇们惦记很久的“伟大理想”。<sup>9</sup>

509

## 2

数年之中，在爱琴海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人的胃口，他们开始考虑在地中海进一步冒险。这些计划的一贯特征是非地中海起源之民族行事的方式。公元 1780 年，英国政府深陷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由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向北美初生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提供援助，英国的局势相当危险。从 1779 年到 1783 年，直布罗陀再次遭到西班牙的封锁，最后还受到无情的炮轰，在这样的打击下，总督艾略特（Elliott）顽强地坚守下来。<sup>10</sup> 重压之下的英国，有必要找一些盟友，尤其是拥有战舰的盟友，显然俄国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友谊必须付出代价。英国大臣斯托蒙特（Stormont）想要诱使叶卡捷琳娜联合攻击梅诺卡，指出“具有这样地理位置的港口对俄国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不用思量”。他还主张“彼得大帝曾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如果俄国得到梅诺卡，英国政府就只有高兴而不会有别的想法。有流言称，英国的敌人试图把俄罗斯人拉入他们的阵营，愿意将波多黎各（Puerto Rico）或特立尼达（Trinidad）让给俄国，这让斯托蒙特担心不已。这位英国大臣明白地中海对于俄罗斯人有着神秘的吸引力。俄罗斯人对于把加勒比海诸岛作为条件很是不满，暂且不论抛出这诱饵的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臣波将金（Potyomkin），因其个子太高，得低头俯视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詹姆斯·哈里斯爵士（Sir James Harris），说：“如果你们把那么遥远的殖民地给我们，就是要毁掉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战

舰很少驶出波罗的海，你们怎么还想着让它们跨越大西洋？”詹姆斯爵士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只有一个地方能诱使女皇与我们结盟，那就是梅诺卡”；那将成为“女皇荣耀的纪念碑”。在波将金的设想中，他们不会去琢磨如何获得梅诺卡人的支持：梅诺卡人将被驱逐，希腊人会被安置在那里。梅诺卡将成为正教在西地中海的堡垒，成为俄罗斯人与奥斯曼人斗争的前哨。

510 哈里斯面对的问题是，这仅仅是一个建议，说明波将金及其政府的兴趣所在；英国政府并未真正批准出让领地，而俄罗斯人更享受这种在分裂的欧洲充当权力掮客的机遇。一方面，叶卡捷琳娜确实垂涎梅诺卡；另一方面，她知道英国会要求一些非常实在的回报，那就是俄国海军的支持。她还知道梅诺卡很难抵御来自西班牙人与法国人的攻击，因为她曾经说：“我不能陷入诱惑。”因此她决定她的使命是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解，而不是激化大西洋与地中海的冲突。她那重视实际的判断力最终占据上风，而且她的判断在一年内就被证实，因为此时西班牙人的注意力转向了梅诺卡，并在公元1782年2月从英国人的控制下夺取了该岛。<sup>11</sup>一位匿名作者，很可能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于与这位女沙皇有关的一些事件做出了简明扼要的评论：

英格兰曾经有充裕的时间来思量，有足够的理由来拒绝那项荒谬、昏聩的政策，在这政策的影响下，她得到的是迟疑不决的盟友，始终存有疑虑的伙伴，一个以波的尼亚湾（Bothnic Gulf）的底部为根基，在地中海、爱琴海及其岛屿上建立起新的海洋帝国的伙伴。<sup>12</sup>

这是在数年之后写成的，那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开始后悔之前对俄国的支持。而现在，在 1778 年，英国政府还想知道路易十六（Louis XVI）是否有兴趣协助英国封锁英吉利海峡，以阻止俄罗斯人经由这里进入地中海。<sup>13</sup>

尽管叶卡捷琳娜拒绝接受梅诺卡岛，但这些协商以及最后英国人对俄国人热情的衰退，均表明俄国已经在地中海战争与外交事务中为自己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地位以后一直维系着。公元 1783 年俄罗斯人吞并克里米亚以及随后在黑海沿岸的扩张（导致敖德萨的建立），使得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因为女沙皇如今已经拥有了向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商业与军事冒险的基地。而这靠的是与土耳其人关系的变化；1789 年，当叶卡捷琳娜与“高门”开战时，得到俄罗斯人授权的希腊海盗在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对土耳其船只进行骚扰。他们还得到威尼斯的热心支持，这也是后者作为独立共和国所参与的最后行动：一位名叫卡宗内斯（Katzones）的希腊船长被允许使用威尼斯人治下的科孚作为基地，这促使俄国考虑这座岛在地中海上可能的优越地位。卡宗内斯给土耳其人的生活带来巨大麻烦：他夺取科托尔湾的新海尔采格城堡，还袭击遥远的塞浦路斯。1789 年，三支“毫无纪律、组织严重无序、半海盗性质的小舰队”悬挂着俄国国旗，刺痛了奥斯曼人。<sup>14</sup>他们的掠夺将地中海的不稳定完全暴露出来。

511

重新稳定地中海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签署和平条约，至少在短期内和约解决了因领土而出现的纷争，使得商船拥有了安全的通道。因此，在公元 1792 年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签署和约后，俄国在地中海的贸易立即得到发展，部分原因就在于敖德萨的绝佳地理位置——它几乎不受冰雪的影响，还拥有通

往乌克兰和波兰南部开阔地带的便捷通道。在其正式建立之年，即 1796 年，敖德萨已经能容留 49 艘土耳其商船、34 艘俄国商船以及 3 艘奥地利商船，它吸引着来自希腊、阿尔巴尼亚以及南部斯拉夫的居民到此定居。商人们从科孚、那不勒斯、热那亚与的黎波里纷至沓来。再看未来，1802 ~ 1803 年，敖德萨已经非常繁荣，从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橄榄油、葡萄酒、干果与羊毛，希腊和意大利的货运船为了行驶方便，悬挂着土耳其、俄国以及奥地利的旗帜；与此同时，俄国的黑海诸港口对外出口谷物，其价值约为进口商品价值的两倍（事实上，1805 年谷物出口总值已经达到惊人的 570 万卢布<sup>15</sup>）。倘若不能自由地穿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这种通行只有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签署和约才能实现，或者俄罗斯人战胜了奥斯曼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使其重回正教控制之下——这样的商业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敖德萨建立的那一年，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Paul）继位，其野心远远超越了他的母亲，而她足够聪慧，知道俄国势力的极限在哪里。保罗在公元 1782 年就曾到地中海游历，假借“北方伯爵”之名微服出行，游遍了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这段经历使他对地中海产生了兴趣，打算在这里建造俄罗斯人的立足点。<sup>16</sup>在他短暂的五年统治期内，他再次推动俄国向地中海核心地区发展。俄罗斯人仍然想要在地中海寻求一座岛屿作为基地；但沙皇保罗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梅诺卡岛以东地区，关注点变成了马耳他。与以往一样，促使俄罗斯人介入地中海事务的是地中海以外的局势变化，起初保罗的兴趣不在那座岛，而是骑士团。马耳他骑士团与俄国在很多年前就



有了联系。彼得大帝曾在 1697 年派遣他的将军鲍里斯·切雷梅托夫（Boris Cheremetov）到访马耳他，提议与骑士团联合发动对奥斯曼人的攻击。俄国的舰队在黑海迎击土耳其海军，而规模不大但战斗力强大的马耳他舰队可在爱琴海向土耳其人发动攻击。骑士团团长不想将赌注压在还不甚了解的俄罗斯帝国身上，毕竟，它仍然是东正教的堡垒。不过，切雷梅托夫给骑士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手臂遗骨的热爱与忠诚令骑士团动容——这份圣物在庆祝圣灵降临节的仪式中要被送往瓦莱塔的修女教堂，为了展现骑士团的伟大魅力，这位来自另一个基督教世界的客人也受邀参加。<sup>17</sup>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骑士团与俄国宫廷也产生了一些纠纷。这源于一位波兰贵族留下的颇为复杂的遗产，并导致在俄国控制下的波兰出现了一座医院骑士团修道院。<sup>18</sup>叶卡捷琳娜觉得自己可以利用骑士团来对抗其在波兰的反对者，于是在公元 1769 年邀请一位老朋友来到她的宫廷，这个人就是马耳他骑士团的意大利籍骑士米凯莱·萨格罗莫索（Michele Sagromoso），她非常清楚此人将带来骑士团团长和教宗的信息，而教宗对于在俄罗斯帝国建立大公会极为热心。然而，当叶卡捷琳娜派遣一位立场模糊的意大利门客——可笑的卡瓦尔卡博（Cavalcabó）侯爵作为代表前往马耳他时，宗教问题再次出现。事情的开局有些不利：骑士团拒绝非天主教政权任命的代理大使，而且卡瓦尔卡博这个人也不值得信任，他被怀疑与骑士团中的狂热亲法派进行秘密交易。由于骑士团中有很多人都是法国人，因此马耳他骑士团在法国也有丰厚地产。<sup>19</sup>卡瓦尔卡博的目标是为俄国舰队在马耳他争取到进驻权，这个时期的俄国舰队仍然在东地中海徘徊。到 1775 年时，这位备感

挫败的女皇代表与古老的、长期被骑士团边缘化的马耳他贵族秘密筹划，徒劳地希望他们能够发动起义反抗暴君式的团长们，然后将他们的岛屿献给女沙皇叶卡捷琳娜。骑士团对叶卡捷琳娜这位代表的诡异行为越来越愤怒。他们突袭其位于瓦莱塔郊区弗洛里亚纳（Floriana）的居所，发现那里堆满了武器。于是，卡瓦尔卡博被驱逐，在最后的岁月里，他生活在法国，在耻辱中过活，时刻担心会因诈骗而被捕。<sup>20</sup>

于是，沙皇保罗与马耳他骑士团的接近也就不那么奇怪了。<sup>21</sup>保罗年轻时就学习了骑士团的历史，他浪漫地把骑士团想象成对抗革命的潜在的强大堡垒：团员们都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因对基督教的热情而团结起来，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欧洲国家之间的微不足道的差异。他并不担心骑士团对天主教的认同，也从未怀疑过自己作为最伟大的东正教的君主，能与骑士团紧密合作。<sup>22</sup>在他的设想中，马耳他骑士团应该能在两条战线上为他提供支援：波兰－俄国的修道院能在东欧内陆抵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贡献资金与人力，而以马耳他为基地的骑士团，则会与俄国舰队一起在地中海向土耳其人施压。不久之后，东正教的统治者就能够收复古老的拜占庭土地。要实现这一伟大梦想，还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的名字叫作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 3

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随后发生的拿破仑战争影响到整个地中海。公元1793年，就在革命政府向英国宣战后不久，似乎在某一刻英国舰队有能力制止法国舰队进入地中海水域。随着法国与其邻国的战争日益激化，以及对雅各宾（Jacobin）激

进派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法国的一些省份爆发了起义。土伦市民通过选举将雅各宾派驱逐出政府，并请英国人帮助他们的城市免遭正向南进发的革命军的蹂躏。难民们蜂拥而至，食物供给出现短缺。幸运的是，由胡德勋爵（Lord Hood）指挥的英国战舰已经封锁了土伦；但这只是加剧了土伦资源的短缺。8月23日，胡德勋爵同意接管土伦，但条件是城里的居民需要承认王位的继承人是国王路易十七（Louis XVII）。市民们忍气吞声地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对雅各宾派的恐惧平衡了他们对君主制所缺乏的热情。英国人占领土伦后，法国舰队的一半沦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但胡德几乎得不到地面部队的支援，因此当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革命军在1793年12月17日夺取港口的入口处，也就是“小直布罗陀”（Petit Gibraltar）后，胡德意识到英国人守不住了。当他们撤退时，英国人摧毁了法国人的9艘战列舰以及3艘护卫舰，将以后法国舰队所需要的木材储备席卷而去。他们还带走12艘或更多的战舰，将其编到英国和西班牙海军当中。<sup>23</sup>

514

这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法国海军遭受的最严重打击之一，至少与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大灾难同样严重。然而，土伦的丢失给英国人带来成堆的问题。只要拿破仑有新的动作，地中海的每一位英国指挥官都会着魔一般地关注着土伦。<sup>24</sup>英国的指挥官们必须想出新办法来应对法国舰队。一种解决方案是重建梅诺卡，在公元1798年时英国人已经重新占领梅诺卡，将这里作为最靠近法国南部的前哨。不过，在那之前，还出现了另一个更具诱惑力的可能。1768年，法国国王从热那亚人手中获得了科西嘉岛，而在此之前，热那亚人已经失去了对该岛的控制，科西嘉实际上被能言善辩、善于鼓舞人心的巴斯卡

尔·保利（Pasquale Paoli）领导的革命军控制。后来，在法国向英国宣战之前，有消息在里窝那流传：革命政府对科西嘉没有兴趣，愿意把它出售。据称，俄罗斯人正积极地与热那亚政府商谈购买科西嘉的事宜，他们认为有可能把科西嘉岛发展成其在西地中海的海军基地。<sup>25</sup> 这些谣言引起英国人对科西嘉的兴趣，当大不列颠要与法国开战时，这种兴趣更是增强了。

当土伦还在英国人控制之下时，巴斯卡尔·保利对科西嘉与英国结盟越来越感兴趣。他理解英国人失去土伦的重要意义，指出：“占领土伦是件好事儿；它会迫使英国人来解救我们。”而保利高估了科西嘉岛的作用。在我们眼前的这本书中，与撒丁岛、梅诺卡岛、克里特岛或塞浦路斯岛相比，科西嘉岛并没有被赋予重要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它能够为跨地中海航行提供的补给非常有限，与其他岛屿相比，它的出产也很少。科西嘉岛北部的巴拉涅（Balagne）出产一些谷物，这里自12世纪被比萨人统治后才开始开发农田，但科西嘉的社会是内向型的、孤立的、保守的，内部交通也相当不便。因此，热那亚人后来会放弃控制该岛也就不奇怪了。<sup>26</sup> 然而，英国人却开始设想，科西嘉岛拥有未开发的潜力，有可能成为很好的海军基地。也许，曾经有些漫无边际的提议提出，阿雅克肖（Ajaccio）最终可成为可与里窝那竞争的港口，科西嘉也会变成“掌控地中海以及黎凡特所有市场的大商场”。公元1794年，巴拉涅的圣弗洛朗（Saint-Florent）遭到英国人的袭击，数个星期后，科西嘉议会投票决定并入大不列颠；这座岛成为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治下的自治社区。科西嘉人拥有自己的旗帜，上有摩尔人的头像和王室的武器，并附一则格言：“要朋友，不要运气。”（*Amici e non di ventura.*）<sup>27</sup>

然而，英国人与科西嘉人的关系变了味道：保利的幻想破灭，因为拿破仑派遣激进分子回自己的家乡活动，革命委员会越来越活跃。公元 1796 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政府认为英国人在科西嘉的位置保不住了；科西嘉与英国的联合解散，英国军队撤离。此前关于提升科西嘉价值的希望也迅速落空。皮特还想着也许叶卡捷琳娜二世会愿意接收科西嘉岛，作为她承诺为英国舰船留出特殊通道的回报；他还想让她相信只要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六千的军队以及科西嘉议会的同意，她就能够控制整座岛屿。但这些建议还没有到达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就去世了。当时，对于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出现，英国人的看法是：俄罗斯人可能是有用的白痴，当英国人的精力和金钱主要用于对抗革命的法国以及后来的拿破仑时，俄罗斯人能够帮助英国完成一些次要的任务。

从法国人手中夺取地中海的控制权，就成为纳尔逊（Nelson）及其能力非凡的同僚们——胡德、柯林伍德（Collingwood）、特鲁布里奇（Troubridge）以及其他人的任务。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阻止拿破仑在埃及建立法国基地，倘若拿破仑获得成功，就可以在更远的东方，也就是印度，干涉大英帝国的计划；从公元 18 世纪中期以来，英国人已经在那里确立了权威。英国人拦截到一封法国人的书信，信中讲到了发动埃及战役背后的争论：

516

政府已经将目光转向了埃及与叙利亚：这些地区有着适宜的气候、优质且肥沃的土壤，可以作为法国商业的粮仓，充裕的仓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成为印度财富的贮藏所。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这些地区并进行日常管

理，那么，几乎确定无疑的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眼光投得更远，即最终摧毁英国人在印度的商贸活动，使我们从中获利，并且使我们成为那里、非洲以及亚洲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考量一同诱使我们的政府发动对埃及的远征。<sup>28</sup>

纳尔逊是位才华出众的指挥官，但将英法两国的冲突带入地中海腹地的是其对手拿破仑。我们再次发现，从俄罗斯人以及马耳他人的视角看整个事件是很好的方法，尽管有些不太正统。

拿破仑·波拿巴从一开始就把马耳他视为一处值得争夺的珍宝。在公元1797年，当他还只是革命委员会的一名雇员时，他就曾撰文向其上司们建议，“对我们来说，马耳他有着很大的利益”，认为法国需要与骑士团团长达成谅解。在他看来，实现这一安排至少需要花费五十万法郎：现任团长自从中风后始终未能康复，其继承者据估计是德意志人冯·霍姆佩茨（von Hompesch）：

瓦莱塔有居民3.7万人，可以把他们安置在法国；地中海也不再会有英国人；为什么我们的舰队或西班牙的舰队在前往大西洋之前不去占领马耳他呢？那里只有500名圣骑士，骑士团的团员也只有600人。如果我们不争夺，马耳他就会被那不勒斯国王占领。这座小岛对于我们价值非凡。<sup>29</sup>

虽然他高估了马耳他作为补给基地的价值，因为当地缺乏木材与水源，但这些依然是相当敏锐的评论。瓦莱塔雄伟的防御工事只是一种掩饰，背后掩藏的实际是防御兵力的不足，无论如

何，人总是会被舒适的生活引诱——即便对抗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战争仍然是这些马耳他海盗的既定目标，但早期作为医院骑士团时所秉持的热情，甚至是狂热的理想已经严重褪色。<sup>30</sup>此外，拿破仑攻占马耳他岛带来的危险不仅仅影响到当地。“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与纳尔逊以及英国保持着紧密联系，长期以来他对马耳他群岛享有完全宗主权的诉求正是通过总团长每年献上的鹰隼得以实现的。

冯·霍姆佩茨在公元 1797 年 7 月正式当选骑士团团长。他把俄国的沙皇视为盟友，从而通过它的波兰 - 俄国修道院重新拿回医院骑士团的财产，同时他还希望得到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他出生在那里，他也希望得到法国圣骑士们的支持，这些圣骑士对于法国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恐，而且骑士团在那里还拥有许多领地。<sup>31</sup>冯·霍姆佩茨正确地判断出拿破仑的真正目标在别处；但拿破仑却坚信要想实现其在东地中海的目标就必须控制马耳他。当 1798 年 5 月一支庞大的法国舰队从土伦出发，经马耳他前往埃及时，冯·霍姆佩茨还在信任俄罗斯人和奥地利人，似乎他们真的准备为他提供帮助。曾担任骑士团团长秘书的杜布莱（Doublet）注意到，“马耳他的海域从没有出现过这样多得数不清的舰船”，当地的马耳他社区的首领们则讽刺说，现在是西欧的舰队，而非土耳其人的舰队，摆好架势要从骑士团手中夺取这座岛了。<sup>32</sup>当法国舰队抵达马耳他时，冯·霍姆佩茨颇为谨慎，坚持一次只能允许四艘舰船进入海港，拿破仑的使者抱怨道：“那样的话，当五六百艘舰船需要进港获取必要的水源和其他补给时，得花费多长时间啊？”使者还抱怨称不久之前马耳他曾向英国人表示出更多的善意。<sup>33</sup>不过，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想要的结果。他现在拥有充足的

理由派出 1.5 万人登陆马耳他并接管整座岛屿。冯·霍姆佩茨意识到他没有任何机会抵挡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因此他让出马耳他。6 月 13 日，拿破仑正式将圣骑士驱逐；他将大量的银盘熔化，骑士团的档案也被没收，但这么做不是为了阅读这些文档，而是因为弹药的外壳通常需要裹一些纸。如此一来，骑士团就失去了身份，只能依靠基督教势力的怜悯，与过去阿克城陷落和罗得岛陷落后的境地一样。骑士团的存续也再次成为不定之数。

518 马耳他的陷落恰恰加强了沙皇保罗将俄国海军开入地中海的决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夸大了马耳他岛作为木材与水源补给地的作用，但他确实期望从马耳他征服更多土地。<sup>34</sup>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劝说骑士团在俄国的修道院宣布废黜冯·霍姆佩茨，并于公元 1797 年 11 月推选沙皇为他们的新任骑士团团长。<sup>35</sup> 他接着委任一些俄国正教贵族为马耳他骑士团成员，他每天都穿着总团长的教士长袍，给人的印象是他对于自己总团长的身份特别骄傲，不亚于俄国皇帝的身份。他自视为骑士的典范。“眼下，”一位奥地利大臣评论道，“沙皇唯一关心的是马耳他。”<sup>36</sup>

保罗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无数意外之一是他与奥斯曼人结盟。此前不久，在公元 1798 年夏，纳尔逊刚刚在紧邻亚历山大的阿布基尔湾（Aboukir Bay）打败了拿破仑的舰队（尼罗河战役）；此后，英国人成功地将法国人赶出埃及，不过此前拿破仑已经从当地掠夺走大量的古代文物。<sup>37</sup> 自 16 世纪以来，“高门”对与法国的结盟始终相当满意。然而，法国人登陆奥斯曼人治下的埃及是难以容忍的。除此之外，巴尔干半岛上也有一些人在制造麻烦，他们对法国表现出极为危险的赞同态



度，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约阿尼纳（Ioannina）领主、伟大的阿尔巴尼亚督军阿里帕夏（Ali Pasha）。显然，现在是苏丹与法国人决裂的时候了，因为法国人对黎凡特地区的野心已经超过奥斯曼人所能容忍的限度，同时也因为拿破仑的舰队和陆军比观察家们所预想的要更脆弱。俄土联盟的最重要特征是预备协议，它就在尼罗河战役结束数个星期后签署，该协议允许俄国海军经波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sup>38</sup>幸运的是，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有着共同的目标：不久前被拿破仑占据的爱奥尼亚群岛。1797年5月，拿破仑夺取威尼斯后，也将威尼斯帝国的剩余领地一网打尽。土耳其人怀疑法国人会以安科纳为基地对巴尔干半岛发动入侵，把对科孚及其邻岛的控制视为封锁亚得里亚海的必要步骤。每一方都将对自己新盟友的极度不信任暂时搁置。事实上，俄国海军指挥官是粗鲁的、只懂一种语言的乌沙科夫（Ushakov），他一直有些嫉妒纳尔逊，因为他不希望英国人获得所有的荣誉，而纳尔逊也决定要让这些不受欢迎的盟友留在东地中海，他自己为英国夺回马耳他和科孚。他写道，“我憎恶俄罗斯人”，还说乌沙科夫是“恶棍”。<sup>39</sup>土耳其人拥有做工精良的法式现代战舰，但事实上，他们的水手中有许多是希腊人，且纪律涣散，而黑海的俄国造船厂也无法建造那种可以远距离航行并长时间作战的战舰。<sup>40</sup>不过，土耳其与俄国的联合部队还是在1799年3月初占领了爱奥尼亚群岛。不出所料，沙皇在嘉奖乌沙科夫时想到了圣约翰骑士团，于是，乌沙科夫成了一名马耳他骑士。他们为爱奥尼亚群岛政府所制定的条款也与众不同。七座岛屿将在土耳其的宗主权下，组建一个贵族制的“七岛共和国”；俄国作为其保护国将拥有特别的影响力。<sup>41</sup>

纳尔逊暂且抛开自己对俄国战舰的适航性及其指挥官的疑虑，致信乌沙科夫，提议联合对马耳他发动攻击，此时俄国军队正从都灵出发向南，这一计划似乎更加现实。纳尔逊担心这会演变成俄国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进行侵略。他坚持道：“尽管某一国家拥有的士兵要比另一国家多一些，但他们并不能因此占据优势。一旦将法国旗帜推倒，就需要立刻悬挂起骑士团的旗帜，而不能是别的旗帜。”<sup>42</sup>据一位历史学家记载：“在公元1799年10月，俄国在地中海的前景看起来是前所未有的光明。”乌沙科夫也很清楚，所以当12月他收到沙皇改变主意的“密令”（*ukaz*）时，震惊不已。密令的内容是：他必须立即撤离地中海，并且带着俄国的所有舰队退回黑海；把俄国在科孚的权利直接转交土耳其人，以换取苏丹允许俄国舰队从爱琴海返回黑海。这一撤退令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俄国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介入威胁到哈布斯堡控制的亚得里亚海，而且此前威尼斯被拿破仑像颗糖果一样送给奥地利人，也使他们尝到了甜头。保罗的算计有些不大现实，当他妄想着在那些一起对抗拿破仑的不情愿的盟友中间瓜分后革命时代的欧洲时，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威尼斯和低地国家之间进行选择。<sup>43</sup>

520

当乌沙科夫发现他不可能将意志消沉的舰队开回东地中海并被迫在科孚过冬时，保罗的野心有多么不切实际就会进一步揭示出来。俄罗斯人有气无力地旁观英国人对马耳他的包围，到公元1800年7月才离开科孚开往黑海。拿破仑对于守住马耳他未抱任何希望，那只是“在我的敌人中投下一颗引发不和的苹果”，他把这当作送给沙皇保罗的礼物；沙皇接住这个“苹果”且落入了陷阱，直到1800年11月，俄国人听说英国人已经于两个月之前夺取马耳他之时，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个陷

阱。<sup>44</sup>英国人决定忘记之前发誓要将马耳他归还骑士团的最终目标，在占领瓦莱塔后，他们也没有自找麻烦地将其他盟友的旗帜悬挂起来：旗帜的主人既不是沙皇兼骑士团团长，也不是圣约翰骑士团，更不是马耳他过去的领主那不勒斯国王。伦敦的外交部以绝妙的外交辞藻抱怨种种不合规矩的做法，表达其因冒犯了作为“公认的骑士团团长”（有些夸张）的沙皇而产生的些许担忧。但就地驻扎（*in situ*）于马耳他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却没有上述困扰。<sup>45</sup>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马耳他上空飘扬的是英国国旗。拿破仑很可能曾经梦想：沙皇在丹麦、瑞典、普鲁士的帮助下，创造“北方的武装中立”，并限制英国船只的进出。然而，拿破仑的美梦变成了噩梦。波罗的海与北海都爆发了冲突；纳尔逊虽然在理论上只是第二指挥，却再次在1801年4月的哥本哈根战役中成为伟大的胜利者，这场战斗中丹麦舰队被打成碎片。<sup>46</sup>约一个星期之前，满腹牢骚的俄国军官们冲进沙皇的卧室，将其扼杀。得知这位难以预料的盟友的命运后，英国人如释重负；被认为是另一个狂妄自大者的拿破仑却深受震动，他认定保罗被刺的背后是英国人的阴谋。然而实际上，保罗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

#### 4

保罗的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更为谨慎地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当公元1801年与法国签署泛欧和平协议后，有人提出恢复骑士团对马耳他的治理，并请俄国来保证马耳他的自治权，沙皇很礼貌地予以回绝：除了两西西里国王，还有谁能够作为该岛的宗主来保护马耳他呢？<sup>47</sup>另外，亚历山大积极地恢复俄罗斯人在爱奥尼亚群岛的利益，特别是在奥斯

曼帝国开始摇摇欲坠（这个摇摇欲坠的过程相当漫长）之后。沙皇的顾问曹尔托里斯基（Czartoryski）说土耳其“在最关键、最致命的部位开始腐烂、生了坏疽”。<sup>48</sup>如果要把奥斯曼帝国肢解，曹尔托里斯基的设想是由罗曼诺夫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瓜分，将爱琴海、小亚细亚、北非留给英国与法国，并让希腊人独立。哈布斯堡皇帝将得到包括杜布罗夫尼克在内的达尔马提亚海岸，而俄国则控制科托尔与科孚，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他们也采取了实际行动：在面临法国人从南意大利施加的威胁时，爱奥尼亚群岛的防御加强，公使们被派往各个城镇，如科托尔，以期赢得当地民众对俄国的支持。<sup>49</sup>但英国与法国签署的《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在1803年破裂（部分原因在于英国拒绝交出马耳他），拿破仑很快自立为法国皇帝，并开始在大陆上彰显自己的强权。<sup>50</sup>这些事件促使亚历山大将其战舰重新部署在地中海。1805年10月21日，就在地中海外围的特拉法尔加，纳尔逊勋爵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使得亚历山大的地中海计划变得相对容易。<sup>51</sup>对于反法同盟的战舰来说，地中海变得相对安全了一些，但英雄纳尔逊已经战死，他无法再继续提醒众人提防靠不住的俄罗斯人，事实上，俄国已经努力改善了自己战舰的适航性。

和他的前任们一样，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对地中海的兴趣，与俄罗斯人对斯拉夫正教的同情紧密结合，沙皇致力于将其保护权扩展到更多斯拉夫教徒身上。正因如此，俄罗斯人派遣船只前往科托尔湾，从那里可以到达群山环绕的正教的黑山（Montenegro）公国，土耳其人从来没能在此地确立完全的统治。黑山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性依然在于意识形态层

面，而非实际层面，即便说科托尔拥有 400 艘商船，这些船也包括一些比小型帆船（skiffs）大不了多少的船。<sup>52</sup>俄国在处理杜布罗夫尼克问题时，宗教问题也浮出水面。由于忌惮塞尔维亚人（Serbs），传统上，拉古萨人一直禁止正教教会出现在其狭窄的领地上。公元 1803 年，拉古萨的元老院甚至关闭了俄国公使的礼拜堂。到了 1806 年 3 月，一支法国军队沿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拉古萨政府勉强同意，让俄国士兵在法国将要打过来时负责杜布罗夫尼克的防御。但到 5 月底，当法国人进入拉古萨领土时，拉古萨的元老院决定他们更愿意接受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而非正教的俄罗斯人，结果法国军队与得到黑山斯拉夫人支持的俄国军队爆发了冲突。尽管俄罗斯人曾一度成功地将其影响力延伸至达尔马提亚海岸，但杜布罗夫尼克一直是法国人的基地，1808 年，它的共和国政府悲痛无奈地步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后尘。法国指挥官马尔蒙（Marmont）的一位代表宣布：“诸位阁下，拉古萨共和国及其政府解散，新政府正式就职。”杜布罗夫尼克起初由拿破仑治下的意大利管理，后来被划归到新设立的伊利里亚省（Illyria）。马尔蒙被授予新称号“拉古萨公爵”（*duc de Raguse*）。<sup>53</sup>这种沦陷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因为在 1806 年时，杜布罗夫尼克还是拥有 277 艘帆船的母港，而到了 1810 年，仍在使用的船仅剩 49 艘。<sup>54</sup>共和国被裹挟到战争中，但这些战争并不能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奥斯曼人的权力消退使得拉古萨人失去了过去土耳其人保护下的中立与安全；他们努力试图重获土耳其人的支持，但无果而终，因为这个时期的奥斯曼人也大大受惠于法国人。<sup>55</sup>对于一个乐观得将“自由”奉为座右铭的共和国来说，这是个屈辱的结局。

这也是俄罗斯停止参与地中海事务的开端。俄罗斯人还是觉得从圣彼得堡控制这么遥远的地方难度太大。公元1806年底，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之间因瓦拉几亚（Wallachia），也就是今天罗马尼亚的事务产生严重分歧，俄土协议破裂，他们在地中海的行动也就大打折扣。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陷入战争之中。带着疑虑，英国向俄国提供了一定的支援，然而，是俄国舰队打了1807年6月底到7月初在阿索斯山附近海域的一场大海战，它是拿破仑战争中的重要海战之一，俄罗斯人希望借此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sup>56</sup>在纸面上，俄罗斯人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土耳其人仍然能够封锁达达尼尔海峡，无论如何，沙皇都收获颇丰。在战争期间，黑海与地中海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枯竭了；在撤出欧洲后，1807年，沙皇与拿破仑在提尔西特（Tilsit）签署和约，放弃了俄罗斯人在地中海的领土野心。他还放弃了地中海的舰队，俄国战舰就被扔在那里。那些试图逃往大西洋的战舰被英国人轻易地俘获。一些战舰驶往的里雅斯特、威尼斯与科孚，但在那里它们也得不到任何帮助，最终只能选择投降、放弃或把船凿沉。还有一些船只来到土伦加入法国舰队：拿破仑一直希望在与俄罗斯人签署和约后，其会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收编俄国舰队。法国军官来到科孚，用法国旗帜替换俄国旗帜。<sup>57</sup>进入地中海让俄国耗费了大量金钱，最后也未能为它带来长久的利益。

## 注 释

1. R. C.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 1951),

- pp. 237–42, 270–76.
2. M. S. Ander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 1769–70',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31 (1952), pp. 148–50, 152, 154.
  3. N.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1797–1807* (Chicago, IL, 1970), p. 4.
  4. Ander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 p. 150; M. S. Ander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 of 1768–74',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9 (1954), pp. 39–58.
  5. Ander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fleet', pp. 153, 155–6, 158–9; Ander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 pp. 44–5;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 281; D. Gregory, *Minorca, the Illusory Priz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s of Minorca between 1708 and 1802* (Rutherford, NJ, 1990), p. 141.
  6.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286–91; E. V. Tarlé, *Chesmenskii boy i pervaya russkaya ekspeditsiya v Arkhipelag 1769–1774* (Moscow, 1945), p. 105, n. 1; F. S. Krinitsyn, *Chesmenskoye srazhenye* (Moscow, 1962), pp. 32–4 (maps).
  7. Ander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 pp. 56–7.
  8.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286–305.
  9.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7–8; Anders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o-Turkish war', p. 46.
  10. S. Conn, *Gibraltar in British Diplom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CT, 1942), pp. 174–6, 189–98; T. H. McGuffie, *The Siege of Gibraltar 1779–1783* (London, 1965); M. Alexander, *Gibraltar: Conquered by No Enemy* (Stroud, 2008), pp. 92–114.
  11. I. de Madariaga, *Britain, 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 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62), pp. 240–44, 250–52, 258, 263, 298–9; Gregory, *Minorca*, pp. 187–99.
  12. Cited by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12, from *Annual Register of 1788, or a View of the History,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88* (London, 1789), p. 59.
  13. M. S. Anderson, 'Russia in the Mediterranean, 1788–1791: a little-known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naval warfare and privateering', *Mariner's Mirror*, vol. 45 (1959), p. 26.
  14. *Ibid.*, pp. 27–31.
  15.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178–9.
  16. *Ibid.*, p. 27.
  17. R. Cavaliero, *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 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n, London, 2009), p. 103.
  18. *Ibid.*, pp. 144–9.
  19. *Ibid.*, pp. 181–201.
  20. D. Gregory, *Malta,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Powers, 1793–1815* (Cranbury, NJ, 1996), p. 105; Cavaliero, *Last of the Crusaders*, pp. 155, 158.

21. Cf.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35.
22. Gregory, *Malta, Britain*, p. 106;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36–8.
23. M. Crook, *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Restoration, 1750–1820* (Manchester, 1991), pp. 139–48; D. Gregory, *The Ungovernable Rock: a History of the Anglo-Corsican Kingdom and its Role in Britain's Mediterranean Strateg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1793–1797)* (Madison, WI, 1985), pp. 52–7; N. A. M. Rodger, *The Command of the Ocean: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 (London, 2004), p. 429.
24. P. Mackesy,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1803–1810* (London, 1957), pp. 5, 7, 13.
25. Gregory, *Ungovernable Rock*, pp. 30–31, 47.
26. D. Carrington, *Granite Island: a Portrait of Corsica* (London, 1971).
27. Gregory, *Ungovernable Rock*, pp. 63, 73, 80–84.
28. Huntingdon Record Office, Sismey papers 3658/E4 (e).
29. Cited by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39, from J. E. Howard,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vol. 1, *The Rise to Power* (London, 1961), p. 191.
30. Cavaliero, *Last of the Crusaders*, pp. 9–101.
31.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39–40.
32. Cavaliero, *Last of the Crusaders*, pp. 223, 226.
33. *Ibid.*, pp. 223–4;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41–2.
34. Cf.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45.
35. Cavaliero, *Last of the Crusaders*, pp. 236, 238, 242.
36. Count Philip Cobenzl, cited *ibid.*, p. 238; Gregory, *Malta, Britain*, p. 108.
37. R. Knight, *The Pursuit of Victory: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 of Horatio Nelson* (London, 2005), pp. 288–303; P. Padfield, *Maritime Power and the Struggle for Freedom: Naval Campaign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1788–1851* (London, 2003), pp. 147–71.
38.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65.
39. Knight, *Pursuit of Victory*, p. 675.
40.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79, 87; Gregory, *Malta, Britain*, p. 109.
41.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99.
42. Cited *ibid.*, pp. 124–9.
43. *Ibid.*, p. 128.
44. Gregory, *Malta, Britain*, pp. 113, 115.
45.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145–6.
46. Knight, *Pursuit of Victory*, pp. 362–84.
47.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162–3; Gregory, *Malta, Britain*, pp. 116–40.
48. Cited by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185.
49. *Ibid.*, p. 186.
50. Knight, *Pursuit of Victory*, pp. 437–50.
51. *Ibid.*, pp. 501–24.



52.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 198.
53. R. Harris, *Dubrovnik: a History* (London, 2003), pp. 397-401.
54.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431-7;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198-206.
55. Harris, *Dubrovnik*, p. 397.
56.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449-53.
57.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457-8; Mackesy,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p. 211; Saul, *Rus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p. 216-20, 222; L. Sondhaus, *The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Austrian Naval Policy 1797-1866* (West Lafayette, IN, 1989), p. 19.

## 九 总督、省长与帕夏 (1800 ~ 1830 年)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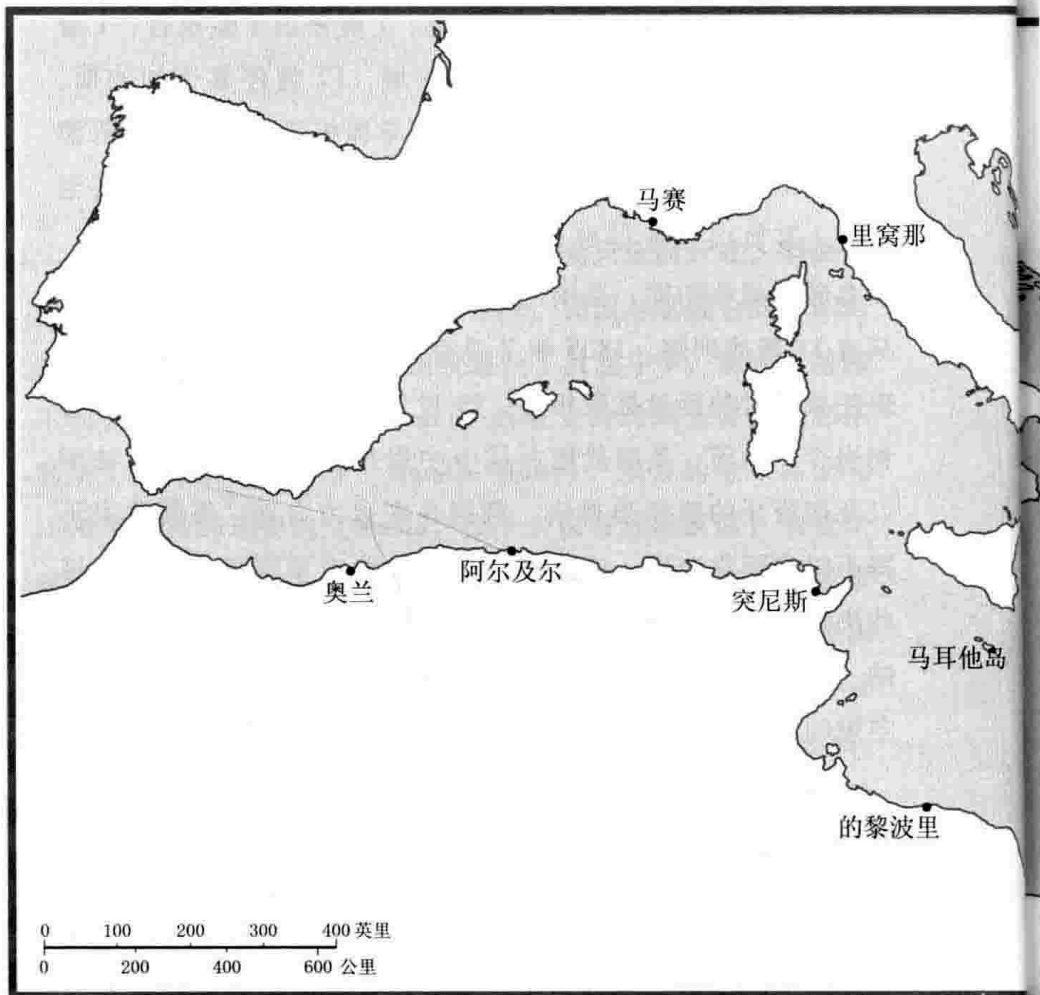
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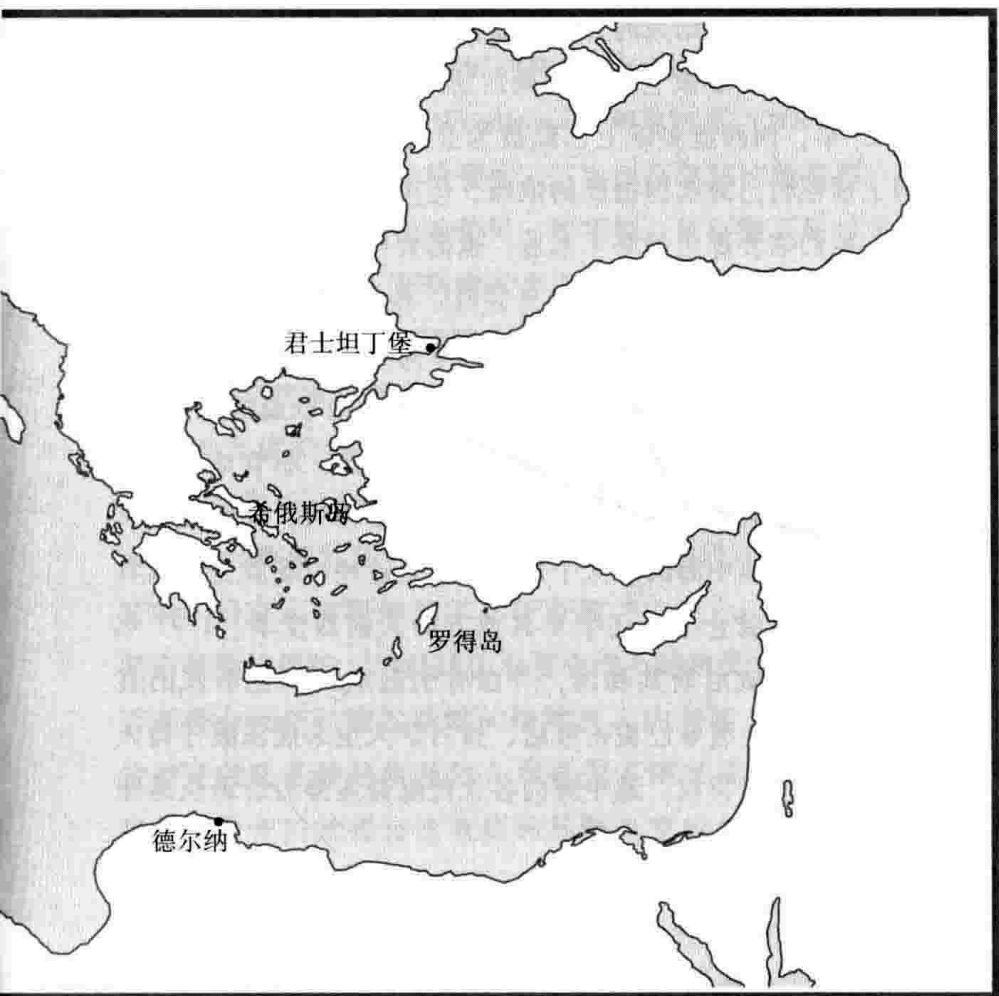
特拉法尔加战役使得地中海向英国船只全面开放，但英国尚未在地中海航线上获得绝对主导权。英国与拿破仑的军队为争夺西西里与南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前者支持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Ferdinand），后者支持时刻想要推翻那不勒斯王权的元帅穆拉特（Marshal Murat），双方的争斗在公元1806年7月的马伊达（Maida，位于卡拉布里亚腹地）战役中达到高潮。英国取得了胜利。<sup>1</sup>马伊达战役揭示出，拿破仑愚蠢得让那么多军队滞留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且距离他最想控制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那么远。把塔兰托作为控制南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入口处以及爱奥尼亚群岛的梦想也随之幻灭。<sup>2</sup>然而，英国舰队的实际战线比歌颂其胜利的故事中所描述的战线延伸得更长。英国人需要保持马耳他与的里雅斯特之间的交通畅通，因为的里雅斯特已经成为奥地利帝国提供的物资补给的重要来源地，而当时经由德意志的路线已经被拿破仑军队封锁。<sup>3</sup>到1808年，法国人似乎正在重夺地中海的控制权；他们在土伦重组舰队，人们担心他们会对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发动攻击。

英国政府怀疑是否有必要在地中海上发动战争。其他的担忧出现了：法国人试图控制西班牙，随着半岛战争的爆发，英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伊比利亚半岛上难以对付的陆上战斗。

战局的艰难可以从英国的战舰规模看出，因为这些舰船本来在英国周边海域、加勒比海以及其他地方承担着重要任务。1808年3月8日，15艘舰船在纳尔逊十分能干的继任者、海军司令柯林伍德的指挥下摆开阵列：1艘停泊于叙拉古，1艘停泊于墨西拿，1艘游弋于科孚海域，12艘停靠于加的斯。在地中海还有38艘三帆快速战舰、单桅帆船（sloops）、双桅横帆船以及炮船对这些大型战舰提供护卫，其中大部分甚至还到土耳其以及亚得里亚海等遥远的地方进行巡逻与侦察。在拿破仑战争初期，英国的海军力量更薄弱：1803年7月时只有11艘战列舰，1805年7月有10艘。<sup>4</sup>与古代海战或者勒班陀战役时的巨量战舰相比，19世纪初对战双方的战舰数量相当少。然而，英国战舰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性能要比法国以及西班牙的舰船强得多，特别是在火力方面。<sup>5</sup>英国政府不得不时常面临选择，应该将海军力量集中于哪里，然而，这些决策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远离地中海的舰队：封锁托斯卡纳、那不勒斯以及杜布罗夫尼克的提议把英国的意图带入到空想的境界。<sup>6</sup>

英国人需要盟友。他们利用了俄罗斯人的野心，使其提供海军支援。公元1809年时，英国人试图利用阿尔巴尼亚督军阿里帕夏去为英国人夺取爱奥尼亚群岛。他们还试图争取反抗奥斯曼人的希腊起义者的支持，尽管起义者们本能地敌视阿里帕夏。但英国政府又担心：倘若奥斯曼帝国西部的纷乱太过严重，会过于削弱土耳其人，致使其帝国崩溃。他们此时还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崩溃，尤其是在与拿破仑进行关系到联合王国存亡的战争期间。在地中海，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是占领爱奥尼亚群岛，将“七岛共和国”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





海军司令柯林伍德率领两千人在爱奥尼亚群岛登陆，就足以吓得法国人屈膝投降。奥地利大臣施塔迪伯爵（Count Stadion）认为，如今英国人已经成为“亚得里亚海的主人”。<sup>7</sup>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获得的领地包括：马耳他、科孚、西西里。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公元1806年到1815年，西西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受英国保护的领地。斐迪南国王憎恨自己对英国援助的依赖，但英国人紧紧地控制着西西里：他们需要那里的海军基地，也需要在此地为其舰队进行必要的补给。<sup>8</sup>英国人在西西里岛驻扎，使得穆拉特在1810年  
526 尽管受命于拿破仑且已经进军至墨西拿海峡，却不敢贸然入侵该岛。<sup>9</sup>英国人明白，他们需要长期驻守地中海以遏制法国人，特别是让法国人远离埃及以及通往印度的航线。尽管地中海贸易已经总体上衰落，但商业心态仍然发挥着作用，如果英国人可以随意出入地中海的各大市场，那么这些市场就会更加具有吸引力。拿破仑战争还带来其他方面的剧烈变革。1797年拿破仑消灭了威尼斯共和国，并没有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哀伤；当拿破仑·波拿巴被击败后，拉古萨人也未能说服任何人来帮助他们恢复特权。地中海的各大传统商业势力纷纷从地图  
527 上消失了。

## 2

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商业活动的减少为其他非地中海民族的商船提供了机遇。贸易衰落了，但仍然存在大量商机。对西西里来说，它已不再是供应整个地中海的巨大谷仓。公元18世纪后半期，岛上的居住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半，但这些增长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城市，主要是巴勒莫。与此同时，谷

物生产却趋于衰落，一部分原因在于产量最大化的失败，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土地荒芜闲置。17世纪时，西西里人每年对外出口货物高达四万吨，但气候条件逐渐恶化；被称为“小冰河期”的日益湿润的气候只是一个因素，因为地中海还面临着波罗的海以及其他地区的竞争。<sup>10</sup>19世纪，来自英国的承包人，例如伍德豪斯（Woodhouse）和惠特克（Whitaker），曾在西西里岛西部鼓励种植葡萄，以生产马尔萨拉葡萄酒。此时仍然能够从地中海轻松地获得一些货物：来自撒丁岛与北非的珊瑚、来自希腊与土耳其的干果，以及经由奥斯曼帝国出口的咖啡。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在从北海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后，出现在北非海岸地区的柏柏尔人的“摄政地区”[这么称呼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号，例如总督（deys）、省长（beys，或译为“贝伊”）和帕夏（bashaws 或 pashas），都是名义上由奥斯曼苏丹委任的代表]。从1769年开始，丹麦人向阿尔及尔总督贡献“礼品”，以换取总督为其商船提供保护，不过这位总督会时不时地要求更多的赠礼，否则就会掠夺和骚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商船，1800年前后，这些要求几乎使阿尔及尔人与丹麦人爆发战争。与此同时，突尼斯的省长觉得自己收到的礼物品质较低，受到了冒犯，因此在1800年5月扣押了一些丹麦人的商船，6月还派人将丹麦领事馆的旗杆砍断，引发一场短暂的战争。战争中，丹麦人和不久之后加入进来的瑞典人，发现自己只能任其宰割。<sup>11</sup>

这些问题最终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省长们和总督们想要得到赠礼以保证财政用度。据美国国会了解，这些总督与省长的政策是签订新的商业条约以诱惑所有国家进入地中海水域，

然后“尽可能频繁地与每个国家翻脸”。<sup>12</sup>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协议过多，以至于柏柏尔摄政们没有太多机会从外国商船上掠夺货物与俘虏。俘虏可以赎回，但也可以被用作外交筹码来换取赠礼；俘虏们在柏柏尔人肮脏的监狱中苟延残喘的同时，也被用作自由劳工（不过军官们的待遇普遍好些）。在的黎波里，普通海员在夜晚会被锁在地板上，每天可以分配到一份食物，包括一块用大麦和豆子制成、杂质特别多的干粮，一些山羊肉，一些橄榄油和水。这些被奴役的俘虏需要为的黎波里建造城墙，被迫在酷日下劳作，被骂作“基督狗”，被鞭打。<sup>13</sup>当然，北非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基督教国家会竭尽全力地使这些人，还有他们从撒丁岛、西西里和巴利阿里群岛掳掠来的女性重获自由。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国家，它的船为柏柏尔人的敲诈勒索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与的黎波里的冲突，是这个诞生不久的合众国与外国势力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它促成了美国海军的建立。<sup>14</sup>美国作家们将北非人说成未开化的“蛮族”，他们通常用“柏柏尔人”来称呼马格里布人，这样做很容易。<sup>15</sup>美国驻突尼斯和其他地区的领事发回的报告确认了之前的看法，这些省长、总督和帕夏们都是不受约束的专制君主，他们的统治方式可以从美国公使亲眼看到的砍头、断肢等刑罚判断出来。公元1786年，乔治·华盛顿在写给拉法耶特（Lafayette）的信中表达了其对柏柏尔海盗的强烈想法：

在这样的文明时代，在这样的自由时代，欧洲伟大的海洋强国怎么可以向柏柏尔人这样的小海盗国家纳贡呢？



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支海军能够把那些敌人改变，把他们改造成文明人，或者把他们消灭吗？<sup>16</sup>

但他没有预见到，很快地，美国将与欧洲列强一起向这些柏柏尔人的国家纳贡。

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一种概念，将美国与柏柏尔人的国家的战争当作基督徒与伊斯兰教“蛮族主义”之间的冲突，这种概念与事实不符。正如弗兰克·兰伯特（Frank Lambert）指出的那样，“对柏柏尔人的战争主要涉及贸易，而非宗教”；公元1797年，美国与的黎波里签署和约，和约中明确指出，美国在本质上并非基督教国家，总统麦迪逊（Madison）相信这种表述能够将宗教因素从争议问题中剥离，从而缓和其与北非穆斯林的关系。<sup>17</sup>所以，“它不是神圣战争，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延续”。<sup>18</sup>在文本记录中，独立战争在1783年结束，这一年英国人承认十三个殖民地不再受英国国王的制约。事实上，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商船横跨大西洋以及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权利。美国人希望达成一个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在外国港口应该享有与欧洲传统国家同等的权利。过去，英国把美洲殖民地看作一个封闭的殖民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一体系中，其泛大西洋属地将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同时也吸收不断增多的英国工业产品。整个体系受到按照18世纪重商主义视角制定的商业税收的保护。1773年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事件明确表明了美国人的反对意见；对于任何一方来说，要摆脱这种关系非常困难。176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十年前，《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有一则报道，

英国官方批准的“地中海通行券”，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里被轻蔑地烧掉。<sup>19</sup>

对美国人来说，前往地中海经商引发两类问题，不过它们又交错在一起。即使在公元1783年以后，诸如直布罗陀这样的英国港口也不愿意接待美国船只，英国的船长们还会利用一切机会扣押美国船只——他们特别热衷于迫使美国船员为英国服务，特别是在英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政治家们，例如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ld）将美国人视为潜在的商业对手，认为他们将会破坏英国的商业霸权，尽管他也注意到，由于柏柏尔海盗的存在，美国人在地中海贸易中获得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另一个问题是与北非统治者的关系：美国人想要在北非的港口自由通行，他们也希望保证自己的船只在公海不会遭到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海盗们的袭击。无论从哪一点看，杰斐逊都赞同谢菲尔德勋爵的观点：欧洲人已经在地中海拥有很大势力，美国人将不得不沿着狭窄的海峡偷偷潜入，而海盗们“会仔细检查进入海峡的一切”。<sup>20</sup>

531 于是，很明显，美国的地中海贸易在总量上难以与已有的欧洲列强相比，特别是公元18世纪末在地中海商业中具有领导地位的法国。然而，美国人的到来对柏柏尔人的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重塑了柏柏尔人与非穆斯林海上势力间的关系。柏柏尔战争只是第一阶段，之后一系列事件不断累积，最终导致1830年以后法国人对阿尔及尔的征服。这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巴克利家族（Bacri），他们是在外部操控阿尔及尔事宜的犹太金融家。巴克利家族一方面为阿尔及尔总督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也到里窝那经商，与生活在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等英国商业基地的犹太人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他们对总督政府的

影响让人十分惊讶，因为美国的观察家们确信犹太人在阿尔及尔是受到迫害的。但总督明白他可以利用犹太银行家作为中介，帮助他处理与欧洲人的事务，而且他们任其摆布。1811年，阿尔及尔总督将大卫·科恩·巴克利（David Coen Bacri）处死，因为与他竞争的犹太人领袖大卫·杜兰（David Duran）残酷地指证他叛国，大卫·杜兰的祖先在1391年大屠杀时从马略卡来到这里。杜兰希望自己获得巴克利的首席地位，但很快就遭遇与巴克利相同的命运。

由此一来，一小撮犹太家族的精英紧紧围绕在总督身边，偶尔还会招致美国公使等人的恶评，例如突尼斯的美国公使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sup>21</sup>公元1805年，伊顿向的黎波里居民呼吁，美国人支持另外一人争夺帕夏之位。他恳求的黎波里市民要了解，美国人是包容“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语族、每一种信仰的人”，他们生活在“西方的尽头”。他说，现任帕夏优素福·卡拉曼利（Yussuf Karamanli）是一个“卑鄙、做伪证的叛徒，他委任的海军指挥官是酗酒的变节者，其主要顾问是贪婪的犹太人”。海军指挥官穆拉德·雷斯（Murad Reis）是坚定的反美派，他抵达阿尔及尔时的名字是彼得·莱尔（Peter Lisle），一个嗜酒的苏格兰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娶了帕夏的女儿，但并没有改掉酗酒的毛病。<sup>22</sup>伊顿还写道，“请放心，美国人的神与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神是同一个神；是唯一真神，无所不能的上帝”。<sup>23</sup>他发现突尼斯与其邻国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一个启蒙中的世界。当他看到北非穆斯林社会中大量的黑人和白人奴隶时，他开始质疑整个奴隶制度的正义性：

当我描述它时，我的灵魂悔恨不已，这的确是我在我自己的国家亲眼看到的野蛮情景的重现。然而，我们却在吹嘘自由和自然的正义。<sup>24</sup>

532 伊顿注意到，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犹太商人似乎主宰着贸易。他提到了一间犹太人的贸易公司“乔纳塔”（*Giornata*），它每年向突尼斯总督支付六万皮阿斯特（*piastres*），在里窝那还有一间“工场”或者说是货栈。他还指出，每年从突尼斯出口二十五万件兽皮以及大量蜂蜡。此外，这里还向欧洲出售油、小麦、大麦、大豆、枣椰、盐和牲畜（包括马匹）；当英法两国战斗正酣之际，拉古萨人作为承运人，凭借杜布罗夫尼克在其最后几年向“高门”纳贡所得到的特殊地位，获得了丰厚利润。与此同时，突尼斯的大市场（*souk*）也渴求着美国人带到北非的商品：“棉布、毛呢、精纺衣料、铁、咖啡、糖、胡椒、各种香料、白色蜡烛、胭脂虫红、干鱼和木材。”他预计这些商品在突尼斯的价格是在美国购买时价格的三倍。<sup>25</sup>他的评注表明，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美国与北非间的直接贸易，还是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转运贸易。他的评述证明突尼斯、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缺乏制造业；虽然这里对外出口大量的蜂蜡，但是蜡烛也需要进口。然而，北非缺乏优质木材始终是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要建造自己的海盗舰队的国家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购买或截获外国船只来解决，但公元17世纪末，在英国与荷兰的压力下，柏柏尔舰队已经衰落；到1800年，每个国家如果能够征集到12艘海盗战舰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只有美国与柏柏尔诸摄政国保持和平关系，美国人才有可能参与

北非贸易以及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贸易。托马斯·杰斐逊曾记录道，美国大量的大麦与面粉出口到地中海，此外还有大米、咸鱼或干鱼，每年能装满一百艘商船；但“显然，对我们的商人来说，他们冒险进入地中海，会遭到北非海岸上海盗国家的劫掠”。<sup>26</sup>

### 3

从获得独立的那一刻起，美国就试图解决柏柏尔海盗问题。公元1784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与柏柏尔国家谈判。摩洛哥苏丹是第一位承认美国独立的统治者。从1786年到1797年，美国分别与摩洛哥、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签署了协议。在1794年12月与阿尔及尔签署的协议中，美国人承诺立刻向总督提供64.25万美元以及价值2.16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包括火药、炮弹、松木桅杆和橡木板材等；他们还送给他一套金色茶具。这与总督最初提的条件差距很大，他的要求是：现金224.7万美元，两艘铜制装甲护卫舰。即便如此，困难仍然存在，当总督抱怨他应得的钱还未到账时，就必须再送上新的礼物——“为他准备了一艘新建的、带二十门火炮的美国战舰，这种船可以行驶得非常快，是给总督之女的礼品”——但总督还是要到了一艘载有三十六门火炮的战舰取而代之。<sup>27</sup>北非的统治者总是责骂他们从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得到的货物品质低劣、分量不足。基督徒诸国确实偷工减料，因为在它们看来，这些要求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533

公元1800年，一艘体积硕大的美国运兵船“乔治·华盛顿号”抵达阿尔及尔港，这艘用东印度商船改造而成的军舰载着当地统治者期待获得的礼物，以及糖、咖啡和鲑鱼。阿尔及

尔总督在惯常地抱怨美国人又拖延上缴礼物后，立刻要求该船船长带着阿尔及尔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船长害怕极了，以至于不敢拒绝。他这艘奇怪的货船还被称为“诺亚方舟”：船上不仅仅有马、牛和一百五十只羊，还有四只狮子、四只老虎、四只羚羊和十二只鸚鵡，还带着一百名黑奴以作为年贡献给奥斯曼苏丹，此外还有随同使者访问的众多随从。船长被要求悬挂阿尔及尔旗帜，不过他很快就换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有报道称，水手们嘲弄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礼拜的时刻使船旋转，以至于礼拜的人无法辨认麦加的方向。<sup>28</sup> 美国人尴尬地从自己的报纸上得知此次航行中的丢脸行为，他们与总督的关系虽然摇摇欲坠，却仍然得以维持。即便美国与阿尔及尔的关系已经跌至谷底，但也勉力维持着，在这个时候，它与黎波里的关系却由于帕夏要求更多的贡赋而恶化。由于没有得到所要求的贡赋，帕夏派人将美国公使馆前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杆砍倒，并派船去自行劫掠；他的小舰队除了一艘被俘获的瑞典船外，还有一艘船是数年前从美国人那里捕获的波士顿的“贝蒂号”（*Betsy*），此时被改名为“梅舒达号”（*Meshuda*）。<sup>29</sup>

534

在公元1801年10月到1803年5月这段时间，法国与英国保持和平，美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正致力于利用地中海的相对平静来获取商业利润。但柏柏尔诸国一次又一次地阻挡着他们的道路，于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次觉得自己被迫要与另外一个国家开战了。1802年，瑞典人出于他们自己的不爽，欣然与美国人一起封锁的黎波里。这场冲突逐渐发展，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当摩洛哥皇帝要求美国人为其向的黎波里运送谷物的商船提供保护并遭到拒绝时，皇帝出于愤怒向美国宣战。<sup>30</sup> 于是，1803年10月，正在执行封锁的黎波里任务的护卫

舰“费城号”（USS *Philadelphia*）在追逐一艘的黎波里舰船时搁浅。这艘船与船上三百零七名船员被帕夏的士兵抓获。帕夏认为他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榨取四十五万美元的赎金。美国舰队的指挥官普雷布尔（Preble）仍然决定要以武力解决，坚信敌人拥有“费城号”就可以在海上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优势：甚至在和平时期“费城号”都可能被用来进行海盗袭击，或者作为从美国人和欧洲人那里压榨更多钱财的筹码。那艘船必须毁掉或最好重新夺回。他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决定在夜间攻击且夺回这艘船。2月16日夜幕降临后，双桅纵帆船“无畏号”（*Intrepid*）受命前往的黎波里，由中尉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指挥，还放肆地悬挂着英国国旗。“无畏号”堂而皇之地进入的黎波里港：海港领航员被船员用“法兰克语”告知他们的船装载着补给品。与此同时，的黎波里的舰队仍在沉睡，并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迪凯特领导的这次攻击成功地成为美国传奇，轻而易举地迫使大多数敌人四处逃窜。美国人明白他们无法将“费城号”带回自己的战线上，因此在夺回后的一刻钟内就放火将其烧毁。据说，整个的黎波里城都被火光映红。<sup>31</sup>1804年8月，对的黎波里海港进行的另一场攻击为迪凯特赢得了更响亮的声誉：据称，他得知一位身材高大的土耳其马木留克军人在那天之前杀掉了他的兄弟；他与那位身躯庞大的马木留克军人扭打在一起，即使短剑断裂也没有放弃，最后（一名无私的水手救了他的命，挡住针对迪凯特的致命一击），他成功地近距离杀死了那名土耳其人。这件事在美国各地通过绘画和报刊广为传颂。它表明美国人的勇气如何战胜了野蛮强大的力量，个子矮小的、自由的和坚定果敢的迪凯特如何战胜又黑又丑陋的马木留克奴隶。

在的黎波里取得的这一小小胜利给美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信心。<sup>32</sup>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摧毁帕夏的意志，美国人于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也是威廉·伊顿长期主张的计划。伊顿乘船前往亚历山大，以寻找的黎波里王位的竞争者哈麦特（Hamet），后者被自己的弟弟优素福排挤。伊顿发现优素福带着一支（主要由阿拉伯人构成）军队，在恶劣的环境中，由埃及沿陆路向的黎波里进军。他们花费了六个星期才行进四百英里，抵达了德尔纳（Derne），他们认为这座沿海城市有可能接受哈麦特为其统治者。最后，美国未能将哈麦特推上的黎波里的统治者之位，但哈麦特返回的威胁迫使帕夏议和。他愿意接受更为适当的条款，绝对无法与其他北非统治者敲诈的财富数额相比，大约是6万美元的赎金。<sup>33</sup>

#### 4

阿尔及尔人实际上更加棘手。公元1812年，当得知美国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后，阿尔及尔总督决定继续向美国人施压，此时的美国人还无法在地中海调集一支舰队。他坚持称“阿勒格尼号”（*Allegheny*）带来的礼物品质低劣：例如，他要求的是二十七条大直径绳索，但只得到四条。他要求补偿2.7万美金，当遭到美国人拒绝后，他就将他们驱逐，最终美国人不得不屈服答应支付这笔钱，公使利尔（Lear）不得不从巴克利家族以25%的利息借款。<sup>34</sup>与此同时，阿尔及尔人还将被捕获的美国双桅横帆船“埃德温号”（*Edwin*）带回自己的港口，在西班牙的英国军队支持下从事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走私贸易（并且完全忽视英美关系的严重恶化）。“埃德温号”



的水手与船一同被留在阿尔及尔，而美国政府全力投入大西洋海岸以及加拿大的战争，无力关注地中海，决定派使者前往马格里布，希望谈判能够成功。莫迪凯·诺亚（Mordecai Noah）被任命为突尼斯公使。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热衷于向其犹太同胞说明，他们在美国社会都有自己的地位，他鼓励“希伯来民族”带着资金从旧世界跨越大西洋，实现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对巴克利家族非常了解，而诺亚可以通过犹太同胞用更有价值的方式接触到总督。1814年冬，他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建立了与直布罗陀的犹太人社区的联系，从当地的一位领袖那里得到一封给巴克利家族的引荐信。但他只换回了一小部分美国俘虏的自由。<sup>35</sup>

536

麦迪逊总统并非好战者，但美国已经在对抗的黎波里的战争中染了血，并把与阿尔及尔的战斗视为终结柏柏尔统治者胡搅蛮缠的第二阶段。公元1815年2月17日，美国与英国媾和；一个星期后，麦迪逊要求国会对阿尔及尔宣战，美国人集结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舰队（只有十艘战舰）。民族英雄斯蒂芬·迪凯特负责指挥此次远征。<sup>36</sup>他完成了大家的预期，在尚未抵达阿尔及尔时就捕获了数艘阿尔及尔船。因此，他向总督提出条件时拥有极佳的优势，而此时的总督刚刚就职（此前两任总督均被刺杀）。当总督的使者要求迪凯特花点时间考虑美国人想在和约中提出怎样的条件时，迪凯特回答道：“一分钟都不用！”<sup>37</sup>他与阿尔及尔签署和约后，立即与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签署和约。阿尔及尔和约规定了要释放美国俘虏，规定了美国公使的职权，但它对地中海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第二条：从此无须缴纳礼物或贡赋。这是迪凯特远征的最大成就。树立了这一先例后，欧洲列强充分理解了它的重要性；他们赋予美

国比以往更多的尊重。美国人也庆祝自己的成就——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写道：“我们在地中海上的战役，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以来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事件。”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但它用一支全新的海军取得的胜利更加令人印象深刻。<sup>38</sup>对柏柏尔人的胜利是美国民族认同形成的决定性时刻。

## 5

587 同样，在东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秩序。到公元1800年，奥斯曼苏丹发现他在埃及以及希腊的臣民们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埃及督军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利用拿破仑军队到来以及撤退后遗留下来的混乱，推翻了奥斯曼人委任的马木留克官员，在1805年成为埃及的统治者。虽然他承认奥斯曼的宗主权，并正式作为总督行使职权，但他完全拥有主权。他是阿尔巴尼亚人，讲阿尔巴尼亚语和土耳其语，不懂阿拉伯语，他的眼光投向的是奥斯曼世界以外的地区，努力从西欧，特别是法国引入知识与技术——他之于埃及就相当于彼得大帝之于俄国。他将经济增长视为实现自己计划的关键，将土地收归国有，并建造了一支作战舰队。这些政策在细节上几乎神奇地让人联想到两千年前托勒密王朝的政策。他鼓励采用新农业体系，包括灌溉工程，因为他意识到西欧对高品质棉花的迫切需求，他还热衷于建立工业基地，因此埃及不会仅仅是向更富庶国家提供原材料的出口方。<sup>39</sup>他的野心是使埃及从19世纪初改变欧洲的经济扩张中获利。例如，他注意到亚历山大已经衰退到相当贫穷的境地：城市的规模和人口严重衰减，如今比一座小村庄大不了多少；其长途贸易也不再

那么重要。穆罕默德·阿里治下的亚历山大开始复苏，吸引了东地中海各地移民的到来，包括：土耳其人、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sup>40</sup>

公元 19 世纪 20 年代，穆罕默德·阿里不断增强的自信还表现在他试图将其统治权扩张到克里特与叙利亚。如果他想要把埃及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海上强国，这位总督就需要得到大量木材的产地，因此与过去的数千年一样，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控制森林茂密的土地。在 19 世纪 20 年代，他所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奥斯曼人对欧洲领地的经营很不成功，但对非洲领地的管理要成功得多。1821 年，摩里亚（Morea）爆发起义，这里的地理环境对起义者比较有利，因此起义军很快控制了农村地区，土耳其人控制的区域只剩下纳夫普利翁、莫顿和科伦。即便如此，土耳其人也没有掌控大海。伊兹拉岛（Hydra）和萨摩斯岛等地成为新的反抗中心。自 17 世纪以来，希腊的商人公会越来越活跃，这时候他们胡拼乱凑起一支舰队，该舰队主要由装备着火炮的商船组成。一支希腊舰队有三十七艘战舰，另一支有十二艘，其指挥官均来自伊兹拉岛。到 4 月底，这些经验丰富的希腊老水手们已经俘获四艘土耳其人的战舰，包括两艘护卫舰，这使得希腊人有信心在爱琴海巡逻，并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与土耳其舰队对峙；尽管希腊的舰队无法对抗土耳其的舰队，但他们未遭受重大损失，成功撤退。到 1822 年时，土耳其政府被希腊人的海上侵扰激怒，集结了一支更大规模的土耳其舰队，这些战舰主要从柏柏尔人的国家征调而来。4 月，当一支希腊远征军正在希俄斯岛上攻打其城堡时，土耳其人登陆干涉。希腊军队被赶走，土耳其人上岛并继续屠杀了当地许多居民，自然，这

场大屠杀也被纳入希腊人英勇抗击土耳其人的历史篇章，成为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sup>41</sup>希腊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五个半月之后，他们屠杀了生活在摩里亚半岛的黎波里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在过去的数个世纪当中，许多希腊人变成了穆斯林，许多土耳其人也被希腊化。希土战争中的大屠杀与宗族灭绝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正是建立在对东地中海希腊与土耳其的共同文化遗产的悲剧性否定的基础之上。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英国、法国、德意志等国的观察家们为希腊人的胜利欢欣鼓舞，他们将希腊人视为古典世界的后继者，早在其学生时代就学习到这个世界的历史、哲学与文学。然而各国政府对起义者提供支持时则更为谨慎：讲究实用主义的英国政府考虑的是，他们是否需要奥斯曼帝国在这个时候崩溃，穆罕默德·阿里也持同一看法，不过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帝国还能延续很长时间。问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分崩离析将会改变欧洲列强的整体平衡，即破坏拿破仑在滑铁卢最终失败后形成的“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的微妙结构。

539 对此，奥地利很是担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它在东地中海维持着一支比英国舰队更大的舰队（二十二艘战舰）。在希腊人看来，奥地利人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们宁愿与土耳其人贸易，然而奥地利人所做的不过是继续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途经杜布罗夫尼克及其附近地区的达尔马提亚和东地中海之间的商业往来。<sup>42</sup>直到公元1827年，欧洲列强才向希腊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也把希腊人的起义看作为自己摘取成熟果实的机会，因此在1825年初，他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希腊。他打算将克里特、塞浦路斯、叙利亚以及摩里亚半岛纳

入自己的帝国，并且设想，倘若立即将那里的希腊人驱逐，并将埃及的农民（*fellahin*）迁移到希腊南部，他就可以控制希腊。因此，他的目标是几乎控制整个东地中海。他不惜代价，派遣六十二艘战舰前往克里特东部海域，希望在爱琴海南部击溃希腊人的海军力量。<sup>43</sup>

公元 1827 年 10 月，当对峙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时，一支由十二艘英国军舰、八艘俄罗斯军舰和七艘法国军舰组成的舰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附近海域，几乎突然被卷入与一支奥斯曼舰队的战斗当中，这支奥斯曼舰队包括从土耳其、埃及和突尼斯调集来的六十艘战舰，其中还有三艘大型战列舰（其对手拥有十艘战列舰）。尽管双方已签署休战协议，土耳其人仍然拒绝这支联合舰队进入纳瓦里诺湾。盟军决定需要展示一下武力，于是，一场在海湾内的全方位战争开始了，战争中土耳其舰队被打成碎片。一些土耳其小船逃往亚历山大；其他的全部沉没。这支联合舰队，特别是英国、俄国以及法国的旗舰也遭损毁，一百八十二人阵亡。盟军并不特别清楚胜利后要做什么——奥斯曼苏丹的还击方式是对异教徒宣布开始圣战，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意识到希腊人内部的乱斗，派遣自己的战舰来辖制那些让人厌恶、各行其是的希腊船长们。<sup>44</sup>但纳瓦里诺海战是达成和约的关键一步，这一和约使处于松散的奥斯曼宗主权下的希腊南部的独立，在 1828 年获得承认。如今，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最有希望的未来是重新发展亚历山大与英国、法国的贸易，因此，在此后的数年中，他改建了造船厂，

投资连接亚历山大与尼罗河三角洲的马赫穆迪运河（Mahmudiyah）。这条运河建成于十多年前。<sup>45</sup>如今是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了。

## 6

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也是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结果，事件的核心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柏柏尔海盗的活动，而是巴克利金融家族。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阿尔及利亚的谷物就源源不断地供给法国军队，但法国人从未把购买这些谷物而不断累积的债务当回事儿。到公元1827年，巴克利家族的资金出现短缺，坚持要求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法国人的欠款到账之前赔偿他们的债务。总督认为，巴克利家族是在与法国人勾结，想要从他手中勒索钱财。<sup>46</sup>当然，近代历史表明，恰恰是总督们更热衷于从他人那里勒索钱财。总督也怀疑法国人，是因为法国人开始加强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两座商站的防御工事。于是，1827年4月29日，总督与法国公使发生争吵，争吵中，总督狂怒之中用苍蝇拍击中了法国公使的脸。法国人的反应是要求鸣礼炮向法国国旗致歉，但总督甚至不愿意考虑一下这一象征性动作，反而派出私掠船袭击法国军舰。1829年夏，法国人封锁了阿尔及尔港口。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想通过征服阿尔及利亚来解决双方的问题，起初，只是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让亲法的穆罕默德·阿里统治这里。

马赛商会从商业方面提出一些理由支持对阿尔及尔的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贸易封锁，再加上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妨碍了法国人在黎凡特的贸易。马赛商人希望拥有处于法国人控制之下的安全的、有保障的贸易伙伴。显然，位于马赛正南方的阿尔及尔就是这样的目标。事实也证明征服这里非常简单。公元1830年7月，总督被流放到那不勒斯，而且还不得不将大部分钱财留给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摄政国的小城

市——奥兰与君士坦丁（Constantine）被分配给友好的突尼斯王公——西班牙人在占领了奥兰将近三百年之后，觉得占领它耗资过大，于1792年将它卖给穆斯林。<sup>47</sup>不过，这时法国人的头脑中还远远没有弄清楚他们想从阿尔及利亚得到什么。他们发现自己正在攻击阿尔及利亚西部及东部的目标：君士坦丁的统治者有自己的想法，要将他的城市发展成为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中心，此外，阿尔及尔东部的安纳巴（Annaba）也陷入混乱。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已经深陷阿尔及利亚的乱局当中，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北非统治者向奥斯曼人求助，但后者不打算给予他们任何慰藉，部分原因是缺乏资源和毅力。然而，虽然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地方性冲突，但这里依然吸引了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1847年，有将近11万居民迁居于此，他们不只是简单地隐于城市之中，因为许多人希望获得从旧政权的国有地产分离出来的各类地产。<sup>48</sup>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各个城市见证了大量的建设工程，阿尔及尔拥有了宽阔的街道以及坚固、雄伟的建筑，变成了一座新马赛。征服阿尔及尔只是第一阶段，其后出现的一系列殖民征服，使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不过在1830年它还没有诞生）将地中海的许多战略要地瓜分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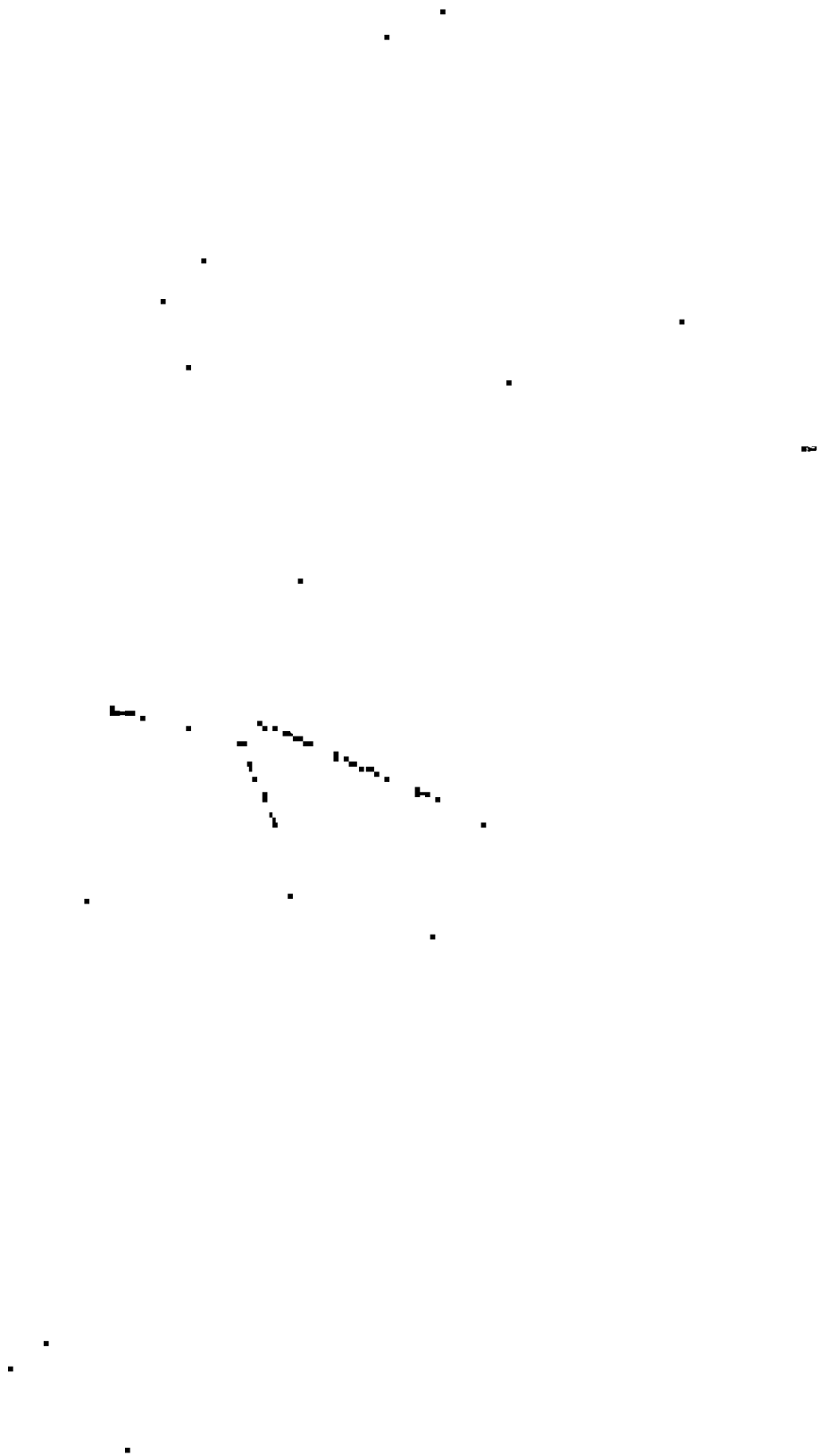
第四地中海的历史始于这样一个时代：威尼斯、热那亚与加泰罗尼亚的桨帆船努力搏斗，越过海洋前往亚历山大。其终结时，埃及以过去的统治者只能梦想着的方式，成了通往东方的通道。当最后一艘清淤船完成任务，苏伊士运河开通，帆船和蒸汽船都能够畅通航行时，地中海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第五地中海——开始了。

## 注 释

1. P. Mackesy,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1803-1810* (London, 1957), pp. 121-53.
2. In 1803: *ibid.*, p. 21.
3. *Ibid.*, pp. 98, 319.
4. *Ibid.*, appendices 1 and 5, pp. 398, 403-4.
5. R. Knight, *The Pursuit of Victory: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 of Horatio Nelson* (London, 2005), p. 555.
6. Mackesy,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p. 229.
7. *Ibid.*, pp. 352-5; L. Sondhaus, *The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Austrian Naval Policy 1797-1866* (West Lafayette, IN, 1989), p. 42; M. Pratt, *Britain's Greek Empire: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Ionian Islands from the Fall of Byzantium* (London, 1978).
8. D. Gregory, *Sicily, the Insecure Bas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Sicily, 1806-1815* (Madison, WI, 1988); Knight, *Pursuit of Victory*, pp. 307-27.
9. Mackesy,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p. 375.
10. F. Tabak, *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1870: 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 MD, 2008), pp. 221-5; D. Mack Smith, *A History of Sicily*, vol. 3, *Modern Sicily after 1713* (London, 1968), pp. 272-4; Gregory, *Sicily*, p. 37.
11. L. Wright and J. Macleod, *The First Americans in North Africa: William Eaton's Struggle for a Vigorous Policy against the Barbary Pirates, 1799-1805* (Princeton, NJ, 1945), pp. 66-8; F. Lambert, *The Barbary Wars: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the Atlantic World* (New York, 2005), p. 91; R. C.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1559-1853* (Liverpool, 1951), pp. 394-5.
12. Lambert, *Barbary Wars*, p. 90.
13. Testimony of Elijah Shaw in M. Kitzen, *Tripoli and the United States at War: a History of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he Barbary States, 1785-1805* (Jefferson, NC, 1993), pp. 97-101.
14. J. London, *Victory in Tripoli: How America's War with the Barbary Pirates Established the U.S. Navy and Shaped a Nation* (Hoboken, NJ, 2005).
15. J. Wheelan, *Jefferson's War: America's First War on Terror 1801-1805* (New York, 2003), pp. xxiii, 1, 7, etc.;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106-7.
16. F. Leiner, *The End of Barbary Terror: America's 1815 War against the Pirates of North Africa* (New York, 2006), p. ix.
17. Lambert, *Barbary Wars*, p. 118.
18. *Ibid.*, p. 8; also pp. 109-13.
19. *Ibid.*, pp. 9, 11, 23.
20. *Ibid.*, pp. 47, 50, 76.
21. Wright and Macleod, *First Americans*, p. 48.



22. Kitzen, *Tripoli*, pp. 49–50.
23. Cited in extenso in R. Zacks, *The Pirate Coast: Thomas Jefferson, the First Marines, and the Secret Mission of 1805* (New York, 2005), pp. 189–90.
24. Leiner, *End of Barbary Terror*, p. 19.
25. Wright and Macleod, *First Americans*, pp. 54–5; Lambert, *Barbary Wars*, p. 31.
26.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30, 34.
27. Kitzen, *Tripoli*, pp. 19–20; Lambert, *Barbary Wars*, p. 87.
28.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100–103; Kitzen, *Tripoli*, pp. 40–42; Wheelan, *Jefferson's War*, pp. 96–7;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 396.
29. Lambert, *Barbary Wars*, p. 101;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397, 403.
30.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133–4;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 407.
31.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140–44; Kitzen, *Tripoli*, pp. 93–113.
32.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146–8; Kitzen, *Tripoli*, p. 122, and plates on pp. 123–4.
33.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130–54; Kitzen, *Tripoli*, pp. 135–76.
34. Leiner, *End of Barbary Terror*, p. 23.
35. *Ibid.*, pp. 26–36.
36. Navy orders to Decatur: *ibid.*, appendix i, pp. 183–6.
37. Lambert, *Barbary Wars*, pp. 189–93; Leiner, *End of Barbary Terror*, pp. 87–122, and appendix iii, pp. 189–94 for the Algiers treaty.
38. Leiner, *End of Barbary Terror*, appendix iii, pp. 189–94 (p. 189 for article 2); Lambert, *Barbary Wars*, p. 195.
39. G. Contis, 'Environment, health and disease in Alexandria and the Nile Delta', in A. Hirst and M. Silk (eds.),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2nd edn, Cairo, 2006), p. 229.
40. O. Abdel-Aziz Omar, 'Alexandri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Ismail', in *The History and Civilisation of Alexandria across the Ages* (2nd edn, Alexandria, 2000), pp. 154, 158–9.
41.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483, 486–7.
42. *Ibid.*, p. 508; Sondhaus,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 63.
43. Anderson, *Naval Wars in the Levant*, pp. 492–3.
44. *Ibid.*, pp. 523–36.
45. K. Fahmy,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Alexandria', in Hirst and Silk (eds.),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p. 283–4.
46. J. Abun-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 1987), p. 249.
47. *Ibid.*, pp. 164, 166, 251, 254.
48. *Ibid.*, p. 261.



**第五部**  
**第五地中海**  
**(1830 ~ 2014 年)**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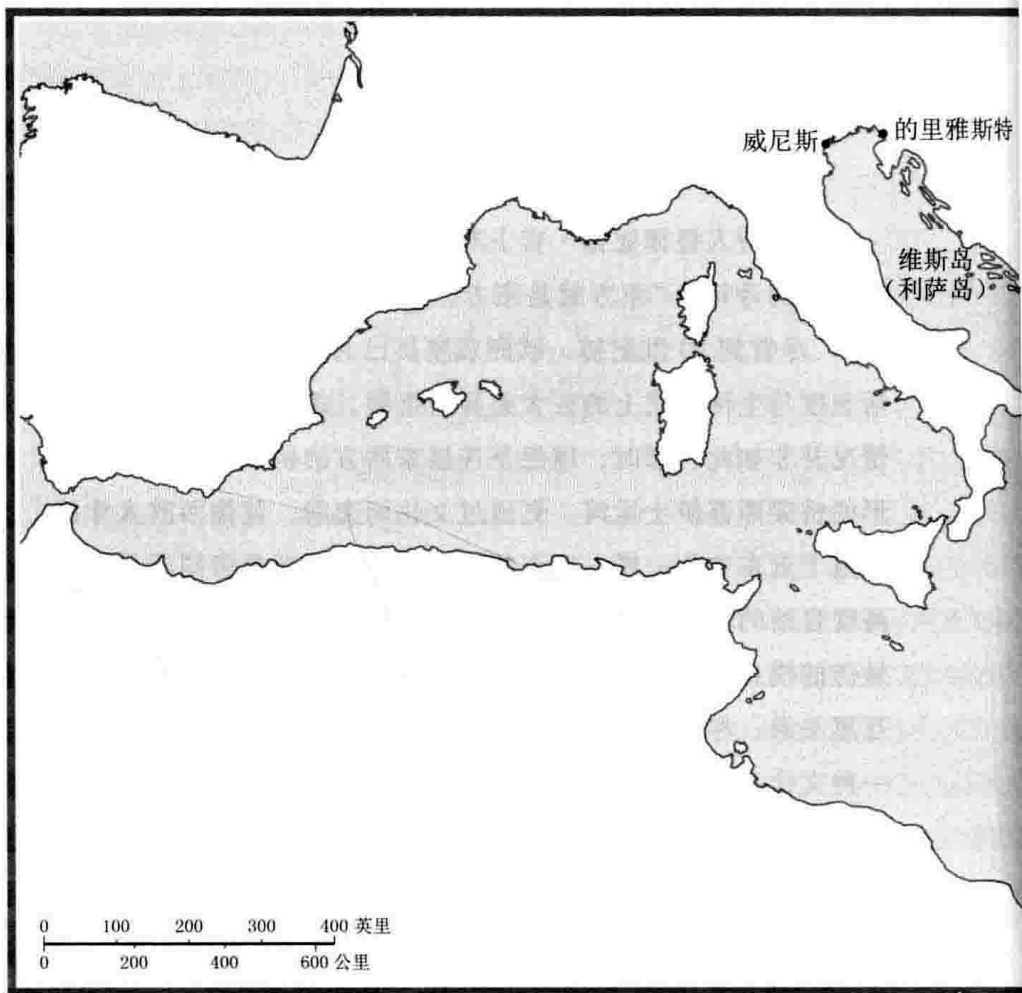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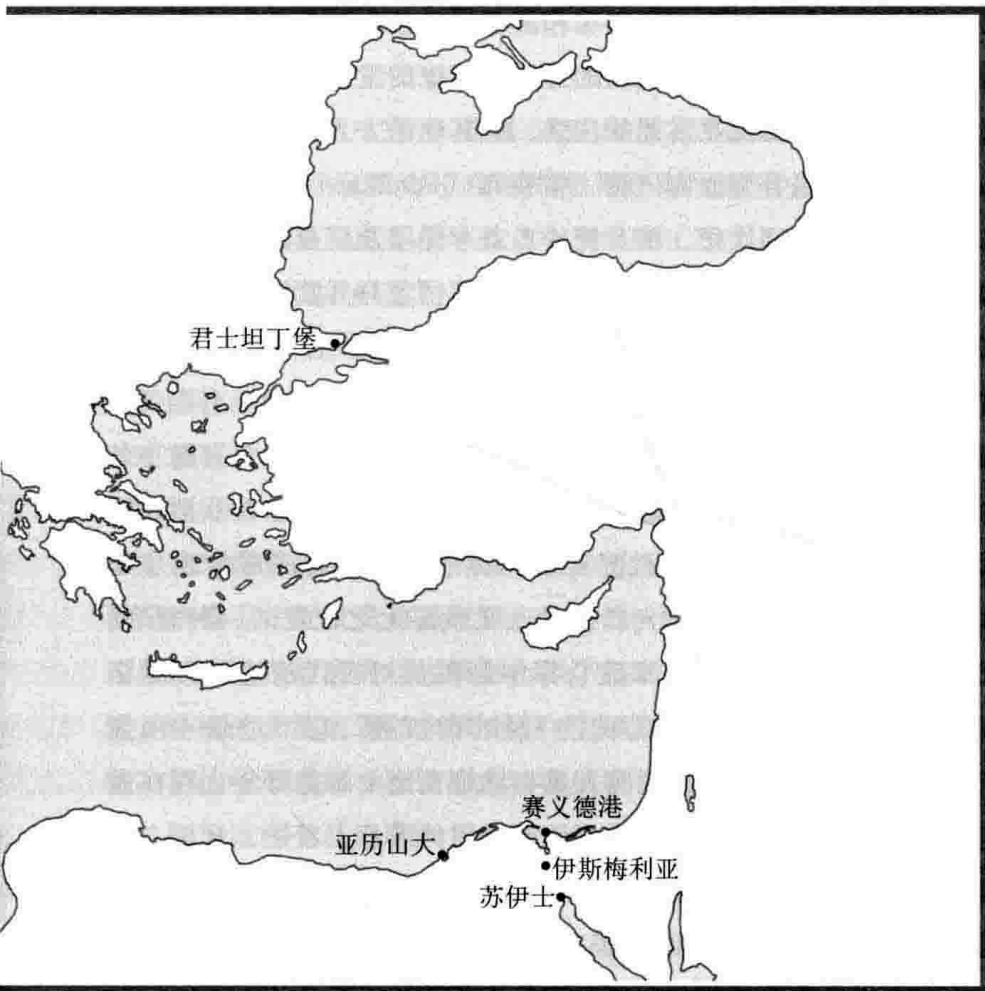
•

# 一 昔日二者即将相见 (1830 ~ 1900 年)

## 1

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曾写过广为流传的诗句：“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相见。”尽管到 20 世纪初，欧洲观察员已为他们眼中东西方在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所折服，但在公元 19 世纪时，情况并非如此。那时，理想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不仅通过有形的桥梁即苏伊士运河，更通过文化而交融，就像西欧人津津乐道于近东文化一样，近东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与其高度自治的埃及总督——也看向法国和英国，以寻求他们可以效仿的模式，复兴治下日益凋敝的经济。于是，这便成为一种互惠关系：尽管有些人将“东方主义”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文化表达，但地中海东部的主人却仍旧积极寻求与西方的文化接触，并将自身视为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君主俱乐部的成员。<sup>1</sup>于 1863 ~ 1879 年担任埃及总督的伊斯梅尔帕夏 (Ismail Pasha) 总是身着欧洲服饰，尽管他偶尔也穿上礼服，佩戴肩章，头顶土耳其帽；他讲土耳其语，而不讲阿拉伯语。同样，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特别是他们的臣子（如伊斯梅尔，通常是阿尔巴尼亚人），经常炫耀西式服装。当然，他们在运用西方理念时也是有选择性的。埃及总督乐于送聪明的下属前往拿破仑时代的产物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学





习；与此同时，他们并不鼓励过多参与法国沙龙：他们希望引入激进的理念，但这种理念仅关乎技术，不涉及政体。到 19 世纪初，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圣战士之基地的理念几乎完全消失。由于在东方失去了陆军和海军优势，奥斯曼帝国已不再是恐惧的来源，而成为迷人的目标。传统的生活方式引起了西方艺术家，如德拉克洛瓦的注意，但其他西方人，尤其是苏伊士运河的修建者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却热衷于推进现代化。埃及统治者急于使埃及跻身欧洲。他们没有看到自身所处的黎凡特非洲角落的位置与其欧洲使命间的矛盾：欧洲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理念，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片地域。<sup>2</sup>

拿破仑在东方的征战激起了法国人对埃及的极大兴趣：就像古埃及曾是宏伟、富有帝国的所在地，现代法国在欧洲、在地中海以及更广阔的世界起着同样的作用。其深层的理念是“文明”，是法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之位置的一种理念。对古埃及的迷恋始于拿破仑军中制图员对古代遗迹的详尽记录；这种详尽记录还算不上一心醉沉迷，它不过是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表现出法国人具有称雄东地中海的野心，而在这一野心中，法国以法老和托勒密帝国的继承人自居。拿破仑一世之后，埃及并未丧失魅力与风姿：在其外甥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时期，即公元 1848 年至 1870 年，“第二帝国风格”在优雅的家具和建筑细节方面追寻着埃及的装饰形式。与古代埃及的精神世界进行沟通的难度在于它们的文本难以释读。然而，在法国军队在罗塞塔（Rosetta）发现了用圣书体、祭司体和希腊文篆刻的石碑——该石碑一度被拿破仑据为己有（尽管现在它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后，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1822



年，年轻的法国天才商博良（Champollion）对埃及铭文的释读，打开了通向古埃及的新窗口，这与若干年后占领阿尔及尔的行动同样重要，其使法国相信，它在地中海奥斯曼统治的那些土地上拥有一种使命。

当时有一些被东方魅力吸引的狂热人士。公元1830年前后，巴泰勒尔米 - 普罗斯佩·安凡丹（Barthélemy-Prosper Enfantin）成了一名致力于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建立联系的新教派的自封先知。这不单单是一个贸易和工程方面的问题。安凡丹在东方与西方的实际接触中发现一种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在这种新秩序中，西方理性思维的阳性原则将和东方神秘生命力的阴性原则融为一体，“使地中海成为东西方联姻的婚床，并通过开凿纵贯苏伊士地峡的运河来完善这段婚姻”。因为这宗婚姻，一个和平的世界将会诞生，在这个世界中，半人半神的安凡丹将被誉为圣保罗的继承人，更无须提及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了。这只是他思想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他坚持不懈地向妇女示以敬意的行为使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许多人感到不解；怪诞的天蓝色服饰与喇叭裤也很容易使他成为巴黎的笑柄。但他依旧参加了法国沙龙，在他获得穆罕默德·阿里接见时，阿里谦谦有礼地聆听了他关于用运河连接东方和西方的建议，而在此之前，他曾在地中海与苏伊士之间调查那里的地形地貌。<sup>3</sup>埃及总督对于招商引资、推动辖区经济发展的诉求与任何人无异，但他认为穿越沙漠的运河是对其资源的消耗，而不是一笔资产：他怀疑运河会使埃及心脏地带的贸易发生转移，不会为亚历山大或开罗（现在已经由尼罗河与马赫穆迪运河连接起来）带来收益，而是会将大量收益转到试图在法国或英国和印度之间进行贸易的西欧商人手中。

549 安凡丹的古怪想法在其祖国法国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他绘声绘色地表达了一种开始引导法国人思考社会和经济的设想。受圣西门（Saint-Simon）著作的影响，安凡丹和他的同代人坚持认为有必要逐步改善物质和道德状况。包括铁路和轮船在内的新科技的出现开始改变欧洲的经济，然而工业化的阴暗面不久即在英国显现。但在巴黎的沙龙中，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并继续受到革命时代的法国风尚的哺育。进步已成为理想。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它在穆罕默德·阿里治下的埃及已成为理想，程度并不亚于在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治下的法国。以苏伊士运河为例，将理想变为现实的正是斐迪南·德·雷赛布。他将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开办运河公司所需要的细节掌控能力融为一体，以便继续他的计划，直到他摆平拒绝其计划的反对派。他不知疲倦地乘船往返于法国和黎凡特之间，也前往西班牙、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甚至前往敖德萨，以确保他能在纷繁复杂的政客、投资者、专业工程师——运河工程依赖这些人——构成的人际网络中了解进展。他因家族与路易-拿破仑——自公元1848年起担任共和国总统，1852~1870年称帝——沾亲带故而拥有无可比拟的家族优势：他的表姐是皇后的母亲。

许多人声称修建运河是他们的主意，尽管开凿于西奈半岛西部石质荒漠中、连接地中海与红海的古运河遗迹还依稀可见。在公元前3世纪时，“恋姐者”托勒密二世曾将波斯人于前500年修建的运河的故道延长。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联系一直到阿拉伯时代早期都是开放的，偶尔会有中断。但其目的十分有限：埃及的阿拉伯征服者阿穆尔·伊本-阿斯曾利用运河系统将埃及小麦运往麦加。<sup>4</sup> 运河能够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商

路的想法直到 19 世纪才正式出现，原因在于：埃及实际上就意味着尼罗河水路，而一条横贯沙漠的与尼罗河平行的水路无疑将夺走托勒密王朝、法蒂玛王朝和马木留克王朝严重依赖的赋税收入。

550 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如何构建两大洋之间的通路的想法。公元 19 世纪 20 年代，年轻的英国企业家托马斯·瓦格霍恩（Thomas Waghorn）注意到，从印度寄往英格兰的信件，存在长时间的延误，并发现从孟买到苏伊士之间存在一条潜在的路线，它可以运送那些愿意忍受炎热和旅途不适的乘客穿越从红海到尼罗河之间的沙漠。到达尼罗河时，原来想要休整的乘客们会因老鼠、蟑螂、苍蝇和跳蚤大批出没于溯流而上的蒸汽船和摆渡船中而受到惊扰。之后，他们去英格兰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每月定期的班轮服务将从亚历山大航行至马耳他与康沃尔的法尔茅斯（Falmouth）——这些蒸汽船的班轮服务容后再议。<sup>5</sup> 当雷赛布邂逅瓦格霍恩时，他甚为动容，并写道“他是一个榜样”——不仅是事业和勇气的榜样，更是在设法建立红海和地中海之间有效通道上树立了榜样。<sup>6</sup> 英国的立场始终认为尼罗河航道更为便捷。在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担任首相时，曾强烈反对雷赛布的计划。其中也存在技术问题，无论进行多少次地形勘察都不足以解决这些难题。红海的水平面与地中海一致吗？这项工程的目标是修建一条运河，而非瀑布。土壤的多样性——砂质荒漠、岩质荒漠、沼泽——使修建过程更加复杂。但是，在帕默斯顿反对立场的背后却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一旦工程获得成功，法国人将获得通往印度的通道，他们在埃及的声望将大大增强，而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利益将受损。

奥斯曼苏丹也根本不确定他是否想要修建一条通往红海的运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政治问题。雷赛布敦促总督们对运河做出自主决定，并且不要顾及某些人的想法——这些人认为修建运河需要获得奥斯曼苏丹本人的准许。被雷赛布的计划打动的第一位总督是赛义德（Said），他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很胖，穆罕默德·阿里曾对其子沉溺享乐之举感到绝望。其实赛义德是个狡诈精明的政客，他乐意派出地质勘察团，乐意在雷赛布的股份中投入巨资，甚至乐意承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报纸开支。赛义德确实摇摆不定，但他在这一工程项目中涉入越深，如果项目破产，他将遭受的损失也就越大。资金当然是个问题，尤其是当雷赛布于公元1856年无法同雅各布·德·罗斯柴尔德（Jacob de Rothschild）达成协议时。<sup>7</sup>雷赛布转而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并宣称要在世界范围内出售其股份，但只有埃及总督和法国人有投资热情。正如赛义德所发现的，当卖不出去的股份不得不推给总督时，雷赛布是个游说高手。赛义德是有回报的：运河北端的新港口将被命名为赛义德港（又译塞德港）；尽管一开始只有简陋的工地，但随着运河工程的推进，工地迅速扩大，到运河开通时，已经形成一座由填海的混凝土石块构成的超大防波堤。到1863年1月赛义德去世时，工程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要实现在1869年预定日期结束项目的目标仍然前途漫漫：大量土方需要搬运，设计航道沿线的高地需要爆破。到此时，解决方案仍需依赖赛义德招募的苦力——这是自以色列子民时代起就已在埃及实施的强制劳役。随着人们不断在尼罗河与运河间往返，强制劳役现象在欧洲引发担忧，因为他们有些类似奴隶，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效率低下。

所有这一切都随着新的总督，赛义德能干、高效的侄子伊

斯梅尔 (Ismail) 的继任而改变。他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支持运河的开凿，因为他是个大地主，而且不喜欢强制劳役制度，强制劳役常常在最需要农民 (fellahin) 劳动力的时候使他们脱离土地。他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了解西方人的理念。他无意使其宫廷民主化，但 (就像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那样) 他认为劳役制度在现代社会中早已不合潮流。正如他所说的：“埃及必须成为欧洲的一部分。”<sup>8</sup> 他终止了强制劳役制，这让雷赛布面临到哪去找劳工的问题，而且即使去远东的中国，也找不到足够的人力。答案就是机械化，这对现代人而言是完全合乎时宜的，到公元 1863 年底，波莱尔拉瓦利公司 (Borel, Lavalley and Company) 开始设计一系列适合运河航道沿线不同土质施工的机器。开凿运河的四分之三的土方是由这些机器完成的，主要是在修建运河的最后两年，即 1867 ~ 1869 年，但没有有什么事件是可以预见的：在最后一天，人们发现一块巨大的岩石伸进运河，威胁着所有吃水深度正常的船，这块岩石必须被爆破清除。<sup>9</sup> 使用机器让公司的开支成倍增长，但没有机器，工程绝不可能如期完成，而且运河要想获得总督、苏丹和法国皇帝的支持，迅速交付也是至关重要的。

552

伊斯梅尔确信，他可以使用可观的棉花税收来支持运河的修建。公元 19 世纪 60 年代，埃及从全世界对棉花的需求中收益颇丰，它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大西洋对岸的传统供货商美国正处于内战。长远来看，其前景并不如伊斯梅尔预期的那么乐观，但与大多数政客一样，他也认为繁荣背后不会有危机；1866 年，他已发生资金短缺，雷赛布甚至在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就在巴黎以高额利息举债。到运河完工时，伊斯梅尔帕夏已经支付了 2.4 亿法郎的建设费用，按目前的汇率计算，

约为 1000 万英镑。<sup>10</sup>在政治上，伊斯梅尔发现他不得不小心行事。他想让“高门”授予他一个新的头衔且其长子可继承的理所应当的权利，他将这一举动不无道理地视为对他的独立统治权的认可。土耳其人不情愿地拣出了赫迪夫（*khedive*，即埃及总督）这一古代波斯头衔给他，没有人清楚该头衔的准确含义，但它似乎是对王权的诉求。另外，随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实力增强，伊斯梅尔有充分的理由提高警惕，至少对运河区内的欧洲殖民者而言，苏伊士运河公司已充当了自治政府的角色。侵蚀埃及对运河的控制权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公元 1869 年 11 月运河的开通典礼清楚显示了赫迪夫对获得欧洲众统治者认可的渴望。来宾中有乘坐“艾格勒号”（*L'Aigle*）明轮蒸汽船的法国皇后欧仁妮（*Eugénie*）、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以及来自普鲁士和尼德兰的王公。这一天同时依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仪式模式举行了宗教性的庆典，以标榜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皇后的忏悔神父宣称，“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今天是全人类的伟大节日”。这一全人类具有兄弟之情的信息，是安凡丹理所当然赞同的，也是伊斯梅尔想要促成的主题之一。神父还宣读了雷赛布的颂词，将他比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而雷赛布确信，此前还从未有过这种由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举行的仪式。<sup>11</sup>11 月 17 日，由三十多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赛义德港出发沿运河航行，达官显贵们在这一旅程中不时在沿途停留，进行各种茶歇和娱乐活动。皇后的明轮于 11 月 20 日抵达红海，并享受了鸣二十一响礼炮的接待。正如《泰晤士报》所报道的，雷赛布“将非洲变成了一座岛屿”。<sup>12</sup>

如今一切都依赖运河的吞吐量，赫迪夫乐观地希望从中获

得巨大利益；他有权获得运河航运收益的15%。显然，船主和商人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来适应通往东方的这一新的快捷通道。公元1870年，有40多万吨货物由大约500艘船装载着在运河中通行。187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75万吨。有人一度让赫迪夫相信，他将每年从500万吨货物中抽取赋税，而要达到这一数字得花上一段时间。当运河还在修建时，赛义德港就吸引了大量法国轮船（64艘）和许多埃及船只，以及众多土耳其帆船。奥地利帆船装载着来自威尔士和法国南部的煤炭，来自科西嘉和伊斯的利亚的木材，以及来自普罗旺斯的、运往西奈的不毛之地犒赏欧洲殖民者的葡萄酒。<sup>13</sup>将这些原始数据同运河开通之后那些年的原始数据进行对比，可直接感受到运河开通后发生的变化。从长期来看，这一数据有大幅增长：1870年有486艘船通过运河，1871年有765艘，而在19世纪70年代的其余年份，通过的船只均有1400艘左右，1880年突破了2000艘，1885年则达到了3600艘的高点，之后的数目只有小幅回落。尽管英国政府对这项工程反应冷淡，但英国商人却迅速加以利用，到1870年，三分之二的运输量被英国投资者占据。1870年之后的二十年，英国的优势愈发明显，以至于到1889年，联合王国占了680万吨的运河总运输量中的500万吨之多；这只让法国得到少许份额（36.2万吨），给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主要是的里雅斯特）留的份额就更少了。伦敦的贸易委员会宣称：“欧洲和东方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苏伊士运河，不列颠国在该贸易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sup>14</sup>

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在公元1870年股东们只能眼巴巴地盼望着，他们的不安随着运河公司被证实无力发放分红而愈发强烈，或者，正如一篇法国短评所写的：“苏伊士运河的

伤痛——零结果——接着便是毁灭！”<sup>15</sup> 雷赛布决定将注意力转到下一个运河工程上，即开凿巴拿马运河（该工程已超过了其技术和资金实力范围），而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法国皇帝已经被迫流亡，巴黎被巴黎公社接管。巴黎的秩序一经恢复，第三共和国就宣布坚定地支持运河，却无力救助不走运的投资者。伊斯梅尔基本上已被抛弃，1872年，因为资金短缺，他被迫举债8亿法郎（3200万英镑）；到1875年他的债务正逼近1亿英镑，而且仅仅是维护费就高达每年约500万英镑，他的各项资源被榨干的速度远远超过积累速度——1863年，埃及政府的税收收入远少于运河的维护费。他对借款人的吸引力在于他的抵押品：他拥有苏伊士运河的大量股份，包括当外国投资者不愿购买股份时雷赛布抛给埃及的那些。伊斯梅尔已带领埃及奔向更伟大的政治独立，但财政开支之巨却使他以独立为代价冒险妥协。1875年，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出售埃及所拥有的运河股份。法国买家做好了一掷千金的准备。然后，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得悉此事，并明白只要花费400万英镑，他就有机会获得地中海至印度洋航线的部分控制权。他告知维多利亚女王，购买运河的股份“只是花几百万的事”，“将至少足以使所有者对苏伊士运河的管理运作施加重大的（虽不能说是压倒性）影响。在这紧要关头，它对陛下您的权威至关重要，苏伊士运河应当归英国所有”。到1875年末，英国政府发现自己已拥有运河全部股份的44%，这使它成为运河的最大股东。迪斯雷利告知女王：“事情已办妥，您已拥有运河，陛下。”<sup>16</sup>

此番购买对埃及和地中海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盎格鲁-法兰西双方共管委员会（Anglo-French Dual Control Commission）



建立起来，以便管理埃及国库，并对赫迪夫的预算施加一定约束，此举大大增强了大不列颠在埃及事务中的影响力。但是，委员会授权赫迪夫以超低的价格将运河 15% 的税赋收入卖给一家法国银行，此举根本无助于巩固赫迪夫的地位。当伊斯梅尔555对国外贷款的依赖足以危及赫迪夫向君士坦丁堡缴纳的岁入时，奥斯曼苏丹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一举动是盎格鲁 - 法兰西接管埃及的第一步。伊斯梅尔梦想着从苏丹统治的地区获取新的资产，但向南方派兵却使他人不敷出。他变得愈发孤立：公元 1879 年，苏丹将他撤职，尽管身处如此宽容的时代，他还是遭受了被流放至那不勒斯湾的严重处罚。然而在罢免伊斯梅尔时，苏丹其实是迫于双方共管委员会的压力，亲近欧洲列强的伊斯梅尔之子陶菲克（Tawfiq）的继任只会使埃及进一步落入英国人的网中。到 1882 年，陶菲克受到国内的巨大压力：一次军事政变组建了一个由阿拉伯人领导的敌视土耳其 - 阿尔巴尼亚旧贵族的政府。1882 年夏末，在一支英格兰派遣军的帮助下，英军炮击亚历山大港为欧洲人泄愤，因为那里发生了对外国人的大屠杀；英军确保了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并向开罗推进，其公开目标是助陶菲克复位。<sup>17</sup>埃及实际上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即便赫迪夫（和他的继承者，即埃及国王）获准拥有大量自治权。在罢免伊斯梅尔的过程中，苏丹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导致奥斯曼帝国最终丢掉埃及，但事实上，当雷赛布的强制劳工撬动苏伊士运河的第一块草皮时，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就已经出现了。

## 2

公元 19 世纪中叶地中海发生的另一场变革是蒸汽轮船的

556 到来，随之而来的是铁甲舰。建造蒸汽轮船的第一次尝试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和法国。轮船航行的新特性是速度，可靠且匀速。但速度不应该被夸大；8 海里/小时即可认为是快速。尽管如此，1837 年开通的从的里雅斯特到君士坦丁堡的轮船航线仍旧要耗时两周，相形之下，帆船则需要一个月甚至四十天，到 19 世纪末，更大型的、铁甲的、螺旋桨驱动的轮船驶抵土耳其首都用不了一周时间。蒸汽机轮船无须根据季风的方向更改航线，可于任何季节在地中海上航行。航运不再受限于追随盛行风和洋流的传统航线；换言之，点到点的航线变得更直接，并且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船只何时抵达。但是，轮船造价昂贵，而且——帆船的甲板下是空荡荡的——轮船需满载燃料（以煤为燃料），更不消说引擎与轮汽机这些船体最重要的部分，以及为工作人员与乘客提供的舱室；它们还携带风帆以便在适当时候增强或替换轮汽动力。一篇报道解释说，“轮船不可能也永远无法成为货船”；因为它们提供的是快捷服务，它们不会游荡在港口间，像帆船那样用不紧不慢的方式装卸货物。<sup>18</sup>

很明显，蒸汽轮船最适于运送邮件，包括银行汇票；换句话说，轮船在贸易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它加快了支付的速度和商业信息的传播，并为那些发现邮轮更为舒适的乘客提供了空间。法国政府早在公元 1831 年就在规划邮轮航线，当时开辟了从马赛到南意大利的轮船航线。<sup>19</sup> 时间表也可以制定：1837 年，奥地利政府与总部位于的里雅斯特的奥地利劳埃德（Lloyd）公司签了一份合同，每月两次航行，从的里雅斯特到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途经科孚、佩特雷、雅典、克里特和士麦那，运送钱币、邮件和乘客。<sup>20</sup> 此前四年，在的里雅斯特，

一批保险从业者建立了一个被称为“奥地利劳埃德”的机构，得名于伦敦的一个咖啡厅，该咖啡厅于18世纪诞生了一个类似的保险从业者合作机构。1835年，奥地利劳埃德创建了一家轮船公司，其保险事业大大受益于能够获得最新的信息；奥地利劳埃德公司60%的股份被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抢购，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伦敦分行帮助它从英国补充船只和引擎。<sup>21</sup>1838年，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船队由10艘轮船组成，其中最大的是“马赫穆迪亚号”（*Mahmudié*），它显然得名于连接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的运河，排水量为410吨；其引擎有120马力。的里雅斯特的英国领事称该船队“建设一流、设备一流、配员一流”。<sup>22</sup>

557

在地中海之外，“半岛轮航公司”（*Peninsular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开设了从英格兰出发、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运服务；它此前就已经开始专注于英格兰和伊比利亚之间的班轮服务〔公司名称中的“半岛”后来演变为“半岛与东方”（*Peninsular and Oriental* 或 *P&O*）〕，并以西班牙国旗中的红色和金色、葡萄牙国旗中的蓝色和白色为其颜色。P&O与奥地利劳埃德公司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一些麻烦事：公元1845年英国公司开辟了穿越地中海，进入黑海，远及特拉布宗的航线；一旦进入黑海，英国公司就威胁要进一步冲撞奥地利在多瑙河与黑海沿岸的轮船的利益。<sup>23</sup>蒸汽航行已演变为一则成功的故事：欧洲列强争相夺取商路的主导地位，但竞争显然仍旧是和平的；19世纪的地中海的确发生了一些航海冲突，但自从美国和法国对柏柏尔人取得胜利后，海盗威胁便大大减少，而希腊独立战争后，武装船队之间的摩擦也鲜有发生。

有一次算是例外的武装冲突，该冲突以公元1866年7月

奥地利海军在利萨岛（Lissa）——今称维斯岛（Vis）——击败新组建的意大利舰队而告终。拿破仑战争后奥地利对威尼斯的占领使威尼斯舰队归奥地利指挥，奥地利人也短暂控制过托斯卡纳地区由哈布斯堡家族统率的舰队——直到1848年，意大利语仍是哈布斯堡海军的指挥语言，大部分水兵也是意大利人，不过到1866年时，德国人已占士兵总数的60%。<sup>24</sup>哈布斯堡舰队管理有方；皇帝的弟弟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Ferdinand Maximilian，他后来作为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墨西哥遭遇了悲剧命运）于1854~1864年担任总司令，他不仅了解使用蒸汽动力的优势，而且也明白用铁甲包裹船体的好处。他建造了由帆船和一些明轮船组成的舰队；他将螺旋桨帆船编入舰队，之后还让铁甲轻帆船入役，后者耗资甚巨——1861年奥地利铸造厂已无法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铁甲生产任务，铁甲不得不从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订购，并  
558 从马赛高度保密地出口。不过发动机却在的里雅斯特的新工厂生产，皇帝持有该工厂的股份。他允许他的弟弟花费任何一笔其认为有必要的款项。<sup>25</sup>

对北意大利领地的统治使哈布斯堡皇帝与在萨伏伊家族领导下追求半岛统一的势力发生冲突。普鲁士和意大利王国的结盟对奥地利在威尼斯和意大利东北部的控制权构成了威胁。当奥地利和意大利舰队在克罗地亚海滨的利萨相遇时，奥地利舰队显然兵力处于劣势——意大利有十二艘铁甲轮船，而奥地利仅仅动员了七艘。意大利一方的无铁甲轮船数量也稍稍多些。另外，意大利人显然没怎么考虑要采取必要的行动。铁甲舰之间的对决是件新鲜事，奥地利人认定，正确的战术（采用古典时代的战法）是冲击敌军。尽管这种战法不利于他们的军

舰，但奥地利人确实击沉了两艘意大利铁甲舰。奥地利指挥官承认道：“整个是一场混战……我们无一军舰损失真乃奇迹。”打败意大利的优势兵力，奥地利人获得了胜利。<sup>26</sup>胜利并没能让他们守住威尼斯，威尼斯还是落入意大利王国之手，但它确实阻止了意大利获得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控制权（一些“奥地利”水兵就来自这里）。<sup>27</sup>倘若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那就是利萨之战后威尼斯的沦陷竟然强化了了的里雅斯特作为哈布斯堡帝国进军地中海的门户的地位。

的里雅斯特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下盛极一时。苏伊士运河开通三十年前，一位驻维也纳的美国外交官向华盛顿的国务卿做了如下报告：

的里雅斯特本身是个美丽的城市，在更大程度上也是个新城市——与大多数新城市一样，的里雅斯特也有很多活动和商业。它的优质港口有着足够的深度，足以停泊任何船只。该城有5万居民从事据称有利可图且正在快速发展的商业。其进口额高达5000万弗罗林（超过1亿美元），出口额达4000万。<sup>28</sup>

的里雅斯特也面临许多挑战：哈布斯堡内陆的维也纳和布拉格周边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并不高，这使得的里雅斯特难以在地中海市场上销售奥地利产品，而前往奥地利心脏地带的通道又被阿尔卑斯山阻隔。另外，的里雅斯特是个可以享受慷慨的商业税豁免的自由港。早在公元1717年，该城就从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手中获得了种种特权，而在这之前还有亚得里亚海海域内历史更加悠久的贸易传统——查理五世曾在1518年赐予的

里雅斯特商人在南意大利的特权。在那几个世纪中，的里雅斯特仍旧非常狭小，完全笼罩在威尼斯的阴影下，直到14世纪才摆脱威尼斯的政治监护。但它摆脱威尼斯的经济控制所经历的时间更长：在18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通过的里雅斯特转运商品，为的是借助它的自由港身份获利。18世纪末，在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统治时期，的里雅斯特获得了更进一步的特权以及海商法，甚至能在1797年威尼斯丧失独立地位后更好地利用自身地位：1805年，537艘船在的里雅斯特注册，它们中的大部分属于威尼斯人。<sup>29</sup>

的里雅斯特的另一方面更为与众不同。当查理六世意识到了里窝那的成功时，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特区，持任何信仰的商人都可在这个特区内定居、发展。当约瑟夫二世于公元18世纪80年代颁布《宽容敕令》（Edicts of Toleration）后，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群体的安全便有了保障。<sup>30</sup>的里雅斯特城堡下山坡上的逼仄隔都在1785年被废弃。一位名叫埃利亚·莫普尔戈（Elia Morpurgo）的犹太作家——他也是丝绸生产商——称赞玛丽亚·特蕾西亚为《箴言》（*Book of Proverbs*）中所描述的“女勇士”，因为她使她的臣民能够享受商业繁荣带来的红利：“港口开放，道路缩短，既方便又快捷，在海上飘扬的旗帜受人尊重，也变得安全。”在的里雅斯特能够看到的其他宗教群体包括亚美尼亚派、希腊东正教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塞尔维亚东正教派等。每个群体都被组织为一个“族群团体”（*nazione*），在承认更多定居者——他们应当在经济上有利用价值，而非流浪者——之前，每个族群团体都被寄予希望去关注城市福祉。宗教标签背后是很多种族群体，不仅有附近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还有德国人、荷兰人、英格兰人、

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土耳其移民或访客；这里是各种语言的杂糅地（*guazzabuglia*），不过在公共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意大利语和德语。<sup>31</sup>

伊塔洛·斯韦沃<sup>①</sup>的城市因其犹太人社区而格外著名，该社区在公元 19 世纪 30 年代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但它还保留着自己的学校和机构。事实上，拉比们开始对各项宗教习俗的标准化感到万分担忧，无论是打破安息日规制，还是对犹太饮食戒律的漠视态度。<sup>32</sup> 犹太人口也有大幅增长，从 1735 年的 100 多人——当时城镇总人口还不到 4000——上涨到 1818 年的 2400 人，这时的里雅斯特居民数量已增长到超过 3.3 万人。由于比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其他地区条件宽松，的里雅斯特的犹太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迹——博拉菲欧（G. V. Bolaffio）撰写了一本论述货币兑换的著作，塞缪尔·维塔尔（Samuel Vital）撰写了有关保险业的著作，在之后几十年的里雅斯特犹太人在簿记、经济和商业法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犹太人也积极参与股票交易所（*Borsa*）的活动，并参与了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创立：创立者包括犹太人罗德里戈·达·科斯塔（Rodrigues da Costa）和科恩（Kohen），希腊人阿波斯托布鲁（Apostopoulo），斯拉夫人乌切提克（Vučetić），莱茵兰人布鲁克（Bruck）和利古里亚人萨尔托利奥（Sartorio），其中最后两位深得王室赏识，以至于获得贵族头衔。<sup>33</sup> 民族融合还为文化发展提供动力。到 19 世纪末，的里雅斯特以其文学咖啡馆著称

560

---

① 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是意大利犹太小说家埃托雷·施米茨（Ettore Schmitz）的笔名，他出生于的里雅斯特，是 20 世纪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代表作为《季诺的意识》。——编者注

于世，它始于建于 1837 年的“镜子咖啡屋”（Caffé degli Specchi）。19 世纪末的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是：的里雅斯特到底属于意大利还是奥地利，这与城市中斯洛文尼亚人自我意识日益增强的现状格格不入。<sup>34</sup>

在维也纳——另一座各民族试图在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下共存的城市——看来，的里雅斯特似乎是通向东方的一座理想桥梁。在公元 1830 年之后的三十年中，当地的商业通过港口逐步扩张：进口额翻了一番有余，与此同时，轮船数量开始增加，而帆船数量日渐减少，这表明轮船渐渐商业化。1852 年，接近 80% 的商品通过帆船运输，但到 1857 年仅有三分之二的商品由帆船运输。的里雅斯特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奥斯曼帝国，对其的出口量在 19 世纪 60 年代占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美国、巴西、埃及、英国、希腊都与的里雅斯特保持经常性往来；的里雅斯特的船舶总量在亚历山大港的贸易中排在继英法之后的第三，土耳其和意大利位列第四和第五，其在 19 世纪末仍然没有衰落。它经营的商品范围也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大部分只运往维也纳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心脏地带，这些商品有咖啡、茶叶、可可、大量胡椒、水稻以及棉花等。<sup>35</sup>从运河开通那年到 1899 年，商品运输量几乎增长了四倍。<sup>36</sup>

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历史揭示了那些试图在公元 19 世纪的地中海利用新条件之人面临的机会和挫折。地中海航行局面已经今非昔比：伟大的海现在已成为通往印度洋的通道，这使它提供了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通行体验；随着邮件网络的发展，各种信息来往于各方；此时的和平与安全程度远胜于罗马帝国全盛期以后的任何时期。然而，统治地中海的既非奥地利，也非土耳其，亦非法国，而是大英帝国。



## 注 释

1. Cf. E. Said's tendentious *Orientalism* (London, 1978).
2. Z.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 2003), pp. 147, 183.
3. *Ibid.*, pp. 28-37; J. Marlowe, *Th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 1964), pp. 44-5.
4. Marlow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 1-3.
5.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p. 56-7; Lord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the Creation of the Suez Canal* (London, 1968), pp. 20-30.
6.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p. 32-3; R. Coons, *Steamships, Statesmen, and Bureaucrats: Austrian Policy towards the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of the Austrian Lloyd 1836-1848* (Wiesbaden, 1975), pp. 148-61.
7.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p. 131-2;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p. 98-9.
8.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 183.
9. *Ibid.*, pp. 208-11;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p. 222-5.
10. Marlow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 227, 231.
11.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 254;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 246.
12.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 253.
13. G. Lo Giudice, *L'Austria, Trieste ed il Canale di Suez* (2nd edn of *Trieste, l'Austria ed il Canale di Suez*, Catania, 1979) (Catania, 1981), pp. 163-7, 180-81;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 287;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 269.
14. Lo Giudice, *Austria, Trieste*, p. 180, table 20; p. 181, graph 7; Board of Trade report cited in Marlow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 260.
15.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 260;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 287.
16. Marlow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 255-75;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p. 262-5; R. Blake, *Disraeli* (London, 1966), pp. 581-7.
17. Marlowe, *Making of the Suez Canal*, pp. 255-75, 313-20; Kinross, *Between Two Seas*, pp. 293-309, 313-14; Karabell, *Parting the Desert*, pp. 262-5.
18. Cited in Coons, *Steamships, Statesmen*, p. 55: 'Dämpschiſſe warden und können niemals Frachtschiſſe ſeyn'.
19. *Ibid.*, pp. 26-7, 35, 63.
20. *Ibid.*, p. 61.
21. L. Sondhaus, *The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Austrian Naval Policy 1797-1866* (West Lafayette, IN, 1989), p. 95.
22. Cited by Coons, *Steamships, Statesmen*, p. 63.
23. U. Cova, *Commercio e navigazione a Trieste e nella monarchia asburgica da Maria Teresa al 1915* (Civiltà del Risorgimento, vol. 45, Udine, 1992), p. 171,

- n. 13; Coons, *Steamships, Statesmen*, pp. 129–32.
24. Sondhaus,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p. 5–7, 13, 36.
25. *Ibid.*, pp. 184–7, 209–13.
26. *Ibid.*, pp. 252–9, 273 (battle diagram).
27. *Ibid.*, pp. 36–8, 129, 151, 178–9, 259; L. Sondhaus, *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1867–1918* (West Lafayette, IN, 1994), pp. 6–7.
28. Cited in Coons, *Steamships, Statesmen*, p. 3; see also Lo Giudice, *Austria, Trieste*, p. 221.
29. Cova, *Commercio e navigazione*, pp. 10, 28–9, 74–5; Sondhaus,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ea*, pp. 2–3, 12–13.
30. L. Dubin, *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 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 CA, 1999), pp. 44–5.
31. *Ibid.*, pp. 3–4, 10–17, 43.
32. *Ibid.*, pp. 164–73.
33. *Ibid.*, p. 32; Coons, *Steamships, Statesmen*, p. 9; Cova, *Commercio e navigazione*, p. 153.
34. C. Russell, 'Italo Svevo's Trieste', *Italica*, vol. 52 (1975), pp. 3–36; A. J. P. Taylor,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a History of the Austrian Empire and Austria-Hungary* (London, 1948), pp. 201–3.
35. Lo Giudice, *Austria, Trieste*, pp. 135, 137, 142, 145–6, tables 8, 9, 10, 14, 16.
36. *Ibid.*, pp. 205–6, table 29 and graph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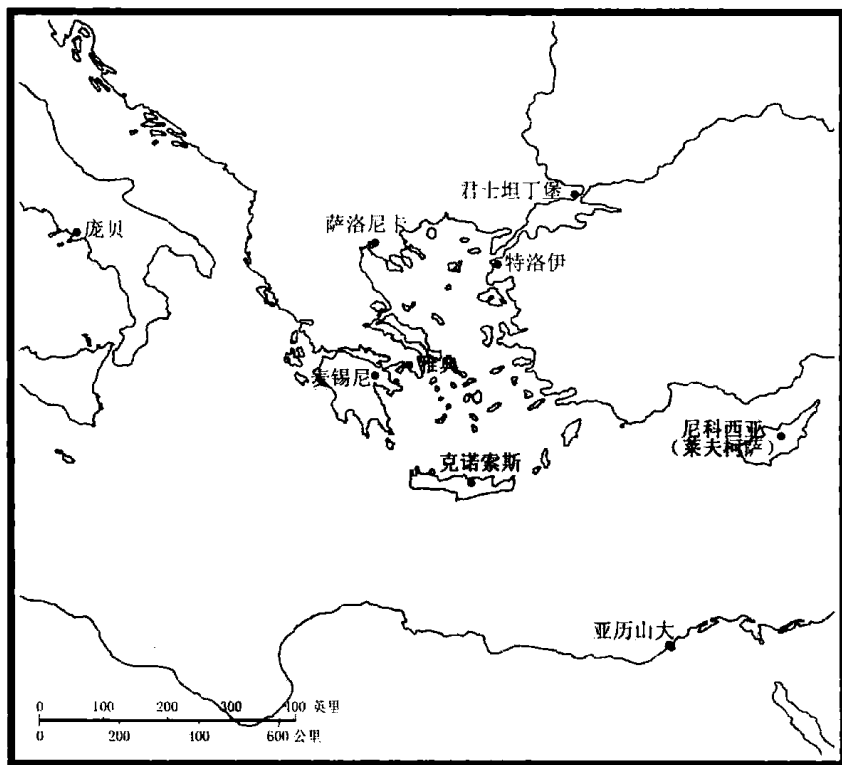
## 二 希腊人与非希腊人 (1830 ~ 1920 年)

### 1

第五地中海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一地中海的发现与第二地中海的重新发现。希腊世界逐渐囊括了荷马所描述的青铜时代 (Bronze Age) 驾驶战车的英雄们, 罗马世界也被人们发现它植根于鲜为人知的伊特鲁里亚人文化之上。因此, 在公元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 关于地中海历史的全新观念开始呈现。早期线索是对古埃及兴趣的增长所给予的——这点在前面的章节已有论述——尽管这也与传统的圣经研究密切相关。在 18 世纪, 大旅行 (Grand Tour) 将富有的旅行家从北欧吸引到罗马和西西里的古典遗址, 英国绅士们将此视为除牛津、剑桥——在牛津和剑桥, 相比古代实物, 那些集中精力于研究之人更愿意沉溺在古代典籍之中——之外另一值得消遣之地。<sup>1</sup> 另外, 由于德国艺术史学者温克尔曼 (Winckelmann) 开始对希腊艺术形式倾注爱意, 辩称希腊人将他们自己献身于美 (罗马人不曾做到这点), 对古代艺术品的美学鉴赏在 18 世纪末重获生机。他的《古代艺术史》(*History of Art in Antiquity*) 于 1764 年以德文出版, 不久又推出法文版, 影响力巨大。

562

随后几十年, 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被发掘出来——被纳尔逊戴了绿帽子的威廉·汉密尔顿爵士 (Sir William Hamilton) 就积极参与其中。之后对伊特鲁里亚的发掘又进一步增强了北欧



563

人对古代艺术的兴趣，它为室内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模型，为收藏家提供了大量劫掠品。当伊特鲁里亚的墓穴被开启时，“伊特鲁里亚花瓶”，几乎都是真正的希腊制品，被装船运出意大利。在希腊，在挖掘和运出发掘物之前，要买通奥斯曼官员。最著名的实例是，在公元 19 世纪初，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的那些大理石制品被其他文物劫掠者运往北欧的一些博物馆：帕加马的祭坛被运往柏林，迈锡尼王阿特柔斯宝藏中的面具被运往大英博物馆，等等。存世的大量裸体男女雕像唤起美学想象和情欲思想，这不足为奇。徜徉于英国、法国、德国的大型博物馆中，就有机会看到地中海的古代遗址，这些博物馆内的古代藏品充斥着温克尔曼的原则：要理解古典

艺术，最重要的就是欣赏它的美。<sup>2</sup> 地中海世界也通过英国艺术家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和沃特豪斯（J. W. Waterhouse）等人的重构古典时期历史的绘画作品而进入北欧。阿尔玛-塔德玛画作中几乎照相般的细节呈现让他格外受欢迎，毫无疑问，他将年轻的裸体女子画在画布上也让他声名大噪。<sup>3</sup>

564

人们通常不认为驻足于古希腊土壤是一件重要的事。特洛伊的传说是关于本不存在的诸神和英雄的神话，但当希腊人摆脱奥斯曼统治时，有关希腊和希腊人的浪漫主义臆断便获得了力量。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例子便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公元1824年他在希腊抗击土耳其人时死于热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完全投身古典历史，当时他进行了覆盖地中海北部许多地区，如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的大旅行。但很难认定他对希腊的兴趣是被对古典历史的深刻依恋，而不是对自由的浪漫主义信念所激发。事实上，英国人对希腊的态度一点儿都不浪漫。1848~1850年，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帕默斯顿勋爵因希腊政府没有对直布罗陀犹太人唐·帕西菲柯（Don Pacifico）——他的财产遭到骚乱暴徒的侵害——进行赔偿，一度对希腊政府大发雷霆。英国皇家海军封锁了雅典，直到希腊人向盛怒的法国人、俄罗斯人——他们和大不列颠一道充当了希腊独立的保证人——做出让步。但帕默斯顿深知，对古典学成就之诉求，在阻碍着而不是有利于希腊人的行为举止：

就像古罗马人一样——只要他说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就能使自己免遭羞辱——不列颠臣民不论身

在何处，都能信心满满地感受到，英格兰警惕的目光和强大的武力会保证他免受不公正的待遇。

古希腊的某种精神可以概括为坚持着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但在19世纪初的希腊已难以见到伯里克利和柏拉图的后代。如果某人想见识真正的罗马人，那他只好转而去见英国人。

## 2

565 一小部分人在理论上确实相信特洛伊的传说。正如所见到的，爱琴海文明的发现始于海因里希·施里曼对于特洛伊故事的迷恋，他于1868年首次来到特洛伊，五年后，他发掘了他所声称的“普里阿摩斯宝藏”。在地层学和年代测定法尚不发达的时代，施里曼凭直觉识别他所发现的一切。在经过伊萨卡时，他从地下挖出了一堆古代瓮罐；问题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奥德修斯家族的瓮罐，而在于瓮罐中的骨灰到底属于哪位成员。<sup>4</sup>公元1876年，他已在迈锡尼进行发掘，此处比特洛伊更易识别，因为历经千年的狮子门仍可依稀辨别。可以预期的是，他发现了阿伽门农及其家族的墓穴。相比他的考古发现的政治寓意，他对证明荷马的存在更感兴趣，但种族主义者很快便开始利用他的发现，认为最初的希腊文明，即欧洲高级文明的创立者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sup>5</sup>尽管学术界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才让人相信，迈锡尼人与后来的希腊人关系密切，甚至使用早期形式的希腊语。此时，这些争论才转向发掘者在希腊和克里特找寻到古怪铭文：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微小的象形文字，恰好适合近视的阿瑟·埃文斯爵士，将他吸引到克里特，引导他去发掘和重构（同等重要的）他所谓的“克诺索

斯的米诺斯宫殿”。

埃文斯在克里特的事迹在公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克里特政治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下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到 1900 年时，约 30% 的克里特人是穆斯林，他们大多数讲希腊语并且是希腊人后裔。这些穆斯林中包括大地主和相当比例的商人，穆斯林人口集中于城镇，而传统上基督徒多分散在乡村。<sup>6</sup> 大陆上的希腊人赢得的独立使信仰基督教的克里特人燃起希望，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进入新的王国。他们的目标是“统一”（*enōsis*）；随之而来的是 1821 年希腊反抗奥斯曼人的起义，起义持续了九年时间，混乱不堪的局面则在克里特岛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了土耳其人的残酷报复，尽管双方的手都不干净——在 19 世纪末，克里特东部的穆斯林惨遭蹂躏。欧洲列强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将克里特纳入希腊王国；经土耳其人同意，克里特被委托给穆罕默德·阿里，从 1830 年起，该岛由埃及统治十年。之后一个希腊人委员会将克里特委托给英国，后者却无意统治克里特，或者说无意推翻东地中海的秩序。<sup>7</sup> 奥斯曼人清楚地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从 1868 年起允许克里特人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尽管这并未使统一运动的倡导者感到满意，到 1897 年时，这些倡导者正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俄国招募志愿者来为他们的事业而战。

566

公元 1898 年，饱受战争创伤的小岛最终被允许在高级专员希腊乔治亲王的管理下获得完全自治，同时它还成为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保护对象，但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仍旧是名义上的君主，因为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土地，尤其在受益人主要是希腊基督徒时更不愿如此。代表两大社群的岛屿政府试图全力

促进经济发展，但许多穆斯林在和平到来前就离开了克里特，许多人在内战尚在进行时也逃走了。要知道，恢复经济的过程也包括重构克里特人的身份认同感。1898年，阿瑟·埃文斯需要大量人手来帮助他发掘克诺索斯，在首批发掘行动中，克里特政府热心地通过一系列法律，以鼓励外国考古项目，甚至允许艺术品的出口。<sup>8</sup> 克里特人将此视为一场公关行动，一个通过在列强保护国的博物馆中展现其历史，从而将克里特的现状公之于世的机会。

这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岛屿，当发掘者们将克诺索斯展现在世人眼前时，埃文斯想象出了一个和平的克里特形象，用来解释那些令人费解的遗迹。埃文斯的克里特是由某个他假定其名字为米诺斯的人统治的王国。他的解释表明他对克里特的未来与克里特历史的设定有着同样真挚的祝愿。他将米诺斯王国时期的克里特视为一个高贵的、崇尚自然的母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是国王的男性朝臣也变得女性化：追求时尚的廷臣们如宫廷妇女那般，乐意在他所发现的宽敞“舞池”中恣意旋转。他让他的工人们为他舞蹈，以图恢复米诺斯时代克里特的魔力。<sup>9</sup> 利用米诺斯壁画的残片，爱好和平的王公和喋喋不休的宫廷妇女的形象被重新塑造出来。在克诺索斯重建的宫殿——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丰富的想象力——是现代主义的和平殿堂。

567

### 3

塞浦路斯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克里特的写照，它是另一座让土耳其人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的岛屿，尽管它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更低一些。在这里，希腊内陆的事件有着巨大影响力：从



公元 1821 年起，希腊人的塞浦路斯变得桀骜不驯，于是土耳其人总督禁止非穆斯林持有武器。19 世纪 30 年代，多达 2.5 万名塞浦路斯人离开该岛前去希腊，意在取得希腊公民权后再返回海岛，成为希腊国王的臣民，这使他们获得了充当希腊独立担保人的英国、俄国、法国领事的保护，这激怒了奥斯曼当局。<sup>10</sup> 即便如此，塞浦路斯东正教多数群体具有“希腊人”主体观念这一认识也不应被夸大：与希腊祖国实现统一的概念更多产生于希腊，而非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其内部各族的社会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相当和平的。英国驻塞浦路斯领事馆与土耳其当局合作，以确保倡导希腊统一的势力能受到控制：1854 年，英国副领事向总督通告了有关宣传“谋反”的小册子的消息，它被认为出自尼科西亚的希腊高等学校校长之手。副领事与总督之间的密切关系还见于 1864 年总督邀请副领事参加他儿子割礼仪式的邀请函：“我诚挚地邀请您全程参加庆典，庆典将从周一一直持续到周四，请您在这四天享用晚餐。”<sup>11</sup> 鉴于塞浦路斯地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它的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它的一些基本农产品略有剩余，如大麦出口叙利亚，角豆可出口亚历山大，但生活水平不高——引用一位 18 世纪晚期的到访者的话——“进口微不足道，因为塞浦路斯只进口刚好可满足其少量居民所需的产品”，即一些精细纺织品、锡、铁、胡椒和染料等<sup>12</sup>。到 19 世纪后期，染料被用于当地的工业：英格兰的白色棉布通过贝鲁特输入，并在当地作坊进行染色，丝织业也蓬勃发展。但塞浦路斯仅仅是东地中海局部网络的一部分，其国际联系相当有限。<sup>13</sup> 然而，随着人们对古代遗物兴趣的增强，一种新型的大宗违法贸易开始在塞浦路斯兴起。从 1865 年到 1875 年，美国领事路易·帕

尔马·迪·塞斯诺拉（Louis Palma di Cesnola）将军是所谓的“我的财富”的最辛勤搜集者；他在气势恢宏的库里翁（Kourion）遗址劫掠的大部分古物进入了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sup>14</sup>

当英国人迫使苏丹在公元 1878 年将塞浦路斯岛的行政权交给大不列颠时，奥斯曼政权在东地中海的衰弱显露无遗。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Abdülhamid II）知道，如果他想要牵制俄国，就需要获得英国人的支持，因为俄国人仍希望能一直出现在地中海上，这只有在他们保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通行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对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反对土耳其当局的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大不列颠时，英国对奥斯曼人的支持开始减弱；英国对独立王国疆域外的希腊人生活状况的同情依旧十分强烈。<sup>15</sup>所以，塞浦路斯被视为维系持续性友谊的首付款。依照典型的奥斯曼作风，“高门”仍旧对海岛享有名义上的主权，英国人则被期望将他们从对塞浦路斯的管理中得到的所有收益汇给君士坦丁堡（直到英国和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锋相对时，塞浦路斯才被大不列颠吞并，且直到 1925 年它才成为英国王室的殖民地）。大不列颠对塞浦路斯的兴趣纯粹是战略性的，随着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大部分股份，而且随着大不列颠于 1882 年在埃及确立统治地位，其股价也得以提升。对塞浦路斯的占领，使英国控制了自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黎凡特一线的所有海运基地；但与此同时，英国人也获得了一口“大锅”，在锅中，持两种不同信仰的塞浦路斯人之间的仇视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因身处第三方势力的统治下而激化：希腊族的岛民越来越强调海岛的归宿是并入希腊，而土耳其族岛民则担心在克里特土耳其

人身上发生的恶性事情将再度降临塞浦路斯。到 20 世纪初，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人群紧紧追随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改革运动，而且一种民族认同意识开始发展，该意识因与希腊民族主义的对峙而进一步加强。<sup>16</sup> 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伴随着日益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这将会产生一种危险，即把一个曾经使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和谐共存的社会撕成两半。

569

#### 4

民族认同意识在各族群和宗教群体本来呈分散和混居状态的奥斯曼土地上发展。毫不奇怪的是，民族成分和宗教成分最为混乱的地区是地中海周边的港口城市，如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和士麦那。尤其是萨洛尼卡，它成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希腊人斗争的战场，尽管在 1912 年时犹太人是该城的最的单一群体，该城的犹太码头工人数量极其庞大，以至于这里的港口在每周六都会关闭。<sup>17</sup> 正如马克·马佐韦尔 (Mark Mazower) 所观察到的，该城通行四种文字、四种日历，因此，“今天中午是几点？”这个问题有多种答案。<sup>18</sup> 城市大部分地区的主体语言是犹太-西班牙语，它是 1492 年后由塞法迪犹太人流亡者带来的。犹太会堂的名称仍旧让人回想起住在萨洛尼卡的各支犹太人的发源地：这里有加泰罗尼亚人的会堂，有“萨拉戈萨”（其实是西西里的叙拉古）会堂，还有个会堂别称为“马卡隆” (Macarron)，因为阿普利亚的犹太人后裔常常出入此地，据信他们和意大利人一样喜欢通心粉。<sup>19</sup>

但是，将萨洛尼卡浪漫化却是错误之举。1911 年，拉迪

诺的报纸《工人团结报》(*La Solidaridad Obradera*)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萨洛尼卡不是一座城市。它是若干小村庄的集成。犹太人、土耳其人、东马派犹太人(追随沙贝塔伊·泽维的犹太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西方人、吉普赛人——在今天,这类团体中的每个都能称为“民族”——彼此远离,就好像害怕传染病一样。<sup>20</sup>

不可否认,一家以“工人团结报”来命名的报纸可能无法提供关于各族群之间关系的最客观观点,因为它希望超越民族情感,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同一化社区。犹太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族群之间的日常友好交流可从莱昂·夏基(Leon Sciaky)对19世纪末在萨洛尼卡的童年时光的描述中获悉;在这里,一个富足的犹太家庭与一些保加利亚农民关系密切,这些农民给夏基的父亲供应谷物,以使他从事市场交易,而在城市的街道上,小夏基受到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邻居的善待,他们往往乐于在其他社区成员遭难时伸出援手。<sup>21</sup>

相较于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居住的东欧所实践的通常比较严格的犹太教义,塞法迪犹太人对周边文化总是更加开放;当西欧在奥斯曼世界的影响更加强烈时,犹太精英的举止和语言正日益西化。塞法迪犹太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具有矛盾性。理想的状态是,塞法迪犹太人应该将西方的温文尔雅与东方的异域风情稍加融合,英国的迪斯雷利也持该观点。即便还是个孩子,莱昂·夏基都穿西式服装,这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趣旨的明显标志,而萨洛尼卡最富有的犹太家族阿拉提尼

(Allatini) 则用东西方最精致的家具来装饰自己的房舍。<sup>22</sup>从公元 1873 年起, 借助“全球以色列人同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AIU) 建立的诸多新学校, 法语开始大规模渗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中间, 并取代了拉迪诺语——一些人将它视为下等人的语言 [在亚历山大的犹太精英中, 法语也成为流行语, 甚至是礼节性语言 (*de rigueur*) ]。到 1912 年, AIU 拥有四千多名学生, 占该城犹太学校学生的半数以上。<sup>23</sup>萨洛尼卡人和亚历山大人根本不担心他们正日益屈从于法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不仅是犹太人, 就连奥斯曼境内所有富裕城市的居民都将讲法语视为与众不同的标记。

在土耳其人还统治着萨洛尼卡时, 他们就知道, 尽管土耳其人只是少数, 但他们掌控着局面。夏基报道了公元 1876 年的骚乱是如何爆发的: 那时一位保加利亚父亲请求外国领事阻止他女儿和一个土耳其人的婚礼; 法国领事和德国领事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怒气冲冲地进入清真寺, 且动用私刑。<sup>24</sup>不同社区内的不安局面到 1900 年变得更加严重。希腊人被教育普及所排斥: 他们的孩子现在在专门的学校中接受本民族语言的教育, 他们向南方看去, 关注着他们的同胞正生活在独立的希腊王国内。斯拉夫人也变得很难驯服。19 世纪 90 年代, 激进的马其顿斯拉夫人——他们使用保加利亚语的一种方言——自行组成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IMRO), 欲在萨洛尼卡与斯科普里之间的所有奥斯曼行省进行自治, 但他们将萨洛尼卡视为理所当然的首都, 他们还打算让这些地区认同保加利亚文化。这是萨洛尼卡的希腊人所无法容忍的, 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 IMRO 行动信息向土耳其人示好。<sup>25</sup>不久之后,

IMRO 认定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到了。1903 年 1 月，IMRO 的代理人得到了奥斯曼银行对面的一间小杂货铺，该杂货铺由一位沉默的保加利亚人经营，他似乎并不愿意出售他所陈列的不多的货物。但是，到夜里，这个杂货铺恢复了生气。一支 IMRO 小队在地下挖好坑道后，将地雷安装在奥斯曼银行的宏伟建筑下。掘地道的人堵住了横在通道前的一处市政下水道，附近的科伦坡旅店抱怨说排水系统坏掉了，这些人因此差一点儿就被逮捕。4 月 28 日，他们引爆了地雷，炸毁了银行和临近的几幢大楼。<sup>26</sup>

当青年土耳其党宣布成立并将启动政治改革时，萨洛尼卡感受到了土耳其政府内部变化所产生的强烈动荡。地中海的政治困境正在剥夺萨洛尼卡的生计：在意大利人于 1911 年入侵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后，意大利商品遭到联合抵制；又因为奥地利控制了波斯尼亚，萨洛尼卡与的里雅斯特的贸易也遭到抵制。富有的阿拉提尼家庭已经挣得盆满钵满，于是就撤离了萨洛尼卡回到意大利。奥斯曼政权的崩溃速度比之前更快，因此当希腊人于 1912 年开始向萨洛尼卡进军并称此举是为了祖国时，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不幸的是，保加利亚军队也来了，并且不愿离开；当劝说他们离开时，希腊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在城外爆发了小规模冲突。希腊人占领了萨洛尼卡，但保加利亚的威胁却实实在在，城市失去了富饶的内陆地区，那里曾经是莱昂·夏基的父亲收购谷物的地方。1913 年，除了 4 万名东正教基督徒，该城也是约 4.6 万名穆斯林和 6.1 万名犹太人的家园，但希腊的激进分子却想使后两者感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sup>27</sup> 他们的墓地被亵渎，商店遭洗劫。首相韦尼泽洛斯（Venizelos）——克里特人革命的英雄——坚信

希腊应该是东正教希腊人聚居的希腊的理念。剩下的犹太人怎么办，这一问题还不清楚，因为韦尼泽洛斯对他们并不信任。1917年8月，一场大火摧毁了城市的大片居民区，让犹太人和穆斯林街区化为灰烬。这场大火和犹太人、穆斯林的逐渐外迁，为希腊当局重建萨洛尼卡，使它成为一座希腊居民聚居的希腊城市提供了契机。至此，目标清晰可见：萨洛尼卡将再度成为圣德米特里守护的基督教城市。萨洛尼卡将以塞萨洛尼基的身份获得重生。

## 注 释

1. J. Black, *The British Abroad: the Grand Tou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roud, 1992).
2. R. Jenkyns,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 1980), pp. 133-9.
3. *Ibid.*, pp. 313-15, 318-24; C. Wood, *Olympian Dreamers: Victorian Classical Painters 1860-1914* (London, 1983), pp. 106-30; J. W. Waterhouse, *the Modern Pre-Raphaelite* (Royal Academy of Arts, London, 2009).
4. C. Gere, *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Chicago, IL, 2009), p. 20.
5. *Ibid.*, pp. 38-44.
6. T. Detorakis, *History of Crete* (Iraklion, 1994), pp. 368-72.
7. *Ibid.*, pp. 295-6, 320-26, 349 (very biased).
8. Gere, *Knossos*, p. 73.
9. *Ibid.*, pp. 67, 82-5.
10. A. Gazioğlu, *The Turks in Cyprus: a Provinc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71-1878)* (London and Nicosia, 1990), pp. 220, 242-8.
11. *Ibid.*, pp. 216-17.
12. Giovanni Mariti (1769), cited *ibid.*, p. 155.
13. Archduke Louis Salvator of Austria, *ibid.*, pp. 164-5.
14. *Ibid.*, pp. 225-34.
15. R. Rhodes James, *Gallipoli* (2nd edn, London, 2004), p. 4.
16. A. Nevzat, *Nationalism amongst the Turks of Cyprus: the First Wave* (Acta Universitatis Ouluensis, Humaniora, Oulu, 2005).

17. M.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 2004), p. 6.
18. *Ibid.*, p. 194.
19. *Ibid.*, p. 242.
20. *Ibid.*, p. 253.
21. L. Sciaky, *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Istanbul, 2000), p. 37 (another edition, as *Farewell to Salonica: a Cit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2007).
22. R. Patai, *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 1981), pp. 90–91; Mazower, *Salonica*, p. 237.
23. Mazower, *Salonica*, p. 234; also Sciaky, *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 92–3.
24. Sciaky, *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 37.
25. Mazower, *Salonica*, pp. 264–5; Sciaky, *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 73–4.
26. Mazower, *Salonica*, pp. 266–8; Sciaky, *Farewell to Ottoman Salonica*, pp. 75–81.
27. Mazower, *Salonica*, p. 303.



### 三 奥斯曼退出地中海 (1900 ~ 191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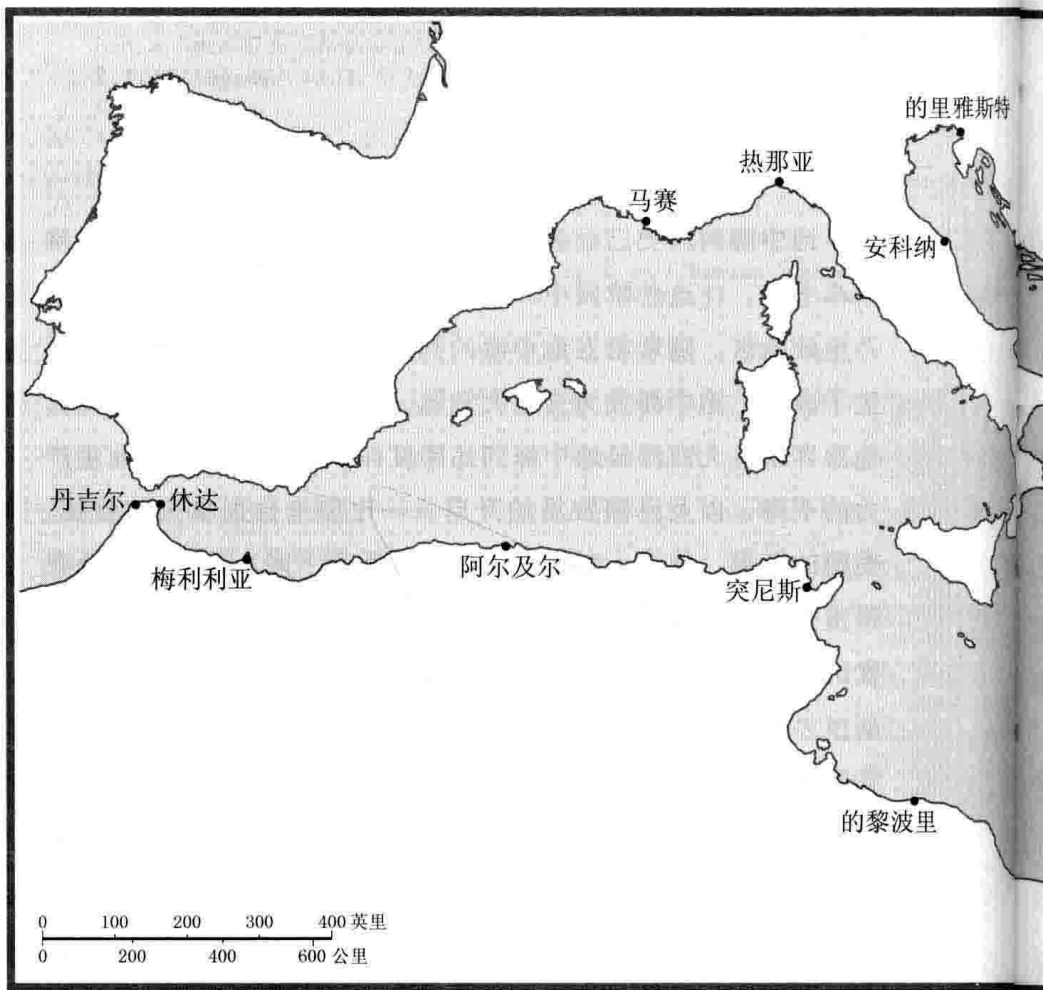
#### 1

地中海的历史已经被分成相互联系各个阶段，并被呈现于本书中，在这些阶段中，地中海或多或少地融为单一经济区乃至政治区。随着第五地中海的到来，该进程的所有特点都发生了改变。地中海成为交通大动脉，商品、军舰、移民以及其他旅客都从大西洋经地中海到达印度洋。地中海周边陆地生产力的下降，以及巨额贸易的开启——比如来自加拿大的谷物、美国的烟草，使商人对地中海的兴趣逐渐下降。就连在埃及获得重振的棉花贸易都面临印度和美国南部的竞争。从热那亚出发的航线穿过西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带往新世界；1900年前后，这些移民在纽约、芝加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以及美洲其他一些蓬勃发展的城市内定居下来。意大利移民主要是南方人，因为南部村庄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升——米兰和其他北方城市正在获得改善。

573

另外，法国人可以在地中海区域内找到创造新生活的机会：阿尔及利亚成为法国移民的首选，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北非沿岸建立一个新法国，并在广大内陆地区依旧维持殖民统治。该政策的两个明证是，将阿尔及尔的大部分地区重建为一座欧洲城市，以及在公元1870年将3.5万名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统一纳为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被认为是“文明

574





开化的”（*évolué*），因为他们早已抓住法国统治者提供的机遇，在“全球以色列人同盟”的支持下开办现代学校——旨在按照欧洲模式提升犹太人的教育水平，并将自己改造为新的专业阶级。<sup>1</sup>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被法国控制后，突尼斯也吸引着法国殖民者，尽管进程更加缓慢；1900年前后，相比法国殖民者，意大利殖民者对突尼斯有了更大的热情。意大利王国也垂涎北非，因为其政治领导人看到了将他们国家建成可与法国匹敌的中海殖民强国的机会。意大利人尚未像20世纪30年代的墨索里尼那样，明确表达地中海是

575 “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因为很显然，大不列颠统治着海洋，但意大利的公众和民主派确信意大利负有建立帝国的使命。一方面，其道义上的理由是：他们要做的事，与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一样，有机会将欧洲文明带给人们眼中的落后民族。另一方面，其政治上的理由是：如果意大利无法展示自己有能力取得伟大的成就，它将在欧洲丧失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理由：意大利的国力仰仗其经济成就，而经济成就的取得只有在它利用好殖民地所提供的原料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西班牙只是个弱小的竞争对手，到1904年，它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包括得土安在内的摩洛哥沿海地区和休达、梅利利亚内陆腹地。<sup>2</sup>

576 公元19世纪60年代，突尼斯国家财政的崩溃为法国和意大利提供了契机。如果总督及其政府无法履行他们的义务，大量法国债权人就将蒙受损失。此番情形与赛义德和伊斯梅尔治下的埃及没有多大的不同。一个国际金融委员会成立了，法国人的目标是控制该委员会。意大利政府对此不悦：意大利人深涉突尼斯经济，大批意大利殖民者鼓励意大利控制突尼斯全境

的经济，如烟草的生产和出口、铁路的运营等。但到 1883 年，法国已经稳占主导地位，总督同意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保护领地。<sup>3</sup> 意大利政府被迫另辟蹊径，它很快发现身边——在奥斯曼统治的利比亚——存在类似的机会；到 1902 年，意图瓜分地中海的法国和英国同意让意大利按自己意志行事——这是将意大利拉进更广泛的政治同盟以对抗未来敌手的有效方法。可能的敌手迅速出现：德国银行开始投资利比亚以便与罗马银行（Banco di Roma）展开竞争。1911 年，德国人而非意大利人获准在利比亚购买土地。随着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土耳其人试图用商业特许权安抚意大利人。但这太晚了。意大利人认定，建立一个帝国的使命是其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奥斯曼实力的虚弱——尤其是在边远地区——日益明显。1911 年 9 月末，意大利政府对土耳其宣战，到 10 月底，意大利舰队顺利将六万人的军队运抵的黎波里、班加西（Benghazi）和其他主要城镇。这是顺利的一面。然而地方上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随着意大利伤亡率节节攀升，意大利政府同意与君士坦丁堡进行和谈。和之前一样，奥斯曼苏丹不愿意放弃土耳其对昔日臣属之名义上的主权。在意大利人入侵一年后，他承认了意大利对名义上属于奥斯曼的利比亚的统治权。<sup>4</sup> 意大利人无法控制内陆腹地，但正如在阿尔及尔那样，他们决定将他们所控制的地区欧洲化，并开始将的黎波里重建为一座现代化的意大利城市。

于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西部休达到东部赛义德港之线上的城镇都处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

获得立足之地，没有获得比在利比亚更多的利益。其实，丹吉尔成了一块飞地，摩洛哥苏丹在此与外国领事分享权力。一个尤为重要的角色是警署总督察，他在苏丹和领事之间起联络作用；他为瑞士出现于地中海提供了一个稀有的例证，因为雇用一些严守中立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土耳其人因此丧失了他们在北非残存的权威；德国人并没有获得任何立足之地；奥地利人依旧被局限在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并未参与北非的争夺；英国人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海路。

## 2

对于意大利来说，另一个有价值的奖励是罗得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岛上居民主要是希腊人，他们试图摆脱奥斯曼的控制。“多德卡尼斯群岛联邦”的前景似乎很美好：该群岛沿商路分布，给当地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带来福祉。意大利人深知群岛的战略价值（它离奥斯曼政权中心太近了），并抓住利比亚与土耳其开战的机会，于1912年占领了群岛。意大利想要发展其新殖民地的经济。多德卡尼斯群岛是与利比亚截然不同的计划，或者说，是与意大利梦想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建立的帝国不同的帝国，意大利人更愿望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多德卡尼斯群岛人。<sup>5</sup> 意大利人的征服标志着欧洲列强试图最终瓜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步。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协同一致的过程；事实上许多动力来自奥斯曼领土内部，因为即便是传统上忠于君士坦丁堡的阿尔巴尼亚，到1912年也成为不满的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加速了奥斯曼行省分崩离析的过程。土耳其坚定地站到德国一方绝非必然。当战云笼罩欧洲时，土耳其

人对与英国人商讨新条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们继续视英国人为对抗俄国人从黑海闯入白海之企图的显而易见的盟友；他们也意识到了希腊人外交上的冒险主义——它使希腊国王乔治一直打到萨洛尼卡——对土耳其人的首都始终构成威胁，韦尼泽洛斯的“远大志向”（*Megalé Idea*）就是让君士坦丁堡取代雅典成为希腊的首都。但在1914年8月，地中海最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极度不稳定性：英国会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吗？或者与俄国？希腊会发生什么情况？情况似乎是，苏丹正被纳入德意志皇帝的网中，但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的。1914年8月10日，两艘德国军舰获准驶入金角湾，土耳其政府同意，如果它们遭到英国舰艇追击，土耳其炮兵将向英国人开火。与此同时，英国为土耳其舰队建造的造价750万英镑的两艘舰艇却被英国皇家海军征用，这引起了土耳其媒体对英国的强烈抗议。<sup>6</sup>

在那些最终转向极端敌视土耳其的人中，有一位是英国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在8月21日说，丘吉尔是“强硬的反土耳其”派。然而隐藏在他的雄辩背后的是一个特殊而大胆的政策。战胜奥斯曼帝国不仅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还将保障英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在印度洋，波斯正在成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并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石油。一旦俄国加入了对德战争，达达尼尔海峡就成为一条重要的通道，俄国可经此补充武器装备，出口乌克兰谷物——这对它平衡收支至关重要。<sup>7</sup>1915年3月，因害怕俄德停战，英国政府决定准许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海峡、色雷斯南部和临近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群岛。<sup>8</sup>

丘吉尔积极支持发动战争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此举

579 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最重要的海上进攻。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在地中海上发生的战事相对有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奥地利舰队并未过多地驶出其决心防守的亚得里亚海。然而，在地中海沿岸发生了几场重要的陆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和意大利东北部。土耳其对苏伊士运河构成的军事威胁足以让英国人将自己支持的人选任命为埃及的赫迪夫，以使埃及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从这时起，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塞浦路斯，这些地区仍处于苏丹保护伞之下的神话被遗忘了。<sup>9</sup>地中海海面仍旧相当平静，尽管水下潜伏着越来越多的潜艇，它们危害帝国海军的能力在大西洋上已得到充分证明。出现这种相对平静局面的部分原因是，英国和德国舰艇需要在北方诸海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备受争议的例外是1915年的加利波利之战。1915年1月，第一海军大臣费舍尔（Fisher）向其同僚杰利科（Jellicoe）勋爵抱怨说：

内阁决定单靠海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动用十五艘战舰和三十二艘其他舰艇，并派三艘巡洋舰和一支驱逐舰分队留守那里——这一切都是本土在危急时刻所急需的！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放弃！但你说“不！”，这意味着我得接受那些我坚决反对的意见。我不同意采取任何行动。<sup>10</sup>

即便在做出让步时，费舍尔也仍向丘吉尔致电：“我越是考虑到达达尼尔海峡，就越不喜欢它！”<sup>11</sup>他坚持认为，海军冲突必须在北海解决。加利波利之战以其艰苦卓绝而被后人铭



记，战斗中土耳其人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岬角对抗英国、奥地利和新西兰的军队。原计划是英国舰艇在法国人的支持下打开通道。当该计划显然行不通时，决定变为用渡船将5万军士运到穆德洛斯湾（Bay of Mudros，利姆诺斯南侧的天然港口，临近加利波利半岛）登陆。穆德洛斯湾缺乏皇家海军所需的港口设施，那里既没有部队所需的足量淡水，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供居住。自于2月到达以来，他们就不得不忍受恼人的冬季环境。<sup>12</sup>1915年3月18日，一支英国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门户之地发动的进攻导致英国损失三艘战列舰，尽管土耳其人向舰队射击时用尽了他们的弹药，但海峡中的水雷被证明是更大的威胁。<sup>13</sup>英国人曾希望俄国黑海舰队率4.7万人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但俄国人除在安全距离外炮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据点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只看到，东正教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时刻还没有到来。<sup>14</sup>更多的灾难导致丘吉尔被逐出海军部，但那时，部队已陷入无助的境地：

580

在崎岖的海岸边  
有块荒凉不毛之地，  
这是一片墓地，被人类的鲜血浸染，  
时光将使之圣化，记忆将奉献给亡灵。  
那里埋葬着英烈的骨灰，  
青年人在黑暗中燃起火把将其照亮，  
全身心为自由而战，无惧枪林弹雨，  
英名长存，永垂不朽。<sup>15</sup>

英方——大英帝国和法国——共损失 26.5 万人，土耳其方面大概损失 30 万人；但是，尽管损失惨重，土耳其人还是坚守了阵地，不到九个月进攻方就撤退了。在英国人看来，加利波利之战有其积极意义：土耳其人被迫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撤出巴勒斯坦，缓解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压力。<sup>16</sup>

### 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大部分地区依旧平静。开战前夕，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拉入同盟，英国海军部认为休达适合作为潜艇和鱼雷艇的基地，而法国人则希望将巴利阿里群岛用于从法属北非运输军队的中转站。如果西班牙国王没有鲁莽地提出用接管混乱的葡萄牙共和国，来补偿他向法国和英国提供的援助，或许谈判还能继续下去。<sup>17</sup>但他至少保持了中立，就航运而言，西班牙的水域依然是安全的。在战争的中心地区，海军行动的焦点是亚得里亚海，那里停泊着奥地利舰队。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正在向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投去贪婪的目光；奥地利人将科托尔视为重要的海军基地，依靠该基地，他们就能控制亚得里亚东海岸。1918 年 2 月科托尔的一次兵变表明，必须给予水兵们的生活工作条件以更多考虑。水兵们抱怨军官的生活方式：军官们经常带着妻子或情妇。一名水兵称，他被要求用光他的肥皂配额去给长官的狗洗澡。更糟糕的是，普通水兵不得不穿破衣烂衫，食用腐败变质的肉类和不足量的面包，而军官们则有优质肉类、蔬菜和水果。想要给年轻护士留下印象的军官，为了满足年轻护士对飞行的好奇，带她们进行空中旅行，便不足为奇了；有时候水上飞机还要带奥地利军官到杜布罗夫尼克去逛高

级妓院。兵变被镇压后，当局仅仅枪决了几位首犯，因为他们意识到，是时候对海军进行彻底重组了 [重组后的海军由新晋升的海军将领霍尔蒂 (Horthy) 统率，数年后他将骄傲地享有内陆国家匈牙利的“摄政”头衔]。<sup>18</sup>

战争之初，科托尔的情况不算太糟。港口在卡塔罗湾 (Bocche di Cattaro) 狭窄通道深处的峡湾之内；背靠陡峭的黑山山脉。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奥地利人需要驯服黑山，黑山统治者出于对其塞尔维亚同伴的同情，在弗朗茨·费迪南 (Franz Ferdinand) 被刺后不久便对奥匈帝国宣战。1914 年夏末，奥地利海军开始炮击黑山的巴尔港 (Bar)，法国人也从马耳他派出包括十四艘战列舰和几艘轻型舰艇的庞大舰队以作为回应。法国舰队将奥地利人逐出巴尔港，并炮击了卡塔罗湾的外围据点，但没有进攻科托尔。可局势非常凶险：直到意大利于 1915 年 5 月对奥匈帝国宣战，法国人才获得比英属马耳他更近的基地，而且法军在遥远的北方忙于应付马恩河 (Marne) 会战。<sup>19</sup>后来，奥地利人变得更加大胆，疯狂进攻意大利沿岸的塞尼加利亚 (Senigallia)、里米尼和安科纳等城镇，他们通过摧毁火车站、煤矿、油井，破坏了包括一座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报复，造成六十八人死亡。即便如此，奥地利人避开了塔兰托——它是意大利的主要海军基地。他们并没有寻求海战。意大利人从阿普利亚向达尔马提亚南部派遣海军以作为回应；他们破坏了从杜布罗夫尼克到科托尔的铁路线。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博弈以德国 U 型潜艇对意大利船只发动鱼雷攻击的方式继续下去；因为意大利尚未对德开战，只是和奥地利作战，德国的 U 型潜艇便恬不知耻地挂上了奥地利国旗。1915 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一艘德国 U 型潜艇在北非沿岸击沉了意大利班轮“安科纳号”（Ancona，当时它正从西西里驶往纽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美国总统向奥地利人表达了严正抗议，奥地利人当然急于将责任推给德国人。<sup>20</sup>最后，在海上炮击恢复后，奥地利军队于 1916 年初登陆黑山，并占领了黑山的首都采蒂涅（Cetinje）。<sup>21</sup>

这仅仅是争夺地中海一隅之控制权的战争。1917 年春，战争行动集中发生于奥兰托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狭长通道，当时奥地利人已占领了都拉斯。所有能用上的新技术都尽可能地利用起来。双方都出动水上飞机向敌舰投掷炸弹，但没有造成任何严重伤害，英国人在布林迪西为水上飞机建立了一处新基地。网被用于抗击奥地利和德国潜艇，但即便它们能阻止潜艇，也无法阻止鱼雷。支持英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的援军赶到了：十四艘日本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在战胜德国潜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六艘澳大利亚巡洋舰也到了；在希腊人于 1917 年 7 月拖拖拉拉地进入战斗后，一支实力可观的希腊舰队便派上了用场。<sup>22</sup>与奥地利进行有限战争的重要性在于出现了争夺制海权的新战法：水上飞机的价值依旧有待验证，潜艇价值的验证进展迅速。一些新危险开始显露：商船深受敌军潜艇威胁，到 1917 年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采用有效的护航制护送船只从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行驶。<sup>23</sup>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后，比柏柏尔海盗更狡猾的敌人在战时出现了：那种无形的、致命的且肆意的破坏方式是寻求战利品和人质的海盗们从未企及的。

##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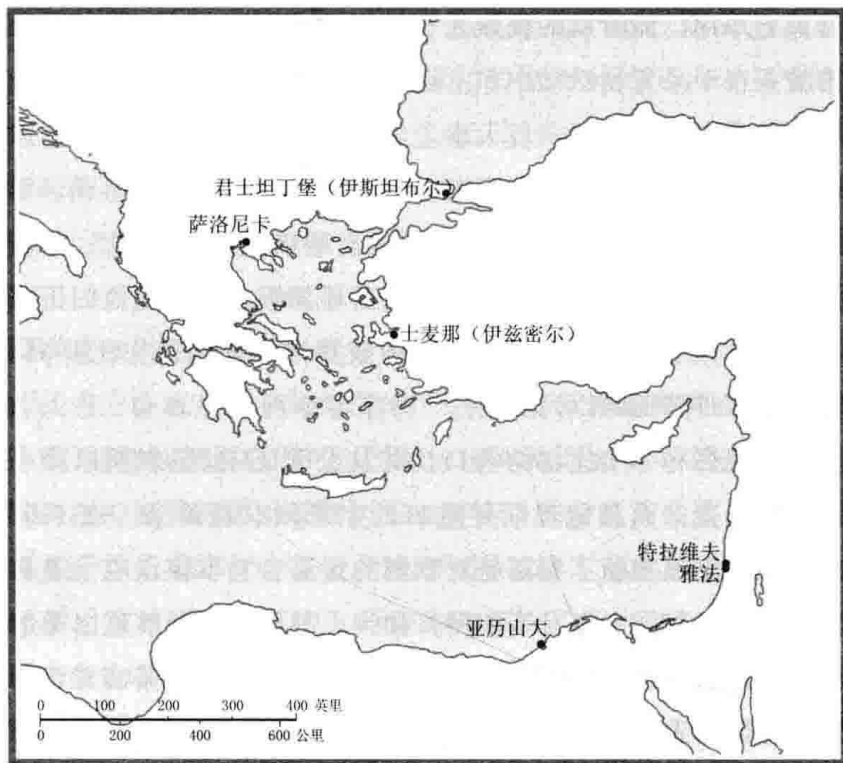
1. R. Patai, *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 1981), p. 120.
2. J. Abun-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 1987), pp. 309, 376-81.
3. *Ibid.*, pp. 281-93.
4. *Ibid.*, pp. 319-23.
5. N. Doumanis, *Myth and Memor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membering Fascism's Empire* (Basingstoke, 1997).
6. R. Rhodes James, *Gallipoli* (2nd edn, London, 2004), pp. 9-11; P. Halpern, *The 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1908-1914* (Cambridge, MA, 1971), pp. 357-8; M. Hickey,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4: *The Mediterranean Front 1914-1923* (Botley, Oxon, 2002), pp. 33-4.
7. Hickey, *Mediterranean Front*, p. 36.
8. Rhodes James, *Gallipoli*, pp. 23, 33-7.
9. *Ibid.*, pp. 16-17; P. Halpern, *A 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 (London, 1994), pp. 106-9.
10. Cited by Rhodes James, *Gallipoli*, p. 33.
11. *Ibid.*, p. 38.
12. *Ibid.*, pp. 40-41; Halpern, *Naval History*, pp. 112, 118.
13. Rhodes James, *Gallipoli*, pp. 61-4; Halpern, *Naval History*, p. 115.
14. Halpern, *Naval History*, p. 113.
15. J. W. Streets, 'Gallipoli', in L. Macdonald (ed.), *Anthem for Doomed Youth: Poets of the Great War* (London, 2000), p. 45.
16. Rhodes James, *Gallipoli*, p. 348; Halpern, *Naval History*, pp. 106-9.
17. Halpern, *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p. 287-90.
18. L. Sondhaus, *The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1867-1918* (West Lafayette, IN, 1994), pp. 318-24.
19. *Ibid.*, pp. 258-9; Halpern, *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 365; Halpern, *Naval History*, pp. 142-3.
20. Sondhaus,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 275-9, 286; Halpern, *Naval History*, pp. 148, 381-5; P. Halpern, *The Naval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1914-1918* (London, 1987), pp. 107-19, 132-3.
21. Sondhaus,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 285-6.
22. Halpern, *Mediterranean Naval Situation*, pp. 329-30, 337-42; Sondhaus, *Naval Policy of Austria-Hungary*, pp. 307-8; Halpern, *Naval History*, p. 393; Halpern, *Naval War*, p. 344.
23. Halpern, *Naval History*, p. 396; Halpern, *Naval War*, pp. 386-94.

## 四 四个半城市的传说 (1900 ~ 1950 年)

### 1

588

从地中海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前的一系列危机的最后阵痛：丧失了塞浦路斯、埃及、利比亚、多德卡尼斯群岛之后，土耳其人又在战时将巴勒斯坦的管理权丢给英国人，不久又是法国人对叙利亚的代管。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和谐共存数个世纪的港口城市，特别是萨洛尼卡、士麦那、亚历山大和雅法等产生了一系列有时甚至十分严重的后果。战争结束时，奥斯曼的心脏地带被各战胜国瓜分，就连君士坦丁堡也挤满了英国士兵。<sup>1</sup> 苏丹在政治上是稳定的，这为土耳其激进派提供了许多机会，尤其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他因在加利波利取得了战功而成名。土耳其人的种种怀疑中还掺杂着公共情感：1915年春夏对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驱逐活动在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的外交官中激起恐慌。穿越炎热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在暴戾监工的驱赶下，男女老幼，或因疲惫不堪而死亡，或被屠杀取乐，而奥斯曼当局则对据称在亚美尼亚人当中盛行不衰的叛国阴谋喋喋不休。其目的是“消灭五十岁以下的所有男性”。<sup>2</sup> 希腊人、犹太人和外国商人的担忧是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种族清洗”不一定局限于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在其最后岁月里，奥斯曼帝国抛弃了旧有的和谐共存理念。在土



耳其亦是如此，正如激进的青年土耳其党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势的民族主义情感正战胜昔日的宽容。

584

士麦那在战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其大多数人口免遭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总督（vali）拉赫米贝伊（Rahmi Bey）曾质疑奥斯曼帝国与德奥的同盟关系，并知道其城市的繁荣有赖于城内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欧洲商人与土耳其人的融合。<sup>3</sup> 当他受命将亚美尼亚人押送给奥斯曼当局时，他便敷衍了事，尽管他不得不将约一百名“声名狼藉者”送上生死难卜之路。<sup>4</sup> 希腊人是士麦那的主体民族；事实上，那里的希腊人比雅典城的希腊人还多，而且他们仍旧依附于东正教，这种信仰在希腊人的学校系统和公共庆典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而希腊的民族主义理念也开始向这一群体渗透。希腊人在干果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在内陆收获的无花果的到来，是士麦那港口的一件大事。虽然操拉迪诺方言的犹太社区不如萨洛尼卡的社区那么出名，但士麦那和萨洛尼卡一样，西方时尚盛行。士麦那总督曾拜访“全球以色列人同盟”的学校，并评价说，他希望犹太人能戴土耳其帽，而不是他们正戴着的西式帽子：“你们不是在法国或德国，你们是在土耳其，你们是苏丹陛下的臣民。”<sup>5</sup>

士麦那有一个优良的港口，并从公元18世纪末期以降一直持续繁荣，而其他奥斯曼港口的生意却日益萧条。在1800年左右，法国垄断了奥斯曼对欧洲的贸易，它不仅供应士麦那城以欧洲的服饰，还有诸如糖、咖啡、胭脂虫红和靛蓝之类的殖民地产品。士麦那的土耳其人购买的土耳其毡帽其实是法国货。<sup>6</sup>在欧洲人中有一帮活跃的英国、法国、意大利裔商业家族，在整个19世纪它们都有助于士麦那的商业繁荣，当时像水果出口大户惠特尔（Whittall）家族，辖下地毯厂雇用了15万人的吉劳德（Girauds）家族，控制着这里的经济生活。美国人是新到者之一，他们使士麦那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的交通中转站。<sup>7</sup>耸立着黎凡特各家族豪宅的广阔郊区——恰如名副其实的伊甸园——位于城外几英里处，有铁路和船舶将其与士麦那市中心连接起来。<sup>8</sup>众所周知，即便是在战时，这些“黎凡特人”也都能维持舒适惬意的生活，因为拉赫米贝伊没有理由将外国商人当作异族敌人——他们大多数出生在士麦那，并且从未去过其护照发放国。

再看伦敦，胜利的英国政府无视士麦那黎凡特商人的利益。他们对土耳其人有着强烈的敌视：外交大臣寇松勋爵



(Lord Curzon) 将奥斯曼人描绘成地球上“最致命的邪恶根源”之一，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有几年时间对古希腊文明的巨大成就是很痴迷，并不在意土耳其人的惨败——在最不切实际的错误判断下，他将凯末尔视为“在集市上叫卖地毯的人”。这使他赞成韦尼泽洛斯所心怀的复兴希腊统治区域的理想——该统治区将跨越爱琴海，将小亚细亚沿岸也包括在内。对韦尼泽洛斯而言，古代爱奥尼亚才是希腊文明的中心，他坚持认为，爱奥尼亚的希腊居民“是希腊民族最纯粹的组成部分”，乐观估计有 80 万人。<sup>9</sup> 在 1919 年对抗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过程中，英国对希腊的军事援助十分重视。显然，有必要嘉赏这些希腊的自由卫士。英国人乐于将士麦那及其内陆腹地给予希腊人，尽管美国人和大陆列强——他们于 1919 年召开了巴黎和会——对此不甚确定，士麦那的惠特尔家族提交证据说，该城的居民不愿受希腊政府统治，因为他们所有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都珍视城市内部的安定和谐，他们更希望实现地方自治。劳合·乔试试图让他的大多数盟友相信，士麦那及其内陆腹地应当立刻委托给韦尼泽洛斯，应当敦促他派希腊军舰前往士麦那，并迅速占领爱奥尼亚沿岸。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 (Bristol) 极力反对这种处置方式，此人的偏见与他所处的职位极不相称：他声称，“亚美尼亚人类似犹太人；他们鲜有或根本没有民族精神，而且道德品质低下”，但他对英国人最为愤怒，因为他不相信劳合·乔治之举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关怀——他完全是为了争夺石油。<sup>10</sup>

586

1919 年 5 月，1.3 万人组成的希腊军队抵达士麦那。开始时还很平静，随之是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土耳其人的村庄遭到

洗劫，仅在士麦那就有四百名土耳其人和一百名希腊人被杀。新任希腊总督阿里斯台德·斯特吉阿德斯（Aristides Sterghiades）身在远方，却更喜欢凌驾于士麦那精英的社会生活之上。他力图做到公正，而且常常在争端中支持土耳其人，打压希腊人；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受到希腊人的鄙视，希腊人的必胜主义威胁着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东西。另外，他通过各项政策，使贸易重回士麦那。然而在内陆腹地，问题变得愈发严重；红十字会搜集了许多希腊人在土耳其人聚居区实施种族清洗的证据。红十字会曾问一位希腊官员，为什么他让他的手下杀害土耳其人，官员回答道：“因为这令我感到兴奋。”事实上，暴力是双方共有的标签。但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集结他的军队，1921年，希腊人试图进入东部高原，希望在希腊和土耳其西部高原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一开始取得了成功，但很快遭遇土耳其人的猛烈反击，希腊人深陷安纳托利亚无法脱身。希腊人的溃败使土耳其军队一路向西抵达士麦那，并于1922年9月9日进入士麦那城，但在此前，来自内陆的5万名战败的希腊士兵和15万名内陆的希腊人已经进入该城。

587

这是铭刻于希腊人记忆中的灾难的开始。尽管首批进驻士麦那的土耳其部队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但随军而来的还有“切特”（*chettes*）——土耳其非正规军，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劫掠中已沾满了希腊人的鲜血。当难民拥入城市时，屠杀、强暴、抢劫成为难以言喻的日常秩序，刚开始的目标对象是他们最喜欢的敌人——亚美尼亚人，而不是希腊人——这些主要是“切特”们所为，但并不全是。无论是新任土耳其总督，还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他们似乎已经将这些现象视为一种战争事实，并且没有任何担心；对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而

言，新土耳其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亚美尼亚人聚居区遭到彻底洗劫，接踵而至的是满城的暴力，但土耳其人聚居区受到尊重。黎凡特商人的郊区别墅遭到抢劫；大多数黎凡特人（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变得一无所有，他们的贸易公司不再营业。最后，士麦那的街道和房子被泼上汽油（再次从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开始），9月13日这天，城市被付之一炬。此举使难民人数暴增至七十万，因为在当时，士麦那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迫逃到码头。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军舰停泊在港口，各方都焦急地保护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大火逼近码头，威胁着各大贸易公司的仓库和办事处，市中心化为灰烬，而大量绝望的民众——他们中许多人死于伤痛、饥渴和劳累——则祈求救援。

列强们的冷漠令人不寒而栗。布里斯托尔上将早就对两名美国记者下达指令，不准他们报道土耳其人的暴行，法国和意大利严守“中立”，防止接纳难民——以至于游向军舰的许多人溺亡在海中。当一艘美国舰船在附近水域发现有一位男孩和一位女孩时，水手们告诉阿沙·杰宁（Asa Jennings）——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雇员，他正力图组织大规模撤离行动——尽管他们也十分希望提供帮助，但此举有违禁令，有损美国的中立性。他拒绝接受建议——孩子们被救了起来，原来他们是兄妹。<sup>11</sup>在英国军舰上，当军官们在食堂用餐时，乐队奉命奏乐以掩盖几百码以外码头区传来的哀号。最终英国上将为人们强烈的哀求所感动，坚持不懈的杰宁获得了附近莱斯沃斯基地希腊海军的援助，盟军船只救起两万人，杰宁的希腊舰队救起的更多。即便如此，士麦那及其腹

地仍有十万人左右被杀，至少有同样数量的人被赶往安纳托利亚内陆，绝大多数人消失在那里。

士麦那海湾指挥官的冷酷无情，以及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布里斯托尔上将深深的敌意表明，当时对人道主义灾难的思考方式与 21 世纪初迥然不同。“中立”被理解为人们应该袖手旁观，而不是中立方最好向种族冲突中流离失所、濒临死亡的受害者伸出援手。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掺杂着某种意识，即劳合·乔治对韦尼泽洛斯的支持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对于它们无论希腊还是英国都无法控制。士麦那大部分居民都离去了；士麦那也不复存在，被大火焚毁，新的土耳其城市伊兹密尔也从未恢复士麦那曾长期保持的商业优势。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留下的空白被那些从克里特和意大利北部逐出的、大批拥入土耳其的土耳其族人填充。最终，根据 1923 年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实施了大规模的居民交换——仅克里特一处就有 3 万名穆斯林离开。1922 年 11 月，末代苏丹离开伊斯坦布尔，这为建立一个新的、亲西方的土耳其——有一座新的首都、一套新的字母体系、一部世俗宪法——扫清了最后的、极其无力的障碍。在希腊，“伟大的理想”(Megalé Idea) 胎死腹中，但土耳其帝国的多民族特点也消失了。尽管出现了民族、宗教关系的紧张局面甚至引发了仇恨，尽管奥斯曼统治当局往往用各种财政和社会限制性条件来羞辱基督徒和犹太人，但它的体制还是将不同的民族凝聚在一起长达几个世纪。它为一系列民族国家所取代，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宣扬着激烈的民族主义，并发现它难以容纳他们当时所认为的外来者——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希腊的犹太人和穆斯林。

## 2

亚历山大是另一座港口城市，市内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城初具现代雏形，优美的滨河公路（Corniche road）傍水而建，宽阔的大街与公寓楼、办公室开始出现。这些建筑中有仿科普特风格的圣公会教堂（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以及建筑师亚历山德罗·洛里亚（Alessandro Loria）——他生于埃及，受教于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成名于亚历山大——设计的著名建筑群。他设计的埃及国家银行俨然一座威尼斯宫殿；他还建造了犹太人的和意大利人的医院，这与他既是犹太人又是意大利人的身份相称；他所修建的最常被光顾的建筑是著名的塞西尔酒店（Cecil Hotel）——温斯顿·丘吉尔和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最爱，当然，还有达雷尔创作的人物贾斯廷（Justine）。<sup>12</sup>城市内的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科普特人和土耳其居民为亚历山大骄傲，并认为，古典时代的 *Alexandria ad Aegyptum* 指一座埃及之外——而非其内部——的欧洲城市。<sup>13</sup>贾斯伯·布林顿（Jasper Brinton），一位在20世纪初担任埃及混合法庭诉讼法官的美国人，谈及亚历山大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说，亚历山大的“宏伟和精巧，远超出地中海任何城市”；音乐爱好者在城市最大的剧院欣赏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巴甫洛娃（Pavlova），以及来自拉斯卡拉（La Scala）的最优美的声音。<sup>14</sup>据说街道十分干净，你可以吃掉落在地上的食物，而这种事在当今是无人会去尝试的。

当然，国际性的大都会亚历山大并非亚历山大的全部，这里将简要交代一下精英的生活，而不是居住在城市北部海滨的

希腊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科普特人中多数人的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地图上，这座窄长的城市的南部叫阿拉伯乡（*Ville arabe*），但除了提供厨师、侍女、电车司机外，阿拉伯人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亚历山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欧洲人仅占城市人口的15%，即便他们把持着经济命脉；1927年，城内约有4.9万名希腊人，其中3.7万人有希腊公民权，还有2.4万名意大利人和4700名马耳他人。在国籍交叉人群中，有2.5万名犹太人（约5000人有意大利护照，尽管许多人依旧无国籍）；许多希腊人也持有非希腊护照——或为塞浦路斯人（这使之成为英国人）或罗得岛人（这使之成为意大利人），或在1923年后成为土耳其的臣民。<sup>15</sup>大部分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家族，包括皇室在内，来自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叙利亚或黎巴嫩。就像在萨洛尼卡和士麦那那样，法国人对亚历山大大举入侵，而无视埃及是英国的被保护国。一名亚历山大流亡者承认，他的阿拉伯语阅读水平仅限于菜单和报纸头条：“我始终认为英语和法语是我的母语。”他的妻子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我妈妈操一口地道的法语，我爸爸只会说意大利语。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彼此了解，但他们确实能了解对方。”<sup>16</sup>对阿拉伯语略知一二主要是因为这有利于和其仆人进行交流。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拒绝任何东方意识将最终被证明不利于这些社区的存活。

安德烈·阿西曼（André Aciman）关于亚历山大生活的传记体小说揭示了许多亚历山大人的思维方式。阿西曼的家庭于1905年从君士坦丁堡来到亚历山大，但他的叔叔维利（Vili）既喜欢亚历山大，也爱慕欧洲：

就像世纪之末大多数出生于土耳其之人，维利蔑视

任何有关奥斯曼文化的事物，同时渴慕西方，并最终像土耳其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成为“意大利人”：通过声称祖上与里窝那——比萨附近的一个港口城市，16世纪时从西班牙逃出的犹太人就定居在那里——沾亲带故。<sup>17</sup>

建筑师洛里亚喜欢让自己和家人身穿法西斯主义者的黑衫；他也是亚历山大犹太会堂的赞助者。最有势力的犹太家族是费利克斯·德·梅纳谢男爵（Baron Félix de Menasce）的家族，男爵拥有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头衔，尽管其祖父——生于开罗——在成为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银行家后才获得了财富；到费利克斯时代，支持着该荣誉家族的财富不仅有银行业，还有与的里雅斯特的商贸往来。他创办学校、医院，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犹太会堂和墓地，这是因为他与坚持将新犹太会堂建于内比丹尼尔大街（Nebi Daniel street）的当权者不和。虽然他过着一种世俗生活，犹太习俗并不受到重视，但当得知正在巴黎学习的儿子让（Jean）在天主教会接受了洗礼，他还是沮丧万分。更糟糕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参加了多明我会，并来到亚历山大传教。费利克斯·德·梅纳谢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密友，后者于1918年3月访问亚历山大，并在气势不凡的梅纳谢宅第停留。有趣的是，费利克斯男爵利用他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关系，试图促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就巴勒斯坦的未来达成双边协议，但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对此并不感兴趣。<sup>18</sup>

这些关系往来为劳伦斯·达雷尔描述亚历山大的巨富银行家内西姆（Nessim）提供了灵感，他将内西姆描写为一位科普

特人，而非犹太人。20世纪50年代早期，达雷尔在塞浦路斯的贝拉佩斯（Bellapais）写完了《亚历山大四部曲》（*Alexandria Quartet*）的第一卷，但他是通过其第二任妻子伊芙·科恩（Eve Cohen）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通过第三任妻子克劳德·万桑东（Claude Vincendon）——她是费利克斯·德·梅纳谢的孙女——与犹太人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sup>19</sup>梅纳谢家族与另一名门望族佐格布（Zogheb）家族社会交往颇深——该家族是来自叙利亚的默基特天主教徒，属于一个由许多富有的丝绸、木材、水果、烟草贸易者组成的社会团体。<sup>20</sup>士麦那黎凡特家族豪华的中产阶级生活和梅纳谢家族及其同级贵族那真正的贵族风格不可相提并论，尤其是在这位亚历山大精英得到国王和奥玛·图颂（Omar Toussoun）——一位非常受人钦佩的王室成员，他懂得与亚历山大不同社区保持联系的重要性——的器重后。他可能会在某犹太学校，或是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College）——仿照英国公学而建——向亚历山大精英人士的子女颁发奖金。他是“科普特考古学会”（Coptic Archaeological Society）的荣誉主席，并慷慨地捐资修建科普特医院。与此同时，他对当地经济也抱有浓厚兴趣，致力于稳定棉花价格。<sup>21</sup>

外国社区的日常生活围绕贸易和咖啡馆而转，在诸多咖啡馆中，最著名的是希腊人的咖啡馆，尤其是帕斯特洛迪斯咖啡店（Café Pastroudis）。在这些咖啡馆中，可以找到希腊知识界人士，其中最有造诣的当数诗人卡瓦菲（Cavafy）。<sup>22</sup>英国小说家福斯特（E. M. Forster）——他在该城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部分时光（并爱上一位阿拉伯男电车司机）——将卡瓦菲诗作的知名度传到亚历山大之外，而诗人自己却一次又



一次地回到故乡主题。问题在于，他的思绪总是回到古代亚历山大，而不是那座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城市对他没有吸引力。<sup>23</sup>在东地中海的所有港口城市中，亚历山大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政治变迁影响最小的城市，它的复兴主要归功于被赫迪夫而非苏丹的进取心吸引而来的外国居民。

### 3

亚历山大是座重建的新城市；离此不远处，在巴勒斯坦，诞生了一座新城。在那里，英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与埃及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阿拉伯人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 T. E. 劳伦斯所扶植的——使英国重要的盟友都对抗土耳其人；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对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要求加剧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英国政府于 1917 年《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表露对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Jewish National Home）之理念的同情之后。犹太人的渴望在重返故土的理念中表现出来。中东欧的理想主义犹太人移居者建立了农业定居点——基布兹运动（Kibbutz Movement）的目的是让犹太人走出城市，到乡间呼吸新鲜空气——但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另一条路线，根据该路线，在巴勒斯坦建立由犹太人定居的西方化城市才是基本任务。1909 年，一群犹太人，主要是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获得了古代雅法港以北一英里处的沙丘，并将这片地区划分为六十六块，这六十六块土地通过抽签方式进行分配——他们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因为抽签方式能保证没有人能为得到好的位置而讨价还价，而且无论贫富都能比邻而居。<sup>24</sup>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宜居的花园城市，

598 或一个花园郊区，因为起初他们不愿将任何商店纳入他们的计划中。他们认为，居民们可以去雅法寻求他们所需的一切补给品。为取一个名字，移民者们为各种备选名争论不休，其中包括坚定的复国主义者荷兹利亚（Herzliya）和讨喜悦耳的叶菲菲亚（Yefefia，“最美丽的”）。最后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赢得胜利，因为特拉维夫是他关于重建锡安山的小说《新故土》（*Altneuland*）的希伯来文标题：特拉（*tel*）代表古代遗存，它提醒来访者，犹太人在一千年前曾出现在那里，维夫（*aviv*）象征小麦丰收的第一批绿芽，引申含义就是春天。<sup>25</sup>

就这样，地中海沿岸诞生了自中世纪早期——突尼斯被建立起来以取代迦太基的时期，也是威尼斯以其潟湖为发源地而兴起的时期——以来首个将成为大城市的城市。特拉维夫的诞生为了解以色列曲折建国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地中海的视角，这座新城市崛起于其阿拉伯邻居的盛怒之下——许多中东阿拉伯国家绘制的地图上至今仍不标注特拉维夫。<sup>26</sup> 特拉维夫的建立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建立一个犹太人定居地，该城将拥有区别于雅法的欧洲特点，他们认为雅法是令人痛心的“东方”城市。对雅法而言，这种对欧洲现代化的向往并不陌生。带着强烈的日耳曼种族优越的意识，19世纪80年代，一支名为共济会（Templars）的新教派别在雅法城外依次建立了两处定居地：“在宽阔的街道、优雅的建筑丛中漫步，人们可能会忘记他实际上处于不毛之地，会以为自己身处一座欧洲文明城市。”<sup>27</sup> 雅法城内富有的阿拉伯人也在其郊区建立舒适的别墅。而特拉维夫也并不是雅法的第一个犹太郊区。19世纪80年代，富有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阿哈龙·舍卢什（Aharon Chelouche）——自1838年起就定居在巴勒斯坦——便购买了

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雅法的尼维兹德克（Neve Tzedek）。令见过尼维兹德克的人印象深刻的是整洁宽敞的格局，这里的房舍被认为是雅法最漂亮的建筑。<sup>28</sup>尼维兹德克吸引了各方的殖居者——包括北非的切鲁切斯（Chelouches），来自中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罗门·阿布拉菲亚（Solomon Abulafia）成为该市市长，他来自离太巴列不远的地方，他和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妻子瑞贝卡·弗里曼（Rebecca Freimann）于1909年逃离切鲁切斯，加入特拉维夫的创建者之列。毫不奇怪，他的肖像，与他在雅法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同僚一样，穿戴着礼服上衣、领结和条纹裤子，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象征。<sup>29</sup>作家阿格农（Agnon）在尼维兹德克的阿布拉菲亚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在特拉维夫成为希伯来文化中心前，这里聚集着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移民群体。

雅法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它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港口，也是耶路撒冷的主要出海口，但稍大一些的船只仍无法靠岸，旅客们因此不得不乘驳船下船，或者让码头装卸工将东西背上岸。奥斯曼苏丹在那建了座钟楼——至今仍旧矗立，作为雅法现代化的象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雅法已有4万多居民，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犹太人群体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后，在战争期间，根据土耳其人的命令——他们担心雅法市民与逼近的英国军队狼狈为奸，该城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被撤走；但雅法和其犹太人郊区并未遭到土耳其人的劫掠（更多的破坏来自澳大利亚军队，他们在空城内驻扎了一段时间），雅法在战后又重新振作起来。<sup>30</sup>人们可从其火车站向北前往贝鲁特，向西南方向前往开罗——甚至前往喀土穆（Khartoum）。雅法不仅从地中海到内陆的贸易往来中获利，还

从其盛产的柑橘中获得收入，其柑橘行销奥斯曼帝国和西欧。雅法——而非耶路撒冷——也是巴勒斯坦的文化中心，阿拉伯人中日益强化的认同感体现在一份由基督教徒所有的报纸《巴勒斯坦》（*Falastin*）的标题和内容上。<sup>31</sup>这并不意味着其文化生活对亚历山大构成挑战。抛开顽固的德国新教徒，雅法是一座讲阿拉伯语的城市，切鲁切斯人与其阿拉伯朋友和邻居关系良好。<sup>32</sup>但特拉维夫的出现引发了新的紧张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雅法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喜欢前往新定居地，那里有伊甸园影院（Eden Cinema）之类的消遣之地，以及新开的赌场和妓院。但从1921年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便开始破坏双边关系；当雅法那神经紧绷的阿拉伯人误认为，特拉维夫的一次共产党示威游行是一群暴民意图攻击雅法时，第一次骚乱发生了；49名犹太人被杀，包括位于郊区的作家移民区的多居民。<sup>33</sup>

造成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是跨越地中海的大量犹太移民的到来。1919年底，俄国船“鲁斯兰号”（*Ruslan*）将670名乘客从敖德萨运到雅法。即使是这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民也未能改变老雅法的内部特点，因为他们前往特拉维夫和巴勒斯坦内陆腹地居住，雅法和特拉维夫之间平衡关系的改变也是可以察觉到的，而且速度十分快。1923年，特拉维夫已有2万居民，几乎都是犹太人。在此之后，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数量逐渐超过了雅法的犹太居民：一年后，特拉维夫有4.6万居民；1930年有15万人；1948年以色列建国那年，达到24.4万人。它渐渐地摆脱雅法而自治，从1921年起便享有内部自治权，在雅法边缘吞并了其他犹太人区，如尼维兹德克，并在193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区。<sup>34</sup>特拉维夫的早期发展之一是建立

一所学校，即赫兹利亚预科学校（Herzliya Gymnasium），它迫使现代建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它已荡然无存，被一座丑陋的塔楼取代）承担起重要文化中心的职能。<sup>35</sup>另外，这使犹太儿童脱离雅法的混合学校——通常由修女开办，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里一同学习。

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港口的创建。雅法港一直为特拉维夫服务到1936年发生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暴力冲突。此后，在阿拉伯人也联合抵制犹太商店、犹太人也联合抵制阿拉伯商店的过程中，城镇议会请求英国当局批准他们在这座日益扩大的城市以北建立一座港口。犹太领导人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说：“我想要个犹太海。此海是巴勒斯坦的延伸。”雅法很快便感受到竞争港口的影响：1935年雅法进口商品总额为770万英镑，次年该数额跌到320万英镑，而特拉维夫进口是60.2万英镑；但到1939年，雅法进口商品总额仅为130万英镑，特拉维夫则增长到410万英镑。因为在1936年危机中阿拉伯劳动力供应不足，雅法港便从萨洛尼卡雇用人手，萨洛尼卡城因此以为犹太人提供码头工而闻名。<sup>36</sup>一系列黎凡特集市也为特拉维夫带来财富，这些集市在1924年平稳起步，但在1932年增长到有831家外国公司在此展出它们的商品。特拉维夫正成长为地中海和中东之间的新的交通枢纽（证明这一点是可能的），集市还吸引了来自叙利亚、埃及和新成立的外约旦王国的商品。<sup>37</sup>

伴随着这种增长，特拉维夫发展为一个真实的城市，甚至在其与雅法的边界还不确定且是争论的主题时就已经如此。城市建筑是不协调的私人产业和一定数量的中央规划的混合体——足以建一条以罗斯柴尔德家族名字命名（以希望获得

更多财政支持)的宽阔林荫大道。20世纪30年代,苏格兰建筑师格迪斯(Geddes)提出了一项总体规划,他试图将城市与其漫长的海岸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市中心令人瞩目的包豪斯(Bauhaus)式建筑表达了富裕居民希望被视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承载者;他们建造的“白城”就被认为足以收入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寻求西方的、欧洲的认同的其他表达方式可见于哈比玛剧院(Habima Theatre)和城市的文学、艺术、音乐文化。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亚历山大、萨洛尼卡、贝鲁特以及雅法;这里不同一点的是,正如观察者经常评论的那样,相比于那不勒斯和马赛之类的地中海城市,特拉维夫有时看起来更像敖德萨和维也纳之类的东欧的城市。

在双方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刻,雅法居民对犹太邻居的行为的困惑感可从1936年的名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报纸刊载的一幅漫画(见第825页)中看出。一位盎格鲁大主教站在布道坛上告诫身材肥胖的约翰·布尔(John Bull,亦可译为约翰牛,即英国人)——他已同两位妻子分手。第一位妻子是端庄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她的脸和头发都暴露在外,但她穿着传统的巴勒斯坦衣裙,提着一个装着鸽子的鸟笼。第二位妻子是一位长腿、身穿超短裤和紧身上衣,抽着香烟的犹太时髦女郎。约翰·布尔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迫使他两次结婚,大主教坚持认为,他必须与他的犹太妻子离婚。漫画中的政治信息十分明确,但对新的犹太定居者行为方式的沉迷和不安也表露得淋漓尽致。<sup>38</sup>切鲁切斯移民建立尼维兹德克时存在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随意的熟悉感消失了。特拉维夫的创建者们开始过分强调他们提议创建的事物和



### The man of the two wives

**JOHN BULL** :— My Lord, I married first an Arab woman and then a Jewess and for the last 16 years I have had no peace at home ...

**THE ARCHBISHOP** :— How did you manage to have two wives, are you not a Christian ?

**JOHN BULL** :— It was the pressure of the Great war, my Lord ...

**THE ARCHBISHOP** :— Well my son, if you are sincerely looking for peace you must divorce your second wife, because your marriage to her is illegal ...

### الرجل ذو المرأتين

جون بول : اتى يا سيده تزوجت امرأة عربية اولاً ثم تزوجت عليها امرأة يهودية ومنذ ١٦ سنة حتى الان لا اطمع بالهدوء المنزلي ...

رئيس الاساقفة : وكيف تزوجت اثنتين أنت مسيحي !!

جون بول : كان ذلك تحت ضغط الحرب العظمى يا سيده ...

رئيس الاساقفة : اخذ عليك يا ولدي اذا كنت حقيقة ترغب في السلام ان تطلق الثانية لان زواجك بها غير شرعي ...

他们留在雅法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建立尼维兹德克的少数现代主义者已被移民们淹没了，对他们而言，东方道路是完全的异域之物。这种变化自然产生于成千上万的新来者——他们从中欧和东欧逃避迫害而来——对特拉维夫所施加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评估了建立犹太人城市——第一座完全属于犹太人的城市——的优势，他们宣称，他们为达此目的已经坚持了一千九百年了。讽刺的是，在这一切发生时，欧洲的迫害浪潮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摧毁了那些犹太人居民接近或已占多数的东欧城市。萨洛尼卡就是其中之一。

#### 4

598 人们已经看到，萨洛尼卡是如何发现自己卷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进程中；它甚至发现自己从1915年起就被置于最前线，当时英法军队已抵达，希望（但又很快放弃）支持塞尔维亚军队抗击奥地利；协约国军队在萨洛尼卡及其周边地区——一个英国人称为“鸟笼”（Birdcage）的地方——驻扎。协约国军队的出现使政局动荡不安：英国和法国支持韦尼泽洛斯对抗希腊国王——韦尼泽洛斯于1916年来到萨洛尼卡，加深了希腊政治中既有的分裂局面，保王党和韦尼泽洛斯党之间爆发了冲突，协约国军队占领了希腊皇家海军的几艘舰艇。<sup>39</sup>之后，在1917年大火及战争结束后，萨洛尼卡吸引了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力，因为它还保有大量穆斯林：1923年7月，尚有约1.8万名穆斯林居住在萨洛尼卡。100万名基督徒从土耳其到达了希腊——他们是逃避那摧毁了士麦那的战乱的难民，随之而来的是根据《洛桑条约》的居民交换条款而遭



驱逐的那些人；这些人中有 9.2 万人将定居萨洛尼卡。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穆斯林被清空，而来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则被安置在土耳其人的空屋和土地上，或大火后重建的区域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洛尼卡人发现许多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难民说土耳其语；他们身份的标识是希腊教会，而非希腊语，他们的服装几乎无法与那些土耳其穆斯林相区别——他们在土耳其穆斯林中生活了将近九百年。<sup>40</sup>

萨洛尼卡仍然有 7 万名犹太人。希腊政府鼓励他们希腊化，尤其是通过在学校教他们希腊语的方式推动这一转化。有时，这种希腊化进程也会在政府去挑战那些“狭隘的宗教观念”，取缔犹太商店可在周六关门歇业但可在周日开业的规定时，导致紧张局面。<sup>41</sup>然而与此同时，赎罪日（Day of Atonement）却成为萨洛尼卡一大公共节日，而且每个人都明白，这座城市经济的稳定有赖于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合作。也有一些犹太人移民至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在海法和特拉维夫，犹太码头装卸工受到重视。但总体感觉是，尽管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犹太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即便有，在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确定之后，威胁也已经减弱了许多。

59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在德国人于 1941 年 4 月占领萨洛尼卡后，上面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变得十分明显了。城内偶有暴行发生，如查封犹太人的珍贵手稿和建筑，但在约两年的时间里，此地对犹太人的限制比希特勒帝国境内任何地方都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食物的严重短缺，该城的经济濒临崩溃，德国人不愿扰乱那里的商业活动。<sup>42</sup>纳粹对待讲西班牙语的塞法迪犹太人与对待中东欧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态度无异。一旦纳粹决定采取行动，他们便迅速而高效——在这些行

动背后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邪恶推手。1943年2月，犹太人被限制在隔都内不得随意出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传闻，他们将被流放到克拉科夫（Cracow）的橡胶工厂去工作；3月15日，第一列火车装载着受害人前往波兰。到8月时，引用当时德国人的话说，该地几乎完全没有犹太人了（*Judenrein*）。在几周之内，43850名萨洛尼卡犹太人被处死，大部分人刚到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其他地方就被毒害。<sup>43</sup>意大利领事拯救了一部分人，个别希腊人，包括教士，经常做他们力所能及之事帮助犹太人；西班牙当局有时愿意帮助那些他们认为长期以来都是西班牙人伙伴的犹太人。尽管如此，纳粹在希腊还是成功地清除了85%的犹太人社区。

所以，在三个半世纪后，旧的萨洛尼卡不复存在。士麦那是第一个被压垮的大型港口城市。士麦那的陷落导致约10万人被杀。萨洛尼卡经历了因工业化杀戮机器而倍增的恐惧。东地中海港口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遭到破坏，尽管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生灵涂炭。每座城市都取得了其特定的身份认同，如一座希腊城市、一座土耳其城市、一座犹太城市或一座埃及城市。在更靠西的地区，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民聚在一起的港口城市正在衰落。里窝那早在19世纪中期，在这些事件发生前，就加入了统一的意大利国家，当该城市失去特权并将首要地位让给热那亚和其他竞争对手时，它的精英认同（无论个人出身何处）了意大利，日益趋向于专业领域的职业和非商业事务。<sup>44</sup>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里雅斯特脱离了奥匈帝国，曾是其优势的地理位置如今成为一种尴尬，因为该城处于新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以及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无足轻重的小国奥地利的包围之中，以至于无法明确

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身份。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为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争论的焦点，直到 1954 年才获得模棱两可的“自由市”（Free City）地位。它独特的文化身份，或者说其多重身份，被证明无法在这些政治经济变革中保留下去。

雅法的变化更加突然，尽管早已随着特拉维夫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非阿拉伯城市而失去了多重身份。在 1948 年春的几个星期中，在以色列诞生前夕，上万名雅法阿拉伯人乘船或经陆路逃离，在加沙、贝鲁特和其他地方寻求避难。联合国已将雅法标注为拟建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块飞地，这个阿拉伯国家将会与一个犹太国家共存于巴勒斯坦地区。4 月下旬，在犹太军队轰炸后，雅法人口数量越来越少。阿拉伯社区——此时该社区已经缩减至仅有约 5000 人——的领导人于 5 月 13 日交出了城市，以色列国于第二天在特拉维夫的罗斯柴尔德大道上宣布正式独立。<sup>45</sup>此后，雅法便成为特拉维夫的一个有少数阿拉伯人居住的郊区，这与四十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而那些已经离开之人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回去。在亚历山大，最后的行动一直拖延到 1956 年，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伽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下令驱逐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其他人并没收其财产。该城将自己重塑为一个穆斯林众多的阿拉伯城市，但经济状况却急转直下。城内留有老亚历山大的一些遗迹，但主要是希腊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科普特人的公墓。至于萨洛尼卡的公墓，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公墓以及所有墓穴都被纳粹洗劫一空。如今它已被塞萨洛尼基的亚里士多德大学的广阔校园所覆盖：“那里尚存的一些墓冢已无碑铭。”<sup>46</sup>

## 注 释

1. M. Housepian, *Smyrna 1922* (London, 1972), p. 83.
2. G. Milton, *Paradise Lost – Smyrna 1922: the Destruction of Islam’s City of Tolerance* (London, 2008), pp. 84–8.
3. H. Georgelin, *La fin de Smyrne: du cosmopolitisme aux nationalismes* (Paris, 2005); M.-C. Smyrnelis (ed.), *Smyrne: la ville oubliée? Mémoires d’un grand port ottoman, 1830–1930* (Paris, 2006).
4. Milton, *Paradise Lost – Smyrna 1922*, pp. 86–7, 98–9; Housepian, *Smyrna 1922*, pp. 124–5.
5. H. Nahum, ‘En regardant une photographie: une famille juive de Smyrne en 1900’, in Smyrnelis, *Smyrne: la ville oubliée?*, p. 103.
6. E. Frangakis-Syrett, *The Commerce of Smyr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00–1820* (Athens, 1992), pp. 121, 207–14; E. Frangakis-Syrett, ‘Le développement d’un port méditerranéen d’importance internationale: Smyrne (1700–1914)’, in Smyrnelis, *Smyrne: la ville oubliée?*, pp. 23, 37, 45–9; and in the same volume, O. Schmitt, ‘Levantins, Européens et jeux d’identité’, pp. 106–19.
7. Milton, *Paradise Lost – Smyrna 1922*, pp. 16–19; Frangakis-Syrett, ‘Développement d’un port’, p. 41.
8. Georgelin, *Fin de Smyrne*, pp. 44–50.
9. Milton, *Paradise Lost – Smyrna 1922*, pp. 36–8, 121, 127–8, 155, 178.
10. *Ibid.*, pp. 128–34; Housepian, *Smyrna 1922*, pp. 63–4, 76.
11. Milton, *Paradise Lost – Smyrna 1922*, pp. 176, 322, 332, 354; Housepian, *Smyrna 1922*, pp. 191–2.
12. M. Haag, *Alexandria Illustrated* (2nd edn, Cairo, 2004), pp. 8–20; M. Haag, *Alexandria, City of Memory* (New Haven, CT, 2004), pp. 150–51.
13. Haag, *Alexandria, City of Memory*, p. 17; E. Breccia, *Alexandria ad Aegyptum: a Guide to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own and to its Graeco-Roman Museum* (Bergamo and Alexandria, 1922); K. Fahmy,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Alexandria’, in A. Hirst and M. Silk (eds.),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2nd edn, Cairo, 2006), p. 282.
14. Haag, *Alexandria, City of Memory*, pp. 136–7.
15. R. Mabro, ‘Alexandria 1860–1960: the cosmopolitan identity’, in Hirst and Silk,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p. 254–7.
16. J. Mawas and N. Mawas (*née* Pinto) speaking in M. Awad and S. Hamouda, *Voices from Cosmopolitan Alexandria* (Alexandria, 2006), p. 41.
17. A. Aciman, *Out of Egypt* (London, 1996), p. 4; K. Fahmy, ‘For Cavafy, with love and squalor: some critical note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 modern Alexandria', in Hirst and Silk,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p. 274-7.
18. Haag, *Alexandria, City of Memory*, pp. 139-50.
  19. L. Durrell, *Justine* (London, 1957); also his *Bitter Lemons of Cyprus* (London, 1957).
  20. M. Awad and S. Hamouda (eds.), *The Zoghebs: an Alexandrian Saga* (Alexandria and Mediterranean Research Center monographs, vol. 2, Alexandria, 2005), p. xxxix.
  21. S. Hamouda, *Omar Toussoun Prince of Alexandria* (Alexandria and Mediterranean Research Center monographs, vol. 1, Alexandria, 2005), pp. 11, 27, 35.
  22. Cited by M. Allott in E. M. Forster, *Alexandria: a History and Guide and Pharos and Pharillon*, ed. M. Allott (London, 2004), p. xv.
  23. Cavafy's 'The gods abandon Antony', trans. D. Ricks, 'Cavafy's Alexandrianism', in Hirst and Silk, *Alexandria Real and Imagined*, p. 346; E. Keeley, *Cavafy's Alexandria* (2nd edn, Princeton, NJ, 1996), p. 6; Fahmy, 'For Cavafy', p. 274; also N. Woodsworth, *The Liquid Continent: a Mediterranean Trilogy*, vol. 1, *Alexandria* (London, 2009), p. 175.
  24. Y. Shavit, *Tel Aviv: naissance d'une ville (1909-1936)* (Paris, 2004), pp. 9, 44-6.
  25. J. Schlör, *Tel Aviv: from Dream to City* (London, 1999), pp. 43-4; M.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Jaffa, Tel Aviv, and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e, 1880-194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2005), pp. 60, 72.
  26. Schlör, *Tel Aviv*, p. 211.
  27. Cited in A. LeBor, *City of Oranges: Arabs and Jews in Jaffa* (London, 2006), p. 30; Shavit, *Tel Aviv*, p. 31.
  28.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 285, n. 2.
  29. *Bare Feet on Golden Sands: the Abulafia Family's Story* (Hebrew) (Tel Aviv, 2006), pp. 18-21.
  30. Shavit, *Tel Aviv*, pp. 81-4.
  31. LeBor, *City of Oranges*, pp. 12-13;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p. 33-4.
  32. LeBor, *City of Oranges*, pp. 38-41; Schlör, *Tel Aviv*, p. 208.
  33. Shavit, *Tel Aviv*, pp. 90-91.
  34. *Ibid.*, pp. 9, 34.
  35. *Ibid.*, pp. 55-6.
  36.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 88; LeBor, *City of Oranges*, pp. 46-7; Schlör, *Tel Aviv*, pp. 180, 183-5.
  37. Schlör, *Tel Aviv*, pp. 191-9.
  38. LeVine, *Overthrowing Geography*, p. 138, fig. 8.
  39. P. Halpern, *The Naval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1914-1918* (London, 1987), pp. 295-300; M. Hickey,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4: *The Mediterranean Front 1914-1923* (Botley, Oxon, 2002), pp. 65-9.
  40. M. Mazower, *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 1430-1950* (London, 2004), pp. 345, 359-60.
  41. *Ibid.*, pp. 4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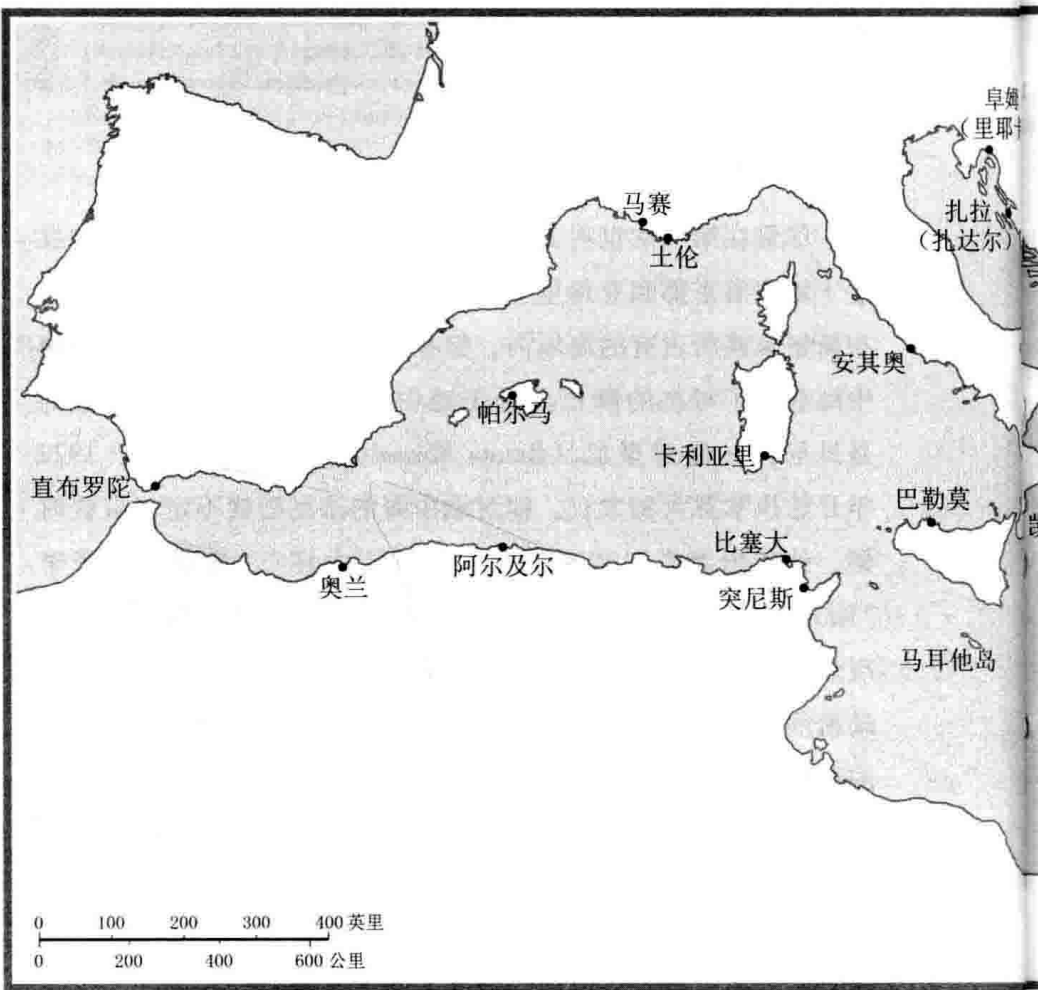
42. Ibid., pp. 423-4.
43. R. Patai, *Vanished Worlds of Jewry* (London, 1981), p. 97.
44. C. Ferrara degli Uberti, 'The "Jewish nation" of Livorno: a port Jewry on the road to emancipation', in D. Cesarani and G. Romain (eds.), *Jews and Port Cities 1590-1990: Commerce, Community and Cosmopolitanism* (London, 2006), p. 165; D. LoRomer, *Merchants and Reform in Livorno, 1814-186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1987), p. 15.
45. LeBor, *City of Oranges*, pp. 2, 125-35; B.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17-1949* (Cambridge, 1997), pp. 95-7, 101.
46. Ecclesiasticus 44:9.

## 五 我们的海——再现 (1918 ~ 194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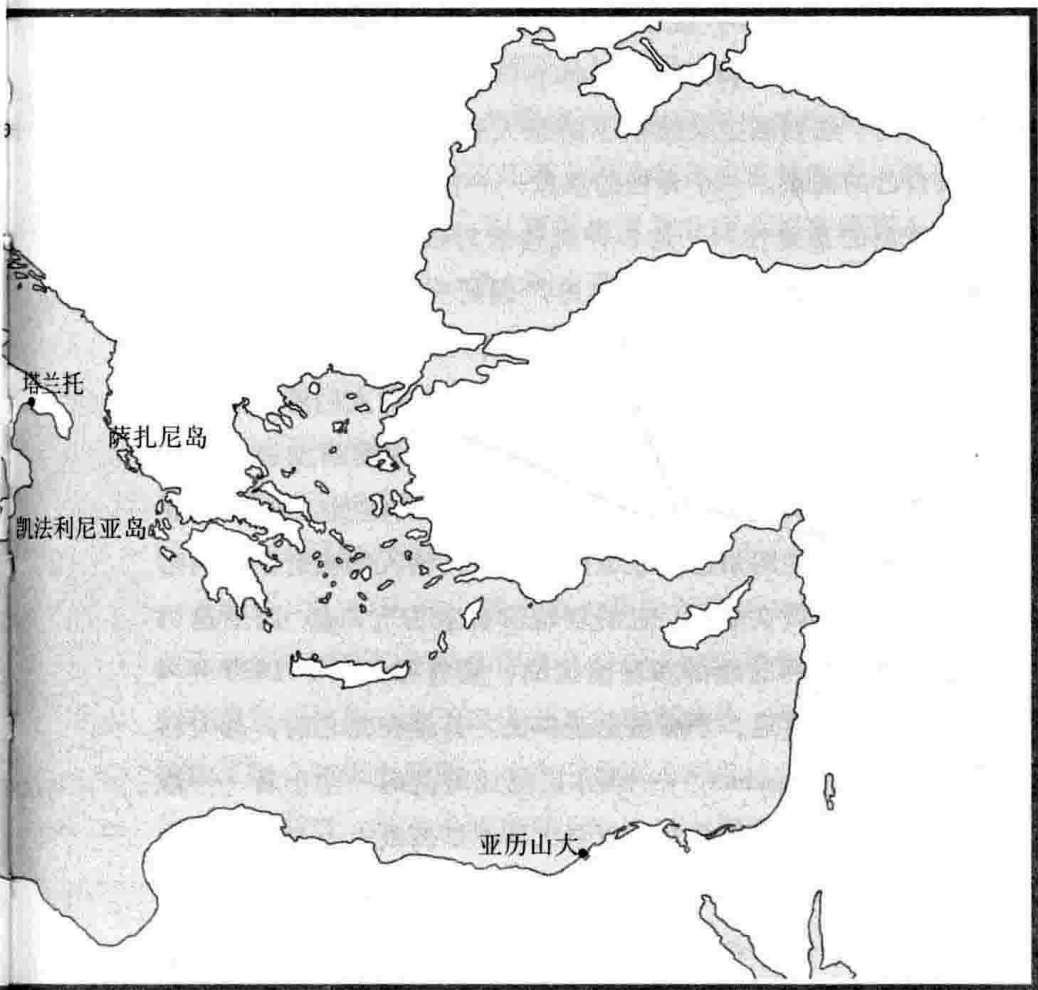
### 1

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中海上大部分海军行动发生于地中海东部和亚得里亚海，在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所占有的海域内，但在1918年至1939年，整个地中海都成了对抗的舞台。<sup>1</sup> 处于地中海霸权争夺战核心位置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野心，他于1922年开始执掌意大利大权。他对地中海的态度摇摆不定。有些时候，他梦想着意大利王国能伸展到“大洋”，为意大利带来“阳光下的地盘”；1935年，他力图通过入侵阿比西尼亚来实现梦想，除了艰难困苦军事战争外，入侵行动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危机，因为到那时，入侵使他丧失了此前英国和法国对他的尊重。在其他一些时候，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地中海本身：他说，意大利是“一座深入地中海的岛屿”；他的法西斯大议会（Fascist Grand Council）也不安地认为，意大利是个被囚禁的岛屿——“监狱的围栏是科西嘉、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监狱的守卫是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sup>2</sup>

意大利的野心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和平协定的饲育。意大利不仅得到了多德卡尼斯群岛，意大利东北部的奥地利人也被逐出，意大利获得了许多“尚未收复的意大利领土”（*Italia irredenta*）——如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和达尔







塔兰托

萨扎尼岛

凯法利尼亚岛

亚历山大

马提亚海岸的扎拉（扎达尔）之类的城市，后者以路萨朵（Luxardo）家族生产的樱桃白兰地著称于世。伊斯的利亚的阜姆 [Fiume，即里耶卡（Rijeka）] 于 1919 年被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d'Annunzio）统率的私家军占领，并被称为“意大利卡尔拿罗摄政国”（Italian Regency Carnaro）；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还是在 1924 年将阜姆并入自己的国家。一个奇怪的现象——它揭示了历史对法西斯主义梦想的重要性——是各种机构纷纷成立，以促进对科西嘉、马耳他和达尔马提亚历史的严谨研究（及它们的“意大利化”）。沿着横贯古罗马广场的庆典大道，经过古罗马市中心，人们都会仰慕罗马帝国的庞地图，它向人们展示了它是如何从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上的一个小聚落发展为囊括整个地中海及其远处大片土地的图拉真的帝国的。1913 年获得不稳定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也进入了意大利人的视野：阿尔巴尼亚中央银行设在罗马；它的新统治者索古（Zog）国王迫切希望得到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援助，随着意大利于 1939 年 4 月入侵阿尔巴尼亚，矛盾被迅速解决。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就在萨扎尼（Saseno）——阿尔巴尼亚海滨的一个小岛——修建了一个重要的潜艇基地。当意大利意欲挑战大不列颠的海上霸权时，潜艇被视为意大利夺取地中海未来胜利的关键。1935 年意大利军队最高统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将军宣布，意大利不需要重型战列舰就能通过更现代的手段赢得海上霸权。事实上，意大利舰队根本不值一提：“它在海战的每个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技术陈旧、操控不稳定、领航能力不堪想象。”<sup>3</sup>

入侵阿尔巴尼亚，继续镇压利比亚起义，这些都证明，意大利要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并不只是夸夸其谈，但是在许多观

察家眼中，墨索里尼是一个半喜剧形象，从他那凸起的下巴中喷出一大堆关于复兴“我们的海”的长篇大论。对利比亚的占领催生了跨越地中海的一条南北轴心线，北非将构成意大利的“第四海岸”。英属马耳他统治着西西里与“第四海岸”之间的海洋的事实令意大利感到格外不便；它是一道障碍。墨索里尼于1937年成功访问的黎波里，庆祝利比亚海滨第一条长达一千英里的宽阔公路的开通，以及利比亚首都内的一些区域被建成现代型欧洲城市。<sup>4</sup>法西斯主义欲取代大英帝国野心的更多证据出现了，当时，意大利人竟然将其财政扶助的对象扩展到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他是一位极具破坏力的人物，曾利用1936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骚乱来提高自己作为逊尼派穆斯林首领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影响力。法西斯民兵——绿衫军和蓝衫军（他们自然彼此攻讦）——在埃及创立，而亚历山大的意大利社区内还有大量黑衫军。<sup>5</sup>

后来，在1936年，意大利人积极帮助由冷酷残暴、毫无魅力可言却指挥有方的佛朗哥（Franco）将军领导的长枪党军队在西班牙作战。除了提供五万人的部队外，法西斯意大利还提供了空中和海上援助，并在巴利阿里群岛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墨索里尼没有对西班牙大陆提出主权要求，但海岛就另当别论了。意大利人在马略卡岛登陆，于1936年9月将共和军从该地逐出；他们以同情共产党为罪名，处决了三千名马略卡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该岛成为意大利空军向共和军中心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发动猛烈进攻的基地。墨索里尼可能想要控制马略卡岛，但他已经获得了他想要的：一个对西地中海采取行动的中心，它与土伦和奥兰之间的距离足以警示在那里驻扎的法国舰队，尽管他的主要困扰是英国海军。然而，事实

上，意大利人总能使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在马略卡岛上，帕尔马城内的主要街道被重新命名为罗马大道（Via Roma），人口处装饰着一些青年人的雕像，罗马鹰停留于他们的肩上。<sup>6</sup>十五个世纪后，“我们的海”再一次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水域。

605 大不列颠还不知道它究竟要从地中海获得什么。到1939年，只有百分之九的英国进口品从苏伊士运河通过；而事实上，马耳他并非特别有用的补给基地，尽管它有着优良的港口，但资源短缺（首先是缺水）让它时常需要获取补给物。然而它的确为飞越地中海的飞机提供了有效的中转机场，使它们能够在直布罗陀海峡和亚历山大之间加油。除了公元16世纪的雄伟堡垒外，马耳他没有很好的防守设施。在战争之初，海岛由三架单引擎双翼飞机，即“信念号”（*Faith*）、“希望号”（*Hope*）和“仁慈号”（*Charity*）守卫，机上配备轻型点303机枪。<sup>7</sup>从战略角度看，马耳他有优势，也有劣势，它距离西西里只有几分钟航程，处于危险的被暴露状态，但英国不会轻易放弃控制地中海中部通道的据点。然而，英国还是选择了亚历山大为其地中海舰队的集结点，尽管它不得使用比瓦莱塔更差的港口。<sup>8</sup>至于英国的其他地中海据点，塞浦路斯在被英国人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取后，很少被用作海军基地，而海法湾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是来自伊拉克石油管道的终端。实践证明，直布罗陀海峡不像英国政府预想的那样，会成为与西班牙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即便是在与德国开战之后：令希特勒恼怒的是，佛朗哥仍然拒绝参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害怕英国会占领加那利群岛。希特勒指责佛朗哥在得到多年的支援后就忘恩负义，称他肯定有犹太人血统。<sup>9</sup>英国仍旧想要获得从西

方到东方，尤其是到苏伊士运河的便捷通道。

即便在 1939 年 9 月英国和法国向纳粹德国宣战后，也没有理由认为，波兰的防御战将震撼地中海。卷入战争的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佛兰德拉锯战的现象能够重现。墨索里尼对加入希特勒一方有所保留，尽管他的宣传部长例行公事地自吹自擂：1940 年 4 月 21 日，他的发言人宣布“整个地中海都处于意大利海军和空军的控制之下，如果英国人胆敢开战，他们就会被即刻赶出去”。<sup>10</sup> 仅在法国即将崩溃时，他才适时地决定于 6 月 10 日加入德国的阵营。这使他占领了法国的一小块地区，尽管不是他所垂涎的尼斯港。

## 2

英国在地中海的首要问题是法国，而非意大利。大部分法国指挥官因战败而震惊，他们在贝当（Pétain）与希特勒的耻辱和谈中看到了祖国的救赎；他们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掩盖了所感受到的耻辱——他们没有像怨恨英国那样讨厌德国，因为要不是英国参战的兵力过少，他们的祖国怎会遭受不该蒙受的战败？在与意大利人打起来之前——意大利人正开始威胁英国护航船，英国海军有必要弄明白自己与法国舰队的关系，代号为“*Force X*”的部分法国舰队正驻扎在亚历山大。在事实上是英国领土的亚历山大，法国人拒绝向英国人移交船只，但同意封存它们；之后没有发生什么麻烦，尽管法国水兵宣誓效忠驻于维希（Vichy）的贝当政府。<sup>11</sup> 但是法国舰队的骄傲停在奥兰，主要驻扎在米尔斯克比尔（Mers el-Kebir），其中包括他们拥有的世界上装备最为精良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Dunkerque*）和“斯特拉斯堡号”（*Strasbourg*）。

海军上将达尔朗（Darlan）被证明是法国利益的誓死捍卫者，在他对维希政权的忠诚动摇前，这种坚定态度将持续几年。英国人向达尔朗提供了多种选择，比如将其舰队并入英国舰队，或者让他率领舰队驶向加勒比海，从而在余下的战争中丧失机动性。达尔朗的观点是，他们是法国人，他们永远是法国人。英国人清楚，剩下的唯一选择是皇家海军发动进攻。1940年7月3日，进攻开始，毫不留情。尽管“斯特拉斯堡号”成功逃跑，英国人还是达成了主要军事目标：法军舰艇遭重创，尽管以1300名法军士兵的生命为代价。<sup>12</sup>英国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与维希政府仅存的外交关系破裂。达尔朗对英国的憎恶得到充分确认。如今，希特勒可以看到，北非的法国海军和陆军及法属叙利亚由仍旧誓死效忠维希政权的人领导。他们可被用于对抗英国人，但有些不清不楚：法国认为自己已经退出战争。米尔斯克比尔战役坚定了希特勒的想法：他应该将战事集中于北欧。墨索里尼获准保有他在地中海所寻求的残破零碎的607 领地，但不包括突尼斯，因为德国人认为，北非在顺服的维希法国政府手中会更加安全，他们嘲笑外交部长齐亚诺（Ciano）对于尼斯、科西嘉、马耳他、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的诉求。<sup>13</sup>

所以英国人在地中海的下一轮冲突是同意大利人的对决，意大利人占据着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埃及最西部的地区，尽管时间不长。1940年11月，英国人在塔兰托证明了自己，从“卓越号”（*Illustrious*）航母甲板上发动的空袭击穿了意大利人最强大的军舰“利托里奥号”（*Littorio*），并击沉了“加富尔号”（*Cavour*）战列舰。<sup>14</sup>这一快速轻松的胜利打消了意大利人寻求海上决战的念头，更重要的是，它使人确信，

即便是有限的空中力量也能战胜骄傲的敌军舰队。现在的问题是，空袭是否有助于攻占岛屿。马耳他自英意开战以来就饱受意大利空袭摧残，尽管在新开发的雷达的帮助下，小型飞机“信念号”、“希望号”和“仁慈号”在对抗意大利皇家空军（Italian Regia Aeronautica）时异常高效，直到一整支中队的现代化飓风式战斗机抵达，英国的空中防卫力量才得以增强。1941年初，当“卓越号”从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进发时，遭到德国和意大利战斗机重创，但它还是设法缓缓滑入马耳他的大海港。<sup>15</sup>对马耳他的轰炸加强了，德国人的每日空袭摧毁了瓦莱塔和大海港对面的三座设防城市，屠杀了成千上万的马耳他居民，这些居民与驻守在岛上的英军一样，常常面临食物和其他基本补给品的匮乏。1941年12月以后，时局每况愈下。这时德军更加严肃地应对地中海战场。穷凶极恶的凯塞林（Kesselring）被任命为地中海指挥官，力图摧毁前往马耳他的英国护航舰船；德军频繁出现于地中海，纳粹德国与苏联开战后，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也在增强。到1941年秋，英国人能够以轰炸西西里和北非为回击，英国潜艇也袭击为北非的轴心国部队运送补给的意大利和德国船只。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激怒了，考虑到日本在太平洋上的经验，他们向第三大轴心国日本求教占领岛屿的最佳方法；日本提议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实行坚壁清野以制造饥荒。<sup>16</sup>

现在，马耳他的大港口遍布着残骸、溺亡的水兵尸体和沉船的油料（有着火的危险）。马耳他守军的部分成功在于保障

608

了马耳他作为有能力突袭敌军、阻止他们向北非调动军队和补给的空军和潜艇基地的价值。与公元1565年第一次大围城一样，第二次大围城同样使马耳他人刻骨铭心。<sup>17</sup>丘吉尔担心情况

会发展到轴心国没有必要发动入侵的境地：马耳他会被轰炸至屈服。英国护航船在马略卡南部水域承受着潜艇的巨大压力，然后是去往突尼斯通道上的意大利巡洋舰和德国、意大利水上飞机的巨大压力——1942年8月，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了一支有十四艘护航船的舰队，其中只有五艘在马耳他安全抛锚。<sup>18</sup>幸运的是，德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想不想夺取岛屿，尤其是这需要与意军联合行动，北非的经历使他们越来越不尊重意军；墨索里尼认为，一旦大不列颠被迫全线投降，该岛便应该是他的了。<sup>19</sup>同样幸运的是，隆美尔（Rommel）向图卜鲁格（Tobruk）东进后，德国人日益沉迷于他们对北非的野心，因此，到1942年5月，马耳他似乎成了边缘性的考虑。轴心国相信，地中海战争将在陆地上赢取，而不是通过攻占一座满是尘埃的小岛实现。英国指挥官也认为，“相较于埃及，还是丢掉马耳他更好”。<sup>20</sup>然而，毫无疑问，拯救马耳他的还是岛上那些人，他们拒绝因持续的轰炸和数月的极端困苦而放弃坚守，当国王乔治六世向整座岛屿授予乔治十字勋章时，这点已得到充分肯定。该勋章至今仍印在马耳他的国旗上，提醒人们应记住这座海岛表现出的英勇抗争精神：3万幢建筑被破坏或被毁，1300名平民被炸死。<sup>21</sup>

马耳他顶住了，但在1941年，英国人在克里特战争中惨遭打击，即便它对德国人而言并不具有什么战略价值。<sup>22</sup>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地中海的重要性只有一些零散的认识。德国人站在巴尔干人的角度上审视地中海。谁将长期控制跨越海洋的通道，这是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的问题。德军与意大利人一道在北非战斗，轴心国想要确保地中海南北补给线的安全，但是希特勒的选择极具争议。在他决定将潜艇派往地中海——一个冒险



之举，因为这意味着得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后，海军上将雷德尔（Raeder）劝说道，此举将危及德国在大西洋的战争努力。轴心国知道，地中海是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中东石油补给通道，但想要将其迅速打通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轴心国的石油储备正在耗尽；到1942年夏，没有油料的意大利舰队深陷困境，出于通盘考虑，德国人拒绝提供任何补给。所以希特勒另辟蹊径，穿过开阔的俄罗斯大平原前往波斯，在1941年打响与苏联的战争，此举之后对他意义更大。他的军队被这场战争带入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并陷于其中，然后遭到重大失败。地中海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让德国吃惊不已。1942年11月，盟军（如今已包括美国人）在1830年法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时登陆的海滩登陆时，地中海真正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sup>23</sup>

对阿尔及利亚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伴随着在摩洛哥登陆和向突尼斯东进。1942年7月，德国人就已受阻于阿拉曼（El Alamein），并于11月被蒙哥马利的军队“沙漠之鼠”（Desert Rats）决定性地击退。但是维希政府的指挥官们，尤其是在北非出现的达尔朗，使局势极端复杂化。事实上，达尔朗只对支持胜利方感兴趣。他自视贝当的天然继承人，愿意与盟军谈判，不管盟军对他这位众人眼中的怯懦叛国者有多轻视。然而达尔朗担心的是，盟军会被击退，那么自己的两面派属性将会被揭露。1942年11月，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将军在阿尔及尔会见了在此地过着奢华生活的达尔朗。艾森豪威尔希望他将法国本土舰队从土伦带到北非，并为美国人效力。达尔朗小声嘟囔着表示同意，但他知道，在土伦当值的海军上将——一位老对手——不会希望如此行事，甚至亚历山大的法国舰艇也表示反对，尽管法国

船员与英国人关系良好。一份糟糕的妥协案允许达尔朗在北非担任贝当的代总理，这在英国和美国激起民愤：达尔朗被斥为卖国贼和反犹者；CBS 主持人爱德华·默罗（Ed Murrow）问道：“我们是在反抗纳粹，还是在与他们共枕？”  
610 圣诞前夜，达尔朗的困境得以解除：当时一位狂热的保王党潜入阿尔及尔政府办公楼，在达尔朗用完午餐归来时，开枪射杀了这位自以为是的海军上将。<sup>24</sup>

对地中海霸权的争夺日趋激烈；盟军的胜利似乎仍不明朗。1942 年 12 月，驻突尼斯的维希政府的指挥官将装备精良的比塞大（Bizerta）海军基地交给轴心国。与此同时，在 11 月，希特勒决定通过占领维希政府控制区来结束法国的分裂局面；作为奖励，墨索里尼获准得到尼斯，此外他还向科西嘉派遣了几支舰队，他们在岛上升起了意大利国旗。维希政权的指挥官们在地中海战争和政治中的角色令人困惑不解，他们利用一个并没有正式参战的国家的代表身份在交战双方间左右逢源。当盟军用潜艇将一位不出名的法军将领亨利·吉罗（Henri Giraud）从维希法国运到阿尔及尔时，他们发现他身上具有达尔朗的一切傲慢和偏见——他不想成为盟军的走狗，他对废除排犹法令不感兴趣，他逮捕“普通嫌疑犯”，并将他们扣押于盟军视野以外的集中营。他迫切希望发动大规模进攻，将祖国从被德国占领的屈辱中解救出来。<sup>25</sup>大西洋或太平洋上的敌对势力分野远比地中海上的清晰。

### 3

地中海的政治乱象在 1943 年变得更加混乱。3 月，盟军在突尼斯的梅德宁（Medenine）击败了德国人，隆美尔的德军

撤离了突尼斯。5月8日，突尼斯和比塞大落入盟军手中，同时还有25万人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突尼斯的陷落使盟军船只变得更加安全，有多达100艘船的超级护航船队如今通过马耳他到达直布罗陀海峡或亚历山大——英国控制下的地中海的统一即便尚未达成，至少可以预见。1943年6月，国王乔治六世从黎波里穿过公海前往马耳他，在那里他受到了喜气洋洋的马耳他民众的欢迎。其目的不只是鼓舞马尔他人的士气，更是为了昭示整个大英帝国正朝着必然到来的最终胜利前进。<sup>26</sup>

对于轴心国而言，还有更多的坏消息。希腊陷于内战，南斯拉夫正掀起反抗。<sup>27</sup>在轴心国内部，有人怀疑，撒丁岛正成为人多势众的盟军取道法国南部入侵欧洲的集结点，卡利亚里为该假情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盟军轰炸的痕迹至今依旧可见。真正的问题是，地中海上的法国或意大利（用丘吉尔的话说）究竟是不是轴心国在欧洲的“软肋”。1943年6月，盟军第一次在意大利攻占了一片土地：位于马耳他西部、面积很小却极具战略位置的潘泰莱里亚岛，在那里，1.2万名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士兵因密集的轰炸而投降。<sup>28</sup>当7月盟军出乎意料地选择在西西里登陆时，法西斯大议会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向墨索里尼发难。在他和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国王接下来的会面中，墨索里尼没有被要求辞职，而是被告知，他已被陆军元帅巴多格里奥取代。在离开奎里纳勒宫（Quirinale Palace）时，他被推入一辆警车，遭到逮捕。尽管巴多格里奥政府的政策导向尚不明确，德国人还是开始组建他们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等待着盟军向内陆攻来。7月22日，美军在巴顿（Patton）将军的率领下占领巴勒莫；8月17

日盟军到达墨西拿时，该城已沦为一片废墟，6万名德军士兵和7.5万名意军士兵已经逃走。这些意大利人并不热衷于战争，他们的情绪也是国家的情绪；在9月初，巴多格里奥被连哄带骗地与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德军飞机轰炸了意大利战列舰“罗马号”（*Roma*），造成大量伤亡，意大利海军将骄傲的本土舰队开往马耳他，并将其移交给英国。塔兰托的巨大港口被心甘情愿地割让给盟军。另外，岛上的情况更加复杂。英军成功地占领了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一些小岛；在凯法利尼亚，德国人残酷地屠杀了6000名意军；科西嘉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德国人、意大利人、自由法国和科西嘉反抗军均对海岛提出主权要求。<sup>29</sup>这样一来，意大利的投降将新的不确定性引入了地中海。

612 1943年底，盟军在意大利首次尝试获取立足点，紧接着在罗马南部的安其奥出其不意地空降了大批士兵。之后，盟军将一路战斗至亚平宁半岛的其他地区；意大利政局因墨索里尼的逃跑和他默许北部建立纳粹控制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而变得复杂化。尽管进展缓慢，自由法国（不出意外地）和美国人热衷于继续在法国南部登陆，以配合盟军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土伦于8月26日落入盟军之手，比他们预期的时间更早，这样便腾出了进攻马赛的兵力，马赛于8月28日被攻克。<sup>30</sup>

不久，人们开始考虑德国战败后的地中海的未来。主要争议问题包括巴勒斯坦、南斯拉夫和希腊，在这些地区，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开始让国家走向分裂。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时，向斯大林表明了英国立场：英国“必须成为地中海的领袖国家”。斯大林理解了这一主张，并同情英国在德国干涉其跨

地中海航线时所面临的困境；他甚至向丘吉尔保证，他不会在意大利搞破坏。这是因为，斯大林主要关心的是，让英国默认苏联在斯拉夫欧洲，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统治地位。<sup>31</sup>对苏联人而言，重申他们是地中海强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 注 释

1. D.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the North Afric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Campaigns in World War II* (London, 2004), pp. xi, 5, 661; S. Ball, *The Bitter Sea: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1935-1949* (London, 2009), p. xxxiii.
2. Cited by Ball, *Bitter Sea*, pp. 10-11.
3.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 48.
4. Ball, *Bitter Sea*, pp. 7, 18-19.
5. *Ibid.*, pp. 20-23; M. Haag, *Alexandria, City of Memory* (New Haven, CT, 2004), p. 151.
6. 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61), p. 279 and n. 2.
7. T. Spooner, *Supreme Gallantry: Malta's Role in the Allied Victory 1939-1945* (London, 1996), p. 14; C. Boffa, *The Second Great Siege: Malta, 1940-1943* (Malta, 1992).
8.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12-16, 40-46.
9. *Ibid.*, pp. 59-60; C. Smith, *England's Last War against France: Fighting Vichy 1940-1942* (London, 2009), p. 142.
10. Cited in Ball, *Bitter Sea*, p. 41.
11.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 63; Ball, *Bitter Sea*, pp. 48, 50.
12. Smith, *England's Last War*, pp. 57-94;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62-9.
13. Ball, *Bitter Sea*, p. 51;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 358.
14.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93-5; Ball, *Bitter Sea*, pp. 56-63.
15. Ball, *Bitter Sea*, p. 68.
16. Spooner, *Supreme Gallantry*, pp. 27, 40-42, 92, 187-205.
17. See e.g. Admiral of the Fleet Lord Lewin in Spooner, *Supreme Gallantry*, pp. xv-xvi.
18. Ball, *Bitter Sea*, p. 149.
19. Spooner, *Supreme Gallantry*, p. 17.
20.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259-65; Ball, *Bitter Sea*, p. 133.

21. Spooner, *Supreme Gallantry*, p. 11.
22.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158–76.
23. Ball, *Bitter Sea*, pp. 109, 148–9;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348–51.
24.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360–62; Ball, *Bitter Sea*, pp. 170–73; Smith, *England's Last War*, pp. 246–7, 424–5.
25. Ball, *Bitter Sea*, pp. 160–61, 167, 178, 186–7; Smith, *England's Last War*, pp. 350–51, 361–2, 366, 372–3, 402, 416.
26. Spooner, *Supreme Gallantry*, p. 281; Ball, *Bitter Sea*, p. 261.
27. Ball, *Bitter Sea*, pp. 200–209;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 566.
28. Ball, *Bitter Sea*, p. 220;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424, 429.
29. Ball, *Bitter Sea*, pp. 219–33, 239–40;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p. 430–52.
30. Porch, *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p. 597.
31. Ball, *Bitter Sea*, pp. 272–7, and for Moscow meeting, p. 280.

## 六 碎片化的地中海 (1945 ~ 199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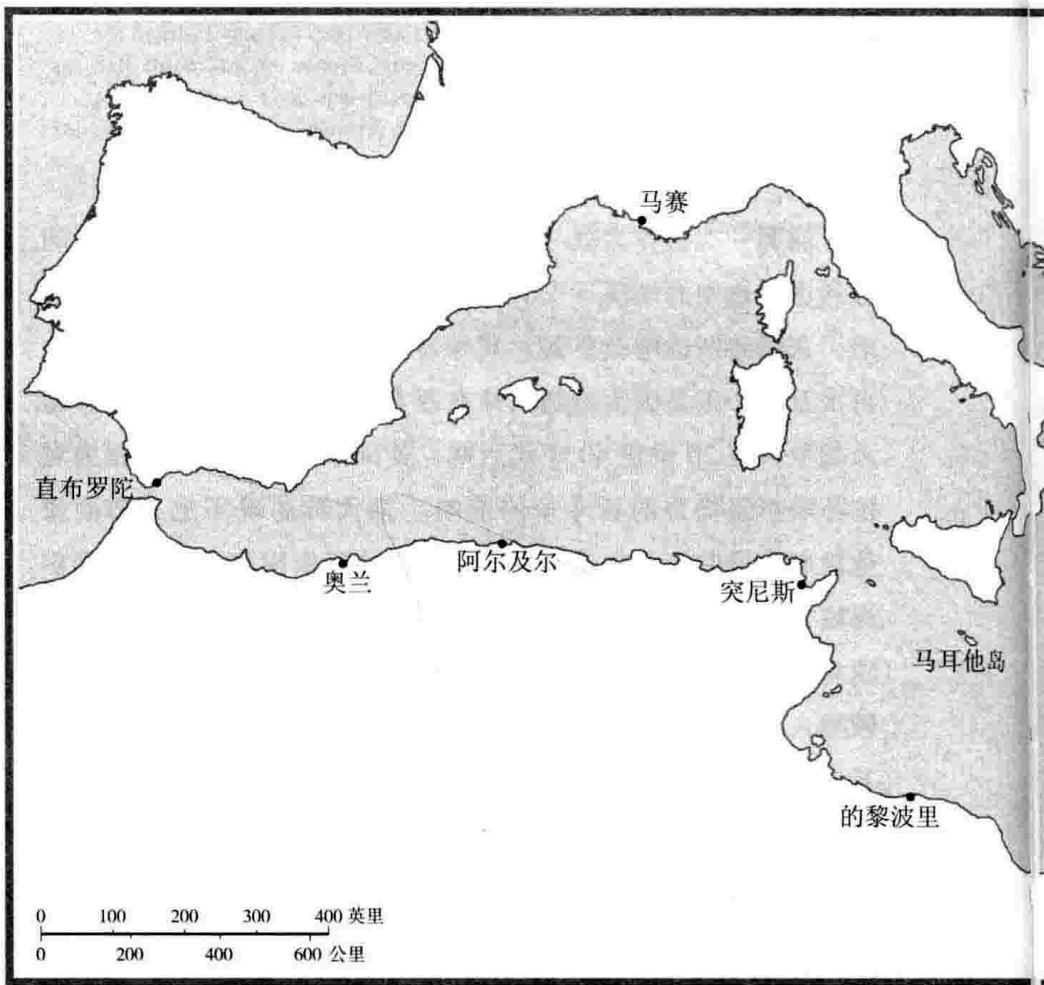
### 1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的胜利也让地中海动荡不安。希腊从内战中诞生出亲西方的政府后，塞浦路斯的喧嚣更甚，其号召与希腊统一的运动（*enôsis*）再次开启。正是因为希腊人站在西方一边，以及土耳其没有卷入战争，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美国才开始将地中海视为对抗苏联扩张势力的新斗争的前哨。<sup>1</sup> 斯大林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没有支持共产党在希腊的起义，但他积极探求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自由出入地中海的方法。在伦敦和华盛顿，对地中海沿岸建立苏维埃同盟国家的担心依旧存在，因为南斯拉夫的游击队领导人铁托（Tito）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打出了正确的牌，甚至开始赢得英国的支持。此外，意大利人已经失去了扎达尔、科托尔的海军基地和他们在战争中垂涎的达尔马提亚的大片地区，而阿尔巴尼亚在经历了第一次意大利人占领以及之后德国人占领的痛苦后，已在受教于巴黎的共产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的领导下重获独立，霍查毫不妥协的姿态使他的国家陷入更深重的孤立。

613

掌权后，霍查设想，他的国家将与铁托领导下的新生的南斯拉夫和苏联一道，成为社会主义众兄弟国家中的一员。与南斯拉夫的密切关系在诸多经济协定中留下了印记，这些协定表

614



直布罗陀

马赛

奥兰

阿尔及尔

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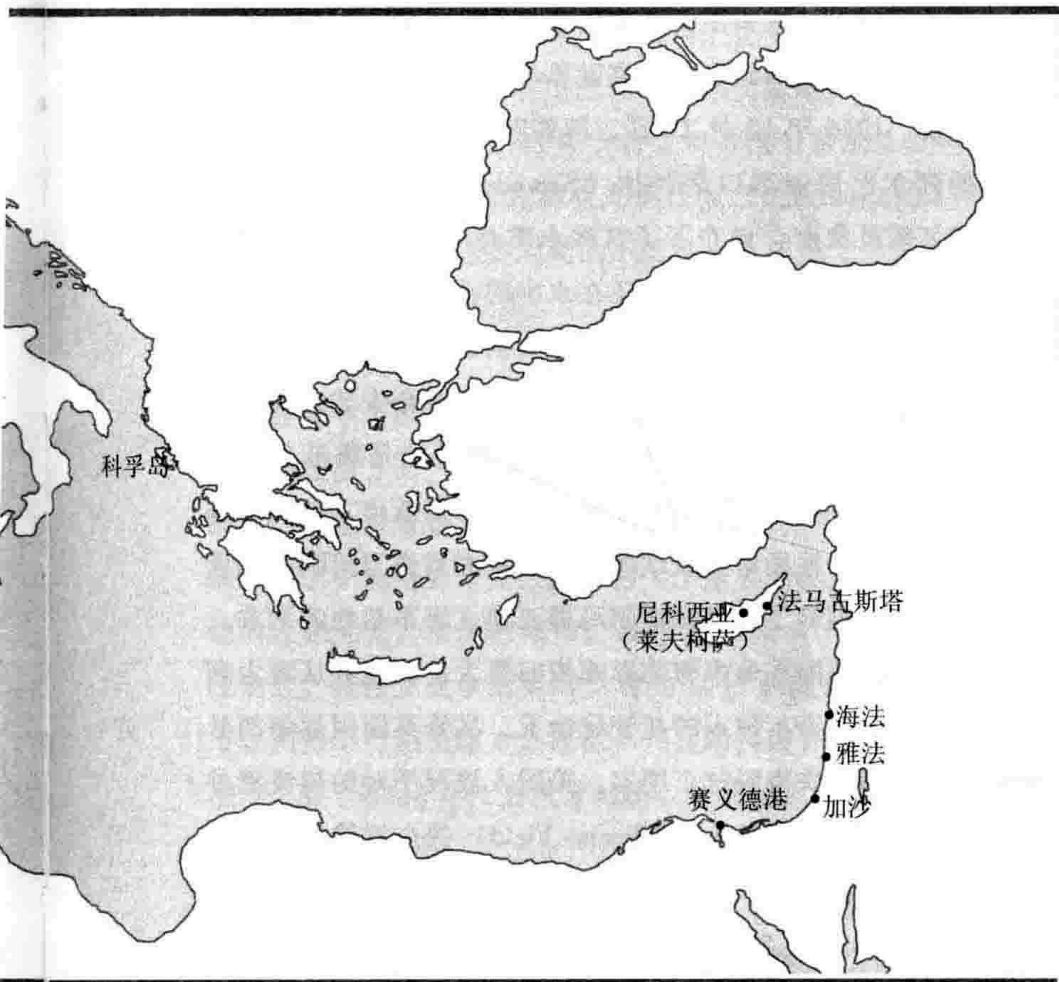
马耳他岛

的黎波里

0 100 200 300 400 英里

0 200 400 600 公里





科孚岛

尼科西亚  
(莱夫柯萨)

法马古斯塔

海法

雅法

赛义德港

加沙

明铁托希望将阿尔巴尼亚拉入南斯拉夫联盟。霍查却另有打算，在他看来，阿尔巴尼亚保卫国家每寸领土的权利，应延伸至阿尔巴尼亚沿岸水域：长期以来作为联系希腊到亚得里亚海的水路的科孚海峡被布上了水雷，防止别国入侵。英国决定派军舰通过海峡，宣称它有权代表世界各国的利益担任地中海上的警察。1946年10月22日，两艘英国军舰在通过科孚东北部的阿尔巴尼亚港口萨兰达（Sarande）附近时触发水雷，四十四名船员丧生。<sup>2</sup> 谁布下了这些水雷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对海峡的后续清理表明，那些还在水中的水雷没有锈迹，是刚上过油的；即便它们不是新的，也有人强烈质疑，它们是铁托的海军代表霍查安放的。阿尔巴尼亚人没有适合安装水雷的船只。<sup>3</sup> 霍查并未道歉，却将手指向了根本不可能是嫌疑犯的希腊人。这一事件终止了英国与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另外，铁托对苏联试图将南斯拉夫当作卫星国的态度愤怒不已，他拒绝了苏联在达尔马提亚建立海军基地的请求。

理论上，英国在地中海的影响依旧强大：利比亚从意大利手中被夺走，置于英国人的托管统治下，尽管英国因战争而处境艰难，希望尽快摆脱这个国家。美国人被授予对的黎波里外围庞大的惠勒斯空军基地（Wheelus Field）的全权使用权，这意味着他们比英国人从利比亚获得的更多——英国在此地的石油开采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sup>4</sup> 但英国人无力勾画地中海未来这一事实在巴勒斯坦危机中表露无遗，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再也无法遏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英国军队逐渐成为极端派别的目标。<sup>5</sup> 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Forrestal）对于使地中海充当对抗苏联的前哨的理念非常着迷，他也对巴勒斯坦，其实是对犹太人十分着

迷，他认为，美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会因美国那些逼迫杜鲁门总统去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人而受到致命伤害。在他看来，这会招致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如果美国想要在地中海建立海军基地，阿拉伯人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形势也很明朗，斯大林正在利用巴勒斯坦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首先鼓励暴乱，接着在 1948 年 5 月，和美国争着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很快从苏联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获得了武器补给。围绕这些问题的不同意见令总统大为光火，他于 1949 年向福莱斯特发难；之后不久，沮丧的福莱斯特便自行了结了生命。<sup>6</sup>

在地中海舞台上，以色列的重要性既体现在人口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方面。人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坦最大阿拉伯城市雅法的居民在该城落入哈加纳（Haganah）——以色列未来的军队——手中前是如何流散的。另一个重要港口是海法，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杂居的城市，该城在 1948 年初有约 7 万名阿拉伯人。到独立战争结束时只有约 4000 名阿拉伯人留在该城市。局势不可避免地十分混乱：一些阿拉伯首领放弃了早先的战斗，并于 1948 年 4 月离开城市，这使留下来的人士气低落；阿拉伯高级指挥部（Arab Higher Command）似乎希望阿拉伯人离开，因为它担心他们会在 5 月英国人最终离开巴勒斯坦后被劫持为人质；哈加纳炮击海法，引发了恐慌，人们顶着炮火逃向阿卡和贝鲁特。轰炸的目的是迫使海法的阿拉伯领导人尽快投降。这一冷酷政策遭到一些犹太领袖人物的反对，他们认为，这座城市的未来必须像一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合资企业——一个犹太代表团前往海法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劝说人们不要离开，而英国军事情报机构注意到，“犹太人已尽力阻止阿

拉伯人成批撤离，但他们的宣传似乎没有多少效果”。<sup>7</sup> 随着更多的人知道阿拉伯人撤离海法城的消息，其他阿拉伯人开始离开那些哈加纳正在逼近的城市：最著名的是雅法，也有加利利内陆各城镇。哈加纳的一篇报道表明，“精神恐慌性逃离”因有关内陆村庄阿拉伯人被驱逐的报道而更趋严重。<sup>8</sup>

20 世纪早期的犹太定居者受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指引，而后来的大部分则是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之前和迫害期间，以及迫害刚一结束时，为了寻求避难所而来。1938 年以来，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限制主要是因为阿拉伯领导人的无情反对，这使巴勒斯坦成了难以到达的避难所。阿拉伯人对犹太国的强烈敌视不仅局限于巴勒斯坦本身，也让以色列中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口激增，他们被视为“新的出埃及者”，从 1948 年开始大量离开阿拉伯国家。在十二年内，地中海的犹太人社区大量集中于以色列。在北非，以色列的建立引发了反犹骚乱，这使得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大量离去，但更加富裕和更加西化的家庭常常会离开中东，前往法国或意大利。由此便有了犹太人的南北流动和东西流动。到 1967 年，除去以色列，地中海主要的犹太人中心是法国南部，这是北非移民的结果。另外，长达一千九百年的地中海犹太人大离散已经突然被逆转了。

如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开始失去它们对东、南地中海之占领地的控制。1943 年（这并非最佳时机），黎巴嫩人已经开始煽动摆脱法国的统治，但他们在 1946 年颁布了一项奇怪的法令，保障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权利；伴随独立而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就像贝鲁特一样，凭借西方化的举措，成为阿拉伯黎凡特的主要港口和银行中心。在埃及，与过去的告别呈现出一

种截然不同的形式：1952年，一个阿拉伯军官的政变集团夺取了政权，国王法鲁克（Farouk）被流放，这标志着亚历山大混合社会解体的第一阶段，法鲁克的王朝在对亚历山大进行统治时太过挥霍。法属和西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突尼斯的骚乱继续给其宗主国施压。英国的直接控制范围正收缩为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塞浦路斯和苏伊士运河一线。这与它本应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设想相比，不足挂齿；印度在战争结束两年后获得独立，而且，即使英国仍然保留着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苏伊士的军事和政治重要性也正在下降。这一切意味着丘吉尔希望恢复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正变得无关紧要，但前提条件是：苏联还没有在地中海内找到盟友。而在1956年之前，的确如此。

618

## 2

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革命引发了新的担忧。埃及新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开始向阿拉伯世界展示自己的这样一种形象：他会重塑阿拉伯国家的自尊心（与之相伴的是他们所坚持的主张，所有阿拉伯国家最终是一个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尽管纳赛尔于1954年支持与以色列进行秘密对话，但双方互不信任，对恢复与以色列关系的犹豫尝试演变成了相互敌视。<sup>9</sup>1954年，英国和法国同意从运河区撤军，而且他们应该不会对1956年7月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城的讲话——宣布运河国有化——感到太过惊讶；也许最困扰他们的是纳赛尔在抨击殖民列强时的强硬语气。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认定，他面对的是“尼罗河上的希特勒”。这些恐惧背后隐藏着其他东西，全球性的担心：当美国不再为修

建阿斯旺大坝提供援助时——人们认为大坝能为埃及带来繁荣——纳赛尔转向了苏联。不能忽视纳赛尔可能为他的新盟友在地中海提供一个海军基地的风险。

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埃及人会把运河经营得一团糟，以色列人则正急于表明，埃及对内盖夫（Negev）居民区的轰炸和阿拉伯突击队（*fedayin*）从埃及占领的加沙对以色列发动的进攻，都必须用武力加以阻止。1956年10月，纳赛尔在加沙  
619 组建了军队，并对以色列进行言语攻击，扬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由此来进一步提升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sup>10</sup>1956年10月在巴黎附近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理安鼓励法国和英国步调一致地对抗埃及，而且提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主意，诸如同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一起重建中东，在以色列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半自主的西方银行，在约旦和伊拉克建立英国的优势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认为这一计划野心太大，而且他仍然相信，只要纳赛尔肯听他的，外交游说（*jaw-jaw*）远胜于战争（*war-war*）。如果发生战争，他就坚持：目标一定是“占领运河区并摧毁纳赛尔”；如果以色列进攻了埃及，法国和英国就将出面干预，保护运河，这会给他们重获已经失去东西的机会，但他们不可能公开站在以色列一方。<sup>11</sup>

所以，事情的结果是丢人的惨败，向全世界昭示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在地中海范围的终结。以色列进攻埃及，迅速占领了加沙和西奈；英国和法国军队在运河区登陆，声称要保护运河，将交战双方隔离开来；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赞成早早地结束战争，以色列被要求从西奈撤军，它仅仅得到从红海到埃拉特（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行的承诺，以及一份心照不

宣的协定，即埃及所支持的阿拉伯突击队的进攻将告终结。纳赛尔看起来比之前更强大，而艾登的首相任期只持续了数月。欧洲人担心难以维护运河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危机彻底动摇了地中海昔日的霸主地位。<sup>12</sup>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里，苏联在埃及的影响与日俱增，正如前者在叙利亚——它一度被并入埃及，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的一部分——所做的那样。苏联为纳赛尔提供“顾问”，与此同时埃及对以色列的抨击变得越来越乏味，其中包括一系列受政府控制的媒体中的反犹卡通片。

纳赛尔对以色列的抨击使他建立起在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地位，但当全中东的民众一起为他欢呼，并谴责以色列时，他被自己的话语冲昏了头脑。1967年夏初，他承诺对以色列实施海上封锁，尽管只是在红海，而非地中海。<sup>13</sup>6月5日，以色列620  
先发制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仅仅六天后，以色列攻占了加沙、西奈、戈兰高地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所属地区。结果，苏伊士运河成为以色列和埃及军队的交战前线，被封锁了十天，之后双方便在运河两岸打起了消耗战，直到埃及人于1973年10月发起突然袭击——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这次，他们的目标不是“将以色列扔进海里”，而是更加现实地收复西奈。尽管以色列人取得了前期胜利，最终埃及人还是反攻到运河对岸，四年之后，埃以双方才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勇闯虎穴，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讲，不久后，他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之后，运河再度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最后也包括以色列。但六日战争还使苏联对以色列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在战争期间，除了摇摆不定的罗马尼亚，苏联一方最终都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此举意在

赢得阿拉伯世界的赞许，同时强调，以色列的朋友是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这类资本主义列强。事实上，赎罪日战争具有美苏代理人战争的某些特点：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大量武器，而美国则通过亚速尔群岛的美军基地运送装备。更多的危害也因苏联支持暴力的巴勒斯坦极端组织而产生，其中一些，像“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就舒适地在大马士革安顿下来，在此宣传着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 3

苏联进入地中海政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斯大林答应，意大利和希腊将留在西方世界，1952年希腊和土耳其都被纳入三年前美国、英国和法国建立的新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这是一个错误的名字，因为意大利也是其中一员。北约将地中海视为对抗苏联扩张的前线：无论是法国及其北非帝国，还是英国及其在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的基地，都是地中海上的大势力。尚在利比亚惠勒斯基地驻军的美国对如何保卫地中海免遭苏联侵犯有其自己的想法。1952年，美国第六舰队到访西班牙八座港口，包括巴塞罗那和马略卡岛的帕尔马，此举给佛朗哥大元帅撑足了脸面，当时他正兴奋地将政府的敌人送往另一个世界。尽管西班牙加入北约需等到1975年这位独裁者死后，但美国在此之前就已开始在西班牙建立空军基地。

20世纪50年代，法国逐渐从地中海向外张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的重心如今比以往更清楚地集中于北欧：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建立不仅被视为促进经济



合作的利器，更被看作防止法德间发生新冲突的手段。意大利的加入给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向地中海发展的空间，但这种空间不应该被过分夸大：意大利之所以有资格加入共同体，凭借的是米兰和都灵（Turin）这些游离于地中海之外的工业城市，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第一个十五年，意大利是共同体中最贫穷的国家，其贫困的南部文化落后、农业衰退、工业化程度低。<sup>14</sup>背离地中海的更多证据可见于法国去殖民化的痛苦历史。法国先是承认了恼人的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的自治，后来又允许他们独立，随后又想象着他们的独立能控制住阿尔及利亚，后者的北部沿海已经被纳入了法国本土（metropolitan France）。法国军队与当地民族主义者“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之间的恶性斗争因激进的“秘密军组织”（*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的参与——他们既攻击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也攻击法国政府，以保护他们所谓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而变得复杂。阿尔及利亚问题震撼着民意和法国政治。随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移民者占领了政府大楼，最终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覆灭和戴高乐在1958年执掌法国大权的军事政变开始了；法国继续向科西嘉派兵。戴高乐接掌政权后，认为法国必须保留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但不久他便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几个同僚将军断定，戴高乐背弃了他们的初衷，并发动针对他的暗杀行动。戴高乐不为这些威胁所惧，于1962年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发生了大规模群众运动。那些还未离开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因1962年7月5日的“奥兰大屠杀”而被劝告离开：阿尔及利亚独立那天，奥兰的欧洲区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屠杀了大量民众——人数存在争议（估计至少有100人），

但成功实现了吓走成千上万欧洲人的目标。尚在奥兰的法国军队奉命保持中立，持观望态度。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后数月，大约有 90 万名法国籍的阿尔及利亚人离开了，包括法国移民和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大部分人定居在法国南部。随之而来的是一波阿尔及利亚本土移民，和来自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移民，他们使马赛和其他城市的中心地区大为改观。大量北非民众的出现，并没有在法国南部创造出新的多民族和谐共存局面，反而催生了丑陋而恐怖的仇外情绪，这种情绪因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简称 FLN）的恐怖主义记忆而得以强化。

英国也面临其地中海各附庸国强烈的独立要求。马耳他人面临三种选择：其一，加入意大利——一种在战前风靡一时但在遭围攻后显得不可思议的观点；其二，通过与英国的联合加强与宗主国的关系；其三，独立。第二种意见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皇家海军显然对马耳他造船厂的使用越来越少，随着英国人逐渐减少在地中海的出现频率，到 1964 年，独立运动最终获得胜利。但马耳他在此后的十年仍然奉伊丽莎白女王为国家首脑，并继续留在英联邦内。后来，在多姆·明托夫（Dom Mintoff）的社会党政府执政时期，马耳他开始鼓吹其不结盟地位，并在地区内寻求盟友，其中就包括谁都想象不到的，于 1969 年攫取了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上校（Colonel Gaddafi）。该岛保留着一笔奇怪的遗产：鱼和薯条，肉桂卷和英语——尽管如今英语对马耳他人而言处于次要地位。继任的马耳他政府对遗留问题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发利用不再有英国舰队出没的大海港。海岛的不结盟地位意味着苏联舰队无法从马耳他获得多少利益。但随着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到意识形

态方面的论战，中国人开始看到了机会。渺小的马耳他和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人投资了对马耳他干涸码头的改造工程。另外，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直享有使用阿尔巴尼亚海上军事设施的权利，阿尔巴尼亚是中国亲密的欧洲盟友，现在，它乐意拒绝向莫斯科的“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分子”提供设施。<sup>15</sup>

623

对英国而言，马耳他是只恼人的蚊子，塞浦路斯却是个大马蜂窝。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要求与希腊实现统一，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分野产生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土耳其政府认定，由希腊人把持的塞浦路斯对土耳其南部水域是个战略威胁。然而，反对的焦点不仅仅是对立的社区。外国势力成为希腊暴力民族主义者的目标，这些民族主义者中有日益极端化的中学生。他们想象着，他们正在重新开始摆脱奥斯曼人的统治并实现希腊独立的斗争，一些人成为“埃奥卡”（*Ethniki Organôsis Kypriôn Agonistôn*, EOKA，即塞浦路斯全国战斗者组织）的成员。它的青年分支组织要求成员以“圣三位一体”之名发誓，将“为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桎梏而竭尽全力，甚至不惜献出我的生命”。<sup>16</sup>这并非儿戏。埃奥卡指挥官乔治斯·格里瓦斯（Georgios Grivas）是个毫无同情心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在最紧要的关头，尼科西亚的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对英军（共屠杀一百多人）和土耳其人的屠杀行为，希腊社区和土耳其社区都防守着各自的区域——由铁丝网隔开，或由非正规军把守。<sup>17</sup>

劳伦斯·达雷尔——受教于尼科西亚的希腊高中，后来成为塞浦路斯的英国情报官——还记得骚乱开始时，英国殖民当局的优柔寡断：

例如，是否以希腊人的方式行事就能被算作希腊人？当雅典正在广播诋毁和煽动性言论，激励希腊人奋起之时，希腊国歌应该在独立日奏响吗？这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我被迫在模糊的友善和责难之间行事。<sup>18</sup>

埃奥卡誓言中的圣三位一体祈祷强调了统一斗争中希腊正教的作用，因为正是希腊教会，而并非作为伯里克利后代的观念，是希腊人认同感的核心——土耳其人对伊斯兰教的情感则随意许多。马卡里奥斯（Makarios）大主教担任了总督（Ethnarch），成为希腊社区的首脑，但英国当局在1956年将其逐出海岛，把他扣留在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上长达三年。他是去殖民化理念的坚定倡导者，并引领了塞浦路斯与希腊的合并运动，土耳其人反击说，缓解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紧张关系的唯一途径是拆分海岛。很难说，这到底是否可行，因为土耳其人遍布海岛各地。此外，希腊人日益掌握经济主导地位，而混合型村庄中的土耳其人社区常常贫困落后。

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了，马卡里奥斯任总统，但共和国需要悉心呵护。希腊、土耳其和英国是保护国，如果塞浦路斯受到威胁，它们有权干涉。英国在泽凯利亚（Dhekelia）和阿科罗提利保留了非正式的基地，面积约100平方英里（250平方公里），作为英国统治下的领土；它们成为北约在中东的监听站。根据塞浦路斯宪法，由土耳其人担任副总统，且土耳其人的政治影响力超出了与其人口数相对应的水平（希腊人坚信这一点）。但宪法的目的是确保希腊人不会使海岛与希腊合并。尽管1960年马卡里奥斯承认，塞浦路斯将成为独立共和国，但合并后在1967年后仍然是塞浦路斯希腊人的待议事项，

当时一个野蛮的、民族主义强烈的军政府在雅典夺取了希腊政权。1974年夏，驻扎塞浦路斯的希腊军官成为骚乱的根源，马卡里奥斯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希腊军官们似乎打算通过武力实现合并。土耳其政府于7月下旬进行干预，宣称其作为保护人有权如此行事；土耳其派3万人的部队登上海岛，占领北方三分之一的土地，而此时雅典的军事集团名誉扫地，失去了政权。在塞浦路斯，人的作用是可以预料到的。19万名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从凯里尼亚（Kyrenia）、法马古斯塔和一些小城镇或村庄逃至南方，逃往希腊控制区，数万名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则匆忙向北逃跑，寻求土耳其军队的保护。由此，海岛终于以民族为界产生了分裂，但也出现了深刻的生理和心理创伤：靠近土耳其前线的法马古斯塔海滨耸立着希腊人利用独立后相对和平局面而建造的酒店，现在已成了废弃的幽灵城镇，与古城法马古斯塔——由四百年前遭土耳其人轰炸的哥特教堂废墟构成的幽灵城镇——相伴。横穿海岛，延伸着在联合国监督下的大片无人区，隔开了两个民族区。尼科西亚早在1963年就已经分为土耳其人区和希腊人区，设置了街垒的区域住着土耳其人。<sup>19</sup>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边界从老城的中心穿过。仅在2008年4月才开放了尼科西亚老城区的一处十字路口。

625

土耳其人继续他们针对合并运动的政策。1983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建立，除土耳其外，它不为国际承认，那里驻扎着大量军队，并鼓励成千上万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在当地寻找新生活。塞浦路斯的政治变化可从地名的变化中，从废弃礼拜场地，从四处飘扬的旗帜中得知——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土耳其国旗与北塞浦路斯的旗帜——白底红新月——一同飘扬；在南部，希腊国旗

与塞浦路斯共和国旗帜一同飘扬。事实上，塞浦路斯隶属于四种相互独立的势力：希腊塞浦路斯共和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英国和联合国。2004年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之后便致力于团结各方力量，因为欧盟将希腊共和国视为全体塞浦路斯人的政府，欧盟的投资也使土耳其尼科西亚、凯里尼亚和北塞浦路斯其他地区的项目获益。希腊竭力推动欧盟承认塞浦路斯，这不足为奇，因为站在希腊的立场上，这是在欧盟圆桌上增强希腊话语权的时机，让欧盟更深入地卷入希腊-土耳其竞争当中，将塞浦路斯的分裂问题带到国际舞台上。<sup>20</sup>而土耳其民众则普遍准备接受成立塞浦路斯联邦的计划，希腊塞浦路斯人拒绝放弃他们在北方的财产，但希望借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之机来解决分裂问题的人未免过于乐观了。迫使北塞浦路斯去寻找一个解决办法的最重要因素是一个严重依赖土耳其经济援助的、不被承认的国家的经济困境，更不用说军事上的困境了。<sup>21</sup>

626 英国在地中海的第三块领土，也是最小的一块领土没有去殖民化的机会——它也不愿去殖民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仍旧将直布罗陀海峡视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尽管其重要性随英国在地中海义务的减少而下降，美国人不需要它，因为他们为使用西班牙南部的基地与佛朗哥达成了协议。佛朗哥想象着，如果他能制造出足够的呼声，他就能拥有直布罗陀海峡。但1950年前后，英国对于发展与西班牙政府——因镇压记录而名声很差——的关系并不十分感兴趣；西班牙也无法使其声音传到联合国，它到1955年才获准加入联合国。<sup>22</sup>前一年，新女王伊丽莎白在她为期六个月的环球之旅中最后访问了直布罗陀海峡，这使佛朗哥有借口调动马德里街头的人群。西

班牙认为，它对国家的每一寸领土都拥有权利，许多直布罗陀人和英国人一样是外国侨民，它宣称，真正的直布罗陀依赖圣罗克（San Roque）的居民而生存，附近的西班牙城镇早在1704年就已有巨岩上的原住民定居。<sup>23</sup>不像其他去殖民化观点，这个问题不在于居民获得自治权，而是一个更加传统的自然边界问题（这点如何适用于摩洛哥对西班牙设在休达和梅利利亚前哨的主权要求，却没有解释清楚）。随着王室到访，佛朗哥对西班牙和巨岩之间的来往做了更严格的规定。一位前美国空军（USAF）飞行员写道：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我几次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飞往直布罗陀。它是我被要求执行的最困难航程之一，因为西班牙的空中交通管制（Spanish Air Traffic Control）为飞机在东部的降落划出了极其狭窄的空中走廊。<sup>24</sup>

英国在该问题上摇摆不定，因为它发现，相比在皇家海军的全盛时期，此时直布罗陀海峡的用处不大，但它还是对直布罗陀人不停地对英国表示忠诚印象深刻。<sup>25</sup>

英国坚持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领土完整问题，而是直布罗陀人的意愿。1969年5月，英国政府解释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会让直布罗陀人民屈从于不让他们自由民主地表达意愿的他国政府。”<sup>26</sup>沮丧恼怒的佛朗哥——他从未丧失横行霸道的能力——彻底关闭了西班牙和直布罗陀之间的边界。这一关就是十三年，直到进入民主西班牙时代，而且直到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才完全开放。那段时间，在直布罗陀有份工作的西班牙工人与他们的工作地完全切断了联系，直布

627 罗陀人只能经丹吉尔迂回到达西班牙。西班牙的敏感性达到了巅峰：1965年，西班牙扬言，如果直布罗陀小姐被允许参赛，它将抵制世界小姐选美；但英国外交部让西班牙自行决断的任何念头都因所有居民拒绝解除与英国的关系而不断遭到抵制。<sup>27</sup>由于其民众融合了英国人、西班牙人、热那亚人、马耳他人、犹太人、印度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居民，直布罗陀可以被视作曾普遍存在的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最后幸存者之一。

## 注 释

1. S. Ball, *The Bitter Sea: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editerranean, 1935-1949* (London, 2009), pp. 303-6.
2. E. Leggett, *The Corfu Incident* (2nd edn, London, 1976), pp. 28-100.
3. *Ibid.*, pp. 113, 128-30.
4. Ball, *Bitter Sea*, pp. 309, 323.
5. See, e.g., N. Bethell, *The Palestine Triangle: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British, the Jews and the Arabs 1935-48* (London, 1979); M.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London, 1998), pp. 153-250; A. Shlaim, *The Politics of Partitio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s and Palestine 1921-1951* (Oxford, 1990: 2nd edn of his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Oxford, 1988).
6. Ball, *Bitter Sea*, pp. 295, 305-14.
7. Cited by B.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17-1949* (Cambridge, 1997), p. 87.
8. A. LeBor, *City of Oranges: Arabs and Jews in Jaffa* (London, 2006), p. 122.
9. A.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London, 2000), pp. 118-19; Gilbert, *Israel*, pp. 306-11; see also Shlaim, *Politics of Partition*, p. 172.
10. Gilbert, *Israel*, pp. 297-8, 311-12, 317.
11. Shlaim, *Iron Wall*, pp. 172-3.
12. H. Thomas, *The Suez Affair* (London, 1967); Shlaim, *Iron Wall*, p. 184.
13. M.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2002), pp. 60-116.
14. G. Schachter, *The Italian Sou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New York, 1965).
15. H. Frendo, *Malt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Reflections on the Course of*



- Maltese History* (Malta, 1989); B. Blouet, *The Story of Malta* (3rd edn, Malta, 1987), pp. 211-22.
16. L. Durrell, *Bitter Lemons of Cyprus* (London, 1957), pp. 193-4.
  17. J. Ker-Lindsay, *Britain and the Cyprus Crisis 1963-1964* (Peles: Studien zur Archäologie und 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und Zyperns, vol. 27, Mannheim and Möhnesee, 2004), pp. 21, 51-65.
  18. Durrell, *Bitter Lemons*, p. 159.
  19. Ker-Lindsay, *Britain and the Cyprus Crisis*, p. 37.
  20. M. Gruel-Dieudé, *Chypre et l'Union Européenne: mutations diplomatiques et politiques* (Paris, 2007), pp. 160, 165-6.
  21. D. Ioannides, 'The dynamics and effects of tourism evolution in Cyprus', in Y. Apostolopoulos, P. Loukissas and L. Leontidou (eds.), *Mediterranean Tourism: Facet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ondon, 2001), p. 123.
  22. M. Harvey, *Gibraltar: a History* (2nd edn, Staplehurst, Kent, 2000), pp. 167-8.
  23. M. Alexander, *Gibraltar: Conquered by No Enemy* (Stroud, 2008), p. 237.
  24. Private communication from Dr Charles Stanton.
  25. 注意书中方法的模糊性: G. Hills, *Rock of Contention: a History of Gibraltar* (London, 1974).
  26. Alexander, *Gibraltar*, p. 241.
  27. S. Constantine, *Community and Identity: the Making of Modern Gibraltar since 1704* (Manchester, 2009), pp. 414-15.

## 七 末代地中海 (1950 ~ 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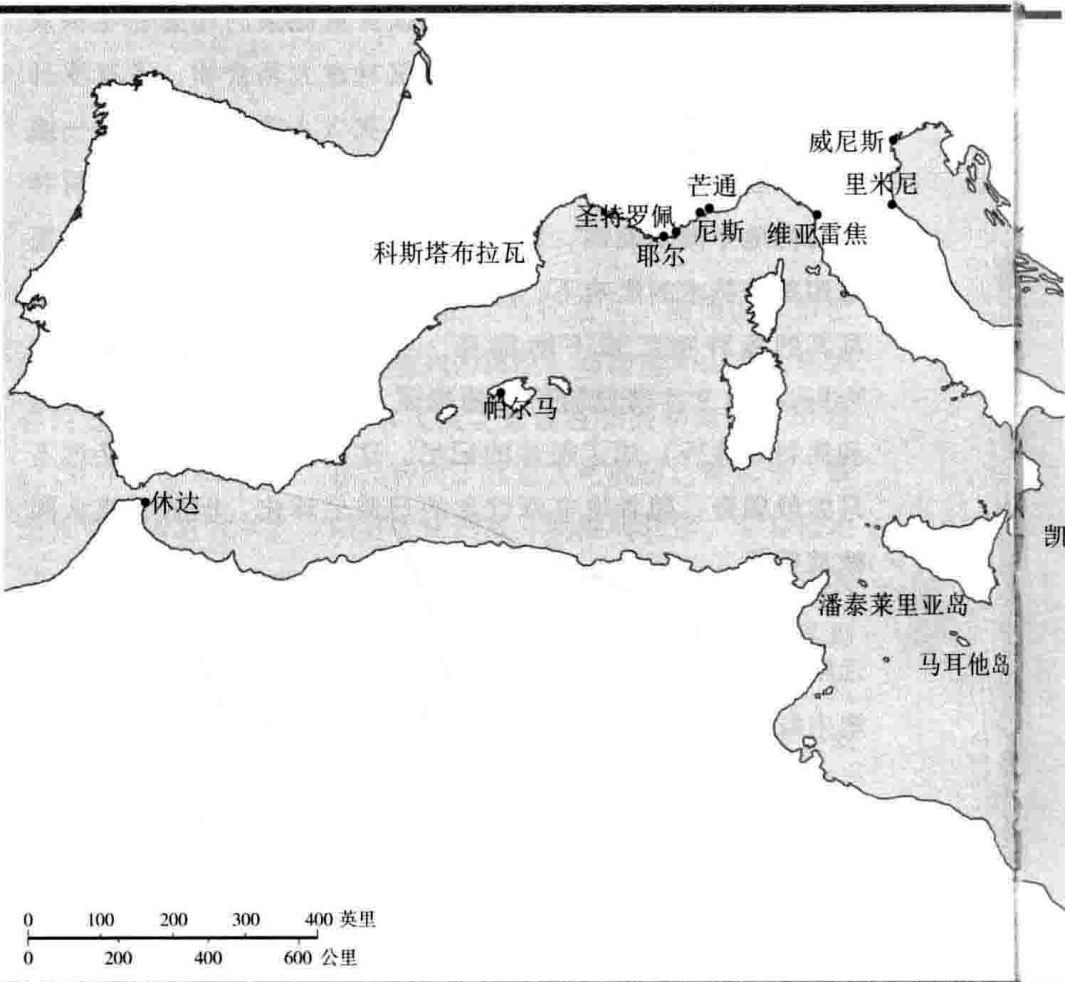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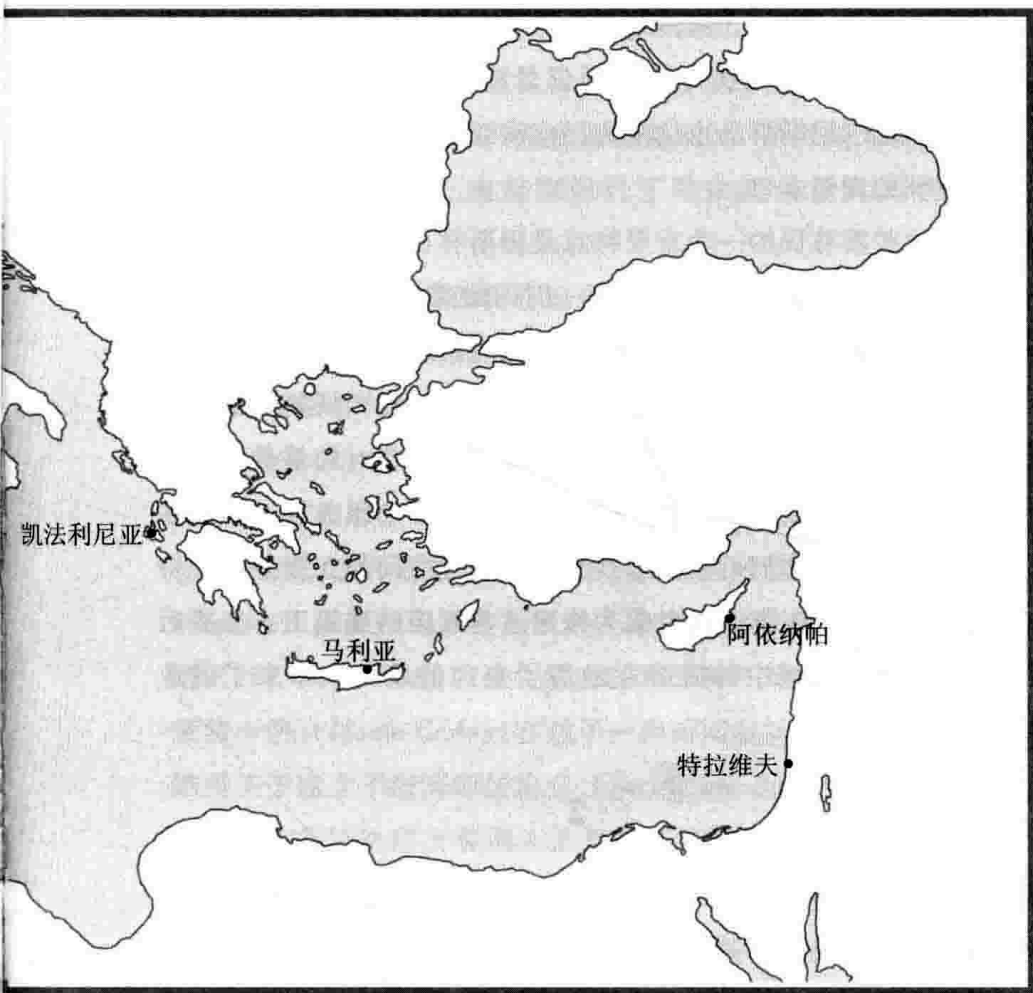
628

20 世纪后期是地中海移民的大时代之一。前面的章节已经论述了来自北非和进出以色列的移民。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移民史始于 19 世纪后期，移民者主要前往北美和南美。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移民转向了北意大利城镇。被忽视、缺乏投资的南意大利农业随着农庄的废弃而继续衰落。在其他地区，殖民联系是重要的。例如，英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就将大量的希腊和土耳其社群带到伦敦北部地区。和这些移民一起到来的是他们的烹饪：20 世纪 70 年代，比萨饼在伦敦风行，且英国的希腊餐馆有了塞浦路斯风味。不足为奇的是，南意大利的食物在意大利移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热那亚酱汁面条这一热那亚烹饪法的卓越创造在意大利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利古里亚之外，鲜为人知。但北部欧洲对地中海食物的第一波热情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伊丽莎白·戴维（Elizabeth David）的《地中海食物》问世了。<sup>1</sup>该书引用她常在地中海地区开展的惊险旅行，并在二战中将敌人甩在身后。起初，该书唤起的是渴望而非成就：英国仍旧实行战后食物配给，即便是橄榄油都难以找到。随着北欧的日益繁荣，地中海产品开始向陌生地区开拓市场，1965 年

戴维夫人终于有信心开了自己的餐馆。到1970年，在英国、德国或荷兰的杂货铺里找到茄子和鳄梨还不算太难；到2000年，富含鱼、橄榄油和蔬菜的地中海饮食远比主要基于猪肉和从猪肉中提取猪油的传统北欧饮食更健康的理念已生根发芽。对地中海烹饪的兴趣——不仅对意大利食物，还有罗马食物，不仅对罗马食物，还有罗马犹太人食物，等等——遍及整个欧洲和北美。<sup>2</sup>人们对产自远在南方的阿普利亚和阿利坎特的地中海葡萄酒，越来越有兴趣，在先进的加利福尼亚葡萄栽培技术的影响下，颇有前景的克罗地亚沿海地区或土耳其的新种植区被不断提及，更不必说贝卡谷地（Bekaa Valley）和戈兰高地的新老葡萄园了。清淡的北方菜（法国和比利时除外）成了遥远的记忆。这些饮食变化的意义远不只尝鲜猎奇：随着地中海饮食的日益全球化，旧的民族认同被动摇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文化财产。但远距离的人口迁移仍旧可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新的非地中海人口暂时或永久地定居于地中海上的城市，或在乡村充当廉价劳动力。在2000年前后到达地中海的大量非洲和亚洲移民只是想借地中海踏上欧洲土地，之后向北前往法国、德国或英格兰，当然意大利的大城市也具有吸引力；但终究是那些加入欧盟的地中海国家站在应对不断膨胀的移入人口的前线。和休达一样，西西里和北非之间的小岛兰佩杜萨、潘泰莱里亚、马耳他都成了受欢迎的人口。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于2009年5月痛斥意大利将船上的大量难民送回利比亚。2008年，36900名避难者到达意大利，比2007年增长了75%；2008年，2775人到达马耳他，相当于每148个





马尔他人中就有一个外来移民；但这是 2002 ~ 2010 年这九年时间中的顶点。事实上，2010 年移民人数急剧下降，因为马耳他从利比亚和意大利——许多移民的计划目的地——的难民协定中获得了好处，或许是因为深受经济危机之苦，欧洲本身似乎不再那么有吸引力。<sup>3</sup> 这不仅是地中海西部国家面临的问题：多德卡尼斯群岛也已成为民众从亚洲取道土耳其以最后到达欧洲的理想入口。

680 这些新移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这引发了有关建立清真寺的争论。这一旧的敏感话题，或者说偏见，在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依旧显眼；但时常出现的极端主义者索取之前所有的伊斯兰土地，包括安达卢斯，以图恢复一个新的哈里发领土国家，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与之相对的是移民的旧现实：随着西欧生活水平的提高，地位低下的服务性工作落在了移民身上，他们可在酒店找到类似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侍者或保洁员的工作，或者成为修建这些酒店的建筑工。二战后地中海经济领域中的旅游业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带来了就业机会。

## 2

681 20 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中不再存在重要的商业或海军势力，而是发展了一种新行业：大众旅游业。<sup>4</sup> 大众旅游业最早出现在地中海，如今它每年都会吸引 2.3 亿游客。<sup>5</sup> 数百万来自欧洲北部、美国和日本的民众为寻求阳光或文化，或兼而有之，会临时性地迁至地中海。与此同时，希望在西班牙海岸或马略卡、马耳他、塞浦路斯的公寓或别墅度过余生的退休德国人、英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了以夜总

会、小酒吧和酒窖为特色的独具风格的社区，马略卡甚至成立了一个德国人的政党。<sup>6</sup> 没有执照的建筑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以塞浦路斯为例）使地中海的退休生活并不总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尤其是当房子被暴怒的西班牙当局悉数拆除时。这种南迁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使有限的淡水和能源供给面临巨大的需求压力（尤其是在塞浦路斯），并用毫无设计、单调乏味的白色混凝土建筑群取代了海滨美景（尤其是在西班牙）。

要了解旅游业是如何在地中海兴起的，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它在二战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大旅行时代使英国和德国游客前往那不勒斯湾和其他地中海地区（或景点），满足了少数精英人士的需求。在铁路穿越法国，维多利亚女王让芒通（Menton）和耶尔（Hyères）成为公元19世纪晚期的冬季流行休假地后，地中海变得更加通达。纪念性的酒店在尼斯和戛纳（Cannes）沿步行街修建起来，一小块地中海海滨“蔚蓝海岸地区”（Côte d'Azur），成为富人在夏天和冬天的度假胜地。而蒙特卡洛（Monte Carlo）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扬名天下，之后摩纳哥王子建立了海滨浴场协会（*Société des Bains de Mer*）——与其说它关注洗浴（英国人推崇其有益健康一面），不如说它更关注赌博。<sup>7</sup> 意大利的温泉疗养地开始在内陆的蒙特卡蒂尼（Montecatini）、阿巴诺（Abano）和海边的里米尼发展起来，它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意大利客户；尽管在福斯特的小说中，英国人到达佛罗伦萨，以包膳宿的方式住上几个月，但此时的大海似乎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sup>8</sup> 在20世纪晚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是游客的人数及其目的地，以及他们到达地中海的多数角落的便捷度。旅游者取代了旅行者。

633 旅游业的扩张是由以下三种因素导致的：首先，在地中海，一些政府——国家、地区或城市——将旅游业视为吸引外国资本、提升当地产业的一种手段。例如，1976年、1987年和1996年，以色列提出了三项总体规划，以期鼓励旅游业；该国主要有四类游客——犹太游客、基督教朝圣者、被该国海滩和纪念物吸引的本国旅游者及国外度假者。到2000年，从雅法边界向北延伸的特拉维夫海岸分布着大量新建的、成排的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但少有结构优美的建筑。<sup>9</sup>其次，地中海外的大型旅游公司如汤姆森（Thomson）和赫伯罗特（Hapag Lloyd），积极地进入地中海旅游市场，向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突尼斯海滨派遣他们的代理人，去寻找能够吸引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客的酒店。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一些顾客认为在地中海海滨度假的两周是一种摆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北部的阴沉的方式——许多人只是想要海滩上的日光浴场或酒店中的游泳池，一些人则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品尝一下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地食物。在希腊的塞浦路斯，英国度假者可以轻易发现吉百利巧克力和英国的切片面包。<sup>10</sup>人们都知道，荷兰度假者通常要带上几袋荷兰本地的土豆。法国人因为有自己的地中海海岸线，比其北欧邻居更具创造性。地中海俱乐部（Club Méditerranée）集团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率先推出包价的旅游度假服务，从马略卡的海滩小屋开始，目的是制造出荒凉小岛的浪漫场景。除此之外，该公司的地中海的游览目的地还包括许多鲜有人探访的地方，如摩洛哥的地中海海滨。它的创新手法包括对向顾客直销的强调，但其巅峰期是在1990年之前；后来，经济状况和管理问题弱化了它的实力。<sup>11</sup>



起初北部的入侵比较温和。里米尼早在 1938 年就有了机场。尽管在这一时期，里米尼吸引了富裕的顾客，但航空旅行还是非常昂贵，并且很快，战争也中断了这些涓涓细流般的外国游客。二战后，里米尼采用了最受公众欢迎的方法。<sup>12</sup>随着航空、铁路、公路旅行变得日益廉价、便捷，各地的商业开始繁荣起来。20 世纪 50 年代，德国人和英国人的铁路运输开始直通里米尼；卫星城镇大量兴起，以致里乔内（Riccione）和海上米兰（Milano Marittima）开始与里米尼相竞争。它们的商标一直都是为每个实体酒店确定范围的密集的日光浴床、太阳伞和雨伞。相似的发展也发生在比萨附近，在那里维亚雷焦（Viareggio）成为托斯卡纳主要旅游中心，因为它满足了一类对佛罗伦萨的艺术之旅和其他托斯卡纳城市少有兴趣，而更乐意去海边度假的人们的需求（他们可以前往比萨进行奇妙的一日游，以一观斜塔）。大量的旅游者和新酒店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兴建，成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

684

但是真正的变革的确随飞机的广泛使用而到来。<sup>13</sup>廉价、安全、快捷的航空旅行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方面，英格兰是先行者，因为它没有直达地中海的铁路，陆上交通极为不便。英国是航空工业的主要中心，它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60 年代早期利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飞机技术，制造了高效的客机，如维克斯子爵（Vickers Viscount）客机和“大不列颠”（Britannia）客机。所以先是英国人，后来是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飞向了天空。20 世纪 50 年代的汤姆森度假公司开通了飞往马略卡岛的航班，它将成为大量空中旅行的首个目的地。否则，前往马略卡岛的旅途将慢得令人生厌，需要先坐火车、船、火车，然后换乘另一趟火车（西班牙宽轨），最后再

坐船。<sup>14</sup>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更高速、更平稳的喷气式飞机的引进，如BAC I - II，交通迅速发展；帕尔马的机场仍旧是——至少在夏天是如此——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1960年到1973年，每年前往马略卡岛的游客人数从60万猛增到360万。<sup>15</sup>到21世纪初，旅游业占马略卡岛经济总量的84%。所有的混凝土城镇，如帕尔马新城（Palma Nova）都是为旅游业而建的。但这些成就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弗朗哥时代。1967年，马略卡岛和西班牙（包括加那利群岛）吸引了25%的英国出国度假者，到1972年吸引了36%，而前往直意大利度假者的比例却从16%下降到11%。<sup>16</sup>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西班牙竞争，这正是弗朗哥政权想要的结果：1959年西班牙经济的“稳定规划”并没有料到地中海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在旅游业方面的扩张会如此稳定。<sup>17</sup>西班牙海滨的大片混凝土建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没有为布拉瓦海岸（Costa Brava）和地中海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自然美景做足够考虑。一时之间，西班牙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遗产——托莱多、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格拉纳达——在吸引力方面让位于海岸线，这些海岸线得益于新公路的开通、合适的照明，以及其他重要发展，即便铁路交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速度缓慢。

685 旅行变得大众化和全球化。受益于旅行团的全包旅游，从英国前往西班牙旅行的概念开始吸引来自所有背景的大量人群。游客们不再是穿行于地中海城镇和乡村间的冒险者，因为现在他们可以在安全、舒适的英格兰或德国客厅，通过一份目录来选择航班、酒店、用餐甚至日程，他们知道一位能讲他们的母语的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克服任何困难。人们想要的是“流水线上的假日”。<sup>18</sup>为避免让人们觉得出国似乎太过危险，

有了颇为舒适的多人同行，且当地人也乐意满足外国游客的各种怪异需求：为英国人提供鱼和薯条，为德国人提供烤肠。

那些到地中海度假的人乐于展示，他们从西班牙或意大利回来后皮肤变成了深棕色。到 1947 年，一些法文的小册子在宣传蔚蓝海岸旅游时，强调的一直是海滩的乐趣。<sup>19</sup>深棕色的皮肤成了富有和健康的标志，因为人们所了解的维生素 D 的好处远多于紫外线（UVA）和电磁辐射（UVB）的害处。苍白色的皮肤现在与肺病与办公室雇员相关联。了不起的鉴赏家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在 20 世纪 20 年代决定按照自己在漫游地中海晒黑之后的形象设计时装，为以后各时代的女性树立了榜样。但这种对古铜肤色的追求也导致了道德理念的变化。<sup>20</sup>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可以在海滩上暴露某些身体部位，在其他公众场合却需要小心地遮掩。女性（及男性）对身体的暴露越来越多。比基尼泳装以一处用于核试验的太平洋环礁的名字命名，于 1946 年在巴黎的时装展示会上获得展示，但又过了二十多年才被广泛接受——即使设计者希望它能像核反应那样在反对它的人群中迅速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变得越来越大胆，于是，通常被掩盖的肚脐也常常被露出。<sup>21</sup>比基尼引起道德缺失行为的可能性让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 1948 年对其下达禁令（梵蒂冈发表口头声明支持这种观点），但随着外国游客大量前来，这种立场很难坚持。比基尼的部分吸引力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制造此类产品的原料氨纶和莱卡，它们是不吸水的天然及人造纤维的混合材料。即使是连体游泳衣，莱卡紧贴身体的性能也能充分地展示女性的身材，而不如保守派所愿。展示是人们穿泳衣的重要目的之一，游泳池经常是多数人静静观望、少数人游泳的场

所。<sup>22</sup>于是，飞机和比基尼这两项人们难以想象的发明，在 20 世纪下半叶改变了地中海和北欧之间的关系。<sup>23</sup>

显然，追求古铜肤色的游客们的到来令地中海居民感到困惑，对他们而言，太阳是正午时分所要躲避的。随之产生的困惑源于游客们的表现：男女之间的肢体接触，尤其是当他们穿着不是很多时，会令希腊人、突尼斯人和其他人震惊。在共产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游客的这些行为被视为西方堕落颓废的表现：恩维尔·霍查抱怨邻国游客的种种怪诞行为，“穿短裤，或根本不穿”。无论他的意思是什么（或许是在攻击南斯拉夫的自由主义），他都想强调，没有多少西方游客能进入阿尔巴尼亚，除了来自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 毛泽东主义政党的来访者。北欧的享乐主义和放纵，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影响了他们对这些情形的态度，这发轫于当地那些痴迷于其所见所闻的年轻人。<sup>24</sup>20 世纪 80 年代，当女性在海滩上袒胸露乳的现象变得普遍时，文化碰撞就变得更加明显。法国对形体美的崇尚，加上其庞大的美容产业，使得圣特罗佩（Saint-Tropez）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意大利和西班牙度假区紧随其后。某些人的自由化对其他人来说，是种两难境地，而且人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一位修女因驱逐衣着不得体的游客而遭到起诉，她发现这份工作压力巨大，并因此精神崩溃。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以同性恋旅游中心而闻名于世，这一迹象表明了该国自佛朗哥时代以来的发展。抓住机遇、从旅游业中获得巨大成就的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它无可动摇地确立起以酒店为基础的、廉价的、安排合理的度假产品供应者的好名声，尤其受到德国人青睐；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裸体主义者的度假胜地。铁托政府深知这将吸引追求浑身黝黑的

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拥趸，于是相当精明地鼓励了这一产业的发展。

廉价航空和廉价酒精也能摧毁旅游业：克里特的马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阿依纳帕（Ayia Napa）就已遭遇恶名，年轻的英国游客的所作所为已足以破坏他们的形象。他们对当地文化不感兴趣，却想“有机会花费比在家更少的时间来寻求更多的乐趣”。“乐趣”主要指性和酒精，2003年，英国媒体称，这二者都得到了18~30岁俱乐部（Club 18-30）旅游公司代表的极力支持。<sup>25</sup>不足为奇的是，马略卡岛曾努力尝试进军高端市场；尽管这意味着游客人数会减少，但每个更富有的造访者会消费更多。一些地方，如阿普利亚和撒丁岛部分地区，已有意识地以“高品质”目的地的名头来做推广，精品酒店已开始抢走大型综合性设施的生意。旅游业已将繁荣带给先前的贫困和非生产性地区。然而环境代价十分高昂。水资源紧缺，空调设备、飞机造成的碳排放，以及酒店综合体附近的海水污染都使地中海环境日益恶化。随着节日日益商业化，当地传统也惨遭荼毒：早就濒临消亡的威尼斯狂欢节被重新启用，并在威尼斯日历上被明显标示出来以加以推广——它在淡季，即城市通常没有游客之时庆祝并非巧合。路易斯·德·贝尔尼埃（Louis de Bernières）的畅销书《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sup>①</sup>的出版让凯法利尼亚的游客增多，2008年大获全胜的电影《妈妈咪呀》（*Mamma Mia*）也让希腊群岛得到游客的关注。<sup>26</sup>

长期以来，地中海地区、葡萄牙和加那利群岛几乎是夏季

---

① 又译《战地情人》。——译者注

大众旅游业发展的绝对受益者；前往古巴、佛罗里达或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长途度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成为其在大众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价格战导致一些由英国和爱尔兰企业家领导的廉价航空的建立，因而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还见证了短途度假，即“城市间旅游”的迅速发展。爱尔兰的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在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设立中转站，建立了欧洲最大的航线系统。这些航线不仅有价格优势，也吸引了那些在法国南部、托斯卡纳或西班牙有度假居所的人们。除了航空旅行，海上旅行也繁荣发展起来，有时，航运公司会有些滑稽地宣称：乘坐游轮比乘坐飞机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杜布罗夫尼克挤满了游轮，以致在旺季时得派交警控制流向老城的人流。

688 当然，地中海旅游业并不只针对欧洲人。更遥远国家的两次“入侵”尤为重要：美国人和日本人。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就常出现于地中海的酒吧中（D. H. 劳伦斯就曾经和一位美国朋友一起参观过伊特鲁里亚墓冢），但他们如今的游览路线中还包括了意大利、希腊、法国南部和埃及的历史遗迹，这再次表明，价格低廉和经过精心设计的便捷交通网络使得乘坐飞机从大西洋另一端到达地中海变得轻而易举。日本人试图在欧洲文化和历史中探寻西欧经济成功的原因；此外，这些联系加速了日本已经开始的快速西化进程。日本游客的数量随日本经济的扩张与萎缩而起起落落。旅游业的另一个限制因素是政治骚乱：20 世纪 90 年代，曾经繁荣一时的美丽的达尔马提亚海滨度假区从南斯拉夫的解体中缓慢恢复过来。与中世纪地中海的商路相比，现代游客的度假轨迹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如果克罗地亚或以色列不安全，其他地区，如塞浦路斯、马耳他、土耳其等，就可获得相对优势。

## 3

因为莫斯科不再试图在叙利亚、利比亚以及其他盟国大肆建立反美集团，所以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和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关系，但这些国家仍旧普遍敌视以色列。这是因为以色列似乎没有兴趣兑现其对和平的承诺，不愿放弃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尽管它于2005年从加沙地带撤出了（此后，该地区便落入了哈马斯的手中）。2010年，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牢固的经济与军事联系断裂了，名义上是因为以色列袭击了向加沙运送援助的船只，当时加沙受到以色列的严密封锁；但同样很明显的是，土耳其正在中东寻求新使命，一些人将其定义为“新奥斯曼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对土耳其排斥政策的后果：欧盟最强大的几个成员国反对土耳其加入，而且，没有哪个国家能就塞浦路斯问题提出让土耳其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639

尽管如此，从1995年的“巴塞罗那进程”开始，欧盟就试图引导所有地中海国家向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目标努力。根据1995年的协定，2008年诞生了“地中海联盟”（*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整个欧盟和地中海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中，在这个组织中，它们可以试探性地找出共同利益而不是分歧。但这个联盟的缺陷在于，它被地中海国家视为欧盟之外，尤其是被视为羸弱的欧盟候补成员的土耳其。其他一些人则希望看到欧盟成为欧洲-地中海联盟，将其成员国身份拓展到地中海所有地区，但在地中海内部，有大量的政治敌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解决，更别说欧洲的未来了，这些都让上面的观点听起来像乌托邦式的美梦。其他极具价值但被忽略了的目标包括清

洁海洋计划。海洋污染和过度开发已经使（例如）金枪鱼捕捞业遭受灭顶之灾——地中海金枪鱼四分之三的捕捞量流向了日本。

2009年底，过于沉重的政府债务引发了欧元区的经济衰退，但整个地中海都受到了影响：地中海北岸和南岸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愈发困难；与此同时，高失业率、濒临破产的银行、无力维持经济增长、严厉的紧缩政策，令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希腊、塞浦路斯的政府忧心忡忡。这些国家同欧元绑在一起，却无力控制国内经济事务，毫无疑问，经济复苏因此变得更难实现。然而，在它们加入欧盟时，它们都深信德国的经济模式也适用于自己。2012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地中海国家并非欧盟成员，而是土耳其和以色列，且土耳其的表现尤为抢眼。直布罗陀成为地中海上保持增长的唯一欧盟属地，但它也未能免于责难。批评者们攻击它的金融服务业和政治地位，且后者还面临着西班牙政府强硬姿态带来的挑战：西班牙政府急于让人们把注意力从经济危机上转移，危机的阴影已笼罩该国全境，且再次点燃了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火焰，该地区的城市上空扬起了加泰罗尼亚旗。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良机，可就此脱离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体系，在地中海欧洲、北非和黎凡特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文化纽带。可是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充满不定性，只有摩洛哥仍能勉力维持稳定，这妨碍了跨海联系的发展。“阿拉伯之春”首先发生在了最繁荣的北非国家突尼斯。之后，埃及废黜了一位总统，然后军方无情地夺得了大权。联合国对利比亚内战的干预使地中海上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性海员，她们来自英国和其他地方；不过干预并未带来稳定，而是使当地重拾部族忠诚的文化。叙利亚爆发了最致命的



暴力冲突：叙利亚的城市曾因对基督徒少数族群的宽容而自豪，可如今这些人也沦为该国流亡者大军中的一分子。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难民试图登上马耳他的海岸和意大利的岛屿；一些漏水小船在海上倾覆，夺走了很多难民的性命；过去对利比亚难民限流的协议纷纷宣告无效。

21 世纪初的这些趋势表明：第五地中海已经瓦解。在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中，一个完整的地中海具有重要的地方意义，而非全球意义。地中海不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地，也不再是紧密经济联系网络的发源地。跨越全球的便捷联系——通过航空的有形联系及通过网络的虚拟联系——意味着，远距离的政治商业和文化联系得以维持。就这点而言，世界正变成一个大地中海，而且，第五地中海是末代地中海，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在这个大地中海内，世界都围绕着伟大的海而转。大海既能连接又能分隔，有时某种趋势会占据上风。地中海尽管曾多次把三块大陆连在一起，现在却成了分隔它们的边界地带。

## 注 释

1. E. David, *A Book of Mediterranean Food* (London, 1950).
2. C. Roden, *Mediterranean Cookery* (London, 1987); J. Goldstein, *Cucina Ebraica: Flavors of the Italian Jewish Kitchen* (San Francisco, 1998).
3. Information kindly supplied by Dr V. A. Cremona, Maltese ambassador in Tunis, and by Julian Metcalf,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Valletta.
4. L. Segreto, C. Manera and M. Pohl (eds.), *Europe at the Seaside: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ass Tourism i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2009); Y. Apostolopoulos, P. Loukissas and L. Leontidou (eds.), *Mediterranean Tourism: Facet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London, 2001); P. Obrador Pons, M. Craig and P. Travlou (eds.), *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Doing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ge of Banal Mobilities* (Aldershot, 2009);

- N. Theuma, *Le tourisme en Méditerranée: une perspective socio-culturelle* (*Encyclopédie de la Méditerranée*, vol. 37, Malta and Aix-en-Provence, 2005).
5. P. Obrador Pons, M. Craig and P. Travlou, 'Corrupted seas: the Mediterranean in an age of mass mobility', in Obrador Pons et al. (eds.), *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 163, 167.
  6. K. O'Reilly, 'Hosts and guests, guests and hosts; British residential tourism in the Costa del Sol', in Obrador Pons et al. (eds.), *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 129-42.
  7. M. Boyer, 'Tourism in the French Mediterranean; history and transformation', in Apostolopoulos et al. (eds.), *Mediterranean Tourism*, p. 47.
  8. P. Battilani, 'Rimini: an original mix of Italian style and foreign models', in Segreto et al. (eds.), *Europe at the Seaside*, p. 106.
  9. Y. Mansfeld, 'Acquired tourism deficiency syndrome: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tourism in Israel', in Apostolopoulos et al. (eds.), *Mediterranean Tourism*, pp. 166-8.
  10. P. Obrador Pons, 'The Mediterranean pool: cultivating hospitality in the coastal hotel', in Obrador Pons et al. (eds.), *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 98, 105 (fig. 5.3); D. Knox, 'Mobile practice and youth tourism', in the same volume, p. 150.
  11. E. Furlough, 'Club Méditerranée, 1950-2002', in Segreto et al. (eds.), *Europe at the Seaside*, pp. 174-7.
  12. Battilani, 'Rimini', pp. 107-9.
  13. P. Blyth, 'The 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 1945-1975', in Segreto et al. (eds.), *Europe at the Seaside*, pp. 11-30.
  14. C. Manera and J. Garau-Tabern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model of the Balearic islands: the pioneers of mass tourism', in Segreto et al. (eds.), *Europe at the Seaside*, p. 36.
  15. *Ibid.*, p. 32.
  16. Blyth, '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 p. 13.
  17. V. Monfort Mir and J. Ivars Baidal, 'Towards a sustained competitiveness of Spanish tourism', in Apostolopoulos et al. (eds.), *Mediterranean Tourism*, pp. 18, 27-30.
  18. Blyth, 'Growth of British air package tours', pp. 12-13.
  19. P. Alac, *The Bikini: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2002), p. 38.
  20. I. Littlewood, *Sultry Climates: Travel and Sex since the Grand Tour* (London, 2001), pp. 189-215.
  21. C. Probert, *Swimwear in Vogue since 1910* (London, 1981); Alac, *Bikini*, p. 21.
  22. Alac, *Bikini*, pp. 54, 94; Obrador Pons, 'Mediterranean pool', p. 103.
  23. D. Abulafia, 'The Mediterranean globalized', in D. Abulafia (ed.), *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312.
  24. Theuma, *Tourisme en Méditerranée*, p. 43.
  25. Knox, 'Mobile practice', pp. 150-51.
  26. M. Crang and P. Travlou, 'The island that was not there: producing Corelli's island, staging Kefalonia', in Obrador Pons et al. (eds.), *Cultures of Mass Tourism*, pp. 75-89.

## 结语：穿越大海

将地中海历史缩减为些许共性，或试着定义一种“地中海特性”（Mediterranean identity），抑或强调地中海的某些自然特性塑造了人类经验（正如布罗代尔强烈主张的那样），这些做法都是很诱人的。<sup>1</sup>然而，这种对基本统一的追求始于一个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定居于其沿岸和海岛，以及穿越其海平面的民族的意义。我们应当注重多样性，而非追求统一性。在人类的层面上，这些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始终受到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外部影响，因而处于一种流变状态。从本书前几章描述的东西里岛的最早移居者，到西班牙海滨的带状发展，地中海沿岸地区为不同背景的民族提供了交汇点；这些民族利用地中海资源，有些时候还学会将产品从富饶之地运往贫瘠之地，并以此谋生。鱼类和盐是地中海的馈赠，这是古代罗马进行大量交易的两种商品，也是地中海大城市之一的威尼斯早期繁荣的基石。正如前言所述，渔民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极少的历史遗存，且他们追求的是海面以下的资源而非与地中海彼岸的地区建立联系。但也有显著的例外，它位于马耳他附近的狭窄通道：为了采集珊瑚，公元1540~1742年，热那亚人在突尼斯海岸的塔巴卡（Tabarka）建立了一处殖民地；也是在这里，现在突尼斯的渔民加入了西西里岛的“马坦萨”（*matanza*），即对金枪鱼的大规模季节性捕杀。由于鱼类只有腌制和风干后才能长久保存，所以粮食长期以来成为跨地中海的主要贸易产品，地中海沿岸

或黑海地区是最初的粮食产地，直至 17 世纪才慢慢为北欧地区所取代。粮食和其他原料的供给为城市兴起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古代的科林斯、雅典和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对于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而言，被敌人切断了必要的供给就意味着被扼杀。虽然小麦、木材和羊毛贸易不及香料贸易那样出名和富有魅力，记载也不够详细，但是这些贸易为丝绸、黄金和香料这些产自遥远地区的商品贸易奠定了基础。为了获取这些商品，竞争者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而满载货物的船只越是频繁往来于地中海，越有可能引起海盜们——古代伊特鲁里亚人、近代早期的柏柏尔人和乌斯科克人——的覬覦。

因此，维持海域内的安定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罗马通过一系列有力的军事活动打击海盜，从而统治整个地中海，进而保障了地中海的安全；在地中海航道无人做主的时期，商队可从诸如威尼斯穆达之类的军事护航队得到保护。位于北非海岸及其他地方的海盜国可能是统治者们为获得安全保障而希望进行谈判的对象，或与其签订条约，或武力对战，如美国在公元 19 世纪初所做的那样。当大的内陆帝国，例如古代的波斯帝国、14 世纪后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 18 世纪的沙皇俄国（它获取永久基地的努力失败了），扩张至地中海沿岸并开始介入航海活动时，地中海上的航运风险变得更大了。也许地中海内最卓越的扩张的例子就是大英帝国了，虽然它是一个不占有地中海海岸的王国，但由于其势力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苏伊士运河，能够对地中海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所以引起了地中海周边政权，尤其是法国的愤怒和嫉妒。本书既是一本有关冲突的历史，又是一本关于联系的历史。

必须将控制地中海理解为对横跨地中海的主要航道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基地是有必要的，这些基地可以为船只提供食物和淡水补给，还能派遣巡逻队抗击海盗及其他入侵者。因此，从很久以前起，近海诸岛上的定居点就为商人深入地中海冒险提供了重要补给。同样，海岸线的失陷则意味着难以获取建立舰队和商队所必需的木材及其他原料，对这一点埃及的统治者们的感受颇深。对地中海航路的控制因竞争对手对地中海海岸和岛屿的统治而变得异常困难。在罗马时期，单一的政治区域造就了单一的经济区域。当然，这也是特例。 648

地中海的历史也是那些政治隶属各异的港口的历史，来自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和居民在此聚集和交流。在本书中，一个屡被提及的港口城市是亚历山大。最初，它具有复杂的身份；直至20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兴起摧毁了地中海的国际化社区，亚历山大城才失去了这一身份。这些港口充当着一些思想观念包括宗教信仰的传播媒介，将希腊诸神传至伊特鲁里亚的塔尔奎尼亚，后来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的核心地区，每个港口都对地中海周边地域留下了显著的影响。

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个人往往具有远见卓识，亚历山大大帝和圣保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似乎一直都是男性。在性别成为历史问题讨论焦点的时代，人们也许会问：“地中海究竟有多男性化？”在公元11世纪埃及的犹太商人和12世纪热那亚的基督徒商人中，坐商也许是女性。尽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对于经商的态度各异，至少在那个时代，妻子不会随同丈夫参与贸易远行，而是任由他们逐利而行。在13世纪晚期的突尼斯，在热那亚人建立的贸易殖民地

644 中可以看到些许欧洲女性，她们主要为基督徒商团提供性服务。至于女性参与海战这一 21 世纪的现象尚未在地中海史的框架内被加以考察。但是在移民中——无论是圣奥古斯丁时期入侵北非的阿兰人和汪达尔人，还是 1492 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经常会出现大量的女性参与者（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甚至早期十字军军队中也存在许多贵族妇女及妓女。关于女性朝圣者的记载出现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前几十年里：4 世纪晚期的一则史料记载了一位来自高卢或西班牙北部的勇敢女性埃格利亚（*Egeria*）或埃特利亚（*Aetheria*）前往圣地的旅行。同样不甚清楚的是，以“海洋人”之名而为人知晓的青铜时代的入侵者是否有女性参与他们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乃至其他定居地域的活动；事实上，关于早期腓利士人放弃爱琴文明的合理解释是他们与迦南人通婚，接受了迦南人的神明并学习了迦南人的语言。然而，在地中海历史上，女奴这一群体有特殊的重要性，她们的境遇天差地别，有的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享有显著的权力，有的遭到了性剥削和性羞辱，还有的则在富有的罗马人别墅内从事下贱劳作。中世纪时，无论男女，许多这样的奴隶从黑海地区被掠来，然而在柏柏尔海盗的猖獗期（还有许多其他时期），沿海居民也面临着劫掠者恐怖的人口掠夺——基督徒从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沿岸被掠夺，穆斯林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海岸被掠夺。1543 年，当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允许土耳其人进入马赛并在土伦居住的时候，他们绑架了包括昂蒂布的修女们在内的诸多受害者。整个地中海的相对男性化值得思考——意大利人的“海”（*il mare*）是阳性的，法语的“海”（*la mer*）是阴性的，拉丁语的“海”（*mare*）则是中性的，而希腊人、伊

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的海神——波塞冬、弗福伦斯（*Fufluns*）和尼普顿——都是男性。

在那些横穿地中海的人群中，一般而言商人最多，这是有原因的。最浅层次的原因是，自腓尼基人将字母文字沿地中海传播开始，贸易者就已希望将自己的交易行为记录在册。所以无论是在罗马的普特奥利，或是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还是在现代的士麦那和里窝那，我们都对他们了解颇多。但是据定义，商人几乎均属于外乡人，为了寻找故乡没有的物品而远走他乡，跨越文化与地域的边界，接触诸多新的神明，听到许多别样的言语，当然有时也会在寻找家乡稀有物品时，将他们（及极少数的情况中的她们）自己置身于当地居民的尖锐批评之中。作为极有价值的外乡人，商人模糊不清的形象早已出现在了我们的最早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荷马不喜欢商人，对仅有的一些腓尼基商人更表露出轻蔑之态，认为他们惯于欺诈、胆小如鼠，但矛盾之处在于在奥德修斯的诡计中他们极为光荣；在某种程度上，从事交易这种不体面的事情所带来的虚伪之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古罗马时期荷马史诗的贵族读者们。然而，正是腓尼基人冒险探索到西班牙南部，并在靠近西地中海当地人口居住地但又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比较典型的是易于防守的近海岛屿，因为人们无法预料到和近邻能保持多久的友好关系。作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凭借自身的力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经济和政治力量，这座繁荣的城市成为新贸易网的枢纽、黎凡特文化和北非文化的世界性交汇点、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中心。尽管城中的精英阶层依旧称自己为“推罗人”，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在迦太基，希腊文化也受到欢迎，城中百姓视

腓尼基神麦勒卡特等同于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男神、女神和商人往返于古地中海之上。此外，出现在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人、希腊人——他们都带着独特的文化身份——促进了古朴的伊特鲁里亚农村向城市转变，城市中较为富裕者对舶来品有着强烈的渴望：希腊的花瓶、腓尼基的银碗、撒丁岛的铜像。我们也发现，除了前往直意大利寻找金属的商人们，还有很多匠人也旅居于西部“蛮族”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清楚，他们的技能在这些地方能让他们赚取比家乡更多的薪金。

在此后数世纪，情形依旧惊人相似。外族贸易者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拜访伊斯兰世界或拜占庭领土的商人会集中于一个小客店或商栈中，该商栈也兼有货栈、礼拜堂、面包铺和浴室的功能，每个小客店为每个主要“国家”而设：热那亚、威尼斯与加泰罗尼亚，等等。在此意义上，商人可能会成为宗教亵渎和政权颠覆的诱因，这使得埃及统治者下令在晚间将这些旅店反锁（钥匙由在店外的穆斯林持有）。这种做法增强了这些居住在一起的商人的团结和共存感；同时，当不同的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群体共同在竞争性的、善于剥削的埃米尔国家中生存时，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得到了突显。拜占庭人在公元12世纪时也将意大利商人隔离于高墙内，在首都培养仇外心理，这样做的可怕后果是迫害拉丁人的丑陋行径。然而，大约在1300年，当阿拉贡国王首次对马略卡岛的犹太人实施隔离政策时，将不同群体以墙壁进行分隔的想法就已不再是新鲜的东西了；到威尼斯当局在1516年建立“新隔都”将犹太人隔离开来，这种做法就已经十分受推崇了；这些商人的社群为隔都的建立提供了很有用的先例。在这些封闭的区域里，无论是犹太人聚集区，还



是欧洲商人的聚集区，自治、自由的宗教崇拜活动、赋税免除等权利都被加以限制，人们的自由活动受到约束，并需要依赖无常的公共权威来获得保护。

谈及犹太人，就是谈及一些在穿越文化边界方面有非凡能力的商人：在伊斯兰教早期，来自开罗的经冢犹太人开始崛起，建立了跨地中海以及超出地中海范围的广泛联系网；在加泰罗尼亚人商贸扩张的时期，为了寻找黄金、鸵鸟毛和其他非洲产品，他们中的少数人可以将其家庭和贸易联系扩展到同教的教友中间，并深入撒哈拉地区；而当时的基督徒依然被束缚于自己的贸易圈中，对这些物品鞭长莫及。关注一个表现突出、机动性强的少数群体是很有趣的。这些犹太商人可以带回关于地中海港口以外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被记载下来，且沿着欧洲的地中海海岸传播，进而促使著名的波托兰航海图和世界地图在中世纪晚期的马略卡岛出现。因为商人四处移动，全世界的地理环境信息也传播开来。

地中海是“信仰之海”这一概念引自近期一部论文集的标题，这里需要考虑在海上来往的人们不仅有穷人和无名流浪者，也有一些有魅力的使臣，如拉蒙·鲁尔。他逝世于公元1316年，生前写下数百部关于如何让穆斯林、犹太人和希腊人皈依真信仰的专著和短论。但必须要说的是，他从未使任何人改宗。<sup>2</sup> 鲁尔的职业生涯提醒我们，宗教的冲突与对抗只是整幅画面的一部分而已。他模仿苏菲派（Sufi）的韵句，并与卡巴拉派交往甚密。他是一个敏锐的使者，也是古老的伊比利亚“和谐共存”派的代表，他承认三个源自亚伯拉罕宗教的上帝是同一个唯一真主。与“和谐共存”理念不同的思想存在于一些宗教团体成员的脑海中，随着1492年西班牙明确了

它的天主教属性之后，他们被驱逐或被迫改宗：马拉诺、摩里斯科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可能在私下里还坚持其祖辈的信仰，但在公共场合被要求做一些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在近代早期，塞法迪犹太人在诸多方面的优越性着实令人惊讶。他们有获得和转变为不同身份者的能力——作为“葡萄牙人”，他们可以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作为犹太人则可以居住在里窝那或安科纳。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跨越文化、宗教和政治的边界，就像在六个世纪前生活于开罗的经冢犹太先人一样。他们的多重身份是范围更为广阔的地中海现象中的一个极端例子：不同的文化会在一些地方交汇和融合，而他们反映了不同的身份在个体身上的交汇和融合，通常来讲这的确不易。

当下存在一种将地中海作为交融中心的浪漫化倾向，这无可厚非，但近代早期跨地中海交流的黑暗史实也应当被铭记于心：公元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柏柏尔海盗的猖獗，使劫掠与贸易紧密结合。在柏柏尔海盗被镇压之前，地中海航行只有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由于罗马对地中海沿岸及其岛屿的完全统治）才真正免于海盗威胁。但是，海盗揭示了一些多重身份最为显著的事例：一些来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海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伊斯兰教，前去掠夺自己祖国的船只。地中海历史的这一黑暗面还包括已经提到的被海盗劫掠的男女奴隶和俘虏，尽管他们就像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一样，在地中海两岸的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

地中海历史的统一性矛盾地依赖于它旋涡式的易变性，依赖于商人和流放者的流动，依赖于那些匆匆忙忙要尽快横跨地中海的人们——他们并不希望像遭受长久折磨的朝圣者伊本·居巴尔和菲力克斯·法贝尔一样滞留海上，尤其在航行变得危

险的冬天。地中海两岸离得足够近，建立联系很容易；地中海两岸又隔得足够远，让各个社会能够在与内陆腹地的相互影响下保持独立发展。那些横跨地中海的人往往并不是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代表者。如果他们在出发远航时不是外乡人，那么在他們渡海进入不同的社会之后，他们也会变成外乡人——或是贸易者，或是奴隶，或是朝圣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对这些不同文明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他们将某一个大陆文化的某些因素引入另一个大陆。因此，地中海可能是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最为频繁的地域，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海域。

## 注 释

1. E. Paris, *La genèse intellectuelle de l'œuvre de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21-1947)* (Athens, 1999), pp. 315-16, 323.
2. A. Husain and K. Fleming (eds.), *A Faithful Sea: 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1200-1700* (Oxford, 2007).

## 扩展阅读

649

此书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此篇简单的记录只指出了一些将地中海视为整体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强调的更多是周边的陆地而非地中海本身。佩里格林·霍尔登（Peregrine Horden）和尼古拉·柏塞尔（Nicholas Purcell）的《被腐蚀的海：一部地中海的历史》（*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2000）是关于地中海周边区域及它们间的相互作用的宏大且资料丰富的第一部著作。它着眼于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一部由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主编的有价值的论文集《对地中海的反思》（*Rethinking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 2005）也思考了他们的结论。沙恩·雷诺兹（Sian Reynolds）翻译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 London, 1972-3），塑造了整整一代人对中世纪晚期和早期近代地中海的研究。布罗代尔的思想世界在帕里斯（E. Paris）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之〈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23~1947年）的智力创新》[*La genèse intellectuelle de l'œuvre de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1923-1947)*, Athens, 1999] 中获得了很好的解释。对于地中海历史的更深入探索是瓜拉奇诺（S. Guarracino）的《地中海：布罗代尔著作中的想象、故事及理念》（*Mediterraneo: immagini, storie e teorie da Omero a Braudel*, Milan, 2007）。关

于1350年到1900年地中海经济和生态变化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见塔巴克（F. Tabak）《1550~1870年地中海世界的衰微：历史地理学的视角》（*The Wan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1550 - 1870: a Geohistorical Approach*, Baltimore, MD, 2008），尽管这一时间跨度与其标题中的并非一致。关于地中海的环境，格罗夫（A. Grove）和拉克姆（O. Rackham）的《地中海欧洲的自然环境：一部生态史》（*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 an Ecological History*, New Haven, CT, 2001）特别有意义且引人深思。在具有布罗代尔传统的作品中，有一部较为简短但很重要，即普赖尔（J. Pryor）的《地理环境、科学技术和战争：地中海海洋史研究，649~1571年》（*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 - 1571*, Cambridge, 1988）。

除哈里斯的论文集外，其他论文集还有：我自己编写的 650  
《历史上的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同时有法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和希腊文版本），其中有托雷利（Torelli）、巴拉尔（Balard）、格林（Greene）和其他许多人写的精彩章节。卡尔庞捷（J. Carpentier）和莱布伦（F. Lebrun）的《地中海历史》（*Histoire de la Méditerranée*, Paris, 1998）主要关注近代，但也包含了一些生动的原始资料。关于宗教问题，可见侯赛因（A. Husain）和弗莱明（K. Fleming）所著《信仰之海：地中海宗教文化，1200~1700年》（*A Faithful Sea: 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1200 - 1700*, Oxford, 2007）。对某些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有考恩（A. Cowan）的《地中海城市文化，1400~1700年》（*Mediterranean Urban Culture 1400 -*

1700, Exeter, 2000), 其中有萨克拉里乌 (Sakellariou)、阿贝尔 (Arbel)、阿梅朗 (Amelang) 及其他人的文章; 以及富萨罗 (M. Fusaro)、海伍德 (C. Heywood) 及奥马里 (M. S. Omri) 编写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London, 2010)。还有一部由米里亚姆·库克 (Miriam Cooke)、古克纳尔 (E. Göknar) 和帕克 (G. Parker) 编写的英文资料集《地中海航线: 从狄多到德里达》(*Mediterranean Passages: Readings from Dido to Derrida*, Chapel Hill, NC, 2008)。

更受欢迎的关于地中海的描述经常是有插图的著作, 包括: 萨拉·阿伦森 (Sarah Arenson) 的《环形之海: 地中海航海文明》(*The Encircled Sea: the Mediterranean Maritime Civilisation*, London, 1990), 它充分利用了海洋考古研究的成果; 以及大卫·阿腾伯勒 (David Attenborough) 的《第一个伊甸园: 地中海世界和人》(*The First Ede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d Man*, London, 1987), 它的真正精彩之处是插图。以上两本书都以电视系列片为基础。地中海的迷人之处在马特维耶维奇 (P. Matvejević) 的《地中海: 一处文化景观》(*Mediterranean: a Cultural Landscap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1999) 中得到了展现。约翰·朱利乌斯·诺维奇 (John Julius Norwich) 的《中间之海: 地中海的历史》(*The Middle Sea: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2006) 离海岸太远, 并不是他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曼塞尔 (P. Mansel) 的《黎凡特: 地中海的光彩和灾难》(*Levant: Splendour and Catastrophe o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2010) 关注的是不同

族群和宗教共存时的士麦那、亚历山大和贝鲁特。

关于整个地中海的游历见闻，有文笔极好的保罗·泰鲁（Paul Theroux）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地中海大环游》（*The Pillars of Hercules: a Grand Tour of the Mediterranean*，London，1995），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的《地中海海岸》（*On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London，1984），以及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的《内海：地中海和它的人民》（*The Inner Sea: the Mediterranean and Its People*，London，1991）。最后，任何迷恋于地中海的人都不会忽视伊丽莎白·戴维（Elizabeth David）的作品《地中海食物》（*A Book of Mediterranean Food*，London，1950），以及记录地中海饮食的克劳迪娅·罗登（Claudia Roden）更近时的著作《地中海烹饪》（*Mediterranean Cookery*，London，1987）。

# 译后记

英国学者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中文版在诸多同人和朋友的关注下，在翻译团队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问世了。

本书的翻译历时近三年，主要译者有（按所译章节先后排序）：李继荣（导言、第一部、第二部第一章至第八章）；徐家玲（第二部第九章、第十章，第三部）；郭云艳（第四部）；张书理（第五部）。徐家玲负责统校全书。在专业术语面，译者基本参照以往西方历史著述中的译法，但也对某些词做了不同处理。

首先是 *tribe*、*race*、*nation*、*people* 的翻译。在以往著述中，*nation* 一词常被译为“民族”，以指代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出现的讲不同语言、居住区相对集中、有相对集中的国家管理机构，以及共同经济、政治生活的人群。但对于古代人群而言，这种译法并不适合，于是本书中做了区别描述和个别调整，在描述古代 *nation* 时多用“族群”概言之，而谨慎使用“民族”这一译法。*Tribe* 是部族，*race* 为种群、种族，自然没有疑问。而 *people* 一词则比较抽象，如第一部分第四章章名“*Sea Peoples and Land Peoples*”中 *people* 译为“民族”显然不合理，用“族群”也不甚贴切，于是本书把群的概念抽象化，把章名译为“海洋人和陆地人”。

在述及埃及犹太人埋经处的文献 *Genizah* 时，本书没有使用国内通行译法“戈尼萨”（例如见夏继果先生所译《作为全



球史的地中海史》), 而是意译为“经冢”。根据犹太教律法的规定, 这些文献通常含有神圣的名称和一些犹太人视为禁忌的符号, 因此即使是废弃的文献也不可玷污, 于是犹太商人将其束之高阁, 而不是焚毁。故译者认为将该词译为“经冢”更为贴切。

对于描述古希腊人的 *Hellas* 一词, 尽管它在现代希腊语语境中指的就是希腊人, 但本书还是遵从希腊史专家的惯常处理方法, 将其译为“赫拉斯”。而 *Greece* 源自意大利半岛足根处希腊移民区的拉丁称呼, 当代希腊人对此其实并不认同。

值得关注的还有通常被译为“僭主”的 *despot*。它的本意是君主, 即一个小型政权的专制者。使用“僭主”这一译名, 其实是为了避免在描述希腊古代政权统治者时出现“专制”字样, 以“褻渎”传统上人们向往的希腊古代民主政治。但这个名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它在古希腊指小邦君主; 在中世纪一些独立城市中可以理解为城主; 而在拜占庭分崩离析的后期态势下, 通常指获得一片封土的亲王或王子。本书在涉及该词时, 通常根据不同的时代做出相应处理。

本书不仅包含历史叙述, 还涉及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甚至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其涉及时段跨越数万年, 从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出现一直到 21 世纪地中海金枪鱼濒临灭绝, 而关于地中海地理形成机制的描述更是属于地球史领域。坦言之, 翻译此书对于涉足“世界史研究”不足百年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严峻挑战。译者虽然尽力以信、达、雅为宗旨, 但仍有学

力和文才不逮之处，因此译本难免存有遗憾。在此恳请各界读者谅解，并从自己的特长领域出发提出善意批评，以资日后改进。

徐家玲

于长春净月东师家园

#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本书页边码)

- Abano 632  
Abbasids 263  
Abdülhamid II, Ottoman sultan 568  
Abi-milki 66  
Aboukir Bay 518  
Abraham of Saragossa 248  
Abulafia, Abraham ben Samuel 342  
Abulafia, Haim 480  
Abulafia, Solomon 593  
Abyssinia 601  
Acciaiuoli Bank 375  
Aciman, André 590  
Acre 55, 291, 300, 310-11, 325-6, 327,  
331, 349, 616  
fall of (1291) 354  
Military Orders of the Temple and  
Hospital 326  
Actium 198  
Adams, John Quincy 536  
Adria 117  
Adrianople 482  
Adriatic Sea xxiii, xxx, 13, 98, 117-18,  
126, 237, 385, 448  
and marshlands in the eighth century  
251-4  
Turkish ships in 456  
Venetian-Genoese clashes in 377  
'Venetian Gulf' 358  
in World War I 580-81  
Aegean  
Bronze Age 16-22, 27-8  
Byzantine 246  
Crete *see* Crete  
Cyclades *see* Cyclades  
eastern 163  
Euboea *see* Euboeia; Euboians  
Genoese control of 354  
grain sources 140  
Greek civilizations *see* Greek  
civilizations/cultures  
Levantine trade network 35  
Mesolithic 7  
northern 44, 135, 143  
pottery 20  
Rhodians and the Aegean islands 163  
Sea xxvii, 18, 27, 147, 365, 439;  
defended against the Persians  
136-7;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7  
southern 16, 539  
struggle of islands against the Persians  
132  
trade routes 17, 22, 44  
Turkish assaults on Venetian naval  
bases in 385  
'Tyrsenians' *see* 'Tyrsenians'  
Upper Palaeolithic 7  
western 87  
*see also specific islands*  
Aelia Capitolina 216  
*see also* Jerusalem  
Aeneas 74, 86, 189-90  
*Aeneid* (Virgil) 74  
Aeschylus 132-3, 137, 160  
Aetheria 644  
Aetius, Flavius 223, 232  
Aetolian League 188  
Aetos 87

- Africa, North *see* North Africa  
 Agamemnon 45, 47, 565  
 Agathokles 173, 174  
 Agde 126  
 Aghlabid emirs 250  
 Agnon, Shemuel Yosef 593  
 agriculture  
     and the Black Death 367, 368–9  
     and economic complexity 227  
     grain trade *see* grain trade  
     kibbutz movement 592  
     Neolithic 8, 9, 14  
     North Africa 203–4  
     over-exploitation of soil 234–5  
     vineyards *see* vines/vineyards  
 Ahhiyawa 44  
 Ahiram, King, coffin 80  
 Ahmad ibn Hassan 309  
 Ahmet Pasha, Fazil 481  
 Ahmet Pasha, Gedik 387  
 Ahura Mazda 135  
 Aï 58  
 Aigina 111, 143, 236  
 Aigospotamoi, battle of 147  
 Aigues-Mortes 358, 397  
 air travel 634, 637  
 Ajaccio 515  
*Akdeniz see* White Sea  
 Akhenaten, Pharaoh 37  
 Akra Leuke 185  
 Akragas 167, 172, 173, 179, 186, 187  
 Akrotiri 27  
 al-Mahdiyyah *see* Mahdia  
 al-Mina 46, 91, 96  
 Alaksandu, king of Wilusa 44–5  
 Alalakh 46  
 Alalia 114  
 Alamanno da Costa 328  
 Alans 223, 230, 231  
 Alaric the Goth 223  
 Albania 55, 283, 350, 385, 391, 577, 613,  
     614–15  
     and China 623  
     Italian invasion of 602–4  
     tourists 636  
 Albertini tablets 232  
 Albigensian Crusade 335  
 alchemy 481  
 alcohol  
     and the tourist industry 636–7  
     wine *see* wine  
 Alcol 351  
 Aleppo 327, 367  
 Alexander I of Russia 520–21, 523  
 Alexander the Great 68, 149–52, 153, 159,  
     174, 643  
 Alexander/Alexandros (Paris) 44  
 Alexandria xxxi, 38, 149–64, 197, 198,  
     204, 236, 305–6, 569, 643  
     attack by William II 323  
     British bombardment of 555  
     British fleet at 605  
     bubonic plague 368  
     Catalans in 345  
     Church of 255  
     cosmopolita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589–92  
     cult of Sarapis 154  
     Delta settlement 153  
     French in 606, 609  
     grain trade 157, 158–9  
     Greeks in 589–90  
     Jews 153, 161, 162, 215, 218, 224,  
         590–91  
     Library 159–61, 197  
     lighthouse of 154–5, 305, 309  
     medical tradition 162  
     Mouseion 159, 160  
     and Peter I of Cyprus 359  
     Ptolemaic 152–4, 155–62  
     reconstituted from 1956 as a Muslim  
         Arab city 600  
     and Rhodes 157, 163–4  
     science 162  
     and the Septuagint 161–2  
     trade with India 158, 207  
     travel accounts of 256, 309–10  
     and Venice 255–6, 292  
     Victoria College 591  
 Alexios I Komnenos 283, 284–5, 293  
 Alexios IV Angelos 330  
 Alfonso I, 'the Battler' of Aragon 335

- Alfonso IV of Aragon 361  
 Alfonso V, 'the Magnanimous' of Aragon  
   381-4, 398, 401, 402  
 Alfonso X of Castile 340  
 Alfonso XI of Castile 364  
 Alfonso XIII of Spain 580  
 Algeciras 97, 364  
 Algeria 528, 617-18  
   and the French 530, 540-41, 573-4,  
   621-2  
   Jews 531, 573-4  
   Operation Torch (World War II) 609  
 Alghero 275  
 Algiers 416, 417, 423, 461, 493  
   and America 533, 535-6  
   dey of 528, 531, 535, 540  
   and the French 573  
   French conquest of 540-41  
   in World War II 609-10  
 Ali Pasha of Ioannina 518, 525  
 Alicante 465  
 Alkibiades 145-6  
 Allatini family 570, 571  
*Allegheny*, USS 535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AIU) 570,  
   574, 585  
 Alma-Tadema, Lawrence 563-4  
 Almería 368, 393  
 Almohads 296, 298, 299, 310, 322, 332  
   disintegration of Almohad power 334  
   Ibn Jubayr 307-15  
 Almoravids 298, 336  
 Almuñécar 78  
 alphabet 36, 64  
   carried by Euboians 93  
   Etruscan 93, 110  
   Iberian 129  
   Phoenician 80, 644  
 alum 297, 347, 358, 366, 392-3  
 Alva, duke of 447  
 Amalfi 246, 256, 267-70, 294-5, 301,  
   316  
   merchants 294-5  
 Amaranthus 218-19  
 Amaury, king of Jerusalem 324  
 amber 34, 91, 122, 285  
 America *se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hens 3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529  
 Amiens, Peace of 521  
 Amnisos 25  
 Amos 57-58  
 'Amr ibn al-'As 244, 549  
 Anatolia xxix, 8, 9, 83  
   Anatolian refugees in Salonika 598  
   Bronze Age 22, 34, 44-5  
   coast of Asia Minor 9, 27, 44, 96, 116,  
   123, 141, 161, 163, 202, 347, 358,  
   364-5, 384, 585  
   Hittites *see* Hittites  
   and the Mycenaean 44-7  
   pottery 20  
   'purification' of 583  
   trading network 55  
   Troy *see* Troy  
   Turks in 364-5, 366  
 Anaxilas of Rhegion 115  
 Ancona 300, 436-8, 440, 442-3, 518  
*Ancona* (Italian ship) 582  
 Andalucía 127, 129, 130, 453, 630  
 al-Andalus (Islamic Spain) 250, 258, 261,  
   263, 264, 306, 308, 476, 630  
 Andronikos I Komnenos 324  
 Andronikos II Palaiologos 354  
 Angevins 349-52, 353, 357, 360, 365, 401  
 Anghelu Rujù 119  
 Anglicanism 501  
   Anglican churches, Minorca 500  
 Anglo-French Dual Control Commission  
   554-5  
 animal hides *see* hides, animal  
 animal husbandry Neolithic 8  
 Anitta 22  
 Annaba 541  
*Annales* school xxvi  
 Anne, Queen 497  
 Ansaldo de' Mari 349  
 Antibes 422, 644  
 Antikythera 162  
 Antioch 288-9, 290  
 Antium (Anzio) 175  
 'Antonius Maximus' 209  
 Antony, Mark 197-8

- Antwerp 463  
 Anzio 175, 611  
 Aphrodite 221  
*apiru* 48, 58  
 Apollo 138  
 Apollonia 117  
 Apollonios, administrator of Ptolemy II  
     157  
 Apollonios of Rhodes 160–61  
 Apuleius 199  
 Apulia 283, 288, 301, 322, 373, 387, 388  
     grain 351, 357, 358  
     tourism 637  
     trade with Dalmatia 389  
     Turkish raids 387  
     and the Venetians 388  
 Arab Higher Command 616  
 Arabs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 243–51  
     capture of Carthage 246  
     and Charlemagne 249–50  
     coinage 255, 257  
     conquest of Egypt 245; 1952 revolution  
         617  
     conquest of North Africa 245–6  
     early Arab expansion after death  
         of Muhammad 245  
     invasions xxix, 161, 234  
     Islam *see* Islam  
     of Jaffa 593, 594, 600  
     Muslim merchants 257, 258, 261–2,  
         266, 296, 404, 453, 457, 465  
     Muslim naval power/piracy 249,  
         250–51, 268, 278–9, 402, 414,  
         423–4  
     and Nasser 618–19  
     in Palestine 592, 594, 595, 616–17  
     revolt in the Great War 592  
 Aragon 335, 351  
     and Castile 398, 408–10  
     kings of 334–5, 338–41, 344, 345,  
         351, 353, 361–2, 364, 376, 379,  
         381–4, 387, 398–9, 401, 405,  
         420, 646  
     Moriscos of 475  
 Aragonese 351, 352, 364, 365  
 Angevins and 351–2  
 Catalan-Aragonese commonwealth  
     353, 361–3, 381, 404, 409  
 Inquisition 405–6  
     rule over Naples 401, 409  
     *see also* Aragon  
 Arborea 361–2  
 Archidamian War 143  
 Archimedes 152, 162, 187  
 Arganthonios 79  
 Arginoussai 147  
 Arians 220, 230, 231–3  
     Ostrogoths 233  
 Ariminum 177  
     *see also* Rimini  
 Aristarchos 162  
 Aristonothos 104, 109  
 Aristophanes 95, 130, 139  
 Aristotle 98  
 Arkadi monastery 485  
 Arkhanes 28, 29  
 Arles 250  
 Armenia, Cilician 359  
 Armenians 198, 583, 584, 586, 587  
 Arno, river xxvii, 271–2, 464  
 art  
     Athenian 105–6  
     Byzantine influence on Italian art 332  
     cave paintings 4, 5–6, 7  
     Cretan fresco painting 37  
     Cycladic 17–18  
     Egyptian 37  
     Etruscan 100, 103, 111, 112  
     Greek 89, 167, 562–3  
     Hellenistic styles 152  
     Iberian 129–30  
     Ionian 112  
     in Majorca 399  
     Minoan 36, 37  
     Phoenician 69  
     of Ugarit 36  
     *see also* pottery/ceramics  
 Artemisia, wife of Meletius 223, 225  
 Arzawa 104  
 Ascalon 292–3  
 Ashdod 55, 56, 57  
 Ashkelon 56  
 Ashkenazi Jews 592, 593, 599

- Asia Minor *see* Anatolia
- Asquith, H. H., 1st Earl of Oxford and Asquith 578
- Assurnasirpal 69
- Assuwa 45
- Assyrians 63, 66, 68, 69, 70, 132
- Astarte 70, 111, 130
- Aswan High Dam xxix, 618
- asylum-seekers 629
- Atatürk, Mustafa Kemal 583, 585, 586, 587
- Athena 221
- Athenaios of Naukratis 116
- Athenians 22, 25, 53, 83
- Archidamian War 143
- Athenian empire 138, 139, 140, 143
- attacks on Syracuse 115, 146
- and Carthaginians 167, 173
- communication channels 116–17
- and the Delian League 139
- grain trade 139–40, 146, 147–8, 158, 172–3
- klerouchoi* 139–40
- navy 115, 142, 146, 147
- Peloponnesian War 133, 141–8
- and the Persians 133, 136–7
- pottery/ceramics 96, 101, 105–6
- and the Ptolemies 160
- and Sicily 144–6
- trade routes 116–17, 141
- see also* Athens
- Athens 25, 53, 55, 89, 131, 138–44
- attack by Roger II 319
- and Carthage 167, 173
- decline during sixth century 236
- and Delos 164
- and Euboia 140, 141
- people of *see* Athenians
- Persian sacking of 136
- plague 144
- Romans and 164
- Royal Navy's blockade of 564
- Athos 107
- Atlantic economy 440–41, 453–4, 505
- Atlantic Ocean xxvii–xxviii, 71, 347, 411, 440, 454
- trans-Atlantic trade 411–12
- Atlas 126
- Atrani 268
- Atreus, Treasury of 563
- Attaleia 195
- Attarssiya 44
- Attic pottery 113, 126
- Attika 17, 137, 139
- Atys, king of Lydia 101
- Augustine of Hippo 218, 229–30, 231
- Augustus Caesar 199, 200, 207, 210
- Octavian 197, 198–9, 208
- Aurelian 200
- Auschwitz 599
- Australians, Gallipoli campaign 579
- Austria 600
- people of *see* Austrians
- Austrian Lloyd 556, 557, 560, 561
- Austrians 456
- in Bosnia 571
- and Greeks 539
- Habsburgs *see* Habsburgs
- in Italy 601
- and Montenegro 581, 582
- and Ottomans 539
- and Venice 519, 557, 558
- war fleets 539, 558, 578, 580–82
- World War I 581–2
- see also* Austria
- autarchy 7
- Avaris 38
- Avars 252
- Avienus 127–8
- Axis powers 605, 606–11
- Aydhah 296
- Aydin 365, 366, 384
- Ayia Napa 636
- Ayia Photia 16–17
- Ayyubids 296–7, 325, 329
- Azores 393, 620
- Baal Hamon 184
- Baal worship 70, 81–2
- Babylon 134
- Bacchiad dynasty 97–8
- Bacri family 531, 535, 540
- Badoglio, Pietro 603, 611

- Baetica 230  
 Balagne 515  
 Balawat gates 69, 73  
 Balbi di Correggio, Francisco 431-2, 433, 434  
 Baldwin I of Constantinople 330  
 Baldwin I of Jerusalem 291  
 Balearic islands 14, 194, 232, 235, 246, 249-50, 339, 417, 604  
*see also* Ibiza; Majorca; Minorca  
 Balfour Declaration 592  
 Balkans 383, 384, 385, 391, 437  
 Franco-Turkish alliance in 421  
 Ottomans in 414, 421  
 silver 98  
 trade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437-40  
 Baltharpe, John 462-3  
 Baltic 520  
 economy 505  
 grain 440, 466  
 Banco di Roma 576  
 Banco di San Giorgio 392  
 bankers  
 Florentine 351  
 Greek 207  
 Rhodian 164  
 Sulpicii of Puteoli 206  
 banks 392, 400, 556, 576  
 Florentine 375  
 international 375-6  
 Banu Hillal 279  
 Banu Sulaym 279  
 Bar 581  
 Barbarigo, Agostino 450  
 Barbarossa, Frederick 300, 302  
 Barbarossa, Hizir/Khizir/Hayrettin 415-18, 419-20, 421-2  
 Barbarossa, Uruij/Oruc 415-17  
 Barbary corsairs 414, 415-18, 419-20, 421-2, 423, 452, 493, 498  
 and America 529, 530, 532-6  
 Barbary states 434, 471, 492, 528-36  
 and America: the Barbary Wars 529-36  
 corsairs of *see* Barbary corsairs  
 regencies 500, 528, 532; *see also* Algiers; Tripoli; Tunis  
*see also* Algiers; Maghrib; Morocco; Tripoli; Tunisia  
 Barcelona xxxi, 128, 202, 304, 325, 334, 335-7, 340, 341, 342, 346, 358  
 attacks on Jews 405  
 Biga 399, 403  
 and the Black Death 368  
 Busca 399, 403  
 business elite 400  
 and the Catalan civil war 401  
 French in 441  
 and Genoese 441  
*llojta* 399, 400  
 merchants/shipowners 345  
 shipbuilding 441  
 shipping 400-401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41  
 trade with Catalonia 401  
 and Valencia 403-4  
 Barcelona Process 639  
 Barcids 184  
 Bardi Bank 375  
 Bari 250, 251, 278, 281, 283, 292, 305  
 bashaws 528, 529, 531, 534  
 Battifoglio, Pietro 299  
 beachwear 635-6  
 Beatrice de Luna (Gracia Mendes/Gracia Nasi) 441-2, 443, 444  
 Bedouins 279  
 Beirut 359, 400, 616, 617  
 Belasyse, John, 1st Baron 493  
 Belisarios 235  
 Bellini, Gentile 388  
 Ben Ezra synagogue, Cairo 258-9  
 Ben-Gurion, David 595, 619  
 Benedict XIII 405  
 Benedictines 269  
 Montecassino 269, 274  
 Benevento 295  
 Benjamin of Tudela 304-7, 335  
 Berab, Jacob 407  
 Berbers 75, 166-7, 374, 411, 472  
 Barbary corsairs *see* Barbary corsairs  
 Islamization of 245-6  
 Marinid 334, 347, 363-4  
*see also* Libyans  
 Bergamo 413



- Betsy* (US ship) 533  
 beys 528, 529  
 Bible 52, 66–7, 69, 79–80, 134  
     account of Paul's winter voyage to  
         Rome 202–3  
     Greek version 153  
     Ladino Bible of Ferrara 442  
     and the migrations of the Sea Peoples  
         56–58  
     Muslim view of 244  
     Septuagint 161–2  
*Biga* 399, 403  
 bikinis 635–6  
*Birgu* *see* Vittoriosa  
*Bizerta* 610  
 Black Death/bubonic plague 59, 144, 234,  
     238, 366–9, 377, 500  
     blamed on Jews 404–5  
     changes after 373, 389, 396, 399, 401,  
         404, 411  
 Black Sea xxiii, xxvii, 17, 86, 140, 285,  
     355  
     and the British 557  
     Celtic and Scythian invasions of area  
         158  
     Genoese control of 354  
     grain traffic 140, 355, 511; and  
         bubonic plague 368  
     Mycenaean contact with 33  
     and the Napoleonic Wars 522–3  
     and the Russians 505, 508, 510, 511,  
         519  
     slaves 349, 355, 373–4, 644  
     trade routes 227, 355, 508, 557  
*Blakeney, William, 1st Baron, Lieutenant-*  
     *Governor of Minorca* 503  
*blancmange* 404  
*Blegen, Carl* 19, 20  
*bluefin tuna* 640  
*Boabdil, king of Granada* 408  
*Boardman, Sir John* 125  
*Bocche di Cattaro* 581  
*Bocchoris, Pharaoh* 93  
*Bodrum* 386  
*Bogomils* 332  
*Bohemond I of Antioch (Bohemond of*  
     *Taranto)* 283, 284, 288–90  
*Bolaffio, G. V.* 560  
*Bologna* 108, 116  
     *see also* Felsina  
*Bombay* 491  
*Bonaparte, Napoleon* *see* Napoleon I  
*Bonaventura* (Italian ship) 346  
*Boniface of Montferrat* 330  
*Bonifacio* 329  
*bora* xxviii, xxix, 456  
*Boreas* xxix  
*Borel, Lavalley and Company* 551  
*Bosnia* 449, 571  
*Bosnia-Herzegovina* 440  
*Bosphorus* 158, 376, 505, 508, 511, 518,  
     568, 580  
*Boston Tea Party* 530  
*Botero, Giovanni* 453  
*Bougie* 303, 344, 345, 409  
*Bourbon, Philip de* *see* Philip V of Spain  
*Bragadin, Marco Antonio* 448, 449  
*Braudel, Fernand* xxv–xxvii, 439–40, 449,  
     451, 465, 641  
*brazilwood* 301, 374  
*Brignole Sale, Antonio Giulio* 469  
*Brindisi* 205, 388, 582  
     *Brundisium* 186  
*Brinton, Jasper* 589  
*Bristol, Admiral Mark L.* 586, 587, 588  
*Britain/the British*  
     aeronautical industry 634  
     in Alexandria 555  
     choice of Mediterranean ports xxx–  
         xxxi  
     contraction of control in Mediterranean  
         617–18, 619, 622–7  
     and Corsica 514–15  
     and Cyprus 567, 568, 605, 623–4, 628,  
         633  
     decolonization 622–5; and Gibraltar  
         625–7  
     and Egypt 550, 554–5, 579, 619  
     England *see* England  
     the English *see* English  
     and the French 606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513–16  
     and Gibraltar 605, 625–7

- and the Greeks 564, 586–7
  - imperial expansion within the
    - Mediterranean 642
  - and the Italians 607
  - and Malta 519, 520, 525, 607–8, 622–3
  - 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World War II 605–12
  - and Minorca 498–503, 514
  - Napoleonic Wars 522, 524–6
  - and NATO 620
  - navy/fleets *see* Royal Navy
  - and the Ottomans 525, 538–40, 568, 578–80, 585
  - and Palestine 592, 616–17, 619
  - and the Russians 504–6, 509–10, 515, 522, 523, 612
  - in Salonika 598
  -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501–3
  - and Sicily 525–6, 607
  - and Smyrna 585–6, 588
  - steam shipping 557
  - and the Suez Canal 550, 553, 554–5, 605, 619
  - tourists 633, 634
  - and the US 529–30, 535, 536
  - World War I 578–80, 582
  - World War II 605–12
  - Broecke, Bernard van den 467
  - Brogie, Victor-François, 2nd duc de 505
  - bronze 12, 17, 19, 94
    - Alexandrian 156
    - Etruscan bronzes 124
    - gates of Balawat 69, 73
    - serpent from Delphi 132
    - Villanovan 108
    - weapons 12, 17, 20, 32, 109
  - Bronze Age
    - Early 9–10, 15–23
    - Late 27–8, 29–41, 42–6, 47, 48; Sea Peoples 42, 49–54, 55–59, 66, 644
    - Melos obsidian 9–10
    - metal work 10
    - Middle 24–6
  - Bruges 347
  - Brundisium 164
    - see also* Brindisi
  - Brutus, Marcus Junius 197
  - bubonic plague *see* Black Death/bubonic plague
  - Bulgaria 355, 439, 599
    - people of *see* Bulgarians
  - Bulgarians 329, 330
    - and Salonika 571
    - see also* Bulgaria
  - Burchard (Frankish admiral) 250
  - burial practices 10–11, 15, 16, 81, 108
    - Iberian 129
    - at sea 312
    - see also* cremation; funerary rites; tombs
  - Busca 399, 403
  - Byblos 35, 37, 39
  - Byng, Admiral John 501, 502–3
  - Byron, George Gordon, 6th Baron 564
  - Byzantine Christianity 162
  - Byzantine Empire/Byzantium 234, 246, 319
    - economy 238, 285, 294
    - fracturing in late twelfth and early thirteenth centuries 329–30
    - and the Franks 251–4
    - integration process 241
    - and Islamic conquests 243–51
    - jihad* against 366
    - under Justinian I 234–8
  - Komnenos dynasty *see* Komnenos dynasty
  - loss of trans-Mediterranean contact 241–2, 256–7
  - navy/fleets 233, 235, 249, 251, 324
  - and the Normans 281–4, 288–9, 319, 322, 323–4
  - and Sicily 235, 242, 265
  - and the Slavs 234, 236, 241–2
- Byzantium 147, 227
  - see also* Constantinople
- Cádiz 66, 72, 78, 126, 465–6, 489, 525
- Caere 94, 104, 108, 111, 112, 170, 175
- Caeretans 114
- Caesar, (Gaius) Julius 194, 197
- Caesarea 210, 291
- Café Pastroudis, Alexandria 591

- Caffa 355, 367–8  
 Caffaro di Rustico da Caschifellone 290  
 Caffé degli Specchi, Trieste 560  
 Cagliari 122, 275, 462, 611  
 Cairo 324–5  
   ‘Babylonia’ 291  
   Fustat 258–60, 263, 270  
   Genizah Jews 258–9, 262, 263–4, 266,  
     279, 295–6, 646  
 Cairo Genizah collection 258–9, 260–61,  
   265, 281, 296  
 Calabria 272, 279, 283, 313, 414  
 Caligula, Gaius 205, 215  
 Calvi 382  
 Cambyses 134  
 Camões, Luis de 396  
 Canaan 35, 37, 48, 49, 57, 58–59  
   *see also* Palestine  
 Canaanites 80–81, 644  
   language 36, 65, 644  
   Philistines *see* Philistines  
   Phoenicians *see* Phoenicians  
   poetry 80  
   religion 57, 65–6, 644  
 Canaries 348, 393, 411, 634, 637  
 Candia 331, 484, 485  
 Cannae 186  
 Cannes 632  
 cannibalism 28  
 Cantabrians 396  
 Cape Verde islands 393  
 Caphor 56–57  
   *see also* Crete  
 Capitulations (trade treaty) 422  
 Capsian culture 7  
 carbon emissions 637  
 Caribbean islands 411  
*Carmen in victoriam Pisanorum* 280  
 Cartagena (New Carthage) 185, 187  
 Carthage 68, 72, 74–6, 77, 90, 114, 227,  
   228–9, 645  
   Arab capture of 246  
   and Athens 167, 173  
   Byzantine recovery of 235, 236  
   *Colonia Iulia Concordia Carthago* 210  
   as a cosmopolitan city 171  
   destruction of 165, 177  
   people of *see* Carthaginians  
   and the Persians 135  
   and the Ptolemies 157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Vandal conquest of 230–32  
 Carthaginians 70, 72, 74–6  
   and Athenians 167, 173  
   child sacrifice 81–2  
   and Corinthian pottery 96  
   and Iberians 128, 130–31  
   invasion of Sicily 137, 166–74  
   massacre of Motya 170  
   and Massaliots 124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6  
   pre-Punic War battles with Romans 175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rise of Carthaginian empire 166–7  
   in Sardinia 77, 122  
   Segestan appeal to 166  
   and the Selinuntines 166, 167  
   trade and settlement along coast of  
     Spain 126, 127–8  
   trade with Corinthians 97  
   trade with Etruscans 101, 115  
   treaties with Rome 127, 174–5, 188  
   under Vandal rule 232  
   warships 114, 167, 173, 178, 180, 181,  
     186–7  
   *see also* Carthage  
 cartography 340, 353, 379  
 Cassiodorus 253  
 Castelnuovo fortress, Naples 399  
 Castile 335, 364, 393, 398, 410  
   and Aragon 398, 408–10  
   gold 411  
   Moriscos 473, 476  
   people of *see* Castilians  
 Castilians 364, 366, 393, 395, 398, 404,  
   405, 410  
   expulsion of Muslims from Castilian  
   lands 408  
   *see also* Castile  
 castration 98, 213, 248, 474  
 clinics 246–7  
 Catalans xxx, 298, 336–7, 338, 353, 376  
 Catalan-Aragonese commonwealth  
   353, 361–3, 381, 404, 409

- and Genoese 361, 382
- grain trade 346, 347–8, 356
- Jews 341
- and the kings of Aragon 334–5, 338–41, 344, 345, 351, 353, 361, 362, 376, 381–4
- Levant trade 400
- merchants 344, 353, 359–60, 400
- militias 344
- and Pisans 361
- rise of a Catalan-Aragonese 'empire' 361–3
- and Sardinia 361, 381
- shipping 344–8, 359–60, 400
- in Sicily 381
- slave trade 346–7
- textile trade 401
-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400, 401, 402
- trade networks 344–8, 401, 410
- trade with North Africa 402
- and the Turks of Aydin 365
- war fleets 347, 352, 359, 362–3, 366, 434
- see also* Catalonia
- Catalonia 111, 127, 335, 352
  - Catalan wine 129
  - civil war 399, 401
  - fleet built after siege of Malta 434
  - Moriscos 475
  - people of *see* Catalans
- Cathars 332–3
  - Albigensian Crusade 335
- Catherine II,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 505, 508, 510, 512
- Catherine of Braganza, queen of England 491
- Catholic Church 278, 354, 500
  - and confessional identity 488
  - in Gibraltar 497
  - Inquisition *see* Inquisition
  - in Minorca 500
  - papacy *see* papacy
  - and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522
- Cato, Marcus Porcius, the Elder 188–9, 191, 200–201, 203
- Cattaro *see* Kotor
- Catullus 102
- Cavafy, Constantine P. 591–2
- Cavalcabó, marquis of 512–13
- cave paintings 4, 5–6, 7
- Cavour* (Italian battleship) 607
- Cecil Hotel, Alexandria 589
- Celtiberians 184, 185
- Celtic peoples 117, 118, 124, 125, 128, 158, 173
  - Celtiberians 184, 185
- ceramics *see* pottery/ceramics
- Cerdagne 339
- Cerveteri *see* Caere
- Cesnola, Louis Palma di 568
- Cetara 268
- Cetinje 582
- Ceuta 246, 298, 308, 393–5, 495, 575, 629
- Chalkis 90, 91, 93, 140
- Champagne 277
- Champollion, Jean-François 548
- Chanel, Coco 635
- Chania 484, 485
- Charlemagne 249–50, 252, 253, 254
- Charles I of Anjou 349–52, 358, 365
- Charles I of Naples, prince of Salerno 352, 354
- Charles II of England 490, 492, 494
- Charles II of Spain 494
- Charles III of Spain, later Charles VI, Holy Roman Emperor 495, 496–7, 498
- Charles V, Holy Roman Emperor 410, 415, 417, 418, 419, 441, 442, 559
  - and Francis I 420–23
- Charles VI of Austria 559
  - see also* Charles III of Spain
- Charles VII of France 397
- Charles VIII of France 387–8, 420
- Charles IX of France 477
- Charles, prince of Viana 399
- Chelouche, Aharon 593
- Chelouche family 594
- Cherchel *see* Caesarea
- Cheremetov, Boris 512
- Chigi Vase 96
- child sacrifice 66, 75, 76, 81–2
- Chilperic II 247
- China 378, 622–3, 639–40

- Chioggia, War of 376–8
- Chios 53, 83, 95, 236, 352, 358, 477  
and Genoese 366, 414, 446  
Turks in 538
- Christendom  
Christian pirates 381, 414, 429, 435,  
446, 449, 453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with Islam  
258–70  
and the Crusades *see* Crusades
- Christianity  
Anglicanism *see* Anglicanism  
Arian 220, 230, 231; *see also* Arians  
and Judaism 222–5  
attempted conversion of Muslims to  
408  
Byzantine 162  
Catholic Church 278, 354, 500; *see  
also* papacy  
Christian relations with Jews and  
Muslims in Spain 340–41, 404–6  
Christians viewed by Romans as  
atheists 213  
churches *see* churches  
Constantine's conversion to 219–20  
Coptic 245  
Eastern Schism (1054) 283  
Greek Orthodox Church 282–3, 354,  
458, 485–6  
and 'heretics' 218, 220  
and Islam 244, 273, 281–2, 340–41;  
Crusades *see* Crusades;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rade networks  
296; mixture of Christian and  
Muslim soldiers in armies 344; Pisa  
and the Muslims 279–81  
martyrs 214, 217–18, 223–4  
Melkites 591  
Minorcan Christians 224–5  
New Christians: converted from Islam  
*see* Moriscos; converted from  
Judaism 398, 443, 463–4  
and Paganism 220–22  
papacy *see* papacy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214, 217–18,  
443
- Protestantism *see* Protestantism  
relationships between Catholic West  
and Orthodox East 282–3  
rift with Judaism 213–14, 217  
Roman legalization of 213, 219–20, 227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522  
spread across Mediterranean 213–14,  
220
- Chrysostom, John 221
- churches  
on Grado 253  
Greek style 274  
Monophysite 244  
of Pisa and Genoa 275  
relations between Greek and Latin 269,  
274  
Sardinian 274
- Churchill, Winston 578, 580, 589, 608, 612
- Cicero 78, 102, 186, 191, 196
- Cid, El 336
- Cilicia 92, 196, 197, 380  
Cilician Armenia 359  
pirates 165, 195  
Rough Cilicia 195, 197
- Circassians 248, 355, 373–4
- Cisneros, Cardinal 409
- Ciudadella, Minorca 499  
Jamona 223, 224, 225
- Ciutat de Mallorca 338–9, 340
- Classis, Ravenna 211, 236
- Claudius, Emperor 207, 215
- Claudius, Appius 179
- Cleopatra 197–8, 199
- climate changes xxix, 6, 7
- Club 18–30 637
- Club Méditerranée 633
- cochineal 465, 532, 585
- cocoa 560
- Cœur, Jacques, of Bourges 397
- coffee 485, 528, 560, 585
- Cohen, Eve 591
- coinage 70, 97  
Amalfitan 270  
Arab 255, 257  
Byzantine 231, 255  
Corinthian 97

- Florentine 327, 358  
 gold 236, 237, 247, 255, 263, 270, 302,  
     308, 327, 358, 402  
 lead 237  
 Rhodian 164  
 Roman 204, 220  
 Valencian 402
- Colbert, Jean-Baptiste 493
- Collingwood, Admiral Cuthbert, 1st Baron  
     Collingwood 515, 525
- Colonna, Marcantonio 447
- Colossus of Rhodes 155, 163
- Columbus, Christopher 409, 411
- Comacchio 252, 253, 254
- commercialization 367, 637
- Communism 604, 612, 613  
     fall of 638
- Comnenus dynasty *see* Komnenos dynasty
- Compte, Pere 400
- Concert of Europe 538
- Conrad III, king of Germany 319
- Constance, queen of Aragon 351
- Constance, queen of Sicily 327-8
- Constantine I, Roman emperor 19,  
     219-20, 227
- Constantine XI, Byzantine emperor 384
- Constantine, Algeria 540-41
- Constantinople 219, 221, 227, 234, 235,  
     242, 349, 354  
     1453 siege 384  
     after the Great War 583  
     and Alfonso V of Aragon 384  
     and Amalfi 269  
     as a centre of Muslim sea power 424  
     fall in the Fourth Crusade (1204)  
     329-30, 332  
     fall to Mehmet the Conqueror 383  
     Gracia Nasi and 443  
     Hagia Sophia 283  
     and the Islamic world 245, 246, 247,  
     251  
     as link between Mediterranean and the  
     Black Sea 285  
     massacre of Italians (1182) 324, 329  
     Michael Palaiologos's recapture 330,  
     331
- Gracia Nasi and 442  
     Joseph Nasi and 444  
     Russian 'Great Idea' for 508  
     Venetians in 458  
     and Venice 256, 330
- Contardo, Ingheto 341
-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640
- Copenhagen, battle of 520
- copper 12, 15-16, 17, 19, 33, 34, 35, 92  
     from Cyprus 70  
     Etruscan 109  
     Phoenician 69, 70  
     Sardinia 123  
     Tartessian 79  
     weapons 20
- Coptic Archaeological Society 591
- Copts 245  
     of Cairo 258
- Córdoba 248, 249
- Corfu xxx, 305, 319, 329, 525  
     Channel 614-15  
     and the Ottomans 419, 518  
     *see also* Kerkyra
- Corinth 89, 95-9, 110, 189, 236  
     attack by Roger II 319  
     Gulf of 97, 285, 449  
     people of *see* Corinthians  
     and Syracuse 98, 172  
     trade routes 95, 98-9  
     Venetian trade with 285
- Corinthians  
     and the Kerkyrans 141-2  
     pottery 87, 95, 96, 101; in Sardinia 122  
     slaves 95  
     trade with Carthaginians 97  
     *see also* Corinth
- Coron 419, 538
- Corsica 114, 382, 514, 621  
     Arab invasion 250  
     and the British 514-15  
     Geiseric in 233  
     and the Genoese 514, 515  
     Ionian colony in 124  
     Phokaians and 126  
     in World War II 610, 611

- Cosa 177, 201, 217  
 Cosimo I, Duke 464  
 Cosquer grotto 4  
 Cossacks 479  
 Côte d'Azur 632, 635  
 Cotrugli, Benedetto 390  
 cotton 323, 359, 374, 437, 477, 560, 573  
 Courmenin, Louis des Hayes, Baron de  
     477  
 cremation 81, 108, 129  
 Cretans  
     Cretan War (1645-1669) 484-5  
     fresco painting 37  
     grain 483  
     Greek 565-6; Orthodox 458, 485-6  
     hand-axes 3  
     pirates 163, 195  
     pottery 236  
     trade networks 485  
     *see also* Crete  
 Crete  
     1368 rebellion 377  
     after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330-31  
     Bronze Age 16-17, 22-8  
     Byzantium and 236  
     Caphtor and the Philistines 56-57  
     Cretan War (1645-1669) 484-5  
     Evans and the 'palace of Minos at  
         Knossos' 565, 566  
     governed by Egypt (1830-40) 565-6  
     Greek Orthodoxy in 458, 485-6  
     Islam in 485-6  
     Minoan 22-7, 28, 29-31, 566  
     Mycenaean 29-35, 47  
     Neolithic 8, 9  
     and the Ottomans 448, 483-6, 565-6,  
         588  
     people of *see* Cretans  
     and Pharaonic Egypt 38  
     and the Venetians 331, 377, 483-5  
     World War II 608  
 Crimea 355, 368, 378, 510  
 Croatians  
     pirates 439, 440  
     Uskoks 439, 449, 454-7  
 Croesus (Kroisos), king of Lydia 134  
 Cromwell, Oliver 481, 488, 490  
 cruises 637  
 crusaders 280, 348  
 Crusades 287-93  
     First Crusade 270, 287-91  
     Second Crusade 318-19  
     Third Crusade 297, 325  
     Fourth Crusade 329-30, 331, 349  
     Fifth Crusade 348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293-303  
 cuisines 628-9  
 Cumae *see* Kyma  
 Curzola, battle of 355  
 Curzon, George Nathaniel, Marquis 585  
 Cybele 213  
 Cyclades 7, 13-14, 352  
     Bronze Age 15-18, 27-8  
 Cycladic art 17-18  
 Cyclopes (Homer) 88  
 Cyprus 35, 55, 305, 358-9, 414, 623-5  
     under the Assyrians 70, 132  
     and the British 567, 568, 605, 623-4,  
         628, 633  
     Byzantium and 236  
     Cleopatra and 197  
     deforestation xxx  
     Delian League in 141  
     Egyptians and 132  
     and the EU 639  
     Euboian ties 91  
     foreign retirement problems in 632  
     Genoese rights in 377  
     granaries 70  
     and Greece, *enosis* movement 613, 623,  
         624  
     Greek Cypriots 567-9, 623, 624-5  
     invasion by Mamluks 392  
     and Joseph Nasi 446  
     Komnenos family in 329  
     Mycenaean refugees 54  
     Mycenaean trade with 33  
     Mycenaeans, Hittites and 47  
     Neolithic 8-9  
     and the Ottomans 446-51, 567-9  
     pottery 38  
     refugees from Acre 349  
     Richard I's capture of 325  
     and the Sea Peoples 52

- tourism 631, 632, 633, 636-7  
 as a trading transit point 36  
 Turkish Cypriots 568-9, 623, 624-5  
 and the Venetians 446-7, 451, 458  
 Cyrenaica 97, 135, 245  
   Jewish rebellion in 208-9, 216  
 Cyriac of Ancona 380  
 Cyrus, king of Persia 134  
 Czartoryski, Adam Jerzy 521  
 Czechoslovakia 616
- Daimbert of Pisa 292  
 Dalmatia 210-11, 233, 252, 253, 254, 373, 376, 377, 389, 539, 613, 615  
   Dubrovnik *see* Dubrovnik  
   Uskoks 439, 449, 454-7  
 Dama de Elche 129-30  
 Damascus 620  
 Damietta 297, 348, 508  
 damming, North Africa 204  
*Danawoi* 52  
 Dandolo, Andrea 254  
 Dandolo family 299, 360  
 Danes 478, 492, 528  
 Daniel, book of 134  
 Danites 52, 58-59  
 d'Annunzio, Gabriele 601-2  
 Dardanelles (Hellespont) 20, 135, 147, 376, 484, 522, 538, 578-80  
   and the Russians 510, 511  
 Dardanians 41, 52  
 Darius I, king of Persia 135  
 Darius III, king of Persia 149  
 Darlan, Admiral Jean François 606, 609-10  
 Dartmouth, William Legge, 1st Earl 494  
 Datini, Francesco di Marco 373-5  
 David, Elizabeth 628  
 David, king of Israel 57, 59  
 de Gaulle, Charles 621  
 de Lesseps, Ferdinand *see* Lesseps,  
   Ferdinand, Vicomte de  
 de Malla family 345  
 Decatur, Stephen 534-5, 536  
 Decius, Gaius Messius 217  
 decolonization
- British 622-5; Gibraltar 625-7  
   French 621  
 deforestation xxx, 234  
 Delacroix, Eugène 538, 546  
 Delian League 139, 140-41, 142  
 Delos 138, 139, 164-5, 201, 205  
 Delphi 95, 96, 113, 114, 125, 132, 380  
   decline during sixth century 236  
   Oracle 32, 136  
 Demaratos of Corinth 98, 99, 104  
 Demeter 130, 171  
 Demetrios of Phaleron 159, 160  
 Demetrios Palaiologos 384  
 Demetrios, Seleucid king 163  
 democracy 135, 138, 139, 613  
   democrats and aristocrats,  
     Peloponnesian War 141-2  
   lost to tyrants 168-70  
 Denia 336  
 Denmark 520  
 Denyen 50-51, 52  
 Derne 535  
 'Desert Rats' 609  
 deys 528, 529, 531, 535, 540  
*dhimmis* 244-5  
 Diana culture 13  
 Dido, queen of Carthage 74-5, 189-90  
 diet *see* food  
 Diocletian, Roman emperor 226-7  
 Diodoros the Sicilian 79, 163  
*diolkos* (slipway) 95, 97  
 Dionysios I of Syracuse 98-9, 130, 168, 170-71  
 Dionysios of Halikarnassos 98, 102-3, 104  
 Dionysos (god) 105-6  
 Dioskorides 266-7  
 Disraeli, Benjamin 554, 570  
 Diversis, Philippus de 389  
 divination 113  
 Dodecanese islands 577, 601, 611, 629  
 Dominicans 341, 379-80, 406, 439  
 Don John of Austria 448, 449, 451, 472  
 Donatists 217, 220  
 Dönme sect 482  
 Dor 39, 41  
 Doria, Andrea 419, 420, 421, 428  
 Doria, Gian Andrea 428-9, 447



- Doria, Pietro 377  
 Doria family of Genoa 275  
 Dorians 53, 83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5  
 Doublet, Pierre Jean 517  
 Dragut (Turgut) 428, 430  
 dried fruits 340, 355, 358, 366, 378, 393,  
   400, 404, 460, 466, 485, 511, 528,  
   584  
 Druze warriors 305  
 Držić, Marin 439  
 Dual Control Commission, Anglo-French  
   554-5  
 dualism 332  
 Dubrovnik (Ragusa) 323, 332, 388-91,  
   401, 423, 438-9, 440, 442, 448,  
   532, 539  
   and Ancona 437, 438  
   inhabitants *see* Ragusans  
   and the Russians 521-2  
   tourism 637  
   and the Uskoks 457  
   wool trade 389-90, 439  
*Dunkerque* (French ship) 606  
 Duran, David 531  
 Durazzo 385, 388, 448, 582  
   *see also* Dyrrhachion; Epidamnos  
 Durrell, Lawrence 589, 591, 623  
 Durrës *see* Durazzo; Dyrrhachion;  
   Epidamnos  
 Dutch 463 *see also* Holland  
   and English 462, 467, 488, 493, 495  
   and Genoa 468  
   grain trade 466  
   and Livorno trade 465, 466  
   navies 463  
   seamen 454  
   tourists 633  
   and Venetians 460, 461  
 Dyrrachium *see* Durazzo; Dyrrhachion;  
   Epidamnos  
 Dyrrhachion 235-6, 269, 283, 285, 324,  
   350  
   *see also* Durazzo; Epidamnos  
 early man, pre-Neolithic 3-8  
 earthquakes 27-8, 45, 164, 438-9  
 Eaton, William 531-2, 535  
 ebony 37, 158, 310  
 Eciija 405  
 economy  
   agricultural 204  
   Alexandrian 155-6  
   Atlantic 440-41, 453-4, 505  
   Baltic 505  
   and the Black Death 366-9  
   boo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36-9  
   Byzantine 238, 285, 294  
   and China 640  
   domination by cities 357-8  
   economic recovery (*redreç*) 399, 401  
   Egyptian 155-6, 537  
   European economic crisis 629  
   European economic network 323  
   Genoese 392  
   global 640  
   Greek 639  
   Italian capital 400  
   and the Japanese 638  
   Mediterranean 97; growing complexity  
     and disintegration 226, 227  
   Mediterranean Union economic  
     objectives 639  
   North Sea 505  
   northern European economies 440  
   *redreç*/economic recovery 399  
   of Salonika 598  
   Spanish 634; Genoa and Spanish  
     finances 468  
   specialization and the Mediterranean  
     economy 373  
   and tourism 633-4  
   transformations after the Black Death  
     373, 399, 401, 404  
   Tunisian 576  
   Valencian 404  
   Venetian 457-8  
   voluntary limit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639  
 Eden, Anthony 618, 619  
 Edessa 318  
 Edicts of Toleration 559  
 Edward IV, king of England 396, 403  
*Edwin* (US ship) 535

-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621
- Egadian islands 5  
Punic naval battle off 182
- Egeria 644
- Egesta *see* Segesta
- Egypt xxix, 14, 22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149–52  
Alexandria *see* Alexandria  
Arab seizure of power (revolution of 1952) 617, 618  
under Ayyubids 296–7  
and the British 550, 554–5, 579, 619  
Cairo *see* Cairo  
and Constantinople 227, 242  
economy 155–6, 537  
European import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326  
Fatimid 291, 296–8, 324–5; *see also* Fatimids  
French fascination with ancient Egypt 547–8  
government of Crete (1830–40) 565–6  
grain trade 157, 158, 164, 203, 204, 227, 242  
incident with Pisan merchants 297–8  
irrigation 376  
under Ismail Pasha 551–2  
Israel and: ancient Israelites 58; modern state of Israel 618–20  
and James II of Aragon 345  
Jewish rebellion in 208–9, 216  
and the Karimis 296  
and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348  
late Roman 227  
Libyan invasions of 48–50  
Mamluks in 349, 355, 392, 397  
Muhammad Ali and 537–40  
Muslim conquest 245  
and Napoleon 515–16  
under Nasser 618–20  
Ottoman 485, 518, 545–8  
people of *see* Egyptians  
Pharaonic 36–41, 48–53, 63, 132; and Crete 38; Hyksos dynasty 37, 38  
Ptolemaic 152–64, 188, 197–200  
and the Romans 197–200, 208–9  
Sea Peoples' invasion of 50–53, 55
-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and Syria 35–6, 38, 39–41  
taxation 297  
timber 37, 39, 40, 263, 297, 537, 643  
and Tyre 68–9  
and Ugarit 35–6
- Egyptians  
in Ascalon 292–3  
ceramics 280  
and Cyprus 132  
navy/warships 51, 156, 163, 293  
papyrus 156–7, 161  
in Puteoli 206  
trade routes to Tyrrhenian Sea 93–4  
*see also* Egypt
- Eilat 619
- Eisenhower, Dwight D. 609, 619
- Eknomos, battle of 181–2
- Ekron 56, 57
- Ekwesh 49, 52
- El Alamein 609
- Elba 109, 115, 334, 383, 416
- Elche bust 129–30
- Eleonora of Arborea 362
- Eliadar, wife of Solomon of Salerno 301, 302
- Elliott, George Augustus 509
- Elissa (Dido) 74–5
- Elizabeth I, queen of England 453, 459, 477
- Elizabeth II, British queen 622, 626
- Elliott, John 402
- Elymians 76, 145, 167
- Emborio 53, 54
- Embriaco family 290–91, 305, 315
- emperor worship 213, 220
- Emporion 110–11, 124, 126, 128, 185
- Empúries *see* Emporion
- 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ér 546–8
- England  
and Catholic Spain 453, 459  
and the Genoese 396–7  
Mediterranean trade with 347  
people of *see* English  
Philip II's wars with Elizabeth I 453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9–61  
*see also* Britain/the British

- English  
 changing alliances between Spain and France 488  
 conflicts with Spaniards 489–90  
 and Dutch 462, 467, 488, 493, 495  
 and Gibraltar 490, 494–8  
 pirates 461  
 shipping 396–7  
 and Tangier 491–4  
 trade in Turkey 499–500  
 and Venetians 459, 460–61  
 war fleets 488  
*see also* Britain/the British; England
- Enkomi 35
- Enna 282
- Enrico Pescatore 328
-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637, 640
- EOKA (*Ethniki Organôsis Kypriôn Agonistôn*) 623
- Epeiros 55, 330
- Ephesos 236
- Epicureans 305
- Epidamnos 98, 117, 141–2  
*see also* Durazzo; Dyrrhachion
- Epirus *see* Epeiros
- Eraclea 253
- Eratosthenes 47, 162
- Eretria 90, 91
- Eryx (Erice) shrine 76
- Ethniki Organôsis Kypriôn Agonistôn* (EOKA) 623
- Etruria 63, 77, 79, 94, 95, 100, 107, 183, 562  
 Eastern influences 111  
 engagements against pirates 195  
 people of *see* Etruscans  
 Tarquinia *see* Tarquinia  
 trade routes 95, 101, 110
- Etruscans 52, 63, 72, 77, 83, 90, 94, 100–118  
 alphabet 93, 110  
 art 100, 103, 111, 112  
 bronzes 124  
 and Corinthian pottery 96  
 ethnic origins 101–5  
 influence on La Tène culture 125  
 language 104  
 migration 101–5, 108, 117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6  
 Phoenician trade 111  
 and Phokaians 114  
 pirates 63, 72, 105–6, 109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Greeks 113–16, 125  
 pottery 78, 109, 110, 112–13; in Massalia 124; in Sardinia 122  
 and Romans 175  
 sexual behaviour 105  
 soothsayers 113, 220  
 tombs 100, 101, 104, 108, 111–12, 114, 117, 563  
 trade with Carthaginians 101, 115  
 trade with Greeks 110–11  
 Villanovan culture 108–10, 113  
*see also* Etruria
- EU (European Union) 625, 629, 638–9, 640
- Euboea 75, 77, 90–91, 94–5, 135  
 Athens and 140, 141  
 marble 222
- Euboians 75, 89–95  
 Lelantine War 94–5  
 pottery 87, 92
- Euclid 152, 162
- Eudoxia, Empress 221, 222
- Eugénie of France, Empress 552
- Euripides 146, 160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621
- European Union (EU) 625, 629, 638–9, 640
- Evans, Sir Arthur 26, 565, 566
- Exarchate of Ravenna 252, 253
- Exekias 105–6
- Eynan (Ayn Mallaha) 8
- Ezekiel 68
- Fabri, Felix 379–80
- Fabriano paper 437
- Falangists 604
- Falastin* (newspaper) 594, 596
- Famagusta 358, 359, 446, 447–8, 449, 451, 624
- famines 367

- Farouk, king of Egypt 617  
 Fascism 601-4, 611  
 'Fat Lady of Saliagos' 18  
 Fatimids 270, 279, 289, 293, 296-8, 301,  
     324-5  
 fauna 6, 7  
 Fayyum 14  
 Fayyum, Lake 38  
 Felsina 117  
     *see also* Bologna  
 Ferdinand I, duke of Tuscany 466-7  
 Ferdinand I, king of Aragon 405  
 Ferdinand II, king of Aragon 387, 398,  
     405, 406, 408-10, 415, 420  
 Ferdinand IV, king of Naples 524, 525  
 Fernando, brother of Henry the Navigator  
     396  
 Ferrante I, king of Naples 387, 396,  
     398  
 Ferrante II, king of Naples 388, 406  
 Ferrara 358, 406, 442  
 fertility cults 11, 18, 154  
 Fibonacci, Leonardi 332  
 Fifth Monarchy Men 481  
 Finley, Moses 88, 97  
 fish xxviii, 76, 641  
     of the Adriatic marshlands 252, 253  
     and the Mediterranean diet 629  
     over-fishing 640  
     preservation 76, 641-2  
     sauce 76, 97, 202, 206, 247, 641  
     stocks xxx  
     trade in 389, 396, 460  
     transport 401  
     tuna-fishing 10, 19, 76, 640, 641  
 Fisher, John Arbuthnot, 1st Baron 579  
 Fiskardo 284  
 Fiume (Rijeka) 601-2  
 Flanders 295, 346, 411, 441-2, 447  
     Venetian trade with 379  
 flax 263, 264, 279, 297  
 FLN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621,  
     622  
 flora 6  
 Florence 327, 356-7, 358, 383, 632  
     Jewish ghetto 464  
     people of *see* Florentines  
 Florentines 327, 437  
     bankers 351  
     banks 375  
     cloth trade 437, 438  
     Jews 464  
     Medici 403  
     shipping 404, 437  
     *see also* Florence  
 Fondi 418  
 fonduks 298-9, 325, 345, 346, 348, 369,  
     645  
 food  
     dried fruits *see* dried fruits  
     grain *see* grain trade  
     Mediterranean cuisines 628-9  
     on package holidays 635  
     rationing 628  
     and sea transport 202  
     spice trade *see* spice trade  
     warship diets 427, 463  
 Forrestal, James 616  
 Forster, E. M. 591-2, 632  
 Fortis (Pisan pirate) 329  
 Forum Julii 210  
     *see also* Fréjus  
 Fos-sur-Mer 247  
 France  
     Charlemagne's defence of 250  
     dominating Ottoman trade 585  
     and the EEC 621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513-20  
     Hellenization of southern France 125  
     Jewish emigration to 598, 617  
     and NATO 620  
     people of *see* French  
     Provence *see* Provence  
     spice trade 397  
     tin of southern France 123, 124  
     tourism 636  
     Vichy 606-7, 610  
 Francesco I, duke of Tuscany 464  
 Franchthi cave 7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418-19, 420-23,  
     644  
 Franciscans 342, 439  
 Franco, Francisco 604, 605, 621, 625-6  
 frankincense 158, 165

- Franks 247, 250, 251-4, 255, 311, 324-5,  
326, 342, 349
- Franz Josef, emperor of Austria 552, 558
- Fraxinetum 250
- Frederick I, Barbarossa, German emperor  
300, 302
- Frederick II of Hohenstaufen, German  
emperor and king of Sicily 328,  
331, 349, 350, 361, 366
- free ports 164, 201, 436-7, 464-8, 559
- Fréjus 302
- Forum Julii 210
- French  
and Aigues-Mortes 358  
and Algeria 530, 540-41, 573-4, 621-2  
alliance with Italians against Turkish  
threat 365  
in Barcelona 441  
and the British 606  
contraction of control in Mediterranean  
617-18, 619  
cultural imperialism 570  
decolonization 621  
and Egypt's threat to Israel 619  
fascination with ancient Egypt 547-8  
Franco-Turkish alliance 418-19,  
420-23, 475  
Hallstatt culture 125  
and the ideal of progress 549  
invasion of Catalonia 352  
in Italy under Louis XII 409  
Levant trade 499  
and Minorca 498, 501-3  
Napoleonic Wars 513, 522-3, 524-6  
navy/fleets 423, 514, 523, 581, 606  
and the Ottomans 418-19, 420-23,  
475, 539, 546-8  
Revolutionary War 513-20  
in Salonika 598  
Seven Years War 501-3  
and Smyrna 585  
and the Suez Canal 548-9, 550, 553,  
554-5  
tourism 633  
trading networks 397  
in Tunisia 574, 576, 621  
World War I 581
- World War II 606-7, 609, 610, 611-12  
xenophobia in southern France 622  
*see also* France
- Friuli 387
-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 621,  
622
- Fufluns 644
- funerary rites 18, 93, 105, 114
- Fustat (Old Cairo) 258-60, 263  
Amalfitans in 270
- Gaddafi, Muammar al- 622
- Gadir 78
- Gaeta 268, 269
- Galata 354
- Galen 152
- Galicians 396
- Galilee 407
- Galissonière, Roland-Michel Barrin de la  
502
- galley slaves 425-7, 435
- Gallipoli 366  
campaign 579-80
- Gamaliel 224
- García de Toledo, Don 433
- garon/garum* sauce 76, 97, 202, 206, 247,  
641
- Gaul 246, 247  
Visigothic rule of southern Gaul 233
- Gaza 56, 221-2, 237, 618-19, 638  
bubonic plague 368
- Gaza Strip 56
- Geddes, Patrick 595-6
- Geiseric 230-31, 233
- Gela 167-8, 172
- Gelidonya wreck 33
- Gelimer, King 232
- Gelon 114, 137
- gender 643-4
- Genizah collection 258-9, 260-61, 265,  
281, 296
- Genizah Jews of Cairo 258-9, 262, 263-4,  
266, 279, 295-6, 646
- Genoa 237, 271, 301, 346, 358, 420  
as banker to the Spanish empire 441  
Black Death 369  
economy 392

- as a free port 467–8
- government of 276–7
- and the Jews 296, 406
- people of *see* Genoese
- and the Visconti lords of Milan 376
- War of Chioggia 376–8
- Genoese 272–8, 286, 305, 467–9
  - in Acre 325–6
  - and Alfonso V of Aragon 382–3
  - alliance with Spain 412, 468
  - and the Almohads 298
  - alum 392–3
  - in Barcelona 441
  - and the Black Death 367–8, 369
  - and Catalans 361, 382
  - and Chios 366, 414, 446
  - compagna* 276–7, 290
  - cooks 628
  - and Corsica 514, 515
  - and the Crusades 290–92, 331, 349
  - and the English 396–7
  - and Frederick II of Sicily 349
  - on Gibraltar 497
  - grain trade 347–8, 355–6, 392
  - and Henry, count of Malta 331
  - in Majorca 338
  - massacre in Constantinople (1182) 324, 329
  - merchants 277, 278, 298–9, 301–3, 341, 344, 358, 441
  - in North Africa 298–9
  - and the Ottomans 392–3
  - pirates 328–9, 331
  - and Pisans 273, 274, 275, 278–9, 305, 334
  - and Sardinia 273, 274–5
  - in Seville 412
  - shipping 315, 316–17, 347–8, 360, 378, 404
  - and Sicily 322–3, 328
  - slave trade 355
  - and Syracuse 328
  - trade networks 271, 354
  - and Venetians 325–6, 331, 355, 366, 376–8
  - see also* Genoa
- Georg, Meister 386
- George I, king of Greece 578
- George III, British king 515
- George VI, British king 608, 610
- George of Antioch, admiral 319, 321
- George of Darmstadt-Hesse, Prince 495, 496
- George, prince of Greece 566
- George Washington* (US ship) 533
- Germaine of Foix, queen of Aragon 410
- Germanic peoples
  - barbarians 208, 226, 229, 230–33
  - Lombards 237, 253
  - warfare with Slav peoples 248
- Germans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577
  - German merchants xxix, 277, 401
  - Hanseatic 463, 468
  - in Libya 576
  - Nazis 599, 600, 605–10, 611, 612
  - seamen 454
  - tourists 633, 636
  - U-boats 582, 609
  - World War I 582
  - World War II 605, 606–10, 611, 612
  - see also* Germanic peoples; Germany
- Germany
  - and the 'kingdom of Italy' 275
  - Nazi 605–10, 611, 612
  - people of *see* Germans
  -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481
- Gezer 35, 56
- Ġgantija 11
- Ghaylan, Abdallah 492, 494
- Ghent 347
- ghettos 438–9, 442, 443, 458, 464, 559, 599, 646
- Ghibellines 351, 365
- Giacometti, Alberto 123
- Gibbon, Edward 226
- Gibellet 305
- Gibraltar 364, 394, 398, 490, 494–8, 509, 605, 625–7
  - Jews 497–8, 536
  - Neanderthals 3–4
  - Straits of 71, 78, 363–4, 366, 395, 398, 492, 557

- Gibraltar Woman 3  
*Giornata* (trading company) 531  
 Giovanni Scriba ('John the Scribe') 278  
 Giraud, Henry 610  
 Giraud family 585  
 Giustiniani, Niccolò 415  
 goddesses  
   earth-goddesses 57, 213  
   Egyptian 199, 212-13  
   Etruscan 111  
   Great/Mother Goddess 11, 12, 18, 213  
   Greek 31-2, 101, 171  
   Minoan 26  
   Mycenaean 32  
   Phoenician 70, 101, 111, 130  
 Godfrey of Bouillon 290  
 gods  
   Anatolian 104  
   Canaanite 57, 644  
   Carthaginian 171; *see also* Melqart  
   Egyptian 154, 209  
   Etruscan 644  
   existence of pagan gods denied by Jews  
     and Christians 213  
   God of Israel 199  
   Greek 31-2, 101, 105-6, 130, 138,  
     150, 154, 165, 644  
   Mycenaean 32  
   Persian 135  
   personification of 154  
   Philistine 57  
   Phoenician 73, 75, 101, 645  
   posing as merchants 88  
   Roman mixture of 209  
   sea-gods 22, 73, 85, 165, 644  
   storm-gods 104  
   sun-gods 37  
   *see also specific gods*  
 Goitein, Shlomo Dov 259, 266  
 Golan Heights 619  
 gold  
   Alexandria and 156, 158  
   Byzantine 242  
   Castile and 411  
   coins 236, 237, 247, 255, 263, 270,  
     302, 308, 327, 358, 402  
   dust 279, 298  
   Egyptian 37  
   of Florentine businessmen 327  
   Guinea trade 411  
   Libyan 48  
   Mycenaean 29, 32  
   New World 468  
   of the Sahara 263  
   Tartessian 79  
   Trojan 21, 22  
 Golden Horn 285, 294, 354, 578  
 Goliath 57  
 Gonzaga, Giulia 418  
 González de Córdoba, Fernando 409  
 Gortyna 236  
 Gothic Wars 235  
 Goths 229, 230, 232, 234, 235  
 Gozo 10, 11, 415, 428  
 Gracchus, Tiberius 200  
 Grado 252, 253  
 grain trade xxix, 28, 70, 144, 202-4, 642  
   African 203  
   Alexandria 157, 158-9  
   Apulian grain 351, 357, 358  
   Athens 139-40, 146, 147-8, 158,  
     172-3  
   Baltic grain 440, 466  
   Black Sea traffic 140, 355, 368, 511  
   and bubonic plague 368  
   Byzantine 236  
   Catalan 346, 347-8, 356  
   Corinth 285  
   and Crete 483  
   and the Dutch 466  
   Egyptian 157, 158, 164, 200, 203, 204,  
     227, 242  
   Florentine 356-7  
   following the Black Death 373  
   Genoese 347-8, 355-6, 392  
   grain ships 202-3, 205  
   in the Islamic world 263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437-8  
   Moroccan 298, 392  
   and north European merchants 454  
   Ostia 207-8  
   Puteoli 207  
   Rome 175, 195, 200-205, 207-8, 227;  
     and pirates 196

- Sicilian grain 144, 172–3, 179, 186,  
 263, 279, 319, 322–3, 346, 356,  
 392, 436, 468, 527–8  
 between Sicily and Athens 172–3  
 taxation 186  
 Vandal control of 233  
 Venice 285, 358
- Granada  
 Black Death 368  
 conquest by Ferdinand and Isabella  
 408, 409  
 Moriscos of 471–4  
 Muslim kings of 363–4  
 Nasrid 334, 347, 393, 395, 404
- Grand Tours 562, 564, 632
- Great Britain *see* Britain/the British
- ‘Great Green’ 38
- Great/Mother Goddess 11, 12, 18, 213
- Greece 53–55, 117  
 and Austrian trade with the Turks 539  
 the British and Greeks 564, 586–7  
 civil war (1943) 611  
 Communist insurgency 612, 613  
 conflicts with Turk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538–9  
 and Cyprus, *enôsis* 613, 623, 624  
 Andrea Doria in 419  
 early contact with Sicily 33  
 economic collapse 639  
 Etruscan trade 110–11  
 Greco-Turkish wars 538, 586–8  
 Greek art 89, 167, 562–3  
 and Greek Cypriots 567–9, 623, 624–5  
 Greek fleets 538, 588  
 Greek nationalism 568–9, 623  
 Greek pottery 75, 77, 108, 113; Attic  
 113, 126; Helladic 33, 35, 43, 53; in  
 Massalia 124, 125; Mycenaean 34,  
 35, 43, 46, 51, 54, 56; in Sardinia 122
- Greeks in Alexandria 589–90, 591  
 Greeks in Smyrna 584, 586–7  
 Greeks of Salonika 570, 571–2  
 Greeks servicing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9
- Hellas 95, 114–15, 132–3, 134, 137,  
 142, 171, 564
- migrations into southern Greece 54–55  
 and NATO 620  
 northern Greece and the second Punic  
 War 186
- Persian invasion 132–7  
 raids by Roger II 319  
 romantic assumptions about 564  
 under Slav rule 234  
 trade network with Asia Minor 55  
 Vandal raids on 233  
 Venice and Greek corsairs 510–11
- Greek civilizations/cultures  
 Athenian *see* Athenians  
 Dorian 53  
 Euboian *see* Euboians  
 first contact with Italian lands 89–94  
 Greek Cypriots 567–9  
 Hellenic identity 83, 132  
 hellenization of Spain 126–30  
 and Iberians 128–31  
 Ionian *see* Ionians  
 Minoan *see* Minoan civilization  
 Mycenaean *see* Mycenaeans  
 Phoenician relations 63, 64, 79, 90  
 Phokaian *see* Phokaians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Etruscans  
 113–16, 125  
 in Sicily 282  
 in southern Italy 123  
 Spartan *see* Spartans  
 the wanderers: heirs of Odysseus (800  
 BC–550 BC) 83–99
- Greek Orthodox Church 354, 623  
 in Crete 458, 485–6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pacy 282–3
- Gregorios, governor of Sicily 250
- Gregory of Tours 237
- Gregory VII, Pope 344
- Grimaldi family 360
- Grivas, George 623
- Grove, Alfred, and Rackham, Oliver  
 xxix–xxx
- Guelfs 351
- Guglielmo Grasso 329
- Guiscard, Robert 281–2, 283, 284, 294,  
 324
- ‘Gulf of the Lion’ xxviii
- Gylippos 146



- Ha-Levy, Judah 259  
*habiru* 48, 58  
 Habsburgs 378, 410, 417, 420, 456, 494,  
 495, 521, 557-8, 559  
*hadith* 341  
 Hadrian, Roman emperor 208, 216, 382  
 Hadumar 250  
 Haganah 616, 617  
 Haifa 292, 598, 616-17  
   Bay 605  
 Halfon ben Nethanel 264  
 Halikarnassos, Mausoleum 386  
 Hallstatt culture 125  
 Hamas 638  
 Hamet Bashaw 535  
 Hamilcar (Carthaginian commander in  
   western Sicily) 173  
 Hamilcar (d. 480 BC) 167  
 Hamilcar Barca 184  
 Hamilton, Sir William 562  
*hamsin* xxviii  
 Hannibal 184, 185, 186, 187  
 Hapag Lloyd 633  
 harems 248, 644  
 Harris, Sir James 509-10  
 Harun ar-Rashid 252  
 al-Hasan, emir of of Mahdia 319-20  
 al-Hasan ibn Muhammad al-Wazzan (Leo  
   Africanus) 381  
 Hasday ibn Shaprut 266-7  
 Hasdrubal 172, 184, 185  
 Hatti 21, 22  
 Hazor 67  
 Hebrews 48, 58-59, 66-7, 70, 280  
   *see also* Israel; Jews  
 Hellenic pottery 33, 35, 43, 53  
 Hellas 95, 114-15, 132-3, 134, 137, 142,  
 171, 564  
   *see also* Greece  
 Hellenism, opposition to Judaism 153  
 Hellenistic culture 152, 162, 199, 211, 213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213  
 Hellenistic philosophy 162  
 Hellespont 135, 147  
   *see also* Dardanelles  
 Henry, count of Malta 328, 330-31  
 Henry III, king of France 423  
 Henry IV, king of France 475  
 Henry, king of Portugal 453  
 Henry, prince of Castile 344  
 Henry the Navigator 393  
 Henry VI, German emperor and king of  
   Sicily 327, 328  
 Herakles 74, 645  
 Heraklion *see* Candia  
 Herceg Novi 390, 438, 511  
 Hercegovina 390  
   Bosnia-Hercegovina 440  
 Herculaneum 562  
*Hermaphollo* (Egyptian ship) 158  
 Hermes 165  
 Herod Agrippa I, ruler of Judaea 205  
 Herodotos 72, 79, 98, 101, 102-3, 106,  
 111, 114, 123-4, 132, 133, 134  
 Herzl, Theodor 592  
 Herzliya Gymnasium, Tel Aviv 595  
 Hesiod 86, 87, 90, 126  
 Hesperides, Garden of 126  
 hides, animal 40, 437, 439, 532  
   on ships 283, 284, 300  
 Hieron of Syracuse 114, 115, 178, 179,  
 182-3, 186  
 Hillel 222  
 Himera 114, 167  
   tyrant of 130  
 Himilco 170  
 Hippo 230, 231  
 Hiram, king of Tyre 66-7, 69  
 Hisarlık 19, 20, 42, 45  
   *see also* Troy  
 Hitler, Adolf 605, 606, 609, 610  
 Hittites 41, 43-5, 46, 50, 51  
 Hohenstaufen 325, 327, 328, 331, 351  
 Holoais the Phokaian 106-7  
 Holland 461, 463  
   Calvinist 493  
   people of *see* Dutch  
   *see also* Netherlands  
 Holocaust 599  
 Holy Grail 291  
 Holy Land 269, 293, 303, 348-9  
   and the Crusades *see* Crusades  
   Jewish pilgrims 304

- pilgrimage to 379–80  
*see also* Israel; Palestine  
 Holy Leagues 365, 419–20, 421, 447, 448,  
 449, 450–51  
 Homer 20, 23, 32, 42, 43, 44, 52, 58, 63,  
 68, 75, 88, 95, 645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150  
*Iliad* 19, 30, 86  
*Odyssey* 85–6, 87, 88–9, 93, 150  
 Homeric Hymns 90, 105  
 Hompesch, Ferdinand von 516, 517  
 honey 68, 114, 139, 157, 225, 401, 465,  
 485  
 Hood, Samuel, 1st Viscount 513–14,  
 515  
 Horace, poet 102, 199  
 Holden, Peregrine and Purcell, Nicholas  
 xxiv–xxv, xxvii  
 Horns of Hattin 325  
 horse-breeding 117  
 Horthy, Miklós 581  
 Hospitallers *see* Knights Hospitallers  
 Hoxha, Enver 613–15, 636  
 human sacrifice 25, 28, 46, 75, 78  
 child 66, 75, 76, 81–2  
 Phoenician 81–2  
 Humbert of Silva Candida, Cardinal 283  
 Hunyadi, John, king of Hungary 383  
 Husayni, Amin al-,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 604  
 Hussein I, king of Jordan 620  
 Hydra 538  
 Hyères 632  
 Hyksos dynasty 37, 38  
 hypogea 10–11  
  
 Iberians 78–9, 128–31, 167  
 absorption into Syracusan forces 170  
 alphabet and script 129  
 art 129–30  
 Celtiberians 184, 186  
 Greek and Carthaginian interaction  
 with 128–31  
 and Hamilcar 184  
 pottery 130  
 Roman captives 192  
 tombs 129, 130  
  
 Ibiza 78, 97, 339  
 gay tourism 636  
 salt 346  
*see also* Balearic islands  
 Ibn al-‘As, ‘Amr 244  
 Ibn al-Athir 279  
 Ibn al-Hawas 281–2  
 Ibn ath-Thimnah 282  
 Ibn Hammud 302–3  
 Ibn Jubayr, Muhammad ibn Ahmad  
 307–15  
 Ibn Khurdadbih, Abu’l Qasim 248  
 Ibrahim Pasha, Grand Vizier 418  
 ice caps 6  
 idols 18  
 Ilios 19, 44, 45  
*see also* Troy  
*Illustrious*, HMS 607  
 Illyria 522  
 IMRO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571  
 India 515–16  
 trade with Alexandria 158, 207  
 Indian Ocean 200, 296, 396, 446, 463,  
 578  
 trade routes to 155, 157, 262, 355,  
 549–50, 561, 573  
 Indians 411–12  
 indigo 323, 326, 374, 466, 585  
 Innocent III, Pope 331  
 Inquisition 405–6, 442  
 Aragonese 405–6  
 banned from British territories 500  
 and the Moriscos 470–71  
 Portuguese 463–4  
 treatment of Protestants 461  
 Valencian 475  
 Venetian 458  
 insurance, maritime 402, 439, 457, 465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IMRO) 571  
*Intrepid* (US ship) 534  
 Ionia 110, 123–4, 135, 137  
 people of *see* Ionians  
 Ionian isles 233, 283, 313, 321, 460,  
 518–19, 521, 525  
 Ionian Sea 13, 33, 98, 174, 439, 448

- Ionians 80, 83, 96, 111  
   art 112  
   in Corsica 124  
   cult of the Delian Apollo 138  
   and the Lydians 134  
   at Massalia 123-4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5  
   and the Persians 123-4, 134, 135, 137  
   relations with Etruscans 111, 114  
   *see also* Ionia
- Iran 245
- Iraq 69, 245, 619  
   oil pipeline from 605
- iron 92, 94, 109, 300  
   and the Philistines 57  
   weapons 248
- ironclads 555-6, 557-8
- irrigation 474  
   Egypt 376  
   North Africa 204
- Isaac II Angelos, Byzantine emperor 332
- Isabella I, queen of Castile 398, 408
- Isaiah 79-80
- Ischia (Pithekoussai) 34, 89-90, 92-4, 95,  
   110, 268, 422
- Isis, cult of 199, 213
- Islam and the Muslim peoples 296  
   Almohad 296, 298, 299, 310, 322; *see also* Almohads  
   Arab capture of Carthage 246  
   bringing new unity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246  
   Byzantium and the conquests of  
   243-51  
   and Christendom: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258-70; Crusades *see*  
   Crusades; mixture of Christian and  
   Muslim soldiers in armies 344  
   and Christianity 244, 273, 340-41;  
   Christian expansion into Muslim  
   Mediterranean, late eleventh  
   century 281-2; Pisa and the  
   Muslims 279-81  
   converted Muslims, 'Moriscos' 408,  
   434, 447, 453, 470-76, 647  
   in Crete 485-6  
   and *dhimmi*s 244-5  
   exiled Muslims struggling to retain  
   knowledge of 408  
   expulsion of Muslims from Castilian  
   lands 408  
   extinction of Muslim rule in Spain 408  
   Ferdinand II's war against 408, 409  
   Greek massacre of Muslims in Tripoli  
   538  
   Islamic ceramics 280  
   Islamization of North African Berbers  
   245-6  
   James I of Aragon and Muslims 339-41  
   view of Jesus (Isa) 244  
   *jihad* 366, 384  
   and Judaism 244, 340-41  
   modern migrants 630  
   Muslim aims in the time of Muhammad  
   243  
   Muslim merchants 257, 258, 261-2,  
   266, 296, 404, 453, 457, 465  
   Muslim naval power/piracy 249,  
   250-51, 268, 278-9, 364, 402, 414,  
   423-4  
   Muslim 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Jews in Spain 340-41, 404-6  
   Muslim slaves 308, 346-7  
   Muslims in Salonika 598  
   Muslims of Valencia 339-40, 341  
   and Ottoman expansion 414, 423-4;  
   *see also* Ottomans  
   and paganism 244  
   and the slave trade 246-7, 248  
   Sunni 298, 310, 334  
   trade networks 246-7
- Ismail Pasha 545, 551-2, 553, 554-5
- Isokrates 139-40
- Israel 49, 52, 92  
   cult of the God of 199  
   Late Bronze Age 57-59  
   modern state of 616-17, 638; and  
   Egypt 618-20; and the  
   Mediterranean Union 639; tourism  
   632-3  
   and Tyre 66-7  
   *see also* Hebrews; Holy Land;  
   Palestine
- Issos, battle of 149

- Istanbul 354  
*see also* Constantinople
- Istria 252, 601
- Italian culture 439
- Italian language 439
- Italian Social Republic 612
- Italians  
 Albania invasion 602-4  
 and the British 607  
 contraction of control in Mediterranean  
 617-18, 621-2  
 Fascist 601-4  
 Gothic Wars 235  
 and Libya 576  
 merchants 164-5, 183, 264, 270, 285,  
 291, 297-8, 324, 332, 338, 349,  
 354, 441, 459, 646  
 and North Africa 574-5  
 and Rhodes 577  
 spas 632  
 trade routes 271, 288, 318, 404, 458;  
 Etruria 95, 101, 110  
 and Tunisia 576  
 war fleets 558, 582, 609, 611  
 war with Turkey 576  
 World War I 581-2  
 World War II 607, 608, 609, 611-12  
*see also* Italy
- Italiote League 175-6
- Italy  
 Adriatic lagoons and marshlands  
 251-4; and the emergence of Venice  
 254-5  
 Austrians in 601  
 Charlemagne's defence of 250  
 collapse of central authority in  
 northern Italy 275-7  
 divided under five powers in fifteenth  
 century 383  
 and the EEC 621  
 Etruria *see* Etruria; Etruscans  
 Exarchate of Ravenna 252, 253  
 Fascist 601-4, 605, 611-12  
 first Greek settlement in 89-94  
 Greeks in southern Italy 123  
 Jewish emigration to 598  
 Justinian and the recovery of 235  
 and Libya 603-4, 615; Libyan refugees  
 629  
 Lombards in 237  
 Muslim slave-raiders in 246  
 Mycenaean trade with 33, 34  
 naval power 296, 558  
 Normans in 283  
 people of *see* Italians  
 Prussia and the kingdom of 558  
 Rome and the southern Greek cities in  
 176-7  
 threats to Sicily 54  
 tourism 636  
 Venice and the politics of Renaissance  
 Italy 412-13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 Ithaka 87
- Ithobaal, king of Tyre 69
- ivory 374  
 brought to Egypt 37  
 Cretan 23, 24, 26  
 Indian 158  
 Phoenician 69, 79, 80, 110
- Izmir 477, 588  
*see also* Smyrna
- Jacob the Pisan 332
- Jacobins 513, 514
- Jaffa xxxi, 290-91, 292, 593-6, 600, 616,  
 617
- James I 'the Conqueror', king of Aragon  
 334, 335, 338-41, 345, 350
- James II, king of Aragon 345, 361
- James II, king of Majorca 339, 348, 353
- James III, king of Majorca 362
- James of Lusignan 392
- Jamona 223, 224, 225  
*see also* Ciutadella
- Janus, king of Cyprus 392
- Japanese 607, 631, 638  
 destroyers 582  
 economy 638  
 tuna imports 640  
 tourists 638
- Jefferson, Thomas 530, 532
- Jennings, Asa 587-8
- Jerba 86, 349, 352, 416, 428-9

- Jeremiah 57  
 Jericho 8, 58  
 Jerusalem 59, 67, 304  
   Amalfitans in 269, 270  
   capture by Saladin 297, 310, 325  
   destruction of 216  
   and the First Crusade 270, 288, 289,  
     290, 291-2  
   Franks of the kingdom of 311  
   Grand Mufti (Amin al-Husayni) 604  
   Holy Sepulchre 252, 287, 290, 292  
   hospice 269  
   kingdom of 291, 292, 297, 298, 301,  
     311, 328, 329, 332, 348-50  
   rebuilt as Aelia Capitolina 216  
   Temple 67, 153, 216; vessels 232-3  
 Jesolo 253  
 Jesus Christ 213  
   Monophysite view of 244  
   Muslim view of Isa 244  
 jewellery  
   amber 34  
   Egyptian 38  
   Etruscan 109  
   Phoenician 79  
   'Treasure of Priam' 21, 565  
 Jews  
   of Adrianople 482  
   in Alexandria 153, 161, 162, 215, 218,  
     224, 590-91  
   Algerian 573-4, 622  
   of Algiers 531  
   and America 535-6  
   in Ancona 442-3  
   Ashkenazi 592, 593, 599  
   attacks on 405  
   'Babylonian' 259-60  
   Bacri family 531, 535, 540  
   banished under Ferdinand II 406  
   in Barcelona 340  
   and the Black Death 404-5  
   Catalan 341  
   in Dubrovnik 438-9  
   early Hebrews 48, 58-59, 66-7, 70  
   under the Edicts of Toleration 559  
   encounter between Contardo and a  
     rabbi 341  
   *Epikursin* 305  
   exiled from Spain 406-8, 442-3  
   of Florence 464  
   in France 598, 617  
   Genizah Jews of Cairo 258-9, 262,  
     263-4, 266, 279, 295-6, 646  
   and Genoa 296, 406  
   ghettoes 438-9, 442, 443, 458, 464,  
     559, 599, 646  
   on Gibraltar 497-8, 536  
   Hellenization of 598  
   impact of exiles o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406-7  
   and James I of Aragon 340-41  
   Jewish Berbers 245-6  
   Jewish diaspora 215-16, 476-83  
   Jewish rebellion (115-16) 208-9, 216  
   Jewish 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Spain 340-41, 404-6  
   Jewish revolt in Palestine (132-6) 216  
   Karaites 260  
   in Majorca 340, 646  
   maritime 218-19  
   mass conversions of 223-5, 405, 441  
   Mediterranean fifteenth-century 404-8  
   merchants 199, 248-9, 258-9, 262-4,  
     266, 279, 295-6, 437, 438, 443,  
     457, 531, 646, 647  
   of Minorca 223-5, 500  
   Nazism and the Holocaust 599, 617  
   and Ottomans 407  
   in Palestine 215, 216;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592-600, 616-17, 620  
   pilgrims 304  
   Pontine 437, 458, 464-5  
   Portuguese 441, 443, 477-8  
   Radhanites 248  
   and the rise of the Italians 296  
   Roman treatment of 213, 214-17  
   in Rome 194, 199  
   of Salonika 569-72  
   in Salonika 598-9  
   Sephardic 260, 407-8, 437, 438-9,  
     443, 444, 458, 464, 467, 470,  
     476-83, 486, 569-72, 599, 647  
   and the slave trade 248-9  
   of Smyrna 584-5

- of Toledo 404
- trade networks of the diaspora 443
- of Trani 342
- of Trieste 559–60
- of Tripoli 538
- of Tunis 531–2
- Tunisian 260
- in Turkey 482
- in Valencia 404, 405, 408
- and Venice 296, 458
- Zionist 592, 596
- see also* Israel; Judaism
- jihad* 366, 384
- Jijelli 417
- Joanna II, queen of Naples 382
- John II Komnenos, Byzantine emperor 293, 294
- John II, king of Aragon 399
- John VI Kantakouzenos, Byzantine emperor 366
- Jonah 79
- Jordan 619, 620
- Joseph I, Holy Roman Emperor 497
- Joseph II, Holy Roman Emperor 559
- Josephus 74, 203, 216
- Jouktas, Mount 25, 28
- Juan, Prince of Asturias 410
- Judaism
  - Almohad sect and 296
  - Christianity and the assertiveness of 222–5
  - Christianity's rift with 213–14, 217
  - cult of the God of Israel brought to Rome 199
  - Day of Atonement 598
  - and Hellenism 153
  - and Islam 244, 340–41
  - Jewish 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Spain 340–41, 404–6
  - Kabbalah 342, 407, 479, 482
  - rabbinic 217, 218–19
  - under Roman rule 214–17
  - Sabbath travel 262
  - and the synagogue of Ostia 212
- Julian (the Apostate) 220–21
- Julius II, Pope 416
- Juno 206
- Jupiter 206
- Justin 125
- Justinian I, Roman emperor 221, 235
- Kabbalah 342, 407, 479, 482
- Kadesh, battle of 41, 42, 48
- Kahina, Queen 245–6
- Kallimachos of Cyrene 160
- Kaminia 106
- Kane, Richard 499, 500
- Karamanli, Yussuf 531
- Karimis 296
- Kastellórizo 384
- Katsamba 25
- Katzones, captain 510–11
- Kemal Atatürk, Mustafa 583, 585, 586, 587
- Kenamun tomb 35
- Kenchrei 95
- Kephalonia 284, 352, 409, 460, 611, 637
- Kerkennah 352
- Kerkyra (Corfu) 86, 87, 98, 99, 141–2, 174
- Kesselring, Albert 607
- Khan al-'Umdan 310
- Khirokitia 8–9
- kibbutz movement 592
- Kimon 141
- Kipling, Rudyard 545
- Kition 70, 74, 91
- Kitim *see* Kition
- Kleon 144
- Knights Hospitallers 269, 364, 365, 366, 386, 414, 415, 416, 431, 445
- Knights of Malta 269, 415, 422, 428, 429, 432, 433, 434, 435, 436, 468, 517, 518, 519; and the Russians 512–13;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269
- Knights of Santo Stefano 452, 462
- Knights Templars 300
- Knossos 9, 23–6, 28, 29, 31, 38
- Evans and the 'palace of Minos' at 565, 566
- palace 24–6
- Kolaios of Samos 79, 126
- Kommene, Anna 283–4

## Komnenos dynasty

Alexios I Komnenos 283, 284-5, 293

Andronikos I Komnenos 324

John II Komnenos 293, 294

Manuel I Komnenos 294, 300, 319,  
322, 324, 328, 329

Komnenos family, post-imperial 329

Korčula 448

battle of 355

*Kosmos* 300Kotor (Cattaro) 385, 438, 521, 581, 582,  
613

Bay of Kotor 390, 457, 511, 521

Kotruljević, Benedetto 390

Kouass 97

Kourion 568

Kroisos (Croesus), king of Lydia 134

Küçük Kaynarca, Treaty of 508

Kurzolaris islands 450

Kyma (Cumae) 90, 110

battle of 114-15, 116

Kypselos 96

Kythnos 17

La Tène culture 125

Lacco Ameno 92-3

Lachish 35

Ladino language 407, 570

Lambert, Frank 529

Lampedusa 250, 629

Languages, ancient

Canaanite 36, 65

Etruscan 104

Luvian 27, 43

Lydian 104

Sard 119-20

Languedoc 125, 126, 332, 335, 358, 404

Laodicea 237

Las Navas de Tolosa 334

Lauria, Roger de 351, 352

Lausanne, Treaty of 588

Lawrence, D. H. 100, 112, 638

Lawrence, T. E. 592

le Paulin, French ambassador 423

Lear, Tobias 535

Lebanon 35-6, 293, 617, 619, 639

Lechaion 95, 96, 285

Lefkandi 91

Lelantine War 94-5

Lemnos 20, 106, 107, 135, 140, 143, 385

Leo Africanus 381

Leo IV, Pope 268

Leo X, Pope 268, 381

Leontini 145

Lepanto 426, 451, 452

Lepidus 197

Lesbos 83, 140, 143-4, 415, 420

Lesseps, Ferdinand, Vicomte de 546, 549,  
550, 551, 552-3, 554

Leukas 174

Levant Company 459-60, 477, 478

Levant trade xxix, 35, 311, 379, 397, 400,  
437, 440, 445, 459, 469

England's 505

and the French 499

Levant Fairs 595

Levantine merchants of Smyrna 585

and Minorca 502

spice trade *see* spice trade

Turkey Company/Levant Company

459-60, 477, 478

Venice and 378, 457, 458

Levantine Jews 437, 458

Levanzo cave paintings 5-6, 7

Lewis, Bernard 244

Libya 576, 615-16, 622, 638

Italy and 603-4, 615, 629

Libyans 48-50, 166-7

refugees 629

*see also* Libya

lighthouse of Alexandria, Pharos island

154-5, 305, 309

Ligurian coast 249

Ligurians 124, 282

*lingua franca* 486-7

Lipari 7, 32, 33, 34, 63, 180

islands 7, 12, 63, 115, 178, 179

Neolithic 10, 12-13, 14

Liria 130

Lisbon 466

Lisle, Peter 531

Lissa 558

Litorius, Count 223

*Littorio* (Italian ship) 607

- Livornine* 464–5, 466  
 Livorno 462, 464–7, 531, 599  
 Livy 187, 199  
 Lixus 66  
 Lleida (Lerida) 346  
*llogtjas* (loggias) 341, 399–400, 402  
 Lloyd Austriaco 556  
 Lloyd George, David, 1st Earl 585, 586, 588  
 Llull, Ramon 342–4, 646–7  
 Lodi, Peace of 383  
*Lombardi* 282  
 Lombards 237, 253, 255  
 London 347  
 Longobardia 281  
 Loria, Alessandro 589, 590  
 Louis I, king of Hungary 377  
 Louis IX, king of France 348  
 Louis the Pious, Frankish emperor 248, 250  
 Louis XII, king of France 409, 420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491–2, 493, 494, 495  
 Louis XVI, king of France 510  
 Louis XVII, heir to French throne 513–14  
 Lucan 193  
 Lukka 49  
 Luli, King 70–71  
 Luni 237  
*Lusiads* (Camões) 396  
 Lusignans 358, 359  
 Luther, Martin 423  
 Luvian language 27, 43  
 Luxardo family 601  
 Lycia 49  
 Lycians 41  
 Lydia 97, 98, 101  
     Persian destruction of 134  
     people of *see* Lydians  
 Lydians 101, 102  
     language 104  
     *see also* Lydia  
 Lysandros/Lysander 147  
 Maccabean revolt 153  
 Macedonians  
     Alexander III (the Great) 149–52  
     IMRO 570–71  
     Romans and 164, 186, 188  
 Madeira 393, 411  
 Madina Mayurqa (Ciutat de Mallorca) 338–9, 340  
 Madison, James 529, 536  
 Maghrib 298, 306, 344, 409–10, 417  
     US envoy to 535–6  
     *see also* Barbary states  
 Magon 76  
 Magona (Maó) 223, 225  
     *see also* Mahón  
 Mahdia (al-Mahdiyyah) 263, 279–80, 319–20, 322, 428  
*Mahmudié* (Austrian Lloyd ship) 556–7  
 Mahmudiyya canal 540  
 Mahón (Maó) 418, 498, 499, 506  
     *see also* Magona  
 Maida, battle of 524  
 Maimon, son of William 332  
 Maimonides, Moses 259, 296  
 Mainake 127  
 Maiori 268  
 Mairano, Romano 299–301  
 Majorca 338–9, 340, 353, 358, 364  
     attacks on Jews 405  
     Black Death 368  
     under Byzantine rule 242  
     Fascist Italians in 604  
     Jews 340, 646  
     *llogtja* 399–400  
     merchants/shipowners 345, 348  
     and Muslim pirates 414  
     Neolithic 14  
     shipping 347–8, 401–2  
     social divisions 399  
     tourism 631–2, 633, 634, 637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401–2  
     and trade networks 362  
     urban population drop (1329–43) 367  
     *see also* Balearic islands  
 Makarios III 623–4  
 al-Makhzumi 297  
 Málaga 78, 124, 393  
 Malamocco 254  
 Mallia 24, 636  
 Mallone, Ansaldo 302



- Malta xxxi, 202, 321, 352, 622  
 British 604, 605, 607–8, 610, 622  
 Catalan consuls 401  
 cotton 323  
 and the Hospitaller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269, 415  
 as an immigrant entry point 629  
 importance to Christendom 429  
 Knights of 269, 415, 422, 428, 429, 432, 433, 434, 435, 436, 468, 517, 518, 519; and the Russians 512–13  
 and Napoleon 516–17, 520  
 Neolithic 10–12, 14  
 and the Russians 512, 518, 519, 520–21  
 sieges: of British Malta (World War II) 520, 608; Ottoman 428–34, 447, 451  
 slave market 435–6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269  
 tourism 631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36  
 and the Turks 269, 428–34  
 in World War II 607–8, 610
- Mamertines 178–9
- Mamluks 349, 355, 379, 392, 397, 537  
 in Syria 349, 414
- Mandelli, Giovanni 380
- Mantua 117, 406
- Manuel I Komnenos, Byzantine emperor 294, 300, 319, 322, 324, 328, 329
- Maó *see* Magona; Mahón
- al-Maqrizi 368
- marble 18, 19, 96, 138, 205, 222, 236, 238, 269, 275, 279
- Marcionites 218, 220
- Marcus Aurelius, Roman emperor 208
- Maria Theresa, Empress 559
- Marinids 334, 347, 363–4
- maritime insurance 402, 439, 457, 465
- maritime law 402–3
- Mark the evangelist 255
- Marmara, Sea of 439
- Marmont, Auguste de 522
- Marnas 221
- Marneion temple 221–2
- Marranos 442–3, 458, 463–4, 647
- Marseilles 77, 110, 114, 126, 237, 247, 250, 358, 376, 622  
 bubonic plague 500  
 and Charles of Anjou 350  
 fall to the Allies 612  
 and James I of Aragon 338  
 merchant privileges 325  
 and Richard I of England 325  
*see also* Massalia
- Martell, Pere 338
- Martial 129
- Martin the Younger of Sicily 381
- Martinez, Ferran 405
- Martorell, Joanot 384
- martyrs 214, 217–18, 223–4
- Marzameni wreck 238
- Masinissa 188
- Massalia 123–5, 126  
*see also* Marseilles
- mastic 345, 358, 366, 374
- Matarò 401
- Mauretania 210
- Mauretians 208, 230
- Mausoleum of Halikarnassos 386
- Maxentius 219
- Maximilian, Ferdinand 557, 558
- Mazara 264, 279
- Mazower, Mark 569
- Mdina 429, 432
- Medenine 610
- Medes 136
- Medici family 403, 462  
 Bank 376  
 dukes of Tuscany 452, 462, 466–7
- Medina Sidonia, dukes of 398
- Medinet Habu 50
- Mediterranean economy *see* economy
- Mediterranean features, physical xxvii–xxx  
 boundaries xxiii–xxiv
- Mediterranean food 628–9
- Mediterranean history literature xxiv–xxvii
- Mediterranean language (*lingua franca*) 486–7
- Mediterranean tourism *see* tourism
- Mediterranean travel accounts (1160–85) 304–17, 462–3

- Mediterranean's names xxiii  
 a 'faithful sea' xxxiii, 646–7
- Megalé Idea* 578
- Mehmet Effendi 482  
*see also* Zevi, Shabbetai
- Mehmet II, the Conqueror, Ottoman sultan  
 383, 385, 386, 387, 388, 391, 415
- Mehmet IV, Ottoman sultan 482
- Meletius of Minorca 223
- Melilla 409, 575
- Melissa, wife of Periandros 98
- Melkites 591
- Meloria, battle of 334
- Melos 5, 7, 9–10, 14, 24, 32
- Melqart 74, 75, 78, 171, 645
- Menander 152
- Menasce, Félix de, Baron 590–91
- Menasce family 591
- Menelaos of Sparta 85
- Menelaus of Caria 206
- Mengebet 39, 40
- Menton 632
- mercenaries 36, 45, 47, 48, 49, 52
- Merchant of Prato 373–5
- merchants 644–6  
 Amalfi 294–5  
 of Barcelona 345  
 Catalan 344, 353, 359–60, 400  
 Genoese 277, 278, 298–9, 301–3, 341, 344, 358, 441  
 German xxix, 277, 401  
 gods posing as 88  
 and heroes of the First Mediterranean  
 29–41  
 Italian 164–5, 183, 264, 270, 285, 291, 297–8, 324, 332, 338, 349, 354, 441, 459, 646; *see also under specific cites*  
 Jewish 199, 248–9, 258–9, 262–4, 266, 279, 295–6, 437, 438, 443, 457, 531, 646, 647  
 Levantine 585; *see also* Levant trade  
 mercenaries, missionaries and  
 merchants of the Third  
 Mediterranean 334–53  
 Muslim 257, 258, 261–2, 266, 296, 404, 453, 457, 465  
 north European merchants of grain 454  
 Phoenician 71, 88, 101, 111, 206, 644, 645  
 Pisan 297–8, 332  
 Puteolan 205  
 Roman 191, 194, 199–200  
 Savoyard 401  
 and shipowners of Majorca 345, 348  
 Venetian *see* Venetians: merchants  
*see also* trade networks; trade routes
- Merneptah, Pharaoh 48–50
- Mers el-Kebir 606
- Meryry, Libyan king 48, 49
- Meshuda* 533
- Meshwesh 48, 50
- Mesolithic 7
- Messana 178, 179
- Messina xxxi, 282, 295, 314, 462, 525  
 arsenal 424  
 bubonic plague 368  
 silk 468  
 Straits of 86, 115, 145, 179, 281, 282, 313–14, 526  
 in World War II 611
- Metellus Balearicus, Quintus Caecilius 194
- Methuen, John 496
- Michael VII Doukas, Byzantine emperor  
 283
- Michael VIII Palaiologos, Byzantine  
 emperor 330, 331, 350, 354, 364–5
- migrations  
 Algerian 622  
 Asian migrants to the Mediterranean  
 629  
 and cuisines 628–9  
 Etruscan 101–5, 108, 117  
 Greek 83–99, 117  
 immigrants from beyond the  
 Mediterranean 629–30  
 Jewish migrants to Palestine 594–5, 617  
 Libyan 48–50  
 Neolithic 8  
 to the New World 573  
 from North Africa 622  
 out of Sicily and southern Italy 628  
 of Palestinians 616–17

- migrations – *cont.*  
 of the Sea Peoples 49, 55–59  
 into southern Greece 54–55  
 temporary migrations of mass tourism  
 631–8
- Miguez, João (Joseph Nasi) 444–6
- Milan 383, 404, 420  
 Visconti lords 376, 382–3
- Milan, Edict of 219
- Milano Marittima 633
- Milawanda *see* Miletos
- Miletos 25, 33, 44, 45, 54, 55, 96
- Military Orders of the Temple and  
 Hospital of St John 326, 348  
*see also* Knights Hospitallers
- Miltiades 134
- Milvian Bridge, battle of 219
- Mine (São Jorge da Mina) 411
- Minerva 206
- Minoan civilization 22–7, 28, 29–31  
 art 36, 37  
 Evans' view of Minoan Crete 566  
 merging with Mycenaean 30–31  
 pottery 22, 23, 24, 27  
 trade routes 24
- Minorca 339, 373, 418, 423, 495  
 and the British 498–503, 514  
 and the French 498, 501–3  
 Jews 223–5  
 Neolithic 14  
 and the Russians 509–10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501–3  
*see also* Balearic islands
- Minori 268
- Minos, King 22
- Mintoff, Dom 622
- Misenum 208, 210
- mistral xxviii
- Modon 419, 538
- Mogador 72
- mommia* 297
- Monaco 360
- Monemvasia 419–20
- Mongols 342, 355  
 and bubonic plague 367–8
- Monophysites 220, 244
- Monopoli 388
- monotheism 153, 225
- Montague, Edward, 2nd Earl of  
 Manchester 489–90
- Monte Carlo 632
- Monte d'Accoddi 121
- Montecassino, Benedictines of 269, 274
- Montecatini 632
- Montenegro 385, 440, 521, 581, 582
- Montfort, Simon de 335
- Montilla 78
- Montpellier 305, 325, 333, 335, 338, 339,  
 358
- Moors  
 and Gibraltar 497  
 pirates 208  
 in Sardinia 233  
 and Vandal shipping 232
- Morea 488–9, 508, 537–8  
*see also* Peloponnese
- Morisicos 408, 434, 447, 453, 470–76, 647
- Moroccans 363–4  
 Marinids 334, 347, 363–4  
 pottery 280–81  
*see also* Morocco
- Morocco 4, 258, 263, 296, 298, 355, 577,  
 617–18  
 and America 532, 534  
 defeat of Sebastian of Portugal in 453  
 and the English 459  
 grain 298, 392  
 people of *see* Moroccans  
 Tangier 396, 491–4, 577, 626  
 tourism 633
- Moscow 612, 638
- Moses 58, 153
- Mostar 439
- Mother/Great Goddess 11, 12, 18, 213
- Motya 76, 81, 166, 170
- Mudros 579
- Müezzinzâde Ali 449, 450
- Muhammad Ali 537, 538, 539–40, 548,  
 565
- Mujahid, Muslim warlord 273
- mules 440
- Murad II, Ottoman sultan 385
- Murat, Joachim 524, 525–6
- Murcia 398

- Muret 335  
 Murlo 104  
 Murrow, Ed 609  
 Muscovy 504  
     trade 459  
 Muscovy Company 460  
 Muslims *see* Islam and the Muslim peoples  
 Mussolini, Benito 574, 601, 604, 605, 606,  
     608, 610, 611, 612  
 Mustafa, Lala 448-9  
 Mustafa Pasha 432, 433-4  
 Mycenae 29-30, 32, 46, 53, 87, 565  
     high kings of 44  
     Treasury of Atreus 563  
 Mycenaean 29-35, 53, 54, 71, 565  
     and the Anatolians 44-7  
     pottery 34, 35, 43, 46, 51, 54, 56  
     refugees in Cyprus 54  
     tombs 32, 34-5, 54, 565  
     trade 32, 33-4  
     *see also* Mycenae  
 Mykale 137  
 Mylai 181  
 Myra 292  
 Myriokephalon 329  
 myrrh 158, 165  
 Mytilene 143-4  
  
 Nabataeans  
     in Puteoli 206  
     trade routes 165, 221  
 Nabis, king of Sparta 195  
 Nafplion (Nauplion) 419-20, 538  
 Nahmanides 341  
 Naples 179, 267, 390, 420  
     Alfonso V of Aragon's capture of 383,  
         401  
     Aragonese 401, 409  
     attack by Francis I 419  
     banishment of Jews 406  
     Bay of 75, 89, 194, 203, 205, 247  
     bubonic plague 368  
     Byzantine capture of 235  
     Castelnuovo fortress 399  
     Ferdinand II, king of Aragon in 410  
     French and Aragonese claims to the  
         throne 387-8  
     kings of 352, 354, 360, 365, 382, 387,  
         388, 390  
     pottery imports 236-7  
 Napoleon I 513, 514, 515-16, 517, 520,  
     521, 523, 524, 526,  
     546-7  
 Napoleon III (originally Charles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547-8, 549,  
     554  
 Napoleonic Wars 513, 522-3,  
     524-6  
 Narbonne 358  
 Nasi, Gracia 441-2, 443, 444  
 Nasi, Joseph 444-6  
 Nasrid dynasty 334, 347, 393, 404  
 Nasser, Gamal Abdel 600, 618-19  
 Nathan of Gaza 480, 482  
 National Bank of Egypt 589  
 national identities/nationalism 568-72, 583  
     Greek nationalism 568-9, 623  
 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Cypriot Fighters  
     623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620, 621, 624  
 naturist resorts 636  
 Naukratis 96, 157  
 naval warfare 72  
     *see also* warships/fleets/navies  
 Navarino, battle of 539  
 Navarre 335, 399  
*navicularii* (guilds of shippers) 218, 227-8  
 navies *see* warships/fleets/navies  
 Naxians 138, 140, 444, 445-6  
 Naxos 134, 140, 444  
 Nazism/Nazis 599, 600, 605-10, 611, 612  
 Neanderthals 3-4  
 Negroponte 385  
 Nelson, Horatio, Viscount 463, 515-16,  
     518, 519, 520  
 Neo-Platonism 220  
 Neolithic 8-14  
     buildings 10-11  
     Revolution 8  
 Neptune 644  
 Nero, Roman emperor 203, 204, 205, 217  
 Nerva, Marcus Cocceius, Roman emperor  
     216

- Neretva, river 456  
 Nestor's cup 92-3  
 Netherlands 427, 463, 471  
   *see also* Dutch; Holland  
 Neve Tzedek 593, 595  
 New Carthage (Cartagena) 185, 187  
 New Zealanders, Gallipoli campaign 579  
 Nicaea, Council of 219  
 Nicaean creed 219, 231  
 Nice 422, 605, 610, 632  
   *see also* Nikaia (Nice)  
 Nicholas, St 292  
 Nicosia 446, 447, 623, 625  
 Nicotera 279  
 Niebla, count of 398  
 Niger, river 279  
 Nikaia (Asia Minor) 330, 349, 366  
   *see also* Nicaea  
 Nikaia (Nice) 126  
 Nikomedeia 227  
 Nile Delta 14, 35, 38, 39, 51, 52, 53, 158,  
   297, 376  
 Nile, river xxvii, xxix, 37, 38, 549-50  
   floods xxix, 156, 158, 204  
 Nile Valley 28  
 Niqmadu, King 35  
 Noah, Mordecai 535-6  
 Nora 77  
 Nora stele 73  
 Normandy 612  
 Normans  
   Bohemond I of Antioch and the First  
     Crusade 288-90  
   and Byzantium 281-4, 288-9, 319,  
     322, 323-4  
   collapse of kingdom of Sicily 327-8  
   rule in Sicily 279-80, 281-4, 294, 318;  
   and campaigns from Sicily 319-24  
 North Africa xxix, 14, 66, 74, 101, 174,  
   227-30  
   Aghlabid emirs 250  
   agriculture 203-4  
   Arab conquest 245-6  
   Barbary *see* Barbary states  
   Berbers *see* Berbers  
   Carthage *see* Carthage  
   Catalans in 345  
   Christian soldiers in Muslim armies  
     344  
   coast xxvii, xxviii, 14, 71, 76, 171, 174  
   demotic culture 189  
   French emigration to 573-4  
   Genoese in 298-9  
   grain trade 203  
   Islamic Ifriqiya 246  
   Italian settlers 574-5  
   as Italy's 'fourth shore' 604  
   James I of Aragon and the Muslims of  
     341  
   and Naples 236  
   Numidians 183, 187  
   pagan cults in 221  
   Pompey's actions against piracy 196  
   pottery 204, 236, 237  
   Roger II and 319-20  
   Roman province of Africa 203, 245-6  
   Spanish garrisons 409  
   trade with Catalonia 402  
   trade with Majorca 402  
   Tunisia *see* Tunisia  
   William II and 322  
   in World War II 607, 608, 609  
   *see also* Maghrib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620, 621, 624  
 North Sea 347, 436, 439, 488, 505, 520,  
   579  
 Norwegians 528  
 Noto 282  
 Novi Pazar 439  
 Nubia 245  
 Numidians 183, 187, 188  
 nuns 422, 501, 595, 644  
*nuraghi* 119, 121-2  
 Obadiah 408  
 obsidian 7, 8, 9-10, 12, 13, 15, 24, 32, 33,  
   34  
 Octavian 197, 198-9, 208  
   *see also* Augustus Caesar  
 Odessa 511  
 Odoacer 227, 233  
 Odysseus (Ulysses) 85, 86, 87, 380  
 oil, crude 578

- Axis supplies 609  
 exploration 616  
 from Iraq 605  
 supplies via the Suez Canal 609  
 oil, olive 20, 34, 35, 56, 67, 73, 76, 79, 90, 285, 511  
   Corinthian trade in 97  
   and the Mediterranean diet 629  
   presses 57, 125  
   Ptolemies and oil industry 159  
   scarcity after World War II 628  
 Old Smyrna 55  
 olive oil *see* oil, olive  
 olive trees xxix, 159, 230, 234, 483  
 Oliverdar, Mateu 345  
 Olympia 113  
 Olympic Games 170, 178  
 Onomastikon of Amenoep 55  
 Ophir 69  
 Oran 406, 409, 417, 475, 495, 540-41, 606  
   'massacre' of 622  
 Order of St John *see* Knights Hospitallers  
 Oristano 308  
 Ostia 175, 196, 203, 205, 207-8  
   naval battle off 268  
   religious buildings 212-13  
 Ostrogoths 233  
 Otho, Marcus Salvius, Roman emperor 208  
 Otranto 386-7, 388  
 Otto I, German emperor 275  
 Otto II, German emperor 272  
 Ottoman Bank 571  
 Ottomans 366, 384-8, 392-3  
   in the Balkans 440  
   and Hayrettin Barbarossa 417-18  
   battle for the White Sea 428-35, 445-51  
   battle of Navarino 539  
   and the British 525, 538-40, 568, 578-80, 585  
   Christian reaction to expans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418-23  
   conflicts with Greek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538-9  
   and Corfu 419, 518  
   and Crete 448, 483-6, 565-6, 588  
   and Cyprus 446-51, 567-9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n Ottoman lands 568-72  
   and Dubrovnik 388-91  
   eros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504, 521, 525, 538, 555, 568-9, 573-80; and exit of the Ottomans 578-82, 583-92  
   expan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14-15, 423-4  
   and the French 539, 546-8; Franco-Turkish alliance 418-19, 420-23, 475  
   and Jews 407  
   and Malta 428-34  
   Mamluks *see* Mamluks  
   and the Moriscos 434-5, 471-6  
   and Muhammad Ali 537-40  
   Ottoman corsairs *see* Barbary corsairs  
   and Russians 505-8, 510-11, 518-19, 522  
   and Salonika 570-72  
   settlement with the Spaniard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3  
   Sublime Porte 385-6, 390, 391, 417, 419, 423, 435, 438, 444, 452, 453, 472, 477, 483, 485, 518, 532, 552, 568  
   Suez Canal and reciprocal East-West cultural relations 545, 548-55  
   Turkish-Russian war 505-8  
   and Venetians 385-6, 387, 388, 392, 419-20, 423, 446-7, 483-6, 489; Cretan War (1645-1669) 484-5  
   warships 424-7, 447, 448, 449-50, 484, 506-7, 538, 539  
   western dress 545  
*Our Lady of the Conception* (Hospitaller galley) 416  
 Ovid 102  
 P & O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557  
 Pacifico, Don 564

- package holidays 634–5  
 Paestum (Poseidonia), 112, 177  
 paganism 220–22  
   and Islam 244  
   *see also* fertility cults; goddesses; gods; religion  
 Palaeolithic era 4–7  
 Palaiologos family  
   Andronikos II 354  
   Demetrios 384  
   Michael VIII 330, 331, 350, 354, 364–5  
 Palermo 266, 279, 282, 295, 350, 351, 353, 406, 527  
   Allied occupation 611  
   *see also* Panormos  
 Palestine 55, 57, 325, 445  
   Arabs in 592, 594, 595, 616–17  
   and the British 592, 616–17  
   and the Crusades 292; *see also* Crusades  
   and James II of Aragon 345  
   Jews in 215, 216; conflicts with Arabs 592, 594, 595, 616–17; influx of immigrants 594–5; Jewish revolt (132–6) 216;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592–600, 616–17, 620  
   kibbutz movement 592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616–17, 618–20  
   withdrawal of Turkish troops 580  
   and Zionism 592  
   *see also* Canaan; Holy Land; Israel  
 Palestinian Authority 639  
 Pallottino, Massimo 104  
 Palma, Majorca 338, 604, 621, 634  
   *see also* Ciutat de Mallorca  
 Palma Nova 634  
 Palmerston, John Henry Temple, 3rd Viscount 550, 564  
 Panormos 166  
   *see also* Palermo  
 Pantaleoni family 269  
 Pantelleria 10, 13, 611, 629  
 Paoli, Pasquale 514, 515  
 papacy 247, 274, 383  
   papal fleets 429  
   Papal Inquisition *see* Inquisition  
   relationship with Greek Orthodox Church 282–3  
   *see also specific popes*  
*Papyrella* 14  
 papyrus 156–7, 161, 247  
 Paris 554, 586  
 Paros 18  
 Parthenon marbles 563  
 Patras 342  
 Patton, General George 611  
 Paul, St 202–3, 213–14, 643  
 Paul I, emperor of Russia 511–12, 513, 518, 519–20  
 Paul IV, Pope 442–3  
 Pavia, battle of 420  
*pax romana* 201, 209, 210, 231  
 Peace of Lodi 383  
 Pech Maho 110, 124  
 Pedro of Portugal 339  
 Peiraieus 639  
 Pelasgians 83, 106  
 Peleshet 50–51, 55  
 Peloponnese 488–9  
   Peloponnesian War 96, 133, 141–8  
   *see also* Morea  
 Peloponnesian League 140–41, 142, 143  
 Pelops 32  
 Peninsular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557  
 Peninsular War 524  
 pepper 247, 270, 279, 291, 296, 301, 374, 560, 642  
 Pepys, Samuel 490, 492–3  
 Pera 354  
 Pergamon 161, 236  
   altar 563  
 Periandros (Periander) 96, 97–8  
 Perikles 140  
*Periplus* 127  
 Perpignan 353, 358, 399  
 Persia 378, 427, 440, 484, 578, 609  
   people of *see* Persians  
 Persians 234, 446, 453  
   Byzantium and 236  
   defeat by Alexander III 149  
   and the Delian League 139  
   invasion of Greece 114, 132–7

- invasion of Ionia 123-4
- navy 134, 136-7, 141
-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6-7
- Persian empire 135
- and the Phoenicians 134, 136-7
- and the Scythians 135
- wheat 158-9
- see also* Persia
- Perugia 116
- Peruzzi Bank 375
- Pesaro 443
- Pétain, Philippe 606
- Peter, St 213
- Peter I 'the Great', emperor of Russia 504, 512
- Peter I, king of Cyprus 359
- Peter II, king of Aragon 335
- Peter III, king of Aragon 339, 348, 351, 353
- Peter IV, the Ceremonious, king of Aragon 362
- Petrarch 380
- Petronius 206
- Phaistos 9, 24, 25
- Pharaohs 36-41, 48-50, 53, 63, 66
- and Ptolemies 152
- Pharisees 217
- Pharos island 150, 152
- lighthouse 154-5, 305, 309
- Pharsalus 197
- Philadelphia*, USS 534
- Philip II, king of Macedon 150, 174
- Philip II, king of Spain 427, 432-3, 447, 451, 453, 471, 473
- Philip III, king of Spain 476
- Philip V, king of Macedon 186
- Philip V, king of Spain, Philip de Bourbon/  
Philip of Anjou 494, 495, 496, 497, 498
- Philippi, battle of 197
- Philistines 55-57, 58-59, 644
- Philo 152, 161, 162
- Phocaea 347
- see also* Phokaia
- Phoenicians 63-82, 90, 91-2, 104-5, 645
-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149
- alphabet 80, 644
- at Cádiz 66, 72, 78, 126
- Carthaginians *see* Carthaginians
- Etruscan trade 111
- merchants 71, 88, 101, 111, 206, 644, 645
- and the Persians 134, 136-7
- pirates 134
- and the Ptolemies 156
- in Puteoli 206
- script 80, 644
- and the Seleucids 156
- shipyards 156
- spread of culture 80-81, 128
- trade routes/networks 63, 66, 67-80, 242
- trading system 69-70, 80
- warships 72, 134, 136-7
- Phoibos Apollo 138
- Phokaia 123-4, 347, 392
- Phokaiaians 77, 106-7, 114, 123-4, 126, 134
- Picenes 117
- pilgrimage 379-80
- crusaders and 280, 292; *see also* Crusades
- female pilgrims 644
- Jewish pilgrims 304
- mixing of Muslim and Christian pilgrims 312-13
- modern pilgrims 632
- and piracy 446
- sea journeys of pilgrims 308-15, 317
- Pillars of Hercules 126
- Pindar 95, 115, 160, 169
- Piombino 383
- Pionius 217-18
- Pippin, king of Italy 254
- pirates/piracy xxviii, xxx, 41, 49, 52, 54, 65, 194-6, 247, 360, 647
- Aegean clearance of pirates by a 'Holy League' 365
- Arab 249, 250-51, 278-9
- Barbary *see* Barbary corsairs
- based in Crete 163, 195
- Christian 381, 414, 429, 435, 446, 449, 453
- Cilician 165, 195



- pirates/piracy – *cont.*
- Croatian 439, 440
  - from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413–14
  - English 461
  - Etruscan 63, 72, 105–6, 109
  - Genoese 328–9, 331
  - Greek 72
  - Italian 275, 328–9
  - by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414, 429, 435
  -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453–4
  - Maltese 429, 435, 484
  - Mauretanian 208
  - Monegasque 360
  - Moorish 208
  - Muslim naval power based on 249, 250–51, 268, 278–9, 402, 414, 423–4
  - Phoenician 134
  - and pilgrim traffic 446
  - Polykrates of Samos 134, 138, 147
  - and the Romans 175, 194–6, 642
  - Saracen 272–3
  - ship technology 461
  - and slavery 414, 417, 418
  - small trading ships and the decline in piracy 201
  - Turkish 428
  - Tuscan 452
  - 'Tyrsenians' 54, 71, 83, 105, 106–7, 115, 195
  - of the Uskoks 439
  - and the Venetian *muda* protection 360, 642
  - Volscian 175
- Pirenne, Henri 247
- Pisa xxxi, 109, 271–81, 286, 290, 301, 316, 326, 346, 358
- and Amalfi 294–5
  - churches and cathedrals 275, 279, 280–81
  - government of 276–7
  - people of *see* Pisans
  - tourists in 633
- Pisans
- and Acre 310–11
  - and Catalans 361
  - commercial privileges 293
  - commune 276–7
  - and the Crusades 292
  - and Genoese 273, 274, 275, 278–9, 305, 334
  - in Majorca 338
  - massacre in Constantinople (1182) 324, 329
  - merchants 332; incident in Egypt 297–8
  - navy 273, 294–5, 327
  - and Sardinia 273, 274–5
  - sheep 367
  - and shipping 316–17
  - see also* Pisa
- Pithekoussai (Ischia) 34, 89–90, 92–4, 95, 110, 268, 422
- pithoi* 34
- Pius II, Pope 393
- Piyale Pasha 429, 432, 433–4
- Piyamaradu 44
- plague 59, 399
- bubonic *see* Black Death/bubonic plague
- Plataia, battle of 132, 137
- Plato 169–70
- Plautus, Titus Maccius 193–4, 199, 439
- Pliny the Elder 180, 203
- Plutarch 133, 146, 172, 195, 196
- Po, river xxvii
- Po Valley 117, 236, 255
- Poland 599, 605
- Poliochni, Lemnos 20–21
- Polis 87
- pollution 637, 640
- Polo, Marco 355
- Polybios 178, 179, 181, 647
- Polykrates of Samos 134, 138, 147
- Pomella* 290
- Pompeii 114, 206, 562
- Pompeius Magnus Pius, Sextus 195, 200
- Pompey the Great 196–7
- Pontine Jews 437, 458, 464–5
- Ponza 268
-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620
- population 376
- and the Black Death 366–7, 368–9

- Porphyry 221, 222  
 Port Said 551, 553  
 ports xxx–xxxii  
     *see also specific ports*  
 Portugal 79, 398, 453, 465, 491, 580, 637  
     exiled Jews from 441, 443  
     people of *see* Portuguese  
     and Philip II 453, 473  
 Portuguese 364, 393–6, 463–4  
     in Ancona 442  
     Inquisition 463–4  
     Jews 441, 443, 477–8  
     opening of route in 1497 to the East  
         458  
     war fleets 366, 393–5  
     *see also* Portugal  
 Portus, Ostia 207–8  
 Poseidon 22, 73, 85, 165, 644  
 Poseidonia (Paestum) 112, 177  
 Potidea 143  
 Potnia, goddess 26  
 pottery/ceramics  
     Aegean 20  
     African 204, 236, 237  
     Alexandrian 156  
     amphorae 25, 67, 97, 201, 202, 206,  
         232, 236, 237; of oil 92; of wine 73,  
         92, 157, 164, 237  
     Anatolian 20  
     Athenian 55, 96, 101, 105–6  
     Bronze Age Greek 26  
     *bucchero* style 93, 109  
     Carthaginian 96  
     Corinthian 87, 95, 96, 101; in Sardinia  
         122  
     Cretan 236  
     Cypriot 38  
     Egyptian 280  
     Etruscan 78, 110, 112–13; in Massalia  
         124; in Sardinia 122; Villanovan  
         109  
     Euboian 87, 92  
     Greek 75, 77, 108, 113, 126; Attic 113,  
         126; in Massalia 124, 125; in  
         Sardinia 122; *see also under specific*  
         *Greek cultures*  
     Helladic 33, 35, 43, 53  
     Iberian 130  
     Islamic 280  
     Late Bronze Age 33  
     Minoan/Cretan 22, 23, 24, 27  
     Moroccan 280–81  
     Mycenaean 34, 35, 43, 46, 51, 54, 56  
     Neolithic 9, 12, 13  
     from Philistine sites 55, 56  
     Samian 237  
     Scornavacche as a centre of ceramics  
         industry 172  
     Sub-Mycenaean 54  
     and the sugar industry 393  
     Syrian 38, 91  
     of Troy 20, 43  
     Valencian 403  
 Potyomkin, Grigory 509  
 Pozzuoli 205  
     *see also* Puteoli  
 prehistoric society development 15  
 Preveza, battle of 420  
 prostitutes 74, 464, 644  
 Protestantism  
     and confessional identity 488  
     and the Inquisition 461  
     Messianic ideas 481  
     Philip II's wars with Protestants 453  
 Provence xxviii, 125, 126, 210, 250–51,  
     346  
 Prussia 520, 554, 558  
 Pryor, John xxvii, xxviii  
 Ptolemies 152–64, 188  
     grain trade 158  
     navy 156  
     and the olive oil industry 159  
     Ptolemaic Alexander 152–4, 155–62;  
         Alexandrian Library 159–61  
     Ptolemy I Soter 152, 153, 154, 159–60  
     Ptolemy II Philadelphos 153, 156, 161,  
         549  
     Ptolemy IV Philopater 156  
     Ptolemy VIII 200  
     Ptolemy XIII 197  
     Ptolemy XV Caesar 197  
     trade control 157  
     *see also* Cleopatra  
 Ptolemy, Claudius 162

- Punic Wars 177–90  
     First War 177–8, 179–82  
     origins of 178–9  
     Second War 177, 178, 183–8  
     Third War 177, 189  
 Punt 37  
 purple traders *see* Phoenicians  
 Puteoli 165, 203, 205–7, 210  
 Pylos 31, 32, 46, 52, 144  
 pyramids 37  
 Pyrgoi 111, 170, 175  
 Pyrrhos of Epeiros 174, 176, 177  
 Pytheas 127
- Qayrawan 246, 263  
 Quintio 201
- rabbis 217, 218, 219  
 Radhanites 248  
 Raeder, Admiral Erich Johann 609  
 Ragusa *see* Dubrovnik  
 Ragusans xxiii, 388–91, 437, 438, 439,  
     442, 448, 478, 526–7, 532  
     and Genoa 468  
     and Ottomans 414  
     and the Russians 521–2  
     and trade from Alicante 465  
     and Uskoks 457  
 Rahmi Bey 584, 585  
 railways 576, 582, 585, 594  
     and tourism 632, 633, 634  
 Ramesses II, Pharaoh 41, 48  
 Ramesses III, Pharaoh 48, 50  
 Ramesses XI, Pharaoh 39  
 Ramesses, city of 37  
 Ramon Berenguer III 338  
 Ramon de Penyafort 341  
 Ravello 268, 295  
 Ravenna 208, 210–11, 235, 252, 253, 358,  
     420  
*Real* (Spanish flagship) 450  
 Red Sea 37, 38, 58, 158  
     blockade of Israel 619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trade 69, 296, 355; routes 158, 248,  
     296, 355
- Reggio 203, 368  
     *see also* Rhegion  
 Reis, Murad 531  
 Reis, Piri 415  
 relics *see* religious relics  
 religion  
     Baal worship 70, 81–2  
     beliefs carried along trade routes 213,  
         332, 481, 482–3  
     Canaanite 57, 65–6  
     changes of 426–7; mass conversions  
         223–5, 405, 441  
     Christian *see* Christianity  
     Delian Apollo cult 138  
     Demeter cult 171  
     and the ‘faithful sea’ 646–7  
     fertility cults 11, 18, 154  
     in Gibraltar 496, 497  
     and Hellenistic culture 213  
     ideas spread by travel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213, 256, 266–7,  
         332, 342, 481, 482–3  
     Isis cult 199, 213  
     Islamic *see* Islam  
     Jewish *see* Judaism  
     under Julian 220  
     in Minorca 500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569–72  
     Phoenician 81–2  
     and the Romans 209, 213–22  
     sacrifice *see* human sacrifice; sacrifices  
     tolerance in 426  
     in Trieste 559–60  
     *see also* Bible; funerary rites; goddesses;  
         gods; religious buildings; temples  
 religious buildings  
     Anglican churches, Minorca 500  
     at Ostia 212–13  
     synagogues *see* synagogues  
     temples *see* temples  
 religious relics 223, 224, 255, 329, 330,  
     345, 368, 512  
 René of Anjou, king of Naples 382, 383,  
     397  
 Renfrew, Colin 10, 17  
 Rethymnon 484

Revolutionary War, French 513–20

Rhegion 115, 178

*see also* Reggio

Rheneia 138

Rhode (Roses) 124, 127, 352

Rhodes 25, 32, 53, 93, 414

and Alexandria 157, 163–4

Arab sea battle off 245

besieged by Mamluks 392

Catalans and 401

Colossus of 155, 163

earthquake 164

and the Italians 577

and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269, 364,

386, 414, 415

Mycenaean trade with 32, 33

people of *see* Rhodians

sieges of 163, 414–15

and trade routes 53, 366

and the Turks 269

wine 164

Rhodians

bankers 164

coinage 164

grain trade 158

Sea Law 236

*see also* Rhodes

Rhône delta 250

Rhône valley 125

Ricart Guillem 335–6

Riccione 633

rice 340, 374, 404, 465, 532, 560

Richard I, king of England 325

Richelieu, Armand de Vignerot du Plessis

502, 503

Richelieu, Armand Jean, Cardinal 475–6

Rijeka (Fiume) 601–2

Rimini 358, 632, 633

Ariminum 177

Robert, count of Flanders 290

Robert the Wise, king of Naples 360, 365

*Roccaforte* 360

Rodriguez, Marrano Daniel 440

Roger I, count of Sicily 279, 281–2, 283,

294, 318

Roger II, king of Sicily 318–22

*Roma* 611

Romania 355

Romano, Ruggiero 465

Romans

and the Aetolian League 188

Christian persecution 214, 217–18

Christianity legalized by 213, 219–20,  
227

civil wars 196–7, 198–9

coins 204, 220

destruction of pagan temples 221–2

development of 'Romanness' 191

disinteg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226–38

and Egypt 197–200, 208–9

and Etruscans 175

*garum* sauce 76, 206, 641

interference in Aegean trade networks  
164

and Macedonians 164, 186, 188

navy/fleets 175, 176, 177, 178, 179,

180–82, 185, 186–7, 198, 208–9,

210

*pax romana* 201, 209, 210, 231

and pirates 175, 194–6, 642

pre-Punic War battles with

Carthaginians 175

and Ptolemies 188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and religion 209, 213–22

and Rhodians 164

Roman Republic 188

and Seleucids 188

slavery 191–3

Tetrarchy 227

treatment of Jews 213, 214–17

treaty with Vandals 231

and the Volscians 175

*see also* Rome

Rome

Amalfi and 268–9

Arab attacks on 250, 268

attack on Syracuse 186–7

birth of Imperial Rome 199

Carthaginian treaties with 127, 174–5,  
188

Rome - *cont.*

- Celtic attack on (390 BC) 118
- citizenship 191, 193
- as a cosmopolitan city 193-4, 199-200
- distinction between Senate and merchants 191
- Gallic invaders 175
- grain trade 175, 195, 200-205, 207-8, 227; and pirates 196
- great fire 217
- Hannibal's attack on 185
- immigrant population 193-4
- Jews in 194, 199
- people of *see* Romans
-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terranean 174-7, 183-4, 191-4, 196-211
- Punic wars *see* Punic Wars
- sacking by Alaric the Goth 223, 229-30
- salt supplies 109
- Samnite war 176
- and Sicily 175, 178-83, 186
- and southern Italy before the Punic Wars 176-7
- spoken languages in 193-4
- St Peter's Basilica 219, 268
- and Taras 175-6
- Vandal plundering of 232
- voting rights 191
- Romegas 429, 435
- Rommel, Erwin 608
- Romulus Augustulus 227
- Roses (Rhode) 124, 127, 352
- Rosetta 548
-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481
- rostra* 175
- Rothschild, Jacob de 551
- Rothschild bank 556
- 'Rough Cilicia' 195, 197
- Roussillon 335, 339, 353, 501
- Roussillon, count of 338
- Royal Navy 514, 524-5, 564, 578, 579-80, 588, 605, 606, 614, 622
- Rozafa 385
- Rufolo family of Ravello 295
- Ruslan* 594
-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522
- Russians 504-13, 514, 518-23, 568, 578
  - and the British 504-6, 509-10, 515, 522, 523, 612
  - and Dubrovnik 521-2
  - Gallipoli campaign 580
  - and Malta 518
  - and the Ottomans 505-8, 510-11, 518-19, 522, 539
  - Turkish-Russian war 505-8
  - in World War I 578
  - in World War II 609, 612
  - see also* Soviet Union
- Sabbath travel 262
- Sacramonte tablets 471
- sacrifices 46, 184
  - child 66, 75, 76, 81-2
  - to deified emperors 213
  - human *see* human sacrifice
  - Jewish sacrificial cult 216, 220
- Sadat, Anwar el- 620
- Safavids 417, 446
- Safed 407
- saffron 27, 297, 327, 367
- Sagrera, Guillem 399-400
- Sagromoso, Michele 512
- Saguntum 185
- Said Pasha 550-51
- St Elmo 430, 432, 433
- Saint-Florent 515
- St Petersburg 504
- St Philip's fort, Minorca 498, 501, 502, 503
- St Sabas, War of 326
- Saint-Simon, 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549
- St-Tropez 636
- Saladin 296, 297, 310, 325, 326
- Salado, battle of 364
- Salamis 114, 136-7
- Salerno 301
  - Gulf of 247
- Salonika 407, 569-72, 595, 598-9
  - see also* Thessalonika; Thessaloniki
- salt 76, 109, 252, 253, 285, 346, 358, 389, 641
- Samaria 69

- Samaritans 260  
 Samnites 176  
 Samos 95, 137, 236, 237, 538  
 San Gimignano 326–7, 367  
*San Giovanni* 428  
 San Mateu 373  
 San Roque 626  
*Sanctus Franciscus* 345  
*Santa Maria della Grazia* 461  
 Santa Trinità di Saccargia, abbey 275  
 Santo Stefano, Knights of 452, 462  
 Santorini 365  
 São Jorge da Mina (the Mine) 411  
 São Tomé 393  
 Sappho 160  
 Saracens 247, 271, 272–3, 346  
 Saragossa 335, 336  
 Sarapis 154, 209, 212  
 Sardinia 73, 119–23, 295, 362, 376  
   Alfonso IV's invasion 361  
   Arab invasion 250  
   under Byzantine rule 235, 242, 249  
   and Catalans 361, 381  
   Gelimer and 232  
   Jews sent to 215  
   Mujahid in 273  
   Mycenaeans in 34  
   Neolithic 14  
   *nuraghi* 119, 121–2  
   people of *see* Sardinians/Sards  
   Phoenician and Carthaginian settlement  
     77  
   Pisans and Genoese in 273, 274–5  
   Pompey's actions against piracy 196  
   salt 346  
   and the Second Punic War 183–4  
   silver 157, 361  
   tombs 119, 120–21  
   tourism 637  
   and the Vandals 233  
   in World War II 611  
 Sardinians/Sards 77, 122–3, 167  
   and Carthaginians 122, 167  
   and Catalans 361–2  
   Etruscan trade 109  
   Euboian contact 92  
   and the Pisans and Genoese 274–5  
   Sard language 119–20, 274  
   statuettes 123  
   *see also* Sardinia  
 Sardis 102, 236  
 Sargon II 70  
 Sarkozy, Nicolas 639  
 Saronic Gulf 95  
 Saseno 603  
 Saul, King 59  
 Savona 316, 358  
 Savoy, duke of 462  
 Savoy, house of 558  
 Savoyard merchants 401  
 Scala 268  
 Scanderbeg, George Kastrioti 384, 385,  
   391  
 scarabs 27, 93, 108  
 Schechter, Solomon 259  
 Schliemann, Heinrich 18–19, 21, 87, 564–5  
 Sciaky, Leon 569–70  
 Scipio Aemilianus 189, 200  
 Scipio, Gnaeus 185  
 Scipio, Publius Cornelius 187  
*sciocco* xxviii  
 Scoglio del Tonno 35, 87  
 Scornavacche 172  
 scurvy 463  
 Scutari (Shkodër) 385  
 Scythians 135, 158  
 sea level 6  
 Sea Peoples 42, 49–54, 55–59, 66, 644  
 sea warfare  
   art of 424  
   fleets *see* warships/fleets/navies  
 Sebastian of Portugal 453  
 Seeley, Sir John 139, 494  
 Segesta 145, 166, 167  
 Segorbe, bishop of 473–4  
 Seleucids 153, 156, 163, 188  
 Selim I, Ottoman sultan 418  
 Selim II 'the Sor', Ottoman sultan 444, 445  
 Selinous/Selinuntines 145, 166, 167  
 Seljuk Turks 289  
 Selwyn Lloyd, John Selwyn Brooke Lloyd,  
   Baron 619  
 Sempronius 209  
 Seneca 102, 382

- Senj 454-5, 456-7
- Sephardic Jews 407-8, 438-9, 443, 444, 464, 467, 470, 476-83, 486, 569-72, 599, 647
- Levantine 437, 458
- Ponentine 437, 458, 464-5
- Septuagint 161-2
- Serapis *see* Sarapis
- Serbia 329
- Sestii 201
- Seven Years War 501-3
- Severus of Minorca 223, 224, 225
- Severus, Publius Attius 206
- Seville 405, 410, 412
- Shalmanasar III, Assyrian king 69
- Shardana 48, 49, 50, 51, 55
- Shekelesh 49, 50-51, 52
- shekels 70
- shipbuilding
- in Barcelona 441
  - Corinth as centre of 95
  - Dutch 463
  - Venetian 378-9
- shipping
- accounts of crossing the Mediterranean (1160-85) 304-17, 462-3
  - Adriatic 117
  - Allied 610
  - American 529-30
  - from Barcelona 400-401
  - boom in maritime traffic (168 BC-2nd century AD) 201
  - British 498, 505, 524
  - Bronze Age ships 18
  - of Byzantine period 237-8
  - Catalan 344-8, 359-60, 400
  - close season 202
  - Corinthian 136
  - cruises 637
  - between Egypt and Syria 38
  - embargo imposed by William I 314
  - English 396
  - Etruscan 114, 115
  - Florentine 404, 437
  - French 397
  - Genoese 315, 316-17, 347-8, 360, 378, 404
  - grain ships 202-3, 205; *see also* grain trade
  - ironclads 555-6, 557-8
  - in the Islamic world 264, 265-6, 281
  - Levant trade xxix; *see also* Levant trade
  - Majorcan 347-8, 401-2
  - Minoan 25
  - and Muslim pirates/navies 249, 251
  - navicularii* (guilds of shippers) 218, 227-8
  - Neolithic boats 13-14
  - onboard conditions and food 462
  - Phoenician 71-3
  - and piracy *see* pirates/piracy
  - Pithekoussai and 93
  - Ragusan 390
  - Red Sea trade 69, 296
  - Rhodian 163-4
  -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seas 210, 440; *see also* pirates/piracy
  - Sicily and 264-5
  - steamshipping 555-8, 573
  - storms and 182, 403; *see also* storms
  - through the Suez Canal 553, 605
  - and Trieste 558-9, 560-61
  - Turkish 386, 422, 456-7, 484, 510, 511
  - types of vessel 315-16
  - Vandal 232
  - Venetian 255, 360, 378, 379, 440, 460
  - winds and xxviii, 71, 312, 313-14
  - in World War II 607, 610
- shores xxviii
- Sicilian Straits/Channel 13, 182, 233, 279, 352, 429
- Sicilian Vespers 350, 361
- Sicily 119, 302-3, 353, 361, 424
- under Aragonese kings 351, 352, 381
  - attacks on Jews 405
  - and the British 525-6, 607
  - Byzantine invasion and rule 235, 242, 265
  - Carthaginian invasion 137, 166-74
  - Catalans in 381
  - collapse of Norman kingdom of 327-8
  - decline of Greek contact 54
  - deforestation xxx
  - destruction in thirteenth century BC 63

- under Frederick II 349
- and the Genizah trade network 264–5
- and the Genoese 322–3, 328
- grain 144, 172–3, 179, 186, 263, 279, 319, 322–3, 346, 356, 392, 436, 468, 527–8
- Islamic 264–5
- and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415
- Latinization of 282
- Mamertines in 178
- Mesolithic 7
- mixed population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282
- Muslim invasion 250, 264, 268
- and Muslim pirates 414
- Mycenaean trade with 33
- navy/fleets 319–20, 321–2, 323–4, 349, 429
- Neolithic 12–13
- under Norman rule 279–80, 281–4, 294, 318; Sicilian campaigns 319–24
- Palaeolithic 5–7
-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144–6
- Phoenician settlement 76–7
- Pompey's actions against piracy 196
- Richard I on 325
- Rome and 175, 178–83, 186
- salt 346
- Sicilian Vespers 350, 361
- silk 264
- Spain and xxxi
- sugar mills 393
- Syracuse *see* Syracusans; Syracuse
- threats from Italian mainland 54
- tyrants of 98–9, 130, 168–71, 173
- and the Vandals 233
- under viceroy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381
- in World War II 607, 611
- Side 195
- Sidi Barrani 607
- Sidon 68, 69
- Sidonians *see* Phoenicians
- Sierra 408
- Sikans 167
- Sikels 167
- silk 200, 255, 263–4, 355, 437, 440, 465, 468, 474
- silver
  - Alexandrian 156
  - American 441
  - Balkan 98
  - Byzantine 242
  - coinage 97
  - Egyptian 39, 40
  - and the Knights of Malta 436
  - Libyan 48
  - mines 192
  - Mycenaean 32
  - New World 468
  - Phoenician 69, 70, 90
  - and the Ragusans 389
  - Sardinian 157, 361
  - Spanish 78–9, 157, 192
  - Tartessian 79
  - Trojan 21
- Sinai 38, 486, 549, 553, 619, 620
- Six Day War 620
- Skanderbeg *see* Scanderbeg
- Skopje 391
- slavery/slaves
  - and the Atlantic 411
  - of the Black Sea 349, 355, 373–4, 644
  - Catalan trade in 346–7
  - Celtic 117
  - Christians and 249
  - Cilician pirate slave auctions 195
  - Corinthian 95
  - Datini and the slave trade 373–4
  - Delian 165, 205
  - Eaton on 531
  - female slaves 422, 644
  - and freedmen 192–3, 199, 206
  - galley slaves 425–7, 435
  - Genoese 355
  - in the Islamic world 246–7, 248
  - Italic 117
  - Jewish merchants and 248–9
  - Jewish slaves 216
  - from Kerkyra 98
  - Knights Hospitallers and 445
  - in Malta 435–6
  - Muslim slaves 308, 346–7



- slavery/slaves – *cont.*  
 of nuns of Antibes 422, 644  
 and piracy 414, 417, 418  
 Roman 191–3; carried off by Vandals  
 232  
 Sards 274  
 Slav *Saqaliba* 248  
 in Toulon 422  
 in the Tyrrhenian Sea 109
- Slavs 234, 236, 241–2, 390, 521, 522  
 in Dalmatia 254  
 Macedonian 570–71  
 slaves 248  
 warfare with Germanic peoples 248
- Slovenia 456, 640
- Smendes 39
- Smyna 101, 218, 365, 440, 476–81, 500,  
 569  
 after the Great War 583, 584–5,  
 586–7  
 Levantine merchants of 585  
 Old 55, 599  
 World War II and the fall of 599
- Sokollu, Mehmet 446–7, 448, 449
- solar energy 640
- Solomon, king of Israel 66–7, 69
- Solomon ben Ammar 340
- Solomon of Salerno 301–3, 316
- soothsayers 113, 220
- Sophokles 160
- Sorrentine peninsula 268, 295
- Sorrento 423
- Sostratos 111
-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269
- Soviet Union 607, 613, 615, 616, 620  
 disintegration of 638  
 and Egypt 618, 619  
 and Israel 620  
 and the US 620–21  
*see also* Russians
- Spain  
 Almohad sect 296  
 Armada 438  
 Carthaginian trade and settlement 126,  
 127–8  
 Catalonia *see* Catalonia  
 deforestation of Spanish coast xxx  
 disintegration into local kingdoms in  
 thirteenth century 334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575  
 extinction of Muslim rule in 408  
 Falangists 604  
 under Franco 604, 605, 621  
 Genoese alliance with 412, 468  
 and Gibraltar 625–7  
 Hamilcar Barca in 184–5  
 hellenization 126–30  
 Iberians *see* Iberians  
 Islamic (al-Andalus) 250, 258, 261,  
 263, 264, 306, 308, 476, 630  
 Jews: exiled from Spain 406–8, 442–3;  
 relations with Christians and  
 Muslims 340–41, 404–6  
 and the Moriscos 408, 434–5, 447,  
 470–76  
 naval power 424  
 pagan cults in 221  
 people of *see* Spaniards  
 silk 264  
 silver 78–9, 157, 192; American 441  
 southern: Byzantium and 235; silver  
 78–9, 192; and trade networks,  
 eighth century BC 63; *see also*  
 Tartessos  
 Spanish influence on Sardinia 119  
 Spanish lands and the second Punic  
 War 184–5, 187  
 struggle against the Ottomans xxxi,  
 419  
 tin 123  
 tourism 634, 636  
 trade with Morocco 263  
 and the UN 626  
 Vandal and Alan invasion of 230  
 Visigothic invasion of 223, 233, 246  
 war fleets 424, 427, 429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495  
*see also specific cities and regions*
- Spaniards 264, 382  
 after siege of Malta 434  
 alliances with English 488  
 and Barbary corsairs 417  
 conflicts with English 489–90  
 at Jerba 428–9

- and Mahdia 428
- in Muslim fleets 249
- in the Netherlands 427
- and Ottomans 416, 419, 421
- in Rome 193
- settlement with the Ottoman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453
- see also* Spain
- Spanish Succession, War of 495
- Sparta 138
  - Corinthian wars 96
  - and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141
  - people of *see* Spartans
- Spartans 83, 90
  - Archidamian War 143
  - hoplites (soldiers) 138, 144
  - navy 144, 147
  - Peloponnesian War 133, 141–8
  - and the Persians 133, 136–7
  - sea power 136
  - see also* Sparta
- spas 632
- spice trade 158, 165, 296, 297, 345, 355, 378, 397, 400, 437
  - and England 459
  - see also* pepper
- Spina 113, 117–18, 126
- Split 439, 440
- Spurinna family 115–16
- Stadion, Johann Philipp 525
- Stalin, Joseph 612, 613, 616, 620
-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 585
- Stanhope, James 498–9
- steamships 555–8, 573
- Stentinello 12–13
- Stephen, St 223–4
- Sterghiades, Aristides 586
- Stone Age
  - Middle (Mesolithic) 7
  - New (Neolithic) 8–14
  - Old and Middle (Palaeolithic) 4–7
- storms xxviii, 182, 202, 283–4, 308, 312, 313, 393, 394, 403
- Strabo 78, 155, 159, 195
- Strasbourg* (French ship) 606
- Sturmy, Robert 396
- Su Nuraxi 121–2
- Suevi 223, 229
- Suez Canal xxviii, 541, 618
  - blocking of 620
  - and Nasser 618, 619
  - nationalization 600
  - and oil supplies 609
  - and reciprocal East–West cultural relations 545, 548–55
  - shipping through 553, 605
- Suez Canal Company 550, 552, 554
- sugar 323, 373, 374, 377, 392, 404, 411, 465, 585
  - production 393
  - Valencia 393, 474
- Sulcis 77, 81
-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Ottoman sultan 414–15, 418, 419, 421, 423, 429, 433, 442–3, 444
- Sulpicii 206
- Sultana* (Turkish ship) 429, 450
- Sunnis/Sunni Islam 298, 310, 334
- suntan 635–6
- Sweden 520
- Swedes 504, 528, 534
- swimwear 635–6
- Sybaris 116
- Sybota 142
- synagogues 153, 212, 217, 221, 222, 224, 258–60, 405, 465, 478–81, 569, 590
- syncretism 113
- Syracusans 114, 115, 137, 145, 166
  - and Carthaginians 168–73
  - see also* Syracuse
- Syracuse 98–9, 114, 115–16, 145, 168, 170–72, 173, 203, 525
  - Athenian attacks on 115, 146
  - Catalan consuls 401
  - and the Genoese 328
  - people of *see* Syracusans
  - Rome's attack on 186–7
  - tyrants of 98–9, 130, 168–71, 173, 178, 179, 182–3
- Syria 8, 619, 638
  - and Egypt 35–6, 38, 39–41
  - Euboian ties 91
  - Islam in 244

## Syria – cont.

- Jewish rebellion in 208–9, 216
- Mamluks in 349, 414
- and the Mediterranean Union 639
- Mycenaean trade with 32, 33, 35–6
- Ottomans in 414
- trade with Alexandria 157
- Syrians, siege of Rhodes 163
- Tacitus 102
- Talamone 422
- Talmud 219, 260, 341
- Tamerlane (Timur) 365, 384
- Tamin, emir 279
- Tana 355
- Tangier 396, 491–4, 577, 626
- Tanis 39
- Taranto 581–2, 607, 611
  - Gulf of 175–6
  - see also Taras
- Taras 87, 90, 175–6, 179
  - see also Taranto
- Tarentines 176
- Tarhun 104
- Tarquin, king of Rome 98
- Tarquinius (Tarquinius) 93, 94, 98, 104, 107–10
  - tombs 111–12
- Tarragona 128, 304, 338
- Tarshish 66, 68, 79–80
  - see also Tartessos
- Tartars 355
- Tartessos 66, 78–9, 81, 90, 127
  - see also Tarshish
- Taruisa 45, 52
- Tarxien 11
- Taula de Canvi (bank) 400
- Tawfik Pasha, Muhammad 555
- taxation 157, 164, 294, 297
  - in Alexandria 309, 310
  - Busca and 399
  - dhimmis 244, 310
  - and the Genoese treaty with Sicily 322
  - gesia 282
  - on grain 186
  - on Indians 411–12
  - on Jews 216, 282

## jizyah 244

- on Muslims 282, 309
- one-fifth tax (*khums*) 297
- under Selim II 445
- and the US 530
- Venetian privilege 285, 293, 294
- tea 560
  - Boston Tea Party 530
- Tel Aviv 592–3, 594–6, 598, 600, 632–3
- Tell Aytun 56
- Tell el-Amarna 37
- Templars 593
- temples
  - Canaanite 57
  - Greek mythological decoration on 113
  - Jerusalem Temple 67, 153, 216, 232–3
  - of Melqart 75, 78
  - Neolithic 10–11
  - pagan temples reopened under Julian 220
  - Phoenician 70, 73, 75, 78
  - Puteoli temple 206
  - Roman destruction of pagan temples 221–2
    - to Sarapis 154, 212–13
- Tenedos 376, 377
- Tenenti, Alberto 462
- Terence 199
- Terra Amata 3
- Tetuan 416, 575
- Teucrians 52
- textile trade 401
- thalassocracies
  - 550 BC–400 BC 132–48
  - Etruscan 116
  - Roger II, king of Sicily 318–22
- Thapsos 34–5
- Tharros 77
- Thebes 35, 342
- Thefarie Velianas, king of Caere 111
- Thera 26, 27–8
- Thermi 20
- Thermopylai 136
- Thessalonika 324, 330, 384–5
  - see also Salonika; Thessaloniki
- Thessaloniki 572, 600
  - see also Salonika; Thessalonika

- Thessaly 53, 143  
 Thirty Years' War 484  
 Thomson Holidays 633, 634  
 Thourioi (Thurii) 176  
 Thrace 135, 140, 578  
 Thucydides 22, 94–5, 106, 138, 140, 141, 142–3, 144, 145  
 Thutmose IV, Pharaoh 38  
 Tiber, river xxvii, 109, 205  
 Tiberius, Roman emperor 102, 207, 210, 215, 444–5  
 Tibnin 310  
 Tiepolo family (Venice) 299, 331  
 Tilsit 523  
 timber 21, 67, 90, 180, 197, 301, 373, 401, 436, 532, 642  
   Egypt and 37, 39, 40, 263, 297, 537, 643  
 Timbuktu 279  
 Timoleon 171–3  
 Timur (Tamerlane) 365, 384  
 tin 17, 19, 33, 34, 37, 68, 123, 124, 125, 127, 156, 465, 567  
 Tingitania 230, 231  
*Tirant lo Blanc* (Martorell) 384  
 Tiryns 32, 46  
 Tito, Josip Broz 613, 614, 615  
 Titus 216  
 Tjaru (Tell Hebua) 38  
 Tjekker 39, 50–51, 52, 55, 65  
 Tlemcen 417, 475  
 tobacco 477, 576  
 Tobermory wreck 438  
 Toledo 340  
   Cathedral 364  
   Jews 404  
 Tolfá 393  
 tombs  
   Egyptian 26, 35, 37, 39  
   Etruscan 100, 101, 104, 108, 111–12, 114, 117, 563  
   hypogea 10–11  
   Iberian 129, 130  
   Maltese 10  
   Mycenaean 32, 34–5, 54, 565  
   Phoenician 77  
   Sardinian 119, 120–21  
   at Spina 117  
 tools  
   copper and bronze 19  
   Mesolithic 7  
   Neolithic 8, 9, 10  
   Upper Palaeolithic 5, 6  
*tophets* 75, 81–2  
 Torcello 253  
 Torchitorio, Mariano 275  
 Tortosa 405  
 Toscanos 78  
 Tossa 401  
 Toulon 422, 495, 501, 502, 513–14, 523, 524, 612  
 tourism 380–81  
   gay 636  
   Grand Tours 562, 564, 632  
   mass tourism 631–8  
   Mediterranean travel accounts (1160–85) 304–17, 462–3  
 Toussoun, Omar 591  
 Toya 129  
 trade networks 33–4, 63, 73, 91, 242, 296, 302, 367, 401, 485  
   Aegean 29, 35, 55, 164  
   Alexandria and the Hellenistic network 156–7  
   Byzantine 236–8  
   Catalan 344–8, 401, 410  
   of a Catalan-Aragonese 'empire' 362  
   and commercialization 367  
   of Crete 485  
   of the Crown of Aragon 400–401  
   of the diaspora Jews 443  
   to the East 262  
   Euboian 92, 93–4  
   focused on maritime trade of Genoa, Pisa and Venice 277  
   fragmentation of: into Christian and Muslim sectors 296: in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348–9  
   French 397  
   Genizah network 262–4  
   Genoese 271, 354  
   Hellenistic 157, 165  
   Islamic 246–7, 267  
   Levantine 35  
   Phoenician 63, 67–80, 242

- trade networks – *cont.*  
 Pisan 271–2  
 Roman interference in Aegean networks 164  
 under Roman rule 201–4  
 and specialization 367
- trade routes  
 up the Adriatic 126, 385  
 Aegean 17, 22, 44  
 alphabet carried along 110, 644  
 Athenian 116–17, 141  
 belief systems and ideas carried along 213, 266–7, 332, 481, 482–3  
 Black Death's spread along 368  
 to the Black Sea 227, 355, 508, 557  
 Byzantion and 227  
 Byzantium to Egypt 296  
 Corinth and 95, 98–9  
 Coron, Modon and 419  
 Cyprus to Armenia 359  
 through the Dardanelles 376  
 Dodecanese islands and 577  
 from Dyrrhachion to Constantinople 269  
 to the East, opened 1497 by the Portuguese 458  
 between Egypt and the Tyrrhenian Sea 93–4  
 Epidamnos and 141  
 to Etruria 95, 101, 110  
 Euboian 92, 93–4  
 Gaza and 221  
 Iberians and 131  
 to the Indian Ocean 155, 157, 262, 355, 549–50, 561, 573  
 to Islamic lands 300, 465  
 Italian 271, 288, 318, 404, 458;  
 Etruscan 95, 101, 110  
 from Livorno 465  
 Minoan 24  
 Nabataean 165, 221  
 New World 410  
 to North Africa 465  
 to northern Europe 125  
 Ottoman 414  
 up the Persian Gulf 263  
 Persians and 134  
 Phoenician 66, 73  
 Radhanite 248  
 down the Red Sea 158, 248, 296, 355  
 reopened after Sicilian Vespers 361  
 Rhodes and 53, 366  
 trans-Asiatic 355  
 Troy and 45  
 Venetian control of Byzantium routes 330  
 Venetian nobility's domination of 360, 365
- trade shipping *see* shipping
- Trafalgar, battle of 524
- Trajan 208–9, 216, 382
- Trani 342, 388
- Trapani 76, 353, 401
- travel industry *see* tourism
- 'Treasure of Priam' 21, 565
- Treasury of Atreus 563
- Trebinje 390, 439
- Trebizond 329, 378
- Treviso 377
- Trieste 524, 558–61, 571, 600, 601
- Tripoli 319, 409, 415, 428, 528  
 American conflict with 529, 534–5  
 American treaty with 529, 536  
 bashaw of 534  
 Italian rebuilding of 576  
 massacre by the Greeks 538  
 Mussolini in 604
- Tripolitania 571
- Trogus, Pompeius 125
- Trojans  
 identity of 42–3  
 and the Sea Peoples 52  
 Trojan War 19, 45, 87, 93  
*see also* Troy
- Troubridge, Thomas 515
- Troy 17, 18–22, 25, 32, 43–4, 53  
 fall of 42, 47, 52, 84–5  
 Hisarlık as Homer's 19, 20, 42, 45  
 legends of 564  
 Mycenaean trade with 32  
 people of *see* Trojans  
 and trade routes 45  
 Troy I 19–20  
 Troy II 20–21

- Troy III 21  
 Troy IV 21-2  
 Troy V 22  
 Troy VI 27, 42, 45-6, 47  
 Troy VIIa 43, 47, 52  
 Truman, Harry S. 616  
 tuna-fishing 10, 19, 76, 640, 641  
 Tunis 170, 246, 263, 346, 531-2  
   and America 535-6  
   and the Barbary corsairs 416, 418, 421  
   bey of 528, 531  
   Black Death 368  
   Catalans in 345, 346  
   and Charles V 418  
   fall to the Allies 610  
   grain 356  
   Hafsid rulers 334, 416  
   Lull in 343-4  
 Tunisia 13, 263, 334, 617-18  
   and the Bedouins 279  
   Capsian culture 7  
   Carthage *see* Carthage  
   economy 576  
   and the French 574, 576, 621  
   and the Italians 576  
   Mahdia 263, 279-80, 319-20, 322, 428  
   Moriscos 476  
   under Roman rule 203  
   tuna fishermen 641  
   Tunis *see* Tunis  
   in World War II 610  
 Turgut 428, 430  
 Turkey 445, 459, 482, 499-500  
   and the EU 638-9  
   and Israel 638  
   and the Mediterranean Union 639  
   nationalism 583  
   and NATO 620  
   people of *see* Turks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 625  
   war with Italy 576  
 Turkey Company 459-60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 625  
 Turkish-Russian war 505-8  
 Turks 287, 289, 329, 364-5, 366  
   and Alfonso V of Aragon 383-4  
   Anatolian 625  
   Austrian trade with 539  
   Greco-Turkish wars 538, 586-8  
   and the Hospitallers 386  
   and Malta 269, 428-34  
   Ottoman *see* Ottomans  
   pirates 428  
   and Rhodes 269  
   and Russians 505-8, 510-11, 518-19, 522  
   in Smyrna 585, 586-7  
   Turkish Cypriots 568-9, 623, 624-5  
   Turkish shipping 386, 422, 456-7, 484, 510, 511  
   in World War I 577-8  
   Young Turks 583  
   *see also* Turkey  
 Turmeda, Anselmo ('Abdallah at-Tarjuman) 380-81  
 Tursha 49, 52  
 Tuscany 34, 81, 92, 104, 356-7  
   dukes of 452, 462, 466-7  
   Etruscans *see* Etruscans  
   famines 367  
   grain 466  
   Livorno trade 464-7  
   Medici duke's holy warriors 452  
   tourism 633  
   Tuscan pirates 452  
   wool imports 373  
 Tutankhamun, Pharaoh 37  
 Tutugi 129, 130  
 Tyre 66-7, 68-9, 70, 79-80, 149, 325  
   peoples of *see* Tyrians  
   Venetians in 293  
 Tyrians 66-7, 70, 75, 77, 81, 82, 194, 206  
   Carthaginians *see* Carthaginians  
   Phoenicians *see* Phoenicians  
   and Rome 194  
   *see also* Tyre  
 Tyris (Valencia) 128  
 Tyrrhenia *see* Etruria  
 Tyrrhenian Sea 89-90, 92, 103, 109, 114-15, 116, 125, 196, 272-3, 295

- Tyrrhenians  
 Etruscans *see* Etruscans  
 pirates 195; *see also* 'Tyrsenians'  
*see also* Etruria  
 'Tyrsenians' (pirates) 54, 71, 83, 105,  
 106-7, 115, 195  
*see also* pirates/piracy  
 Tyrsenoi 52, 101-2, 106  
 Etruscans *see* Etruscans  
 Tyrsenos 101
- Ugarit 35-6, 46, 52, 58, 65, 80  
 ships 72
- Ukraine 355
- Ulcinj 448
- Ullastret 128
- Uluburun wreck 33
- Ulysses (Odysseus) 85, 86, 380
- Umur Pasha 365
- UNHCR 629
- Uni (Etruscan goddess) 111
- 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 639, 640
- United Arab Republic 619
- United Kingdom *see* Britain/the British
- United Nations (UN) 600, 624, 626
- United Nations of America 463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n tourists 638  
 Barbary Wars 529-36  
 Boston Tea Party 530  
 and the British 529-30, 535, 536  
 and Israel 616, 620  
 and Jews 535-6, 598  
 and Libya 615-16  
 Mediterranean trade 529-30  
 migrations to 573  
 neutrality in Greco-Turkish war  
 587-8  
 shipping 529-30  
 and Smyrna 585, 586  
 and the Soviet Union 613, 620-21  
 War of Independence 529  
 World War II 609, 612
- Urban II 287
- Ushakov, Fyodor Fyodorovich 518-19,  
 520
- Uskoks 439, 449, 454-7
- Utica 66, 76
- Utrecht, Treaty of 497, 498
- Valencia 128, 339-40, 358, 364, 402-4  
 ceramics 403  
 Consulate of the Sea 402-3  
 decline of city of 474  
 Inquisition 475  
 Jews 404, 405, 408  
*llotja* 399, 400, 402  
 Moriscos and the kingdom of 473,  
 474, 475  
 sugar 393, 474
- Valentinian III, Roman emperor 232
- Valéry, Paul xxvii
- Valette, Jean de 428, 432
- Valletta 429, 516, 520, 607
- Valona (Vlorë) 385
- Van den Broecke, Bernard 467
- Vandals 223, 230-33  
 collapse of the Vandal kingdom 235
- Veiî 94, 109, 113, 175, 207
- Velia 179
- Velleius Paterculus, Marcus 66
- Venetian Gulf 358  
*see also* Adriatic Sea
- Venetians 250, 254-6  
 in Acre 325-6  
 and the Adriatic 385  
 and Albania 385  
 and Apulia 388  
 and Catalans 376  
 in Constantinople 458  
 and Crete 331, 377, 483-5  
 and the Crusades 292-4  
 and Cyprus 446-7, 451, 458  
 and Dutch 460, 461  
 and Egypt 354  
 and English 459, 460-61  
 and the Fourth Crusade 329, 330  
 and Genoese 325-6, 331, 355, 366,  
 376-8  
 grain trade 285, 358  
 and Greek corsairs 510-11  
 Inquisition 458  
 and Mamluks 392  
 and Manuel I Komnenos 294, 300, 319

- merchants 299–301; and the Byzantine economy 285, 294; Golden Bull and privilege to trade free of tax 285, 293, 294, 319  
*muda* protection system from pirates 360, 642  
 navy 322, 376, 448, 450, 461  
 nobility's domination of trade routes 360, 365  
 and Normans 284  
 and Ottomans 385–6, 387, 388, 392, 419–20, 423, 446–7, 483–6, 489; Cretan War (1645–1669) 484–5  
 and the Peloponnese 488–9  
*Serrata* (closing to the noble ranks) 361  
 shipbuilding 378–9  
 shipping 255, 360, 378, 379, 440, 460  
 and Thessalonika 384–5  
 trans-Asia trade 355  
 and Trieste 559, 560  
 in Tyre 293  
 and the Uskoks 455, 456–7  
 Venetian carnival 637  
*see also* Venice
- Venice 237, 246, 301, 316, 330, 383  
 and Alexandria 255–6, 292  
 Arsenal 378–9, 445–6  
 Austrian control of 519, 557, 558  
 Beatrice de Luna in 442  
 Black Death 369  
 and Byzantium 278, 319  
 Catalan consuls 401  
 and Constantinople 256, 330  
 and Dalmatia 389  
 emergence of 254–5  
*garum* sauce and the early prosperity of 641  
 and Germans 277  
 and the Habsburgs 456  
 and the Jews 296, 458  
 and Joseph Nasi 445–6  
*Milizia da Mar* 425  
 Napoleon and 518, 519  
 people of *see* Veneti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haping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457–9  
 and the politics of Renaissance Italy 412–13  
 and Ragusans 389  
 San Giorgio dei Greci church 458  
 Serenissima Repubblica 387, 413, 460, 489  
 St Mark's Basilica 255–6, 285, 330, 636  
 and the Turks 386, 387, 388, 419–20, 423, 446–7  
 and the Uskoks 455, 456–7  
 War of Chioggia 376–8  
 wool industry 458
- Venizelos, Eleftherios 571–2, 578, 585, 586, 588, 598
- Vespasian 208, 216
- Vespers, War of the 350, 361
- Vetulonia 109, 123
- Via Egnatia 235, 252, 283, 350
- Viareggio 633
- Vichy France 606–7, 610
- Victor III, Pope 280
- Victor Emmanuel III, king of Italy 611
- Victoria, British queen 554, 632
- Victoria College, Alexandria 591
- Villanovan culture 108–10, 113
- Villefranche 462
- Vincendon, Claude 591
- vines/vineyards xxix, 125, 164, 234, 267–8, 295, 335, 483, 528, 629
- Virgil (Publius Vergilius Maro) 74–5, 102, 189–90, 199
- Visconti, Filippo Maria, duke of Milan 382–3
- Visconti lords of Milan 376, 382–3
- Visigoths 223, 233, 246
- Vitellius, Aulus, Roman emperor 208
- Vittoriosa (Birgu) 430, 432, 435
- Vivara 34, 89
- Vix 124
- Volscians 175
- Voltaire 505
- della Voltas of Genoa 299, 315
- Vukčić, Strjepan 390–91
- wages 376
- Waghorn, Thomas 550



- Walsingham, Sir Francis 459  
 Ward, John 461, 462  
 Warrior Vase 51, 57  
 Warrior's Tomb 108  
 warships/fleets/navies  
   Algerian 423  
   American 529, 536  
   Angevin 351-2  
   Arab 249, 250  
   Austrian 539, 558, 578, 580-82  
   Barbary 427; *see also* Barbary corsairs  
   *bertoni* 461, 462  
   British 514, 524-5, 564, 578, 579-80, 588, 605, 606, 614, 622  
   Byzantine 233, 235, 249, 251, 324  
   Caeretan 114  
   Carthaginian 114, 167, 173, 178, 180, 181, 186-7  
   Castilian 364  
   Catalan 347, 352, 359, 362-3, 366, 434  
   of Charles V 350, 351-2  
   conditions on 425-7  
   diets on 427, 463  
   Dutch 463  
   Egyptian 51, 156, 163, 293  
   English 488  
   Etruscan 114, 115  
   French 423, 514, 523, 581, 606  
   Genoese 273, 275  
   German 578; U-boats 582, 609  
   Greek 538, 588  
   Holy Leagues of western navies 365, 419-20, 449, 450-51  
   Italian 558, 582, 609, 611  
   Japanese 582  
   light galleys 281, 315-16, 449-50  
   Moroccan 364  
   Muslim 249, 250-51, 268, 278-9, 364, 402, 414, 423-4  
   Neapolitan 363  
   Ottoman 424-7, 447, 448, 449-50, 452, 484, 506-7, 538, 539  
   papal 429  
   Persian 134  
   Phoenician 72, 134, 136-7  
   Phokaian 114  
   Pisan 272, 273, 275  
   Portuguese 366, 393-5  
   Ragusan 438  
   Rhodian 163  
   Roman 175, 176, 177, 178, 179, 180-82, 185, 186-7, 198, 208-9, 210  
   Russian 504-7, 512, 520, 523  
   Sicilian 319-20, 321-2, 323-4, 429  
   Spanish 424, 427, 429, 489; Armada 438  
   spiked ramming ships 72, 181  
   Syrian 156  
   Venetian 322, 376, 448, 450, 461, 557  
 Washington, George 529  
 water  
   carried by ships xxx  
   irrigation *see* irrigation  
   and tourism 637  
   transport 201; *see also* shipping  
   Tyre and 68  
   Valencian water tribunal 408  
 Waterhouse, J. W. 563  
 wax 68, 114, 349, 355, 440, 465, 485, 532  
 weapons  
   bronze 12, 17, 20, 32, 109  
   copper 20  
   iron 248  
   spiked rams 72, 181  
 weather systems xxviii  
   *see also* storms; winds  
 weights 70  
 Weizmann, Chaim 591  
 Wenamun 39-41, 55, 70  
 Weshesh 50-51  
 West Bank 619, 638  
 Wheelus Field air bases 616, 621  
 Whitaker, Joseph 528  
 White Sea (Turkish name for Mediterranean) 386  
   battle for 428-35, 445-51  
 Whittall family 585, 586  
 Wilhem II, Kaiser 577  
 William I, king of Sicily, 'the Bad' 305, 322  
 William II, king of Sicily, 'the Good' 314, 323-4

- William of Modica 321-2  
 William of Orange 495  
 Wilusa 44-5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562, 563  
 winds xxiv-xxv, xxvi, xxvii, 71, 312,  
     313-14  
 wine 20, 35, 56, 73, 76, 78, 90, 237, 367,  
     511  
     Alexandria and 157, 159  
     amphorae 73, 92, 157, 164, 237  
     Corinthian trade in 97, 285  
     Etruscan 109  
     expanding interest in Mediterranean  
         wines 629  
     Greek and Etruscan production  
         technology 125  
     Iberia and 129  
     Malmsey 485  
     Marsala 528  
     Massalia and 124  
     Joseph Nasi and 444  
     poisoned 457  
     Rhodian 164  
 Wisdom of Solomon 162  
 women 643-4  
     display of the female body 635  
     harems 248, 644  
     nuns 422, 501, 595, 644  
     prostitutes 74, 464, 644  
 wood *see* timber  
 Woodhouse, John 528  
 wool 272, 295, 347, 373, 511, 642  
     Castilian 404  
     Catalan cloth 401  
     Crete 24  
     English 326, 347  
     Flemish cloth 277, 295, 323  
     Italian cloth 323  
     Ragusans and 389-90, 439, 465  
     Spanish 444  
     Troy 21  
     Venetian wool industry 458  
 Woolley, Sir Leonard 91  
 World War I 577-82  
     Arab revolt 592  
     World War II 599, 605-12  
     Wren, Sir Christopher 493  
     writing  
         Cretan 25, 27, 30-31  
         disappearance after twelfth century  
             BC 63  
         early Greek 47, 64  
         Iberian 129  
         Mycenaean 30-31  
         Phoenician 80, 644  
         *see also* alphabet  
     *xaloc* xxviii  
     Xenophon 167  
     Xerxes, king of Persia 135, 137  
     Yom Kippur War 620  
     Young Turks 583  
     Ypres 347  
     Yugoslavia 611, 613-14, 615  
         disintegration of 638  
         tourism 636, 638  
     Yusuf Bashaw 535  
     Zaccaria, Benedetto 358  
     Zadar 448, 613  
         *see also* Zara  
     Zakynthos 233  
     Zama, battle of 187  
     Zante 460  
     Zara 329, 601  
         *see also* Zadar  
     Zekerbaal 39-41  
     Zeus 221  
         Zeus Ammon 150  
     Zevi, Shabbetai 479-80, 481-2  
     Ziani, Pietro 301  
     Ziani, Sebastian 300  
     Ziani family 299  
     Zionism 592, 596  
     Zog I (Ahmet Zogu), king of Albania  
         602-3  
     Zogheb family 591

三千多年来，地中海一直都是人类文明的一处伟大中心。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是第一部完整叙述地中海历史的著作。书中讲述的地中海故事对世界历史发挥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在时间上它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马耳他神殿的建立一直讲到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在空间上从宣布罗嗦一直讲到雅法、热那亚与威尼斯，还生动记叙了朝圣者、海盗、苏丹、海军将领等人物的经历。

2011 The Mountbatten Maritime Prize

2013 British Academy Medal

人物形象丰富多采……阿布拉菲亚轻松地热情洋溢地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就其本质而言，本书是一部人类历史，一部扣人心弦、富有世俗色彩、生动、妙趣横生的人类历史。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金融时报》（英国）

这是一项可以为普通读者接受的非凡学术成就。任何一个因分散的地中海历史碎片而产生兴趣的人在阅读此书后都将获益匪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出现能够与本书抗衡甚至类似的作品。

——罗杰·克劳利，《文学评论》

一本具有轰动效应的书……这部恢宏的历史著作展现了一片狭长的海域是如何变成人类文明的交汇之地的。

——汤姆·霍兰，《观察家报》

在世最伟大的地中海历史学者。

——安德鲁·罗伯茨

在评价阿布拉菲亚取得的成就——他对史诗场面的描绘、对细节的敏锐观察与清晰的语言风格——时，任何评论都显得苍白。他在书中描写了大量无畏的探险者、焦虑的朝圣者、勇于进取的商人、野心勃勃的政客、战战兢兢的难民……真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几乎每一页都充满人文关怀和洞见……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168.00元（上、下）